

地 缘 看 世 界

西 域 (上)

温骏轩 / 著

第 五 册



地 缘 看 世 界

西 域 （ 上 ）

第 五 册

温
骏
轩
著

仅供学习
禁止商用



整理说明

本书整理自天涯社区论坛的帖子——地缘看世界，作者天涯 ID 为鄙视抢沙发的（笔名为温骏轩）。其中微信公众号：地缘看世界，亦有更新和连载，也可关注。在帖子十年连载的过程中，创作出的文字内容比较多，涉及中国历史和全球各地的解读较广，为方便查找和阅读，对其进行了分类和整理成册。当然，这些划分和整理只是基于个人的理解。由于涉及到版权问题，整理出的系列电子书可以用于个人打印，收藏，但不可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

书中的插图（以地图为主）基本沿用帖子的原图。因很多文字内容需要对照地图才能更容易理解，但又不想经常性地翻页查看地图，所以在很多需要用图的地方都配有地图，但也因此会出现部分的重复地图，好在对于电子书来说，因此增加的这点页数并无大碍。另外，有的地图理论上来说，插入文中时就应该保持完整的一张，即保持原图的完整性。只是由于页面有限，这样的话显示会比较小，地图看着不是很清晰，所以有时会只截取其中的部分插入页面，显示效果更好。相比于美观，我想还是把实用排在第一位。

除了沿用作者所作的地图以外，还另外补充了一部分插图，其中包括地图和实景图片。补充的地图来源于网络和个人制作。由于文字内容涉及范围广，原帖地图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新增图还是很有必要的。对于个人制作的地图，因水平和制图能力有限，仅作为参考，如有发现错误的地方，也可指出修改，以免误人子弟，那就不是希望看到的了。至于哪些是原图，哪些是新增补充的地图，应该不难看出，况且帖子原图也已集中整理出来，大多数人应都存有，对每张原图大体比较熟悉了。

实景图片部分，则基本来源于网络。对于一个地缘板块的了解，只有地图和文字还是不够的，如果能够身临其境，会有更好的体验。如果一时不能做到，通过图片也能一定程度有直观的感受。有时候，对一些事物的描述，文字方面比较苍白，“一图胜千言”，一张精确直观的图片，所能传达出来的信息会更有效。当然，前者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文字作为铺垫，对图的理解同样会有局限性，二者相辅相成。

对于来源于网络的地图、图片，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对原图作者深表敬意和感谢。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敬请及时告知，会立即删除或做其他妥善处理。本书整理仅用于学习，不会用于商业途径。对于地图方面，只是自学之用，并未经过权威机构的核勘审查，所以地图没有等同于正规出版物的法律效力，切忌上纲上线。如存在任何问题，也可指出进行修改或者删除，以减少因扩散而造成的不利影响。

关于划分章节方面，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比如内容、字数、版面等。基本上，每一章节都是一个独立的主题，但如果字数太多的话，章节也会作调整，以使阅读体验上能

够更佳。通过这些划分的章节，层层推进，更容易理解文章内容的思路和传达的信息。章节标题基本都是自取的，作为文字内容的提示。因标题比较多，所以不敢保证所取的都比较精确，可以作为参考之用。

在整理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文字校对方面，对此表示感谢。因个人水平和精力有限，整理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些问题和错漏之处，如有发现也可指出，以进行修改，使能够得到完善。最后，在此对沙发一直以来的付出和分享表示感谢！

清风

前言

【贴子写作总结】

开始以地缘的角度解析国际关系，最初只是来源于一时的灵感，觉得中印两国的地缘结构颇有些相似的味道，于是便有了《印度与中国的地缘情况对比》的主帖。只是写到后来，很多朋友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于是便越写越多了。也许以后还要将视线从中国的周边扩散到其他地区，因此便请版主将名字改为了《地缘看世界》。没有两个国家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主帖中将中印两国做这样一个类比，也成为争议最多的话题。我承认一开始并非出于技术的角度开这个帖，只是作为一个有趣的话题罢了。不过后面的内容的确是经过一番探究的。

我并不认为大家需要全盘接受我的观点，这里只是提供一个方法，或者说一个思路。大家尽可以在这当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其实用地缘的方法解析国际关系，很多高手都在做。我只不过是做些基础的分析，为部分需要的朋友答疑。就好像大家都知道 $1+1$ 等于 2 ，但也许有人会更感兴趣为什么结果不会是 3 一样。就“地缘看世界”这个话题而言，实际上还是从中国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或者说是主要探究与中国相关的地缘话题，包括中国在这个星球上的地缘定位、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结构，以及它们与中国之间的地缘关系。这部分目前已经整理成书稿，如果幸运的话，当会有机会出现在书店的某一个角落。

在写完这部分之后，按照“地缘看世界”这个命题，应该会将视线投向其他地区，比如欧洲、美国，以从地缘的角度更为全面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不过混迹于国观也有些年头了，深感大部分朋友都对国家兴亡抱有极大的兴趣，但有些时候也显得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对于激情，我向来是持肯定态度的，否则一个国家将会了无生气。不过在激情的背后多了解些基础知识，想来不是件坏事。而在将视线投向更为波澜壮阔的国际舞台之前，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本身的地缘结构。西方有句谚语叫“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也不是自古就形成现在的地缘结构的。

之前的部分，我们可以将之总结为第一部分，并暂命名为《中国崛起之地缘路线图》；而第二部分则以解读中国现有的地缘结构为方向。以地缘为角度，历史为脉络，沿着先人的足迹，渐进式地解读中国形成的过程。如果要为这部分取个名字，可以叫作《中央之国的形成》。以史为鉴，一则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国家；二则可以从历史的兴衰探究出国际政治的规律，以利于我们更清楚地睁眼看世界。当然，对于喜欢历史的朋友，也许这部分可以成为你读史的助手，里面的内容或许能够帮助你解开心里埋藏已久的疑惑。

帖子不会写得太快，因为按照我个人的习惯，还是要以图明事，在线做些地图以使大家更直观地了解内容，但会尽量保证每天更新。对于这些地图，如果觉得还有些参考价值的话，尽可以拿去使用。由于由于是在线写和做图，难免会出现失误甚至硬伤，如果有看

出的朋友，也请指出，在此先行谢过。另外对于史料的采信，尽量会采用已有定论的史实，不过“周”以前的历史以及地缘格局，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推论，大家姑且当成一种参考。其实整个帖子的内容，都只是一家之言，希望大家不要抱着听课的态度来看，我亦担不起这个责任。大家并不一定要将每个部分都看完，尽可以在目录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并参与讨论，也可以短信交流。

关于之前的内容，以及新近发生的一些国际事件，与地缘相关的也会间或做一些解读，内容则会偏重于基础分析。至于预测和判断，在看过这些基础分析后，相信大家会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写些时评或慷慨激昂的文字，更新速度会快些，也会让很多朋友觉得更加过瘾。不过论坛上已经有很多方家在做这类事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还是做些基础的事情更有意义些吧。

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一开始写只是为了分享一点心得，一个角度。写的多了倒也可以集结成章，期间亦有不少编辑联系过，希望可以出版。不过经过一年多的操作，终因国际部分牵扯到的敏感话题过多，而告夭折。所以对很多希望能看到纸质书的朋友说声抱歉，特别是曾经答应过赠书的朋友。

按照计划，目前已经结束了《中央之国的形成》中先秦部分的章节，并且在抽时间整理、修改。至于出版的事，不会很急，毕竟这是关于中国的事情，需要抱着一份感恩、敬畏的心情来做，在考虑商业性的同时，不能在细节方面出现硬伤。如果有编辑能够抱着同样的心情来看待这件事情，可以来共同完成这个心愿。对于希望看到地球其他角落的朋友，也不用急，待现在写的“秦汉第一帝国”部分完结了，会对欧洲的地缘结构、传承做详尽解读。写完之后，三国迷期待的三国故事就会展开了。时事的背景解读，依然会穿插期间。但不会每件事情都往地缘上面靠，除非这件事情的确有地缘博弈的成份在里面。

【时政解读的分析】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多写些时政，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闻，可写的素材丰富，感兴趣的人也多。其实这主要还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了，毕竟这个帖子只是从地缘的角度谈些基础的、战略性的东西。而无论是地缘还是战略，都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并不会随时变换的。如果有些时事有着强烈的地缘背景，也是会随时插播解读的。只不过可能只是一段话，一张图，看上去不如很多方家的时政帖内容丰富罢了。

当然，观察各种层面的时政要闻，并不一定都要从地缘视角来解读。也有朋友希望我从综合的角度，来周期性地解读时政。首先感谢这些朋友的信任，不过就我个人的想法来说，还是不愿意这样去做，即使能够吸引更多的眼球和点击率。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愿陷入为了解读而解读的怪圈之中去。我曾经在回答一位长期跟帖的朋友问题时写到过：我之所以不愿意写时评，是因为现在的时评路子大多已经模式化了。先是按照冷战思维，一厢情愿地把世界划成中、美两极。无论什么事情，包括一些纯粹的突发事件和刑事案件，

都能和所谓的中美博弈拉上关系。演变下去，就是“美国阴谋无处不在，中国高层深谋远虑”（地球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大棋局”的一部分）。当然，这种模式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国内主流论坛的舆论环境。如果在导向相左的网络环境中，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解读出“中国威胁无不在，美式民主力挽狂澜”的结论来。

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国家制定各项政策，做各种事情，首先都是基于自身利益、安全考虑的，而参与度也是与利益、安全关联度成正比的。大部分时候，大多数国家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只能是见招拆招，根据时事的变化，以务实的态度调整自己的政策，并非是每一件事情都那么深谋远虑，决胜于庙堂之上。所以如果以吸引眼球为目的，周期性地写时政的话，在思路很容易演变成“过度解读、上纲上线”；在方法上，则模式化为将石油、金融、宗教、党派、共济会、二分法的集团划分（中美）等等时评必备要素，用万试万灵的“阴谋论”将之串连起来的时政分析法，就不可避免地大行其道了。正因为如此，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做一些基础的分析。如果大家觉得这些分析有“渔”的成分在里面，那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

上述对时政解读的态度，除掉不愿意陷入为了解读而解读的“逻辑怪圈”之外，技术上对这个时代有自己的看法，也是重要原因。基于国际关系当中博弈是永恒的主题，因此很多讨论，包括这个帖子的提问中，基于冷战思维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美两大阵营，并凡事都和两国的战略意图拉上关系的情况比比皆是。这其实是一个很偷懒的办法，因为就博弈的复杂程度来说，多角博弈的情况总是比两方对决要复杂得多。简单的两分法，更容易让大家找准辩论的焦点。只不过在现实的情况下，切割世界的铁幕早在 1990 年就被撕裂。新时代的政治博弈，也已经不是冷战中那种两极对抗明显的模式了。如果让我为这个时代贴上一个标签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暗战时代”。

一个时代总是有不同于前代的诸多特点的，就像冷战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美、苏两大阵营用军备竞赛这种战略博弈手段，来代替了那种动辄诉诸战争的大国博弈模式。能够实现这个“进步”，核武器这种毁灭性的战争武器的诞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从军事博弈的角度来看，核武器的作用在于极大压缩了对手的战略纵深，让大国们可以在一次攻击中就丧失战争能力，甚至生存能力的风险下，考虑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毕竟在双方都拥有核打击能力的情况下，同归于尽的风险，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承担的。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武器，居然成为了世界和平的保卫者。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前提是你不能让所有人都拥有这项可怕的武器。

回到我们的“暗战时代”。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于前代的鲜明特点，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已经开启了 30 年的暗战时代，和之前的冷战时代有什么不同：

一：多极博弈取代了两极博弈模式。单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看，冷战或者二战当中，那种非敌即友的划分阵营的方式，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了。尽管美国的一超地位仍然

存在，但在地缘潜力上，中国、俄国、欧盟，甚至印度，都已经作为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出现在核心政治圈中了。也许有人会觉得，在美、欧战略联盟依旧存在的情况下（实际上也已经分化明显），中、俄在战略上也在背靠背。这似乎又在表明，世界又重回两极对抗的模式了（印度在中间游走）。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诸大国、板块之间并没有拉起新的铁幕。基于务实的态度，现在无论大、小国家都不会认为在某一层面的对手，就不能在另一层面进行合作。

二：经济取代军事，成为硬实力较量的主要指标。基于核武悖论的存在，大国们终于明白了，在你不可能毁灭世界的前提下，盲目地进行军备竞赛是多么的可笑。这并不是说拥有军事上的战略威慑力就没有必要，但这一切必须和自己的经济实力成正比。

三：合作取代对抗，成为国际交往的主流。如果说在冷战及之前的一、二战时期，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结盟，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对抗中彻底击垮对方的话，那么现在的国家竞争，则是为了在合作当中取得更大的支配权。这种变化的产生，在技术上得益于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并最终成就了现在这种“暗战时代”。就大国关系的处理上来说，这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你能够在台面上听到的，总是关于“合作”的声音；即使是台下的博弈不可避免，表面和平的维护也是必要的。如果形势发展到有一天，大国们开始撕破脸，公开指责某一方是世界和平的破坏者，那么新的时代也就到来了。

【地缘研究的要素】

很多初看帖子的朋友，会回帖表示这个帖子所表达的是“地理决定论”，或者认为这是一个普及地理知识的帖子。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地理也好，环境也罢，都只是“地缘”这个概念中的一个要素罢了。“人”才是地缘这个概念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也就是说，当我们用地缘视角去审视一件事情时，不光要去考虑物理环境，更要考虑“人”在其中的作用。而地缘研究的终极目的，也是希望“人”在了解地缘规律的情况下，作出更事半功倍的决策。

与一般的历史、政治研究习惯着眼的精英人物有所不同，地缘视角下的“人”指的是群体性的人。当我们把视角放大到用各种属性划分的人类群体身上时，那些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由于生存环境和相互博弈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属性，比如种族的划分，民族的认知；宗教、语言、文字等文化特征，就成为了“地缘”的一部分，并成为地缘研究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研究、解读这些地缘要素产生的环境背景，但在大多数时候，这些要素会直接运用到地缘研究中去。

要想甄别哪些反映在群体身上的特性能归入地缘的概念中，有个很简单标准，那就是它有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按照这个标准，根植于绝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基于农耕文化所产生的对“家”的眷恋感，就是研究中国地缘时所必须考虑的要素；而那些阶段

性流行的所谓“日风韩流”，就不在考虑的范畴中了。

明确了地缘研究需要考虑的要素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地缘视角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了。由于这些要素都是相对恒量，所以解读出来的观点也就不可避免地偏向战略层面了。比如我们可以从地缘的视角来分析出，中国有哪些城市具备成为区域中心，或者“国际金融中心”的潜质，有可能直接辐射哪些区域，但具体要达到上述目标，就不是光做地缘研究能够做到的了。

温骏轩

2011 年

昨日的事件，明日的世界

2009年7月，我在“天涯论坛的国际观察版块”，用“鄙视抢沙发”这个马甲开写了名为《地缘看世界》的帖子（后应部分读者要求，换了个文气十足的笔名“温骏轩”）。那一年我的宝宝即将来到这个世界，为了陪伴爱人和他，便下定决心推掉晚上的工作和应酬。不过对于一个习惯工作至深夜的人来说，爱人早睡后的漫漫长夜，实是需要有点事情来打发的。在论坛里流连，看起来是不错的方式。

一开始，也只是如很多人那样，用马甲写些口水贴博关注。只是如此消磨光阴，实在非我本性。一如“鄙视抢沙发”这个儿戏般的马甲一样，并非真的在“鄙视”坐到沙发的朋友，更多的只是在表明一种态度：“人上网多是因为无聊，但网上并非只能做无聊的事”。历史和时事一直是非常热门的两个话题，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前者有助于我们了解昨日的事件，后者则帮助我们推演明日的世界。以这两个话题为切入点，分享一点心得、方法，看起来也算是件有意义的事。

从技术解读看，历史研究者多着眼于考据，时事解读则更多是一种推演。很多时候历史粉和时政爱好者会分成两个群体，就像当我沿着历史线解读中国的地缘结构时，会有读者建议应该发在历史版块一样。然而昨天的历史也是当时的时事，要想一窥历史事件的原貌，需要置身于当时的环境里去理解。一个只知道在故纸堆里寻找证据的人，很难看清真正的“历史”；反过来，今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又都有它的历史渊源，没有历史常识的人，同样很难看清今天的时事，更别说预测未来的走向了。问题在于，无论是解读历史，还是推导未来事件，我们都极易受到“证据”的影响。一旦证据的可靠性存疑，甚至大误，分析出来的结果自然会不可靠。

2006年，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年份。在这一年，央视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品三国》及天涯历史版块的《明朝那些事儿》火爆一时，从人性角度的解读，让众多历史爱好者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只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易中天和当年明月两位老师的解读越精彩，所产生的困惑就越多。为什么基于同样的史料，不同的切入角度会让我们有看到两部历史的感觉呢？既然大家所依据的都是老祖宗留下的那些材料，那么谁的解读才是历史的原貌呢？

事实上，对此留有疑惑的不仅是我，还有很多历史爱好者。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即使史料丰富，谁又能保证历史留存下来的那些文字、证据，就一定没有曲笔呢？张学良先生在幽禁期间，为了打发时间曾潜心研究明史，并做了大量笔记，但一直到今天，研究成果都未能公布。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他认为那些文字记载让人疑惑之处太多，研究得越深，就越怀疑自己的判断有被前人误导之嫌。

那些被很多研究者奉若圭臬的历史文字是如此，在时事评论圈盛行的“阴谋论”套路

也是如此。最为典型的做法，就是先按照冷战思维，一厢情愿地把世界划成中、美两极。无论什么事情，包括一些纯粹的突发事件和刑事案件，都能和所谓的“中、美”博弈拉上关系。演变下去，就是“美国阴谋无处不在，中国高层深谋远虑”（地球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大棋局”的一部分）。当然，这种模式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国内主流论坛的舆论环境。如果在导向相左的网络环境中，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解读出“中国威胁无不在，美式民主力挽狂澜”的结论来。

既然历史记录不完全可靠，阴谋论的推演又陷入了“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怪圈，那么有没有一种证据本身较少受主观影响，且大家能够自行核对证据的研究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地缘”。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地缘”一词几乎等同于“地缘政治”。有这种理解也属正常，毕竟人类的发展、内部的博弈，很大程度是通过“政治”体现出来的。不过仅仅将“地缘”视角局限于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博弈，是有失偏颇的。经济、人文、宗教等诸多领域，都是地缘研究的对象，政治只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向罢了。

除了将“地缘”窄化为“地缘政治”的误区以外，“地理决定论”是容易引发的另一个误读。地理毫无疑问应该是“地缘”研究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中国国家地理”是最合适组织开展这项研究的原因（包括授权出版也是如此）。然而正如盖房子一样，基础固然重要，却也不能让人住在地基之上。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能盖出什么样的房子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用地缘视角去审视一件事情时，要做的不光是考虑地理、气候等物理环境的影响，更要考虑“人”在其中的作用；而地缘研究的终极目的，也是希望“人”在了解地缘规律的情况下，作出更事半功倍的决策。

源出《孟子》一书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若是将地缘概念窄化的话，那么地缘之利所指向的就只是“地利”。实则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概念本身，都是“地缘”因素。之所以要选择“地缘”二字，就在于这两个字本身的含义能够完美的做到了这点。所谓“地”，指向的是那些包括地理、气候等因素在内的物理环境；“缘”则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地”之间的关系。

与一般的历史、政治研究，习惯着眼于精英人物不同的是，地缘视角下的“人”，指的是群体性的人，精英人物则是顺势而出的代表。当我们把视角放大到用各种属性划分的社群身上时，那些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基于生存环境及复杂博弈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属性，比如种族的划分、民族的认知；宗教、语言、文字等文化特征，就成为了“地缘”的一部分，并成为地缘研究所需要考虑的要素。要想甄别哪些反映在群体身上的特性，能归入地缘的概念中，有个很简单标准，那就是它有没有经历时间沉淀。

一个地缘要素的形成，一般最少需要半个世纪时间的沉淀。如一个新王朝建立 5、60 年后，绝大部分民众将成长于这个新王朝，由此产生的归属感就是重要的地缘要素，亦会帮助王朝惯性运行很长一段时间，哪怕期间出现不少“昏君”。大多数时候，这些非物理

性地缘要素，可以直接运用到地缘推演中去。比如一般解读现实地缘政治时，只需将“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中国视为一个地缘板块即可。然而如果想再深入了解中国是怎么形成的，中国人身上特有的属性又有没有可能改变，就需要更深一步的研究了（对于这个世界也是）。

世界是复杂的，诸地缘要素之间往往又互为因果、互相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以地理为基础、历史为主线，层层推进地探究这个世界形成的过程，是最好的研究方法。用地缘视角来串连那些历史事件，不仅能够用来帮助验证地缘逻辑，更能训练我们从纷杂的线索中，抓出问题本质的能力。《地缘看世界》一文这8年来所写的400余万文字，实际在做的就是这项工作。《中央之国的形成》、《帝国时代》、《中东部分》、《欧洲部分》、《大航海时代》等篇章，帮助我和喜欢这些文字的读者，更加清晰的了解了我们的世界。

很显然，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庞大到我自己都不太会回看写过的内容。好在我所接受的法律思维训练，以及一开始就规划好的大方向，使得这些文字最终有机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过这些文字其实也并不重要，我经常劝读者，不需要把这些内容全部看完，更不需要全盘接受里面的观点。我所想要分享的只是一个角度，一种思维方式。如果喜欢这些文字的读者能得到一点启发，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在这里，特别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一书，正是他所分享的“大历史观”，当年帮助我跳出了传统人文历史的束缚，从更高的纬度观察这个世界。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地缘视角绝不只适用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这些高冷的课题，更可以为每一个个体服务。孟母三迁就是个人对地缘环境的一次主动选择。当然，地缘研究也有它的局限性，由于地缘要素都是相对恒量，基于这些要素而推导出的只能是一个战略性、方向性的选择。孟母也不可能只凭选了个好邻居，就培养出一位“亚圣”。我写《地缘看世界》一贴也是如此，最值得分享的不仅仅是一个新颖的视角，更是选择之后的持之以恒。

温骏轩

2017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匈奴在蒙古高原左翼的扩张	1
第一节 匈奴崛起于色楞格河上游地区	1
第二节 匈奴在南北扩张面临的问题	4
第三节 东胡游牧于大兴安岭西麓草场	6
第四节 锡林郭勒草原和科尔沁草原的价值	10
第五节 匈奴征服乌桓和鲜卑部落	15
第二章 匈奴在蒙古高原右翼的扩张	18
第一节 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地理结构	18
第二节 唐努乌梁海分布的渔猎民族	20
第三节 李陵与唐努乌梁海的联系	24
第四节 唐努乌梁海在蒙古高原的地位	27
第五节 大湖盆地的地理结构	29
第六节 大湖盆地草场分布于山地中	35
第三章 匈奴在西域与河西走廊的渗透	37
第一节 蒙古高原牧民渗透阿尔泰山南麓	37
第二节 欧亚草原放牧方式差异的背景	39
第三节 匈奴内部分配的南侵基地	42
第四节 匈奴西扩面临的荒漠和戈壁	46
第五节 匈奴南下河西走廊的河谷通道	50
第四章 汉军在代地平叛并与匈奴交战	57
第一节 韩王信在匈奴人南侵时降叛	57
第二节 汉军北上击退匈奴和平叛	59
第三节 匈奴诱使汉军进入大同盆地	61
第四节 吕北山地和阴南丘陵的防御力不足	65
第五节 刘邦身陷匈奴的白登之围	69
第六节 匈奴撤围并与汉帝国和解	71

第五章 汉初河套与河西走廊的形势	74
第一节 汉匈在前套平原形成共存	74
第二节 匈奴内部对河套平原的分配	76
第三节 匈奴攻灭大月氏占据河西走廊	77
第六章 汉帝国对陇西高原的经营	82
第一节 陇西高原内部缺乏地缘中心	82
第二节 陇西高原与周边板块的地缘关系	85
第三节 大月氏未与汉帝国接触的原因	87
第七章 河湟谷地地区的地缘结构	90
第一节 周穆王与湟水河谷的联系	90
第二节 汉代时羌人经营湟水河谷	93
第三节 河湟谷地的范围及其重要价值	94
第四节 湟水较大通河更具地缘价值	99
第五节 湟水河谷连接河西走廊的通道	102
第六节 湟水河谷经青海道连通西域	106
第八章 关中经陇西至河西走廊的路线	111
第一节 张骞选择由河西走廊进入西域	111
第二节 关中经陇关道和萧关道连通陇西	112
第三节 陇西中北部至河西走廊的路线	115
第四节 陇西南部经庄浪河谷至河西走廊	117
第九章 汉初河西走廊的地缘结构	124
第一节 张骞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俘获	124
第二节 焉支山对河西走廊的分割作用	125
第三节 张骞进入黑河和北大河流域	127
第四节 疏勒河和党河流域的地理结构	130
第五节 大月氏击败乌孙完控河西走廊	133
第十章 西域东疆盆地区的地缘结构	135
第一节 天山南北降水量的差异及影响	135
第二节 东疆盆地区的地理结构	137
第三节 东疆三个盆地的地缘潜力	140

第四节 吐鲁番盆地的坎儿井的作用	144
第五节 柴窝堡——达坂城谷地的区位优势	147
第十一章 博格达山南北的地缘格局	151
第一节 博格达山地缘圈形成的背景	151
第二节 博格达山南麓分布的国家	153
第三节 博格达山北麓分布的国家	156
第四节 匈奴控制巴里坤盆地和伊吾谷地	159
第五节 柴窝堡——达坂城谷地的风灾问题	163
第六节 三塘湖盆地开发程度低的原因	165
第十二章 清代时西域与外蒙古的分割线	171
第一节 外蒙古管辖阿尔泰山南麓的背景	171
第二节 清帝国对蒙古高原统治的方式	175
第三节 清帝国与漠西蒙古的博弈	177
第十三章 大月氏与乌孙先后入主伊犁河谷	181
第一节 伊犁河谷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	181
第二节 外伊犁盆地的地理结构	185
第三节 近代中俄在伊犁河谷的博弈	190
第四节 大月氏从尤尔都斯盆地攻入伊犁河谷	194
第五节 乌孙占据伊犁河谷	199
第六节 乌孙从汉帝国反击匈奴中获益	201
第十四章 乌孙向伊犁河谷北部扩张的路线	203
第一节 准噶尔盆地难以诞生独立游牧政权	203
第二节 准噶尔西部山地的地理结构	206
第三节 清俄在准噶尔西部山地的分割线	209
第四节 乌孙沿阿拉套山西北麓北进	213
第五节 乌孙经果子沟和赛里木湖北进	215
第六节 准噶尔盆地西南角的地缘潜力	218
第十五章 乌孙在其北部和东部的控制线	223
第一节 乌孙与匈奴分割准噶尔西部山地	223
第二节 乌孙控制玛纳斯河和塔西河	225

第三节 博格达山北行国能独立的原因	229
第十六章 乌孙在天山南部扩张的边界	233
第一节 乌孙控制特克斯河谷地区	233
第二节 乌孙控制伊塞克湖盆地区	236
第三节 中亚北部族群属性的变迁	241
第四节 乌孙控制阿克苏河上游谷地	244
第五节 大宛国控制费尔干纳盆地	247
第十七章 乌孙在天山西部扩张的边界	251
第一节 乌孙渗透入楚河河谷地区	251
第二节 俄国接收东干人开发楚河河谷	254
第三节 费尔干纳盆地的复杂形势	258
第四节 吉尔吉斯斯坦的南北分裂危机	260
第五节 吉尔吉斯斯坦南方的民族问题	264
第六节 康居控制塔拉斯河谷	268
第十八章 哈萨克斯坦三玉兹的地缘结构	272
第一节 大玉兹部游牧于七河地区	272
第二节 中玉兹部游牧于哈萨克丘陵	275
第三节 中玉兹部进入天山的路线	278
第四节 图尔盖草原在连通欧亚上的作用	282
第五节 中玉兹部沿萨雷苏河南下渗透	284
第六节 小玉兹位处中亚西部和东欧草原	286
第十九章 哥萨克人在南俄草原的逆袭	290
第一节 东欧平原的草原与森林分割线	290
第二节 哥萨克人在南俄草原形成的背景	297
第三节 哥萨克人渔猎属性的形成	300
第四节 清帝国和俄国同时逆袭草原	302
第五节 哥萨克人渔猎属性的价值	305
第二十章 锡尔河中游地区的地理结构	309
第一节 锡尔河中游右岸的地理环境	309
第二节 中亚地区南农北牧的特点	314

第三节 锡尔河中游左岸的地理环境	316
第二十一章 伊朗高原与中亚的地缘关系	319
第一节 大中亚的农业带与早期存在的族群	319
第二节 雅利安人迁入伊朗高原定居	322
第三节 伊朗高原承受的入侵压力	326
第四节 米底和波斯在伊朗高原先后崛起	329
第五节 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帝国	333
第六节 塞琉古王朝将统治重心西移	337
第七节 帕提亚崛起并统一伊朗高原	340
第二十二章 大月氏人进入粟特地区	344
第一节 希腊化时代的中亚政治格局	344
第二节 泽拉夫尚河中下游形成的绿洲	346
第三节 卡尔希河中下游形成的绿洲和草原	349
第四节 大月氏人南下阿姆河流域	352
第五节 昭武九姓分布于粟特和花刺子模	354
第六节 大月氏到来前粟特存在的定居者	359
第二十三章 大月氏人入主吐火罗盆地	362
第一节 大月氏攻取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	362
第二节 吐火罗盆地分属不同的国家	365
第三节 粟特经铁门关沟通吐火罗盆地	367
第四节 吐火罗盆地南部蓝氏城的位置	370
第二十四章 兴都库什山脉北麓的地缘结构	373
第一节 兴都库什山脉的特点及其战略价值	373
第二节 昆都士河谷与蓝氏城的交通优势	375
第三节 捷詹河绿洲和马雷绿洲的价值	379
第四节 游牧民族在卡拉库姆荒漠占有优势	383
第二十五章 兴都库什山脉西麓的地缘结构	389
第一节 赫拉特为阿里亚地区的地缘中心	389
第二节 锡斯坦地区的地理结构	390
第三节 锡斯坦灌溉设施在历史上遭破坏	394

第四节 锡斯坦由塔尔纳克河谷进入南亚	396
第二十六章 兴都库什山脉南麓与南亚的通道	400
第一节 俾路支高原的潜力及其战略价值	400
第二节 坎大哈经波伦山口沟通南亚	403
第三节 普什图人与周边族群的亲缘关系	408
第四节 由锡斯坦进入南亚的河谷通道	410
第二十七章 兴都库什山脉南北通行的山口	414
第一节 昆都士河谷切入喀布尔河谷的山口	414
第二节 巴米扬和希巴尔山口的区位优势	415
第三节 卡瓦克山口和多拉山口的位置	420
第二十八章 印度河平原的地缘结构	426
第一节 波特瓦尔高原上的犍陀罗文化	426
第二节 影响印度河流域伊斯兰化的因素	428
第三节 印巴两国分割上印度河平原	432

第一章 匈奴在蒙古高原左翼的扩张

第一节 匈奴崛起于色楞格河上游地区

从战国后期开始，匈奴所代表的蒙古高原游牧势力就开始向南渗透。其实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并非始于战国，事实上，华夏民族的原始基因与游牧文化的关系，本身就十分密切。这种关系在周、秦两代的崛起过程中就很容易看到。不过秦以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的地缘博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首先通过秦人的努力，中央之国开始转入集权式的社会结构；并将这种被归结为“大一统”的思维、组织方式，牢牢的根植在了文明的基因中。如果按照传统的归类方式，那就是中国自此进入了“封建”王朝时代。只不过，用“集权帝国”来形容这个延续了两千二百年的时代会更合适。

其次，在中央之国开始从封建“王朝”时代转入集权“帝国”时代时，游牧文化也开始了质的跨越。简单点说，就是以蒙古高原为根基的亚洲游牧文化，同样开始了集权的趋势。很难说，这种趋势没有受到农业文明的影响。只不过从形式上来看，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拷贝中央帝国的组织形式来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从结构上来看，游牧政权更像是周天子时期的“封建”时期。即内部虽然尊卑有序，建立了等级制度，但每一个部落都享有自己独立的领地。彼此之间的关系处理，也类似于周王室还拥有控制力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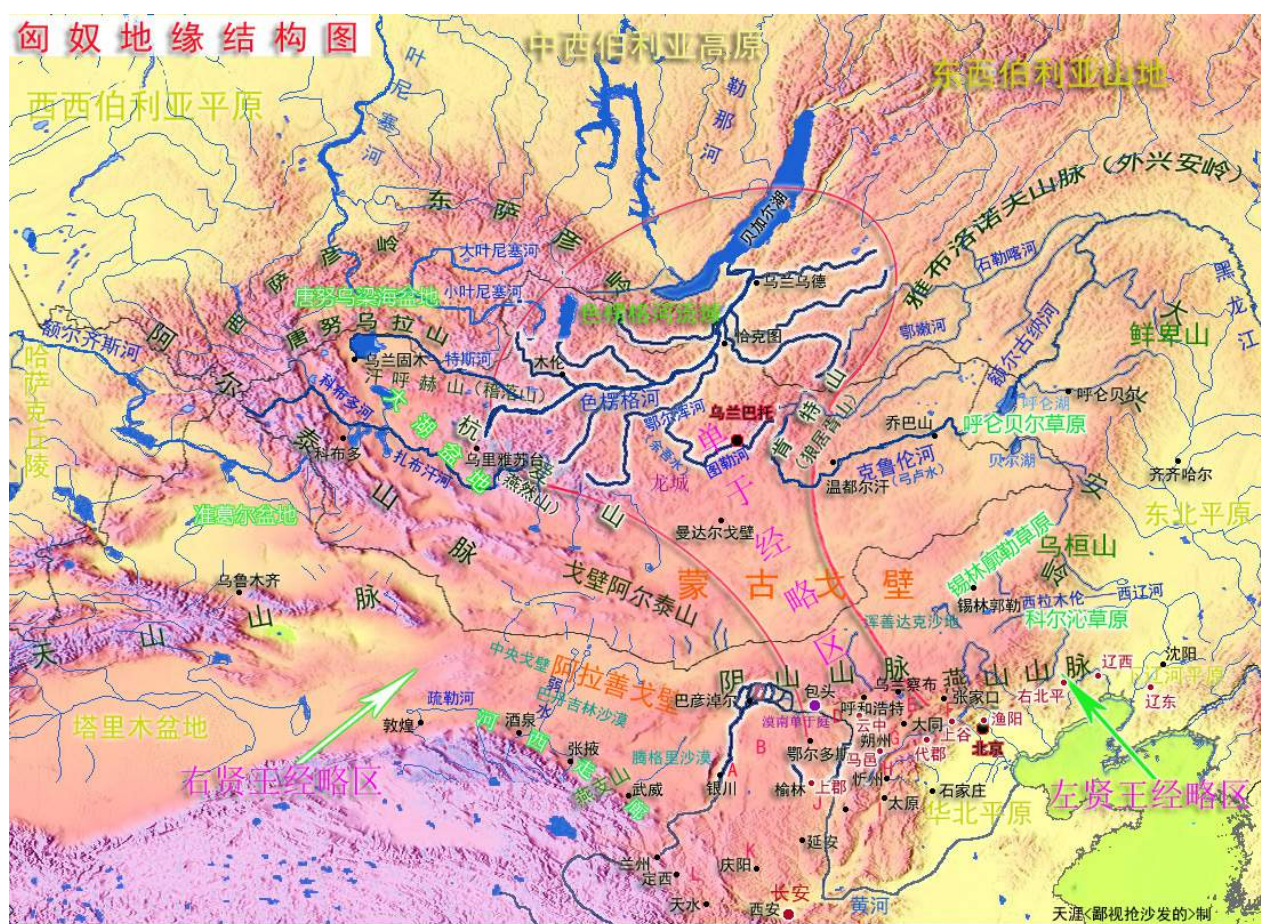
如果说，中央帝国的真正建立、成熟，是秦人的功劳大些，还是汉朝的贡献多些，可能还有些争议的话，那么实现蒙古高原统一的功劳被记在“匈奴”头上，应该就没有异议了。这个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在河套地区与赵国进行过精彩博弈的游牧民族，成为第一个“草原帝国”的建立者（所谓“帝国”其本质就是权力集中使用，从这个角度看，统一蒙古高原的匈奴就可以当得起这二字的）。

匈奴统一蒙古高原的时间，到底是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完成，还是在秦汉相接时完成的，并不是一件十分确定的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刘邦击败项羽，得以建立汉帝国时，他所面对的匈奴，已经是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了。换句话说，这时候的匈奴，已经统一了东到大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北至贝加尔湖、南至阴山的蒙古高原。

其实像所有历史事件一样，匈奴帝国的建立有历史的必然，也有历史的偶然性。说历史的必然性，是游牧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势必会出现统一的趋势；而说历史的偶然性，就是哪一个游牧部落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就要看“人”的努力了。这个解释，相信也有助于解答一些朋友心中的困惑，即到底英雄人物能不能决定历史（简单点说，就是看你怎么理解“历史”二字了；我在这里谈的，更多的是“历史趋势”，

而不是谁顺应了这个趋势)。

作为活跃于蒙古高原的众多游牧部落之一，匈奴的起源之地一直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关系到匈奴帝国建立之后的结构划分。要想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对蒙古高原的地理结构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很多时候，对于大部分生活在低地的我们来说，高原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其实高原只是海拔比较高罢了，身处其中，除了有可能会有高原反应以外（那也要高到一定程度），能直接感受到的高度，还是各种地理形态的相对高差。山脉、丘陵、盆地、平原这些地理形态之间的海拔差，并不像它们的绝对高度那样吓人。从蒙古高原的地表结构来看，总的来说是一个被山脉切割的低缓丘陵地带。这些纵横于蒙古高原的山脉，也把蒙古高原表面分割为一个个盆地或者类盆地区。而这些山脉之间的相对低地，则靠着收集周边山脉的河流之水，成为一片片草原。



匈奴地缘结构图

如果以山脉为切割，把蒙古高原划分为一个个地理单元的话，位于贝加尔湖南部，由外兴安岭（雅布洛诺夫山脉）、肯特山、杭爱山、唐努乌拉山、东萨彦岭围就的这片位置居中的高原腹地，无疑是整个蒙古高原内部的核心板块。这个类盆地地带内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河流众多，且均匀分布。由周边山脉上流入腹地的河水，

首先是汇集到了一起（色楞格河），然后向北注入了贝加尔湖。也就是说，从水系的角度来看，蒙古高原的这块核心板块，是被扇形分布的“色楞格河水系”均匀覆盖。这种地势低缓，水源充足的结构，无疑是有利于连片草原的形成的。这也让色楞格河水系地区，成为众多游牧民族的驻地。而最初的匈奴部落，也正是活跃于色楞格河上游地区的一支游牧部落。



色楞格河水系图



色楞格河

匈奴之名，最初其实只是游牧于蒙古高原色楞格河上游地区的一个部落之名。只不过这支部落最终在高原内部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建立了统一的政治体系，所以也就成为当时整个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标签（后来的所谓“突厥”、“蒙古”，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其实不用太纠结于去搞清北方那些游牧民族的内部，到底应该如何分类。事实上，只有那些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在亚洲地缘政治版图上谋取过一定位置的游牧部落，才有可能被历史所记住。否则的话，他们就只能湮没在历史当中，并被更强大的民族所代表了。

就匈奴来说，他们最初崛起的“色楞格河上游”地区，是介于蒙古高原最核心的两座山体：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这两座呈倒八字排列的山体，像一座半开的大门一样，守护着贝加尔湖以南的整个色楞格河流域。依照一般的扩张路径，与匈奴部落最先进行竞争的，应该是那些同属于色楞格河流域的部落（比如位置更靠近贝加尔湖的“丁零”部落）。在统一了整个流域之后，再把扩张的目光投向蒙古高原的其他地理单元。

如果说匈奴人在争夺蒙古高原腹地的这场竞争中得以脱颖而出，有什么地理

因素的优势的话，位置更偏南一些，可能是一个原因。在其他条件都类似的情况下，相对较低的纬度能使得年平均气温更高些，让匈奴人的草场生长期更长一些。当然，在东亚核心区的农耕民族看来，这种差别相当于没有差别。因为即使是位于色楞格河流域最南部的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带（也就是匈奴的兴起之地），一年中平均气温低于零下 15 度的冬季，也长达 5 个月之久。而在气温最低的 1 月份，平均气温甚至达到了零下 30 度。这样的气温环境，加上较低的降雨量，别说是支撑古典时期的农耕生产方式。即使是已经适应了环境的游牧民族，其能够从土地上收获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蒙古国现在的人口，也不过几百万）。

不管怎么说，匈奴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在蒙古高原之上的竞争，暂时还不用考虑远在阴山——燕山以南的华夏农耕民族的影响。事实上，在华夏农耕民族的成长过程中，游牧民族的影响力是一直存在的。在中央之国成型的周王朝时期，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和山西高原北部，都曾经活跃着各不相属的游牧民族。只不过经历过春秋、战国的成长期之后，不仅华夏内部趋于统一，那些在黄土高原边缘的游牧区域也基本上都被华夏文明所覆盖了。

如果匈奴想代表游牧民族向趋于统一的中央之国发起新一轮攻击的话，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整合蒙古高原之上所有的游牧力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和南方那个已经进入帝国体系的汉王朝进行 PK。很难判定，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开始向黄土高原渗透的匈奴人，是否已经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统一。从他们对赵国的战绩来看，这种整合应该还没有完成。

第二节 匈奴在南北扩张面临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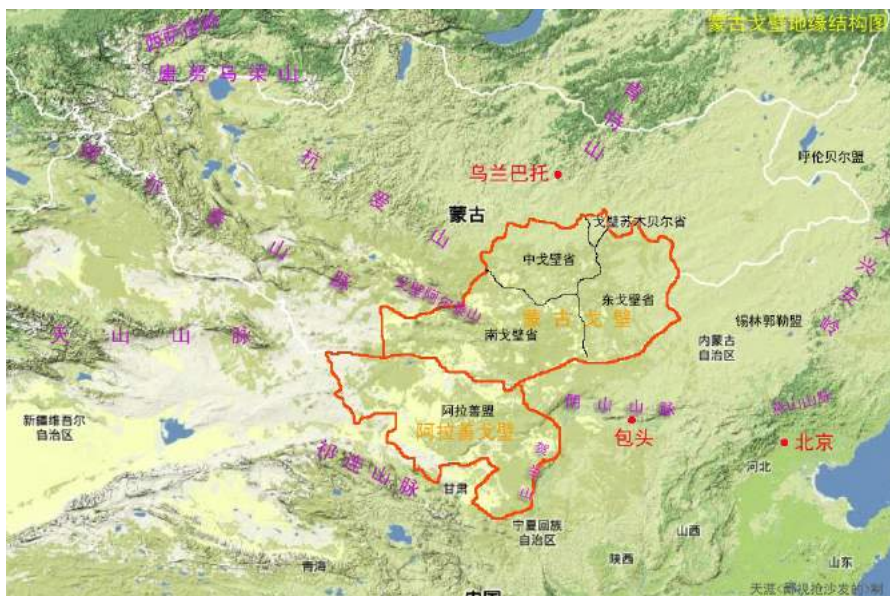
对于匈奴来说，统一色楞格河流域，仅仅是他们建立游牧帝国的第一步。在蒙古高原之上，他们还有很多地缘板块和部落需要征服。单从方位上来看，匈奴人在征服了东萨彦岭、贝加尔湖、兴安山脉（外兴安岭的西部）、肯特山、杭爱山之间的这片高原腹地之后，可以向四个方向继续扩张。然而实际上，真正有效扩张方向，只有两个：东和西。南、北两个方向一个太冷，一个太干，都不是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的地区。

所谓“太冷”指的是贝加尔湖以北地区。从小的板块命名角度来说，这一地区被叫作“外贝加尔高原”，而从大的划分来看，整个贝加尔湖以北，一直到北冰洋的西伯利亚中部地区，被叫作“中西伯利亚”高原。至于整个西伯利亚的地理环境，我在之前的国际部分已经有过专节分析了。只能说，如果你不是想挑战极限，或者说被逼得实在没去处，在古典时期的技术条件下，向这一片永久冻土带索要生存之地，是非常不明智的。

既然向北再向西伯利亚地区扩张，是一件没有价值的事情，那么向南寻找温度

更高的草场，应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从大的方向来看，这种选择并没有问题。匈奴后来也的确把位置更靠南，已经侵入黄土高原边缘的阴山以南地区，当成了扩张的重心。只是当他们准备沿直线侵入农耕文明区边缘时，首先要面对一大片极限之地——戈壁。

戈壁二字本身就是源于蒙古语，有沙漠、石头、干旱的意思。按照我们之前的说法，其实指的就是“荒漠”了。在蒙古高原的地形图上，寻找到这片荒漠的边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本身并不像盆地、河谷那样，有明显的山体作为板块边缘。而了解这片戈壁荒漠的分布范围，对于我们解读匈奴乃至后来游牧帝国的地缘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中央之国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长达两千多年的地缘博弈中，这片面积比高原腹地——色楞格河流域还要大的戈壁荒漠区，极大的影响了双方之间的博弈方式。并且将整个游牧帝国由北至南的进行了地理切割，即所谓“漠南”、“漠北”。



蒙古戈壁地缘结构图

虽然说很难在地形图上一眼就看出蒙古戈壁的地理边界，但通过主要河流的分布结构，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出这片干旱之地的范围的。从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北起肯特山、杭爱山相接处，南至阴山山脉北部，西接阿尔泰山东部余脉，东到大兴安岭的大片区域内，地势都相对平缓，没有

高大山脉。相比被色楞格流域所覆盖的贝加尔湖南部这个类盆地区，蒙古戈壁所处的这个类盆地区，在水资源的供给上就显得先天不足了。一方面周边的山脉，在高度和体量上都不足以从天空拦截更多的水汽；另一方面，腹地面积过大，那些从周边山脉上流下来的有限水资源，最多只能滋养自己附近的区域，根本没有机会在中间汇流成一个像“色楞格河”那样的完整水系（地下水资源也同样受影响）。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了蒙古高原的东南半壁江山成为荒漠化地区。

假如你一定想从一些客观指标上了解蒙古戈壁。我们可以从蒙古的行政地区图上，即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南部，找到四个叫作戈壁的省份：中戈壁省、南戈壁省、东戈壁省，以及面积较小的“戈壁苏木贝尔省”。这四个省份所覆盖的区域，基本

上就是以戈壁、沙漠为主的区域了。

当然，与所谓的“撒哈拉大沙漠”一样，整体呈荒漠化的地区并不代表人类就完全无法驻足。在蒙古戈壁中，那些相对靠近边缘山脉的地区，依托有限的土壤以及有限的水资源，也能有顽强的灌木及草原生成（由四周越往中心腹地走，沙漠化越严重）。只不过这种荒漠化草原，不仅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产草量也是非常低的（一公顷也就2、3斤干草）。这样的植被条件，能够承载的牲畜和人口就可想而知了。



蒙古戈壁

对于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一直以来有一句很写实的概括——逐水草而居。从本质上来看，这也与农耕民族的需求并没有本质区别。哪有水，能生长自己生存所需的植物，哪里就是家园所在。只不过相比游牧民族靠天吃饭（往好了说，是尊重

自然），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注定要通过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来提升一块土地的产出。不过，以蒙古戈壁的自然条件，即使是有现代技术条件支撑的我们，也很难将之改造为一片绿色之地，更别说是古典时期的人了。因此无论是对蒙古戈壁，还是对它以北的那片有水、有草的高寒之地，中央之国都很少表露出兴趣。而尽管蒙古戈壁的自然条件，注定也不可能成为游牧民族的核心草场，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却使得他们更容易在这片干旱之地中机动甚至小规模地生存，这也使得这片干旱之地事实上成为游牧民族的地缘优势所在（我比你更适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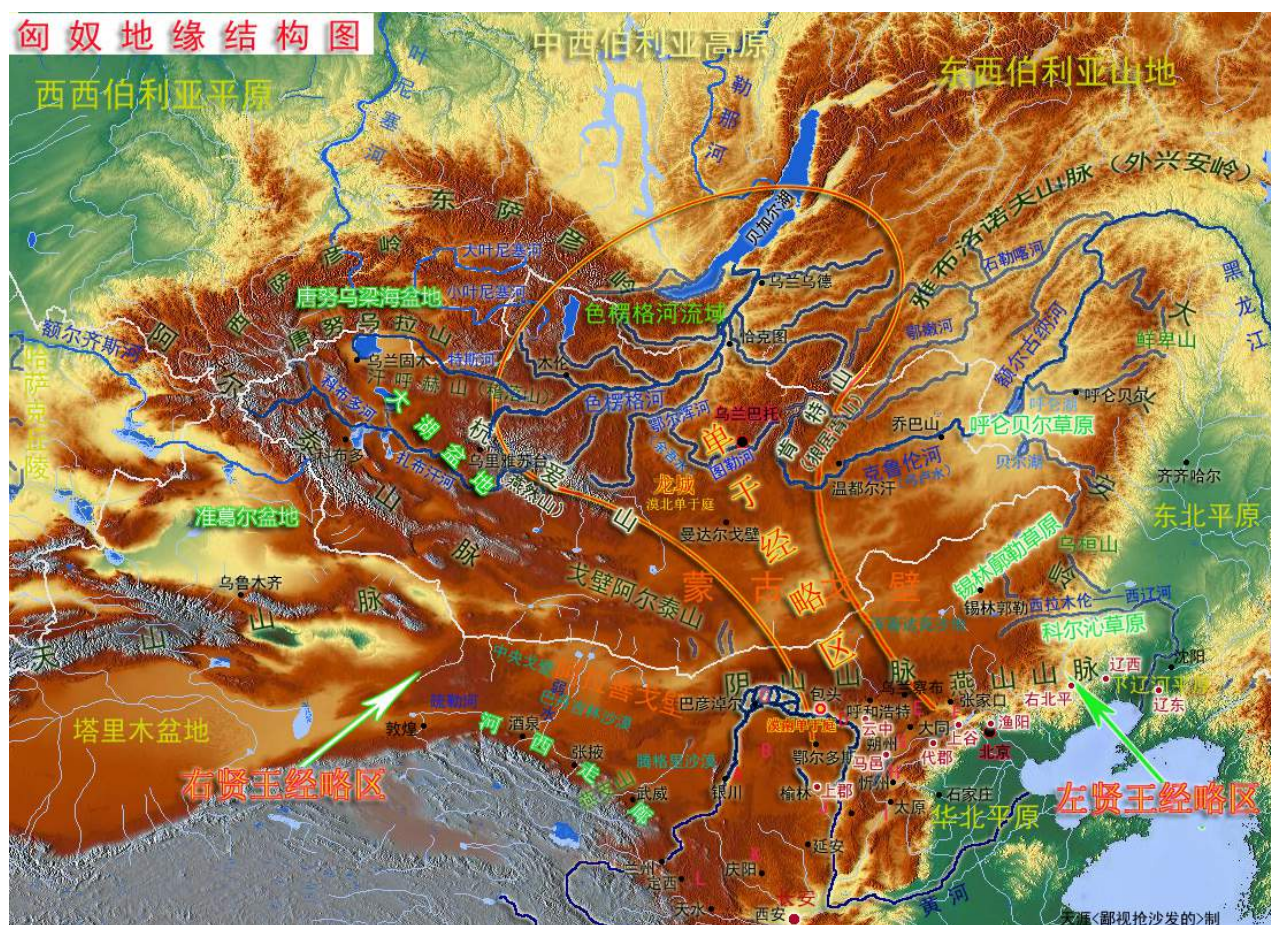
第三节 东胡游牧于大兴安岭西麓草场

相比南部荒漠化的情况，蒙古高原东西两翼的情况就要好得多了。如果从地势的角度看，蒙古高原大致呈现西高东低的走势。其西侧较为密集的存在着东萨彦岭、西萨彦岭、唐努乌拉山、杭爱山、阿尔泰山脉几条山脉。而这些山脉之间形成的河谷、盆地，也有条件成为水草丰美的牧场。只不过和色楞格河流域一样，高纬度和高海拔造成的低温，始终是限制其发展的关键问题。

按照中央之国的方位习惯，当你站在一条河流边上定位时，你的脸应该朝向下游方向，并以此来区别河流的“左”、“右”两岸。如果按照这个方式的话，以色楞格河流域为核心区的匈奴人，应该把西侧的这片山地盆地区，视作“左翼”。然

而事实却是，在匈奴人的概念中，这片即将纳入匈奴帝国的土地，是在自己的“右”面。而为单于经略此地的贵族，也因此被称之为“右贤王”。其实这一点也很好理解，与华夏民族的先民从黄土高原沿河流向下游地区扩张不同，匈奴也好，其他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也罢，心目中最向往的地方，并不是下游所指的西伯利亚地区，而是南边温暖、富庶的农业区。当他们习惯于把目光投向南方时，左、右之位也就定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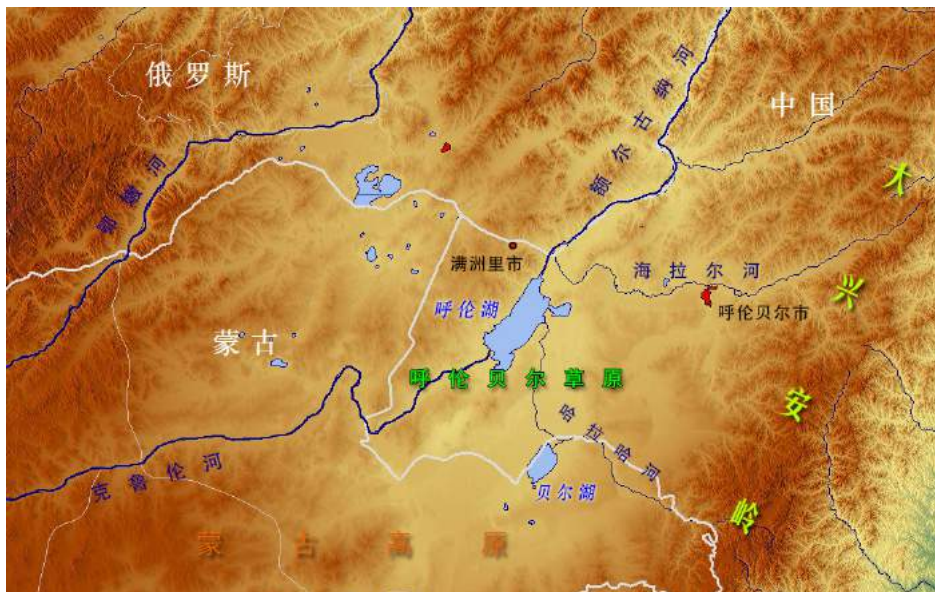
对于匈奴人来说，高原左、右两翼的开拓同样重要。只有把这些同样住在毡房里，逐水草而居的部落纳入草原帝国体系后，匈奴才有足够的力量与正在统一的中央之国对抗。另一个技术原因则在于，如果匈奴不能统一整个蒙古高原的话，那么他们即使能够穿越蒙古戈壁，并在汉地获得额外的资源（或交换，或劫掠），也难保自己的后方不被其他游牧部落所侵袭。不过如果让匈奴人选择优先扩张方向的话，他们应该会更倾向于优先从左翼，也就是肯特山以东着手。



匈奴地缘结构图

相比右翼那高低起伏的多山地形，蒙古高原左翼就要显得平缓多了。从外轮廓来看，这是一片由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兴安山脉）、大兴安岭所围就的“箕”状地理单元。比南部戈壁区要幸运的是，走向基本与海岸线平行的肯特山、兴安山脉，能够从太平洋季风中得到相对不错的降雨量。这也使得从肯特山以东直到大兴安岭

北段的这部分蒙古高原，拥有鄂嫩河——石勒喀河、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等水量不错的河流。与蒙古高原腹地的河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色楞格河水系”，并最终注入有贝加尔湖一样，肯特山以东的这些河流，无论长短最终都合流入了我们所熟悉的一条大江——黑龙江，并注入太平洋。



呼伦贝尔草原位置图

如果不缺水的话，越靠近南边的河流流域，就越适合人类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发源于肯特山南部的“克鲁伦河”，作为蒙古高原左翼纬度最低的大河，就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了。尤其是它靠近大兴安岭的下游地区，更是在和大兴安岭西麓河流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蒙古高原最为优质的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

呼伦贝尔大草原得名于两个湖泊，一个叫“呼伦湖”，一个叫“贝尔湖”。想找到这两个湖泊，以及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核心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如果你像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视中国现有的版图为一只雄鸡的话，那么你应当也很容易找到这只雄鸡的鸡冠所在。没错，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核心区，就是这个鸡冠南部的那个突出部。非常幸运的是，它目前在中国的版图之中。

如果不是古典时期的最后一个帝国（清王朝），根基之地在大兴安岭以东的东北地区的话，很难想象，中央之国在步入现在国家体系时，有兴趣谋得并经营这块漠北的草原。不过在蒙古高原游牧体系中，像克鲁伦河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样的自然条件，注定会成为各方聚焦的关键板块。力图统一蒙古高原，建立第一个游牧帝国的匈奴，当然更不会放过了。只是在匈奴所代表的色楞格河游牧部落联盟，准备越过肯特山向东发展之时，这里并非是无主之地。一个在中国历史中同样占据了相当重要地位的边缘族群——东胡，正在经营着包括呼伦贝尔草原在内的大兴安岭西麓草场。

有了这些生命之源，蒙古高原左翼，特别是靠近大兴安岭，同时能够受大兴安岭西麓河流补给的区域，植被覆盖状况就要理想得多了。当然，水并非是决定生存环境的唯一因素。在北亚这种高海拔、高纬度地区，温度的影响会显得同等重要。也就是说，

正如古典时期很多纠缠不清的边缘民族一样，“东胡”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个案例。很多时候，大家所纠结的是，诸如东胡到底是什么人种，应该包括哪些民族一类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讨论起来并不会有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即使我们有机会穿越回去，没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游牧民族，也未必说得清自己的源流。事实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所谓血统并不是最重要的。恶劣的环境，使得他们珍惜每一个可能为己所用的潜在劳动力（战士），并养成了“养重于生”的观念。也就是说，后天是否成长、融于自己的部族，其意义远大于血统的来源。在这种观念指导下，那些从战争中掠夺而来的人口，只要愿意都可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尤其是对于那些文化归属感尚未形成的幼童来说。



呼伦贝尔草原

流和匈奴就有明显区别（刚才也说了，他们自己都未必搞得清楚），造成这一点的基本原因，是肯特山以东的蒙古高原，本来在地理结构上就呈独立状态，是蒙古高原的一个二级地缘板块。相比之下，这些依托黑龙江流域和大兴安岭的游牧部落之间更容易产生交集和博弈，并形成和色楞格河流域有一定区别的地缘文化。

不过在地理条件上有机会自成体系，并不是东胡族让“历史”记住的主要原因。

游牧民族的这种“拿来主义”的务实做法，甚至不会受到人种的限制。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繁杂的历史记录中，经常能够看到对一个游牧民族有不同的种族特征描述。以至于直到今天，在网络之上讨论某一古典游牧民族的人种，依然是很多人所热衷的话题。当然，这类话题的最终结果，一般都是没有结果。

东胡作为一个独立的游牧族群出现，最初就是在匈奴崛起时代。在中央之国开始把匈奴人人叫作“胡人”的时候，那些居于“匈奴”之东，也就是我们前面分析的，肯特山、蒙古戈壁以东，直至大兴安岭的区域的游牧民族，也被称之为“东胡”了。事实上，东胡之族之所以能够以独立面目出现在中央之国视角中的游牧体系中，并非是因为他的人种、源

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蒙古东部的这个地缘板块，在古典时期曾经成就过许多影响到中央之国历史进程的游牧民族，比较“著名”的如：鲜卑、契丹、蒙古。而按照他们的地缘位置归类，都被认定和公元前的“东胡”有亲缘关系了。这些被很多历史研究者认定同出东胡体系的族群，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估计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不过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就是兴起之地都在蒙古高原的东部。

第四节 锡林郭勒草原和科尔沁草原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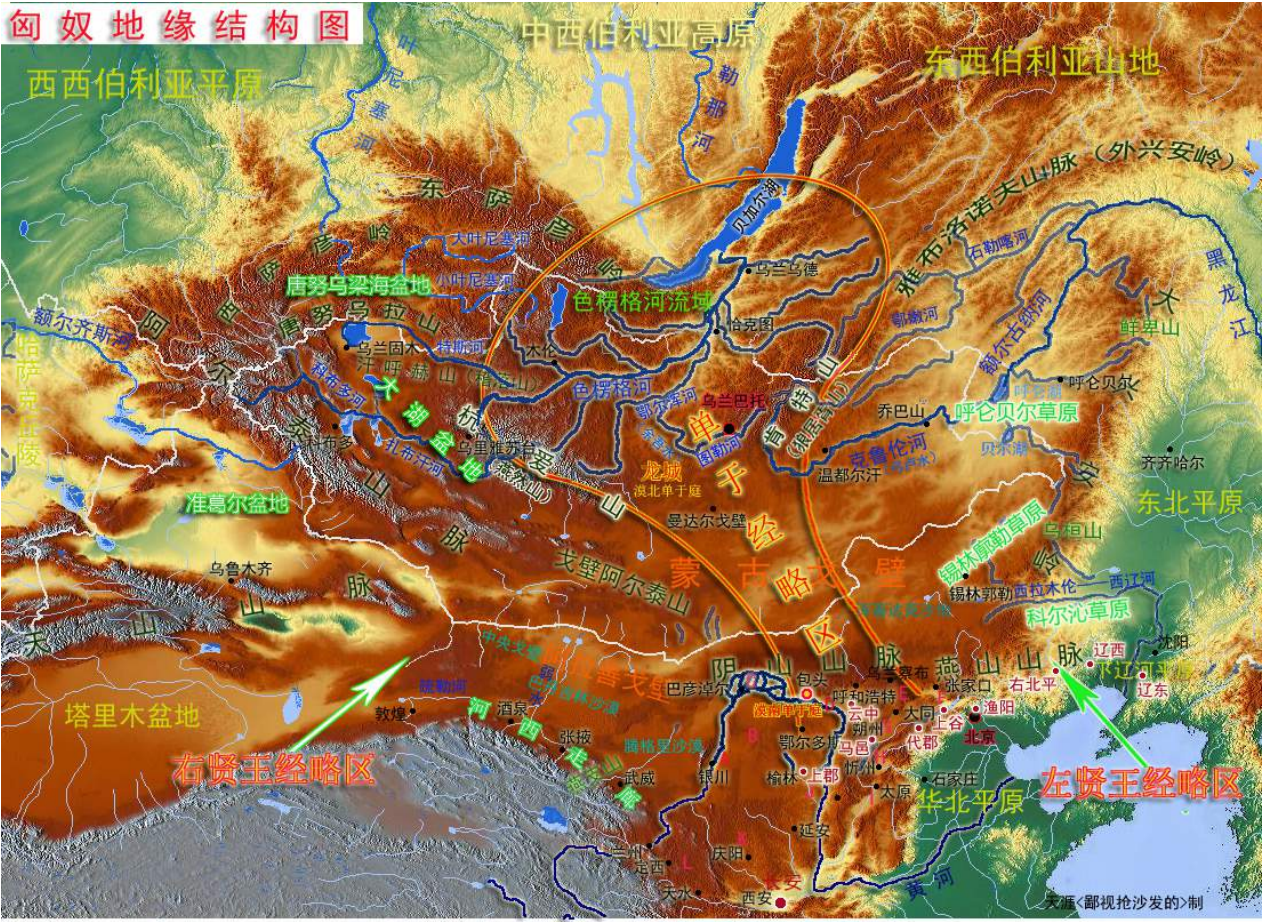
相比位于戈壁大漠以北的色楞格河流域，东胡之地与农耕区的地缘关系要更紧密些。而这种紧密关系的形成，地理上的原因是因为大兴安岭的存在。关于大兴安岭的基本地貌，我想大家都应该有个基本印象，那就是林木茂盛。作为一条与海岸线平行，与海洋之间又存在大片低地和缺口的山脉，大兴安岭比它身后的那些山脉，要更容易接受到太平洋季风的润泽，并积蓄更多的雨水。当然，也正是由于“水”从东来，大兴安岭东麓的河流水系，在质量上要明显优于西麓。这也为东北地区成为对水资源要求更高的森林地带，奠定了环境基础。而当有一天人类决定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同样对水资源有高要求的耕地时，森林也就要比草原更有资格“进化”成耕地了。

虽然大兴安岭西麓的水资源状况不如东麓，但在临近大兴安岭的低地中，孕育出一片对水资源要求相对较低的“草原”来，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同时可以得到肯特山——大兴安岭东麓河流补给的北部地区，其植被在温度较高时期的状况，是十分让游牧民族满意的。其综合条件最佳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核心之地就是克鲁伦河和大兴安岭流下的海拉尔河共同汇集而成的“呼伦湖”）。

如果说东胡之地的北面可以在水资源上左右逢源的话，那么南面的情况就不那么尽如人意了。因为在这个方向，大兴安岭所面对的是干旱的蒙古戈壁。其临近大兴安岭的低地不仅得不到来自西面的河流补给，还要受到更多的来自戈壁沙漠的恶劣气候影响。当然，由于大兴安岭的存在，那些从山岭西麓流下的河流虽然没有能力伸入戈壁腹地，但还是可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南，沿大兴安岭向南铺设一条草原走廊的。当然这条草原走廊在体量和质量上，相对呼伦贝尔草原要差一些。最后覆盖这片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称这条“大兴安岭西麓草原走廊”为锡林郭勒草原。而今天，它的行政建制也继承了这个名称（锡林郭勒盟）。基于同样的历史继承，呼伦贝尔草原在行政上的归属也是“呼伦贝尔市”（地级市）。

无论对于东胡，还是后来赶走东胡，视东胡之地为自己“左翼”的匈奴人来说，这片土地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在于它拥有几片水草丰美的草原。更大的诱惑在于，当燕山以南的农业区进入秋季收获期时，游牧民族也正是秋高马肥时。对于习惯于以劫猎方式为游牧生产补充额外资源的游牧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而这个时候，锡林郭勒这条草原走廊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相比在漠北的那些游牧部落，这些本来就游牧于大兴安岭南部的部落，要更容易接近富庶的农业区。即使是以匈奴为核心的北部游牧部落联盟成为蒙古高原的控制者，并领导南下“打猎”的军事行动时，也很容易发现，相比穿越阴山以北的戈壁沙漠，沿大兴安岭西麓的草原走廊南下的障碍要小得多。当这条草原走廊即将走到尽头时，燕山也就在眼前了。



匈奴地缘结构图

上天对于蒙古高原东部的厚爱，并不仅仅在于为之提供了一条依附大兴安岭而生成的草原带。事实上，当由北而南迁移的游牧民族，沿大兴安岭西麓南下到达燕山北麓时，会惊喜的发现一条新的河流和新的草原带。这条新的河流属于燕山水系，换句话说，这条叫作“西拉木伦河”的河流，主要是由燕山北麓流下的雨水汇集而成的。由于它的位置正好处在南北向的大兴安岭与东西向的燕山山脉相接处的缺口处，因此决定了西拉木伦河流域枢纽般的位置。到达此处的游牧民族不仅得到了一片新的水草丰美的草场——科尔沁草原，也获得了通往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跳板。

与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一样，科尔沁之名也是来自于蒙古人。不过，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历史，可不是自蒙古人而起的。甚至最早进入中央之国正史视线的“东胡”，也并不是这片土地的拓荒者。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当中，有一个长期被忽视，

却又因为惊人考古发现而曝光的上古文明——红山文明，便是出现于此。这个出现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文明，带给中央之国文明史的最大冲击在于：它明显是独立于黄河文明之外，而独立起源的文明，其文明程度甚至高于同时期的黄河流域。

对于一直以黄河文明为正源，甚至是唯一来源的中央之国来说，这种结果多少让人有些尴尬。在那些传统的史家看来，与黄河流域并重支撑起中央之国的长江流域，甚至都不存在单独起源的文明。换句话说，长江流域进入文明期，都是因为某支黄河流域的部族迁移到此。这种认知，更是在史记为楚、吴、越等先秦南方诸侯，续上来自黄河流域的家谱之后，被固定了下来。只是在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由西方传入的考古学在中央之国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黄河流域并非中央之国文明的唯一起源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覆盖众多地理单元的“华夏文明”，更应该是多文明融合的结果。而中央之国的文明被称为“华夏”，并将黄土高原视为起源地，并非是因为原始的华夏文明比其他地区独立发展的文明，文明程度更高，而是因为他最终的胜利者。可以在自己的政治框架下，融合其他文明的优点，并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华夏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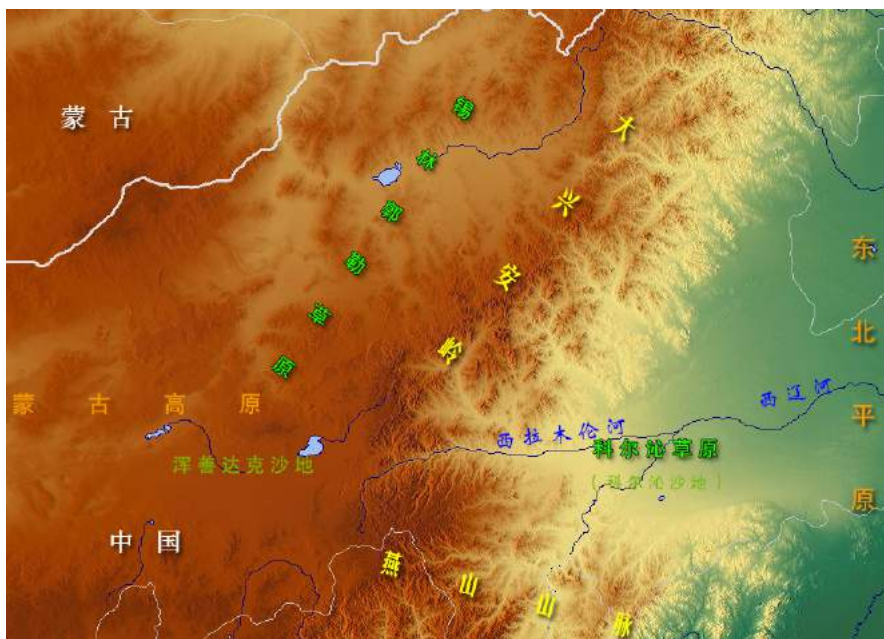


锡林郭勒草原

将中央之国文明的起源跳出黄河流域的框架，有利于我们更客观的看待中央之国的历史，甚至对于现实的政治也是有用的。因为如果你坚持认为原始的黄河文明代表着东亚最高的生产力，并为唯一起源地的话，那居于半岛之上的某些“历史学家”，会非常愿意看到被剥离出来的文明程度在同时期明显有优势的“红山文明”，成为自己的所谓的独立文明的起源，并以“红山文明南下，唤醒了黄河文明”为推论，认定自己才是东亚文明的创造者。

关于红山文明的知识，相信大家可以百度得来。记得在中央之国开始之时，我们在探讨华夏、东夷文明博弈时，也曾经提及过。事实上从考古发现来看，红山文明的很多文化特征，无疑已经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无论红山文明在中央之国的文明史中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它都明显无误地是中央之国历史的一部分。不过，我们现在所要关注的并非这一点，而是在于它所在地区的地缘结构在古典时期是如何影响中央之国历史进程的。

对于处在几大板块交接之处的西拉木伦河流域来说，影响它历史定位的最大因素，除了枢纽般的位置外，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环境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简单点说，就是由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处在东北平原与蒙古戈壁的交接之处，它的地理属性一直在变化着。在红山文明兴起的 5000 多年前，这一带的环境显然要比现在要好许多。凭借原始的工具和技术，创造红山文明的先人们已经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发展原始的农业了。



西拉木伦河流域示意图

能够拥有如此良好的环境，那些从大兴安岭南部，以及燕山北麓流下来的河水，自然是功不可没。它们在共同汇入西拉木伦河之后，继续向东进入了平原地区。而在进入平原地区后，西拉木伦河被称之为“西辽河”，并与东部长白山脉流下来的东辽河，合流成为“辽河”，南流入了渤海。

相比靠近蒙古戈壁，且没有山脉阻隔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可以受到燕山保护的辽河下游平原（下辽河平原），情况就要稳定得多了。最起码，那些蒙古高原吹过来的风沙，不会影响到此。而它相对较低的纬度，以及丰富的水资源，也成为中央之国北出华北平原之后，经营农耕文明的首选之地。关于“下辽河平原”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中已经详细解读过了。

其实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西拉木伦河流域要更为重要。因为如果不是立志要成为中央之国主人的话，控制了西拉木伦河之后，就有机会跨越燕山中的几条通道，进入华北平原窥探农民的收成了。而当东胡、匈奴在蒙古高原东部发展的时候，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气温、环境虽然未必如红山文明时期那样适合农业生产，但却绝对能生成游牧生活所需的优质草场。只不过，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一地区的环境并不稳定。大兴安岭和燕山之间的这个缺口，让来自蒙古戈壁的西北风变身成为“穿堂风”制造了机会。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科尔沁草原”，在很多地图上已经被标注为“科尔沁沙地”了。当然，造成这种沙、草相间的状况，人类的过度活动也是重要的催化剂。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如果不注意保护环境的话，周边环境恶劣板块的渗



大兴安岭周边卫星图



科尔沁沙地



浑善达克沙地

透便会更加的容易(恢复起来就难了)。这一幕在临近干旱地区的陕北高原，也同样上演着。

既然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的这个缺口，使得科尔沁草原的环境不十分稳定，那么，受此影响的，也就不只是东流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了。沿大兴安岭西麓延伸至缺口西侧的“草原走廊”——锡林郭勒草原，也同样会陷入沙与草争地的状态。如果我们在地图上寻找，就会在这个位置找到一片被标注为“浑善达克沙地”的区域。一方面要受西侧蒙古戈壁的风沙之苦，一方面又有能接受来自临近高地水资源（包括地上、地下）的地理条件，使浑善达克沙地成为不多见的“水沙漠”。即沙漠中存在众多的小型湖泊、河流。随之而来的，也就是沙、草相间的奇异景象了。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浑善达克、科尔沁两片土地，算是悬于天堂与地狱之间了。如果维护改造得好，完全有机会打造成一片农、林、牧相互依存的绿色之地。而对于两千多年前的游牧民族来说，他们倒不用考虑这么多。天然形成的草场，已经足以满足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了。当然，既然已经游牧到了西拉木伦河流域，就没有理由不继续沿河向东，进入辽河下游了。在中央之国的农耕民族还没有跨越燕山向北渗透时，下辽河下游地区的自然状态同样也是游牧、渔猎民族所喜欢的。特别是这一带，有些相对更温暖的气候。

第五节 匈奴征服乌桓和鲜卑部落

真正让最先游牧于辽河流域(包括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东胡部落遭受重大打击的,并非匈奴人。在战国后期,试图从燕山以北开疆扩土,提升自己地缘潜力的燕国,成为东胡部落噩梦的开始。这段历史在战国部分我们已经解读过了,在燕国的强大攻势之下,“东胡却千余里”。下辽河平原以及之前被东胡部落所覆盖的燕山山脉,成为燕国的领地。燕人甚至兴建了长城来保卫他们的胜利果实,并持续向东胡施压。当然,这种施压并不在于燕国有兴趣继续向西拉木伦河渗透,并将科尔沁草原变成农耕之地,而是东胡部落再想南下从农业区获取额外收益的话,就不那么容易了。

燕国大破东胡,并在东胡之地开疆拓土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300年。这次重大打击,无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胡部落的实力。以至于当色楞格河流域的匈奴人开始向两翼扩张时,东胡部落没有成功的保住他们在蒙古高原东部,以及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草场。当然,从地缘潜力来看,大兴安岭周边地区在游牧区显然是有一定优势的。与汉地更为紧密的地缘关系,以及水资源相对充足的草场,都为东胡故地日后诞生出有重大影响力的边缘部落奠定了基础。而视克鲁伦河为母亲河的蒙古部落,只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罢了。

如果说谁是从东胡之地入主中原的先行者,那么这个荣誉应该授予鲜卑人了。其实鲜卑族群的形成,和匈奴的东扩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匈奴人向东扩张,并占据大兴安岭西麓草场之后,除掉那些被匈奴帝国直接吸收,并成为匈奴一分子的东胡之民以外,并不愿意就此湮灭的东胡部落退入了山高林密的大兴安岭。而这些即将重拾更为原始生活方式的东胡部落共分为两支。一支由呼伦贝尔大草原退入大兴安岭北部,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鲜卑人”。他们所退守的山地,也被称之为“鲜卑山”;另一支则由锡林郭勒草原退入大兴安岭南南部。相比于后来有机会成为中原之主的“鲜卑人”,这支东胡部落的名气要小一些。不过熟读三国的朋友应该会有印象,他们就是“乌桓”。而乌桓所经营的大兴安岭南南部山地,则被称之为“乌桓山”。退入大兴安岭的东胡部落得以保持自己的部落形态,但并不意味着不会受到如日中天的匈奴帝国所影响。最低限度,他们不能挑战匈奴对蒙古高原的领导者地位。而在具体的合作态度上,鲜卑人和乌桓人也有着区别。这最终也直接影响了这两支部落的命运。

相比中央之国正在转进的“中央集权”制,匈奴人建立的草原帝国,结构就要松散得多了。就其内部的组织架构而言,与中央之国之前盛行的“封建制”颇有些类似。各大小部落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草场,而这些部落之间又分级管理。其中在匈奴单于之下的第二等级,就是负责经略左、右两翼的左、右贤王了。相比于之前各自为战,仅以原始的血缘关系来区分敌友的状况,匈奴能够建立这样一套草原“封建”体系,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不过按照我们的“历史”属性划分,中央之国现

在才是“封建制度”时期；匈奴自然就是低一级的“奴隶制度”阶段了）。

与始创封建的周人一样，那些被匈奴征服的部落，除了被打散并入嫡系部族以外，也有机会成建制的加入草原帝国体系，前提是它们要表现出足够的服从度。对于匈奴人来说，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够以较小的成本（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将对手并入己方阵营；坏处就是，一旦自己的控制力变弱，那些能够完整保留自己部族文化的被征服者，会更容易成为变节者。作为“东胡”系残存部族的代表——乌桓，就是这样一个成建制的臣服于匈奴帝国的典型。而他们所得到的回报，就是被允许从“乌桓山”上下来，在西拉木伦河流域保持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当然，匈奴能够“恩赐”这样一块草原，并不是出于善心。除了按岁纳贡之外，同样要服从于匈奴帝国的军事调遣。不过我们刚才也说了，以强大的武力威慑这些曾经的手，并使之成建制的为我所用，固然是一种节约成本的方式，但可靠性就要差上许多了。在汉武帝大破匈奴之后，这些本为匈奴左翼前哨的乌桓人，又反过来成为汉帝国对付匈奴的助手。

当乌桓决心在战略上依附更为强大的汉帝国后，他们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控制乌桓，另一方面也为了使其免受匈奴的直接威胁，乌桓在和汉帝国的合作过程中，不断的内迁至燕山南北的几个边郡。甚至在三国时代，成为曹操统一中原的主力骑兵的来源。也许对于以前在塞外苦寒之地游牧的乌桓人来说，生活在温暖的南方，甚至一定程度接受一些农耕生产方式，并不是件坏事。只是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没有机会像匈奴一样在蒙古高原建立属于自己的游牧帝国了。

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乌桓选择在匈奴与汉帝国之间周旋不同，退入大兴安岭北部的鲜卑人，似乎更安于接受在山林之中以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这也使得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在汉帝国与匈奴的残酷博弈中露脸。我们并无法知晓鲜卑人困守于大兴安岭北部，是主观上不愿意被匈奴所同化，还是因为匈奴不希望在自己左翼最核心的草原为鲜卑人分割出一片草场所至。不过客观的结果却是可以知晓，那就是当匈奴在汉帝国强大的武力压迫下被迫分裂、衰退之后，作为与匈奴核心之地最近的独立部族，一直在积蓄力量完成内部统一的鲜卑人有机会从山林中下来，接收呼伦贝尔草原的东胡故地（还包括数以万计的部众）。并在漠北匈奴被迫西迁之后，成为蒙古高原之主。

鲜卑人后来的成就与结局，相信我们在中学历史中就已经知晓了。不过在我们现在解读的历史中，他们还只是一个一出镜就得倒地装死的龙套角色。他们后来的成就更多的是在反证蒙古高原左翼，在蒙古高原三大板块中的重要地位。虽然鲜卑后来取得的成就，让我们知道了蒙古高原左翼的重要性。但对于匈奴人来说，他们当时也不可能没有关注到这点。即使这时的匈奴还没有想过代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大兴安岭西麓的优势草原，以及可以直通农耕之地的不间断的草原走廊，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莫大诱惑。正因为如此，在匈奴的游牧帝国版图中，肯特山左翼地区

的重要性仅次于肯特山、杭爱山之间的色楞格河流域上游地区。为了重点经营这片从东胡手中夺来的土地，匈奴将除了单于以外最重要的政治地位，赋予了左翼的最高政治领导者——左贤王。

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有什么政治地位是仅次于最高领导者的呢？这个答案并不难猜，它就是未来的最高领导者，也就是单于之位的继承者。换句话说，谁要是被封为左贤王，谁就是未来单于的继承者。只是和中央之国的情况一样，当左贤王之位成为最高权力继承者的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成为政治漩涡的中心，并承受更大的政治风险。而为了抵御这种风险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自己生命了。这也使得有的时候会接连有几个左贤王都不得善终。以至于匈奴人觉得，是不是左贤王这个尊号有些不祥。尊号叫什么，当然不是决定左贤王命运的根本因素了。权力争夺者们所觊觎的，是它未来的政治空间。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既然蒙古高原左翼的条件如此不错，又有不必受长时间穿越大漠戈壁之苦就可以攻掠汉地的优势，为什么匈奴只是把它当成次一级的板块经营，而把色楞格河流域当成单于自理的核心板块呢？其实我们看地图，就应该已经得到结论了。因为从地缘位置来看，色楞格河流域是蒙古高原绝对的中心板块。除非建立帝国者可以无视高原右翼那一大片高山盆地区，否则把经营蒙古高原的地缘核心放在蒙古高原的地理中心——色楞格河流域最南部，几乎是必然的。这个地理中心，具体的说就是杭爱山与肯特山南端之间的鄂尔浑河、图拉河上游的地区（这两条河流是色楞格河最南端的两条支流，分别发源于杭爱山、肯特山南端）。匈奴帝国的“龙城”、突厥帝国的汗廷所在（于都斤山）、蒙古帝国的“哈拉合林”，以及现代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都在这个地理中心。

并不肯定崛起于这个蒙古高原地理中心的匈奴人，到底是先解决左翼，还是从右翼开始着手。不过居中的地理位置，使得他们无论是向北统一色楞格河流域；还是向东翻越肯特山进入蒙古高原东部；抑或先从杭爱山以西的地区着手，都有着同样的机会。唯一比较困难的，就是穿越蒙古高原中央戈壁去阴山以南“打猎”。不过要是能够先把色楞格河流域，以及左右两翼搞掂，这就不再成为问题了。

既然蒙古高原的右翼在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中三分天下有其一（除掉条件恶劣的中央戈壁区），那么右翼的地缘结构也是我们必须重点解读的了。事实上，尽管蒙古高原的左翼诞生了更多的曾经入主中原的游牧部落。但从战略上来看，游牧民族对右翼的经营，以及中原王朝对西部的渗透，更能从战略上决定双方的命运。至于这一切缘于哪些因素，那就要等我们循序渐进的解读完蒙古高原西部，以及汉、匈日后博弈的焦点板块——河西走廊、西域之后，才会有答案了。

第二章 匈奴在蒙古高原右翼的扩张

第一节 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地理结构

与蒙古高原东部地势相对平缓的情况不同，蒙古高原西部的地势就要高上许多了。这块被匈奴视为右翼的区域，由北至南紧密排列着东萨彦岭、西萨彦岭、唐努乌尔山、杭爱山、阿尔泰山脉，以及阿尔泰山脉的东部延伸——戈壁阿尔泰山。所谓山水总相连，山脉越高，拦截水汽、蓄积雨（雪）水的能力就越强。因此相比地势平缓，腹地无高大山脉分割的蒙古高原“中央戈壁”区，蒙古高原西部在水资源方面是很有优势的。不过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高大山脉过密的存在，虽然有利于植被生长，却也让森林挤占了游牧民族更为喜欢的优势草场的生存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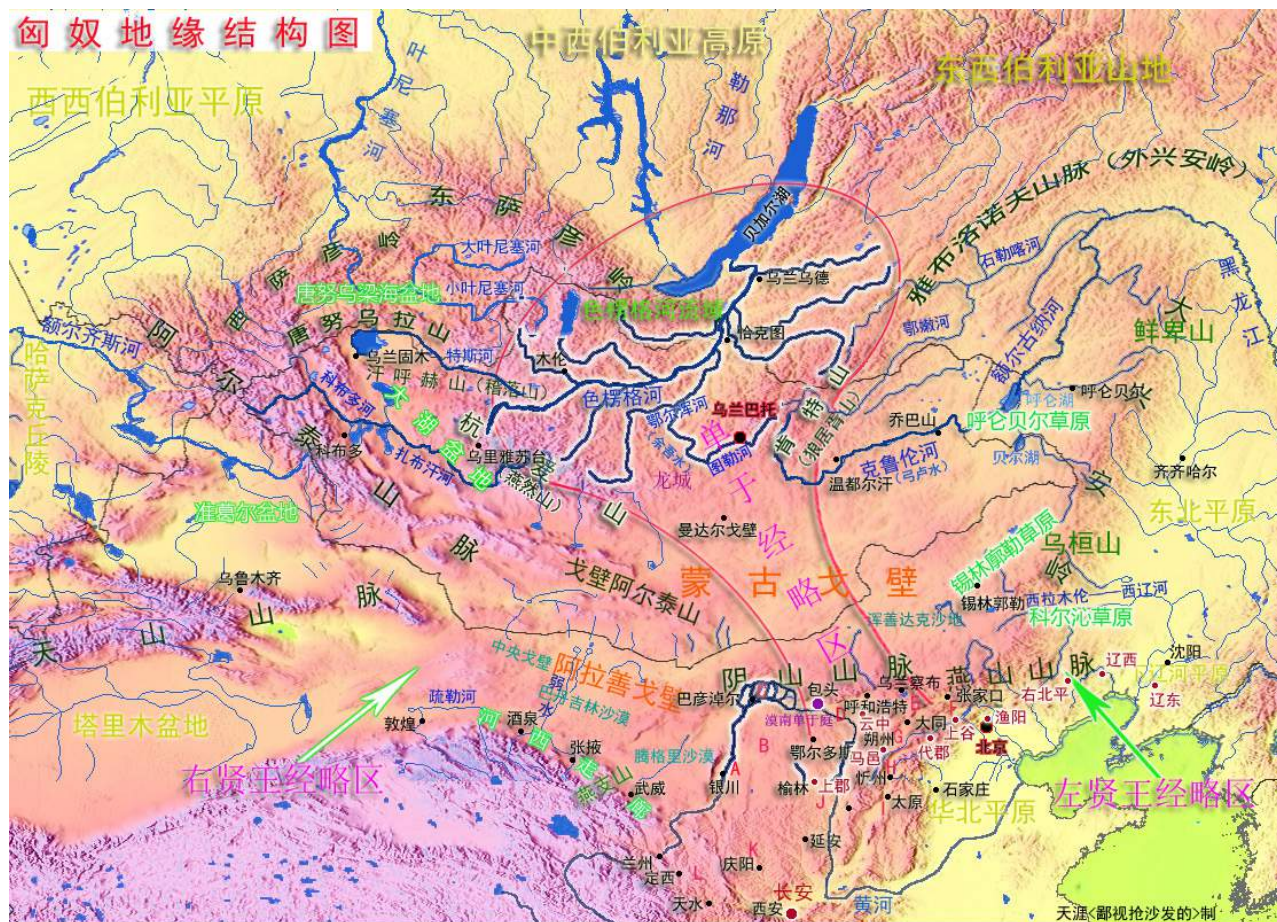
尽管在高山之上同样有可能生成草场，但总的来看，山脉之间地势较为平缓的河谷、盆地中，所生成的草场更适合人类大规模的生存。从这个角度看，游牧民族如果想在蒙古高原西部发展的话，其重心就要在那几条山脉所包夹、合围出的低地上了。根据山脉的走势，右翼的低地区可以被划分为二个。一个是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却又对其结构感到陌生的“唐努乌梁海”。如果从地理的角度为之命名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唐努乌梁海盆地”；另一个则是无论从名字还是结构，都有可能让大家感到陌生的“大湖盆地”。

很多人知道唐努乌梁海，是因为网络之上经常有文章表示，当年中国政府（是哪个政府同意的，也是永恒的争论点）同意的是外蒙古的独立，而在蒙古高原西北角的“唐努乌梁海”并不在此列。也就是说，这块最终被俄国人直接吞并的土地，似乎在法理上还有得一搞。至于这其中的法律逻辑到底对不对，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包括这两块土地到底是被哪个政府给卖了，也不会展开，毕竟所谓的法理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政治博弈讲究的是实力，在没有实力保有和“拿回”所谓故土的情况下，讨论下去只会徒费口舌。不过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倒是有助于大家明白，为什么俄国人一定要把唐努乌梁海划给自己。而这一板块在游牧帝国的版图中，又是不是一个重要单元。

从地理结构上看，唐努乌梁海盆地是由蒙古高原最西北角的三条山脉所合围而成的。即西萨彦岭、东萨彦岭、唐努乌尔山（也叫唐努乌拉山）。与蒙古高原整体呈西高东低的走势有所不同，唐努乌梁海盆地周边山势呈现的是东高西低的走势。也就是说，唐努乌梁海与色楞格河流域之间的山体地势是最高的，而面向西西伯利平原的地势相对较低。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区别，这点区别最终在地缘政治之中决定了唐努乌梁海的归属问题。

与所有由山脉合围而成的河谷、盆地一样，那些从山脉之上冲刷出众多河道的

雨水，最终会在最低点合流成一条河流。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合流之后的河流会寻找一个缺口冲出谷地，并在和更大的河流合流之后，奔向海洋。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雨水都有这份幸运回归海洋。也会有一些内陆河没有力量找到大部队，只能在低地蓄积出一个湖泊作为最终的归宿。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案例了。



匈奴地缘结构图

在我们的幼儿教育中，经常有水汽是如何变成雨水，并最终流入大海的童话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能够“回到”大海中的小雨滴都是幸福的。而唐努乌梁海中的雨（雪）水，也有机会成为幸运儿。因为它们在合流之后，冲破了山脉的包围，汇入了海洋。由于东萨彦岭以及唐努乌尔山的西部，地势要高于西萨彦岭，因此从这部分山体上汇集入谷地的众多河流，决定了唐努乌梁海中河流的最终走向。合流之后的河流，从地势较低的西萨彦岭寻找到了缺口。当然，如果让我去写类似童话的话，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因为发源于唐努乌梁海的这条河流，在向北经由“西西伯利亚平原”与“中西伯利亚高原”的相接处漫流之后，注入的是寒冷的北冰洋。

对俄国地理结构知晓一二的朋友，应该可能会听过这条河流的名字，它就是俄国最大的河流——叶尼塞河。也就是说，为俄国带去最多水资源的叶尼塞河（利用率倒不是最高的，因为人口密度太低了），就是发源于唐努乌梁海。从这个意义上

说，任何一个稍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都不会愿意自己境内的河流受制于人。或者说，无论你是主观上有计划，还是客观上遵循自然渗透的规律，沿河流向上、下游方向扩张，都很自然的有把一条河流两边的土地归入同一政治体的需求和欲望。如果俄国在尽握主动权的情况下，不试图把和蒙古的政治分界线，定位在叶尼塞河与色楞格河（也包括大湖盆地）的分水岭之上的话，那也当不起我对他们在地缘政治研究上的诸多赞誉了。

按照我们在温带的生活经验，每一条大河的下游地区通常都会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区域。地势的平整和充足的水资源，一旦人类可以有力量对其加以疏导的话，肥沃的良田就能够使所承载的人口呈几何数级的增长（相对自然状态）。不过西西伯利亚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记得在北亚部分我们曾经解读过了。尽管西西伯利亚平原可以算得是世界上最为平整的大平原，但纵行其间的河流却因为由南至北的走向，让周边的土地雪上加霜。因为在度过漫长的封冻期后，位置更南，纬度更低的上游河流，总是先于下游地区解冻，而被下游冰层阻挡的上游河水，除了向四周漫流之外，就别无出路了。短暂的夏日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些因河水漫流而形成的沼泽地晒干，就又进入新的封冻期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西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土地都变成了沼泽地了。只有在上游纬度较高的区域，才有可能为人类所开发。

西西伯利亚平原的这种情况，不仅古典时期的农耕民族无力开发，就算是靠天吃饭的游牧民族也不会有太大兴趣。当然，我们前面也说了，越靠近上流高地的区域，反倒越有机会为人类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下，群山环绕的唐努乌梁海倒称得上是一个世外桃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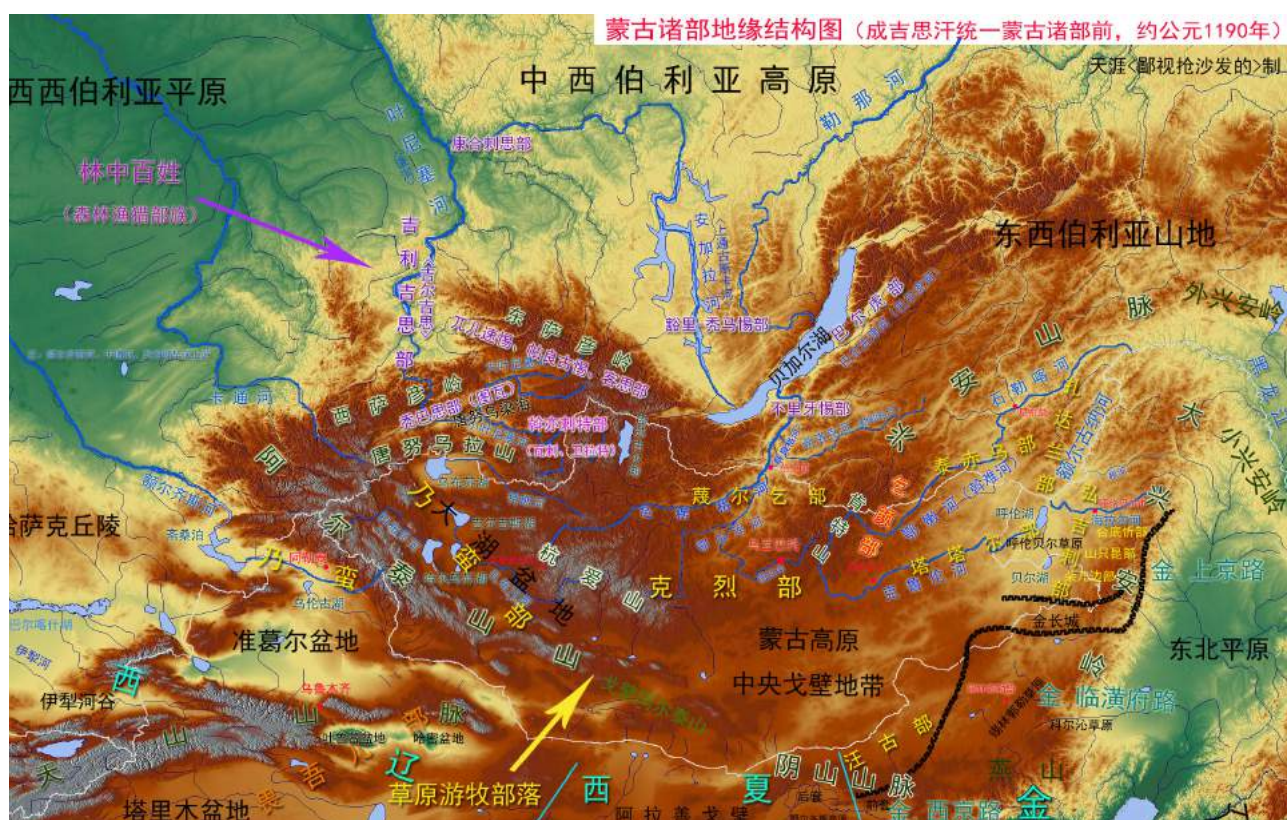
每二节 唐努乌梁海分布的渔猎民族

由于合成唐努乌梁海的三条山脉相距较近，唐努乌梁海盆地内事实上并没有大规模的草场，或者说植被以森林为主。发源于东萨彦岭上的大叶尼塞河，与发源于唐努乌尔山东端的小叶尼塞河，在西萨彦岭——唐努乌尔山之间汇合成了“叶尼塞河”的起始段。而这些河流两侧就成了这些生产方式整体以渔猎为主，辅以畜牧的部落的生存之地（越往高地上，渔猎的比例越高。也就是说，西段叶尼塞河干河河谷，畜牧的比例高些；东段大、小叶尼塞河等支流，渔猎的比例高）。唐努乌梁海地区并不是蒙古高原之上，唯一高森林覆盖率的区域。在其东面的环贝加尔湖地区，包括色楞格河下游，同样也属于高森林覆盖的区域。

在成吉思汗成为草原之主的时候，生活在唐努乌梁海，及其以东直至贝加尔湖东岸森林地区的部落，被统称为“林中百姓”。区别于那些驰骋在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些“林中百姓”被视为渔猎民族。由于这种渔猎的生产方式，注定了这些林中部落的人口并不会太多。不过这些猎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都是非常优秀

的战士。当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准备南下与中央之国的统治者决战时。自己的后方，也同样有可能成为这些林中部落的袭掠对象。因此，成吉思汗在统一草原之后，也专门针对这些森林之民展开了政治、军事攻势。而他们在后来的历史中，也成为蒙古游牧帝国的一部分。甚至在迁入游牧区之后，成为影响中央之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

这些被成吉思汗征服，并纳入帝国体系的森林民族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当属“瓦剌”人了。在元朝灭亡，瓦剌人成为草原最强悍的部落之后，其在与明帝国的战争中，一手酿成了农牧战争史上中央帝国最惨痛的失败之一：土木堡之变。在这次战役中，中央帝国甚至直接损失了一位皇帝（明英宗，被瓦剌所俘）。而在成吉思汗决心征服蒙古高原西、北部这些森林民族时，瓦剌人的前身“斡亦剌特部”，也是最先与蒙古人合作，并成为其他森林部落迅速纳入蒙古帝国体系的导火索。这种政治上的“先知先觉”，也为瓦剌人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成为蒙古高原的主导力量，取得了先发优势（因此可以获得比其他部落更好的政治待遇）。当然，这时候的瓦剌人已经是蒙古民族的一部分。并以蒙古部落的身份，继续着与农耕区的千年博弈。



蒙古诸部地缘结构图

瓦剌人之所以会成为“林中百姓”中最先归顺成吉思汗的部落，和他们的位置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因为他们所聚居的山林，正是唐努乌拉山脉的最东端。这里也是小叶尼塞河的最上源处（由于共有八条小河，也称之为“八河流域”）。与蒙古

高原核心游牧区：色楞格河流域无缝对接的地理位置，也使得瓦剌人成为最容易下山游牧化的民族。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也就顺便说下“大叶尼塞河”上游，也就是东萨彦岭上游的情况。当时在这一带游牧的部落中，有一支叫做“兀尔速锡”。当然，在成吉思汗的兵锋之下，他们也同样很快成为“生活在毡帐之中的兄弟”。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中，他们倒没有瓦剌人那么拉风。他们的一部分后人，甚至直到 20 世纪中叶仍然在大小兴安岭中保持着渔猎生活方式。然而，这也许也是一种幸运。因为在现代中国的所谓“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民族分类中。这些源自东萨彦岭的渔猎民族，因为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以不足万人的数量成为五十六分之一。只不过这时候他们的名字，已经被称之为“鄂伦春族”了。



鄂伦春族（中国）



图瓦人（俄罗斯）

按照现有的进度，蒙古高原崛起的这段历史与地缘博弈，解读的话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之所以会在现在有所涉及，是因为需要一段相对较近、资料相对翔实的历史，来帮助我们了解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鉴于匈奴帝国的历史距离我们太过遥远，史料的缺乏使得这种佐证变得十分必要。当然，我们这一节的重点，不是解读蒙古帝国的形成，因此这之前做了张《蒙古诸部地缘结构图》，上面标出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蒙古高原诸部的地缘位置。相信大家能够从这张图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既然那些完全生活在山林之中的“林中百姓”，都有机会在游牧帝国的历史中出现，那么条件相对较好，有机会吸纳更多畜牧业以为补充的叶尼塞河谷（唐努乌梁海盆地内的部分），就更没有理由不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了。比起异地而生，得以保持民族独立性的“鄂伦春人”；以

及迁居草原，完全成为蒙古民族一部分的“瓦剌人”来说，当时生活在唐努乌梁海盆地腹地的这支被叫作“秃巴思部”的部落，要显得更为幸运。因为他们留在当地的部落成员，至今仍然保持了原有的族名。只不过在汉语中，他们通常被译为“图瓦”人。而在现在俄罗斯的政治版图中，唐努乌梁海板块也被标注为“图瓦共和国”。

尽管图瓦人和很多亚洲游牧民族一样，因为蒙古人的那段辉煌历史，而愿意称自己为蒙古人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这些生活在世外桃源的部族，至今所操的语言还是蒙古人征服之前所持的“突厥”语。当然，所谓民族认同，最主要的指标是在于这个民族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他们想做，并认为自己是蒙古人也并无不妥。而在这里指出图瓦人的语言和其他蒙古人有明显区别的原因，是因为这和唐努乌梁海地区封闭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唐努乌梁海的边缘位置，以及与蒙古高原主体若即若离的地缘关系（河流不是指向高原腹地，而是西伯利亚），加上不甚突出的游牧环境，使得这一板块在历史上，本身并没有成为决定蒙古高原命运的重要板块。

不过对于中央之国来说，这个板块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里说其特殊，并非是大家所纠结的，清帝国就已经在唐努乌梁海建立有效统治，俄国人的占领是否合法这件事。事实上，唐努乌梁海地区与华夏文明的交织，远比很多人所认知的要早。可以说，在我们正在解读的汉帝国时代，这一地区就已经播撒了华夏文明的种子了。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和当地群山环抱，水源充足的小环境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周边山脉最大限度的帮助隔离了来自西伯利亚与蒙古高原腹地的恶劣气候（冷和沙），相对湿润的小气候，以及因高森林覆盖率而累积而成的良好的土壤条件（想想东北平原的黑土地是怎么形成的），使得相对开阔的大叶尼塞河河谷不仅有着自然条件不错的草场，也具备了农业开发的基本条件。



小叶尼塞河

你很难要求两千多前的匈奴人，或是其他蒙古高原部落，能够自然生成农耕的概念，并试图开发唐努乌梁海的农业潜力。不过对于那些因为战争而被俘虏、劫掠到蒙古高原的华夏农耕族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于习惯在长城以南的暖温带、亚热带气候中进行农耕生活的人来说，中温带的蒙古高原那寒冷的气候，以及

游牧的生活方式都是他们所不适应的。而这种不适应，也加大了人口的死亡率。对于视人口为第一生产力的古典时期来说，人口的损失就是资源的损失。就这一点来说，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都一样重视。否则我们就不会在那么多历史片段中，看到战争之后的“战利品”中，包含那么多被胜利者带回的人口了。

通常情况下，那些被掠入蒙古高原的来自汉地（现在已经是汉帝国时代了，可

以称之为汉地了)的人口,会依军功分配给各部落,并分散到蒙古高原的各个角落。到底是谁最先发现唐努乌梁海腹地中,存在可供农业开发的气候环境和土地,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匈奴人就此发现,这个边缘之地可以用来安置因各种因素进入蒙古高原汉人移民,却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匈奴人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这些或主动,或被动来到蒙古高原的汉地移民,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匈奴人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让他们有一个更适应的环境生活,有利于发挥他们从汉地带来的技术特长。另一方面,相比渔猎、游牧的生产方式,同一片土地如果被开发为耕地,其产出量要远远高于草场和森林。

第三节 李陵与唐努乌梁海的联系

尽管匈奴人陆续在唐努乌梁海腹地安排了不少汉地移民,但历史注定只会记住那些看似能够左右“历史”的精英人物。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除非这些汉地移民最终成为独立的族群,并发挥了能影响到中央之国的政治影响力。否则他们是没机会被我们的史书所记住的。而在今天,我们也很难从考古的角度在其中获知这些曾经的历史。真正让唐努乌梁海和我们所认知的“历史”联系到一块的,是一个原本就对我们的历史观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李陵。那么李陵是如何与之联系起来的呢?

李陵的故事,在中国算得上是一件非常著名的悲剧性事件。长期以来,中国的文人和士大夫对于李陵力尽之后归降匈奴一事争议颇多。既无法做出正面评价,亦无法做出一边倒的负面评价。然而,绝大多数像李陵这样虽有功在前,却最后“大节”不保的人,就没有这种好运了。李陵能够在投降异族之后,还能“有幸”成为争议人物,很大程度是因为司马迁。正是因为为李陵鸣不平,司马迁才被处以对男人来说,最为残酷的“宫刑”。而在受此严重打击后,完成被后世认为是史书标杆的《史记》,也成为司马迁人生当中最大的追求,也可以说是证明自己的唯一机会。从记录历史的角度看,你也可以认为李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

当然,我们的重点并不是去探讨李陵和司马迁多大程度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按照惯例在我们的叙述中是很少论及具体历史人物的,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位悲情英雄,是因为李陵和我们正在解读的蒙古高原西部,也就是匈奴“右翼”有关。因为在得到李陵之后,大喜过望的匈奴单于所给予李陵的政治待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个政治待遇具体到官职上,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匈奴游牧帝国的三号政治人物——右贤王¹。

1 应为右校王。汉书·李陵传:“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单于将自己的妹妹嫁给李陵,并封其为右校王,负责管辖当时被匈奴征服的坚昆一带地区。

获封右贤王，意味着李陵成为色楞格河以西游牧之地的最高管理者。能够得到这个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李陵在这次远征中给匈奴造成的杀伤力，足以证明他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也和他李广之后的特殊身份有关。汉匈博弈中，最为知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后人归降了匈奴，对于汉军的心理影响，绝对要比一般汉军投降匈奴要大得多。而以最高的政治待遇礼遇这位曾经的劲敌，为匈奴在政治上的加分，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不算是最高的政治待遇，毕竟左、右贤王虽属同一级别，但负责左翼的“左贤王”，政治地位要略高一点。不过考虑到左贤王等同于“太子（王储）”地位的政治身份。相信不会有人认为，作为降人的李陵会适合这个位置。



唐努乌梁海植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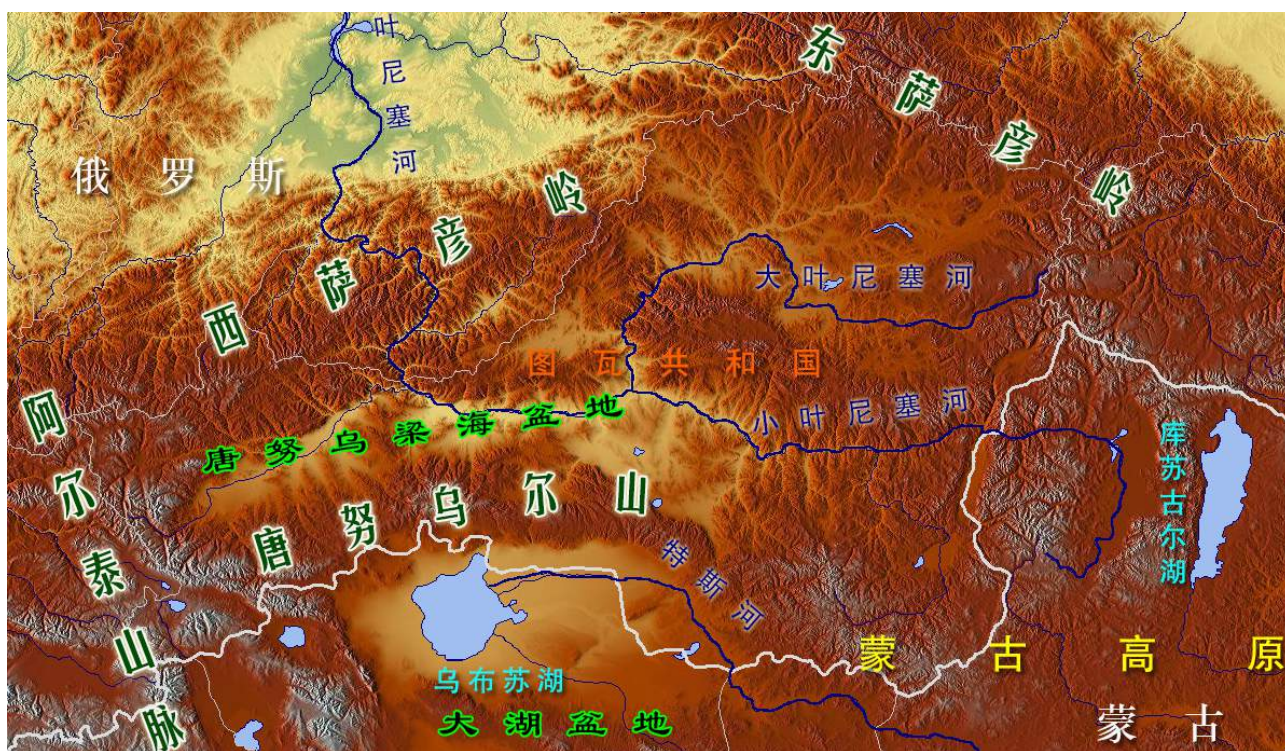
在前面我们也说了，匈奴右翼的核心板块应该是唐努乌梁海盆地之南的“大湖盆地”。而位置边缘的唐努乌梁海，只能算是次一级的地理单元。由于山高林密的地理结构，历史上的各个游牧帝国对于经营唐努乌梁海的热情，并不算高。不过对于李陵和那些不习惯塞外风沙之苦的汉人来说，唐努乌梁海却有些特殊意义。理由其实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唐努乌梁海的河谷之中，有条件让这些不想和游牧民族一样过着逐水草而居的不稳定生活的汉人，重拾农耕的生产方式。

对于习惯于农耕生活的人来说，地势平缓的森林地带远比草原要有吸引力。依靠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焚烧过的森林很快就能变成

耕地。等到那些因焚烧草木而产生的肥力被快速消耗掉后，原始的农耕者就会把目光投向另一片森林。不过在中央之国，随着人口的增加，这种粗放的农业方式已经变得过于奢侈了。以积肥、秸秆灰还田等方式对固定土地的精耕细作，保持肥力的

方式，成为东亚农耕区的普遍做法。而这种生产方式，以及对土地的态度，也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性格。

不过李陵和那些被迫归顺匈奴的汉人，如果想在唐努乌梁海的山间河谷中重拾田园生活的话，倒不用去考虑改良土壤的问题。因为千百年来因为植物腐败所形成的腐土，足以让他们的农业生产中只需要“播”和“收”两个程序。事实上，在东北亚、北亚森林地带，只要温度不是冷到难以忍受，以及能够提供农业生产最低限度的积温（植物生长周期所需要的日平均气温的总和），小规模农耕生产，以及畜养牲畜都是一直存在的，并作为渔猎生产的重要补充方式。



唐努乌梁海地理结构图

相比游牧区，渔猎区对于农业的兴趣要更大些。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渔猎区与农业区的居民，都有些相同的定居方式。当你有机会稳定下来，并视自己脚下的土地为家园时，才会有机会在它当中发掘出新的潜力。而在历史上，把农业生产方式带入渔猎区的，往往就是那些因为战争方式被掠入的华夏农耕区的人口。可以肯定的是，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有无数被北亚、东北亚游牧、渔猎部族掠入的华夏农业区人口，尝试过在这些苦寒之地以自己熟悉的方式生存下去。

而李陵之所以能够有幸被历史所记住，并引发我们对唐努乌梁海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匈奴的政治地位。真正引发我们在宏观历史层面对之产生兴趣的，是一个叫作“黠戛斯”的唐代部落。这支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部落，曾经向唐帝国的统治者表述过他们当中部分成员的华夏血统，并试图以此为纽带建立政治

联盟。而“黠戛斯”部所指向的血统来源，就是李陵。基于中央帝国在东亚地区的文化统治力，边缘民族的这种攀附行为是很常见的。不过结合唐努乌梁海的地理结构，以及李陵和汉地移民经营过蒙古高原右翼的史实，“黠戛斯”中那些明显带有黄种基因的成员，的确有很大可能是以李陵所代表的，那些曾经在唐努乌梁海及其周边地区生存的汉地移民之后。只不过因为李陵是他们当中声名最为显赫者，才有幸成为代言人罢了。

“黠戛斯”人也就是现代“吉尔吉斯人”（中国的柯尔克孜族）的直系祖先。不过如果你有机会遇到这些在外貌上和我们有诸多相似之处的朋友的话，建议不要去一厢情愿的提及所谓李陵之后的问题（现在所显示的黄种基因，已经和汉帝国移民的关系不大了）。毕竟在民族认同这个问题上，血统并不是最主要的。如果你在文化、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即使没有血统上的联系，也会有人愿意寻找证据拉近双方距离的；反之，你就是证明骆大使从血统上算应该是“华人”，他也绝不会选择入中国籍的。

第四节 唐努乌梁海在蒙古高原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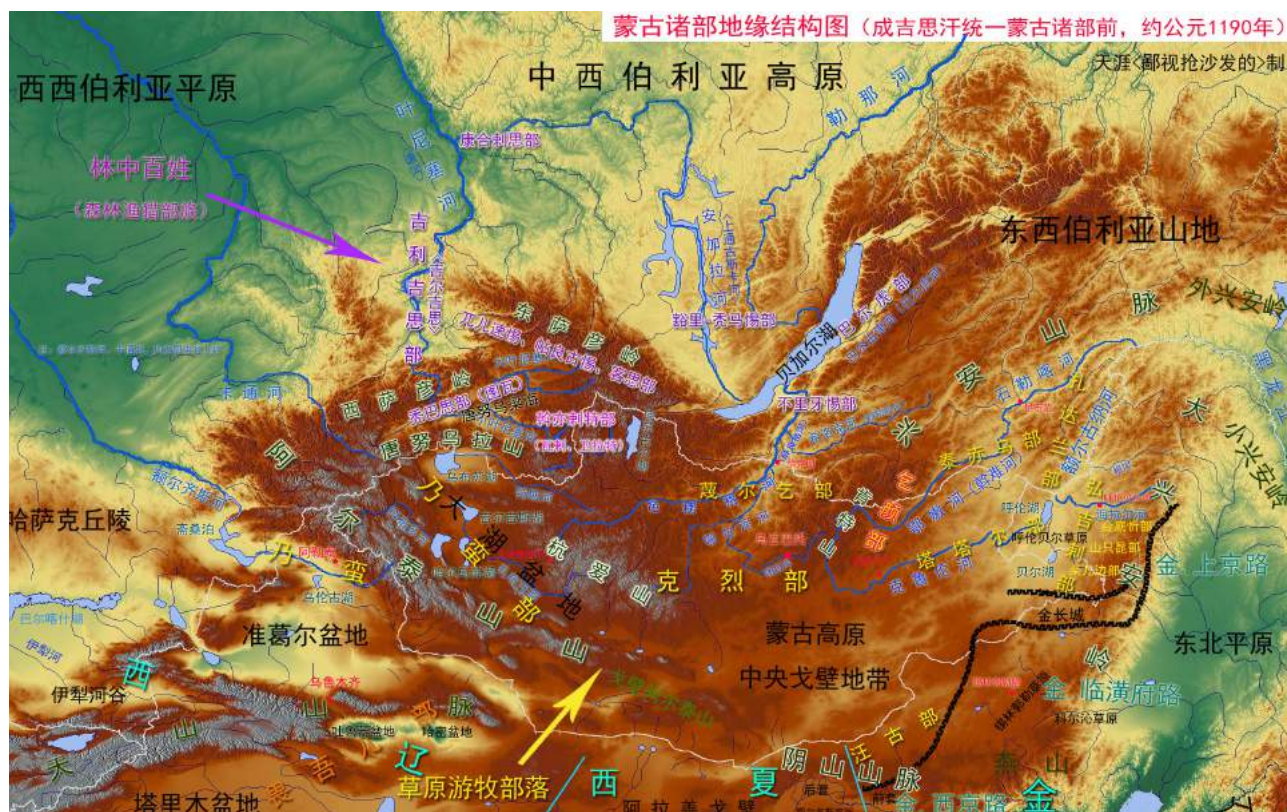
回到唐努乌梁海的问题上。唐努乌梁海盆地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它有机会为人类保留一些“原始”的东西。好像现代图瓦人所操持的语言，就被认为是一种古老的突厥语，并为许多语言学家所瞩目。而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也是许多人所感兴趣的。当然，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会很遗憾这片土地目前已经归属了俄国。不过如果你只是对图瓦人的生活方式感兴趣，并试图通过他们感受唐努乌梁海的地缘特点的话，倒是不用出国。在新疆阿尔泰山脉南麓，中国西北地区唯一与俄罗斯相交的边境区域，生活着一支从唐努乌梁海地区迁移过来的图瓦人。而研究这些自称蒙古人，却与蒙古人在语言、生活方式上有诸多不同点的族群，以及探访他们的生存之地，在这几年也很热门。只不过，在大多数时候，你听说过的可能是“喀纳斯湖”这个地理标签罢了¹。

当我们把视角抬高到整个欧亚大陆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唐努乌梁海地区是整个大陆的地理中心。而它处在蒙古高原——大中亚板块——西伯利亚平原交汇之处的位置，也的确当得起欧亚大陆腹地地缘枢纽的称号。不过具体到地缘博弈的话，山高林密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就不能算是重要的地缘板块了。在蒙古高原的西部，乃至包含准噶尔盆地北部在内的大中亚地区，核心地区是在由唐努乌尔山——杭爱山——阿尔泰山所围就的“大湖盆地”。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在蒙古高原三分天下

1 在中国新疆布尔津县，阿尔泰山深处的喀纳斯湖区生活着大约两千名图瓦人。与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图瓦人属同一民族。有认为是成吉思汗西征时遗留的，也有认为从西伯利亚迁徙而来。

有其一，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的话，大湖盆地就是必得的天王山。

每一条河流都有他们最终的归宿。蒙古高原是这个星球上，为数不多的发源出两片大洋水系的高地。肯特山以东的蒙古高原东部的河流，除了消失在大漠戈壁中的内陆河以外，成规模的河流最终都通过黑龙江汇入了太平洋；而色楞格河流域大大小小的上百条河流，最终的归宿却是北冰洋。



蒙古诸部地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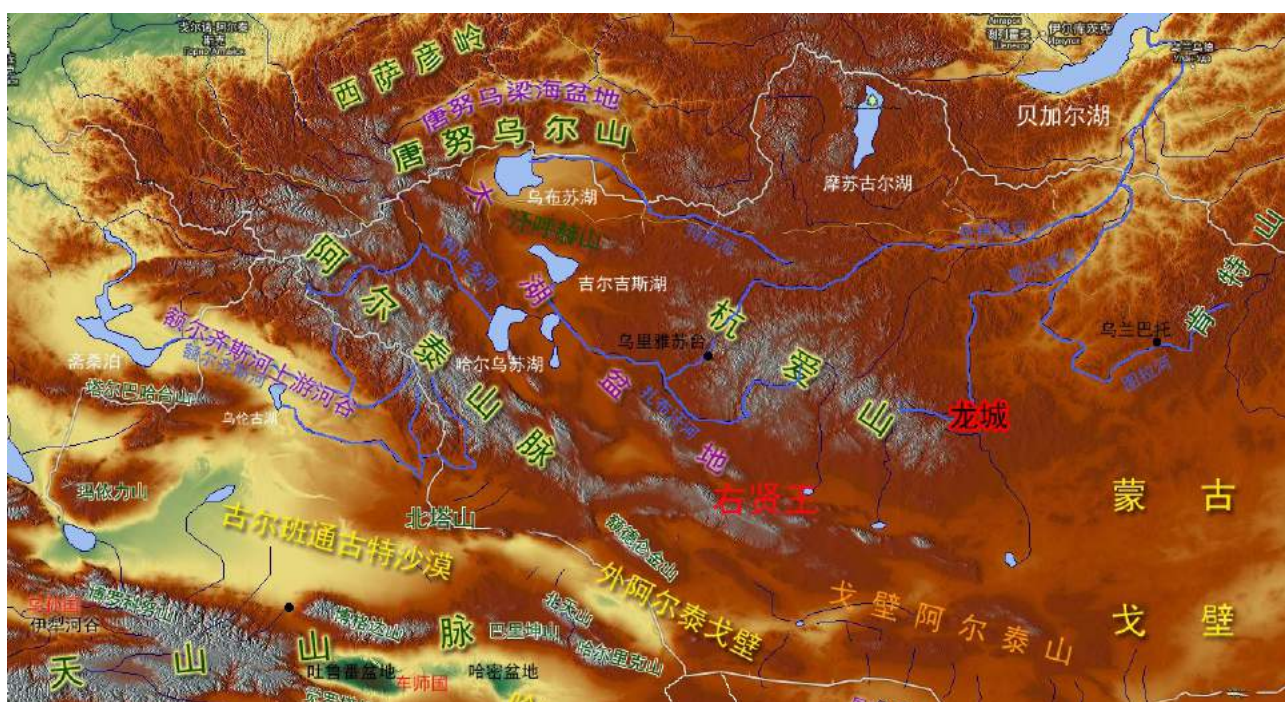
只不过在它们到达北冰洋之前，先得填满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在填满贝加尔湖这个大坑之后，再汇入贝加尔湖的河水就有机会向地势较低的西北方向，也就是西西伯利亚平原方向打开一个缺口，最终通过西西伯利亚平原边缘的“叶尼塞河”流入北冰洋。这条唯一有机会引出贝加尔湖湖水，让色楞格河流域有机会“晋升”为北冰洋水系的河流，叫作“安加拉河”。对于这个名字，估计绝大部分人会感到陌生。不过提起它的另一个名字，估计就引起很多人的猜测了，这个名字就是“上通古斯河”。没错，总是能在每一本罗列世界之谜的书籍中出现的“通古斯大爆炸”，就是发生这在上通古斯河流域的。

从流域划分的角度看，安加拉河也是叶尼塞河的一条支流。只不过叶尼塞河正源之名，被授予了唐努乌梁海中的大、小叶尼塞河。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俄国人在和清帝国时期的中央之国，以及后来分割出的“蒙古国”划定边界时，唐努乌梁海盆地和贝加尔湖一样，都作为叶尼塞河的源头，成为俄国势在必得的区域。

第五节 大湖盆地的地理结构

与蒙古高原其他板块相比，大湖盆地算得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板块。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所有的河流都是内流河。也就是从盆地周围的山地上流向腹地的河流，最终都没能汇合成一条河流，并流向大海。从地理结构上看，大湖盆地诸河流内流的命运，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整个盆地的缺口在东南部，即使这些山脉上流下的河流有力量冲出盆地，也会悲哀地发现，等待它们的并不是从其他高地汇集而来的，和他们共同冲向大海的河流，而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在这种地理结构下，大湖盆地周边山地上流下来的河水，除掉在盆地腹地汇集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之外，就别无出路了。

由于大湖盆地的东南部靠近干旱的戈壁区，因此整个盆地内的湖泊也呈现南小北大的格局。即南半段靠近戈壁的蒸发量相对较大，土地也更容易沙漠化。而北半段受戈壁的影响相对较小，所蓄积的湖泊也相对较大。这其中最大的有三个湖泊——哈尔乌苏湖、吉尔吉斯湖、乌布苏湖。这些湖泊的名字，相信很多朋友是闻所未闻。不过接下来出场的几个地缘标签，知道的朋友可能就要多上很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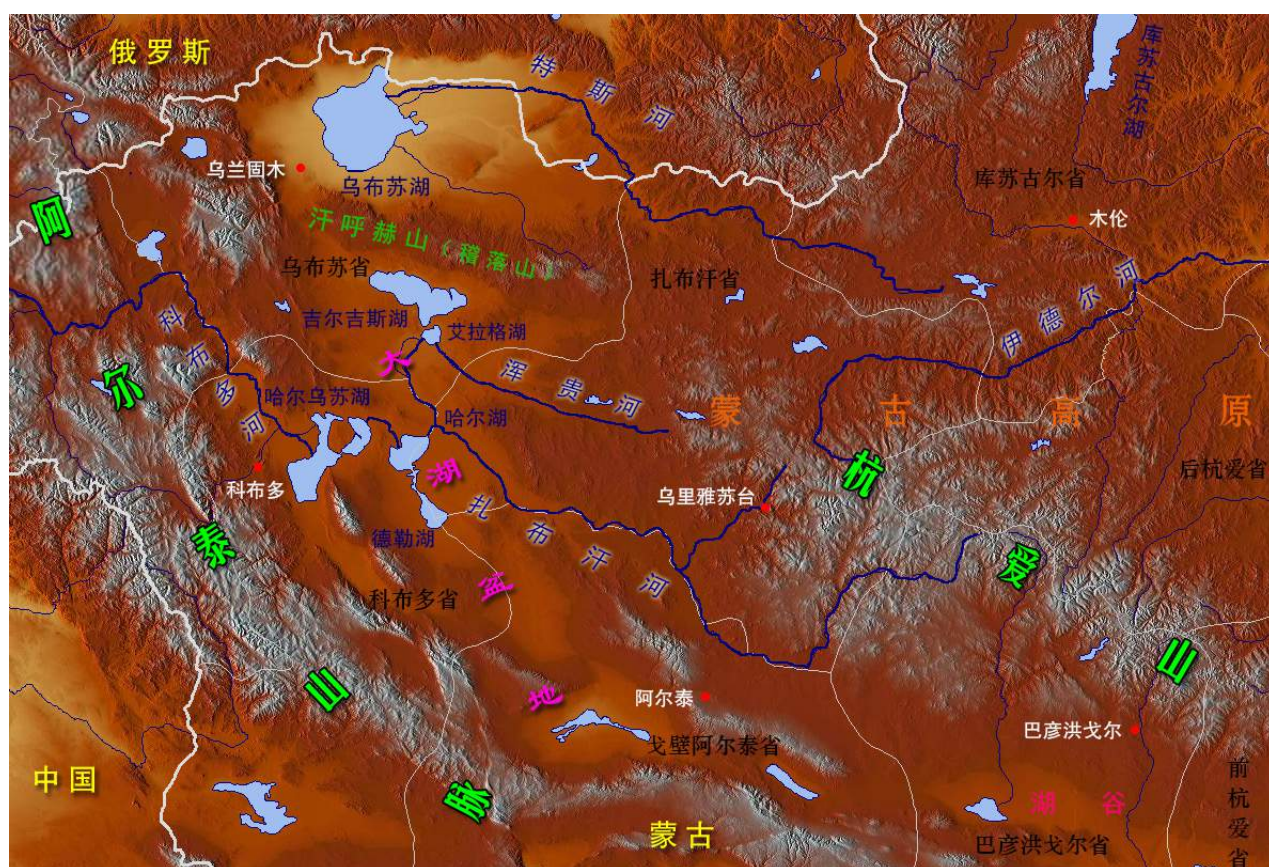


匈奴右翼（右贤王部）地缘结构图

既然湖泊之水是从山上来的，那么它们也必定对应着各自的上游河流了。我们知道，大湖盆地实际上是由西南方向的“阿尔泰山脉”；西北方向的“唐努乌尔山”；东北方向的“杭爱山”三面合围而成的。也就是说，盆地内的湖泊之水正是来源于这三大山脉。从贡献度的角度来看，这三条高地倒是属于同一级别。因为我们刚才

所说的三大湖泊之水，正是分别来自于这三条高地。这其中，阿尔泰山上流下来的“科布多河”汇成了“哈尔乌苏湖”；杭爱山上汇出的“扎布汗河”，蓄积了“吉尔吉斯湖”；而唐努乌尔山，则为“乌布苏湖”，及汇入该湖的特斯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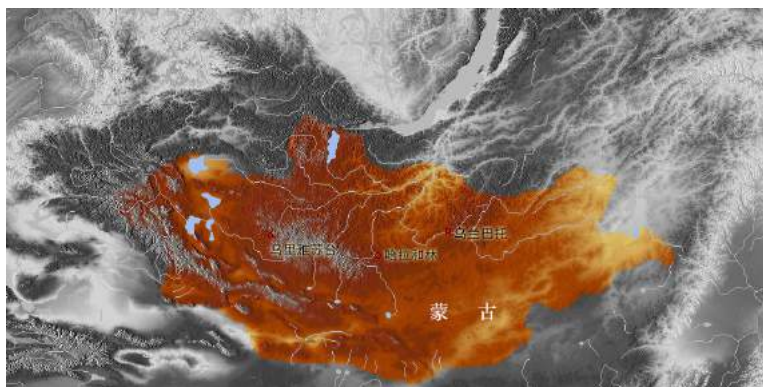
既然围就大湖盆地的三大山脉成就了三大水系和三大湖泊，那么很自然的，大湖盆地的北半段也可以分割为三个亚板块。由于两千多年前的匈奴帝国过的是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我们很难找到他们生活的遗迹来验证这三个亚板块在匈奴帝国中是居于何等地位。不过，在古典时期后期，清帝国出于控制蒙古高原的需要，以及近代蒙古国独立之后，出于建立符合现代国家要求行政区划的需要，在大湖盆地北部建立了几处重要城镇。这其中最有可能为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所知晓的，就是清帝国兴建的“科布多”（科布多河流域）与“乌里雅苏台”（扎布汗河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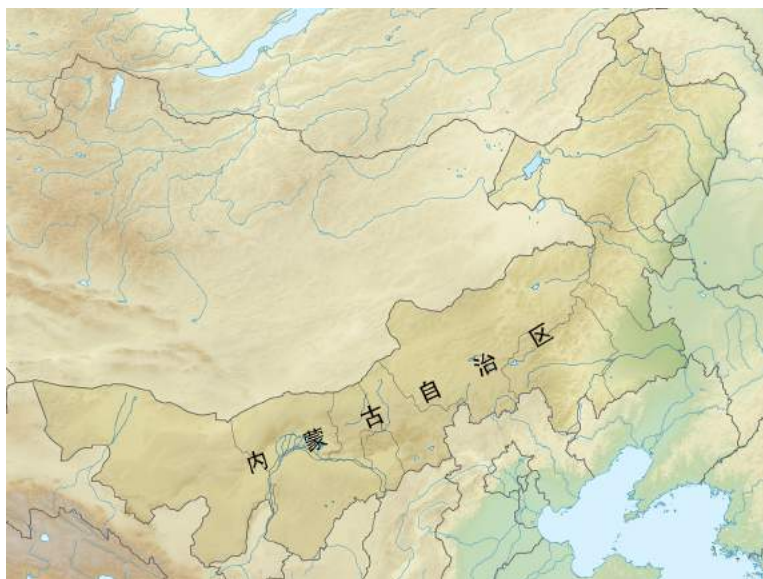
大湖盆地示意图（蒙古国）

在清帝国统治蒙古高原时期，外蒙古的政治中心并非是在传统的色楞格河流域上游地区（具体地说，就是鄂尔浑河与图拉河上游），而是在大湖盆地中，也就是杭爱山西南麓的“乌里雅苏台”。之所以会做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满洲人在试图化解蒙古高原的威胁时，和汉族所主导的中原王朝有所区别。对于长城以南的华夏农耕民族来说，将阴山一线的游牧民族驱逐至漠北，就足以保障核心区的战略安全了。而对于视东北地区为祖地的满洲人来说，仅仅控制阴山南北显

然是不够的。如果不能将大兴安岭西侧的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这条“草原走廊”，归为直接控制区的话，大兴安岭东侧的东北地区的战略安全会很成问题。这一点，满洲人的先祖“女真人”，就有惨痛的教训。



蒙古国位置图



内蒙古自治区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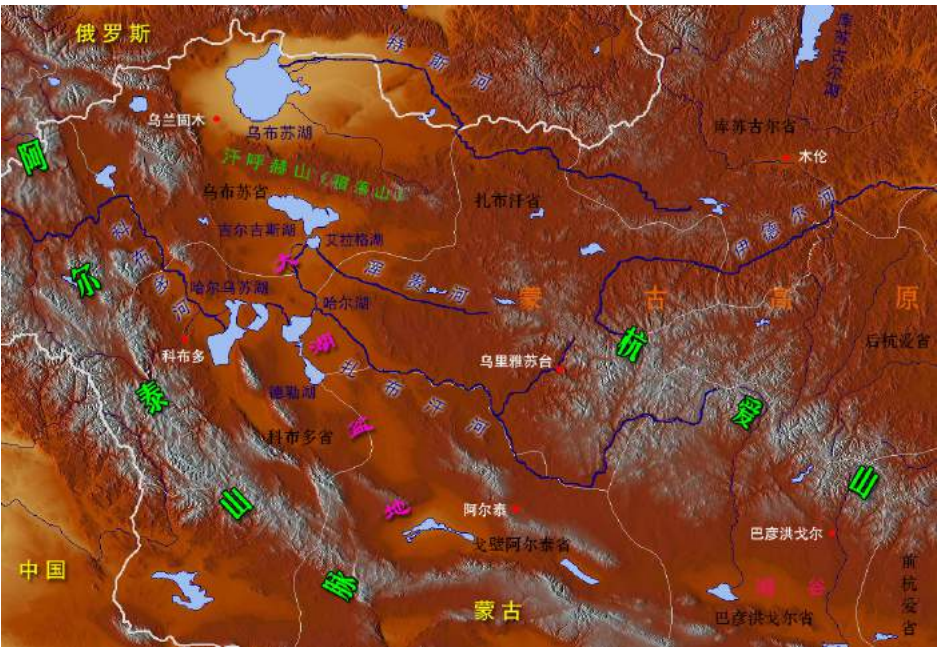
虽然女真人为了防备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袭扰，直接控制了锡林郭勒草原（当然也包括阴山北麓的草原地带了），并在大兴安岭西侧构筑了中原王朝未曾尝试过的草原长城。但呼伦贝尔草原及其以北的蒙古高原东部地区，还是成为了金王朝的心腹之患。在成吉思汗通过统一东蒙地区，进而成为草原之主后，金王朝也成为蒙古帝国崛起道路上的牺牲品之一。女真人的教训告诉满洲人，如果他们想保证自己的后院不起火，他们需要把整条大兴安岭西侧的“草原走廊”控制在手。最起码，作为这条草原带核心的“呼伦贝尔草原”，需要有帝国强有力的控制力。在这种思路指导之下，在大部分古典时期适用的对蒙古高原游牧区用“漠南”、“漠北”加以区别的方式，就不适用了。

传统的漠南地带，加上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草原带，成就了“内蒙”的地缘概念。至于在此之外的蒙古高原，自然也就成为“外蒙”了。

清帝国是如何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来控制内、外蒙地区的，并不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所谓内、外有别，仅仅从这两个字当中的区别，就足以显出帝国对这两个地区在控制力上的差异了。当然，外蒙地区作为清王朝时期中央帝国的组成部分，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在管控力方面会相对弱些罢了。而“乌里雅苏台将军”，就是控制外蒙地区的组织机构。与其他非帝国核心区的管理一样，帝国对外蒙地区的行政派出机构，也是军政合一的组织模式。

既然东蒙的核心草原带已经成功的从传统的“漠北”板块分离出来了，那么外

蒙地区的政治中心势必也可以向西移动一点了。由此在大湖盆地核心区南部，扎布汗河上游兴建的“**乌里雅苏台城**”，也就成为整个外蒙地区新的政治中心。其实如果仅仅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大湖盆地——唐努乌梁海，以及色楞格河流域的话，杭爱山——肯特山南端的传统地缘中心（**乌兰巴托**及其以西至杭爱山地区），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在肯特山以东，仍然有大片虽不及“**大兴安岭西麓草原走廊**”肥沃的土地，归入了外蒙板块。从纯粹的几何角度看，蒙古高原传统的地缘核心区仍然居于中点。不过清帝国最终还是选择了将控制外蒙地区的**乌里雅苏台将军府**，设立到了大湖盆地之中。决定这一选择的地缘理由，就是所谓的“**外蒙**”地区，当时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阿尔泰山以东的地理意义上的“**蒙古高原**”，阿尔泰山脉南麓的**额尔齐斯河流域**（也就是**准噶尔盆地**北沿），也同样属于蒙古游牧部落的控制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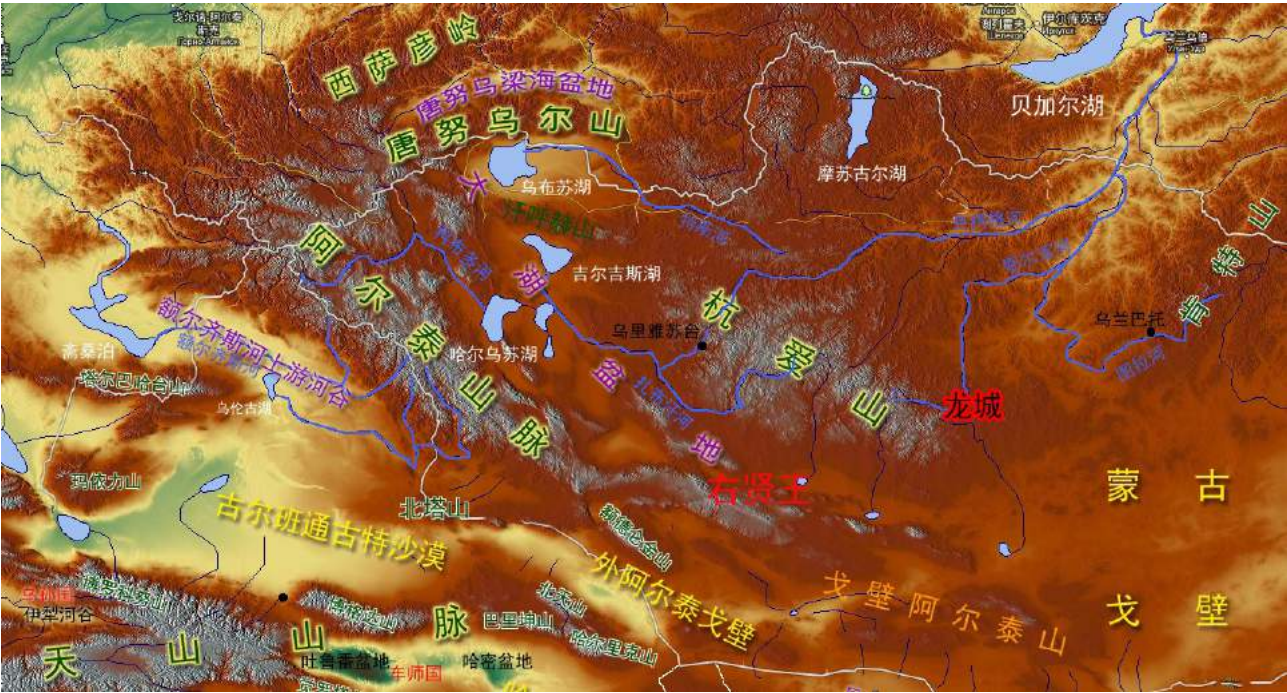
大湖盆地示意图

关注焦点还是在大湖盆地。如果你观察得够仔细的话，会发现“**乌里雅苏台**”城并非建立在大湖盆地的腹地，而是建筑于扎布汗河上游河流的山谷之中。按照我们在东亚核心区的经验，河谷、盆地腹地（下游地区）才是最利于植被生长的区域，也因此能承载更多的人口，成为地缘核心。乌里雅苏台的选址似乎告诉我们，在大湖盆地当中最优质的牧场并非存在于湖泊众多的盆地腹地，而是那些海拔相对较高的上游河谷中。

在这里，我们需要先对“**大湖盆地**”这个地理标签的范围作一个标定。狭义的“**大湖盆地**”，指的是阿尔泰山、唐努乌尔山、杭爱山西北段所合围出的地段。我们先前所提到的**乌布苏湖**、**吉尔吉斯湖**、**哈尔乌苏湖**等几个规模较大的湖泊及其周边地区，就是狭义“**大湖盆地**”的腹地。有一条曾经在汉匈博弈中出现过的山脉“**汗呼赫山**”（

蒙古人并非是唯一渗透到阿尔泰山以南的高原游牧民族。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中，包括匈奴人在内的诸多草原民族，在控制大湖盆地之后，都会很自然的渗透至阿尔泰山以南，并将直接控制线推进到额尔齐斯河上游。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在后面会有解读，现在我们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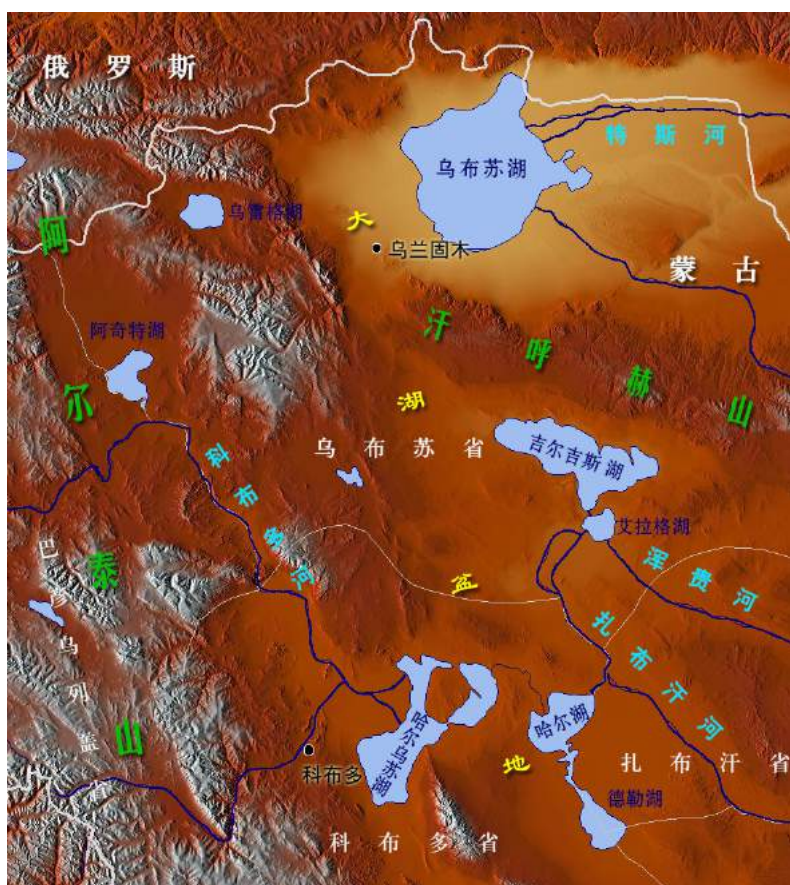
古称“稽落山”，公元 89 年，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及副将耿秉击败北匈奴主力于此），横向将这片腹地切割为了两块。北面的乌布苏湖地区自成一块；南面的吉尔吉斯湖、哈尔乌苏湖，包括二者之间面积略小的另两个大湖：哈尔湖与德勒湖，共为一区。事实上，南部湖区之间都存在河道相连。也就是说，从杭爱山南麓汇流下来的扎布汗河，与从阿尔泰山北麓流下来的科布多河，在盆地腹地汇集到了一起。而唐努乌尔山东部，以及杭爱山西北侧的河流，则单独打造出特斯河和乌布苏湖。



匈奴右翼（右贤王部）地缘结构图

相信通过《匈奴地缘结构图》，大家应该能够直观的理解上述内容。当我们把视线从乌里雅苏台城向南转移时，会发现盆地区仍在向东南方向延伸。只不过在这半段只剩下杭爱山东南麓在向腹地提供淡水了。阿尔泰山向南的延伸山脉，几乎对盆地腹地的湖泊没有贡献。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部分的湖泊在规模上远没有北段的大。在地理分类中，这部分由阿尔泰山脉南延伸段，与杭爱山东南段包夹而成的谷地，有时也被单独称作“湖谷”。而广义意义上的“大湖盆地”，也会包括这部分。

相比北段，湖谷的自然条件要恶劣得多。而造成这种恶劣环境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南部的阿尔泰山山势开始走低，没有力量提供足够的水源。这不仅使得湖谷内部荒漠化，同样的，山脉本身也植被稀疏。正因为如此，这段山脉的名字被标注为“戈壁阿尔泰山”。戈壁阿尔泰山的悲剧，与它的地理位置和海拔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如果想从大气中获得更多的水资源，有两个条件很重要：一个是与海洋的距离，另一个则是高度。与海洋距离越近，太平洋季风就越有机会带来湿润的水汽；而高度越高，就越有机会将之转换为雨水（雪）。从距离的角度看，蒙古高原东部显然会



大湖盆地示意图



乌布苏湖卫星图

更有优势；而从蒙古高原的地势来看，西高东低的格局，又是西部山地占优。这种纠结的结构，成就了蒙古高原中南部的悲剧。具体到高原西部的核心板块——大湖盆地（广义），就是其地势最高的西段地区，干旱程度要低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越靠近蒙古戈壁的地区越干旱。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蒙古国在大湖盆地区的行政建制中得到验证。盆地中乌里雅苏台及其以南的重要城市，都是建于上游河谷中。而西北部的省会城市“乌兰固木”及“科布多”，则可以靠近湖区了（前者近乌布苏湖，后者近哈尔乌苏湖）。

虽然大湖盆地区的西北段自然条件要比东南段好，但就盆地腹地的整体条件而言，比之色楞格河流域，以及蒙古高原东部还是要差上许多。不仅湖泊有很多是咸水湖，而且荒漠、荒漠草原的比例也比较高（荒漠化程度，自西向东逐渐严重）。不过大湖盆地板块腹地的草场情况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整个板块却还是有机会在蒙古高原三分天下有其一，甚至有机会翻越阿尔泰山脉，将势力范围渗透到准噶尔盆地。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

欧亚大陆东部草原带自东向西延伸到阿尔泰山南北时,形式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印象中那种一望无际,地势平缓的草原带开始消失,取而代之成为主角的,是立体分布于高大山脉之中的“山地草场”。至于这种结构的变化对游牧民族的生存与扩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又是如何影响周边地缘板块的,我们下一节再分析。

第六节 大湖盆地草场分布于山地中

与蒙古高原东部、色楞格河流域不同,大湖盆地腹地的低地草场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不过周边存在的高大山脉却为游牧于其中的部落,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山地牧场。我们知道,游牧民族的生活被形容为“逐水草而居”。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在于,在一个部落的游牧范围内存在不同生长期的草场。而除了牧草的品种、纬度这些因素以外,决定这些草场生长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温度。山地复杂的地形结构,恰好能够提供不同的温度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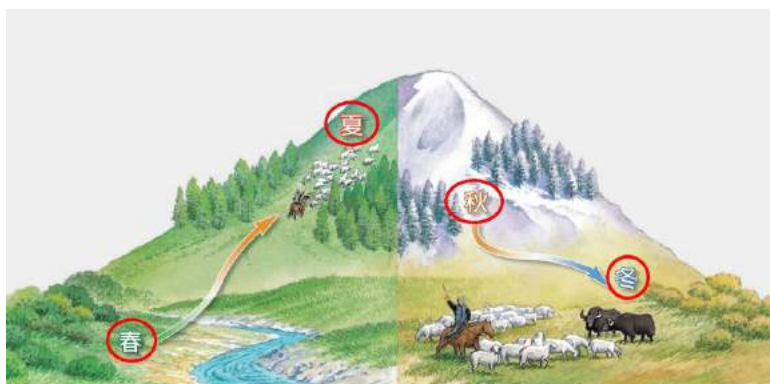


山地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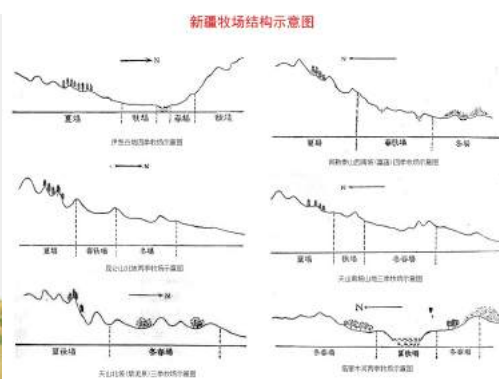
一般情况下,海拔越高,就意味着气温越低。按照这种逻辑,山地草场应该只能让游牧民族用来避暑了。但实际上,在一些结构复杂的山地,在某些层次高海拔地区的气温,却有可能比低海拔地区还要高。像山地轮廓呈块状和层状(断块山)的阿尔泰山就是这种情况。当然,草地的产生还跟水资源的供给情况有关。水太多的话,森林就会成为主角;太少的话,又会荒漠化。如果一定要具体解读阿尔泰山之中哪一层次,哪一区域是草场、森林、荒漠地貌;这些草场又分别适合在哪一季节放牧的话,应该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对于我们来说,知道像阿尔泰山这样的

山脉之上，存在气候环境迥异的山地牧场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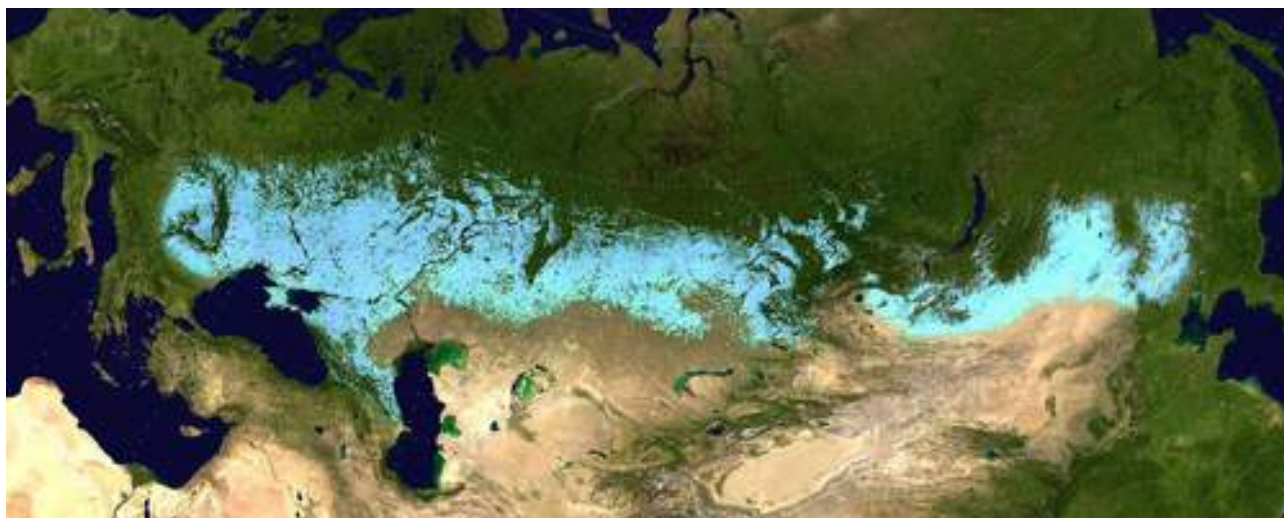
其实像大湖盆地这种以山地牧场为主的地缘板块，并不是孤例。在我们即将涉及西域板块，其腹地干旱的环境，也同样使得山地牧场成为游牧民族的研究对象。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生活实践，依据不同山地的自然条件，分割出二季、三季，甚至四季牧场来。即使是在那些以低地牧场为主的区域，那些有条件在夏季避暑，或冬季躲风的山地牧场，也往往会作为某一季节的迁徙地。如果大家对游牧民族在山地之中的生存方式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附上的《新疆牧场结构示意图》，这张图里对新疆内部几个地理单元的牧场结构，都标示出来了。



山牧季移示意图



新疆牧场结构示意图



欧亚草原地带

以大湖盆地的位置来看，他们对于精耕在东亚核心区内的华夏文明，直接影响要小于蒙古高原东部。然而这并不代表以大湖盆地为核心的蒙古高原西部，对中央之国的形成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以我们正在解读的历史来说，匈奴右翼就已经对汉帝国造成了直接威胁。只不过统领匈奴右翼的“右贤王”，在准备南下劫掠中原之前，还需要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第三章 匈奴在西域与河西走廊的渗透

第一节 蒙古高原牧民渗透阿尔泰山南麓

对于匈奴和其他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来说，有一个问题是许多人感兴趣的。就是为什么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中，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往往成为周边地区，包括其他游牧区的噩梦。也就是说，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似乎比其他地区的民族，显得更有进取心和战斗力。要解读这一点，我们需要先看看蒙古高原的地缘位置。

从地缘的角度看，欧亚大陆腹地往往与“游牧”二字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古典时期欧亚大陆腹地属于游牧民族驰骋之地。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片腹地不像西欧与东亚大陆一样靠近海洋，因此形成了相对干旱的“大陆型气候”。而相比森林，更耐干旱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这种气候下会更占优势，因此而形成的草原地带也被称之为“干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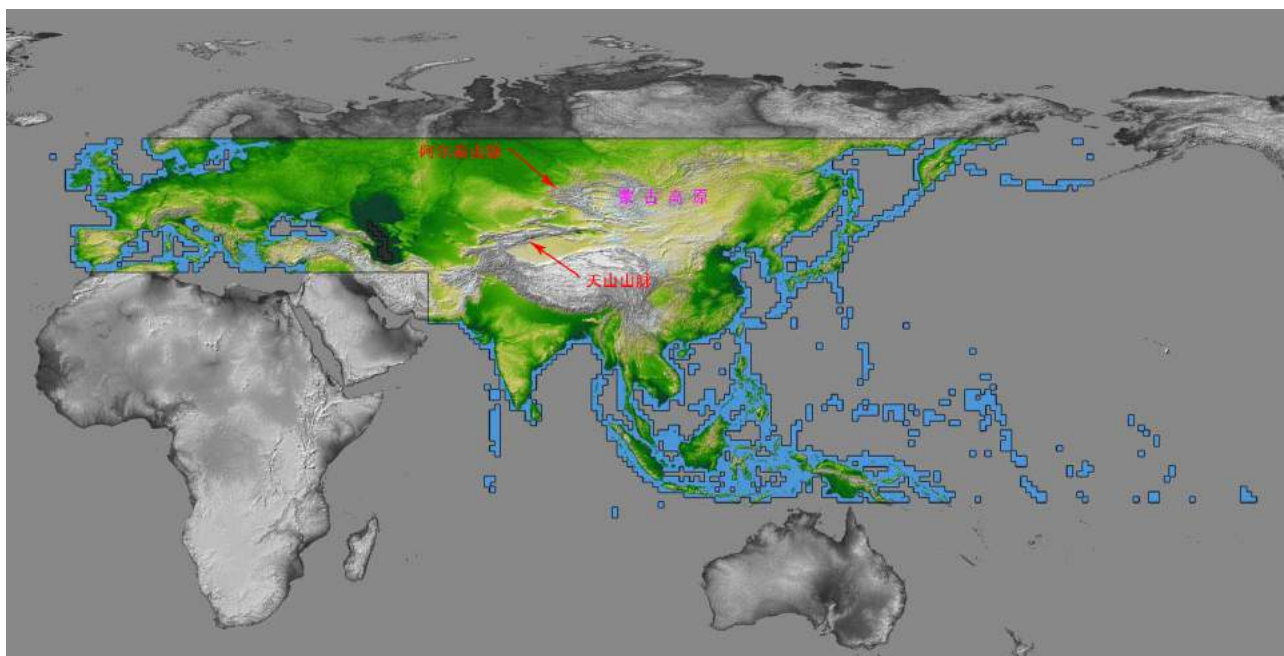
一般认为，欧亚大陆的干草原地带可以被一分为二。即由多瑙河平原向东一直到阿尔泰山脉，纵深达 4000 公里的“西干草原”；以及由阿尔泰山到大兴安岭，纵深 2400 公里的“东干草原”。从这种分割法我们可以看出，东干草原地带其实指的就是蒙古高原；而西干草原的核心，则在东欧平原。

相比西干草原，海拔较高的东干草原气候要恶劣许多。降水较少，以及因高海拔而引起的低温，都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亚洲游牧民族所遇到的困难。不过事物总是两面看的，为了适应这种恶劣环境，蒙古高原之上的游牧民族也形成了惊人的耐力和战斗力。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已经适应高原生活的他们，其他地区，包括西干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这片苦寒之地都没有征服的欲望。而反过来，这些东干草原之上的游牧民族却更有动力向周边更温暖，水资源更充分的地方迁移。伴随着这种迁移，一场在古典时期让欧洲人闻之色变的“黄祸”，以及困扰了华夏文明两千多年的北方压力，也就随之产生了。

对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来说，除了对绝大多数人类来说，属于极限之地的“西伯利亚”地区以外，其他几个方向都可以成为扩张渗透的地区。而对于以大湖盆地为核心的部落来说，他们最优先渗透的，则是阿尔泰山西南麓，也就是准噶尔盆地的北部。不仅匈奴右翼将此视为自己的核心区经营，后来的游牧帝国也同样将阿尔泰山南麓视作蒙古高原右翼的一部分（除非天山南北出现了同样强大的游牧帝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20 世纪初。在民国政府从清帝国继承下对外蒙地区的政治管辖权时，阿尔泰山南麓以“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为核心的“阿勒泰地区”，仍然属于“外蒙古”的一部分。并且由阿尔泰山北麓的“科布多”所管辖。

之所以蒙古高原西部的游牧民族总是有兴趣渗透到阿尔泰山南麓，就和西风有

关了。当我们把视线从东亚核心区向西转动，尤其是到了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时，就会发现，我们所熟悉的从太平洋所刮过来的东南季风，已经渐渐消失。取而代之成为主角的，是来自西北方向的风。当然，对于西面来风，我们也并非没有感觉。每到冬日，那干冷的西北风总是逼迫我们穿上厚厚的冬衣（东南丘陵地带的感觉就没那么明显了）。不过我们这里关注的“西风”，并非是那些来自欧洲大陆内部的干冷西北风，而是由大西洋而来的，带来湿润水汽的“大西洋湿润气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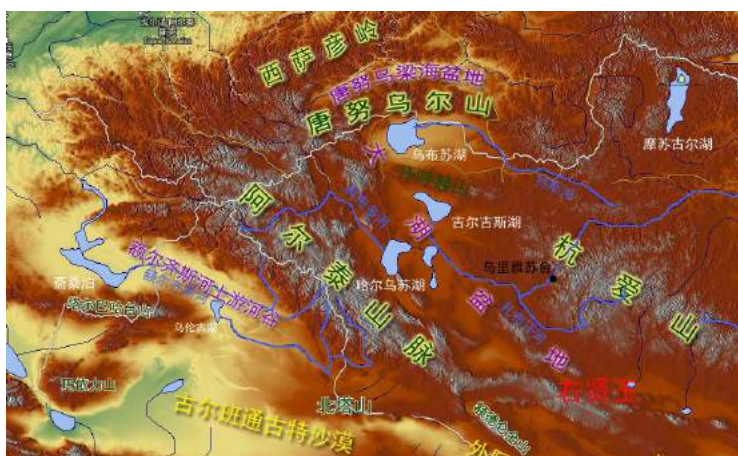


天山与阿尔泰山位置图

我们很容易在地图上观察到，位于蒙古高原最西端的阿尔泰山——天山山脉，基本算是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了。这个位置，意味着无论是太平洋的水汽，还是大西洋的水汽，到达这一地区时，都会有更多的消耗。尽管从地理位置上看，阿尔泰山——天山山脉一带似乎都没有什么机会受到太平洋和大西洋水汽的润泽。但实际上直线距离还稍远些的大西洋，却对这两大山脉的气候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以西，直至大西洋（包括地中海等边缘海），都没有南北向的高大山脉阻隔。相比之下，太平洋刮来的东南季风，想深入蒙古高原西部，所要遇到的障碍就要大得多了。

如果欧洲大陆也像中国这样，由西至东的形成三级地形的话，那么欧亚大陆中部的干旱程度还会加剧到什么程度，就很难说了。不过现在，大西洋的水汽在润泽了东西向排列的阿尔卑斯山系后，还有余力吹到阿尔泰山、天山山脉却是客观事实。这也意味着，当温润的大西洋水汽长途跋涉到达天山——阿尔泰山时，将要被迫抬升进入气温较低的空间。如果气温足够低，那它们将形成冰雪，等到整个区域进入夏季时，再化成雪水润泽山麓；而在气温还没低到让水汽结冰的空间时，这些水汽

就会很快变成“地形雨”，为山地带来绿色。



匈奴右翼（右贤王部）地缘结构图



阿勒泰草场

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既然水汽是西来的，那么西南——东北向排列的天山西北麓，以及西北——东南排列的阿尔泰山西南麓，降雨量就要远大于它的背面了（迎风面往往有超过 1000 毫米的年降雨量，背风面一般就是 300 毫米左右了）。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也正是这两大山脉迎风面，所包夹而成的准噶尔盆地，自然环境要好于塔里木盆地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试想下，当阿尔泰山北麓的游牧民族溯河而上，在山地之中寻找适应不同季节的草场时，他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在阿尔泰山南麓存在着降雨量更多、气候条件更好的草场。而在这些习惯了在山地之中游牧的部落看来，寻找到一条翻越雪线的通道，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阿尔泰山南北被同一部族所覆盖，

第二节 欧亚草原放牧方式差异的背景

有人提到，游牧于蒙古高原之上的部落之所以显得对周边地区那么有兴趣，是因为这片土地的“载畜量”太低。所谓“载畜量”指的是单位草场所能承载牲畜的数量。造成载畜量低的直接原因，是产草量太低。而再上溯原因的话，就是蒙古高原恶劣的气候了。相比蒙古高原的恶劣环境，欧洲大陆的草场则可以算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草场了。欧洲大陆三面临海，地势平坦的地理特点，使得其全境基本都处在海洋性气候的环境之下。大西洋水汽的全覆盖，也使得欧洲的牧草生产期更长、更多汁。其载畜量要高出蒙古高原数倍。

事实上，在欧洲大陆的生产生活中，畜牧业一直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即使是在现代，像英、法等国的农业产值中，仍有三分之二是来自于畜牧业（法国有三分

之一的土地都是草场）。这一比例在北欧国家，甚至高达九成。其实我们在平时所接触到的影视、文学作品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在这些信息当中，欧洲农村很少有我们常见的在农田中精耕细作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畜养牲畜，生产、食用奶制品的片断。这种以畜牧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为欧洲人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体质普遍好于东亚农耕区的民族。当然，在东亚民族意识到奶制品对体质的重要作用，并有针对性的弥补这个短板后，这种差距在迅速拉近。



欧洲草场

欧洲人在身体条件上的优势（但并不代表是健康的），也许让很多亚洲人所羡慕不已，尤其是在这个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然而亚洲，尤其是东亚民族，却不用为自己的土地感到自卑。因为说穿了，欧洲的土地之所以侧重畜牧业，是因为它的综合条件比不上东亚。我们很容易在地图上发现，欧洲大陆在纬度上整体要比东亚大陆高出一个层级。以英、法、德为核心的西欧地区，与漠北蒙古高原处在同一区间（纬度）；而北欧的纬度，则已经和西伯利亚拉平了。唯一能够和东亚地区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就是以亚平宁半岛为代表的（意大利）南欧地区。这样一横向对比的话，相信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欧洲文明起源于地中海沿岸；以及现代欧洲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跑到地中海去晒太阳了。问题是，尽管大西洋的湿润水汽能够很大程度抵冲掉高纬度所带来的寒冷，但欧洲半岛的整体环境还是比不上与海洋同样近

距离接触的“东亚半岛”。而能够有条件大面积种植对气候环境要求更高的农作物，也让东亚地区的人口承载量要远高于面积更大的欧洲大陆。

虽然欧洲大陆在种植业的规模上无法和东亚地区比拼，但当他们选择对环境要

求更低的畜牧业作为农业产出的主要生产方式时，却有着蒙古高原所无法比拟的条件。那些从森林中走出的原始渔猎民族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并不一定要像亚洲游牧民族那样，选择“游牧”的生活方式。牧草更长的生长期，以及更高的产量，使得欧洲人可以选择像农耕民族一样，过上定居的生活。那些在秋季收割、晒干的牧草，能够支撑他们所畜养的牲畜渡过寒冷的冬季。

定居生活所带来的好处，并不仅仅在于可以让欧洲人住上更舒适的木屋（而不是像亚洲游牧民族那样，住在简陋的帐篷里）。对于人类来说，定居生活意味着能够有时间和精力经营“家”这个概念，并因此而发掘出进一步改善自己生活的方法。这无疑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具体到畜牧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开始定居并经营固定牧场的欧洲人，会更有动力通过选育、种植牧草的方式来提升草场的载畜量（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四季常青的牧场了）。从地理条件来看，整个欧洲大陆对定居生活方式的选择，呈现着由南向北，由西向东的推进规律。这一点，相信对欧洲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已经能够迅速在脑海中印证了。相比之下，亚洲游牧民族在文明的贡献上就乏善可陈了。他们所能做的技术改进，更多的是在寻找自然规律，以期有效的利用天然牧场之上了。



蒙古草原

即使是在现在，我们依然能够在蒙古高原之上看到坚持游牧生活方式的牧民。而帮助他们进入定居生活状态，以便更好的接触现代文明，也成为牧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当然，对于很多早已脱离温饱状态，追求更高精神生活的“小资”来说，这种人为干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在地球的某些角落保持一些原始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有机会走马观花式的体验一下，能够让他们的精神世界获得极大的满足，并体现所谓的人文关怀。

只可惜，如果让他们年复一年的在青藏高原或蒙古高原持续这种生活状态的话，能坚持下来的就屈指可数了。

对于小资一族来说，看似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游牧生活方式，处处显露出浪漫气质，

但对于古典时期生活在干旱地区的游牧民族来说，选择游牧生活方式，其实是出于无奈。集高海拔、高纬度，低湿度于一体的蒙古高原上，你很难找到一片草场能够供给牲畜全年所需的牧草。为了生存下去，蒙古高原中、东部平原的游牧部落，必须在一年当中迁徙3到8次。其迁徙半径，中部地区约在10—20公里，东部地区约在30—50公里。就游牧生活方式而言，能够在平原草场上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幸福。相比而言，那些在戈壁荒漠中凭借有限、低矮的荒漠草场生存的部落，以及高原西部以山地草原为主的区域内，其一年当中的迁徙强度和半径，就要高得多了。一年当中，10—15次的迁移频率，以及100公里以上的游牧半径是他们的基本生活状态。

相比农耕民族对生存环境所做出的改造努力，游牧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几乎为零。这也意味着，他们对灾难的抵抗能力更低。一旦遇上大的自然灾害，相互之间的竞争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对于处在农业区边缘的游牧民族来说，他们的幸福之处在于，那些辛勤耕种的农民，家中总是储备着丰富的物资。当然，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试图无偿取得这些储备物资时，通常会引发道德层面上的问题。然而，当你一直生活在丛林法则的环境时，这种掠夺方式和针对动物的渔猎行为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

第三节 匈奴内部分配的南侵基地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匈奴人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让蒙古高原所有的游牧民族，无论远近都有机会到农耕区分享邻居家的物资。而中央之国日益强大的实力，以及日趋集权的国家机器，也促进了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必须联合起来，才有机会突破长城的阻隔。正是由于东亚农耕区的这种吸引力，匈奴人在组建游牧帝国，并对帝国内部做出左、中、右三块的划分之后，也对各板块的攻击方向做出了部署。在游牧民族看来，这种部署并不是负担，而是在分配猎场。

作为活跃在漠北的匈奴部落，本来是没有机会觊觎富庶的农耕区的。这些机会，是留给那些活跃在阴山——燕山一线的游牧部落的。在战国后期的燕、赵两国决定向北方拓展疆土时，他们的对手被记录为东胡、楼烦、林胡。而这一时期的匈奴人，应该还在忙于整合漠北的游牧部落。匈奴人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之国的视野中，是在战国行将结束时。

在赵国和其他诸侯国都不得不面对强秦的压力时，匈奴人得以越过戈壁向阴山一线发起攻击。尽管赵国最后的天才将领李牧帮助中央之国抵御住了匈奴的第一波攻击，但在赵国将北地边防军抽调至河北平原，与秦人做最后决战时，匈奴人显然抓住机会渗透到了阴山以南。只不过，针对匈奴人所发起的这第二波攻击，强大的秦帝国很快便做出了反应。在他们解决完中央之内部的统一问题后，蒙恬所带领的秦军重新又夺回了阴山——燕山一线的控制权。而燕、赵、秦三国所修筑的长城

也连成了一个统一体，并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央之国的防御核心。

匈奴人之所以那么热衷于南侵，并不仅仅是因为觊觎华夏核心区的富庶。即使出于游牧生活的需要，漠南那些纬度更低的草场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只不过，每一个游牧民族在靠近农耕区时，都会不自觉地被那里的财富所吸引。而当农业区所出产的一些生产、生活资源（如茶、铁、盐）成为游牧生活的一部分时，农耕区对于游牧民族的吸引力几乎是不可割断的。诚然，通过平等的交换似乎也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不过，当你有更容易的方式获取这些物资时（尤其你的对手不够强大时），丛林法则的心理总是会占据上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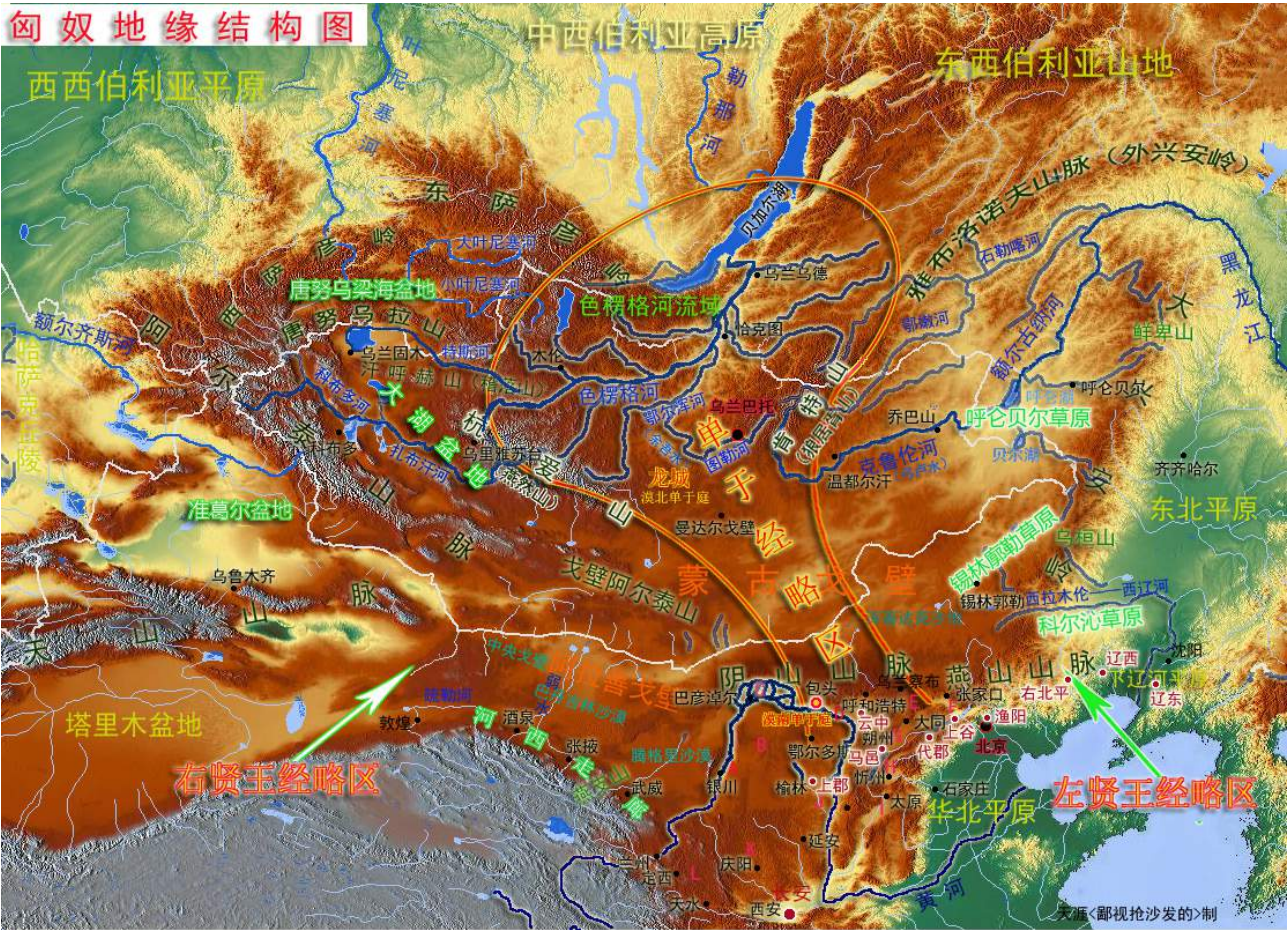
对于匈奴人来说，他们如此热衷于渗透阴山一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之前也分析了，由于大兴安岭的西侧存在一条连续的草原走廊，因此无论是之前的东胡，还是后来统辖这一地区的匈奴左贤王，都更容易接近华夏农耕区。在这种地缘结构之下，燕山以北包括科尔沁草原在内的草场，更多的是起到一种跳板的作用。即左贤王部的核心力量依旧可以在熟悉的克鲁伦河一带游牧，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南下，汇同燕山以北的游牧部落向中央帝国在燕山一带的防线发起攻击。从位置上看，张家口盆地以东，直到海洋的燕山一线，都是左贤王的天然“猎场”。

如果不是因为蒙古高原西部的大湖盆地——阿尔泰山一线还存在大片游牧区，也许匈奴人会选择把单于庭设在高原东部了。只是出于统一蒙古高原的需要，匈奴帝国的最高领袖——单于，并不能放弃色楞格河的经营权。问题是，这样一来，单于自领之地与农耕区之间就间隔了大片的戈壁荒漠了。尽管在戈壁之中仍然有顽强的游牧部落，靠着那些低矮的荒漠草原生存。但匈奴单于的核心力量无疑是在色楞格河流域。也就是说，如果他也想在农耕区划出一片猎场的话，在漠南地区需要的就不仅仅是一个跳板了。单于必须想办法拥有一块肥美而又独立的草原，作为基地来容纳自己的核心部落。

从地理位置上看，色楞格河的游牧部落在直线穿越蒙古戈壁之后，所针对的战略方向是阴山一线。考虑到中央之国已经把防线推进到了阴山分水岭之上，阴山以北的草场应该是匈奴人的第一选择。相比漠北的苦寒，匈奴人对于戈壁以南地区的温度状态，应该是十分满意了。无论对于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来说，这都意味着植物有着更长的生长期。问题是，体量偏小的阴山山脉，并不能为它的北麓地区提供太多的水资源。何况这一地区还如此的靠近蒙古戈壁，自然条件并不足以让单于觉得，可以把王庭南移到此。

既然阴山以北并不适合作为匈奴帝国南部的地缘核心，那么阴山以南是不是有合适的地理单元承担这个战略任务呢？答案是肯定的。通过战国阶段的分析，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了阴山山脉与黄河之间的那片土地。这块被称之为“河套平原”的土地，既能够一年四季的得到黄河水的滋养，又有阴山山脉帮助阻隔来自蒙古高原的风沙。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绝对是一片水草丰美，并且不用跨板块游牧的天堂之地。所

谓“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所描述的正是河套平原的优越自然条件。想想荒漠草原那些仅到脚踝的低矮草场，大家就会明白这些水草丰美之地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



匈奴地缘结构图

正是因为河套平原优越的草场条件，匈奴和他后世的诸多游牧民族，一直都视其为在漠南站稳脚跟的核心之地。相应的，如果中央帝国的统治者想解决游牧民族的边患的话，也必须控制河套平原。不过对于匈奴单于来说，尽管河套平原是一块非常具有诱惑的土地，并且在占据了它之后，就可以很自然的向陕北高原以及山西高原的农耕区发起攻击。但帝国的最高领袖——单于，却并没有独占这块宝地。这是因为，在帝国内部还有一个重要板块，也被大漠戈壁阻隔在了漠北苦寒之地。他们也需要一块靠近农业区的基地，来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这个重要板块，就是帝国内部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匈奴右翼。也就是被分配给右贤王进行管理的，以大湖盆地为核心的高原西部游牧区。

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不是处在统一的游牧帝国体系中，蒙古高原西部的游牧部落，一般并不会直接威胁到中央帝国的安全（包括色楞格河流域也是）。毕竟在有漠阻隔的情况下，游牧民族自己也很难跨越大漠组织起大规模进攻。而在像匈

奴这样的统一游牧帝国体系之下，他们就有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为高原中、西部的游牧部落，争取一块能够直接接触到农耕区的草场了。

被匈奴帝国划分给右翼的前进基地，是被我们称之为后套平原的板块。这块和前套平原连为一体的水草丰美之地，其实是可以和前套平原一起，归为单于的直属领地的。不过你既然希望右翼诸部落为游牧帝国的扩张尽一份力，不在大漠之南为他们留出一块前进基地来，就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了。更为重要的是，当单于决定调动蒙古高原所有的游牧骑兵，对汉帝国发起攻击时，左、右两翼的部落，便可以很快集结在划割给自己的草场上。

其实从对汉地造成直接威胁的角度来看，匈奴右翼诸部仅仅拿到后套平原的使用权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认定汉地是一片“猎场”的话，那么仅仅据有后套的右贤王，似乎必须透过单于直领的前套平原才有机会打猎。在中央帝国解决河套平原的威胁之时，也存在这样的渗透次序。即必须先把前套平原归入帝国版图，才有机会解决后套平原。而在将后套、前套平原纳入长城的保护之后，帝国版图在这里的直接控制区，往往就呈现一条危险的突出部了。然而上述想法，仅仅是出于农耕民族的思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干旱少水的鄂尔多斯高原并非一无是处。即使在比鄂尔多斯高原环境更加恶劣的戈壁之中，游牧部落仅仅依靠着那些产草量极低的荒漠草场，也有机会显示自己的存在。

在这种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之下，鄂尔多斯高原在游牧体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就要比在农耕文明中重要得多了。也就是说，如果匈奴帝国决定给右翼诸部划分一块猎场的话，后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打包在一起，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话，黄土高原之上的陇西高原、陕北高原，就直接暴露在匈奴右翼的威胁之下了。透过这两个地缘板块，匈奴帝国甚至可能直接对关中平原构成威胁。也正因为此，在秦帝国还是战国诸侯的一员时，就开始沿陇东——陕北高原的边缘修筑秦长城了。

后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大致上也就是汉帝国时期所谓的匈奴“河南地”了。在汉帝国将匈奴势力逐回漠北之后，这片原属匈奴右贤王经略的土地，被设置成为一个新的郡级行政机构——朔方郡。然而，从经营的角度来看，鄂尔多斯高原本身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移民，能够为这个新边疆发挥作用的，还是能得黄河之水的后套平原。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气温尚可的地理条件，让中央帝国有机会移民实边，为帝国拱卫西北边境。不过，失去了河南地，并不代表匈奴右翼就不再直接威胁汉帝国的安全了。事实上，就匈奴右翼的经营范围来看，除掉河南地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基地可以接触到汉帝国的核心区。

当我们把视线从鄂尔多斯向西移动时，很快就会发现接受黄河水滋养的，并不仅仅是前套、后套平原。在河套地区的西侧，同样有着一片被黄河滋养，山脉庇护的土地——西套平原。只不过，庇护西套的山脉不再是阴山山脉，而是后来被党项

人奉为神山的贺兰山。对于匈奴右贤王部来说，占据西套平原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有了这片同样水草丰美的土地，在鄂尔多斯高原寻找机会的游牧骑兵，就更容易得到支援和补给了。只是当匈奴人准备经略西套平原，并准备将其作为攻略中央之国的前进基地时，他们很可能会遇到一股先来的游牧力量的阻挡。

第四节 匈奴西扩面临的荒漠和戈壁

经常会有朋友问一个问题，既然亚洲，特别是蒙古高原的游牧力量，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来自欧洲的游牧部落呢？从地理结构上看，东欧平原的自然条件甚至要好于蒙古高原，应该没有理由不诞生出属于自己的游牧力量的。其实发源于欧洲的游牧部落，在历史上也曾经直接接触到中央之国。只是进入到帝国时代之后，亚洲的游牧区就被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力量所主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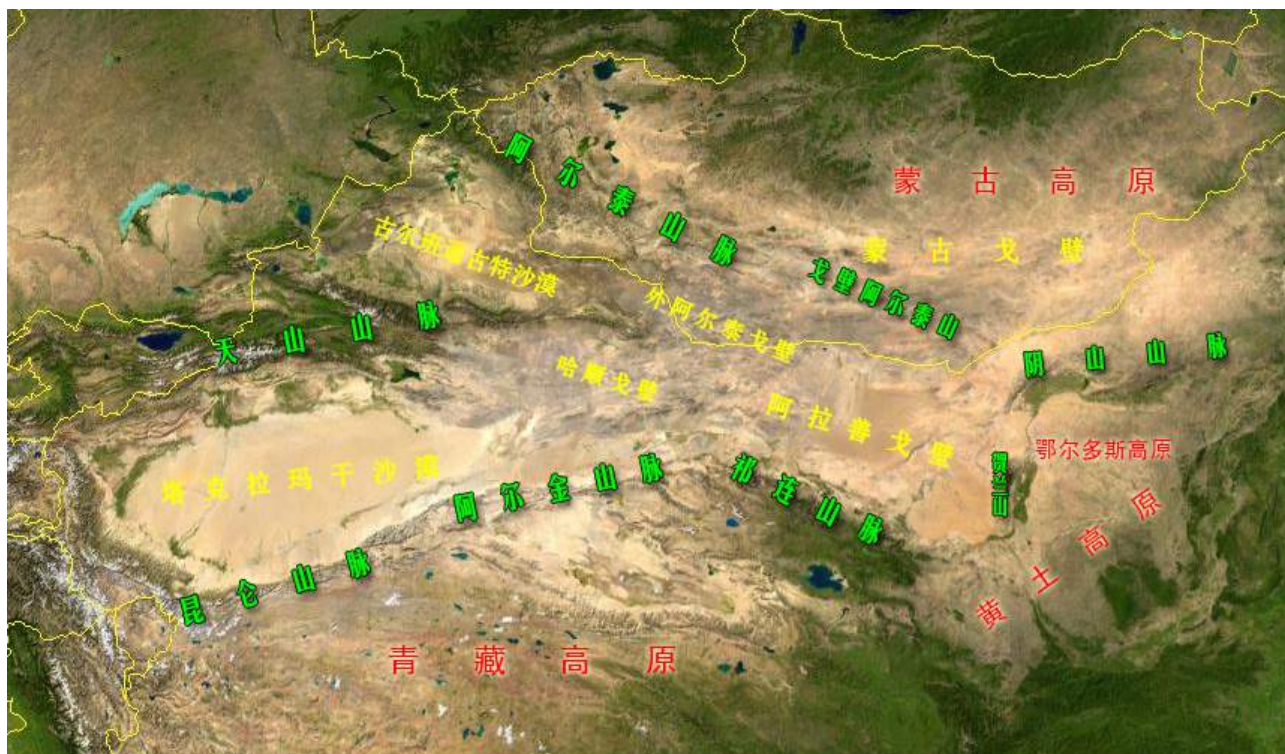
历史研究者们根据不同的角度和信息，为这些西来的游牧势力分别标注了吐火罗、塞种、斯基泰、雅利安……诸多标签。争论这些标签的含义、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就是无论这些曾经影响到亚洲的欧洲游牧民族在源流上有何差异，他们在人种上都是可以确定的，即都是属于与亚洲黄色人种迥异的欧罗巴人种。如果简单的以肤色划分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白色人种”；如果按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那位种族主义狂人的方法来划分的话，他们应该被归类为“纯种雅利安人”。

这些西来的游牧民族，在亚洲的历史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伊朗高原（伊朗）——亚美尼亚高原（库尔德）——兴都库什山脉（阿富汗）——帕米尔高原（塔吉克），以及南亚次大陆北部，至今仍然被他们的后裔所覆盖。事实上，在历史上，欧洲游牧民族的迁移并非一次完成的，南亚次大陆也并非他们向亚洲渗透的最东端。在青藏高原的北部，欧洲游牧民族的进入，在时间上很有可能比入侵南亚次大陆的雅利安部落要更早。支撑他们比亚洲游牧民族更先向外大陆另一端扩张的技术动力，应该是马的驯化使用。也就是说，能够更早、更熟练的利用“马”这种战略资源，是欧洲游牧民族率先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只是，当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亚洲游牧民族也能够熟练使用这一技术，并开始不满足于在苦寒的蒙古高原游牧时，欧洲游牧民族渗透到东方的这些触角，很快就被一一斩断了。

当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还在忙于内部整合，以及中央之国尚没有形成帝国体系时，从天山南北到河西走廊的整个中国西部地区，都是被这些西来的游牧民族所渗透、覆盖。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些朋友感到奇怪，既然欧洲游牧民族已经占据了今天中国的广大西北地区，那为什么没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为患中央之国呢？其实在先秦的历史中，这些欧罗巴人并非没有出现过（到底哪些史书记载过的边缘民族、种族上是否属于欧系，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只是在天山山脉——黄土高原之间的

这片土地，看着虽大，适合人居的区域却十分有限。这些来自欧洲的部落整体上只能呈不连续的线性分布，并没有一块土地让他们积蓄出足够和中央之国对抗的政治体。

在先秦之时，这些接触到中央之国的游牧民族到底是谁，又有否成功的在黄土高原的西部建立过据点，是个不太容易考证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匈奴建立游牧帝国，并准备挑战汉帝国时，河西走廊仍然是被这些来自欧洲的“异族”控制的。这其中的核心部族，就是后来直接引发汉帝国开拓西域的导火索——大月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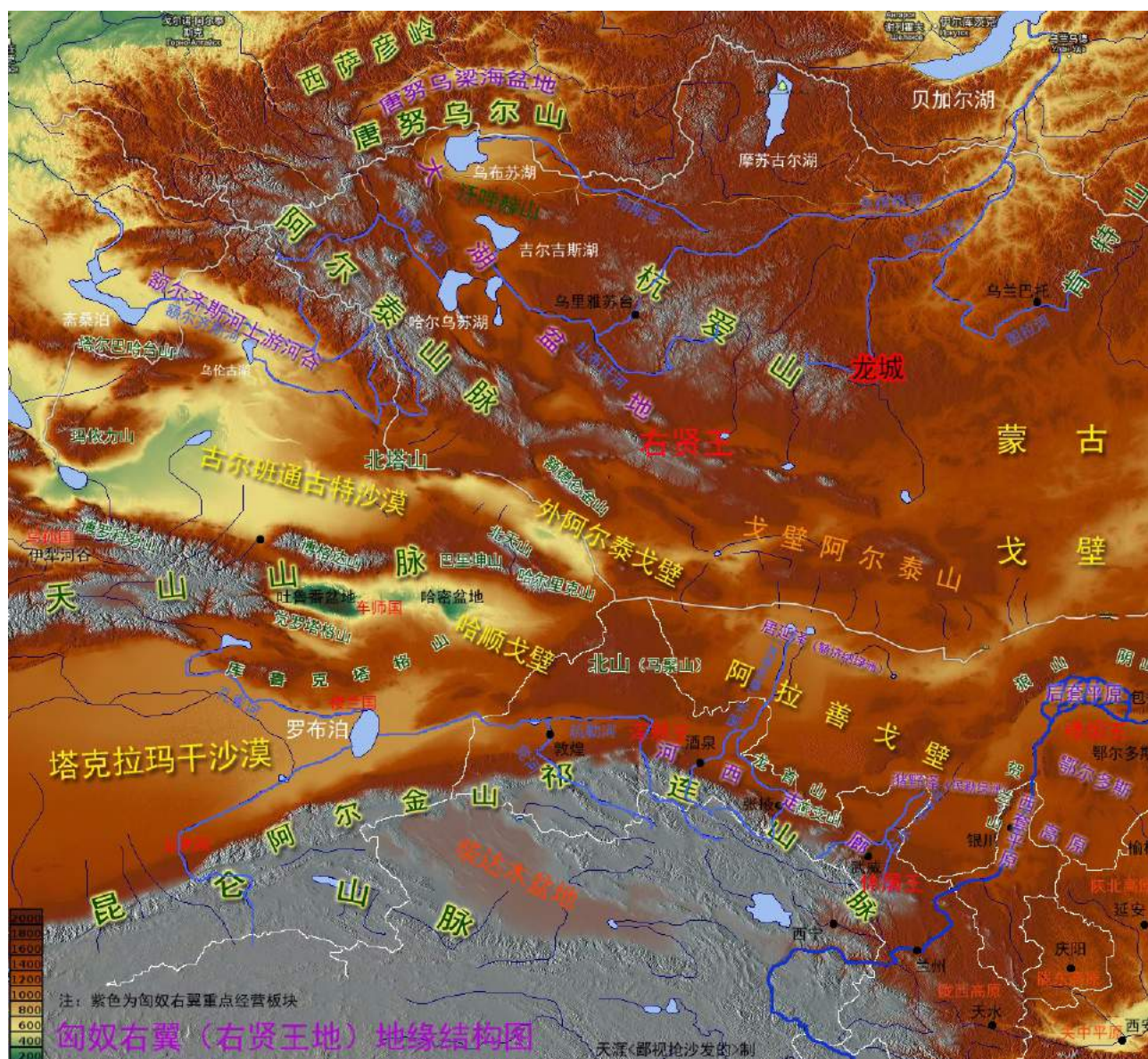
中国西部荒漠带示意图

在匈奴帝国与汉帝国刚开始碰撞时，作为欧系游牧民族的代表，大月氏人已经在河西走廊上生活很久了。从位置上看，从天山南北到河西走廊的区域，都是匈奴右贤王经营的范围。单从面积上看，这个任务似乎很重，所遇到的压力也会很大。不过当我们仔细观察这片土地时，会发现真正值得匈奴人出手的地方并不多。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还是干旱。这片远离海洋的土地，整体的干旱状态比之蒙古戈壁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没有一些高大山脉拦截水汽，并形成坡面雨的话，整个区域估计就是亚洲的“撒哈拉沙漠”了。

不过，比之撒哈拉荒漠区，这片处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三大高原包夹中的土地，还是幸运的。因为除了蒙古高原边缘的阿尔泰山脉，青藏高原边缘的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祁连山脉以外，还有天山山脉横亘其间。这些高大山脉为这片荒漠之地所铺设的绿色通道，为之登上地缘博弈的舞台提供了基础。事实上，

造成黄土高原以西地区如此干旱的重要原因，是因为青藏高原的存在。

对于华夏文明来说，青藏高原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尽管被我们称之为“东亚核心区”的这片土地并不缺水（有太平洋水汽所形成的“锋面雨”滋润），但青藏高原仍然愿意锦上添花的将高原之水，汇成黄河、长江等河流帮助东亚核心区，变身为这个地球上最重要的农业区。虽然这些河流所带来的洪水，也曾经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华夏族苦恼不已，但没有人会认为，没有了这两大河流，东亚核心区会变得更适合人类生存。相比之下，青藏高原对于它的北面之地就非常吝啬了。



匈奴右翼（右贤王部）地缘结构图

正是由于青藏高原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亚洲中部的这片腹地才会如此的干旱。虽然我们在之前，着重介绍了蒙古高原东南部的荒漠之地——蒙古戈壁。但实际上，这片成为蒙古高原地缘分割线的荒漠，只是亚洲腹地荒漠带的一部分。

在它的西部，与青藏高原同经度范围的区域，也存在着大片连续的荒漠地带。

如果说蒙古戈壁是阻碍在蒙古高原中部色楞格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向南自然渗透的障碍的话，那么当蒙古高原西部的游牧部落准备向南渗透时，他们会发现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并不亚于中部地区。在翻越阿尔泰山分水岭之后，除了在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阿尔泰山西段，能够满意的看到一片被西风润泽的绿色之地以外，在其他地区他们都将直接面对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条荒漠带。这片荒漠之地从额尔齐斯河上游河谷之侧，一直向东跟着阿尔泰山脉的走向，延伸到了贺兰山——阴山山脉。

由于山地的分割，这条荒漠带也被打上了不同的地理标签。最西侧的，是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这个名字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陌生，它的位置其实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准噶尔盆地”的腹地。虽然阿尔泰山西段和天山北麓拦截了不少水汽，但它们所造成的降水，还是不足以将整个盆地变成绿色之地。

顺着阿尔泰山东行，荒漠地带仍在延伸。而天山山脉的走势，也开始出现了变化。一方面由于阿尔泰山的西北——东南走向，两大山脉渐行渐近；另一方面天山山脉东段开始出现明显橄榄形凹陷区。由于两大山脉都开始走低，且与西风呈平行走向，因此山脉边缘的植被状态比之西段要差上许多。北部天山山脉与阿尔泰山脉之间的荒漠带，被称之为“外阿尔泰戈壁”；南部天山东段凹陷区的荒漠带，则被称之为“哈顺荒漠（戈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整个天山东段有大片戈壁存在，但山脉流向荒漠腹地的雪水，供给出小块绿洲还是没有问题的。从地理结构上看，这块凹陷区被分割为西低东高的两个盆地。而两个盆地中的绿洲，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一个就是盛产葡萄的“吐鲁番”，一个就是以哈密瓜闻名天下的“哈密”。

当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向东即将走到尽头时，荒漠带仍在延伸。北部结构上属于阿尔泰山延伸山地的“戈壁阿尔泰山”，名字本身就表明了它的地理属性。南部位于天山山脉以东的，是一片位于戈壁阿尔泰山之南，河西走廊之北，贺兰山以西的高地——阿拉善高原。不过它还有着另一个地理标签——“阿拉善戈壁”。戈壁阿尔泰山再往东，就是蒙古戈壁了。如果没有阴山、贺兰山这两座体量不大的山脉阻隔，以及黄河水的补给，这条戈壁带势必会与陕北、陇东高原对接。也就是说，在阿拉善戈壁、蒙古戈壁的共同压力之下，鄂尔多斯一定会被打上“鄂尔多斯戈壁”或者“鄂尔多斯沙漠”的标签。尽管如此，那些从贺兰山、阴山之间吹过来的风沙，也已经加剧了鄂尔多斯高原的干旱状况，并制造大片土地的荒漠化了。

从蒙古高原西部的游牧部落来说，当他们无缝渗透到阿尔泰山西南麓的高山草场，以及额尔齐斯河上游之后，他们比较自然的选择，应当是沿着准噶尔盆地西侧，天山山脉与阿尔泰山之间的断续山地进入天山山脉，并将天山南北的绿洲作为帝国的下一个经营板块。由于这些被称之为“塔尔巴哈台山”、“玛伊利山”的山体存在，匈奴人从阿尔泰山向天山山脉的转进过程，并不会显得很困难。

而当他们进入到天山北麓时，会很快发现一个由天山北麓山体包夹而成的河

谷——伊犁河谷。单从游牧的角度来看，伊犁河谷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板块（至于为什么不错，在汉通西域部分会详细解读）。事实上，匈奴人也会把影响力渗透到包括伊犁河谷在内的天山南北绿洲。不过，在控制的方式上，他们更倾向于间接控制。即生活在天山南北的部落，只要认可属于匈奴势力范围，并不对其造成威胁就可以了。就直接控制这一点来说，匈奴人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东部。

由于戈壁带的存在，匈奴右贤王如果放弃重点经营以伊犁河谷为核心的天山北麓草场的话，他们再想渗透到任何一个绿洲，都必须面临大片戈壁的阻隔了。匈奴人这种看似不太合理的选择，其实就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毕竟对于高原游牧民族来说，人口资源是有限的，一定要放在能产生最高效率的板块。将资源投向东部，在接近黄土高原的地区寻找一片游牧之地的诱惑在于，可以让匈奴人更接近农耕区。在匈奴人已经知晓可以从农耕区获得额外资源时，这种诱惑是不可阻挡的。

第五节 匈奴南下河西走廊的河谷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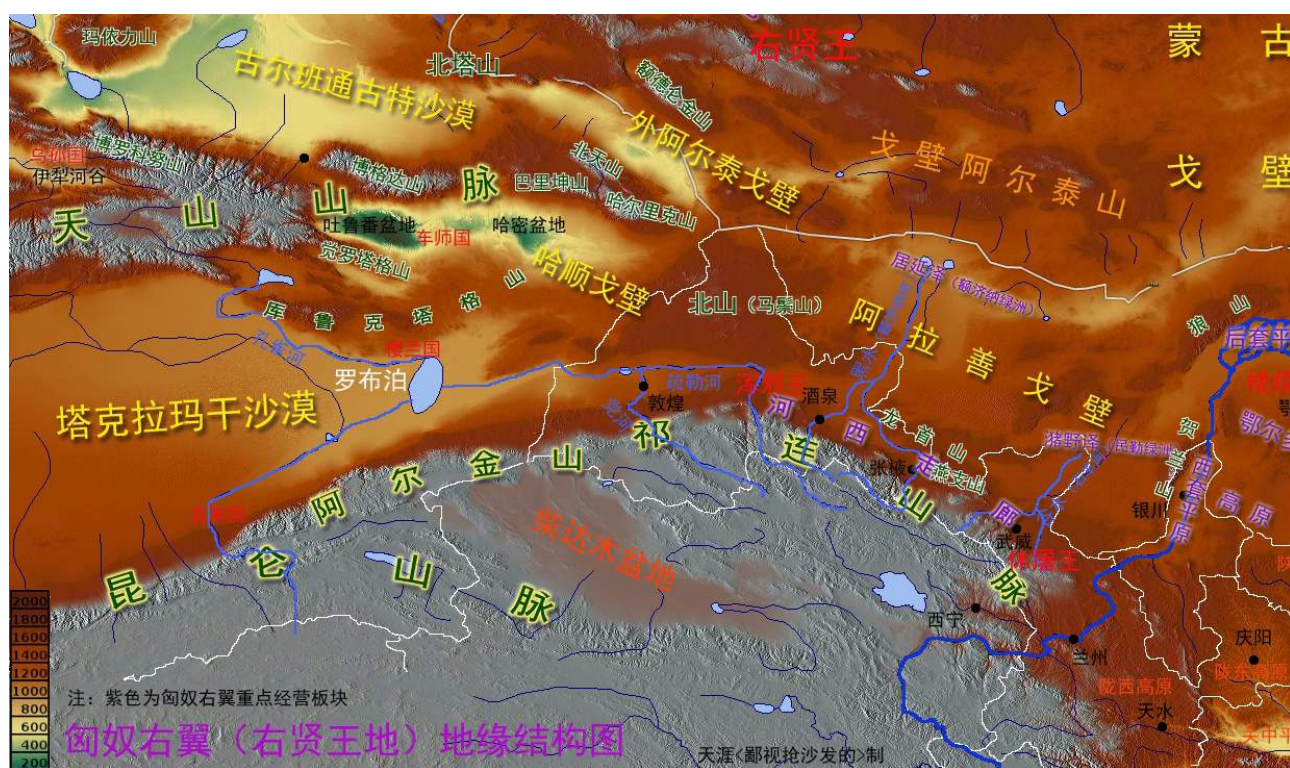
在这个地球上，决定一个地理单元潜力的最重要指标，就是它的水资源状况。有水人类才能生存，并才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去开发土地的潜力。对于远离海洋的亚洲腹地这片干旱地带来说，水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有高山流水滋润的土地，都有机会在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并演绎出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而那些在历史进程中，因河流枯竭湮没在沙漠之中的古代文明，更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相比那些被沙漠吞噬的曾经的绿洲，河西走廊是幸运的，因为它背靠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原水塔——青藏高原。虽然从整体上看，正是因为青藏高原的阻挡，才加剧了整个亚洲中部的干旱状况，但这并不妨碍青藏高原之上的雪水为它的边缘地带来一抹绿色。

其实即使不考虑河西走廊与黄土高原紧密对接的关系，匈奴右翼的部落联盟在试图向南寻找新的草场时，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与大湖盆地同经度的区域内，紧贴青藏高原东北角的河西走廊，是唯一成规模的绿地。作为河西走廊“靠山”的祁连山脉，其四千米到五千米的平均海拔，使之更有机会拦截到更多的水汽。而西北——东南的走向，也使得祁连山脉比之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更能接触到来自太平洋的水汽。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风水”一词的话，作为东亚大陆最后一块能明显接收到太平洋水汽的板块，祁连山脉和河西走廊在历史上能够比较稳定的成为华夏农耕区的一部分，与大家能够共享同一“风水”带不无关系。

从地理位置上看，黄土高原之上的华夏族似乎更应该有机会渗透到河西走廊。问题是，对于这个从黄土中发现农业潜力的族群来说，东部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毕竟，与华北平原等东部板块相比，河西走廊可供农业开发的那些土地就不算什么了。

只是当游牧民族从西、北两个方向对中央之国造成强大压力之后，华夏文明才会去思考如何把自己的农耕线尽量往西、北两个方向推进。在压缩对方游牧空间的同时，也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缓冲之地。

华夏文明对河西走廊不屑一顾的态度，也让西来的欧洲游牧民族和蒙古高原的亚洲游牧民族，有机会先行一步渗透至此。前面我们也说了，在技术上有先发优势的欧洲游牧民族，是最先渗透到西域和河西走廊的。至于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他们如果也就想把牛羊放牧到河西走廊，反而要比华夏民族要更困难。因为横亘在二者之间的，是大片的戈壁荒漠。如果来自中部色楞格河流域的游牧部落想染指河西走廊的话，他们必须穿越蒙古戈壁、阿拉善戈壁两片荒漠地带。考虑到困难程度，以及可能带来的收益，这个战略方向显然不是选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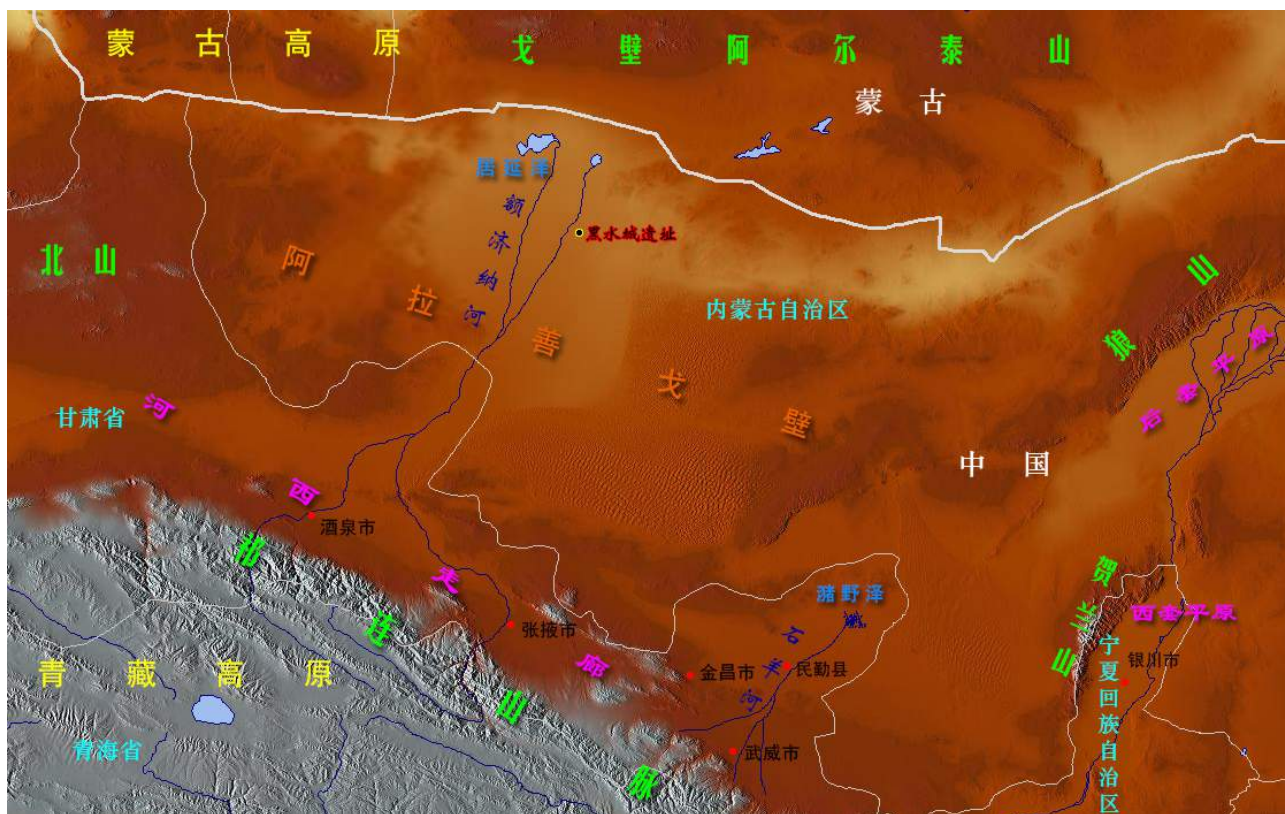


匈奴右翼（右贤王部）地缘结构图

因为仅仅穿越蒙古戈壁，色楞格河的游牧民们就可以很快看到阴山北麓的草原，并觊觎长城以南的财富了。相比单于自己率部从色楞格河流域到达河西走廊的距离，以大湖盆地为基地的右贤王诸部，渗透到河西走廊的距离就要近上许多了。在翻越了海拔不算太高的“戈壁阿尔泰山”之后，阿拉善戈壁成为他们进入河西走廊腹地的主要障碍。

既然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匈奴人争夺河西走廊的道路都绕不开“阿拉善戈壁”，那我们就很有必要了解一下这片比蒙古戈壁还要干旱的土地是什么样的结构了。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位置，以及范围。在《匈奴右翼地缘结构图》上，我们很容易找

到阿拉善戈壁的地理边界：戈壁阿尔泰山——阴山山脉——贺兰山——天山山脉（最东端的“北山”）——河西走廊。对于希望从一般行政地图上了解阿拉善戈壁大致位置及范围的朋友来说，这一点也很容易做到。如果我们把“内蒙古”的轮廓看作一条“龙”的话，阿拉善的位置就是龙尾。要是你手上的地图能够标示出地区一级的行政边界的话，很快就能够看到，这片戈壁的行政名称是“阿拉善盟”。



河西走廊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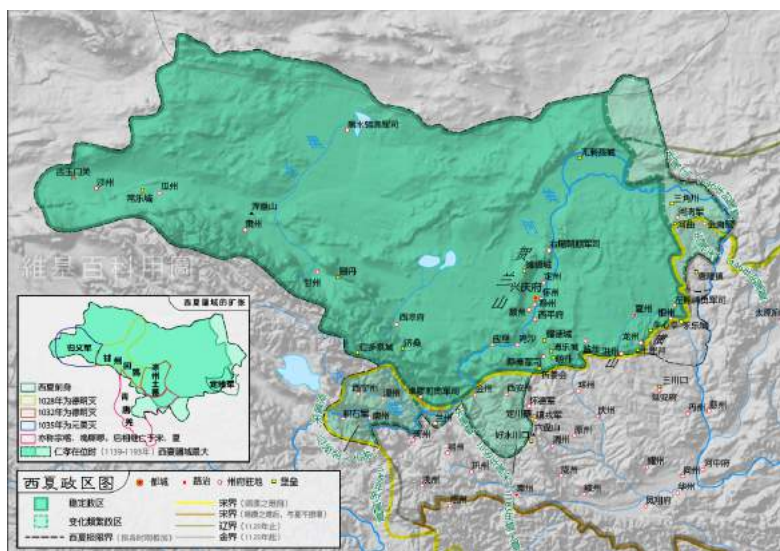
从行政地图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阿拉善戈壁的地理范围，也同样能够锁定河西走廊的位置。哑铃形状的甘肃省，其轮廓本身就显露出了它的建制使命——连接西域与黄土高原所代表的“华夏核心区”。西域地区的东大门“北山”（天山最东端），以及黄土高原最西部的陇西、陇东二高原，是这个哑铃的东西两端。而中间细长的地带，就是“河西走廊”了。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理解河西走廊位置的重要性都不是一件难事。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西域、蒙古高原四大板块的交汇之处，使得河西走廊的那条狭长的绿色带承担了太多的地缘使命。然而说到河西走廊的地理结构，想来却会有很多人有误区。因为从板块的角度来看，河西走廊的绿洲带并非我们从表面所感觉的那样，是一条带状。

如果仅仅从交通枢纽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关注的，的确会是河西走廊紧贴祁连山脉的那条走廊地带。在这条走廊之上，汉帝国在驱逐匈奴人之后，所建立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城，至今仍然在中国的行政区上占有一席之地。只是当我们在

审视河西走廊原始的地缘潜力（有多少绿洲，能承载多少人口）时，视线就必须向北延伸了。实际上，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从甘肃地图的外轮廓上看出端倪了。在甘肃这个哑铃状的外轮廓上，河西走廊所代表的中间地带并非是条边缘光滑的带状，而是在东北方向有两个明显的凸起。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这两个深入阿拉善戈壁的凸起只是一片对农、牧双方用处都不大的荒漠的话，通常情况下并不会划入一个位列核心区的省份的。也就是说这种行政分割法很可能意味着这两个区域内，存在着足以让双方争夺的绿洲。事实也的确如此，甘肃中部的这两个凸起的确是两块依附于河西走廊的绿洲——居延泽和潯野泽。这两个标签的得名来自于历史。如果大家觉得这两个两千多年前的标签有些陌生和拗口的话，我们也可以用“额济纳河绿洲”和“民勤绿洲”来代替。前者来源于滋养这片绿洲的河流（额济纳河），后者则得自建制在这片土地上的县级行政区（民勤县）。

居延泽和潯野泽两个古地名，明白无误的表明了这两片绿洲在历史上是和一片湖泊伴生而成的。即使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额尔济纳河下游，紧邻中蒙边境的地方，看到有两个小型湖泊存在。而在两千多年前，又被称之为“居延海”的大湖，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面积堪与现在中国的第一大湖——青海湖相比。如此宽阔的湖面能够为周边地区带来多少绿色，就可想而知了。



西夏政区图

在漫长的历史中，作为河西走廊绿地的一部分，居延湖畔发生了无数故事。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它最为人所熟知的历史发生在西夏时期。这倒不是说西夏对于居延泽绿地的经营有着过人之处，而是因为西夏人在居延泽畔所建立的重要据点——黑水城。黑水城得名于“黑水”，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额济纳河（也称“弱水”）。20世纪初在这座被沙漠所湮没的古城，俄国探险家发掘出了无数珍贵的西夏文物。这些被俄国人带走的文物在西方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也第一次把这个消失的古国呈现在西方人面前。并且让对西夏的研究，成为一项世界性的课题。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人说，这又是显得那么的无奈，因为你必须仰仗那些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才能更清晰的了解那些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中，作为河西走廊绿地的一部分，居延湖畔发生了无数故事。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它最为人所熟知的历史发生在西夏时期。这倒不是说西夏对于居延泽绿地的经营有着过人之处，而是因为西夏人在居延泽畔所建立的重要据点——黑水城。黑水城得名于“黑水”，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额济纳河（也称“弱水”）。20世纪初在这座被沙漠所湮没的古城，俄国探



黑水城遗址



今居延海环境

说到这里，顺便澄清一个误区。曾经不止一次有朋友问，为什么西夏仅仅凭借西套平原就能够和辽（金）、宋呈现三足鼎立之势。实际上，西套平原只是西夏国的核心区。在西夏的版图中，包括居延泽绿洲、潯野泽绿洲在内的河西走廊绿洲，以及河套地区的后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都曾经完全属于西夏（自然也包括这些绿洲相间的整个阿拉善戈壁了），其控制区甚至还渗透到了前套平原、陇西高原、陕北高原的边缘地区。这样的控制区，基本就相当于匈奴右贤王在漠南的领地了。

如果中央之国处在统一的政权之下，应该说还是有足够的国力解决掉这个强悍的邻居的。可惜的是，当时正处在多方角逐的阶段，宋、辽（金）二国的百年对峙，让西夏在与两大强邻的政治斡旋中获得了生存空间。当然，如果西夏本身的地缘潜力太弱，还是没有资格做到这点的。而在之前汉、唐帝国对西北这些水草丰美之地的农业开发，无疑极大增强了西夏领土的地缘潜力（前提是党项人必须与时俱进，

而不是固执的坚持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很显然，他们做到了。）

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向周边地区扩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延伸农业线的过程。这种以农为本，人地合一的做法，固然是华夏文明能够历经千年而不倒，并且越做越大的根本原因。但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在那些农牧相接处开展大规模农业活动，其环境代价也是很惨痛的。相比自然生长的草场，种植农业所需要用到的水要多得多。当然，相应的产出和单位土地的人口承载量也要高得多。只是这样一来，在人口压力下，环境就会变得更加脆弱了。这种情况在河西走廊板块尤为明显。

黑水城遗址能够留到 20 世纪初才被人发掘，很大程度倒是要“感谢”环境的

恶化了。正是因为原来的绿洲变成了沙漠，才使得那些残留在城内的文物能够摆脱自然的侵蚀和后人的进一步破坏。与名声在外的黑水以及“黑水城”相比，河西走廊绿洲带的另一个凸起——潯野泽绿洲（后为匈奴休屠王所据，又称“休屠泽”）的名声要小些，但二者命运却是相似的。由于自汉帝国强势渗透河西走廊之后，为潯野泽带来祁连山雪水的“石羊河”两岸农业开发过度，这个在两千多年前曾经长100公里，最宽处有50公里的湖泊，最终在上个世纪完全干涸了。而“民勤县”这个建制于民国的县级行政区，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多是当地居民如何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试图在沙漠中固沙植绿的勤勉之举。

从地理结构上看，居延海和潯野泽之所以能够成湖，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所在地应该要低于周边地区，呈凹陷状态（盆地）；二是需要有河流为之补水。由于为这两个盆地区补水的额济纳河、石羊河，所穿越的是气候干燥的阿拉善戈壁，因此在这两河流域最初的绿洲状态，其实是和尼罗河流域有些类似。即上游靠近高地处由于最接近水源地，支流众多，绿色之地的纵深较宽。而下游低地作为河流的最终归宿，同样也可形成大面积的湖泊及绿地。反倒是中游地区，绿洲呈带状分布于河流两岸。这样一种结构，使得我们抛开河西走廊的概念，单看额济纳河、石羊河流域的情况，应该也是两条呈哑铃状的绿洲带。然而由于周边环境的不断恶化，现在整个河西走廊的绿洲实际上都是呈点状，而非连接在一起的带状了。

对于蒙古高原之上的匈奴人来说，额济纳河、石羊河两条河流能够冲破荒漠的包围，以阿拉善高原的腹地形成两条绿洲带，是一件值得惊喜的事情。这样的话，当他们翻越戈壁阿尔泰山之后，很快就能够看到大片的优质草场了。尤其是额济纳河下游的“居延海”和它周边的绿洲，甚至已经延伸到了戈壁阿尔泰山的南麓（所以居延海在历史上战略地位更重要）。这种结构，无疑大大拉近了河西走廊与蒙古高原的地缘关系。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比较清晰的了解，匈奴人和他们之后蒙古高原西部游牧民族的南下路线了，在翻越戈壁阿尔泰山之后，居延海会是他们必须夺取的第一个据点。接下来便是顺着额济纳河南下，到达祁连山麓，然后向两翼扩张，直至占据从敦煌至武威的河西走廊带。当然，包括潯野泽在内的石羊河中下游地区，也是这个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当包括两个凸起的河西走廊绿洲带，都处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时，他们就可以考虑到黄土高原的华夏农耕区打猎了。

在此之前，兴起于陇西的秦人已经帮助中央之国，把黄土高原最西部的亚板块——陇西高原尽数纳入了华夏核心区。现在位于黄河之滨的甘肃省会兰州，所辖之地就是陇西高原的最西部（秦汉归属于“陇西郡”）。仅仅是凭借河西走廊的地缘实力想与统一的中央帝国，甚至是战国后期的秦国进行PK，还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当游牧民族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他们只需要再穿越不太长的沙漠之路，就可以在黄河西侧找到一个独立的，水草丰美的地理单元——西套平原。占据西套平原，

不仅能够为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再获得一片优质草场，更可以让他们在河套地区进一步拓展空间。

我们前面也说了，在匈奴人成功渗透河西走廊之前，这片土地是被以大月氏为核心的欧洲游牧民族所控制的。基于西套平原与河西走廊的地理关系，匈奴人如果想在穿越戈壁沙漠后直接插入到西套平原，以控制这个独立地缘板块的话，很有可能也会遇到那些先行到此的欧洲游牧民族的阻力（倒不一定是大月氏人了）。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和秦人交战了数百年的“西戎”部落，到底有没有包含一些白色游牧部落，一直是有些争论的。以大月氏人最后的位置来看，在此之前如果有欧系游牧民族渗透到黄土高原，甚至渭河流域，并被记录进先秦的历史中，也是很有可能的（好像就有人怀疑，秦人所解决掉的最后的西戎强敌“义渠”，就有可能是大月氏人的近亲）。因为记录历史之人也未必真的清楚，他记下来的信息是否全面、正确。我们只是从地缘的角落来梳理大的脉络罢了。

回到匈奴人的话题上来。匈奴人对河西走廊感兴趣，除了这一带有不错的水草资源，以及接近农耕区以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河西走廊的商业价值。尽管我们现在往往把东西方交流的通道称作“丝绸之路”，并将开辟这条商道的功劳记在了汉帝国和张骞的名下。但事实上，在此之前，东西方的交流就已经开始了。控制这条自然商路的，是那些熟悉路径的，逐渐从欧洲渗透过来的欧洲游牧民族。只不过，在没有强大统一政权控制、维护商路时，这种商业、文化传播很大程度是呈接力棒形式，相对缓慢地传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骞正式开辟丝路，并从官方层面把汉帝国做成了商路的终端（后果就是交易量有了质的飞跃），其意义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东西方商路的开辟，原始功劳应该记在谁头上，河西走廊的价值都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这条在荒漠压力之下，依靠祁连山庇护而存在的绿洲带，用“咽喉要道”来形容并不为过。无论西来的商路有多少条，如果想要对接以黄土高原为核心的华夏文明，河西走廊都是必经之路。有了这份附加值，匈奴人进占河西走廊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

河西走廊的具体结构（这里指的是靠祁连山麓的狭义的走廊带），我们在历史进展到张骞通西域阶段时，会详细解读的。对于刚刚建立的汉帝国，以及已经渗透到了阴山之麓的匈奴帝国来说，河西走廊暂时不是双方博弈的焦点。这时的焦点，甚至不是赵人曾经强势渗透进的河套平原，而是大同盆地。因为当中央之国在忙于内部整合之时，匈奴人已经乘虚而入，不仅控制了阴山南北，还将势力范围渗透至了陕北高原、山西高原的北部。如何在稳定新生帝国内部结构的同时，解决北方边患，成为刚刚登上帝国最高权力宝座的刘邦，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第四章 汉军在代地平叛并与匈奴交战

第一节 韩王信在匈奴人南侵时降叛

在解读完蒙古高原和匈奴帝国基本的地缘结构后，我们要把视线拉回到阴山以南了。因为在刘邦志得意满的建立属于他的刘氏王朝之时，匈奴人已经越过了阴山，控制了整个河套地区。这里所说的河套地区，不仅包括前套、后套、西套三个水草丰美之地，以及占据河套腹地大半的鄂尔多斯高原，甚至还包括陕北高原的北部。关中平原为了防范北方威胁所建制的最北部的重要据点——上郡的郡治所在“肤施”（今陕西榆林），也成为了匈奴控制区。对于匈奴人来说，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入主河套地区了。之前一次，也是在中央之国内部的博弈白热化时发生的。当时代表中央之国控制河套平原的赵国，不得不将北地边防军作为最后的生力军，并调回河北平原与秦军决战。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战胜项羽就意味着中央之国的统一的话，汉帝国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将匈奴赶出河套平原，将北方控制线推进到阴山分水岭。在那里，秦帝国以及更早的赵国，已经帮助新生的汉帝国修筑起了一道长城。然而处在这样一个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体系过渡的历史阶段，刘邦的帝国统一之路注定不会那么平坦。在感觉到自己有可能成为统一的牺牲品时，绝大部分在灭秦、楚汉战争中封建为王的“诸侯”都先后叛乱了。这其中，甚至包括最先投入刘邦阵营的诸侯王——韩王信。

韩王信的叛乱，多少让人感觉到有些意外。这个因血统原因而勉强挤入项羽封建体系的“王”，可以说是异姓诸侯中最没有理由反对刘邦的。一开始就被项羽完全架空的尴尬地位，使得韩王信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忠实的服务于刘邦阵营。如果刘邦重拾封建制度的话，韩王信所治的“韩国”，很有可能是刘氏封建体系最坚定的拥护者。很可惜，尽管刘邦个人并不认为，像秦帝国那样不用“休克疗法”，而是用强制手段一下子把诸侯割据的中央之国，跃进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治国的好办法，但他却从周人那里认识到了血统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汉帝国可以给封建诸侯留下一席之地，但帝国的腹地一定要掌握在中央政权，或者刘姓诸侯手中。以韩地的位置，无疑是绝不能留给外人的。哪怕这个“外人”在忠诚度方面暂时并无问题；能力方面看，似乎也不足以为害。

既然刘邦准备把韩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那么就必须为这位“韩王”找一个新的封建之地了。如果按照战国时代的地缘标签来划分的话，新“韩国”的选址是在赵地之上。不过这里所说的“赵”地，并非是赵国后来的核心地区——河北平原，而是山西高原北部。简单点说，就是河东之地以北的太原、忻定、大同三个

盆地。

尽管后世有人认为，将韩王信迁地建国，意味着刘邦对他的不信任。但结合当时刘邦决定压缩异姓诸侯空间的大背景来看，这种安排并不能算是针对韩王信的。相反，在刘邦吸取项羽的教训，将帝国的核心板块定位于黄土高原之上时，将韩王信放在自己的北边，以直接拱卫帝国的核心，其实是一种信任了。这意味着刘邦把帝国的北大门，交给了异地重生的“韩国”。从韩王信所受封的位置来看，他的战略任务无疑是用来防御匈奴的。鉴于匈奴的强大，很多朋友在遗憾，如果把另一位兵圣级别的“韩信”（韩王信亦称“韩信”，只是为了区别我们所熟知的韩信，史家方在其间加一“王”字）放在北方屏藩的话，汉帝国是否会有机会早一天打败匈奴呢？

从战术的角度来看，将韩信放在与匈奴接近的地方，在抵御匈奴上肯定会比“韩王信”要有力得多。不过对于天下在手的刘邦来说，在用人方面对“忠诚”二字的考虑，要多于“能力”。让在楚汉战争中独当一面的韩信，继续因为战争的原因而拥兵自重，对于帝国今后的运作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在帝国封建给新“韩国”的领地中，无论是从位置、结构，还是历史来看，位于太原盆地北端的“晋阳”（今太原）都是当然的地缘中心。因此在刘邦最初的册封当中，晋阳城也是韩王的新都。

不过韩王信却提出了异议，建议将自己的政治中心设在大同盆地南部的“马邑”（今天山西朔州）。从战略角度来看，韩王信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你的注意力是在中央之国内部争霸的话，那么晋阳城更深入核心区的位置会是优势。而如果你的敌人确定在北方时，自己的指挥中枢离对手间隔两个大的地理单元，就不是好的选择了。所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虽然大部分帝国的统治者不会真的把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地区，但作为明确为国守边的诸侯、藩镇来说，这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他们存在的价值）。

韩王信这种主动前突的做法，显然有着表忠心的成分在里面。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刘邦没有理由不接受。不过，无论是刘邦还是韩王信都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很快，匈奴人就轻易突破了韩国的防线，将马邑重重包围（公元前201年秋）。现在，摆在韩王信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或是投降，或是战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很难做到慷慨赴死的。韩王信也不例外，他的选择是和匈奴人合作，并将战火引向帝国的核心区。以当时的背景来看，这并不是韩王信个人的选择。因为包括燕、代在内的北地诸侯在背叛汉帝国之后，都选择了和匈奴人合作。在刘邦明显有意重整帝国结构的背景之下，这种出于自保而做出的选择，也是一种本能了。在之前的楚汉战争中，这些本来指望在世代交替中投机一把的诸侯们，就经常在楚、汉阵营中变化。包括韩王信，也曾经在荥阳之战时归降过项羽（后来又逃了回来）。

关于诸侯们在楚、汉相争中变换阵营与在汉匈之间做出选择，是否有本质的区别，并不是我们需要展开讨论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因为韩王信的背叛，汉帝国的北

方门户实际上已经被打开了。在韩王信的带领之下，匈奴人的军队轻易地穿越了天险“雁门关”，将战火烧到了晋阳。对于合作双方来说，他们的诉求并不相同。简单点说，此时的匈奴人并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在他们的眼中，汉地还只是一块物产丰富的猎场。与汉地反叛者的合作，能够让他们轻易地深入农耕区的腹地，去猎取更多的财富、人口；而对于那些叛乱的北地诸侯来说，他们所希望的，则是匈奴人在战略上的支撑能够帮助他们割据对抗中央政权。

正是由于这种诉求的不同，包括韩王在内的叛乱诸侯，其实并不能指望匈奴人能够帮助他们稳定防线，割据一方。更多的时候，南下的匈奴人在劫掠得手之后往往会迅速的后撤。与汉军决战的任务，依旧要由叛乱诸侯们自己来完成。韩王信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当他试图携匈奴之力在太原盆地以南建立防线时会发现，这些匈奴人的战力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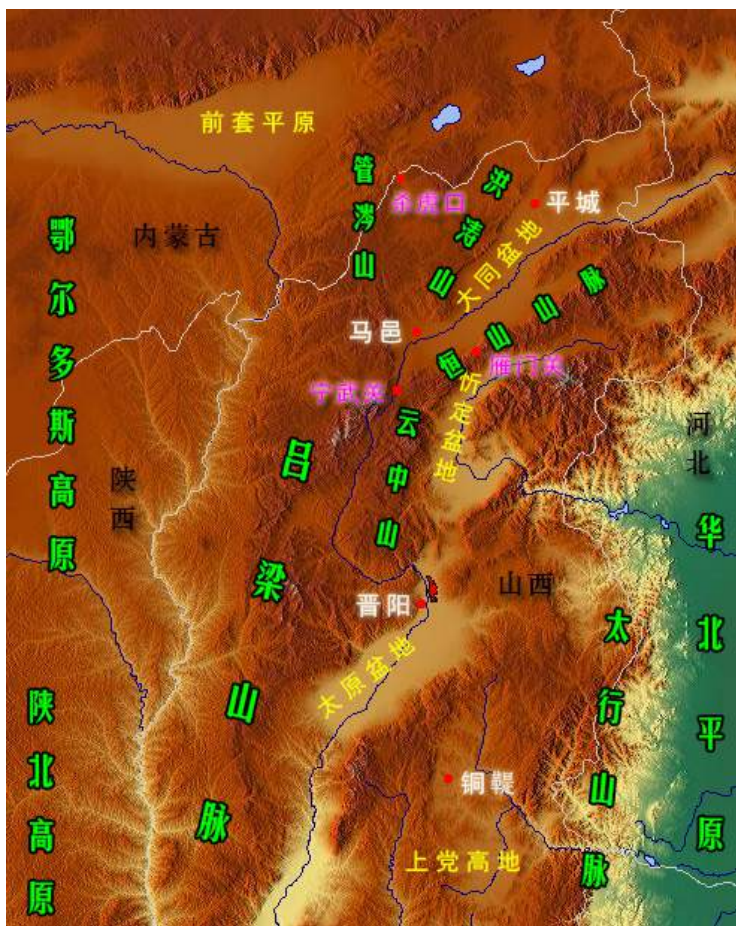
第二节 汉军北上击退匈奴和平叛

从秦末起兵时起，就一直处在战争状态的刘邦，对韩王信叛乱的反应还是非常快的。仅仅在韩王信叛乱的第二个月，汉军主力就集结好开始北上平叛了。汉军之所以反应如此迅速，是因为这些兵力本来是准备北上去解马邑之围的。只不过现在他们的目标是去平叛了。然而韩王信反叛，并率军南下去稳定自己领地后方时，似乎并没有影响汉军北上的计划。也就是说汉军主力并没有试图随之南下与之决战，而是快速插至忻定盆地的北部，在攻下恒山山脉南麓的重镇“霍人县”（今繁峙东）后，穿越雁门关，攻击韩都“马邑”。汉军的这种作战方式，应该是很出乎韩王信的意料的。因为按照正常方式，汉军肯定应该先解决掉前突的韩王信部，然后不断攻击前进，逐次收复失地。现在这样直接插入大同盆地的做法，等于是抄了南下叛军的后路（这种釜底抽薪的战术，是张良提出的）。

对此更应感到意外的，是那些留守在大同盆地的叛军。当汉军主力突然出现在马邑城下时，马邑城中能否组织出有效的防守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当汉军拿下了马邑之后，他们并没有选择继续肃清大同盆地的叛军，或者南下歼灭韩王信的主力，而是由马邑北上，进入了吕梁山脉北部的山地之中。

说到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大同盆地的结构和马邑的位置了。所谓“大同盆地”，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地理标签来代替，就是“桑干河上游河谷地带”。也就是说，这片低地区是由发源于吕梁山脉北部管涔山的桑干河冲积而成的。由于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既可以从大同盆地西部的河套之地攻击大同盆地的西南部，也可以直接从阴山山脉北麓穿越阴南丘陵地带，或者先占据张家口盆地等桑干河中游盆地后，再由大同盆地的东北角攻入大同盆地，因此大同盆地实际上是呈双中心的状态。即由

西南角的“马邑”以及东北角的“平城”，来共同分担防御任务的。即使是在今天，整个山西北部行政建制依旧是遵循这个规律一分为二的。只不过“马邑”现在被叫作“朔州”，平城被叫作“大同”罢了。



山西高原地理结构图

在战国阶段解读赵国的北上扩张时，我们其实已经解读过大同盆地西北山地的地理结构了。就这片山地本身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两山之间没有发育出大的河谷平原，农、牧的价值都不大）。争夺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无论是中央之国想从大同盆地进入河套平原，还是游牧民族想从河套平原进入大同盆地，都必须穿越它。如果汉军执意要进入马邑以北，由管涔山与洪涛山（前者是吕梁山的北延，后者被认为是阴山的南延）包夹而成的山地地带的话，就很可能与匈奴人直接交火了。

在没有解决完内部问题时，就以匈奴人为主攻目标，似乎显得不够明智。然而兵锋正盛的汉军还是这样做了，汉军在穿越杀

虎口进入前套平原之后，与措手不及的匈奴骑兵数次接战并取得了胜利。不过汉军的这次突击行动，更像是对匈奴人的一种警告，而不是针对匈奴的战略反击。在北地诸侯叛乱皆有匈奴幕后支持的情况下，这种战术性的警告并不算多余。不过对于孤军深入的汉军来说，在没有做好战略准备，并且后方有叛军活动的情况下，长时间在对手纵深活动是不明智的。因此在攻击大同盆地、前套平原得手之后，汉军主力旋即穿越雁门关，回头去收拾还在山西高原腹地渗透的韩王信。

以汉军的实力，对付反叛的韩王信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双方的决战并非发生在晋阳一带，而是在上党高地的北部——上党郡的铜鞮县（山西沁县）。在北有汉军主力回师追击，南有河东汉军堵截的情况下，退入上党高地据险以自保，是韩王信和他的部下唯一的选择。不过对于韩王信来说，无论在太原盆地以北地区，还是上党高地都没有什么民众基础，试图割据于此的想法并不现实。在战国的记忆还牢牢的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时，这些土地上的民众会认定自己的地缘属性为“赵”。如

果是一个赵国王族的成员来对抗中央政府，在大局初定的时候还是很有市场的，但如果是一个“韩国人”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说韩王信在铜鞮之战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任何资本割据为王的话，等他带着少量亲随逃回大同盆地后，就会彻底认清形势了。鉴于汉军主力急于南下寻找韩王信的主力决战，汉军并没有时间肃清恒山南北的叛军。这片战国时期属于赵国高地区，在战国后期被用“代”的标签来标注的土地（以区别河北平原的赵地核心区），在楚汉战争中，一直都处在边缘状态，并没有太深的介入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这样一个经历，也使得代地之人对于“赵”的认同感，要高于正在形成的，统一的“汉”的国家概念。

在韩王信这个空降的“王”授命于已经成为天下之主的刘邦来管理“代”地时，顾忌到中央政权的强大，代地中那些不愿意就此融入汉帝国的人可能还会静观其变，暂时接受这个“王”。但当这位准备在赵国故地新建“韩国”的王，本身就成为中央政权的弃儿时，就不用指望他能够依靠赵地民众的支持东山再起了。逃回大同盆地的韩王信很快就知道了，这些原本归于自己治下的高地上的赵国人，已经推选出了属于自己的王——血统上属于赵王后裔的“赵利”。鉴于他们高地赵国的属性，这个准备依靠与匈奴合作而割据一方的新政权，仍然继承了“代国”的标签。不过，如果最终能够形成割据格局的话，河北平原的赵国故地势必会成为他们扩张的方向。在普通民众还抱有源自战国格局的地缘属性时，这种扩张还是有地缘基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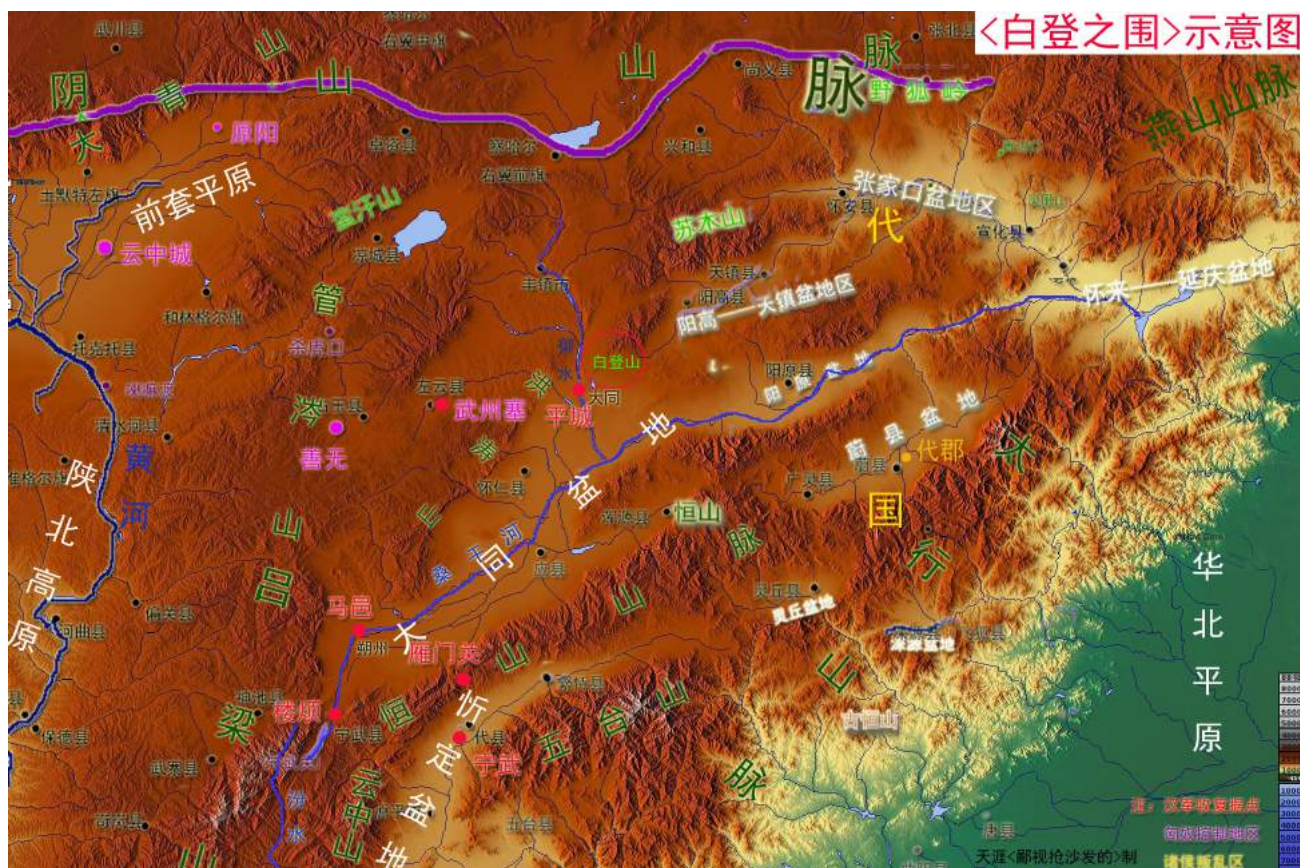
当韩王信彻底明白自己不可能再有机会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时（回到韩地发展，更是没机会），他唯一的归宿就是归顺匈奴，成为匈奴帝国治下的臣民了（之前有本钱时，是合作关系）。尽管从心理上很少有汉地之人心甘情愿的成为这些夷狄的一分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选择可以让自己更安全。而现在对于汉帝国来说，韩王信个人的生死与否其实已经不是重点了。因为新“代国”的崛起，意味着一切又回到了韩王信叛乱时的原点。主力已经置于山西盆地南部的汉军必须又一次的北上平叛。

第三节 匈奴诱使汉军进入大同盆地

如果对手仅仅是代地的叛军，刘邦并不认为这种反叛会有很大威胁。毕竟在经历过与项羽的战争后，汉军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以及亲信的军事核心圈。加上掌握中央之国大部分资源的背景，任何异动的诸侯都不会动摇到帝国的根本。只是很明显的是，代地的这些反叛者已经和匈奴人结成了紧密同盟。正确判断这些匈奴人的战力和动向，是能否彻底稳定北方边郡的关键。对于刘邦和汉军来说，在上一阶段的平叛中，其实已经和匈奴人有了初步的接触。只是当时汉军所面对的，是对汉军出现没有心理准备而游弋在河套平原东部的匈奴部落。以刘邦的战争经验

来说，是不会依据这些规模不大的遭遇战来判断对手实力的。汉军需要的是更多的与对手接战的经验。

想要获得这些经验并不太难，因为那些随同韩信南下的匈奴人仍然活动于晋阳一带。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些匈奴人虽然与韩王信表面上算是盟友，但目标却不一致。韩王信并不能指望这些眼中只有战利品的匈奴人，帮助他与汉军决战。也正因为匈奴志在劫掠，而非土地。所以在汉帝国决心清剿这些南下的匈奴人时，出乎意料的顺利。一经接触，这些匈奴人就很快退入吕梁山地，并沿着吕梁山与云中山之间的谷地向北撤退。双方在晋阳、离石曾经两次接战，汉军均获得了胜利。只是在匈奴人急于把劫掠的财富带回草原时，这种胜利注定是战果不大的击溃战。



白登之围示意图

说起来，汉军对于匈奴南侵骑兵的这条败退路线，应该并不陌生。因为在上一阶段攻取马邑，抄韩王信后路的战役中，汉军主力应该就是顺着这条路线沿汾水北上，突破恒山山脉、吕梁山脉、云中山三山交汇处的“楼烦关”，进入大同盆地的。而这一次，汉军又循着同样的路线尾随匈奴骑兵攻至了楼烦关。如果说，在上一阶段的战争中，匈奴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在中央之国的内斗中取利的第三者的话，那么这一次，匈奴人不可避免的成为主角了。为了接应撤退回来的匈奴人，匈奴的左、右贤王各自率领了一万骑兵集结于楼烦关北。只是这第三场接触战，仍然是以汉军

的胜利而告终。

在歼灭韩王信部主力后，与匈奴部的三次接战中均取得了胜利，汉军中不可避免的提升了与匈奴作战的信心。然而对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这些胜利仍然不足以让他下定与匈奴决战的决心。毕竟一直以来的信息表明，匈奴控弦数十万，并拥有强大的战力。如果刘邦想借着这次集结兵力平叛的机会北伐的话（集结了三十余万的兵力），目标就不会仅仅是收复已经稳定存在于华夏核心区的大同盆地了。之前被赵国开拓，秦国复得的河套平原，才是刘邦此次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汉军甚至迂回兜底马邑时，就已经尝试过攻击匈奴控制的云中郡故地了。

基于一战将匈奴驱逐到长城以北的想法，刘邦需要更加谨重的了解对手的实力。而与此同时，匈奴人和代地的叛军也正是在恒山以南集结（忻定盆地最北部，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脉之间滹沱河上游谷地，史称“代谷”），准备抵挡主力北上的汉军。于是，一场发生在战争之前的，侦察与反侦察的情报战拉开了序幕。

在汉军骑兵追击匈奴南侵部队至楼烦关北，并在与匈奴左、右贤王部接战中取得胜利时，匈奴人与代地的叛军也正在思考应该如何应对汉军主力的北上。从代国试图割据的角度看，如果能够在忻定盆地之南据险以自守的话是最好。这样的话，叛乱的代国才有本钱与汉军长期拉锯。当然，如果事实上无法阻挡汉军的北上，在雁门、楼烦一线设防，也就是依托恒山山脉控制大同盆地及其以东至太行山脉一带，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一切的构想，都是在得到匈奴强有力支持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否则以代地的实力，是无法与整个帝国对抗的。

对于匈奴人来说，他们在南侵的过程中，应该也已经观察到了恒山山脉对山西高原所起的分割作用。如果匈奴人有入主中原企图的话，大同盆地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农耕区的突出部。在这里，游牧帝国有足够的资源学习更高一层级的华夏文明，并为下一步争夺中央之国的控制权做足准备。事实上，在后来的历史中，大同盆地以及东部的辽河下游平原，这两个作为最北部的农业区，都曾经多少为游牧、渔猎民族承担这样的战略任务。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鲜卑人和满洲人。正是在这两个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边缘板块，这两个边缘民族完成了政治、文化上的华丽转身。

大同盆地和辽河下游平原之所以屡次成为北方民族南下中原的准备基地，和它们的地理结构有着密切关系。辽河下游平原北部的平原结构，使得无论是东北渔猎民族，还是沿西拉木伦河——西辽河东进的蒙古游牧民族，都很容易对它造成巨大的压力。而大同盆地北部的丘陵地形，也同样不足以抵挡住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骑兵。相比之下，阴山东麓这些丘陵地带所自然生长的草场，对游牧民族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却更加有利。

基于大同盆地以及下辽河平原在防御上的困难程度，一旦中央帝国内部的整合度不够高时，是很容易被放弃的。帝国的统治者们，会认为把资源投入到两个边缘农业区南部的恒山、燕山两大山脉之上，费效比会更高。当然，如果帝国真的决

定把长城收缩到这一线的话,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所面对的就不再是纯粹的“游牧”(渔猎)帝国了。这些得到属于自己的农业区补给的边缘民族,在适应定居生活,并在农业区变得更“文明”些后,大部分都会尝试成为真正的华夏之主。作为最早建立游牧帝国的匈奴人来说,他们还没有这么高的政治理想。定居和据城以自守的方式,并不是他们所喜欢的。匈奴人对于进入农业区的渴望,纯粹是出于原始的“渔猎”兴趣。

在之前韩王信与汉军的决战中,匈奴人并没有真正“帮忙”,而现在对于帮助代国叛军稳定防线,同样也不会有兴趣。正是因为匈奴人并没有兴趣帮助代国人稳定防线,因此集结于恒山山脉南部“代谷”的匈、代联军,在汉军主力开始北上时就主动撤退了。甚至于有雁门、楼烦之险的恒山山脉,也没有成为拉锯战的战场。促使匈、代联军没有稳定恒山防线的另一个原因,是汉军骑兵在追击回撤的匈奴人的过程中,已经突破了楼烦关,并开始向东收复失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着于建立恒山防线的话,匈、代联军在战术上会受到汉军的两面夹击。

既然作为大同盆地南大门的“恒山山脉”,对于汉军来说已经不再是天险,那么汉军完全收复大同盆地应该就没有什么悬念了。面临数十万汉军压力的代国人,他们可以选择的是在大同盆地以东,即蔚县盆地——张家口盆地一带设立防线。这一地区也是“代”这个地缘标签最初出现的地区。在赵国和秦帝国的行政区划中,被称之为“代郡”。只是这样一个两面承受压力(华北平原和大同盆地),由一系列小型盆地所组成的板块,如果没有匈奴人的强有力支持,基本是无法达到割据要求的。

在轻易放弃大同盆地之后,那些不愿意融入汉帝国的赵国遗民,一定会为即将到来的压力感到惴惴不安。但对于匈奴来说,却是让自己在战略战术上置于了更加有利的地位。已经占据并经营河套平原、阴山东部草场(分为“阴北丘陵”、“阴南丘陵”两个地理单元)的匈奴人,能够对大同盆地造成全面的压力。换句话说,他们可以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随时出击占据大同盆地的汉军。这比起以自己所不熟悉的大同盆地农业区为基地,和忻定盆地的汉军展开拉锯战,要更容易发挥匈奴人的优势。

从匈奴人的后来的表现来看,在放弃恒山防线,让汉军轻易突进到整个大同盆地之前,匈奴人就已经做好了在大同盆地与汉军进行决战的准备。也就是说,这次主动后撤是一次“诱敌深入”战术的成功实践。可以提供佐证的是,当刘邦同样对与匈奴决战感到不安,并急于了解匈奴主力实力时。匈奴人在代谷一带并没有集结自己真正的主力,而是将一些老弱之军放在汉军情报人员能够窥探到的地方。这种故意示弱做法,不仅骗过了汉军的情报人员,也骗过了刘邦派出的以谈判为名,前往匈奴营地的外交人员。在十几批出使匈奴的使臣都汇报出同样的结论后,刘邦终于相信,挡在他面前的匈奴人并不如传说中那般强大。

并不能十分确定匈奴人之前的快速后撤，以及在楼烦关北与汉军骑兵所展开的接触战，是否也有故意示弱的成分。但从结果来看，这些或主动或被动的示弱战术结合在一起，足以让刘邦产生了轻敌的想法。当北出楼烦的汉军骑兵，回报他们在大同盆地的军事行动异常顺利后，刘邦决定不再跟随行动相对缓慢的步兵部队（数量占大多数），而是快速北上与骑兵部队会和。而这个时候，汉军的骑兵已经由马邑向西，收复了大同盆地东部最重要的据点——平城。平城的收复，也意味着整个大同盆地重新回到了汉帝国的控制之中。接下来刘邦所要思考的是，先向东剿灭收缩于代郡的叛军；还是先向西、北方向，寻机与匈奴人展开决战。

到达平城与汉军骑兵汇合的刘邦，究竟是怎么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我们无法得知。因为接下来，汉军就会发现，战争的主动权并不在自己手中。从刘邦进入平城的那一刻起，一张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大网就开始收网了。

第四节 吕北山地和阴南丘陵的防御力不足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知晓，汉帝国和匈奴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就发生在汉军刚刚收复的“平城”。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平城和马邑分别为一北一南控制大同盆地的两个地缘中心。而这片更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土地，其核心河流就是桑干河。与处在上游的马邑位于桑干河畔有所不同，平城并不在桑干河畔，而是在桑干河北面支流“御河”河谷中。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强调大河对一个地理单元的重要作用。因此也产生了一个误区，认为重要的城市一定是建立在大河之畔的。事实上，在水患频繁的古典时期，人们更愿意把城市建立在离干流不远，流量较小的支流边上。这样既能得到水利之便，又能少受洪水之苦。另外，干流的中下游地区往往冲积平原发育得比较好。这样的话固然更有利于开耕出更多的山地，但同时无山可依的结构，也让城市的防守陷于不利境地（包括防洪）。因此从依山傍水的角度来看，大同盆地北部的地缘中心，也没有选择在桑干河畔的开阔河谷中，而是在整个盆地区的北部边缘。

对于中央之国而言，平城（大同）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出部。因为它北面、西面的两个地理单元，都是游牧生产方式更占优势的板块。历史上，从阴山以北而来的游牧民族，如果想攻击平城或者进入大同盆地的话，一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穿越阴山山脉东部的丘陵地带，直接出现在平城的北边。另一条就是从阴山北麓或前套平原，经“杀虎口”进入“吕梁山脉北部山地”（管涔山——洪涛山组成，简称“吕北山地”），然后循谷地而下，进入大同盆地南部，攻击“马邑”（朔州）。为了控制这条匈奴南下的路线，赵人在将“吕北山地”和“大同盆地”捆绑在一起，设置为“雁门郡”时，将郡治设置在了靠近西侧管涔山的“善无”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省右玉县。

当然，就后一条路线而言，马邑并不总是直接攻击的目标。因为进入吕北山地的游牧骑兵，同样可以向东穿越洪涛山，从侧翼攻击平城。而为了控制这条威胁到大同盆地北部的路线，赵国和秦帝国在靠近洪涛山一侧，构筑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名曰“武州塞”。其行政中心，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左云县。从这个角度看，“左云右玉”所代表的“吕北山地”，算得上是大同盆地，乃至山西高原的西大门了。

对于护卫大同西侧的武州塞，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不过提到“云冈石窟”，相信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了。这个与洛阳“龙门石窟”齐名的石窟，除了均为佛教造像集中地的共同点以外，很少有人关注到它们共同军事价值。那就是均处在交通要道之上。如果说龙门石窟中的佛像，注视的是洛阳的南大门“龙门”的话，那么云冈石窟看护的就是大同的西大门了。它的位置正是在武州塞的最东端，穿越洪涛山的山口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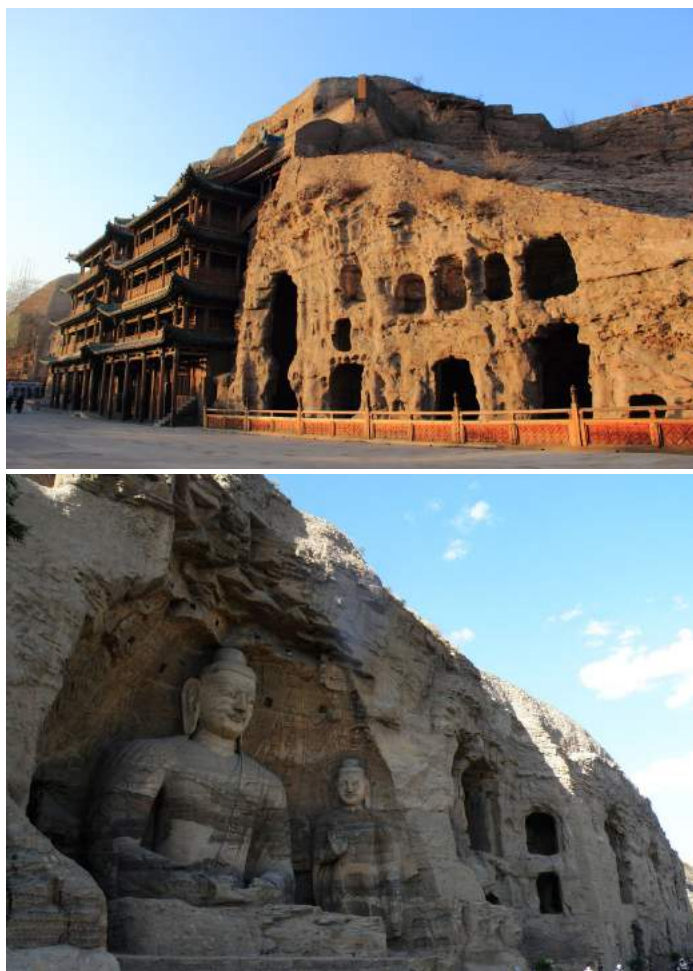


大同盆地示意图

与大部分穿越山脉的道路依河而建一样，武州塞所保护的也是一条河谷通道（现在的109国道）。源出吕北山地的这条叫作“十里河”的河流，最终汇入了大同的母亲河——御河。顺便说一下，要是朋友对那些冰冷的佛教造像不感兴趣，我也可以提供一个比较“香艳”的典故，帮助大家认识云冈石窟和武州塞的战略位置。据说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的“王昭君”，就是西出武州塞前往匈奴之地去承担她的历史使命的。只不过那个时候，云冈还没有大佛在目送她罢了。

我们前面也说了，就“左云右玉”所处的吕北山地而言，地势并不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生产力落后的古典时期前期，即使是被中央之国所控制，整片山地的主要生产方式也是以畜牧业为主。当然，华夏移民也会努力寻找面积稍大的

河谷平原来建立自己的定居点，像左云、右玉两个行政中心就是这样形成的。在适合农业生产的耕地较少的时候，定居的华夏移民也并不会无视那些周边山地之上的草场资源。在开垦耕地的同时也会放牧牲畜，以增加食物的来源。只是这样依附于定居点的畜牧方式，仍然注定是缺乏机动性，并无法有效控制整片山地的。而这也意味着这一区域很容易被游牧势力所渗透。



大同云冈石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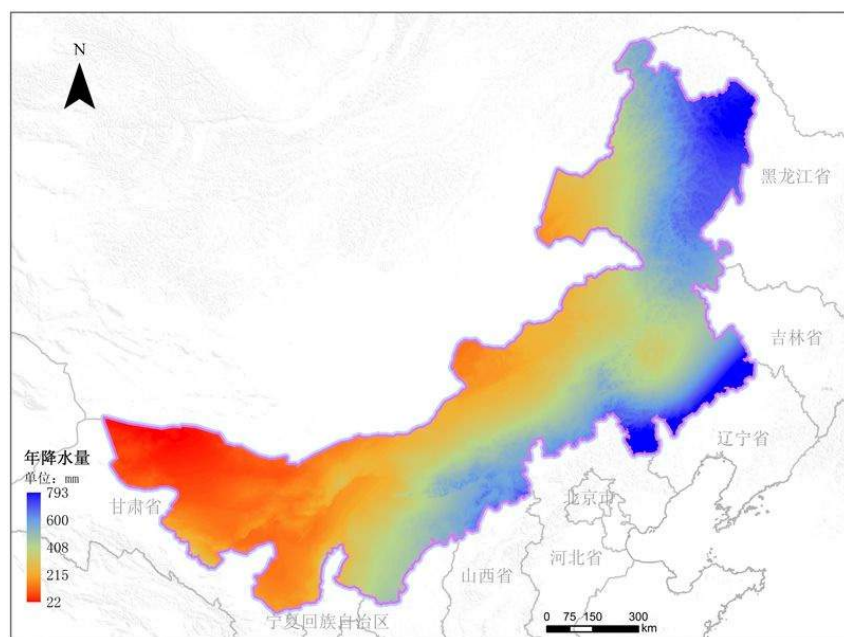
到歧视。

当然，所谓愿意融入，除了主观意愿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接受那些因农耕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生活方式。否则的话，这种融合是十分不稳固的。就好像那些原本归入赵国的楼烦等游牧部落一样，在匈奴人代表游牧势力重新渗透到阴山以南地区之后，他们又会很自然地回归到游牧阵营中，成为匈奴帝国的一部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被秦帝国用行政手段迁移到河套平原的东部移民，在中央之国内部出现动乱后，又都尽数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土地上。从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争夺的角度看，地缘平衡线又回归到了战国后期，即赵国将控制力延伸出大同盆地的时期了。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味的将游牧势力驱逐出境。事实上，在赵国征服吕北山地以及河套地区后，活跃于当地的游牧部落很多也归顺成了“赵国人”。也就是说，在赵国所依仗的“胡服骑射”的骑兵，很多本身就是所谓的“胡人”。这些当时被称之为“楼烦”的胡人，甚至于在楚汉战争中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双方的阵营中，都存在不少精于骑射的“楼烦”战士。从华夏民族开始崛起之时，“化胡为夏”之类的将边缘民族吸收进华夏文化体系的事，就没有间断的在进行中。对于华夏文明来说，血缘和文化同等重要。只有兼具了这二点，才能够成为这个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这其中的变通之处在于，血缘关系可以通过追溯祖谱的方式对接。而一旦对接上之后，这些愿意融入华夏文明的边缘民族本身并不会受



阴南丘陵示意图



内蒙古年降雨量图

吕北山地并不是唯一在中央之国内乱时，唯一容易被游牧民族控制的地理单元。在大同盆地的北部，阴山南麓的丘陵地带——阴南丘陵，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尽管赵国和秦帝国已经十分努力的试图将农牧分割线，定格在阴山分水岭之上。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除了大同盆地这块大面积的冲积平原之外，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一样，同样更适合生长耐旱的草本植物。一旦中央之国无力控制阴山之麓的长城防线（好像白登之围时的情况一样），阴山北麓丘陵地带（阴北丘陵）的游牧部落，就会穿越本来也已经弱化成为丘陵地带的“阴山山脉”东段，到阴南丘陵地带进行放牧，并直接威胁到大同盆地的农业核心区。

当然，由于阴山山脉的分割作用，阴山南北的丘陵地带在气候和降雨量还是有所区别的。相比阴北丘陵每年 100 多毫米的降雨量，阴南丘陵 350——400 毫米的降雨量还是比较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这一点最终也体现在了现在的行政规划上。在现在管辖阴南、阴北丘陵地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地级）的行政结构中，被称之为“前山”地区的阴南丘陵地带，主要为体现农业文明的“县级”行政区（如丰镇市、兴和县）；而自然条件较差的“后山”地区（阴北丘陵），则有更多地以“旗”命名的县级行政单位（四子王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

第五节 刘邦身陷匈奴的白登之围

对于努力将汉帝国的控制力延伸到大同盆地北部的刘邦来说，他的最终目标是夺回长城，以重新将匈奴人阻挡在阴山以北地区。只不过，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匈奴人并不愿意就此回到长城以北。单于和他的游牧骑兵（史称四十万）正潜伏于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之中。当刘邦和汉军骑兵进入平城后，这些以机动性见长的游牧骑兵迅速从两个方向杀出，对汉军形成合围之势。

匈奴人的攻击来得如此迅速和强大，是让刘邦和汉军骑兵始料未及的。对于一直决战于黄河以南地区的汉军来说，在初次与匈奴人的大规模接战中，做出误判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为了诱使汉军轻敌冒进，匈奴人还在代谷故布疑阵。从匈奴人的角度来看，将汉军引至自己势力范围的边缘，不仅能让自己有“主场”之利，更可以让恶劣的气候帮到自己。在久据漠北的匈奴人看来，阴山以南地区的冬天已经是非常温暖的了；而对于那些来自华夏核心区，甚至有相当比例来自楚地的汉军来说，大同一带的冬天应该是他们这一生中所遇到过的最寒冷的天气。

在没有做足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选择在冬天向北方出击，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不过在这次战役中，汉军所犯的错误已经够多了。在寒冷的气候下冻伤 30% 的战斗人员，只是雪上加霜罢了。最大的错误仍然在于刘邦的轻敌冒进。因为被匈奴包围陷入困境的是汉军中最精锐，与匈奴骑兵在野战中实力差距最小的骑兵。你并不能指望随后赶来带着辎重粮草的汉军步兵，有能力能够冲开匈奴骑兵的包围圈。相比善于野战的骑兵，这些步兵所擅长的是依托工事和严密的阵型进行防守，以及使用攻城工具攻击防守坚固的城堡。如果让汉军的步兵军团去对数量占优、机动性占优、单兵素质占优的骑兵集团发起冲锋，无异于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被匈奴人包围的是补给充足的步兵，而汉军骑兵在包围圈外围冲击的话，汉军的情况会好上许多。可惜的是，刘邦已经没有时间后悔了。他在战术上唯一能做的努力，就是将汉军骑兵带到一个能够最少受到匈奴人冲击的地点，以尽可能的争取时间。

以匈奴人的战术特点来看，在旷野中野战无疑是他们最擅长的，而攻城战则是他们最头疼的。然而刘邦并没有试图在“平城”的城墙之内固守待援，而是渡过了城东的御河，退入了离平城东最近的山地——白登山之上（现名“马铺山”）。而这场汉匈之间的第一次重大战役，也因此被称之为“白登之围”。鉴于匈奴主力来自于北部的阴南丘陵，以及西部的吕北山地，汉军向东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放弃城墙的保护而进入山地，就可能让一些朋友感到不理解了。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的骑兵，都是用来野战的。守城并不是这个昂贵兵种所应承担的任务。

当然，如果平城的城防措施坚固，这些汉军骑兵并非不能下马登上城墙，依托防御工事与匈奴人周旋。这样的话，总比暴露在数十万匈奴骑兵面前，捉对厮杀更

能保存实力和争取时间。问题是，匈奴人既然一开始就准备在平城一带展开决战，是断然不会为汉军留下一座完整的城，以让自己所期待的野战变成一场持久的攻坚战的。既然在匈奴人掌握战役主动权的情况下，刘邦和汉军骑兵不可能得到可供依托的城防工事，那么在匈奴人对平城合围成功之前，退入山地之中以居高临下的进行防守，便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



平城位置图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汉军骑兵的撤退方向应该是南面。只是匈奴人既然是想合围汉军，自然是要重兵穿插到平城的南面了（从洪涛山方向出击的骑兵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汉军想退回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匈奴人的合围计划也并不完美。如果足够完美的话，汉军甚至没有退入白登山上的可能性。要是那样的

话，无所依托，又在数量、单兵素质上都不占优的汉军骑兵，很可能在匈奴人的第一波攻势中就全军覆没了。而匈奴人计划中的这一缺憾，不仅在战术上让汉军骑兵能够退到白登上争取时间，也为刘邦最终脱身提供了战略机会。

在匈奴人合围之前，将部队带到白登上，无疑为刘邦后来的突围赢得了时间。在连续七天的攻击中，汉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了匈奴骑兵的一轮轮攻势。如果双方是在旷野中接战的话，就很难说了。然而能在仓促应战中抢到制高点，据守以待援，却还得感谢汉军的另一个敌人——代地叛军。

对于拥戴了新“代王”，并收拢了韩王信残余力量的叛军来说，大同盆地以东，张家口盆地——蔚县盆地一线的“代郡”，是他们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既然他们与匈奴人已经是盟友关系了，在这次合围汉军的计划中，匈奴人自然也就把包围圈东线的任务分配给了代地叛军。只是当匈奴人倾巢出动，准备在平城围歼汉军骑兵时，才发现代军并没有出现。以匈奴的兵力，即使没有代军这个盟友，也可以轻松的完成合围计划，最终匈奴人也的确做到了。只是代军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给了刘邦向东突围，抢占白登山的机会。代军的这种做法很显然是想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如果匈奴人多读点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政治结盟，还是军事合作中，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匈奴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冤大头的。

在匈奴人看来，他们与汉帝国并非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或者说，匈奴人之所

以热衷于南侵，只不过是财富、人口，而并非汉地诸侯们所热衷的土地。相反，代地叛军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在中央之国的北方割据出一块足够大，自成体系的板块，他们很快就会被汉军所攻灭。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匈奴四十万主力与汉军三十余万主力以命相搏的话，算是为代军在争地盘了。匈奴人和代军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也被汉军方面所洞悉。为刘邦想出解围办法的，就是在历史上以使用“反间计”而闻名的陈平。在楚汉战争中，陈平最经典的一次用计，就是离间了项羽与范增的关系，使得项羽失去了最可靠的智囊。

其实说起“反间计”这种计谋能够实施成功，关键并不在于用计者如何挑拨，而在于中计者本身已经有了间隙。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就是这个道理。历史并没有详细记载陈平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说服匈奴单于放刘邦一马的（其事秘，世莫得而闻也）。后人比较常见的解读，是说陈平用重金贿赂了匈奴单于的阏氏（单于正妻），并告知汉朝准备送给单于绝世美女，以解白登之围。如果单于见到了汉地美女，势必会冷落阏氏。因此阏氏才跟单于说子“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意思就是说，刘邦也是有神灵庇护的君主，我们占了汉朝的土地，也不可能长期据有。

其实相比于后人揣度的“美人离间说”，阏氏被记录下来的说服匈奴退兵的说法，更为可信。或者说，也许汉朝使者真的跟阏氏表明过要送美人的想法。但能够让单于做出决定的，还是“得其土地，非能有也”八个字。如果说里面有没有“离间”的成分，那就是善于用“间”的陈平，应该会让单于知道，他这次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为“代国”做嫁衣裳。

第六节 匈奴撤围并与汉帝国和解

尽管历史上有很多游牧部落曾经入主中原，但不是每一个游牧、渔猎出身的政权都有类似想法的。对于这些在草原上如鱼得水的马上民族来说，农耕区的财富是他们所渴望得到的，而农耕区的生活方式却是他们所恐惧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土地所束缚，并习惯于享受农耕区所带来的舒适生活的话，自己所倚仗的在游牧、渔猎生产方式下所维持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就会被严重削弱。认清这一点，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仅仅出于本能就可以了。即使是那些经不住诱惑，决心成为中央之国主人的边缘民族，也都在想办法“鱼和熊掌兼得”。

比如契丹人所想到的办法，就是“一国两制”。将辽国所控制的疆土分为“南院”和“北院”两个行政区；农业和游牧两种生活方式、行政体系共存，互不干涉。而满洲人则将八旗与“农工商”等生产方式分离的方式（不能从事上述行业），强化自己核心民族的军事属性，并通过定期的围猎（木兰围场）来延续自己在骑射上的优势基因。当然，还有做得更彻底的就是蒙古人。这些几乎完全拒绝融入农业文

明影响的草原民族，直接把大片农田变成了草场。很显然，作为游牧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并没有机会从后来这些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方式来尝试长期控制农耕区的游牧民族身上吸取经验。而代军那种坐山观虎斗的做法，无疑又加深了匈奴人的疑虑（让人当枪使了）。

以匈奴人的经验来看，他们对中央之国的战争潜力是有深刻感受的。当年轻仅是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就已经让匈奴人驻马于阴山之北。而统一之后的秦帝国，在长城一线所展示的力量更是远胜于赵军。现在，虽然从战术上看，匈奴大军已经围住了刘邦和汉军骑兵，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匈奴人一定要和包围圈内外的三十万汉军决战的话，自身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更大的问题是，这种损失并没有有效的收益来补偿。这些原本互相独立的草原部落之所以愿意跟着单于南下，图的就是汉地的财富，而不是向汉军显示他们的战斗力有多强。相反，如果匈奴人在显示出强大战斗力后，放刘邦一马，则不仅可以得到财富上的丰厚回报，更可以避免介入中央之内部的政治斗争。

在汉军方面抛出橄榄枝后，匈奴人“逐利”，而非“谋土”的想法，终于让刘邦获得了一线生机。在匈奴大军打开一个缺口之后，刘邦和被围的汉军骑兵得以和外围的步兵汇合。至于匈奴人，没有记录表明他们在这次交易中具体得到了多少好处。但很显然，匈奴人对于这次商业般的政治交易是十分满意的。由此，也将汉匈奴之间的共存模式给固定了下来。即汉、匈两国以姻亲的方式结盟，并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当然，“和亲”只是一种形式了。匈奴人也不可能因为单于得到了一个汉朝皇室之女，就放弃对农业区的袭扰。

决定汉匈双方之间能否短暂维持和平的核心在于，匈奴人能否通过和平方式获得他所需要的物资（重点在于“嫁妆”）。如果可以，他们也很愿意在享受汉地补给的同时，休养生息；如果不满足，或者因为大灾需要从农业区获得更多的资源的话，那么新一轮的威胁或者攻击仍然会展开。直到汉帝国同意再用“和亲”这种方式，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仅仅是发起“白登之围”的冒顿单于，就迫使汉帝国和了三次亲）。对于一直有着华夷之辨观点，并以文明高地自居的“中央之国”来说，采用和亲这种方式来减缓游牧民族的侵扰，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在经历过灭秦、楚汉两场战争之后，刘邦所接手的中央之国已是满目疮痍了。

更为重要的是，新生的汉帝国从一开始就承担着“转制”的历史使命。那些对“分封”制还抱有幻想的诸侯们，并不甘于就此放弃割据为王的权力。在白登之围解除，汉、匈之间通过“以财富换和平”的方式达成战略和解后。刘邦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掉那些叛乱的诸侯了。而这其中，与匈奴接壤的燕、赵之地，始终是叛乱的核心地区。然而，由于汉、匈之间已经完成了政治交易。类似白登之围的，由匈奴来为叛乱诸侯出头的情况，始终没有再出现。对于那些叛乱诸侯来说，匈奴人所提供的支持，更多的是作为最后的避难所。即当他们无法完成割据的梦想时，可以逃往匈奴人的

领地。只是，这样也意味着，他们日后就必须饱受风沙之苦了。

当白登之围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解除后，汉匈之间出现了一段相对和平期。除了双方以生意人的做法达成了“以和亲换和平”的交易以外，各自内部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也是战略层面的原因。就汉帝国来说，那些异姓、同姓诸侯们此起彼伏的叛乱是一个问题，而经历长期战乱后，民众需要休养生息，国力需要时间恢复是更为严峻的问题。至于匈奴人，他们的问题也同样不会少。尽管在汉帝国眼中，“匈奴”似乎已经完全成为北方威胁的代名词，但这个空前的游牧帝国本身只是一个松散的结构。那些因为被征服而成为匈奴一分子的游牧部落，同样有可能随着局势的变化对匈奴王庭构成威胁。这使得匈奴单于和他的核心贵族阶层，并不能总是把目光锁定在农耕区这块肥肉上。

第五章 汉初河套与河西走廊的形势

第一节 汉匈在前套平原形成共存

在评判现代中国的军力结构时，有句比较经典的总结：海军是中国人的钱，而陆军是中国人的命。这句话套用在匈奴身上，可以被改为“漠南是匈奴的钱，漠北是匈奴的命”。将经营的重心放在漠南，匈奴所得到的不仅仅是放牧期更长的草场，还可以经常性的从农耕区获得额外补给。但问题是，如果匈奴核心部落都放在漠南的话，漠北就很有可能被那些尚未完全臣服的被征服部落乘虚而入了。要是那样的话，匈奴人所丧失的就很可能是草原的统治权了。

赚钱和保命，永远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至于匈奴人到底是侧重于经营漠北，还是更着力于南线扩张，就要视情况而定了。总的来说，时间越早，匈奴人越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稳定漠北上。反之，随着内部结构的稳定，匈奴人也会越来越有力量发动在南线的大规模战争了。只是再怎么平衡，基于漠北在帝国结构中的核心位置，匈奴人也不可能把核心部落尽数放在漠南的。这一点，从匈奴人对蒙古高原左翼的经营上就可以看出。在这个方向，水草肥美，并最为接近农耕区的科尔沁草原，并没有成为匈奴左贤王部的核心草场，而是被交给了东胡遗族“乌桓人”游牧。

在帝国内部尚未完全融合的情况下，匈奴人的重点要更加侧重漠北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也对河套平原的归属造成了一定影响。因为在白登之围之后，匈奴人并没有要求完全得到河套平原，而是坐视汉帝国将触角伸到河套平原，恢复了对前套平原东部，也就是赵、秦两代所划定的“云中郡”的统治。也就是说，汉匈双方并没有以更有可能达成地缘平衡的“管涔山”为界，而是在前套这样的平原地区保持接触。那么，匈奴人“允许”汉帝国渗透到前套平原，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做内部整合吗？情况当然并没有这么简单。

以汉、匈两国的实力、地缘结构以及战术特点来看，匈奴人要想在大同盆地立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反过来，汉帝国想在河套平原保有一个突出部，也同样非常困难。然而双方在那段和平期中，却还是在前套平原维持了一条别扭的，无法确定平衡线的实际控制线。即汉帝国保有了在河套地区的存在，却又无法占据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而匈奴也并没有因为自己所占据的优势，一定要将汉帝国压缩回管涔山以东。

在博弈当中，一方能前进到什么程度，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决心和实力，对方的实力和想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动机来看，汉帝国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在河套平原显示存在。因为最起码从面子上来看，汉帝国并不认为自己败给了匈奴，所谓“和亲”只是由于双方都不想诉诸武力，而采用的一种相互示好的办法罢了。这样想的话，

其实倒也不算自欺欺人，因为匈奴也的确无法击败全力一搏的汉帝国。既然汉帝国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那么作为一个以秦王朝终结者而自居的新王朝，恢复秦帝国所建立的疆界就很重要了。

尽管和亲之后的汉帝国，实际上是在花钱买平安。但想用钱买断河套平原，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失去了这片水草丰美之地，不仅意味着匈奴人在漠南没有了稳定的前进基地，更意味着，那些善于据险以自守的汉军可以在阴山分水岭上重建赵、秦两代所打造的长城防线。即使是只得到由大青山——阴山所庇护的“前套平原”，也足以让汉军拥有足够的地理优势来打造一条相对完整的防线。也就是说，从匈奴的角度来看，放弃整个前套平原，与汉帝国形成有明显地理分割的地缘平衡线，对自己并没有好处。相反，在汉帝国强烈希望在河套平原建制行政区时，让汉帝国“适当”的占据部分前套平原，对匈奴人来说反而会有更大的利益。

我们知道，作为北亚历史上第一个游牧帝国，匈奴暂时并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也让他们对于土地得失本身并不像农耕民族那么敏感。如果一片土地有着比自己游牧牛羊更高的产出，而又无力阻止自己在丰收的季节前去收获，那么匈奴人其实并不介意这片土地名义上归属于谁。换句话说，汉帝国能够在前套平原重建一个缺乏地理防御能力的“云中郡”，并不是因为匈奴无力控制这一区域，而是匈奴人觉得汉帝国耗费超量的资源所维持的这个突出部，更像是为自己在经营一个可以轻易进去打猎的猎场。

基于同样的理由，在汉匈博弈线的最东端——下辽河平原，匈奴人也同样不认为需要把汉帝国压缩至燕山以南。而为了经营这个和云中郡一样缺乏地理屏障的“辽东郡”，汉帝国也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匈奴拥有战略优势的时期，这两个边郡也是受到匈奴攻击最多，损失最大的行政区。如果匈奴试图吸收农耕文化，并依照中原政权结构建立帝国的话，那么最起码在一开始，汉帝国是无力保有这两个突出部的。

虽然汉帝国在竭尽全力的保有在河套平原和辽河平原的突出部，但在具体的经营上，云中郡的经营显然要更为帝国所关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板块直接承受着匈奴王庭的压力，更是因为它可以成为帝国中心（关中平原）在北部的第一道防线。事实上，基于地理结构上的原因，即使汉帝国放弃经营云中郡，陕北高原的“上郡”仍然是呈突出部状态，并被迫在西、北两线承受巨大压力。而有了背靠山西高原，占据前套平原东部“云中郡”，二者之间也可互为犄角，对匈奴的动向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不管汉帝国有多少理由希望显示在河套平原的存在，但这种缺乏地理屏障的存在注定是痛苦的。我们甚至无法确知，西汉初期的云中郡到底在前套平原控制了多大区域。在匈奴的强大压力下，这条平衡线很有可能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变化区域，大致应该在阴山山脉东段的“大青山”至黄河一带。

而对于汉帝国来说，唯一能够摆脱这种不稳定状态的办法，就只有将匈奴人完全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汉帝国甚至在领地本来就十分局促的“云中郡”东部，背靠管涔山区域又分拆出了一个狭长的“定襄郡”。以在帝国的政治体制内，向这个河套平原的突出部倾斜更多的资源。这一做法和今天我们把南海那几个弹丸之地，升格为地级的“三沙市”的思路如出一辙。

第二节 匈奴内部对河套平原的分配

当汉帝国忙于运用行政手段强化对河套平原的经营时，匈奴那边对河套平原的经营也同样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在前面也分析过了，除了拥有大兴安岭西麓草原通道的蒙古高原左翼（也就是左贤王部领地）以外，居中的匈奴单于，以及右翼的右贤王，在接近汉地时都需要穿越大漠戈壁。这也使得这两个方向的游牧部落迫切需要在阴山南北，特别是河套平原拥有根基之地。因此，在汉帝国表面艰难控制一部分前套平原之后，剩余的部分前套平原，以及后套平原，就需要在匈奴人内部也做一个分配了。

以匈奴人的生活习惯而言，并不会有明显的分割线和据点来标示这种分配。不过大致的分配还是可以确定的。即大部分水网密集的后套地区草场，也就是狼山至阴山（狭义）一线是由右贤王部放牧。而位于阴山山脉中部的“阴山”南北，以现在的包头为中心，则为匈奴单于庭所直接控制（包头则为匈奴单于庭所在）。

现在汉初河套平原的地缘格局，我们已经比较清楚了。组成阴山山脉的“狼山”、“阴山”、“大青山”，分别置于匈奴右贤王、匈奴王庭，以及汉帝国的控制之下。这一点，我们从后来汉帝国在河套地区的建制也可以看出来。当汉帝国终于开始战略反攻，并收复整个河套地区之后，并没有按照前套、后套的地理分割建制两个行政区，而是把匈奴右贤王、单于庭所分别控制的狼山——阴山一线的河套平原，建制为了“朔方”、“五原”两郡。加上之前从云中郡被分拆出的“定襄郡”，整个河套平原实际上被建制为了四个同级的行政区。

明显处于更高文明级的中央之国，经常会依据地缘结构和形势变化对行政区划做一些调整。不过对于匈奴人来说，这些并不重要。当匈奴帝国掌握战略主动权时，不仅云中郡、定襄郡这个突出部经常为匈奴人的扰，甚至雁门、代郡、上郡这些有山地庇护的行政区，匈奴人也同样视之为自家后院。

在匈奴人的内部划分中，这些最先被秦、赵两国带入农耕文明的地缘板块，都算是匈奴单于的常规“猎场”。而以后套平原为基地的匈奴右贤王部，位置就十分不利了。因为和其他两大势力相比，它在漠南的基地是最远离农耕区的。如果不想只是跟在单于庭后面喝汤，而是拥有自己的常规猎场的话，那么将整个鄂尔多斯高原置于匈奴右翼的控制之下，以和陇东高原的农耕区对接，就是匈奴右翼必须完成

的战略目标了。



西汉河套四郡地缘结构图（公元前126年）

看起来，上天似乎对匈奴右翼颇为不公平，当他们从大湖盆地艰难的穿越戈壁大漠到达水草丰美的后套平原之后，还要继续经营自然条件同样不太理想的鄂尔多斯高原，才能够触及他们梦想中的富庶之地。也就是说，后套平原之于匈奴右翼王部，更像是一个“中继站”，而非侵入农耕区的前方基地。然而当我们把汉匈博弈的视角，从边境的战火上移开，上升到更高战略层面时会发现，最终成为汉匈争夺主战场，并在战略上让汉帝国压倒匈奴的，恰恰是匈奴右翼所经营的区域。而这也将是我们下一部分所解读的方向。

第三节 匈奴攻灭大月氏占据河西走廊

如果说居中的单于王庭与匈奴左翼，这二者的对手就是汉帝国的话，那么匈奴右翼所承担的任务就要重得多了。当然，对于崇尚丛林法则，赏罚分明的匈奴人来说，责任与收益是成比例的。你面对的敌人越多，所在负责的区域越大，意味着可以预期的收益空间也越大。经过之前的分析，相信大家已经十分清楚，匈奴右翼除了可以穿越鄂尔多斯高原侵掠汉地之外，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也同样是匈奴人强劲的对手。

以河西走廊被纳入中央之国后，成为核心农业区这一点来看，在河西走廊从事牧业的自然条件也是相当不错的。而经过我们之前的解读，大家也应该清楚，所谓“河

西走廊”的绿洲带，并不仅仅是指沿祁连山北麓的那一条狭长的走廊地带，还应该包括额济纳河下游、古羊河下游所形成的“居延海”、“潯野泽”两块水草丰美的草场。不过这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早在战国初期便已经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能够长期抵御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侵袭。甚至在匈奴人开始将蒙古高原带入帝国时代后，还曾经在与匈奴人的战争中占据上风。以至于在白登之围中成功迫使汉军以“和亲”方式妥协的“冒顿单于”，年少时都曾经在大月氏为质。

事实上，大月氏人能够长期与匈奴为敌，很大程度是因为和中央之国形成了掎角之势。尽管这两个板块之间应该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盟行为，但客观上他们都在面对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压力。而在与匈奴人的博弈当中，中央之国在战国后期以及秦帝国时代与匈奴在河套地区的争夺，无疑极大地缓解了大月氏人的压力。可以这么说，匈奴帝国自统一漠北，开始南侵之时，就在河套地区与中央之国陷入了胶着状态（先是赵，后是秦）。当匈奴人因为中央之国的存在而无法稳定经营河套地区时，他们所损失的就不仅仅是袭扰中央之国的前进基地了，河西之地的大月氏人同样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除了汉帝国客观上为大月氏人缓解了北方压力之外，大月氏人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也是他们能够长期抵御匈奴人进攻的重要原因。这种改变指的就是，在大月氏人决心在河西走廊立足之后，他们逐渐变得不那么像游牧民族了。我们知道，所谓“游牧”生活，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生产、生活都处在“逐水草而居”的不稳定状态。这固然为游牧民族带来了超强的机动性以及生存能力，但也很大程度影响了游牧民族的上升空间。因为当你一直处在移动状态时，是很难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发展更高一级的文明的。而游牧生活对土地产能的低开发力度，也让游牧民族的人口潜力有限。

以古典时期的技术而言，农耕无疑是最有效挖掘土地产能的生产方式。只能养活一只羊的草场，如果能够开发成耕地的话，很可能产出足够一家人食用的粮食作物了。然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种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甚至比那些森林中的“渔猎民族”要更难转变。后者因为本身已经接受了定居生活，并且在生产方式上处于更低的层级，技术上对游牧、农耕两种生产方式都更容易接受。这是因为从层级上看，游牧和农耕其实是平级的。即人类从最初完全依赖自然赐予的“渔猎”生活开始转变时，并不是说经由“游牧”之后，再进入“农耕”文明，而是可以同时向这两个方向发展。具体转变为哪一类，就要看所处的地理环境更适合做什么了。

虽然当一个族群选择了游牧生活之后，会比较难以向农耕生活转变（难不代表不会）。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过渡，让自己有机会升级到更高一级的文明。这种方式就是欧洲人在经营牲畜时，很早就采用的“驻牧”方式。也就是说，在固定牧场放牧甚至圈养牲畜的话，可以为这些曾经的游牧民族带来“定居”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点对于文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们在之

前的解读中也分析过了，尽管欧洲与蒙古高原处于同一纬度区间，但欧洲大陆无论在高度、湿度还是温度上就占有优势。其单位土地远高于蒙古高原的产草量，让欧洲人更有机会很早就转入驻牧阶段。相比之下，不要说两千多年前的匈奴人，即使是现在生活在蒙古高原的牧民，在有更好技术条件的帮助下，也很难完全依靠一片草场提供畜群所需的牧草。

与生活在苦寒之地的匈奴人相比，大月氏人则幸运得多。河西走廊与华北平原一样的“暖温带”温度条件，加上季风所带来的相对充沛的降雨，以及祁连山慷慨的赐予，都让这片土地之上的绿洲有着比蒙古高原更好的植物生长条件。这样一片能够被农耕文明开发成规模农业区的土地，也同样有机会为游牧而来的大月氏人提供驻牧的条件。也就是说，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已经很大程度摆脱了游牧生活。可以在固定草场小范围放牧的优越条件，使得大月氏人像农耕民族一样，开始营造固定的城堡、据点来抵御外族的入侵了。



河西走廊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在旷野中进行野战是他们所最喜欢的战争方式，而这也是缺乏机动性的农耕民族的短板。不过当农耕民族开始在自己所适应的区域（能够得到战略补给）营造城邑，据城以自守时，优势便开始转向这些防御者了。双方在博弈当中的这种特点，也使得农、牧民族的博弈分割线——长城，长期以来就是农牧两种生产方式的地缘分割线。

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大月氏人在经营河西走廊时，有没有对这些绿洲做一定的农业开发，农业生产又在其中占据了多大比例。但能够稳定下来，并营造永久性工事抵御来自蒙古高原的入侵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说，此时的大月氏人既有着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又有着农耕民族在防守上的技术特点。加上匈奴人在河套地区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支点，大月氏人最起码在进行防御时会有很大优势。这种防御上

的优势，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转换为进攻上的优势。因为以大月氏人的实力和战术特点来说，要想攻入漠北，成为蒙古高原之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如果大月氏人想渗透河套地区时，在距离上却比漠北的匈奴人更有优势。

如果匈奴人在与中央之国争夺河套地区时，不想被人背后捅刀子的话，通过外交手段与大月氏人暂时维持和平就变得十分有必要了。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匈奴人曾经会送质子给大月氏的直接原因。对于两线作战的国家来说，在先解决哪一个对手的问题上并没有标准答案的。不过通常情况下，你总是要避免两线作战。即在一条战线上用外交手段稳定住对手，以集中精力对付另一对手。在取得最终胜利或阶段性成果之后，再反过手来解除前者的威胁。在汉帝国与北线匈奴、南线诸越王国的博弈中，这种策略无疑使得汉帝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相反，自信心极度爆棚的秦帝国，在外战上的两线作战，无疑加速了帝国的崩溃。同样面临两线作战的匈奴人，也同样采取了和汉帝国一样的策略。事实上，看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究竟选择哪一方作为主攻对象，不光要看自己的情况，也要看对手的变化。

通常情况下，因为内部动乱而消耗掉大量资源的一方，更容易成为对手直接攻击的对象。很不幸的是，最先让匈奴取得战略突破的是汉帝国。白登之围在战术上所造成的重大挫折，以及汉帝国不得不正视的休养生息问题，让帝国在面对匈奴之时，只能长期采取战略防守的态势。当然，幸运的是，汉帝国的体量足以保证自己核心农业区的完整，让匈奴人的战略优势仅仅维持在农牧分割线一带。

从匈奴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应该从来没有想过入主中原。对于这个游牧帝国来说，能够在河套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断从农耕区获得额外补给（和亲或劫掠）就足够心满意足了。这也使得匈奴人在战略上不再面临两线作战的风险，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大月氏人的问题了。对于匈奴人来说，大月氏人那丰美的草场，以及垄断东西商道所带来的丰厚利益，都是他们不断通过战争方式试图占据河西之地的直接动力。当中央之国不再成为匈奴的威胁（甚至直接为匈奴人提供战略补给），河套之地又可以让匈奴人无限接近大月氏人时，大月氏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匈奴人对于河西走廊的占领，并非是通过一场战争完成的。经过之前对河西走廊的粗略分析，我们知道，这个板块其实是由相互独立的几块绿洲组成的。不过，最迟在公元 174，随着大月氏王在战争中为匈奴所杀，大月氏人就应该完全退出了河西走廊，并向西迁移。而匈奴人对河西走廊的完全占据，也极大影响了河西走廊两端的板块生存状态。一方面，完全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人可以在西、北两面对汉帝国形成半包围之势，极大地增加了汉帝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大月氏人的西迁，在西域乃至中亚板块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对于汉帝国来说，西域和中亚实在太过遥远了。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暂时并不会与中央之国发生任何关系。然而汉帝国却明显可以感觉到，匈奴人在占据河西之地后，对汉地的大规模侵袭愈演愈烈了，几乎达到了一年一次的密度。而在此之前，

基于和亲政策的实施，匈奴人一般只是在大灾之年才会集结兵力南侵，希望逼迫汉帝国提供更多额外的物资。

自白登之围之后，通过休养生息来积蓄力量，以期待最终与匈奴的决战，一直是汉帝国的战略指导方向。帝国对于北方边境所倾注的资源，是被动随着匈奴人的压力变化而变化的。至于匈奴人在游牧体系内部的整合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暂时并不是汉帝国所关心的。与之相比，汉帝国更关心的是内部那些诸侯能否真正融入中央集权体系，以让帝国的战车更顺畅的运转起来。只有当这一切整合工作都做得差不多，国力恢复到高峰期后，了解游牧体系内部的结构，看看有没有机会通过合纵连横一类的战术来更有效的打击匈奴，才会提上议事日程。

当经由“文景之治”，一切战略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到位，汉帝国开始迎来伟大的“汉武帝”时代时，针对游牧体系内部的分析工作终于受到了帝国中央的关注。而曾经作为匈奴强大对手的“大月氏”也第一次进入了帝国的视线，由此也拉开了汉帝国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

第六章 汉帝国对陇西高原的经营

第一节 陇西高原内部缺乏地缘中心

公元前 141 年，汉帝国历史上最为卓越的君王“汉武帝”，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领导者。此时的汉帝国，经过一甲子的休养生息，以及内部整合，已经具备了与匈奴决战的基础。不出意外的话，一雪白登之耻的战争将会在河套地区爆发。然而除了北出河套与匈奴一决高下的传统战略以外，帝国也在考虑新的战略方向。在中央之国已经非常成熟的“谋战”思路中，主动开辟第二战场，以让对手两面受敌的方法，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层面上，都曾经有过非常多的案例。在战略性层面上看，这种第二战场的开辟，往往是通过外交手段来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在对手侧后方寻求可能的盟友来做到的。而在战国时期，带着这类任务出访各国的外交家则被称之为“纵横家”。

与战国时期的情况不同，汉帝国如果也想针对潜在的盟友施展纵横术的话，他们需要面临很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些潜在的盟友们，不再是大家所熟悉的华夏诸侯，而是在文化上与匈奴人类似的游牧民族。而对于这些可能的联合对象，汉帝国所能得到的信息是非常少的。当中国历史上最为卓越的外交家——张骞，向汉武帝提出，他需要授权前往西域去寻找匈奴的另一个对手“大月氏”时，他所能掌握的信息仅仅只有两条：第一：大月氏人在匈奴人心目中，是仅次于汉帝国的第二大对手；第二：此时的大月氏人已经被匈奴击败，被迫离开他们世居的河西走廊，前往更为遥远的西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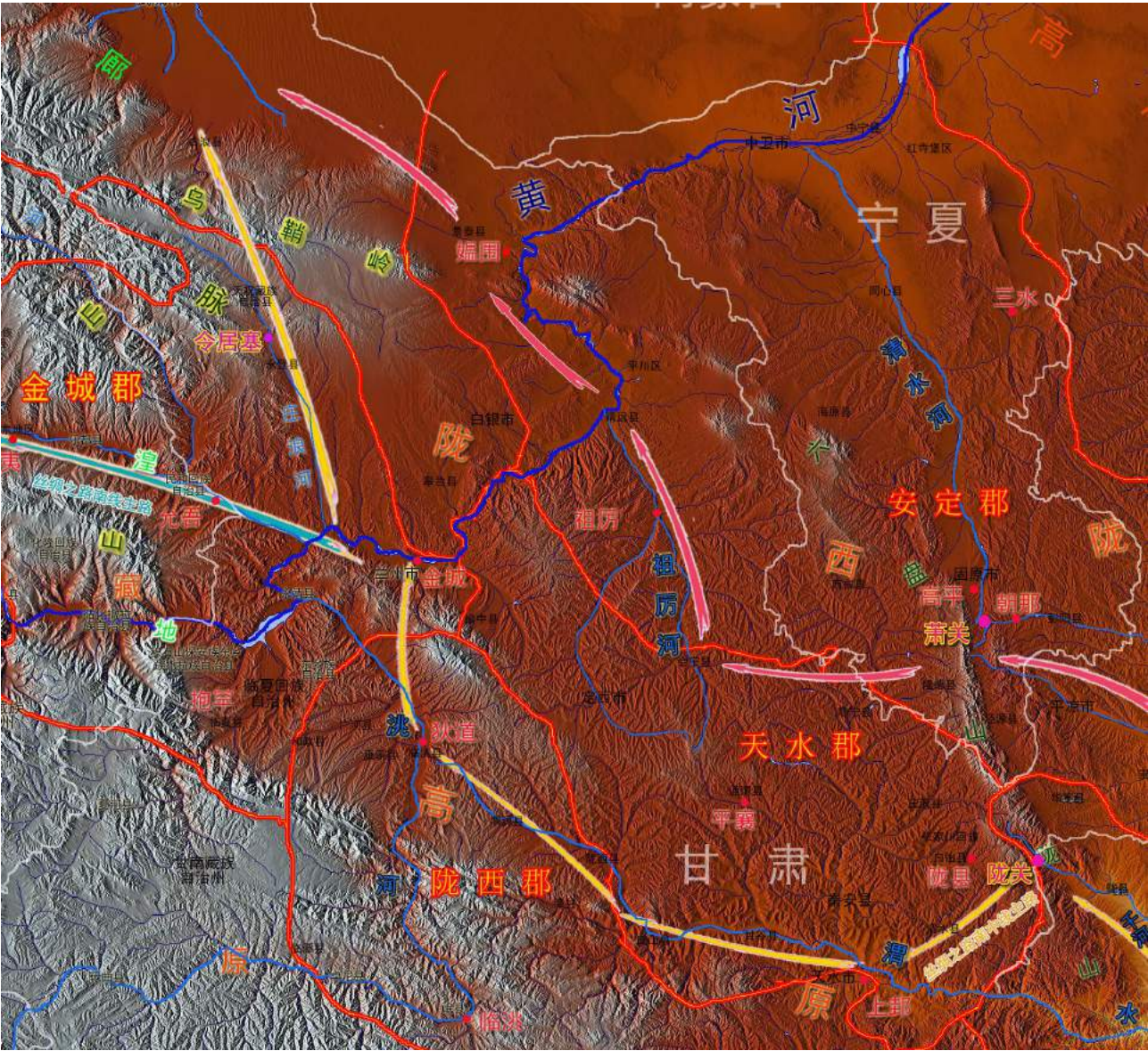
此时的西域，在汉帝国政治家的脑海中，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唯一让他们觉得华夏文明曾经触及过这个板块的事件，可能就是周穆王相会西王母的典故了。不过后面我们很快会分析到，这位集武功与浪漫主义色彩于一身的传奇天子，其实并没有跑那么远。他西游所去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华夏文明最初的发源地。

寄希望于从穆天子的传说中了解关于西方世界的情况，当然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够为帝国带来些信息的，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主要是战争）而留在汉帝国的“胡人”了。如果按照今天网络上所常见的非黑即白的划分，这些人可能要被归类为“胡奸”了。就像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匈奴服务过的人，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汉奸”一样。后来帮助张骞完成西域之旅，并唯一跟随他回到汉土的，就是这样一位“胡人”（堂邑父）。

如果不是匈奴人把游牧民族带入了帝国时代，并且开始从河西走廊威胁汉帝国的安危的话，华夏文明可以说对黄土地带以西的那片土地毫无兴趣。在华夏内部的博弈中，像华北平原这样面积庞大、土地平整，又黄土覆盖的利于耕种的土地，才

是争夺的焦点。对于他们来说，陇山以西的“陇西高原”，就是世界的尽头了。再往西去的话，只是上天留给那些戎狄之族容身的蛮荒之地。事实上，要不是在汉以前，建立帝国、王朝的是来自中央之国西部的周、秦两族的话，那些生活在中央之国东部的族群，很可能对了解陇山以西的地缘结构都没有什么兴趣。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央之国最终不会渗透到陇西高原，而是说因为周、秦两代的经营，特别是兴起于陇西高原的“秦人”将陇西高原经营为了“熟地”。后来的汉帝国，可以不再为和边缘民族争夺陇西高原而烦恼了。因为单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陇西高原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时间，并不一定会比东南丘陵地带更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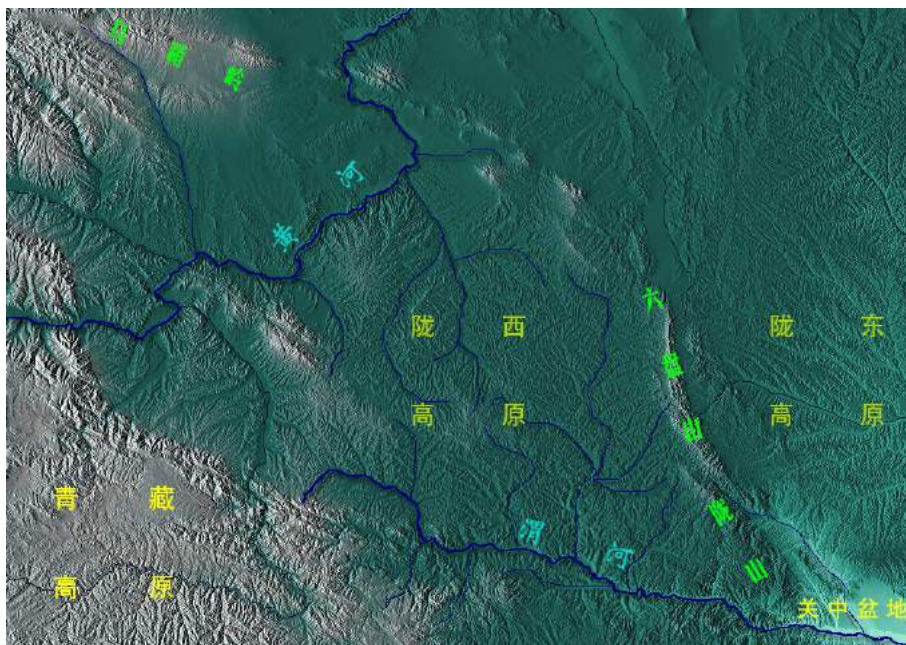


西汉陇西地区地缘结构图

不管怎么说，当汉帝国从秦帝国手中接过中央之国的领导权之后，陇西高原便已经作为帝国核心遗产的一部分被接收过来了。当西部压力开始加大时，这个在春

秋战国时代从来只是作为秦人后院存在，并没有机会成为博弈焦点的板块，终于有机会上升成为一线板块，并决定帝国的命运了。而“陇右”（陇西）这个地缘概念，也随之向西延伸了。

“陇右”这个概念在汉帝国的经营之下扩张到了什么程度，是我们后面所要解读的方向。我们现在要了解的，是秦帝国所控制之下的中央之国西部是什么结构。作为环绕关中盆地三大高原之一的“陇西高原”来说，它的内部结构其实要比陇东、陕北两大高原复杂得多。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地缘核心，你无法认定将政治中心设在哪里，才能够平衡的将控制力辐射到各个角落。以地缘规律而言，衡量一个地缘板块内部是否有足够向心力的重点，在于“水系”的分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缘板块内部主要是由一条大河水系所覆盖的话，那么在这个水系中、下流的某一个点上设立政治、经济中心是最常见，也是最自然的选择。像赣江流域的“南昌”、湘江流域的“长沙”，关中盆地的“西安”等城市，能够一直成为所在板块的政治中心，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陇西高原示意图

相比那些内部由单一水系组成的板块，在陇西高原寻找一个地缘中心，就比较令人头疼了。当然，从水系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认为陇西高原是处于同一水系所覆盖。因为所有的河流无论发源于何处，最终都汇入了黄河。而黄河本身也从板块的最西端滑过了。然而问题在于黄河实在太长了，它在

从黄土高原西端穿过之后，围着河套地区转了个“几”字形，又从中切割了黄土高原，并在关中盆地的东端再次转向东方，流入了华北平原。

这种怪异的走法，对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其中对于陇西高原的影响在于，作为陇西高原主要河流之一的“渭河”，并非像其他河流那样向北注入黄河上游河段。而是向东穿越“陇山”，贯穿整个关中盆地注入了黄河中游河段。也就是说，从陇西高原的角度来看，虽然所有的土地都可以算是黄河流域，但最起码渭水流域跟其他水系之间并没有互通的可能。

既然黄河在陇西高原实际上与渭水之间并没有发生关系，那么它在串联渭水流域以外的其他单元当中，有没有起到核心作用呢？情况也并不是那么乐观。由于黄河上游河段在陇西高原的位置过于边缘，在汉帝国与匈奴展开“河西之战”之前，它的存在只是作为帝国西部边境的一条天然分割线，成为隔离那些被挤压至黄河以西地区边缘民族的屏障。

在这种地理结构和政治背景的情况下，一个完整水系干流对内所应起到的互联、互通作用，就体现不出来了。而黄河东岸那些北流入“河”的支流，更像是浙闽丘陵那些“独流入海”的江河，彼此之间虽然因为相似的地貌特征、较短的地理距离，可以构成一个统一的地缘板块。但谁对谁更有控制力就不好说了，要想在竞争政治中心的博弈中取胜，取决于谁更有机会影响到黄河以西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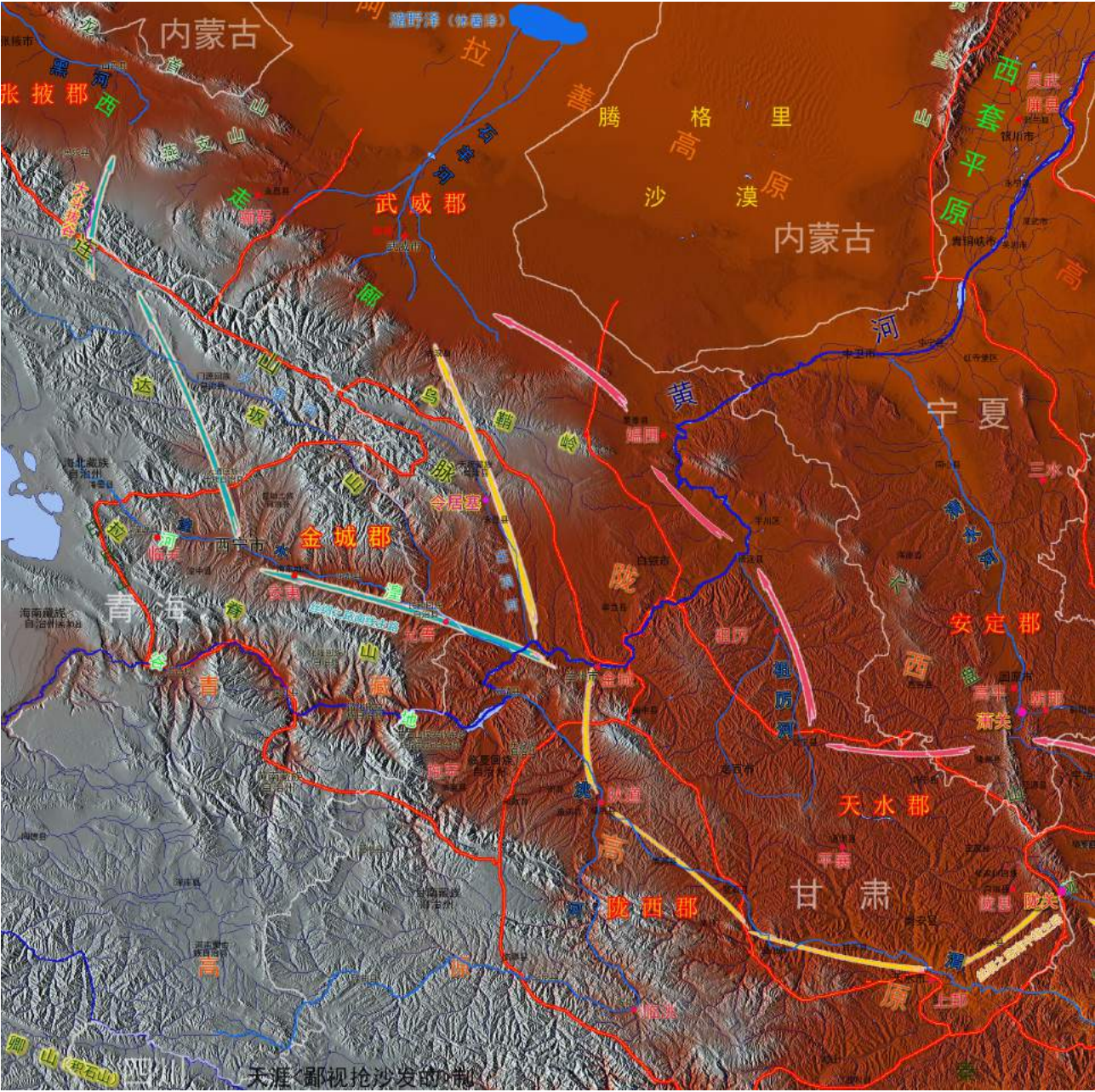
第二节 陇西高原与周边板块的地缘关系

既然陇西高原本身没有足够的向心力，需要从其与周边板块的关系中来寻找建制线索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看看围绕陇西高原的都有哪些地缘板块。而当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帝国的西部，这块曾经诞生过秦文化的土地上时，就会发现，除了与之隔陇山相望的，同属黄土高原体系的陇东高原、关中盆地以外，在其他方位所分布的地缘板块，在中央之国后来成熟的版图上也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最先为中央之国所熟悉的板块，是位于陇西高原之南的四川盆地。而事实上，陇西高原其实算不上四川盆地的邻居，因为二者之间横亘着山高林密，几无天然通道的“秦岭”。如果不是因为蜀人在成都平原的农业经营已经初具规模，沿“江”而下又可以从战略上对秦人的最大对手“楚人”构成致命威胁的话，相信秦人很难有兴趣在这个方向上有所作为。不过由于穿行秦岭的道路实在过于艰难，无论是秦人还是之后的诸帝国，在从渭河流域南望时，都会将秦岭之南，大巴山脉以北，介于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之间的“汉中盆地”，作为战略上的跳板，必先占之才会继续向南渗透（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而从陇西高原直通四川盆地的道路，如沿嘉陵江而下的“嘉陵道”，在战略上往往起到的就是辅助作用了。不过不管怎么说，中央之国能够成功将汉中、四川两盆地纳入版图，陇西、关中两个板块的共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缺失了任何一环，这种控制力都会被削弱。

关中、汉中、四川盆地，以及陇西高原四者的地缘关系，在秦征巴蜀的部分我们已经花过很长篇幅分析过了。如果再想在一些细节上深入的话，最好的历史阶段是在三国时期，六出祁山的诸葛亮会很完美的从战略、战术角度，为我们展现这几大板块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现在的话，汉帝国并不需要为这个方向的稳定而烦恼。刘邦获封“汉王”，并从汉中止兵的背景，让这个在文化属性上明显带有江淮楚地基因的帝国，在继承秦帝国西南版图的时候并没有特别障碍。

汉帝国和秦帝国治下的陇西高原，所面临的挑战其实都是来自西、北两个方向。在这个方位上，最先跳入到我们脑海中的，当然是“河西走廊”了。以地理结构来看，黄河并不是河西走廊与陇西高原的分割线。无论是秦人，还是汉人，在西渡黄河之后，还是能够在熟悉的黄土覆盖的台地上行走一段时间。直到一条祁连山脉东端所延伸出来的支脉——乌鞘岭出现在面前时，方才意味着即将走出黄河流域，进入河西走廊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河流的走向上加以识别。即乌鞘岭实际上是一道分水岭，岭东的河流都东南方向汇入了黄河，并最终将部分祁连山上的雪水带入大海。而相比之下，流入岭西的雪（雨）水就没那么幸运了，它们在滋养了河西走廊之后，最终只能消失在戈壁沙漠中。



西汉陇右地区地缘结构图



乌鞘岭

从地理分割的角度看，黄河与乌鞘岭都可以作为两个政治体的分割线。而在秦、汉两朝并没有试图在河西开拓时，黄河会更有机会成为中央之国与那些边缘民族的分割线。不过当中央之国准备西扩，并取得突破时，帝国的军事家们就会选择在乌鞘岭一线构筑类似长城的永久性工事，以将整个

陇西高原完整的留在帝国板块内了。最先帮助中央之国从陇西高原成功渗透过黄河的，是在中央之国的扩张之路上发挥过非常重要作用的名将“霍去病”。后面我们也会看到，他是如何在乌鞘岭东西留下自己的印记的。

第三节 大月氏未与汉帝国接触的原因

在匈奴人占据河西走廊之后，汉帝国很显然在这个方向承受了巨大压力。这也直接激发了汉帝国在河西走廊的后方寻求盟友的想法。然而让人有些不解的是，在大月氏人经营河西走廊时，却并没有对汉帝国造成过威胁。以至于直到他们被匈奴人逼迫，远走西域之后，帝国的统治者才从那些归顺的胡人口中，间接了解到关于月氏人的一些信息。事实上，在秦人统治时期，将陇西高原视为后院的他们，应该肯定是有过与大月氏人发生交集的。只不过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确定那些被笼统归为“戎”人的部族中，究竟哪一支才是大月氏人。

很多研究者也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究先秦文献中，到底有没有记录过大月氏人。比如有人就认为，曾经在陇东高原威胁过秦国后方的“义渠”就是大月氏。在被秦国吞并之后，义渠人被迫西迁，并在河西走廊定居。大月氏人在先秦时期与秦人的关系到底如何，已经很难考证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自然也可以去故纸堆里翻翻，看看能不能形成一套新的说法。事实上对于中央之国的其他群体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和记录这个西部边陲的部族。毕竟从地缘位置上来看，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至多只能影响到秦人的后院罢了。

而当大月氏人在河西走廊的经营卓有成效，并有可能以一个强大政权的姿态进入中央之国视线时（之间就算有小规模的冲突，也会被笼统的归于戎狄的袭扰），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也开始建立游牧帝国，并开始关注到河西走廊这片游牧体系

中的世外桃源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月氏人准备渡过黄河针对汉帝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话，显然是十分不明智的。毕竟从地缘关系，以及后来的历史来看，假如中央之国决心向河西走廊扩张的话，可是比漠北而来的游牧民族要有威胁得多（如果大月氏人真是先秦时与秦人博弈过的部落中的一支的话，应该对这一点更加了解）。

其实除了选择不与汉帝国为敌之外，大月氏人本来应该还有更好的选择来捍卫自己在河西走廊的领地的。那就是选择与汉帝国结盟，对抗共同的敌人“匈奴”。只是最终大月氏人并没有这样做，同样的，汉帝国也没有做这样的努力。这其实也并不难让人理解，两个在各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的文明体刚开始碰撞时，形成互信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就好像 19 世纪中叶的清帝国，在面对那些跨海而来的“洋”人时，一开始是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的交流，当中央之国的政治家们明白这些“洋人”彼此之间并非是一个共同体，也存在诸多差异和矛盾时，能够寻机施展“以夷制夷”手段的外交家，便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了。

假如继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是“胡服骑射”的赵人的话，熟知游牧民族习性的他们，也许会早一些尝试在游牧民族体系内施展纵横之术。不过就汉帝国来说，对越地的了解似乎要更多些，对越地诸王国之间的关系也介入更深。这其中，除了越系部落与华夏文明之间的渊源更深些以外，汉帝国楚地出身的背景，也同样在潜移默化的发生作用。

一个在王朝建立之初的一些战略规划，多少是会受帝国统治者和他所依附的政治、军事集团出身地的影响的。不过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影响在两三代之后就会被完全消化掉。如果不想失去整个帝国的统治权的话，他们坐天下的子孙们，就必须从整个中央之国的视角来规划帝国的结构以及战略方向了。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明帝国对都城的选择。在帝国草创之初，朱元璋曾经试图建都于他的家乡“凤阳”，以依靠帮助自己起家的江淮人士稳定帝国。但如果一定要把帝国的中心放在江淮的话，虎踞龙盘的“应天”（南京）无疑才是最佳选择，因此在凤阳城所营建的“中都”尚未完工就被完全放弃了。

当然，从中央之国的全局，以及所受的外部威胁来看，将政治中心放在江淮流域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不是后来采取硬突破上位的“燕王”朱棣将帝都迁到了北京的话，几乎可以肯定，“南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以及地位，应该有机会等同于“南宋”了。

就汉帝国的情况来看，一甲子的时间，已经足以让帝国的统治集团完全摆脱自己出身地的地缘背景影响了。长安城里的汉武帝，将要引领着汉帝国开始真正了解那些游牧之地的地缘结构了。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地缘板块，当然是我们一直在提的“河西走廊”了。从地缘关系上来看，也是陇西板块在西方所渗透的重点。而中央之国在这个方向上也成功的将自己的核心农业区，向西北方向延伸出了一个重要的突出部。然而实际上，中央之国在这个方向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河西走廊”，还有一

个在中央之国约束边缘地区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板块——河湟谷地。这个板块也同样是中央之国需要通过陇西高原渗透的地区。

对于以农为本，步步为营扩张的华夏文明来说，开发河湟谷地农业潜力的重要性，并不会比经营河西走廊那些绿洲要低。至于这其中的原因，以及河湟谷地的地缘结构，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分析方向。到时候，很多朋友感兴趣的“西王母”也会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第七章 河湟谷地地区的地缘结构

第一节 周穆王与湟水河谷的联系

就河湟谷地与黄土高原的地缘关系来说，文字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最早证据，可能就是之前所提到的那位穆天子了。在记录他事迹的《穆天子传》中，这位周王朝的第五代君主曾经展开过一次在后世之人看起来非常浪漫的西部之旅。这次旅程之所以让人觉得有浪漫的成分在里面，是因为据说他最终与一位叫做“西王母”的君主相会。当然，《穆天子传》中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俩见面后都做了些什么。只不过仅仅是因为双方的性别和身份，就足以让后世的文人遐想连篇了。相比被视为华夏正统君主世系一员的周穆王，那位居住在西方的王母，可发挥的创作空间显然要更大些。不用怀疑，我们现在经常在神话故事中所看到的那位一会开蟠桃会，一会又把牛郎、织女隔在天河两边的“王母”，就是源出这位“西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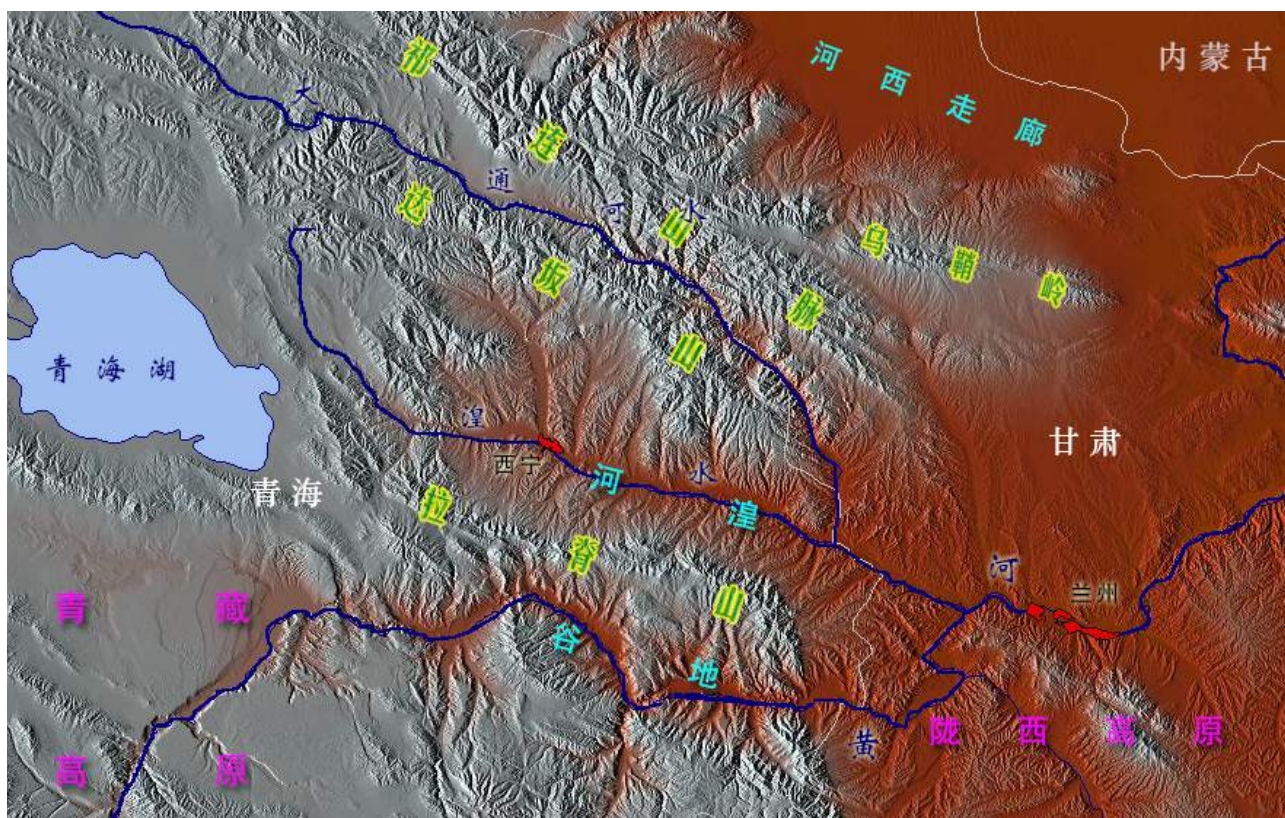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秦帝国为了更好的实行中央集权，曾经对先秦文化进行过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被后世总结为“焚书坑儒”的做法。幸运的是，秦王朝的存在时间够短，以至于在汉帝国草创之初，那些对先秦文化还有记忆，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来部分文献的知识分子们，便迫不及待的开始了先秦文化的恢复。这个过程甚至持续到了这些先秦遗民完全离世之后。像《穆天子传》的发现者，就身处西晋时期。并声称这部古书之所以能够躲过秦帝国焚书的大火，并在 500 年后面世，是因为它藏身于先秦古墓中。

很显然，中国历史上这场文化恢复运动，与后来所发生的因研究古罗马、希腊思想、艺术而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那些恢复记忆者当中也不可避免的会有人夹带私货，将一些自己的想法以及知识托古人之名展现在世人面前。在祖先崇拜盛行的中央之国，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像《穆天子传》这类文献，更由于它所记录周穆王游历的范围过大，近乎神话而倍受质疑。然而在人类早期的文字记录中，这种以事实为基础进行的夸大和臆想是普遍存在的。即使《穆天子传》被认定是伪书，它的面世也非常有可能有真实的传说作为背景。也就是说，在华夏文明的记忆中，这位天子确实曾经展开过一场对中央之国边缘的探险之旅。只不过很有可能没那么浪漫，是以战争的形式展开的罢了。

类似的问题在《史记》这部以严谨著称的史书中，也同样可以看到。我个人绝对相信，太史公在记录华夏上古文明时，没有进行再创作。但无疑，他也是相信那些带有神话色彩的记忆是真实发生过的。对于我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现这些离奇故事发生的真实背景，也就是说要把相对可靠的信息过滤出来。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周穆王这次西游的文化记忆中，最可靠的信息应该有两点，第一：他的

确以周王朝兴起的黄土高原为起点,进行过一次西部之旅(也许是战争,也许是结盟);第二:他最终会见的对象中,有一位女性首领。

这两点的存在,已经足以让我们从地缘的角度来进行一次推论了。即周穆王这次西行的终点到底在哪里?要是按照我们所常用的地缘板块分解法,即西王母所率领的部族到底生活在何方呢?历史上,对这一点曾经有过非常多的推论,其中最远的说法是在青藏高原西边缘的昆仑山。然而从当时的地缘结构,以及技术条件来看,周穆王显然没有机会跑那么远,并在当中穿越那些大漠、高寒之地。在陇西那些臣服于周王朝的部落陪同之下,沿黄河右岸的渭水、洮水等支流到达黄河,并在渡过黄河之后进入湟水河谷,是他最有可能做到的极限。如果在近几年流行的“名人故里争夺战”中,西王母故里也成为争夺焦点的话,位于湟水河谷西部起点处的“湟源县”,应该会更更有资格取得最终的胜利。



河湟谷地位置图

“湟水河谷”这个地缘标签,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感到很陌生。但提起青海省的省会“西宁”,知道的人应该会更多些。不错,西宁所处的地理单元,就是我们接下来所要解读的“河湟谷地”中的“湟水河谷”(另一部分,是一段黄河河谷)。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河湟谷地是隶属青藏高原的一个亚板块。也就是说,这片河谷地带是镶嵌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就像关中盆地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一样。在整个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中,河湟谷地起着类似于河套平原的作用。后者在中央之国核心

区与蒙古高原的博弈中，是至关重要的连接板块。谁占据了它，就意味着掌握了压制对方的地缘优势；而前者的位置也同样如此。只不过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农业民族在这个方向上所要面对的，是来自青藏高原的农牧民族罢了。

之所以说活跃于青藏高原板块的族群是“农牧民族”，是因为这个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地理单元，不仅地形、海拔独一无二，而且内部地理结构、气候复杂多变。因此除了大片不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的极限之地以外，适合游牧和种植业的区域交错存在。并不像古典时期的蒙古高原一样，基本就是游牧文化的天堂。在青藏高原内部这些适合种植农业生产的土地中，位于高原东部边缘，与黄土高原隔黄河相望的“河湟谷地”无疑是其中条件最好的。而它的地缘位置，也注定了中央之国有机会将之纳入核心区的范畴。



湟水谷地

前面我们也说了，包括穆天子在内的中央之国的旅行者，在由陇西高原出发，穿越黄河之后，他们的脚下仍将是黄土覆盖的台地。并且可以找到几条由祁连山方向流下来的黄河支流，为自己指引西行的道路和补给淡水。不过这种熟悉的感觉，很快就被一条叫作“乌鞘岭”的山岭阻断。因为越过这条祁连山支脉后，就进入

沙漠与绿洲相间的河西走廊了。而流淌在河西走廊的河流，就跟黄河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也意味着，你没有机会利用黄河水来打通连续的水上通道了）。不过，如果立志为汉帝国开拓西部领地的冒险家们愿意稍微改动下路线，将目光南移上点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在那片被很多人视为生命禁地的青藏高原边缘，湟水正在由河西走廊的南边静悄悄的流入黄河。

我们从《西汉陇西地区地缘结构图》上，就可以清晰的看见湟水河谷的存在。相比周边地区的其他河谷地带，湟水流域的河谷低地在纵深上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其干流和支流两侧因地质作用和河水冲积，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而又连接成串的小型盆地。其中最大的，就是位于湟水中游，现在青海省会西宁所在的“西宁盆地”。另外，面朝东南方向开口的河谷地形，也让湟水河谷有机会和黄土高原一样，同处于东南季风带的西端。这一切，都使得湟水河谷本身的地理、气候环境并不像它所处的青藏高原那样恶劣，反过来却与黄土高原有着诸多共同点。

第二节 汉代时羌人经营湟水河谷

最先发现湟水河谷的小环境适合农业生产的，并不是那位穆天子或者来自汉帝国的探险家或者移民。在汉帝国开始关注这一区域之前，这个由一连串小型河谷、盆地串联组成的低地带，是由一个叫作“羌”的族群所占据。在华夷五方的命名和先秦的文献记载中，这一与华夏民族有着很深亲缘关系的族群，一般是被归类于“西戎”阵营。所谓“西戎牧羊人”就是他们地缘特点的最好诠释。从华夏民族的起源来看，应该就是从那些生存在黄土高原西部的牧羊人中分离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们当中最先进入农业社会，并开始向东寻找耕地的部落成为华夏民族最初的来源。当然，如果就此认定现在的“羌”族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也是错误的，就好像说人类的祖先是猴子一样，也是不客观的。准确定义是大家拥有共同的祖先，只是由于在某一历史时期因地缘选择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变成不同的民族罢了。相比那些因开发关中平原农业潜力，而在实力上发生质的飞跃的华夏系民族而言，仍然选择生活在高原之上坚持以牧业为主的“戎”族，在人口和技术上的差距就越拉越大了。

整个周、秦两代在黄土高原西部，包括陕北、陇东、陇西高原的经营，实际上就是融合这些表亲的过程。在西周阶段，曾经有无数被标注为“戎”的部落被主动或被动的迁往东部，并最终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像我们所熟悉的建立齐国的姜子牙，就是出身于一支与周王室所属部族关系密切的戎族“姜戎”。与周人相比，因强大的中央集权机器而得天下的秦人，对于黄土高原剩余戎部的融合就要彻底得多了。当秦帝国得以建立起来时，那些戎狄部落在黄土高原留下的更多只是一些地名了。而那些拒绝成为华夏文明一部分的戎族，能够选择的就是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相接之处，寻找一片条件相对较好的土地，以继续自己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

当汉帝国准备在秦霸西戎的基础上继续向西扩张时，“羌”字已经取代“戎”成为这些表亲的地缘标签了。我们现在所重要解读的湟水流域，就是羌系部族所控地域的核心区。实际上，作为与黄土高原紧密相连、地理相似，而又独立存在的“湟水流域”，与华夏文明渊源远不止成为羌人之地时期。因为人种学与语言学，已经证明了“羌”族并非唯一与汉族有着极深亲缘关系的民族。

另一个生活在青藏高原腹地的民族——藏族，也与现在我们所说的汉、羌两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青藏高原的原始藏族与黄土高原的原始汉族之间存在一个地缘连接点的话，那么湟水流域无疑是最有可能承担这个使命的。而被汉、藏两族挤压至青藏高原边缘的“羌”族，也更像是二者之间的过渡者。在历史上，羌系部族的命运也正像他们所处的地缘位置一样，在青藏、黄土两大高原的挤压之下，人口、文化被汉、藏两族不断的吸收、融合。以至于现在中华民族的序列中，能够继承这笔文化遗产的人口仅仅只有三十万之数罢了。

不管汉、羌、藏三族是怎样一个分化过程，湟水谷地的地缘枢纽作用都是十分明显的。我个人一直有个观点，从语言的角度看，同属汉藏语系的“汉语族”、“藏缅语族”也许就是在走出湟水河谷后，开始在不同的地理单元各自发展的。也就是说，湟水河谷很可能是汉藏语系诸民族共同的祖先的形成地。当然，这个地缘上的推测几乎是无法验证的，因为当时语言是不可能有载体保留下来的。不过，就湟水流域在连接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中所起的地缘作用来说，我们在今后的解读中却有足够的历史来进行验证。

第三节 河湟谷地的范围及其重要价值

与关中平原这样的大块冲积平原相比，湟水河谷的体量是很不起眼的。湟水以及它的支流并没有能力形成连片平原，只能在河流的两岸形成一些相对独立的河谷平原。这样的体量放在沃野千里的华北平原旁边，估计是没有机会成为一个一级地缘板块的。也正因为如此，在汉帝国决心向西扩张，以减轻来自匈奴的北方压力之前，湟水河谷并没有成为关中各政治体心目中必征的对象。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湟水河谷并非生成在那些并不缺少农业用地的地理单元，而是隶属于极限之地的青藏高原。在这种背景下，有这样一条类似黄土高原农业条件的河谷向西延伸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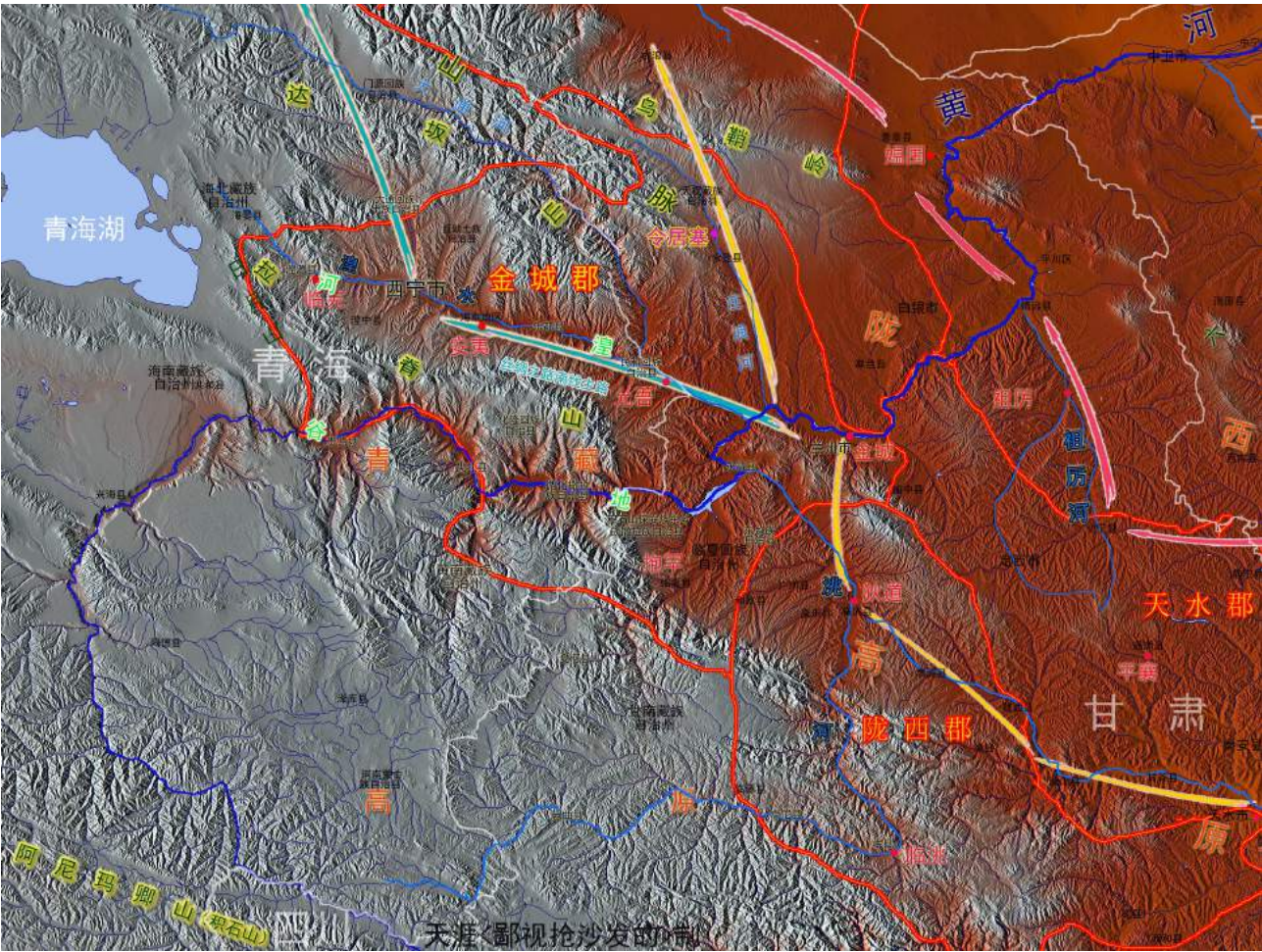
仅从一个数据——人口数量就可以看出，湟水河谷在青藏高原的重要性。我们知道，除掉被新疆、四川、甘肃等省份分割掉的部分边缘区域，青藏高原的大部分是被西藏和青海两个省级行政区所分割掉的。其中位置靠近中央之国核心区的青海，人口数量要更多些，约为 560 万；而西藏人口则正好是青海人口的一半，约 280 万。这其中湟水谷地的面积在青海省的比例不过 2.2%，放大到整个青藏高原的基数上，更是不足 1%。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体量，却拥有青海省 55% 的耕地面积，将近 60% 的人口。也就是说，仅一条湟水河谷的人口数量，就超过了整个西藏。

在英国皇家空军奇迹般的抵御住纳粹空军的猛烈攻击，避免英国本土沦陷后。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话“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做出过这么大的贡献”。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套用在湟水谷地之于中央之国的地缘作用上也同样适用：“在中央之国的形成过程中，从来没有这么小体量的地缘板块，对中央之国渗透、控制这么大的地理单元做出过这么大的贡献”。

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她的幸运来自于，湟水河谷并非独立存在于青藏高原腹地，而是与黄土高原紧密相连。黄河之于二者之间，更像是一条使之联系更为紧密的纽带，而非一条地理分割线。在汉帝国开始研究这个渗透青藏高原的前进基地之前，居住于湟水河谷与陇西高原的居民，就已经通过水运沟通而关系密切了。只不过，这种交流中的重要载体，并非是我们常见的木制船舶，而很有可能是更有地缘特色的“羊

皮筏子”。仅仅是在上世纪初，那些操弄皮筏的“筏子客”还经常顺湟水而下，与陇西、河套地区进行商业交易。那时候充沛的河水，使得从西宁到宁夏的水上运输线毫无障碍。相比之下，在河西走廊与黄河流域的交往当中，就无法利用到“水运”这种量价比最高的运输手段了。

湟水河谷（湟水谷地）并非是中央之国在这个方向上，唯一有可能强力渗透的地理单元。不要忘了，湟水河谷是一个更大的地理单元——河湟谷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湟水河谷的旁边，最起码还有一段黄河谷地有着类似的地理条件。从地理结构上看，一条支流与干流基本都是呈“丁”字相交的。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湟、河相汇处的黄河上下游地区都是“河湟谷地”的一部分呢？



西汉陇右地区地缘结构图

答案并不是这样的。包含在河湟谷地这个地理单元中的黄河谷地，仅指的是湟、河交汇点上游的一段黄河河谷，而包含这个点在内的下游河谷，则隶属于陇西黄土高原板块了。细分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被归入“河湟谷地”的那部分黄河河谷和湟水河谷一样，是在青藏高原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也就是说，无论从内部地理环境，还是周边山地的状态来看，“河湟谷地”都更容易形成类似的地缘特色。假如你的

手边没有大比例的地形图，而只有一般的行政地图的话，要想认定河湟谷地的范围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它与陇西高原的地缘分割线，就是青海省省界的最东端。在青海省会西宁与甘肃省会兰州之间，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条带有地缘分割性质的行政分割线。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巧”，我只能说，这就是“地缘”的力量。

在行政地图上找到河湟谷地的西部边界，也并不困难。在青藏高原东部最显眼的地理特征——“青海湖”的东边，我们可以沿湟水一直向东，依次找到海晏、湟源、湟中、大通、西宁、互助、乐都、民和八个县市；而在湟水之南的黄河两岸，与湟水相对应的区域里，贵德、尖扎、化隆、循化四县，则基本覆盖了青海境内能够适合开发为耕地的所有的黄河谷地了。加上这段黄河谷地，整个河湟谷地能够占据青海省的耕地、人口数量都超过八成了。说一句“得河湟者得青海”并不为过。

有一些资料将河湟谷地描述为一个由黄河、湟水包夹而成的三角洲地带，但实际上这种在低地区经常见到的地理形态并不存在。即使是在河、湟相汇的甘肃省永靖县，你也几乎找不到这种三角洲平原的影子。事实上，河、湟两水能够在青藏高原东部冲出两条稍具规模的河谷已是相当不易，要想冲蚀掉河、湟之间的分水岭——拉脊山，估计要等到人类灭亡那一天了。也就是说，河湟谷地其实是两条呈线性排列，又相对独立的农业带。

不仅如此，而且由于河谷的横切面宽度有限，周边山地又过于强势。每一个今天能够成为县市级行政中心所在地的河谷，都可以看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点。这种地理结构使得河湟谷地内部的地缘特色，并非以统一的面目出现。一些古典时期的边缘民族在向华夏文明学习农耕技巧的同时，依然有机会保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现在现在“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中华民族体系中，就是覆盖河湟谷地的十四个县市中，有五个是民族自治县（分别是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陇西高原与河湟谷地密切的地缘关系，也可以从这两个地区民族自治县的分布当中看出一二。在陇西高原西南部的甘肃省境内，与河湟谷地的“河”谷相连处（黄河南岸），你一样会看到相似的民族自治地区——临夏回族自治州。而在这个自治州所辖的县级行政区内，又夹杂有“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这种因复杂地理结构而出现族群相杂的地缘结构，也正是两千多年前汉帝国西境地缘结构的轮回。

当然，这些民族自治地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央之国对这一板块的控制力会减弱，只是出于在大板块相接地带的一种地缘现象吧。同样的，基于大的地缘背景（如共同的气候、生产方式），板块、民族之间相互交融的情况会更多。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的和“沙县小吃”东西对立的小吃网络——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兰州拉面”店，其实并不是发明这种小吃的兰州人建立的，而是由那些走出河湟谷地民族地带的居民所开（像沙县小吃一样，政府当然起了主

导作用)。只不过最近不知道是兰州方面还是青海方面的版权意识加强了,我见到有一些“兰州拉面”店已经更名为“高原拉面”了。

来自汉帝国的探险家们在经行兰州进入湟水河谷时,应该还没有机会品尝任何一方所做的“拉面”。不过他们此行除了验证湟水河谷的农业潜力以外,很有可能还承担着另一项政治任务,那就是寻找中央之国的西部地理边界。在华夏文化“海中地”的地理观中,这一边界是用“海”来标定的。就湟水河谷所处的方位来说,如果存在这样一片“海”的话,那就是“西海”了。仅仅是在湟水流域寻找,这些东来的旅行者一定会感到失望,因为整个湟水流域并没有一片水域在体量上有“海”的潜质。不过当他们沿着湟水上溯到它的源头处时,就离成功不远了。因为他们再往前走一点,很快就真的可以看见一片“海”了,这片青色之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青海湖”。



河湟谷地示意图

在现在的藏文化中,青海是笼罩着宗教光环的圣湖。不过在中央之国的地理格局中,它很早就开始承担着另一项重要的地缘任务,那就是为华夏之地标定西部的极限。由此,青海湖这个高原盐湖也荣幸的得到“西海”的标签。事实上,如果汉帝国有意寻找西海之地的

话,他们很可能并不是盲目的把目标指向湟水河谷以西。那些口口相传的带有神话色彩的文化记忆,足以为帝国指明方向。唯一难以确定的是,华夏文明到底是从什么开始认为青海湖是自己对西部认知的边缘。假定湟水河谷真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的话,那么这种认知就很有可能上溯到一个非常久远的年代了。

有可能记录这种记忆的最早的文字,除了那部被认为性质在神话传说与地理文献之间摇摆的《山海经》之外(西海之名,最早见于山海经),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穆天子传》了。对于源自黄土高原的周人来说,如果他们在成为天下共主,并在东部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后,希望回到自己文化记忆中的起源地来一次寻根之旅的话,应该并不意外,就好像现在的西方人非常热衷于寻找诺亚方舟最终停靠的地

点一样。“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人类共同的疑问，对于家国天下的华夏文明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按照这个思路接下去推理的话，已经进化为父系文明的周人在到达湟水河谷之后，看到的是还处在母系氏族阶段的由“西王母”领导的部族，也是符合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的。只不过在后世闷骚文人加工的神话故事中，“西王母”变身成为一位女性神祇，甚至最终成为玉皇大帝的另一半。而为华夏文明标定西部极限的“西海”，也香艳的变成了西王母洗浴的“瑶池”了。



青海湖

湟水河谷一带能够承载华夏文明记忆的地理标签并不止于西海，事实上在华夏文化当中有着更高、更神圣地位的一个符号——昆仑，也应该源自于此。我们知道，在大部分的人类文明中，都会有一座代表自己对相关板块控制权的“圣山”存在，华夏文明也不例外。用五岳来标定华夏文明区的框架，只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罢了。在上古文明中，“昆仑山”才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地标所在。

而这样一座华夏圣山，却并非是我们今天在地图上所看到的纵横于青藏高原西北部边缘，为西域盆地西南边缘滋养绿洲的“昆仑山脉”。这样一个标注，其实只是汉武帝为了坐实帝国对西域的统治，而刻意玩弄的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移花接木之术罢了。就好像为了适应华夏核心区向南北两个方向的扩张，五岳之中的南、北两岳都曾经变换过位置一样。实际上，如果古昆仑山是以一个点，也就是山峰的形式存在的话，那它最有可能存在的地方就是横亘于湟水河谷之北的“达坂山”。具体的说，就是最有可能存在于达坂山的东端那部分与湟水最接近的山体中。在所附的《西汉陇西地区地缘结构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的在青海、甘肃省界与湟水包夹的夹角之间，看到这段山体的存在（也就是我标注“金城郡”的位置）。

对于最初生存在湟水河谷的华夏先民来说，昆仑山既是他们生存之地的东大门，又是他们以后走出湟水河谷后，在陇西高原都可以回望到的“圣山”。至于说到底是哪个点，就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了。只能说，如果现在有多地来争夺带有华夏圣山地位的“昆仑山”标签的话，出自湟水河谷的竞争者应该是最有地缘基础的（有资料表明，西宁以东，湟水中游的青海省乐都县，最迟在上世纪初，已经在自己的行政区内开始建筑有关“昆仑山”的地标建筑了）。

第四节 湟水较大通河更具地缘价值

尽管湟水河谷在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大家现在在一般比例的行政地图上很可能看不到它。取而代之的，是一条位置与之相邻的河流——大通河。其实位于湟水之北，以“达坂山”为二者之间分水岭的“大通河”，与湟水属于同一水系。二者在达坂山东合流之后，共同汇入黄河。也就是说，整个水系既可以称之为“湟水水系”，也可以称之为“大通河水系”。关键就看用什么标准来界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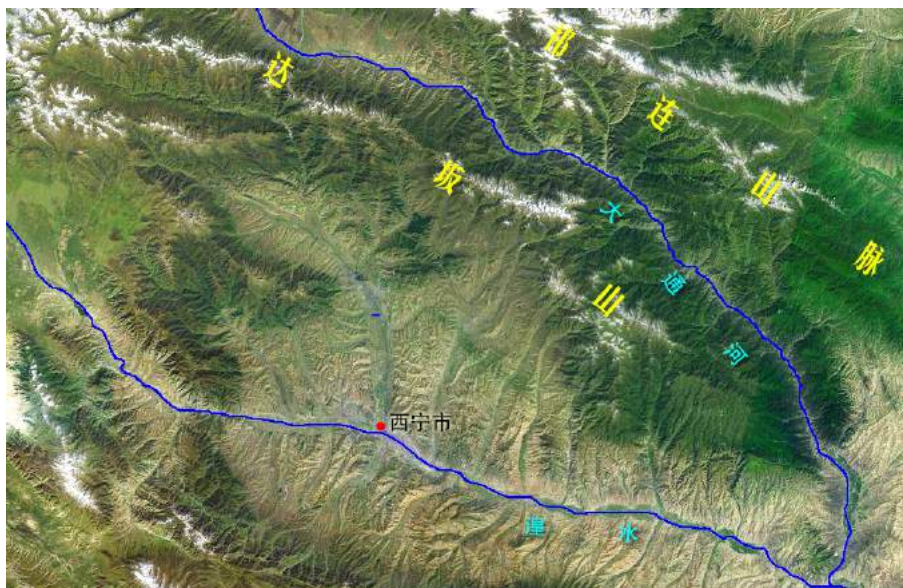
从历史以及地缘结构的角度看，湟水河谷的地位无疑是要远高于大通河谷的。相比湟水河谷近似于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大通河谷的地理、气候条件就呈现出青藏高原的特点了。河之南的达坂山，以及河之北的冷龙岭，并没有给大通河留下太多横向发展的空间。除了部分河谷地段发育出了些许河谷平原能够用于农耕之外，大部分的河谷显得深、窄，呈峡谷结构。这种地理结构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大通河流域水势湍急，下切力强的水流状态，同样也使得在大通河上通航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古典时期，一条河流既不能提供成规模的冲积平原用于农耕，又不能成为水路交通的重要载体，那它的地缘价值无疑就被大大压缩了。

当然，大通河流域对于人类来说也并非一无是处。只不过在古典时期，大通河流域的森林、草场，更多吸引的是从事牧业的边缘部落罢了。而在工业化之后，像大通河这种水资源丰富、有足够落差的河流，又有机会以一种新的方式为人类提供资源了。那就是通过兴修水电站，为人类提供电力。不过大通河能够在干、支之名的争夺战中胜过湟水，并非是因为它现在能够奉献更多的资源。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按照现在划定流域干、支的标准，一般是取长或取量。也就是说，一个水系中上游中最长或水量最大的那条支流，一般会被认定为干流。很不幸的是，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作为青海省毫无疑问地缘中心的“湟水”，无论是在长度还是流量上，都比不过它北面的大通河。所以在按照相关技术人员制定的标准下，大通河替代了湟水，出现在那些只标注干流的低精度地图上。

如果从地理的标准来看，这种做法并无可厚非。问题是，一张地图所显示的并

非只是地理结构，而是包含人类存在信息的“地缘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以地理标准而把湟水这样一条极其重要的河流，从地图上抹掉是不可接受的。这样的话，不仅会让人无法直观认识到湟水河谷的存在，亦会对一些朋友造成认知上的困惑，那就是：为什么西宁作为青海的省会，却没有处在一条大河之侧，而它北面被明显标注出来的“大通河”，边上却没有什麼重要城市？



湟水与大通河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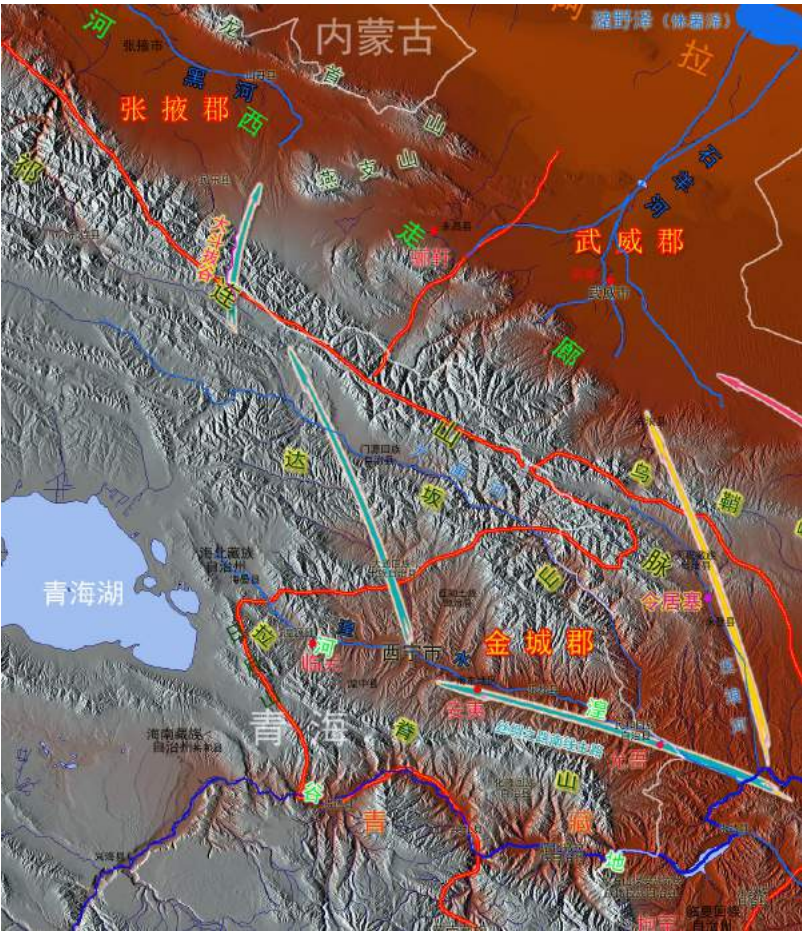
在地理标准和地缘标准之间找到平衡点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并不难，那就是将湟水和大通河作为两条单独的河流分别标注，并加以研究。这种认知，其实也是千百年来居住在达坂山南北的居民共同的认知。也就是说，这两条河流在汇入黄河之前曾经出现的短暂合流，并不应当也不会

会让人认为它们应该被归入同一地缘板块。真正能和湟水河谷放在一起研究的，是之前我们解读的南边那段黄河河谷。

说到大通河与湟水的干、支流之争，之所以会为“湟水”鸣不平，是因为这条河流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即使不考虑它与华夏上古文明之间的关系，仅从政治角度来看待中央之国的形成问题，我们也能够从湟水河谷的地理位置推测出，如果中央之国想进一步渗透青藏高原腹地的话，湟水河谷将会是二者之间的必经之路。不过这样一条贯穿整个青海高原核心地带，由关中（长安所在地）直达青藏高原南部地缘中心——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所在地）的通道，正式为中央之国所知晓，要等到下一个强大帝国“唐”的出现了。那时候，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部族正处在“事业的巅峰期”，强大的吐蕃王朝史无前例的完成了青藏高原的统一工作。所以这条连接两大地缘板块的通道，被称之为“唐蕃古道”。而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文成公主”了。

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在我们所吸收的历史知识里，经常会提到一些道路的开辟。然而这种道路的开辟，仅仅从官方角度来考虑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官道”。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一条重要官道的产生，是不需要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来做到的。即使是史家把开辟东西方交通大动脉的功绩，完全归功于张骞“凿空”西域，我们

依然可以看出张骞在整个行程中，其实是在对已存在道路的一种考察。从这个角度来说，贯穿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通线也并非出现在唐代。最起码，藏族的先民应该很早就利用这条交通线渗透到了青藏高原的南部。



西汉陇西地区地缘结构图



湟水河谷

虽然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华夏文明已经融合了诸多边缘文化，占据了足够多的地理单元，并成为这个地球上最重要的地缘板块之一。但总的来说，华夏文明是一个缺乏主动扩张力的文明。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爱好和平”。在经由夏、商、周、秦四代之后，华夏文明终于基本完整的控制了地球上农业基础最好，面积最大的东亚核心区。此后中央之国的历史，也开始推进到了王朝循环的怪圈之中。农业文明所带来的对土地的强烈依附感，以及尽得天下可用之土的优越感，都使得华夏文明如果不是承受到了特别的压力，是很难再有向外扩张欲望的。对于汉帝国来说，最终扩张到河湟谷地这个青藏高原的突出部，也决非看中了这个板块当中那对于羌、戎来说弥足珍贵的农耕之土。真正让汉帝国对河湟谷地感兴趣的原因，是帝国对这个板块的经营，有助于帮助稳定河西这条脆弱的走廊地带。

河西走廊的价值，无疑是体现在连通西域的枢纽位置上。相对充裕的水资源，使得汉帝国在从匈奴手中夺取这块战略要地后有基础移民实边，将其经营成一块有

自给能力的战略级板块（而不仅仅只能提供战术通道）。然而这条通道实在太过狭窄了，仅仅依靠来自陇西高原的战略支援，就想要将其稳定的留在中央之国的版图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以及来自青藏高原的农牧民族，都有可能凭借他们强大的机动性，从中原王朝手中夺取河西走廊的控制权。

要想缓解来自蒙古高原的压力，尽量延伸在额济纳河、石羊河下游的控制权是唯一的选择。占据这两个绿色突出部的意义，不仅在于把防线推进到了阿拉善戈壁的腹地，更在于让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在漠南缺乏向河西走廊渗透的跳板。这也是现在甘肃为什么在中部有两个凸起的地缘原因。在华夏文明对河西走廊长达两千多年的经营史上，河西走廊的耕地已经沿着两河稳定的渗透入了戈壁之中。河西走廊的北线已经依靠祁连山的恩赐而得到了两个缓冲点，那么南线呢？自然就只能靠农耕文明最有可能渗透的“湟水河谷”了。那么湟水河谷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与河西走廊发生地缘关系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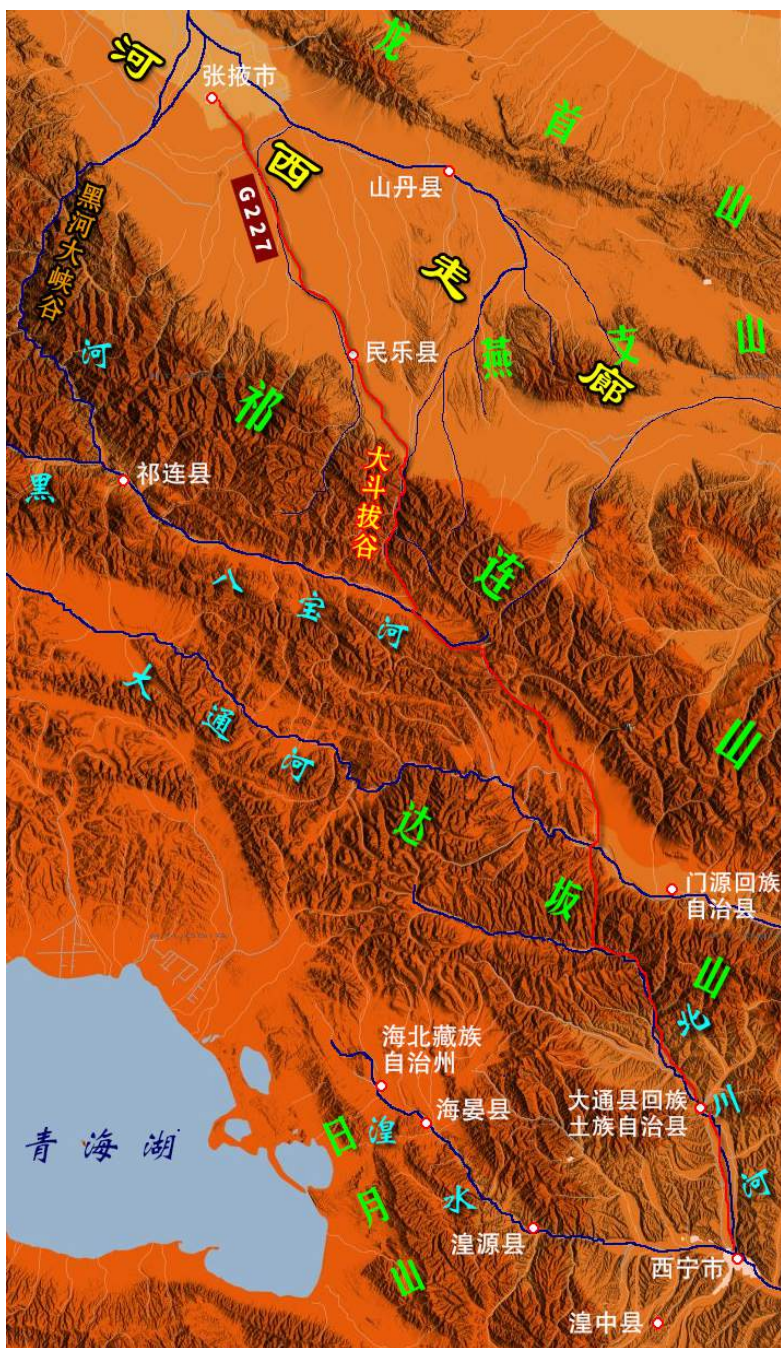
第五节 湟水河谷连接河西走廊的通道

对于试图从河湟谷地穿越祁连山脉到河西走廊的中央之国旅行者来说，他们并不需要走到湟水的源头再开始转而向北。由祁连山脉自北向南注入湟水的那些黄河“二级支流”，可以提供多种选择（湟水是一级支流）。而从地缘结构来看，从湟水中游最大的河谷盆地——西宁盆地，转而向北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沿着这样的路径修筑官道的话，不仅可以打通河西和河湟之间的通道，更可以将湟水河谷的地缘中心串联起来。

稍具规模的河谷盆地，一般都是由两条以上河流所共同冲积出的三角洲平原。西宁盆地的情况也不例外。为西宁盆地带来部分土壤，以及提供北向天然通道的河流叫作“北川河”。沿着它向西北方向前行，经过北川河谷的地缘中心“大通县”（回族土族自治县）后，旅行者就将要翻越达坂山，步出湟水谷地的地理范围了。比较有意思的是，尽管大通县与大通河位置相邻，但其实并不属于大通河流域（如果把大通河与湟水视为两条独立河流的话），只有在翻越达坂山之后，我们才会看到真正的大通河谷。在跨越这道分水岭之后，旅行者将看到整个大通河流域中，地势最平坦、南北纵深最宽、最具农业潜力的一段河谷。现在建制于此的行政区是“门源县”（回族自治县），当年那些为游牧民族所钟爱的草场，大部分已经被开耕为油菜田了。在汉帝国开拓西方领地的时候，大通河被叫作“浩门河”，所以这段河谷平原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狭义的“浩门河谷”，或者“门源盆地”。

与青藏高原众多世界级的高大山脉相比，翻越达坂山这样体量山脉的难度，可以说是很低了。尤其是在它的南北还有地理环境不错的北川河谷和浩门河谷，作为战略补给地。不过接下来的行程，相对来说就要艰难些了。因为在到达河西走廊之前，

祁连山这座横贯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高大山脉是没有办法绕过的。如果按照一般规律循河开路的话，旅行者们在北出“浩门河谷”后，倒是可以很快在祁连山腹地看到一条自东向西叫作“八宝河”的河流。



大斗拔谷位置图

不过考虑到很快就要面对的大漠戈壁，还是好好珍惜这段旅程吧。

既然八宝河最终的归宿是河西走廊的黑河，那么它就不可能一直西流了，而是需要找一个合适的缺口穿越祁连山脉。而这个缺口的位置也正是旅行者在此段旅程中最为关心的。在现在的行政版图上，我们可以在八宝河的下游位置（即在与其它河

我相信，除了当地人以外，很少有人会知道这样一条带着吉祥色彩的河流。然而当我们在地图上顺流而下，看看它究竟汇入了哪条更大的河流时，很快就会有惊喜的发现了——原来“八宝河”就是我们之前重点解读的“黑河”的上游支流（之一）。这样看来，如果顺着八宝河而下，旅行者们很快就能够到达河西走廊的地理中心——黑河（额济纳河）绿洲了。

以八宝河谷的地理、气候条件来说，并不适合像浩门河谷、湟水谷地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农耕生产。千百年来，藏羊和藏牦牛才是这片土地的主角。不过对于高原旅行者来说，有相对平坦的河谷提供天然道路，以及充足的淡水补给，已是相当幸福的事情了。如果沿路放牧的土著部落足够友好的话，旅行者在祁连山腹地的这段行程应该会更加惬意。也许对于很多生长在人口密集的农业区的人来说，这样的旅程仍然会觉得艰苦，

流合流共同穿越祁连山之前)看到一个叫作“祁连县”的行政建制。而在两千多年前,这样一片牧草丰美之地是属于羌人的领地。只是来自汉帝国的旅行者在到达八宝河下游,也就是祁连县城所在地之前,很可能就从羌人口中得知,他们的这段旅程除了能够饱览祁连山腹地的自然风光外,于进入河西走廊这个目标来说,并没有任何帮助。



门源油菜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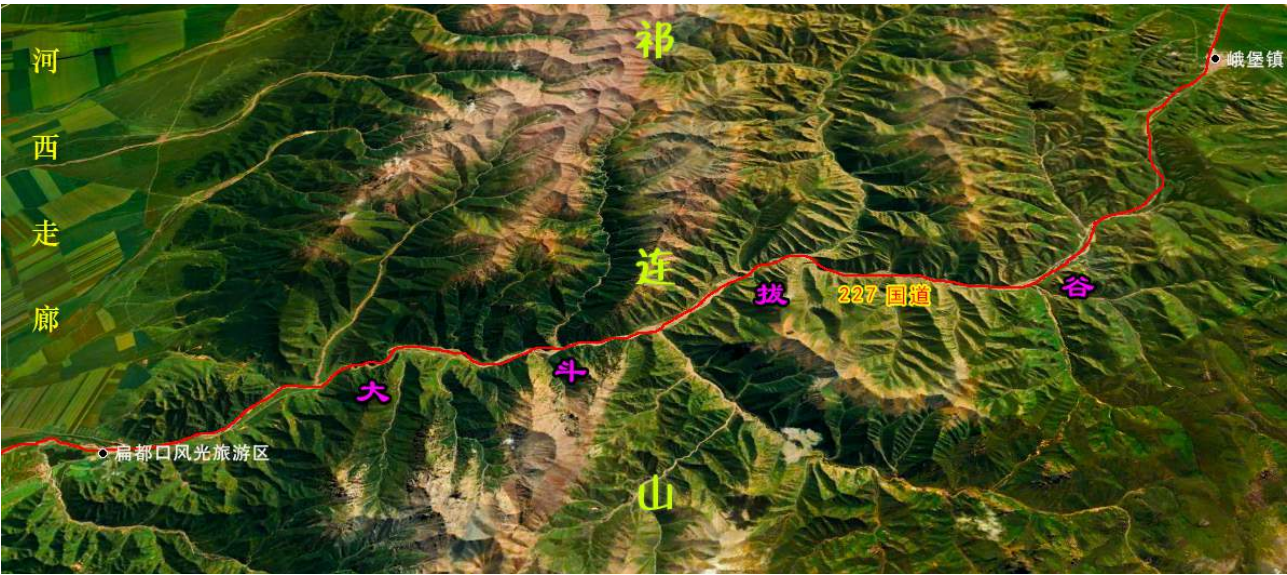
黑河大峡谷

因为八宝河与其他黑河上游支流,所要穿越的这段祁连山脉是整个山脉当中最“厚”的一段。这样“厚”的山体,加上这样大的水流(数流合一),最有可能呈现在旅行者面前的就是峡谷地形了。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这段以黑河为名,被标注为“黑河大峡谷”的谷地,绝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合人类生活与穿行。水电开发,以及开展水上漂流等旅游项目,才是当地政府推动GDP增长时所可能挖掘的潜力。至于古典时期,就只能算是一道天险了。

像黑河大峡谷这种不能被利用的自然通道,在中央之国核心区其实也很常见。就像在人类可以利用隧道、高架技术修筑道路之前,那条貌似最近的,切割陇西高原与关中盆地的“渭水河谷”,也并没有成为二者之间当然的联系纽带。在陇山中段经陇关绕行一下,才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这样虽然会拉长些行程,但相比在那些山高水急的山间峡谷中穿行,还是值得的。不过要想穿越祁连山的话,这样的冤枉路倒是可以不走。事实上单从山脉“厚”度的角度来看,八宝河上游才是最佳的穿越地点。

尽管从哪怕较薄的山体中穿越祁连山脉,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所谓路是人走出来的,在这个地球上,几乎没有地理相连的两个地理单元之间是没有通道的。

所不同的，无非是道路是否通畅，是否有天然通道可以利用罢了。从八宝河上游穿越祁连山的通道也不例外。和绝大部分穿越山脉的通道一样，它也是利于了一段天然谷地，史称“大斗拔谷”。



大斗拔谷卫星图



大斗拔谷

与那些宽敞的河谷通道相比，大斗拔谷的情况其实也并不尽如人意。最窄处仅十余米的宽度，以及两侧海拔达五千米的高山地形，都使得这条穿行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风险。在历史上，为这种风险付出最大代价的，当属那位“臭名昭著”的隋炀帝了。尽管我们认识这位短命皇帝，更多的是因为他那些被唐帝国所渲染的荒淫之举。但事实上，如果隋朝能够成就百年基业的话，这位隋朝的第二代君主很有可能就会被包装成类似秦皇汉武的“明君”了（反过来，如果唐朝二世而终的话，李世民也有足够的黑材料来包装成“昏君”）。

在隋炀帝对中央之国的那些“贡献”中，大运河是最广为人知的事迹。相比之下，隋朝对边缘地区的那些开拓，

或者说在复兴汉帝国版图这件事上所做的那些努力，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事实上，后来唐帝国所试图经营的那些方向，隋帝国都做过尝试。对河湟谷地与河西走廊的“收复”就是其中之一。在利用政治、军事手段击败当时占据河湟谷地的“吐谷浑”之后，隋炀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亲身巡视河西走廊与河湟谷地的帝王。而正是在这次西巡之中，大斗拔谷给中央之国的历史记录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人数规模达到数十万之巨的军事行动中，令人恐惧的暴风雪使得隋朝大军减员过半¹。

如果有兴趣的话，也许相关专家可以去实地考察、研究一下，隋军是否可能因为他们过于庞大的人数而引发了这次灾难。至于我们普通人，倒也不用在做好驴友的心理准备后，才有机会去一睹“大斗拔谷”的风采。事实上，鉴于连通河湟谷地与河西走廊的重要性，沿古道所在修筑一条现代化的高等公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手边只有行政地图的话，也可以在西宁和张掖之间看到这样一条国道——G227的存在。只不过如果你不是遇到历史特别好的司机，最好告诉它，你要找的是“扁都口”罢了。

第六节 湟水河谷经青海道连通西域

“大斗拔谷”所在的连通河西走廊与湟水河谷的交通线，固然对连接这两个板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后来立志开拓西域的中央之国来说，就有了一个疑问——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吗？既然湟水河谷已经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并且无限接近青藏高原的地标——青海湖，那么为什么西行的旅行者不选择继续西行，穿越青藏高原北部进入西域呢？单从地理结构上看，在顺着湟水河谷上源到它的源头处后，如果想保持正西的方向继续行走，并绕过河西走廊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话，旅行者将要面对青藏高原北部的另外两个亚板块：青海湖和柴达木盆地。只要在经过这两个地理单元之后，才能够最终进入塔里木盆地。

每一个地理单元都有着自己显著的地理特征。比如青藏高原给人的整体印象就是“高”，以及因高海拔而带来的高原反应。至于柴达木盆地和青海湖的话，如果说它们有什么共同特点的话，那就是“咸”。盐在这两个盆地型的地理单元中，都成为最明显的地理特征。只不过体量相对较小的青海湖里面还有水，并因此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咸水湖；而四亿多年前为浅海地形的柴达木盆地内部，现在除了星星点点分布的盐湖以外，绝大部分的盆底都已经因为亿万年前的地质运动变成了陆地。

而在这片陆地上，白茫茫的盐层成为最显著的特征。当然，这里所说的“盐”，并不仅仅指的是我们日常所食用的钠盐，还包括数百亿吨其他类型的，可以进入工

1 《隋书·炀帝记》记载：“大业五年三月，驾西……六月，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司相失，士卒冻死大半，马驴死者十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

业系统的矿物质。不过仅仅是可食用的钠盐部分，也足以供给这个星球上的人类食用上千年了。所以我个人绝对相信，应该没有生活在柴达木一带，或者到过这里旅游时看到用盐铺路的人，会去参与前段时间因日本核泄漏事故而引发的食盐抢购潮中。



柴达木盆地盐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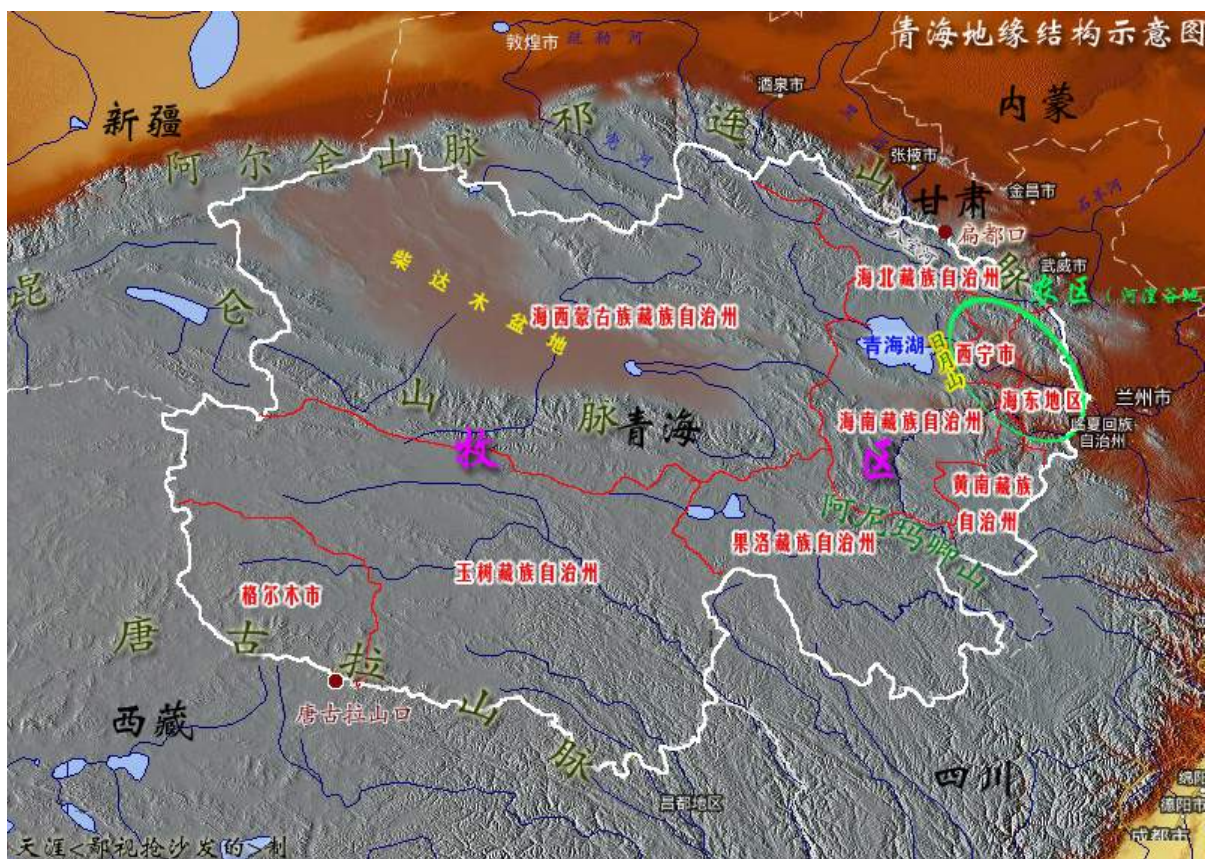
事实上，由湟水谷地经青海湖区，再沿柴达木盆地边缘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线，现在也的确被认定为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历史上，穿越青藏高原北部，绕过河西走廊的路线，的确承担过东西方交流的任务。由于这条路线几乎完全从现在的青海省境内穿行，因此现在也被称之为“青海道”（走河西走廊的路线叫作“河西道”）。在更早的时代，由于这一地区基本为羌人所控制，所以也被称之为“羌中道”。然而羌中道虽然可以成为河西走廊之外，另一条连通西域与黄土高原的路线，但在历史上它却一直以辅路的形式存在于东西方交流的交通线上。

也就是说，除非有特殊情况需要才会走青海道，一般河西道总是能够垄断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利益的。鉴于青藏高原的高度，以及我们刚才所分析的柴达木盆地和青海湖的情况，也许高海拔所带来的高原反应，以及缺乏淡水补给会是影响羌中道历史地位的主要原因。只是当我们分析过相关环境因素后，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经行青海湖这样的湖区和柴达木盆地这样的干旱之地，由它们的边缘绕行是必然的选择。而在它们周边，以及二者之间，有不少汇入盆地（湖）的河流。因此旅行者还是能够在穿行羌中道时得到淡水补给的。至于高原反应，也许对于从东部低地上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不过青藏高原东、北部是整个板块中平均海拔最低的区域。特别是那些河谷、盆地，海拔一般也就在 3000 多米。这样的高度，虽然还是会有部分人有高原反应，不过对于那些身体强壮，并习惯于长途旅行的人说，并不难适应。

既然高原反应和淡水补给都不应该成为阻碍羌中道成为丝路主角的拦路虎，那

么我们就需要从其他方面来找原因了。当我们在行政地图上观察青海内部的行政区划时，就会发现问题的时候了。除了河湟谷地被明显为农业属性的汉、回等族所占据之外，其他地区都被建制为藏族自治州了（格尔木市这个因资源而立，兼控制进入西藏的“唐古拉山口”的地级市除外）。这意味着，河湟谷地之外的青海地区应该拥有完全不同的地缘属性，以至于让那些地缘属性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划地而治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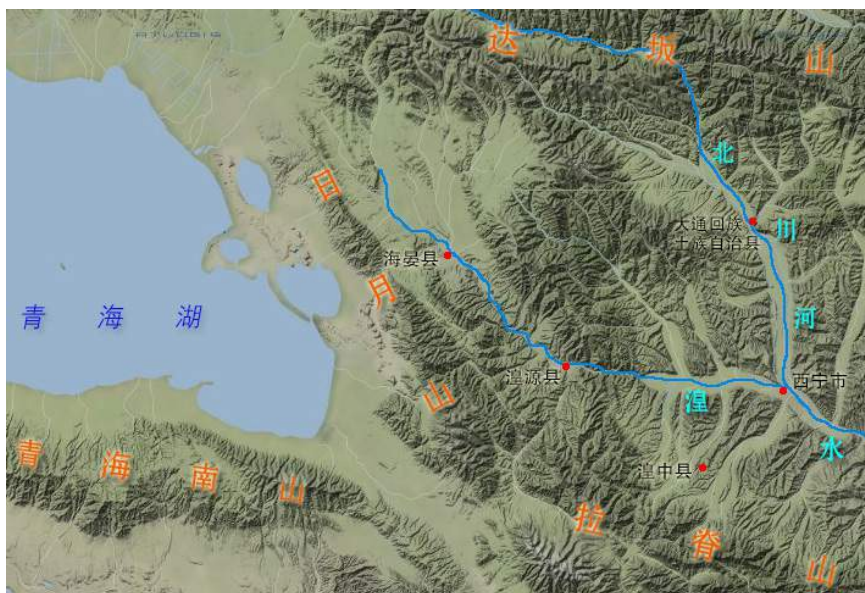
青海地缘结构示意图

简单点说，这种反映在行政区划上的地缘分割，其实就是对青海地区的农、牧两种生产方式的分割。也就是说，在河湟谷地以外的区域中，除了比例极小的河谷地区有些许适合种植青稞等高原作物以外，大部分区域都只适合经营粗放型的游牧生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青海众多的藏族自治州当中，以柴达木盆地为核心的海西地区，建制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原因。在蒙古人成为欧亚大陆的最强者时，向南扩张的他们发现，青海地区也同样存在着大片适合游牧生活方式的草场。

蒙古人和藏人并不是最先发现青海地区的游牧潜力了。那些被华夏文明挤压至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羌”人，才是有史可查的最初开拓者。然而不管是什么人占据了河湟谷地以外的牧区，对于中原政权来说结果都差不多。那就是在青海方向，中央之国无法将自己的农业据点进一步向西延伸了。比起经营河西走廊那条延伸至

西域盆地东部的绿洲带来说，中央之国显然对把自己的直接控制区延伸到青海湖区及其以西地区缺乏信心。除非河西走廊因为政治原因受阻，以及整条路线有足够强大的地方政权愿意保证通行的安全，否则羌中道并不会成为中原政权开辟丝绸之路的选择。

这一历史时机，最早出现在唐王朝统治中央之国时期。这时候占据青海地区的游牧政权，是由一支源自大兴安岭西麓的游牧民族——鲜卑族，所建立的“吐谷浑”政权。为了对抗来自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吐蕃”人（藏族的前身）的战略需要，吐谷浑一方面与唐帝国结盟，获得政治上的战略支持；另一方面则向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旅提供安全、补给保证，引导部分商旅穿越青海地区，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不过从唐帝国的角度来说，能够直接控制的河西走廊，始终是自己的第一选择。真正让青海道成为丝路主角的历史时机，出现在宋、夏、辽三足鼎立的时期。当以西套平原为根基之地的“西夏”王国完全控制河西走廊后。宋朝如果想继续从东西方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的话，除了加大海上丝绸之路的运力之外，启用之前被忽视的青海道，成为宋朝连通西域的唯一选择。



日月山位置图

顺便说一下，如果你希望找一个比较明显的地理特征作为青海地区的农牧分割线的话，那么最合适承担这个地缘任务的，就是横亘在湟水河谷与青海湖之间的“日月山”了。这段大致呈南北走向，与拉脊山、达坂山共同合围出湟水谷地的山体，在古典时期基本上就是中原政权在青藏高原扩张的终点了。比如我们刚

才说的“吐谷浑”，就曾经在此与唐帝国会盟。其实要是青藏高原的地质运动稍微出现点偏差，也许中原政权就有机会把直接控制区向西延伸到青海湖区了。因为仅仅在十几万年前，青海湖还是面积比现在大数倍的，连通黄河水系的淡水湖。如果不是因为地质运动将湖区东部的地形抬升，切断了青海湖流向黄河的通道（无法排水带走矿物质的青海湖，也就越变越咸了）的话，青海湖区完全有机会与湟水谷地一样，成为中原政权在青藏高原的突出部。

而现在，青海湖对于古典时期的中央之国来说，更多的是在象征西方的尽头了。

虽然“青海湖”在华夏文明中曾经长期被视作蛮荒之地，但青海道毕竟存在着通行的可能性。对于像张骞这样的探路者来说，如果能够得到土著羌人的帮助，并非没有可能选择这样的路径。这样走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绕过被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那么张骞到底有没有选择（或者部分选择）青海道进入西域呢？

第八章 关中经陇西至河西走廊的路线

第一节 张骞选择由河西走廊进入西域

对于一个强大而又渴望胜利的帝国来说，总是不会缺乏像张骞这样的冒险家的。事实上，这次冒险的外交之旅很有可能在一开始就夭折，因为张骞和汉帝国对于帝国以西地区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尽管掌握足够多地缘知识的我们，知道如果从青海道穿行的话，很可能可以绕过匈奴人的控制区进入西域。但实际上，对于这点张骞和他的使团在出发前却并不知道。从技术上看，这和张骞所选择的向导应该有一定关系。因为唯一能够为这次西域之旅提供技术帮助的，是使团中的一位叫作“堂邑父”的匈奴人，这位向导最终也成为唯一陪同张骞完成西域之旅的随员。然而在匈奴并没有将直接控制区渗透到祁连山以南地区的情况下，匈奴人对青海道的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的。即使堂邑父能够凭借他的身份在旅途中从匈奴人那里探听出西行的路径，所能够指向的也就只能是河西走廊了。

其实这样一个问题，即使是问那些生活在陇西的羌人，也很难有准确答案的。毕竟青海道在出湟水河谷后，要穿行大片人烟稀少的牧区或无人区。对于这样的一条通道，那些久居汉地的羌人也未必知道。然而是否还存在一种可能呢？那就是张骞先由陇西进入湟水河谷，然后向北穿越祁连山，最终进入河西走廊的地缘核心——黑河流域？毕竟以中央之国和羌系族群的渊源来说，汉帝国和张骞对湟水谷地的存在应该还是有所了解的。

不过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张骞应该并没有选择由湟水谷地转进河西走廊的路线。因为他如果这样走的话，就应该很快能够收集到关于大月氏人的信息了。这是因为在月氏部为匈奴所败被迫西迁时，并不是所有的月氏人都接受了这个选择，有一部分不愿意远离故土的月氏人选择了向南进入青藏高原。为了与西迁的大月氏人相区别，这部分月氏人被称之为“小月氏”。而他们所选择的路径，应该就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大斗拔谷”。

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层面，这种由低地就近转入高地避难的做法，都是很自然的选择。只不过，祁连山南是羌人经营的地盘。人数不多的小月氏人，其实并没有机会得到祁连山南最好的土地来重建强力政权，更多的是以联姻等方式依附于原有羌人部落。真正能够打出自己一片天地的，还是带走月氏主力的“大月氏部”。如果当初月氏人的战略决定是尽数退入祁连山南，在羌人占据的青海地区重生的话，那张骞西行的终点兴许就只是河湟谷地了。不过要是那样的话，西域之地被华夏文明所渗透的时间，很可能就要推迟一点了。

尽管以月氏难民身份避难于祁连山南的小月氏人，并没有机会成为这片高原之

地的主人。但如果张骞选择了由湟水河谷向西，或转进河西走廊的路径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应该有足够的机会在湟水河谷至大通河谷、祁连山一线知晓小月氏人的信息，并由此对大月氏部有个初步的概念。然而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张骞应该还是在匈奴向导的指引之下，选择了最为人所熟知的河西道西行。其结果就是，他很快就成为匈奴人的俘虏。

尽管习惯于游牧生活的匈奴人并不一定会像汉帝国那样，在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但在匈奴人已经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的情况下，张骞所带领的一百多人的使团想要顺利的穿越这条走廊地带，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唯一不确定的是，他到底走了多远，又是被哪个匈奴部落所俘获的。事实上，被匈奴阻击的风险，并不仅仅存在于张骞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之时。这种风险，其实从张骞跨越陇山进入陇西高原时，就已经存在了。

第二节 关中经陇关道和萧关道连通陇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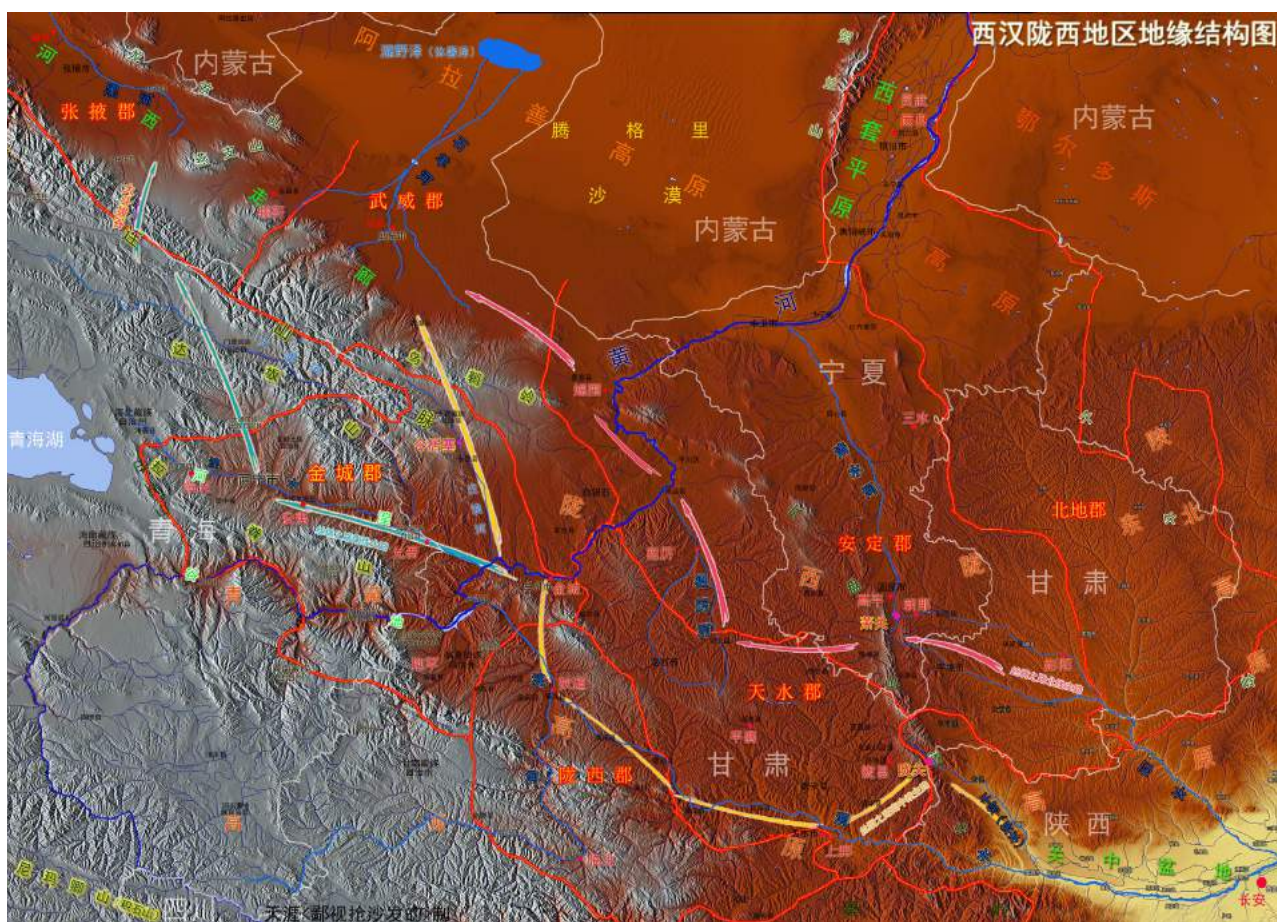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如果按照一般规律，横穿陇西高原与关中盆地的“渭水”，无疑是连通两大地理单元的天然纽带。然而陇山与秦岭的地理关系实在太过紧密，结合部的东西纵深也够宽（也可以认为，陇山——六盘山就是秦岭向北延伸的支脉）。山高水急的地理结构，使得沿渭水往来陇西与关中的通道十分艰难。相比之下，在海拔并不算高的陇山之中，寻机翻越会更加的安全。这样一条通道的走向，关键并不在于应该从哪里翻越陇山，而在于陇山东西两端渭水支流的走向。这样的话，穿越陇山者可以尽可能地行走在河谷通道中。从尽量缩短行程的角度看，与陇山地理位置最近的两条支流，是最有机会承担这项任务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当年秦人由渭水上游渐进式的渗透关中，并最终受命于周王室入主关中时，发源于陇山东、西两侧，与之地理距离最近的两条渭水支流——清水（今牛头河）、汧水（今千河），就帮助秦人渐进式的完成了这个过程。至于为连接这两条不得不绕行的支流通道的而设立在陇山之间的关卡——陇关，自然也就是在清水、汧水之间了。

假如张骞是按照这条最初的官道从关中平原溯千河而上，然后跨越陇山进入陇西高原，再沿牛头河南下，至天水一带回归渭河河谷，并由此继续向西的话，那么他的使团在这一路上应当说是相当安全的。那些有可能威胁到这条路线的戎狄部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被整肃干净了。除掉西迁至河湟等地，变身为“羌”人部落者之外，剩下的基本已经被融合为华夏族了。

现在的问题是，张骞也许并没有走这条最安全的路线穿越陇西。在后来成型的丝绸之路中，穿越陇山的路径并不只有经由陇关的“陇关道”，在陇山以北，被称之为“六盘山”的那段延伸段（陇山、六盘山可合称为“六盘山脉”）中，还有一个对中央之国来说更加重要的通道——萧关道，用以连通陇山左右。“萧关”之名，

相信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应该都有所耳闻。作为“关中四塞”中的西北门户（另三塞为：散关、潼关、武关），萧关在历史上所承受的压力和战火也是最多的。在中央之国的核心区已经形成，战争压力主要来自西、北方向时，其他三关的军事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所谓“内战”之上了。唯有“萧关”，一直都以其接近农、牧分割线的地理位置，而长期在所谓针对游牧民族的“外战”中露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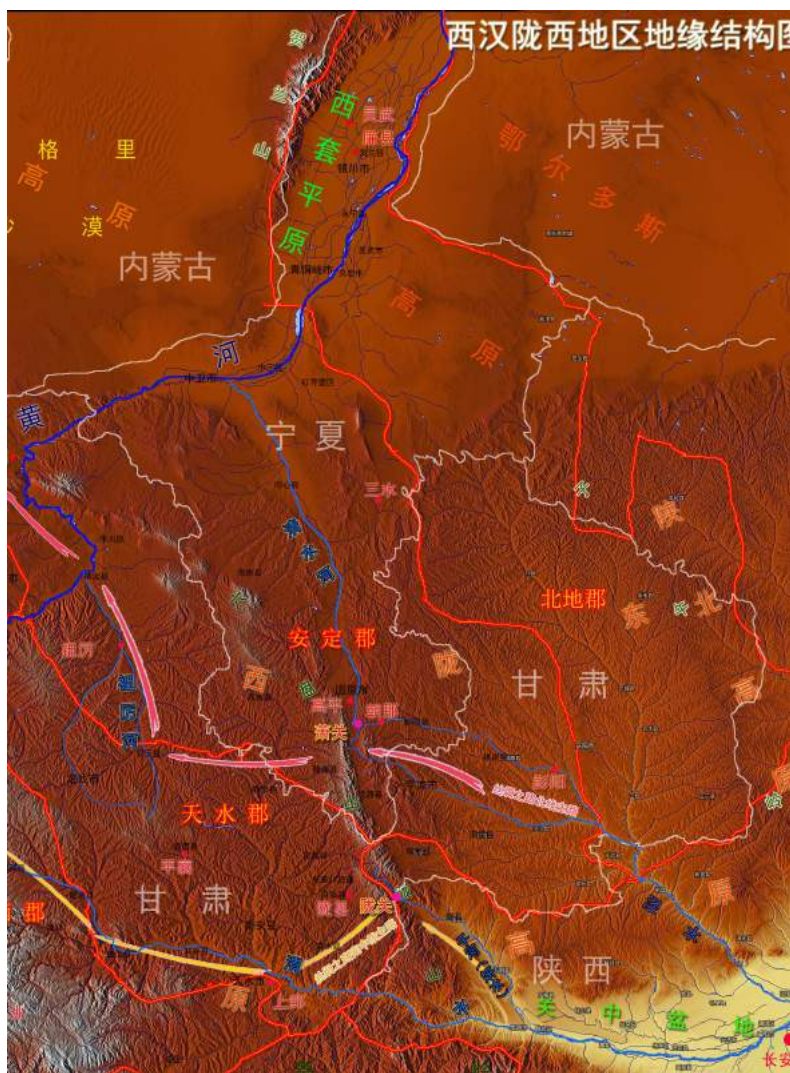
我们经常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有需要，在六盘山之中多打通几条通道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我们也经常说，在古典时期如果不是十分有必要，为了降低维护成本，以及更好的管制战略要道，一个时期里内，连通两个地理单元的通道有一条就够了。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萧关道”，其实指的是：由萧关防线所直接庇护的，穿越六盘山的通道。



西汉陇西地区地缘结构图

简单从地理结构上看，我们也能看出萧关道存在的必要。陇关道的存在，相当于直接连通了关中、陇西两单元；而位置更北的萧关道，所连通的就是陇西、陇东两大高原了。如果来自关中的汉使，希望最终到达的是陇西高原的北部的话，那么他最合理的选择，就是溯泾水而上，沿一条发源自六盘山东麓的上游支流到达六盘山东麓，然后再翻越六盘山，进入到陇西高原北部。这样一条通道存在的价值，并

不仅仅在于为关中和陇西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更在于可以直接连通陇西和陇东两大高原。而这点对于中央之国的西北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就地缘位置而言，陇西、陇东两大高原都是关中平原在北方的屏障，也是游牧民族从西北方向入侵中央之国的前沿板块。机动性极强的他们，既可以沿六盘山西麓侵入陇西高原，也可以沿六盘山东麓直攻陇东高原。



事实上，一直到游牧骑兵兵临城下时，分驻陇山左右的边防军都未必能够判断出对手的主攻方向。这是因为，当游牧骑兵逼近帝国的西北边关——萧关时，他们依然可以随时变换攻击的方向。出现这种复杂局面的原因，在于在这个方位上，最有可能作为游牧民族南侵跳板的板块——西套平原身上。当匈奴人试图从西套平原向南渗透时，他们会发现有一条很不错的河谷通道可以直插陇西、陇东两大高原的结合部。而对汉帝国威胁更大的是，当匈奴人沿着这条叫作“清水河”的河流上溯到它的源头处——也就是萧关之北时，这些凶恶的敌人不仅已经切入到陇西、陇东两大板块的腹地，甚至离关中平原也已经不远了。如果张

西汉陇西地区地缘结构图

骛最初是由此进入陇西的话，那么他在萧关一带实际上就已经无限接近匈奴人的势力范围了。

既然在西套平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生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通道——清水河谷，那我们就很有必要来探究一下这条河流的走向，以及它与西套平原、黄土高原的地缘关系。当我们在地图上审视西套平原与陇西、陇东两个黄土板块的位置关系时，会发现如果从西套平原的中心南北向拉一条线直至秦岭的话，那么这条和六盘山平行的直线基本上就是陇西和陇东高原的几何分割线了。也就是说，当匈奴人向南渗透

至西套平原，并以此为跳板进攻汉帝国的话，陇西高原和陇东高原受到攻击的概率是对等的。

当然，上述假设是建立在纯几何关系的基础上的。而在现实中，我们也知道由于山脉、河流的阻隔，两个板块的地缘关系远近并不一定会和几何距离成正比的。不过就西套平原与陇西、陇东两大板块的地缘关系来说，这种障碍却并不明显，因为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东西向的难以逾越的高大山脉。在这片黄土高原上，最为高大的山脉就是南北走向的六盘山脉了。更为重要的是，游牧民族由西套平原侵入汉地的主要路径——清水河谷，本身就是沿六盘山麓切入的。

从地缘关系上看，清水河与西套平原会更为紧密。这是因为，这条和六盘山主脉连接在一起，成为陇西、陇东高原地理分割线的河流，实际是一条发源于六盘山麓，向北由西套平原西南角汇入黄河的支流。从这一点上来看，来自西套平原的控制力显然更容易在清水河谷中体现。而这种地缘控制力在我们今天的行政区划上，也能够清晰看出。作为中国面积最小的省级行政区（直辖市除外），宁夏的管辖范围除了在贺兰山——黄河一线，以西套平原为核心的区域以外，在其南部还有一个偏离了黄河这条轴线的三角形突出部。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行政标签为“固原市”的地级行政区的存在，才使得甘肃省东部的平凉、固原地区（陇东高原）几乎被分割成了一块飞地。而这个突出部之所以存在，地理上的原因就是清水河谷的存在。也就是说，宁夏南部的地理轴线并不是黄河，而是“清水河”。

关于清水河谷、萧关是如何在汉帝国与匈奴的博弈中体现地缘价值的，我们在后面分析到汉帝国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时，会详细解读的。接下来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如果张骞或者其他人在沿泾水上溯到六盘山东麓后，并不想继续向北进入西套平原，而是想横穿整个陇西高原进入河西走廊的话，他们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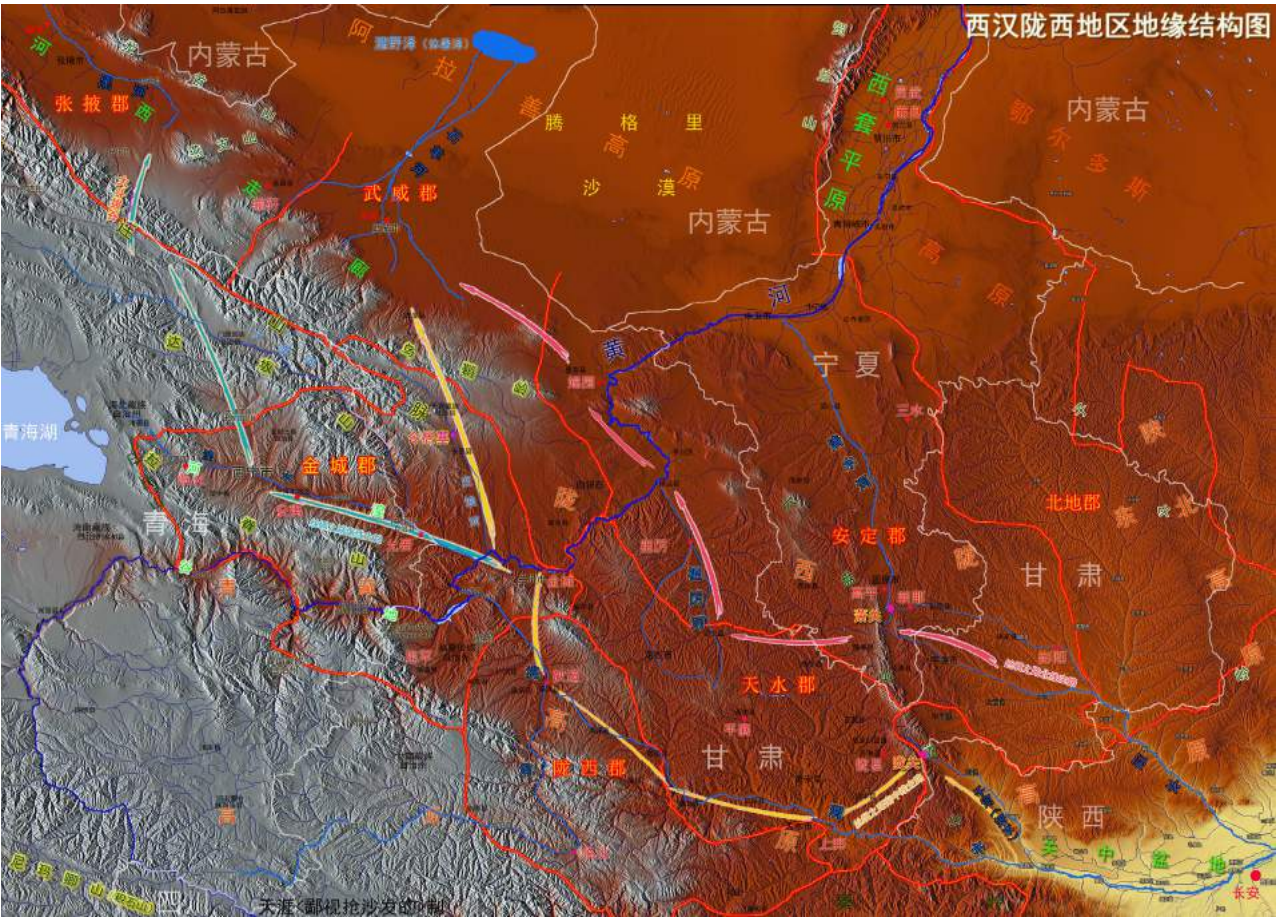
第三节 陇西中北部至河西走廊的路线

假如张骞和他的后来者经由陇东高原翻越六盘山进入陇西高原的话，他们并不能像走陇关道那样，很快找到东西向的“渭水”来指引道路的方向。在陇西高原中北部分布的河流实际上被分成了两个系统，东、南部的河流向南注入了渭水；西、北部的河流则向北直接汇入了黄河。如果你在穿越六盘山——陇山之后，一定要回归到渭水河谷，再继续西行的话，那么无论是从萧关道还是陇关道出来，都很快能够找到一条渭水支流帮助自己向南转向。只不过，以陇西高原复杂的水系走向而言，旅行者并无法完全利用一条河谷来横穿整个陇西高原。无论你决心走南线，借助渭水河谷西行，还是从一开始就决心从陇西高原中、北部穿行，最后一步都必须借助那些北流入黄河的河流谷地，才能到达黄河岸边，并最终转入河湟、河西等板块。

既然没有一条现成的天然通道可供利用，那么道路选择者所重点关注的，就应

该是地理距离的远近了。也就是说，在沿途地理形态相似的情况下，直线距离越近的方案，越有可能成为干道。当然，直线距离的远近，并非是唯一的标准。是否有充足的水源补给、是否能够尽量多的利用天然河谷通道，以及区域行政中心的位置，都有可能影响到主干道的走向。可以这样说，陇西高原的每一个重要城镇，都有证据声称自己在某一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合上述因素，假如旅行者决定从萧关道，也就是北线开始横切陇西高原的话，他们在前半段的旅程中应该会尽量遵循几何原则，选择最短的路线横穿陇西高原。这是因为由六盘山脉主脉（西侧）发源的河流，最终都是南流入渭水的。要是试图沿着这些支流一路向前的话，对于希望从北线进入河西走廊的旅行者来说，显然是在绕路。不过在行程过半之后，旅行者很快就会发现第一条可以把他们直接带到黄河岸边的河流——祖厉河了。只不过这条发源于陇西高原中部的河流，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旅行者们需要在进入祖厉河谷之后，转而向北，然后在陇西高原的西北河口处，也就是现在甘肃省靖远县渡过黄河。



西汉陇西地区地缘结构图

沿祖厉河北上渡过黄河的旅行者，继续保持西偏北方向的话，他们很快就可以从乌鞘岭东端，也就是海拔最低处进入河西走廊。无论从绕开地理障碍，还是规避

对手防线的角度来看，这样一条路线都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这样一条看似合理的路线，本身却也存在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缺水。这种缺水的感觉，在跨越黄河之后就会很明显地感觉到。因为从地理结构上看，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区域完全暴露在阿拉善戈壁的风沙面前。那些来自乌鞘岭和天上的淡水在面对阿拉善戈壁时，根本没有机会形成连续的绿洲带。旅行者们必须在穿行大片荒漠地带之后，才能到达石羊河流域的地缘核心——武威地区。

尽管在后面漫长的西域之旅中，张骞和他的后来者们将要经常性的面对这样大片的荒漠地带，并且只能依靠那些点缀在荒漠中的绿洲来进行补给。但就陇西高原进入河西走廊这段路程来说，他们完全有机会选择一条不用为水发愁的路线。最起码，单从“水”的角度来看，走南线沿渭水河谷，经另一条北向注入黄河的支流“洮水”水系，进入湟水河谷。再由湟水河谷经大斗拔谷插入河西走廊中部的路线，就肯定不会有缺水的担心。只不过，这样一条路线在距离上并不占优。绕行湟水河谷这样一个高原板块所增加的地理难度和地缘风险，更会加深通道维护者的担忧。

事实上，如果仅仅希望从黄河到乌鞘岭的这段路线有足够的淡水补给，甚至有天然的河谷通道可供利用的话，张骞和他的后来者们并不一定要深入到湟水河谷后，再冒着风险穿越祁连山脉。他们完全有机会在渡过黄河后，选择沿青藏高原边缘（祁连山脉东边缘）向乌鞘岭方向进发，最终在乌鞘岭的西端翻越山岭。在越过乌鞘岭分水岭之后，旅行者们马上就可以找到发源于乌鞘岭西北部的石羊河上游河流，并带他们无缝接入河西走廊绿洲带。

简单点说，这样一条算作陇西道中线的路线，实际上是在渡过黄河之后就开始沿青藏高原边缘行走了。也就是说，在正式进入河西走廊之前，旅行者们就开始受益于祁连山上流下来的河水了。对于他们来说，利好消息并不止于有机会免受缺水之苦，因为这样一条沿青藏高原边缘连通黄河与乌鞘岭的通道，本身就是一条天然的河谷通道——庄浪河谷。

第四节 陇西南部经庄浪河谷至河西走廊

庄浪河是位于大通河北部的一条几乎与之平行的河流。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在于：都源自于祁连山，且最终都是在东南方向注入黄河的一级支流；而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庄浪河谷的位置，其实已经在祁连山或者说青藏高原的外围了。相比大通河谷那山高水急的峡谷结构，一面紧靠青藏高原，承接高原来水；一面对接黄土高原，获得更宽纵深的庄浪河谷，最起码在通行条件上要有利得多。溯流而上的话，我们会发现庄浪河的发源地，就是在乌鞘岭与祁连山主脉的结合部。

如果准备进入河西走廊的旅行者在渡过黄河之后，选择的是大通河谷继续他们的行程的话，相信沿途的高原、峡谷地貌很有可能会让他们丧失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即使一定要在进入河西走廊之前，先绕到祁连山南去领略下高原风光，最好的选择也是与黄土高原海拔、地貌相似的湟水河谷。而如果认为选择庄浪河谷进入河西走廊是一件颇有难度的事（中间必须翻越乌鞘岭最高处），因而执意从乌鞘岭东端绕行的话（也就是之前分析的北线），那么这一路上淡水补给就不能保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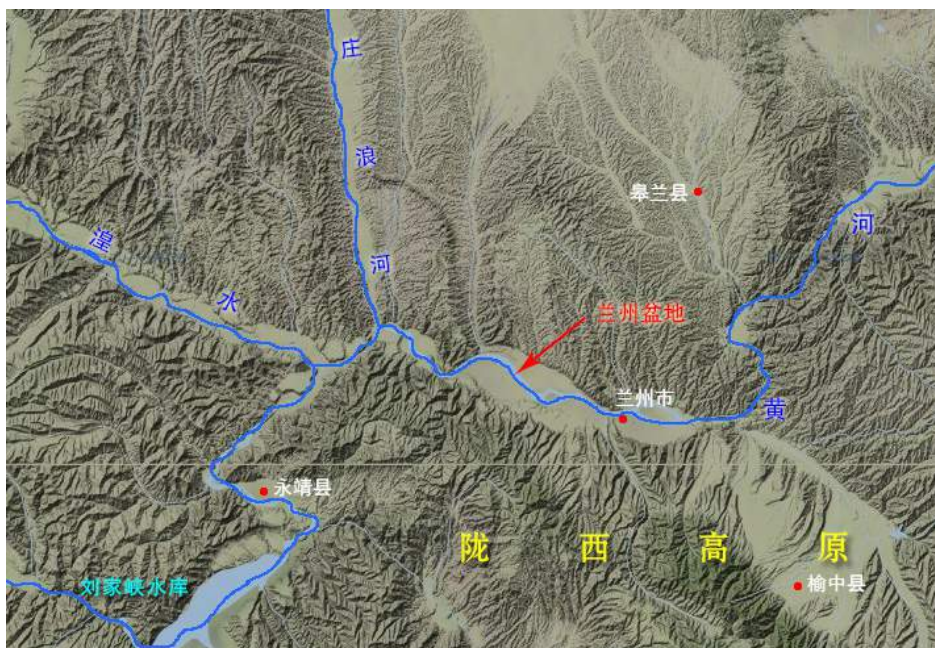


丝绸之路陇西——河西段示意图

无论从淡水补给，还是通行难度、通行距离来看，庄浪河谷的优势都十分明显。而这样一条连接黄河与河西走廊的战略通道，后来也的确成为丝绸之路在这一区域的主干线。至于乌鞘岭的翻越难度，其实也并不算高。如果你有幸坐车穿越兰州——永登——天祝——古浪的 312 国道（G30 高速也可以），就可以全程体会下古人在

穿越庄浪河谷和翻越乌鞘岭的感觉了。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公路在翻越乌鞘岭时其实是有现成的谷地可以利用。古典时期往来于此的旅人，可以毫无压力的跨越这道分水岭，由庄浪河转接入石羊河流域。

当然，这种毫无压力指的是地理结构上的压力。这样一个山、水相连的狭长战略通道，你很难想象军事家们不会想办法在此设防。尤其是一直对河西走廊是否能够持续留在中央之国版图内，心存疑虑的中原王朝。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汉帝国完成对河西走廊史诗般的征服后，一代天骄——霍去病很快就在庄浪河谷构筑起了一条防线，并沿着与乌鞘岭平行的方向东延伸至阿拉善高原。这条防线的核心控制点就在乌鞘岭南，现在的甘肃省“永登县”北，史称“令居塞”。



兰州盆地位置图

既然庄浪河是一条流入黄河的支流，那么按照一般的地缘规律，庄浪河与黄河相交的三角洲地带，应该就是连接庄浪河谷与陇西高原腹地（河东）的枢纽了。假如汉帝国最终决心将河西走廊与陇西高原置于同一建制之下的话，那么在这样一个点上建制的城邑，无疑是最

有机会成为该行政区的行政中心的。更为吸引人的是，湟水（大通河）进入黄河的入河口，与庄浪河口是如此的接近。这意味着，建制在这两个河口地带的城邑，能够拥有双重的地缘价值。也就是既能够帮助汉帝国控制通往河西走廊的战略通道，又可以将影响力延伸到湟水河谷乃至整个河湟谷地。

对于汉帝国的政治家或者我们来说，如果面前所呈现的是一张只显示基本河流和行政区的地图的话，相信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有上述想法。然而当我们看到的是一张高精度的地形图，或者实地去考察一下时，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三河相汇的河谷地带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亿万年前的造山运动，使得这里的河谷横向纵深有限。对于一个需要管理如此之大区域的地缘核心来说，它的地缘潜力多少有些不足。毕竟如果没有足够大的河谷平原来发展农业，以承载较多的人口，仅仅是一个区位优势的话，这个地缘枢纽能够承担的，很可能仍然只是交通、军事方面的任务（就像那

些依要塞而生的城镇一样)。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为这个能西控河西、河湟两大板块的战略要点感到遗憾。毕竟这样的区位如果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的话，是很有机会成为西部中心城市的。不过我们也不要太遗憾，因为早在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就已经在它的东面不远处发现了一块由黄河水冲积而成的，拥有足够纵深的河谷平原来承担这个重任。传说帝国在此筑城以控河西之地时，曾经挖出过金子，因此建制于此的城邑被命名为“金城”。而它现在的名字相信大家会更为熟悉，那就是以拉面闻名天下的甘肃省会“兰州”。

以这片河谷现在行政区来为之命名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兰州盆地”。很显然，如果陇西高原、河西走廊、河湟谷地要放在一个行政区的话，兰州盆地会是地缘中心最合适的选择。那些穿越陇西的旅行者，不仅可以在帝国建筑于此的“金城”中获得补给，更可以在到此之后再思考到底是走湟水河谷（南线），还是庄浪河谷继续他们的丝绸之路。在汉帝国以陇西高原为基地，在黄河以西地区开疆扩土时，基本就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设想的，以陇西、河湟、河西走廊为核心区，共同建制一个一级行政区的思路来划定行政区的。这样一个一级行政区，在汉代被称为“州”或者“刺史部”（共十三个）。史称“凉州”或“凉州刺史部”。当然建制这种东西，是一直在变化的。不过以“凉”这个地缘标签来标定陇山以西地区（也就是扩大化的“陇西”概念），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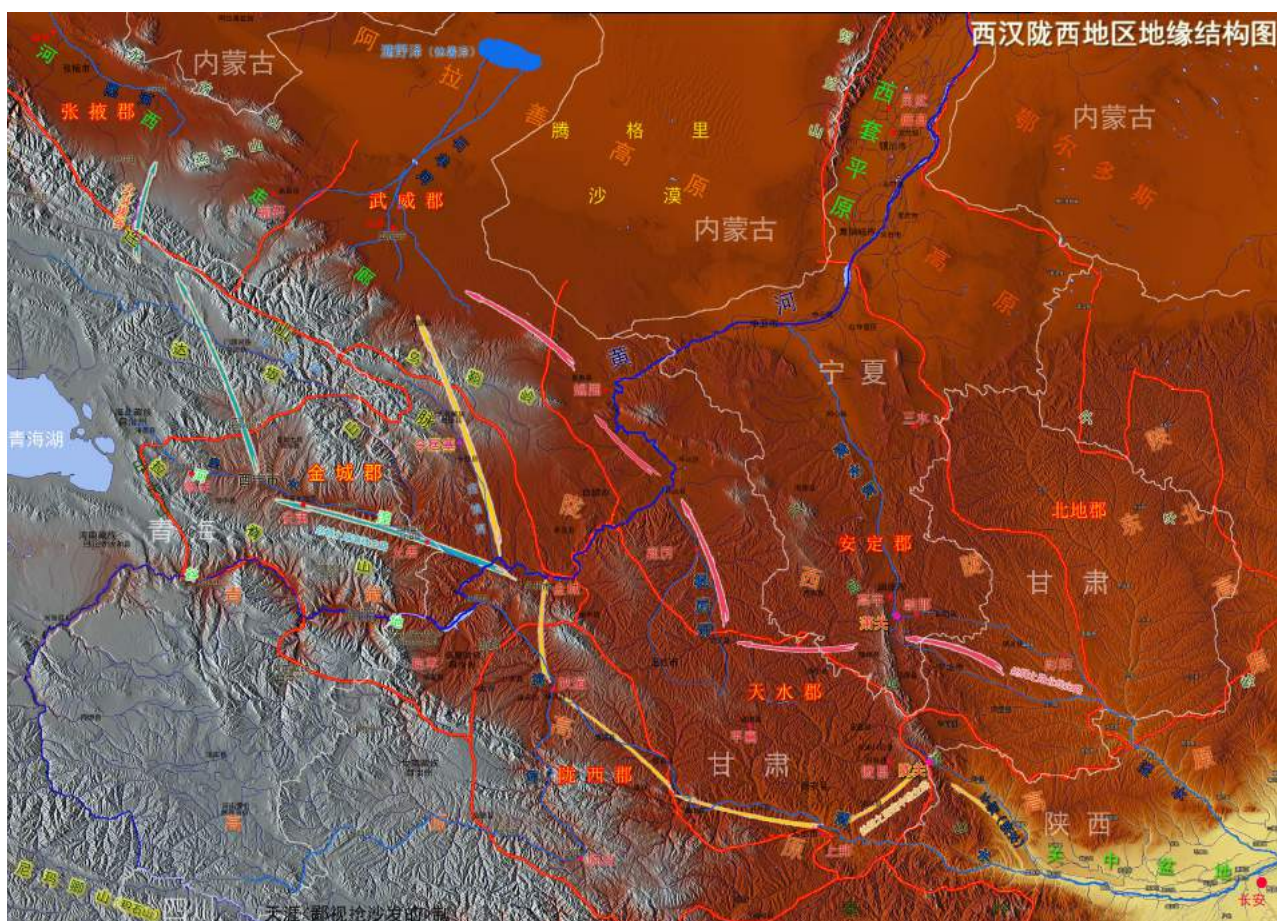
鉴于它在中央之国的位置，民间更习惯于将这一地区称之为“西凉”。相信年龄稍长的人，听到“西凉”二字时一定勾起了不少回忆。在那些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历史评书中，“西凉”一词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说到这里，不得不再表扬一下汉字的魅力，以及娴熟利用这些汉字标注地名的人。在大部分时候，这些地名都能够把它所代表的地缘板块中，最突出的地缘特征表现出来。好像“西凉”二字一样，不仅显示了它在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方位，也让我们马上感受到了这一板块那更加寒冷的气候。

居于河西、河湟、陇西三大板块相接的枢纽位置，又有黄河水滋养，兰州能够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就具体的行政规划而言，并不是总是要把这三个最高地缘板块放在同一行政区的。就好像历史发展到现在，为了控制青藏高原北部，河湟谷地和唐谷拉山以北那一大片牧区打包成为“青海省”（湟水河谷的地缘核心“西宁”，也就成了青海的省会），因此并没有和它的“西凉”伙伴们成为一省。但仅仅凭借连通河西、陇西的枢纽地位，也足以坐实兰州在甘肃省的省会地位了。

既然经兰州盆地——庄浪河谷（现建制为永登、天祝两县）进入河西走廊的路线，是连通陇西——河西板块的最合理选择，那么横穿陇西高原的最短路线也就此出炉了。就我们现在所解读的汉朝来说，在大部分的时段，兰州——陇关之间的几何直线，所经过的张家川——通渭——定西——榆中——兰州诸地，就是西汉丝绸之路的主

干线了。当然，我们前面也说了，决定一条路线是否有资格成为官道，不仅要看直线距离，还要考虑环境、安全，以及板块行政中心位置等因素。后来东汉时期的官道，就向渭水方向南移了。

如果没有秦人对陇西高原数百年的经营，我们很难想象汉帝国能够以陇西高原为中心向西北地区扩张，并对匈奴展开战略反击。从这个角度看，秦人留给汉帝国的最大遗产可以说就是“陇西”了。就这个板块所能够辐射的区域而言，对于中央之国的安全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也意味着陇西必须承受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在西、北两个方向。以河湟、河西、蒙古高原，乃至西套平原为根据地的边缘民族，都有可能对陇西高原造成巨大压力。在这样一种数面受敌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在陇西高原建制一个郡一级的行政区，就显得不够了。为了缓解陇西高原的压力，在汉帝国的建制中，陇西高原北部是和陇东高原放在一起，合制为“北地郡”的。



西汉陇西地区地缘结构图

从战略上来看，这种建制不无道理。因为无论是陇东还是陇西，所承受的北方压力，都是来自西套平原和鄂尔多斯方向。尤其是那个水草丰美，又可以通过清水河谷随意切换攻击方向的“西套平原”，更是使得萧关两侧在军、政上有统一协调的必要。六盘山东西两侧必须放在同一建制中，才能更好屏障关中这一战略思维，

也在现实的行政格局中有所反应。我们会看到，虽然由于宁夏的“独立”（原来也是甘肃的一部分），陇东高原不得不以一种近乎飞地的状态留在甘肃的版图中，但甘肃省还是能够保有陇东。

陇山两侧的这种紧密地缘关系，在汉帝国反击匈奴成功后又一次得到了验证。这时的北地郡因为西套平原的“回归”（秦帝国已经征服过西套），已经变得过于庞大了。汉帝国不得不将北地郡的西部分拆出“安定郡”时，仍然遵循了六盘山两侧必须军政统一，共同防御来自“清水河谷”战略威胁的原则，将陇东高原的西部、陇西高原的北部放在了同一建制中（安定郡）。



西汉河西走廊地缘结构图

虽然建制一个理想的行政区，似乎应该与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相重合（重要标准，就是同一水系；典型的案例就是江西）。但在实际操作中，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往往很难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在很多时候，政治家们甚至更热衷于在一个以某一地缘板块为核心的行政区中，刻意加入一些周边板块的部分。这种做法，往好了说是希望各行政区之间，能够因此而产生更紧密的地缘关系；往阴谋方面想的话，也是在避免某一板块太过独立而产生离心力。像陇西高原这种水系繁杂，又面临多方压力的板块，变数就更加的大了。比如汉帝国继成功渗透河湟谷地后（在河西之后），为之设立“金城郡”时，就刻意将包括“金城”（兰州）在内的，与河湟谷地地缘关系最为紧密的陇西高原西部，划入了这个为控制“河湟”而设立的行政区中。

总的来说，对于汉帝国而言，陇西高原的行政区划如何调整，所依据的标准已经不是陇西高原内部的需要了。如何能够更好的控制、防御那些陇西以西（北）的边缘板块，才是帝国不断调整陇西高原建制的原动力。对于即将越过黄河，进入匈奴之地的张骞来说，他的关注点也肯定不在陇西的道路之上。如何能够安全的穿越河西走廊，在西域找到大月氏人，才是此行的意义所在。

第九章 汉初河西走廊的地缘结构

第一节 张骞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俘获

虽然张骞在出发之前，应该还不太了解匈奴在河西走廊是如何经营、布防的，不过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却还是有足够的资料来了解这一点的。在匈奴占据河西之地后，这条走廊地带被一分为二，交给了归属于匈奴右翼的“浑邪”、“休屠”二王分治。通过之前的内容，我们知道，整个河西走廊并不是被一条东西向的河流所贯穿的河谷地带，而是由诸多从祁连山上汇流而来的河流，在山脉外侧所形成的珍珠链般的绿洲带组成。这些河流在祁连山麓滋养出片片绿洲之后，又汇集成了额济纳河、石羊河两大河流，向阿拉善戈壁的腹地渗透。当然，以它们的走向而言，是完全没有机会把祁连山之水送到大海的。这种迎难而上的做法，最终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在阿拉善戈壁腹地形成了“居延泽”、“潯野泽”二片因湖而生的绿地。

在大月氏人经营河西走廊时，他们的核心领地就是额济纳河绿洲带，以及石羊河绿洲带。当匈奴人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时，很显然也可以以此为标准将这两个绿洲带分别交给浑邪、休屠二王管理。不过从体量上来看，额济纳河明显要更占优。尤其它上游河流的密度和跨度，要明显大于石羊河。仅仅按照流域来分割领地的话，被分配在东部的休屠王很可能就会觉得吃亏了。因此最终成为休屠、浑邪二王草场地理分割线的，是额济纳河上游正源——黑河（其实额济纳就是汉语“黑水”的意思）。即黑河以东的草场由休屠王管辖（潯野泽也因此被称为“休屠泽”），以西的绿洲则由浑邪王管理。

从位置上看，以石羊河流域为核心领地的休屠王部，显然与汉帝国更为接近。在匈奴人战略优势明显时，这可以让休屠王部有更多的机会劫掠汉地；只是一旦形势发生逆转，休屠王部也会承受最大的压力。当然，这只是战略层面的分析。具体到战术层面，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经典案例。到时看看一代名将霍去病是怎样出奇制胜的，将浑邪王部作为第一攻击目标的。

其实不管张骞是被匈奴哪部所获得，他此行的命运都注定会有一个悲剧的开始。你很难想象，一支数百人的庞大队伍应该如何顺利穿越东西纵深千里的“敌占区”。对于这一点，俘获他们，并得知张骞所肩负的使命时，匈奴人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张骞和他的随从们并没有生命危险。这倒不是完全基于“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惯例（以张骞此行的目的对于匈奴来说，其实可以按间谍处置了），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人力资源的争夺。在“人”是最基本的战略物资和地缘潜力体现的古典时期，你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多少，决定了你的战争潜力。

对于像匈奴这种游牧体系来说，他们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局限，使得他们无

论是在单纯的人口潜力，还是人才的培养环境上，都有很大的短板。因此针对更高文明区的汉地的人口（人才）资源的掠夺、吸引，也是匈奴帝国保持、提升竞争力的必然手段。

正是在匈奴对人口，尤其是人才资源的极度渴望下，像张骞这种因各种原因而为匈奴所获的汉人精英，一般并不会会有生命危险。“帮助”他们组建家庭，并生儿育女，是匈奴人所使用的方法。这样一种看似简单的方法，其实是十分有效的。就像现在偏远地区那些被卖作人妻者，通常在诞下儿女之后都会认命一样。而买妻者的家族，在这个阶段之后也会随之放宽管制，甚至允许她回乡探亲。

当然，并不是所有被迫在异乡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人都会这样“认命”的，肩负历史使命的张骞就是其中之一。在河西走廊留置十余年的他，最终还是在匈奴人管制日松的情况下离开了他在匈奴的妻儿，继续履行他出使大月氏的使命。我们无法得知，具体有多少当日的使团成员做出了类似决定共同出逃。不过对于张骞来说，那个匈奴人身份的“堂邑父”能够随他一起出逃是最重要的。至于张骞是遵循什么样的路线逃出匈奴控制区，后面又是如何找到大月氏人的，我们接下来再接着解读。

第二节 焉支山对河西走廊的分割作用

如果张骞是被休屠王部截获，并被扣留在石羊河流域的话，那么他在出逃时，就必须穿越一座非常著名的地标——焉支山（燕支山、胭脂山）了。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从匈奴人失去河西走廊后所传唱的那两句歌谣：“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中，知晓这座河西“名山”的。其实从地理结构来看，所谓“焉支山”也是祁连山脉的一部分。只不过和祁连山脉内部那些老老实实遵循东西向原则排列的山体不同，焉支山的发展方向有些异样罢了。和乌鞘岭一样，焉支山也固执的向东北方向偏移了自己的走向。只不过前者最终成为河西走廊与陇西高原的地理分割线；而后者则成为横断河西走廊的一个显著的地理特征。

我们也可以从水系的角度，来理解焉支山和乌鞘岭对河西走廊的分割作用。二者突兀的存在，对山体两侧的水流也形成了自然分流。乌鞘岭所分割的是黄河、石羊河水系；而焉支山分割的则是石羊河、额济纳河水系。很明显，这样的地理结构，会让河西走廊内部有机会形成相对独立的亚板块。在汉帝国征服河西走廊之后，焉支山东部的石羊河流域就建制为河西四郡中的“武威郡”（公元前115年）。而焉支山以西部分，一开始只是被笼统的建制为了“酒泉郡”（公元前121年）。只是后面我们就会分析到，焉支山以西部分远非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进一步分拆实属必然。

对于匈奴人来说，横亘于河西走廊当中的焉支山并不一定会成为一条地理分割线。因为游牧生活需要利用山体阴阳两面温差对牧草生长的影响来转换牧场。然而

对于习惯于稳定农业生活的农耕民族来说，类似这样山体的存在就很珍贵了。除了承担行政区的天然分割线以外，军事家也会毫不犹豫的依靠山体建立一系列防御体系。如果翻越山体的通道只是山口、峡谷的形式存在的话，那么依山而建的防御体系，更多的是会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口而存在（这类通道，我们称之为“战术通道”）；而如果山体结构并不是那么紧密，防御纵深比较大的话，比如像南阳盆地与华北平原之间那样（方城夏道），那么军事家一般就会和政治家相互配合，在此营建一些军、民两用，有自给能力的城邑作战略防御（这类通道，即为战略通道）。



汉西域全图

就地理结构来说，呈断块状的焉支山无论是内部，还是与祁连山主脉之间的连接都不算紧密。因此已经在河西走廊生活了十年之久的张骞，应该还是有足够机会躲避开匈奴游骑兵，穿越焉支山进入额济纳河流域的。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要是占据河西走廊的是汉帝国这样的农耕政权，张骞碰到的麻烦可能就要更大了。事实上，后来汉帝国在焉支山与祁连山之间屯田驻军时，就建制了一个战略级别的防御据点——骊轩（县）。

相信很多经常看新闻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应该会感到有些熟悉了。在各地都热衷于牵强附会，挖掘历史来发展旅游经济时，骊轩城所在的永昌县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依靠古城遗址所在地的一些长相多少有点带欧罗巴基因的村民，并结合

在故纸堆中翻出的对骠轩驻军的一些描述。这个被华夏文明经营达两千多年的地方，竟然奇迹般的和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一个与汉帝国同时代的帝国——罗马联系到了一起。而那些带有所谓“罗马血统”的村民，为了配合相关炒作，也已经开始逐渐相信，自己的祖先是来源于一支在罗马东征中消失的军团。假如你没有看过相关报道，相信你也能很快百度到相关信息的。



焉支山

对于此类有所谓基因证据的炒作，我只能说，在河西走廊乃至整个陇山以西这片多方博弈之地，找点带有所谓“异族”基因的人，实在是太容易了。假如现在波斯或者阿拉伯板块是这个世界上的优势文明区（而不是罗马文明所代表的西方）的话，相信从逻辑和证据的角度来看，以波斯或者阿拉伯后

裔来拉动旅游经济会更让人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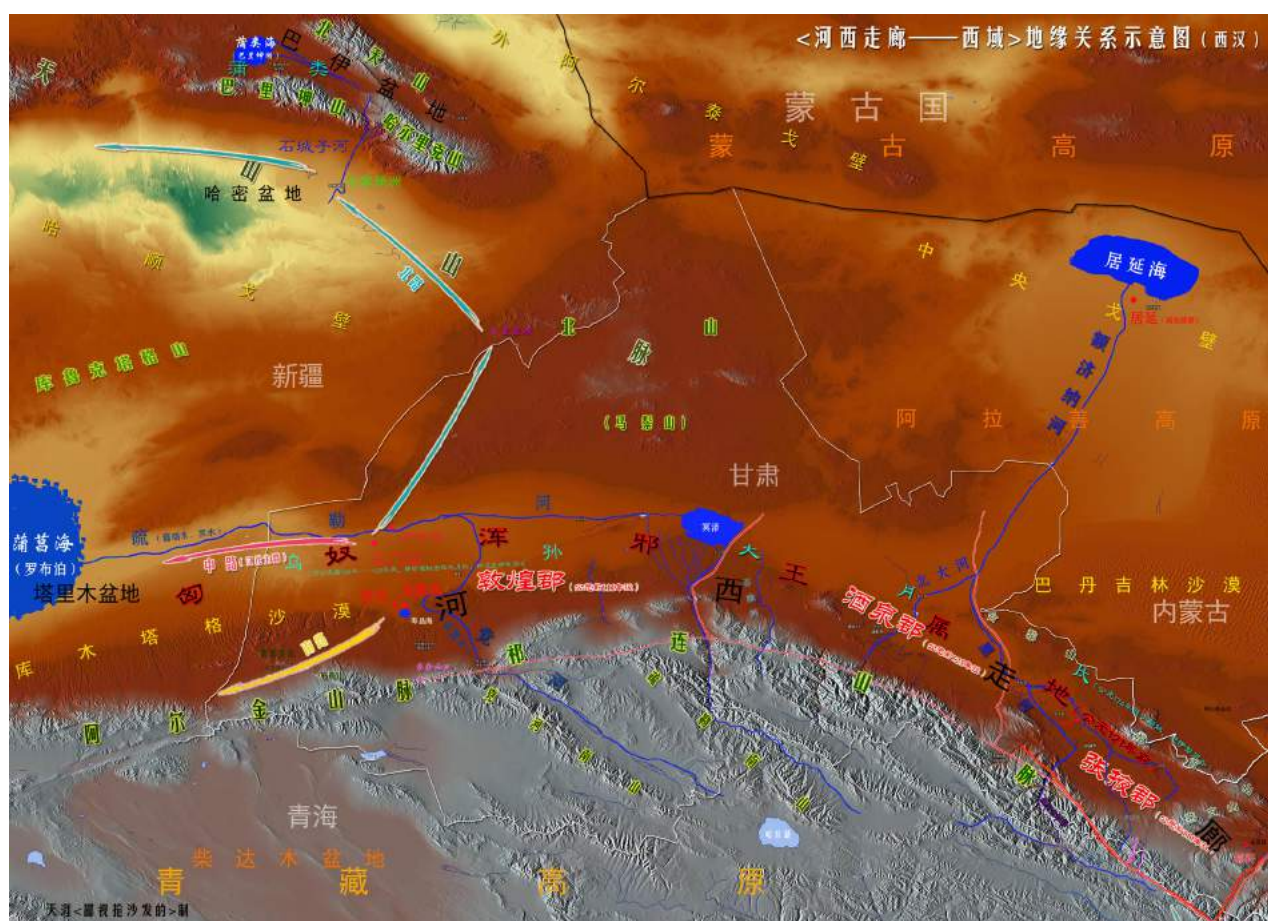
以地缘的视角来说，用“历史”来为现实利益服务话题只是一个插曲了。可以肯定的是，关于骠轩罗马军团后裔的炒作，是无法把张骞他老人家拉出来做证据了。对于张骞而言，“大秦”（罗马当时的称呼）只是他在西行过程中，听说到的一个远在世界另一端的强大帝国。在业已存在的东西方贸易，以及后来以官方贸易通道形式而建立的“丝绸之路”中，这个帝国都是中央之国可以知道的商路的终点。对于张骞来说，他现在唯一要关注的，就是匈奴人的动向了。

第三节 张骞进入黑河和北大河流域

不管张骞是在最初的行动中就突破了焉支山；还是在十年之后才进入额济纳河流域，他都注定还要在匈奴人的阴影下旅行一段时间。在匈奴浑邪王管辖的这片土地上，额济纳河及其上游支流所覆盖的区域要比石羊河流域更大。当然，以张骞的出使方向而言，他并没有必要绕到额济纳河下游去考察一下居延海的水土情况。不过仅仅在祁连山麓的额济纳河上游地区，张骞也必须穿越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才能够完成一半的河西之旅。

和所有发源于山地的河流一样，额济纳河的上游地区存在许多原本独立的支流。这些由祁连山上流下的河流，在祁连山北冲积出一片扇状的绿洲之后，再汇合成一

条河流向阿拉善高原腹地渗透。在这些上游河流中，最大的是位于东西两端的黑河和北大河。如果不考虑已经渗出走廊带的额济纳河干流，我们其实也可以将反方向对流的北大河和黑河，理解为两条完全独立的河流。事实上，现在的北大河也的确没有汇入额济纳河，而是完全成为一条由酒泉地区独享水资源的河流。在今后的解读中，我们会无数次的看到类似情况。为了获得更多的耕地，以养活更多的人，那些在中游地区就被断流的河流，并无法像它最原始状态时那样流到下游地区了。随着那些横亘在河流中游的为农业蓄水的水库的兴建，那些面积更大的古代名湖（海）也一个个地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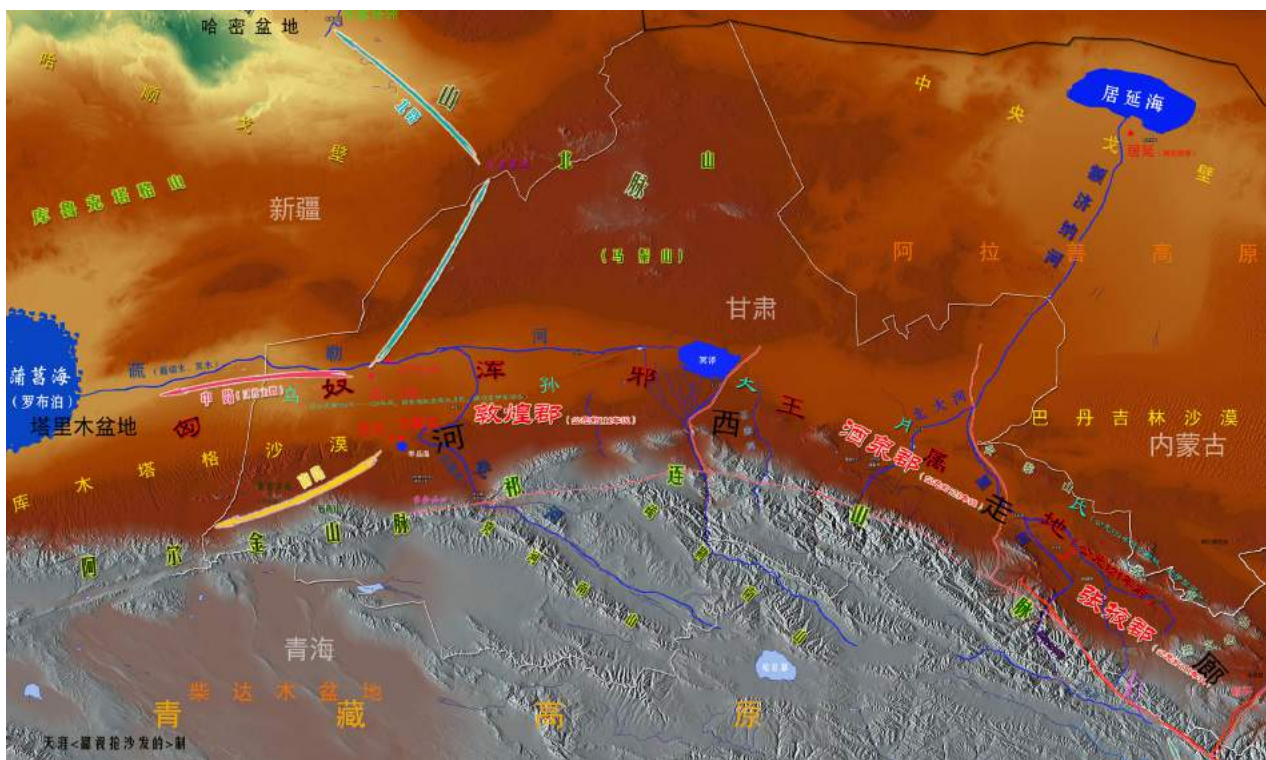


西汉河西走廊——西域地缘关系图

要是追根溯源的话，张骞也许要为河西走廊乃至整个西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承担最初的责任。就支撑华夏文明在古典时期优势地位的“农耕”生产方式来说，在提高土地承载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比原始的游牧经济更为明显的影响了生态。当然，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古典时期的农耕技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还算是小的。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工业时代，在人类可以利用化石资源所带来的技术飞跃来对这个星球进行改造时，那些没有考虑到生态平衡的急功近利之举，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对生态体系的影响程度就要远超漫长古典时期的变化了。

回到额济纳河上游的话题上来。既然北大河与黑河流域之间相互独立，那么将行政中心放在任何一区，都有可能影响到对另一板块的经营。因此在最初笼统的将焉支山以西地区建制为“酒泉郡”之后，东部的黑河流域连同额济纳河干流地区（包括居延海），被分割出了河西四郡中的另一个成员——张掖郡。而北大河流域则成为缩编后的酒泉郡核心区。实际上，如果单从额济纳河流域的结构来看，张掖郡所在的黑河流域，应该更有机会成为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西部最初的地缘核心。

这不仅仅是因为黑河流域面积更大的绿洲，以及地理位置更接近河西走廊的地理中心（只包括额济纳河与石羊河流域的话），更因为张掖在地理上的防御体系会更封闭。焉支山和祁连山的存在为张掖地区的南、东两面提供了天然的保护，而在它最容易受到压力（包括自然力的侵蚀，以及游牧民族的威胁）的北部与阿拉善高原之间，也有一条与黑河平行的山体——龙首山帮助防御。这样一个三面有山可依，中间水资源相对更充足的板块，显然更容易打动行政规划者。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西部最初的建制应该就是“张掖郡”了。



西汉河西走廊——西域地缘关系图

然而历史最终还是第一时间选择了北大河流域的“酒泉”，来承担河西走廊西部地缘核心的重任。之所以会有这种安排，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说的河西走廊西段，也就是额济纳河上游地区，其实只是河西走廊的“中段”罢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即使张骞安全走过北大河流域，他也只不过是在河西走廊走了一半路。要想完全走出匈奴的直接控制区，他还需要再横穿河西走廊的下一个地理单元——疏勒河流域。

第四节 疏勒河和党河流域的地理结构

作为河西走廊的庇护者，祁连山是非常慷慨的。石羊河、额济纳河两大水系，并不是祁连山为河西走廊做出的唯一贡献。疏勒河流域，则是另一片由祁连山之水滋养出来的绿洲。也就是说，整个河西走廊实际上，是由石羊河、额济纳河、疏勒河三大水系所覆盖。而一旦离开祁连山麓，想继续沿着青藏高原的边缘西行的话，就没有机会看到连续的绿洲带了。之所以会这样，和青藏高原乃至西域的地理结构有关。作为一条大致呈西北——东南方向，矗立于青藏高原边缘的高大山脉，祁连山还是有机会承接来自太平洋的水汽的。另有研究认为，阿尔泰山脉与天山山脉之间那个缺口（也就是准噶尔盆地东端），也会为祁连山脉和河西走廊放进一些来自大西洋的水汽。

至于到底是太平洋还是大西洋为河西走廊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就不是这里所能解答的了。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祁连山脉的确比它西侧那些同属青藏高原边缘的山脉要更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祁连山脉以西的青藏高原，是由另外两条独立山脉所维护的。一条是与祁连山脉相连的阿尔金山。如果说祁连山脉所庇护的是河西走廊的话，那么阿尔金山对应的地理单元就是柴达木盆地了。这个横亘于青藏高原北部，东至青海湖区的巨大盆地，与塔里木盆地的地理分割线就是阿尔金山脉。

只不过相比祁连山，阿尔金山能够为两侧低地所做的贡献就要小得多了。一面是拥有巨大纵深和高度的青藏高原，另一面是与之隔塔里木盆地相望，体量高出自己一个级别的天山山脉。无论是来自大西洋还是太平洋的水汽，甚至对青藏高原腹地气候有影响的印度洋水汽，都基本与阿尔金山无缘了。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绿洲带从河西走廊继续沿青藏高原向西延伸是不现实的。当然，没有连续的绿洲带，并不代表阿尔金山山麓就一定是生命的禁区。等张骞完成他的出使任务，准备从塔里木盆地南缘转回来时，我们会具体解读包括阿尔金山以及位置更西的昆仑山脉，有没有为他的行程提供帮助。

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回到疏勒河身上来。与邻近的额济纳河相似的是，疏勒河主要也是由两条河流汇集而成的。一条就是位于东部的疏勒河干流；祁连山西段的两条延伸入高原腹地的支脉——托来南山和疏勒南山，是疏勒河干流水源的主要供给者。在向北流出这两条支脉所包夹的谷地之后，疏勒河在祁连山麓的走廊地带又继承向北流淌了一段。与所有乌鞘岭以西的河流一样，疏勒河也没有机会找到一条入海路线。最终消失在戈壁沙漠之中，是它们摆脱不了的宿命。

不过命运对于类似疏勒河这样水量巨大的河流，还是更偏爱一些的。这些在荒漠之中无望挣扎的河流，总是会遵循着基本的物理规律找到一片低洼之处作为它们的最终归宿。也许是古人也认为，对于一条河流来说，不能归流入海总是一种遗憾，所以这些内陆河流最后所形成的湖泊，很多被贴上了“海”的标签。只是想做“海”

的话，你的水量必须得大，最起码得让人在终端湖泊边上有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感觉。

当然，也并不是每一处内陆湖泊都一定会被称为海的。像疏勒河水所汇流而成的湖泊，就被古人称之为“冥泽”（冥泽以南的疏勒河也被称之为“冥水”）。古人没有慷慨的为这片湖水贴上“海”的标签，也许是因为它的形态不太固定，边缘会有大片水陆相间的湖泽之地（就像云梦泽那样）。这是因为，疏勒河和它旁边从祁连山下来的河流一起，在祁连山北部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扇状冲积带。由于地势平坦和水量不固定的原因，这片冲积带中的河流与陆地的位置，并不总是固定的。而作为终端的“冥泽”，在形态上也同样有着变化。对于在华北平原治水多年的华夏民族来说，有着足够的经验来驯服疏勒河这种随意改道、漫流的行为。只不过，在这种治理卓有成效，并沿冥水开垦出大片耕地之后，“冥泽”这个疏勒河上的“中继湖”也就不复存在了。



汉西域全图

可能会有朋友感到奇怪，刚才我们不是说“冥泽”是疏勒河的终端吗？为什么又为它贴上了一个中继湖的标签呢？这主要是因为冥泽所处的位置并不仅仅是一个低洼的盆地区，事实上它只是由天山山脉的东端（北山）与祁连山脉之间包夹而成的，一条低地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疏勒河水在向北漫流，并在遇到北山阻断去路形成冥泽之后，又继续向西沿着北山南麓向西域腹地渗透了。在这种情况下，冥泽就只能算是疏勒河当中一个调节水量的中继湖了。在水量足够大的情况下，它可以变化面积自然调节下游水量。而当上游地区因自然或人为（开耕耗水量更大的耕地）

减少给水量时，冥泽就会变小甚至消失了。

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没办法在实地找到曾经被张骞记录过的冥泽了。事实上，由于中上游的开发问题，疏勒河渗透入塔里木盆地的下游河道也早已不复存在了。然而在两千多年前，当张骞踏上这片土地时，这里还是一片在西域难得一见的水草丰美之地。对于那些以游牧为生的部落来说，疏勒河漫流变道的问题并不会成为问题。只要有水和那些伴水而生的牧草，就足以支撑他们的存在了。

对于发现疏勒河有机会成为一片游牧之地的部落来说，疏勒河并不是唯一有机会大幅度提升他们人口潜力的河流。当疏勒河沿天山（北山段）南麓向西流淌一段时间后，它马上就要迎来另一条来自祁连山脉的重要河流——党河的补给了。如果不是因为疏勒河固执的向西渗透的话，发源于祁连山脉最西端，与疏勒河干流流量相差并不多的党河，完全有机会成为一条独立的河流，并在北山南部汇集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终端湖。当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党河与疏勒河是否一定要相接成同一水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一东一西，跨度基本相当于额济纳河上游流域（北大河——黑河）的两大水系存在，他们就有机会在天山山脉和祁连山之间又经营出一片连续的牧地了。



疏勒河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知晓，两千多年前那些游牧部落，是如何在疏勒河流域选择适应不同季节的牧场了。不过这条绿洲带，在被汉帝国带入中央之国体系之后的行政沿革却是清晰可见的。在帝国最初的设计中，整个疏勒河流域是属于北大河流域的“酒泉”所辖。然而帝国的统治者很快意识

到，让酒泉将行政控制力向西延伸到这么远的距离有些不现实。特别是在疏勒河流域，在地理结构上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因此很快，酒泉郡的西部边界被定在了“冥水”西岸。而河西走廊伴随着疏勒河水转向西的部分，则分治出了“敦煌”这个河西四州中最为著名的地缘标签。

也许张骞在穿越疏勒河流域，准备进入西域时，心里就已经在为帝国将来控制这片土地做行政规划了。以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他后来呈交给汉武帝的报告，主要内容其实就是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地缘结构分析。当然，还没有走出河西走廊的

张骞，还要花上许多时间来完成这份报告。不过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这时候的张骞心里很可能有些遗憾。因为如果不是被匈奴人拦截滞留河西走廊达十年之久的话，或者说一开始就顺利穿越石羊河、额济纳河绿洲的话，他应该在进入疏勒河流域之时，就已经脱离了匈奴的直接控制区了。这十年之差，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他接下来的行程路线，以及找到大月氏人的时间和地点。而这一切的变化，除了与匈奴人有关外，还与另一个曾经活动于河西走廊的重要部族——乌孙人有关。

第五节 大月氏击败乌孙完控河西走廊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匈奴人到来之前的河西走廊应该是月氏人的领地。假如仅仅把河西之地的范畴限定在额济纳河——石羊河流域的话，这种理解的确没有错。不过当我们把视线西移到疏勒河流域的话，就会发现这一带还存在一支与大月氏人势不两立的部族——乌孙。相比大月氏人，乌孙人可控的牧场要小一些。党河流域也就是现在的敦煌一带，是乌孙人的根基之地。很显然，如果乌孙人要想发展，最自然的选择就是东向控制整个疏勒河流域了。然而有这种想法的，并不仅仅只有乌孙人。要是大月氏人不想去挑战黄土高原的中央之国的话，他们唯一的选择，也是向同属一条走廊带的疏勒河流域渗透了。

没有人能够说清乌孙人与大月氏人，到底是谁先渗透到了疏勒河流域的东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近邻之间的地缘博弈是在所难免的。从实力来看，有两条绿洲带在手的月氏人，明显要比可能还不能完控整个疏勒河流域的乌孙人要强一些。在东方的刘邦终于击败项羽，并将中央之国带入了新的帝国时代时，乌孙人与月氏人之间的博弈也出现了阶段性结果。随着乌孙王“难兜靡”被月氏攻杀，月氏人终于成为整个河西走廊的主人。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阶段性结果，是因为乌孙人和月氏人之间的恩怨还远没有结束。失败并被迫离开河西走廊的乌孙人，转而投奔了月氏人的另一个对手——匈奴。对于匈奴人来说，有这样一支和自己有共同敌人的部落前来投奔，当然是一件好事了。在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与月氏人的决战中，这些与月氏有着国恨家仇的乌孙人，无疑会有着更强的战斗力。并不能说，匈奴后来对月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就是得益于乌孙人的加入。但乌孙人在与月氏人的战争中，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乌孙人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也使得他们有机会在匈奴帝国中保持原有的部落状态，并最终得以复国。

作为匈奴人的亲密战友，在匈奴攻占整个河西走廊后，乌孙人应该就已经回到了疏勒河流域。当然，这时的他们无论是已经独立为国，还是隶属于匈奴体系的一部分，都应该要接受匈奴浑邪王的节制。至于和当年的乌孙人一样，战败离开河西走廊的月氏人，就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去处了。从地缘板块的角度来看，离开了河西

走廊的月氏人有五个选择。首先被划掉的选项，自然就是乌孙人当年的选项——北向投奔蒙古高原的匈奴人。也许向东进入黄土高原臣服于汉帝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样的话，月氏人就会有很大的机会像乌孙人那样借力回到河西复国。然而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月氏人并没有遵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外交原则做这样的选项。阻碍月氏人做出这个战略上应该是最明智选择的原因，应该是双方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让游牧为生的乌孙人，融入同属游牧体系的匈奴是很容易的；而让月氏人去信任农耕文明的汉帝国，就不那么容易了。

既然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都不能成为月氏人败退的方向，那么向南退到祁连山南也是一种选择。事实上，月氏人也的确这样做了。这些退入祁连山南和羌人混居的月氏人，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小月氏”。只不过，选择这条高原之路的月氏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月氏的主力并不认为，祁连山南能够提供给他们充足的牧场。

现在摆在月氏人面前的道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西迁了。不过具体分析的话，这条西迁之路其实还可分为两条，或进入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或进入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尽管在大多数人眼中，天山南北似乎应该有着共同的环境特点，并拥有共同的地缘文化，但实际天山的阻隔使得这两大板块之间的环境存在很大的区别。这种环境差异不仅影响了月氏人的选择，也影响了后来丝绸之路的拓展方向。至于这种区别到底是什么，这片被我们统称为西域的土地，内部地缘结构又是怎么划分的，则是我们接下来解读的方向。

第十章 西域东疆盆地区的地缘结构

第一节 天山南北降水量的差异及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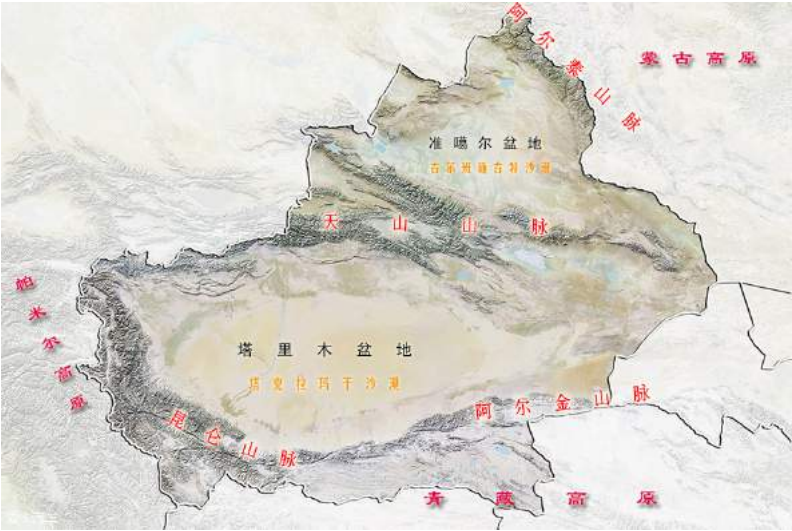
用一个字形容西域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相信选择“旱”字的朋友会最多；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西域基本地理结构的话，初中地理教科书（我读书那个年代）中概括的“三山夹两盆”，应该是最形象的了。所谓“三山”，指的就是北部的阿尔泰山脉、中部的天山山脉，以及南部的昆仑山脉（包括部分阿尔金山脉）；包夹在这三大山脉之间的两片低地：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就是所谓的“两盆”了。这种高低错落的地形特点，加上整个西域少雨干旱的气候特点，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盆地腹地这种在东亚博弈中代表着最高农业潜力的地理形态，变身成了大而无用的荒漠地带。以至于提到天山南北的两大盆地时，盆地腹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往往更让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后者）。

既然天山南北的基本环境都不尽如人意，那么对于被迫西迁的月氏人来说，是否仅仅依靠丢硬币这类方式就可以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呢？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分析蒙古高原时已经提到过的，让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感到陌生的“西风带”，已经帮助月氏人做出了选择，那就是天山北麓才是月氏人西迁的目标之地。就月氏人之前所控制的河西走廊来说，其东亚核心区与西域之地的连接枢纽地位，并不仅仅体现在地理结构上。这种过渡性的特点在气候上也同样有所表现。来自太平洋的水汽和来自大西洋的湿润海风，都不同程度的为河西走廊的绿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当我们把视线转移到西域的话，就会发现这一板块所能指望的，就只能是那些来自大西洋的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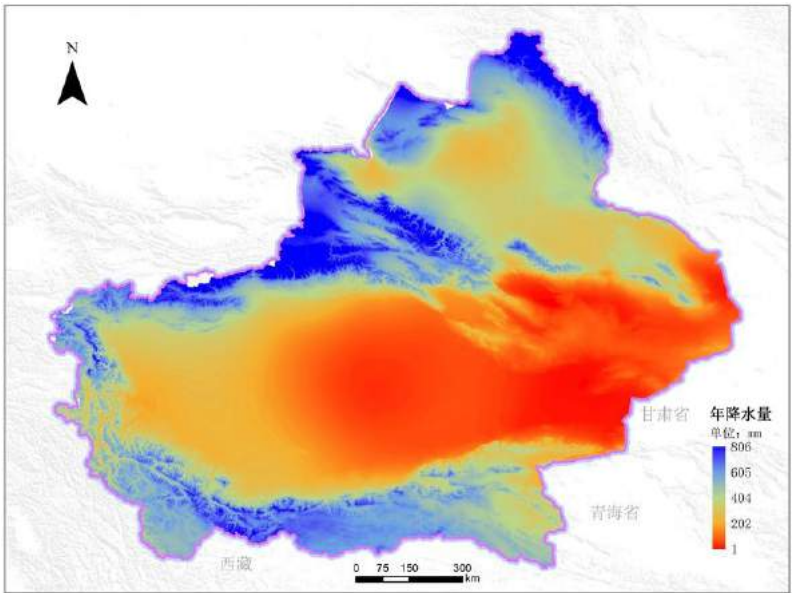
从海拔上来看，分割西域的三大山脉都有机会拦截住来自大西洋的水汽。在这片水汽资源本来就少的大陆腹地，这些山脉的迎风面是最有机会截留住湿润的水汽，并迫使其抬升，在遇到上空冷空气后形成降雨的。影响水汽分配的最终因素，在于山脉的位置排列。谁排列在前面，谁就能够具备最强的地缘潜力。从这点来看，最为悲剧的就是西域盆地区与青藏高原的分割线：昆仑——阿尔金山脉。天山山脉与二大山脉共同的发源地——帕米尔高原一起，在位置上完全封堵住了大西洋水汽的来路。

不幸中的万幸是，生长在世界屋脊边缘的昆仑山脉平均海拔达到了6000米，比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天山山脉要高出许多。那些被天山——帕米尔高原漏过的水汽，依然有机会为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做贡献。只不过基于位置和海拔的原因，昆仑山脉的降水呈现由西至东逐渐走低趋势。这并不仅仅在于西昆仑地区的位置更接近大西洋，也在于昆仑山脉本身也是由西至东逐渐走低。位置和海拔因素一结合，在地

缘上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不管是准备西迁的月氏人，还是试图凿空西域的张骞，如果想在西出疏勒河流域后，选择沿昆仑山北麓西进的话，他们所面对的将是整个西域盆地最令人绝望的山麓地带之一。既然昆仑山北麓的情况是那么的不尽如人意，那么在塔里木盆地的另一面——天山南麓的情况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西域地理结构图



新疆年降雨量图

才是最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时，他们就会发现，塔里木盆地干旱高温的气候其实也是一笔财富。充足的光照，以及沙漠的高导热性造成的巨大昼夜温差，不仅让塔里木盆地的水果能产生更多的糖分，也更容易锁将糖分锁住。这也正是为什么，大家一提到塔里木盆地边缘那些绿洲之地，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比内地产出要甜许多的水果了（哈密瓜、吐鲁番的葡萄、库尔勒的香梨、和田的大枣……）。

如果你对比的是昆仑山北麓，那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确会更好些。这是因为尽管天山北麓才是迎风面，但那些上升到山脉最高段凝结成冰雪的水汽，却并不会给那些“雪山”剃个阴阳头，仅仅覆盖在山脉的北面。那些覆盖在分水岭之南的高山之雪，在融化之后就成为天山南麓的生命之水。当然，比起整个天山北麓因为迎风可以有相对充足的降雨，基本依靠高山雪水补给的天山南麓，绿洲的体量就要小得多了。

这些因天山雪水而生的被荒漠包围的绿洲，由于规模太小，其实并不太适合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生存。反而是精耕细作，技术上可以以用更少水资源承载更多人口的农耕方式，更有利于挖掘天山以南地区的地缘潜力。当活动于此的人类最终意识到进驻绿洲进行农业开发，

对于我们来说，西域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一定会有塔里木盆地那些香甜的水果。然而对于大规模迁徙的月氏人来说，他们并没有时间去改变生活方式来适应塔里木盆地的环境。月氏人的文化中虽然已经融入了驻城自守的定居因子，但基本属性还是属于游牧文化体系。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像河西走廊这样拥有大片连续草场（包括换季迁徙的高山草场）的板块，才是他们西行的目标。从这点来说，降水更多的天山北麓肯定是更好的选择。当然，阿尔泰山南麓在方向上也是一个选择。只不过这一区域，注定是属于那些从蒙古高原游牧而来的匈奴人的。被匈奴人击败的月氏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去主动摸老虎屁股的。

由于整个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一样，海拔由西至东逐渐走低，因此无论天山南北，包括北部同样走势的阿尔泰山，降水都是呈现西高东低的趋势。对于试图向西渗透的华夏文明来说，这无疑不是个好消息。因为从地理结构上看，虽然河西走廊看起来能够很快过渡到天山这条西域中轴线上，但东天山却根本无力像祁连山那样，在山前供给出一条绿色走廊来。正是有了这个巨大的荒漠间隔，汉帝国和他的后来者即使发现了天山西段的农业潜力，也很难稳定经营。汉帝国将来要遇到的这些麻烦，准备西迁的月氏人同样也会遇到。不过作为游牧民族的他们并不需要像华夏族那样，去思考步步为营的延伸连续的农业带。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快速跨越天山东段的这片干旱之地，在天山北麓寻找到一片水草丰美之地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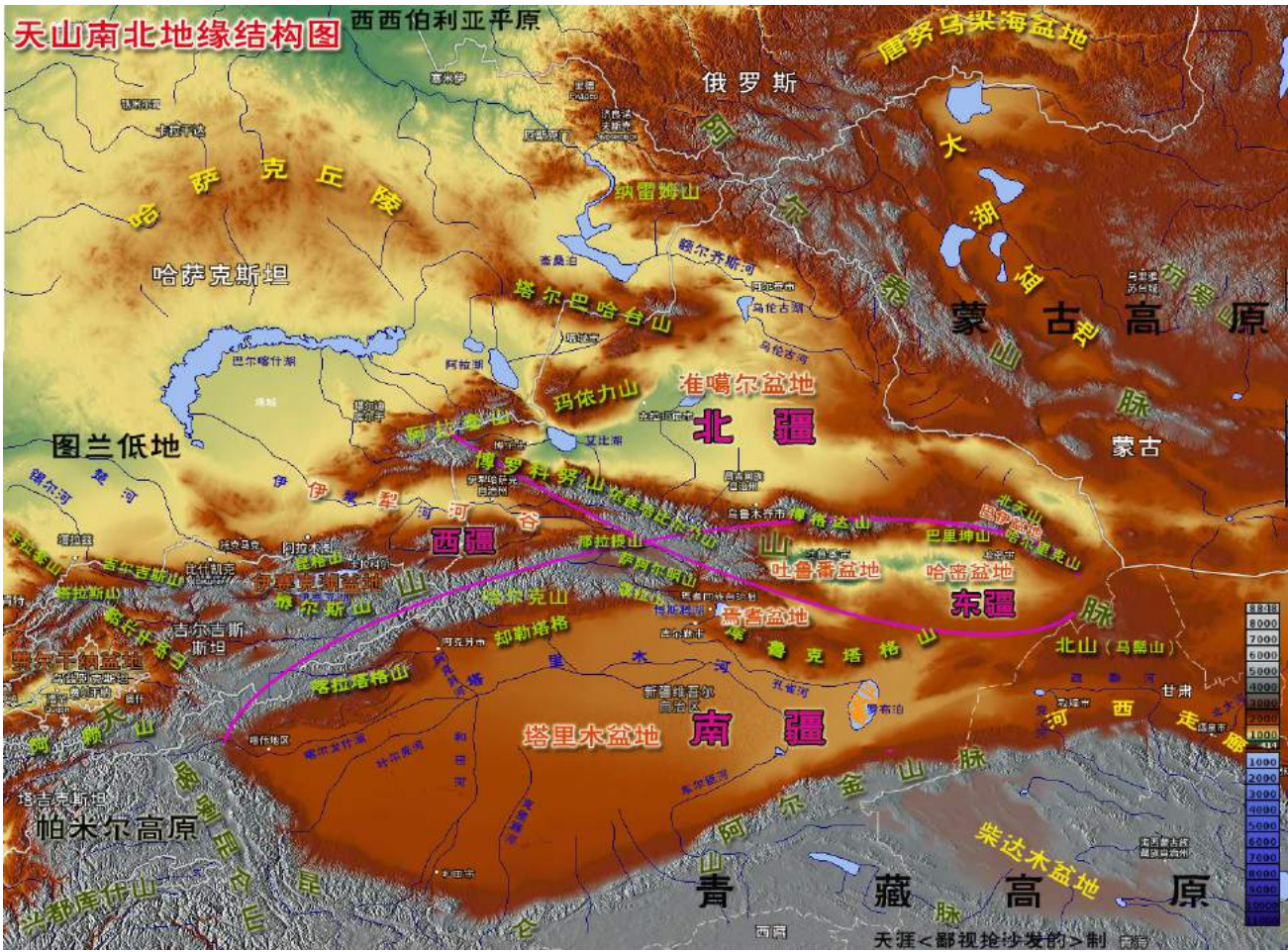
第二节 东疆盆地区的地理结构

既然月氏人已经被迫沿天山向西域纵深迁移了，那我们就很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天山南北的地缘结构了。前面我们也说了，西域之地也经常被概括为“天山南北”。结果它现在的行政标签，又可以被大致分割为南疆、北疆。然而当我们仔细研究天山南北的地缘结构时，就会发现仅仅以天山主脉为中轴线，将西域划分为南北两块并不精确。基于天山山脉的地理结构，以及现实的地缘政治形态，在南北两疆当中，其实还可以分割出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板块——东疆和西疆来。至于这四个板块之间的地缘关系，以及各自的地缘特点，也是我们后面所要分析的内容。

每一个地缘板块的独立都必须有相对清晰的地理边界，以使它们有形成独立地缘特点的基础。简单的依照几何原则来做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西域内部这四个亚板块也不例外。单就南、北疆的划分来说，其地理分割线是十分明显的。天山山脉就是二者的地理分割线，准噶尔、塔里木两个盆地区就是它们的基本地理形态。现在的问题在于，绝大部分山脉并非呈完美的线性排列，地质运动总会使它们的边缘或多或少的延伸出一些支脉。这些支脉与主脉之间的夹角地区，有时甚至会封口为一个独立的盆地，并因为它位于板块连接处的枢纽位置（通常是在两端），而获得与依附主脉而生的一类地理单元同等的地缘地位。典型的案例，就是位于秦岭最

东端，由伏牛山等支脉合围而成的“洛阳盆地”。这个连接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战略枢纽，其在中央之国的地缘等级，足可以与依秦岭而生的关中盆地相媲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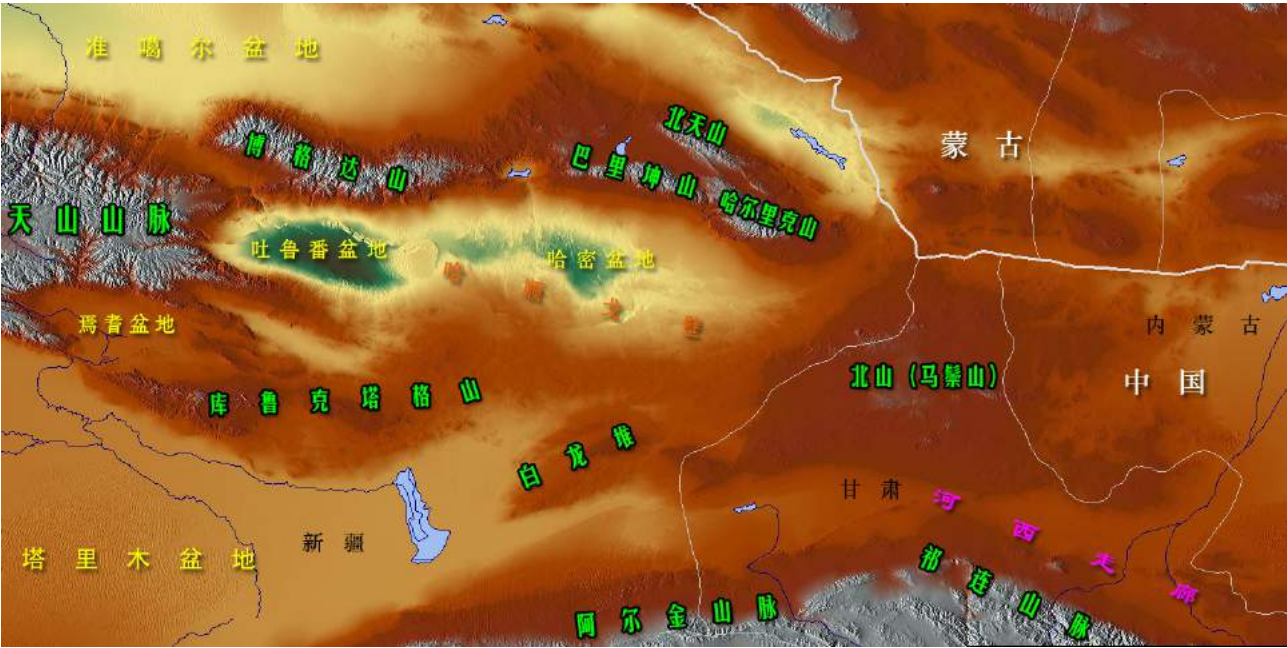
仔细观察天山山脉的地理结构，我们就可以在它的东西两端各发现一个明显的夹角、盆地区。其中东部与河西走廊相连的部分封闭性较好，呈完整的盆地结构。不过天山东麓的这个地理单元，与其说是一个“盆地”，不如说是一个“盆地带”。因为它的内部最起码有三个体量相当的盆地——哈密盆地、吐鲁番盆地，以及大部分朋友不太熟悉的“焉耆盆地”。这也意味着，单从地理结构的角度来看，“东疆”的概念应该是由这三个盆地共同组成的。然而“地缘”与“地理”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要考虑人的因素。基于人类活动的原因，“东疆”作为地缘标签存在的话，一般只是包括哈密、吐鲁盆地地区。至于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我们在后面的内容中会逐渐揭开这个谜团。可以透露的一点是，这和神秘消失的楼兰古国有关。



天山南北地缘结构示意图

东疆板块能够合围成一个封闭的盆地带，除了在主脉南部延伸出了一条叫作“库鲁克塔格”的支脉以外，更要感谢一段叫作“北山”的山体。正是这片轮廓呈三角形的山地矗立在天山山脉的最东端，东疆板块才有机会呈现完美的盆地状。从地理

结构上看，又被称之为“马鬃山”的北山，不仅直接为东疆盆地位置最靠东的“哈密盆地”封口，更成为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地理分割点。如果最终控制河西走廊的是来自西域的政治力量的话，也许这个颇有一些体量的地理分割点就会被划入西域内部的某一行政区了。但事实上，这种控制力是来自于东方的。因此在现实的行政规划中，北山的绝大部分是归属于覆盖河西走廊的甘肃省。在行政地图上，它与乌孙人曾经游牧过的疏勒河流域一起，成为甘肃两头大、中间细的哑铃状地理结构的西头。



东疆盆地区示意图

按照我们在东亚大陆的经验来看，能够在走出河西走廊绿洲带之后，就面对东疆这样一个盆地区，绝对是一种幸运。理论上，这个盆地区四周山地上的河流都会遵循自然规律向盆地汇集，并在盆地冲积成一大片湖泽、平原之后，继续滋养着这片土地。对于像月氏人这样的游牧民族来说，盆地腹地的那些水草丰美之地，以及周边山地上那些高山牧场，足以在一年当中的各个季节为他们的牛羊提供牧草。至于向西渗透的华夏民族，更可以在这些盆地腹地施展他们治水和精耕细作的本领，将东天山腹地开耕成塞外江南。

从体量上来看，东疆盆地区的面积几乎与河西走廊不相上下。如果东疆盆地区的自然条件真的如我们想象的这么好的话，古典时期的中央之国在坐实河西走廊之后，应该完全有机会将自己的核心控制区延伸到此的。也许过于突出的位置会影响中央之国在这一区域经营的稳定性，不过盆地地形结构使得中央之国有机会沿周边山地构筑他们最擅长的防御体系，以弥补地理距离上短板。只要盆地腹地的自然条件足以供给出足够多的人口。

然而这一切最终并没有在古典时期成为现实。尽管因为地理距离和交通的原因，

东疆地区与东亚核心区的地缘关系是西域内部最为紧密的，但中央之国的主体文化仍然没有机会在此占据优势。简单点说，东疆地区在古典时期并没有成为“汉地”。之所以会这样，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字——水。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包括天山山脉在内的西域三大山脉，都是呈现西高东低的走势。这也意味着，无论从海拔还是与西风带的亲密度来说，东部山麓都要更为干旱。体现在东疆盆地区上，就是流入这些盆地的河流，几乎都没有机会在盆地腹地形成河流纵横的冲积平原。由于东疆盆地区实际上是在天山主脉的南边（所以简单划分南、北疆时，是归属于南疆板块），因此盆地内有限的水资源补给，几乎完全要仰仗来自西、北方向的天山主脉上的高山之雪。

至于盆地区东南边缘那些海拔更低的山地，比如库鲁克塔塔山、北山，在天山主脉的拦截之下，就很难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河流供给盆地腹地了。如果换个方向，如天山主脉延伸在东疆盆地区的南面，而盆地区的北面是海拔更低的支脉的话，相信整个盆地区的自然条件会好得多。最起码那些西来的水汽有机会润泽更多的山麓，供给出更大片的山地。然而就我们所能够考虑到的地缘因素来说，此类最基本的地缘因素却又是人类最难以改变的。所以无论是古典时期在此博弈的各个民族，还是现在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立足于现实的地理条件，开发最有可能形成绿洲的盆地北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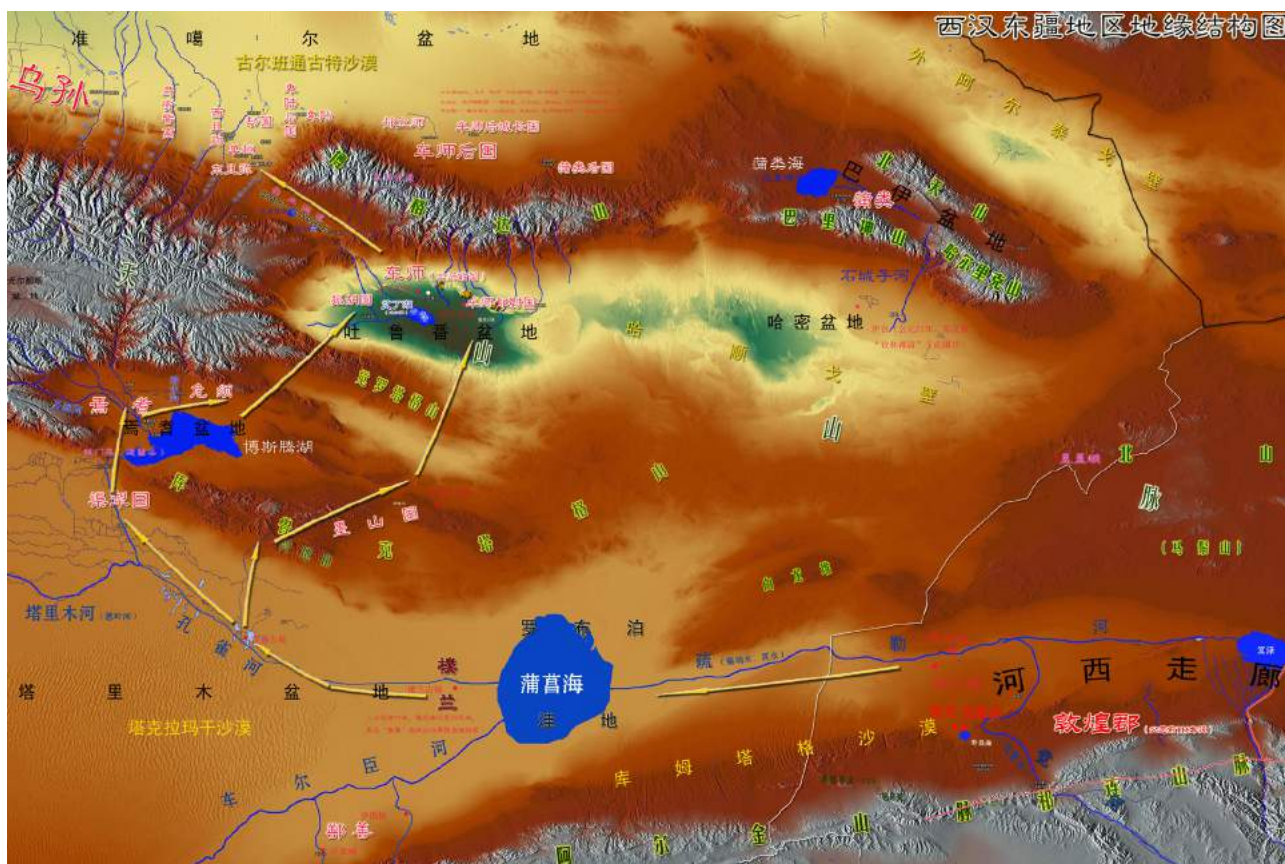
第三节 东疆三个盆地的地缘潜力

既然东疆盆地区基本上是依赖西、北方向的天山主脉上的雪水供给，那么这也意味着你所依靠的那段山体越高，南北纵深越宽，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水资源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最靠西的焉耆盆地，所处的位置是最为有利的。它西、北方向所依附的那段山体，是天山山脉中较厚的一段。依靠这些来自西北方向的雪水，焉耆盆地之中不仅形成了现在新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甚至还有余力南向流出盆地，向塔里木盆地腹地延伸出一条西域名河——孔雀河来。

说到孔雀河，它的知名度应该比“焉耆盆地”高多了。尽管在两千多年前，焉耆盆地中的“焉耆”国也是西域诸国之一，不过比起在孔雀河下游神秘消失的楼兰古国来说，大家对前者的熟悉度就要低得多了。不过提到紧贴焉耆盆地南缘，孔雀河谷出口处的“库尔勒”的话，很多朋友可能就知道了。毕竟这些年来，库尔勒香梨的名气已经差不多等同于哈密瓜和吐鲁番的葡萄了。“背依高山雪水足，面朝沙漠光热多”的环境组合，使得这三个地方的水果都足够的香甜。

孔雀湖和楼兰国的问题，我们在后面不久就会解读到，现在还是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东疆盆地区内部来。在张骞凿空西域的年代，分布在博格腾湖西、北两侧的，是“焉耆国”和“危须国”。其中纵深最大的焉耆国人口过万（史载“口

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算是西域位列前三的大国了。加上危须国的几千人（史载“口四千九百，胜兵二千人），焉耆国、危须国所定居的半个焉耆盆地的人口承载量，应当算是相当不错了。如果博格腾湖东南方向的另外半个焉耆盆地，以及与焉耆盆地体量相当的吐鲁番盆地、哈密盆地，都有这样的条件话，那么整个东疆盆地区就足以吸引月氏人入驻，并以此为核心经营向天山南北渗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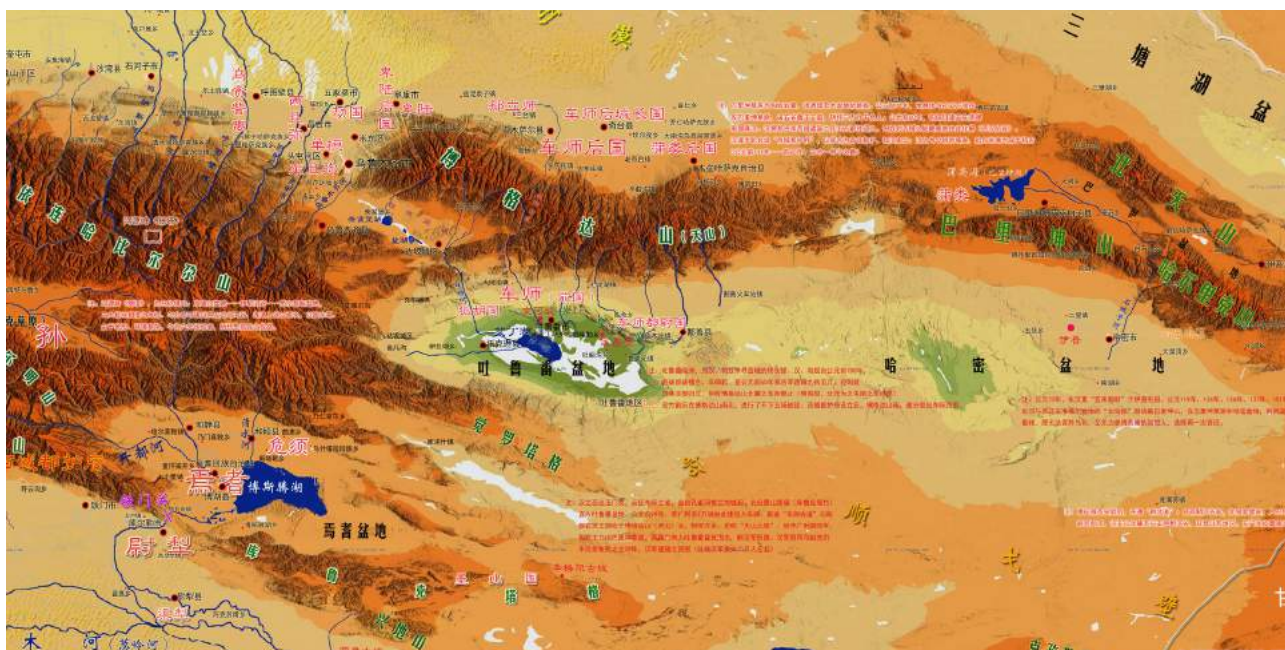
西汉东疆地区地缘结构图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由于焉耆盆地的水源基本来自于西、北两个方向，所以这个东疆盆地区当中条件最好的盆地，利用率其实也只是一半。也就是说，不管居于其间的部族是从事牧业还是农耕，博格腾湖的西、北方向都是最好的选择（现在有和静县、和硕县、博湖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四个县级行政区分布于此）。而缺乏淡水补给的东南部，就只能让位给戈壁大漠了。这也就是说，那半个水草丰美的焉耆盆地所能承载的人口，就是全部盆地的潜力了。

对于人口至少在二十万左右的大月氏人来说，仅仅依靠人口承载量数万的焉耆盆地显然是不够的。那么东疆盆地区的另两个成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到月氏人呢？从地理形态上来看，并排排列的吐鲁番、哈密盆地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无非是吐鲁番盆地更深一些，而哈密盆地略大一些罢了。然而在干旱的天山南麓，这两项指标都不是影响板块地缘潜力的重要参考选项。唯一重

要的要素只有来自高山的雪水，谁能够从天山之上获得更多的雪水，谁就能够在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就位置和周边山地纵深而言，占据优势的显然是吐鲁番盆地。紧邻焉耆盆地的它，和焉耆盆地一样，可以从西、北两侧的天山主脉上得到天山雪的润泽。至于哈密盆地，情况就要悲观得多了。它唯一能依靠的，只是北部被称之为巴里坤山——哈尔里克山的两段山体。这两段东西相接的狭长山体，算得上是最后一段山顶有积雪的天山主脉了。再往东的话，就是天山山脉的最后一段山体——北山了。而这个身兼西域与河西走廊地理分割线，以及为东疆盆地地区封口双重任务的山体，平均海拔不到两千米。能够为那些顽强生存于此的游牧民提供水源的，除了那每年仅仅 80 多毫米的降水以外，就只有低洼处才能一见的泉水了。



汉西域全图

这样看来，吐鲁番盆地是最有可能具备和焉耆盆地一样地理条件的了。即由于能够承接来自西、北两侧天山雪水的补给，而在盆地腹地形成半个水草丰美之地。事实果然如此吗？情况似乎并不那么乐观。问题还是在于周边山体的体量上。从所附的《西汉东疆地区地缘结构图》上，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围就吐鲁番盆地的山体，显然和围就焉耆盆地的山体，在体量上不属于一个级别。当然，比起哈密盆地来说，吐鲁番盆地的情况又要好上许多了。后者除了在盆地北缘有机会开发出些许绿洲来外，绝大部分土地都是被干旱的荒漠所覆盖。如果“盆地”之名，以及地图上那代表低海拔的“绿色”，让大家对其腹地产生幻想的话，那么我们还有另一个地理标签来帮助你打消这个幻想，那就是哈顺戈壁。这条由吐鲁番盆地东南部起，覆盖哈密盆地大部的戈壁带，最终一直延伸到了北山西侧。



哈顺戈壁



艾丁湖

吐鲁番盆地在东疆盆地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水资源结构，还体现在其腹地的形态上。和焉耆盆地一样，天山之上汇集而来的雪水也有机会在这个中国陆地的最低点（海拔负155米）汇聚出一片湖泽——艾丁湖。然而在吐鲁番盆地的高蒸发量下，河流所带入的矿物质最终被浓缩在了剩余的湖水里。也就是说，艾丁湖是一个咸水湖。实际上，艾丁湖水中的盐分提高，与周边人类活动的加剧也有密切关系。人类在山麓所截流用来作农业开发的雪水，在滋养出绿洲的同时，也让艾丁湖的湖面不断缩小。仅仅是在最近半个多世纪，湖水面积就已经缩小了八成多。

当然，也不是说艾丁湖这样的盐泽之地，周边就是生命的禁区了。只不过，能在这种缺水环境下生成的些许荒漠化草原，已经不足以成规模的承载人类活动了。让艾丁湖区成为那些能适应此环境的动物天堂（比如野骆驼），是最合理的选择。艾丁湖区的恶劣环境，很自然的缩小了吐鲁番盆地的土地利用率。不过在靠近盆地西、北边缘，那些能第一时间承接到天山雪水的低地上，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居民

却利用技术改善了生态环境，扩大了绿洲面积。这项工程是那么的成功，以至于我们在小学地理课中都应该读到过对它的赞美之声，它就是“坎儿井”。

第四节 吐鲁番盆地的坎儿井的作用

对于坎儿井的基本构造，相信大家都会有些印象。简单点说，坎儿井就是一条将天山雪水引入绿洲的地下暗渠。而为了对这条暗渠进行日常维护，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口连通地面的竖井。通过这类暗渠引水，并非吐鲁番地区的独创，在中亚和中东地区都有过类似的做法。不过从水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来看，吐鲁番的坎儿井工程可以算得上是性能最突出的了。而这又与吐鲁番盆地特殊的地理构造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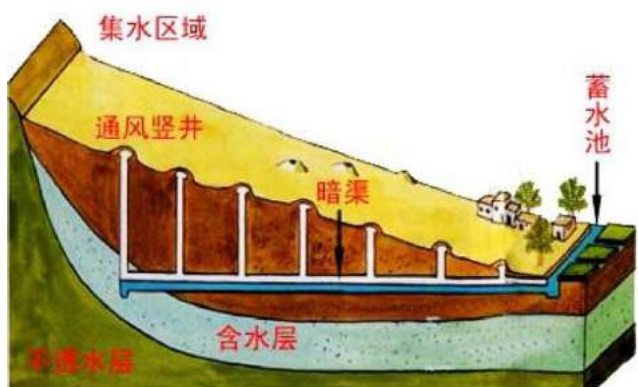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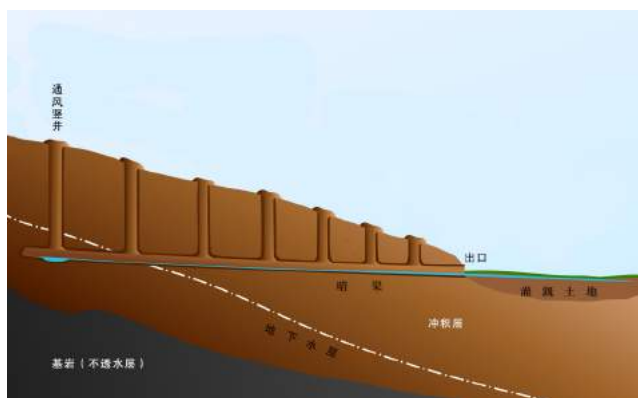
前面我们也说了，以天山南麓的降水情况而言，基本没有可能支撑大规模的人类生存，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来自天山之上的雪水了。然而吐鲁番本身的气候条件，对于山脚下的人类能否得到这些珍贵的雪水，又造成了很大影响。作为中国地势最低的盆地，吐鲁番盆地也比西域的其他地区更容易积聚热量（年降水量 16 毫米，蒸发量却可达到 3000 毫米）。在这样的高温烘烤之下，雪水甚至还没有流到低地就必须在荒漠化的土地中穿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真正能被人类所利用的雪水有多少，就很难说了。

不过吐鲁番盆地的高温虽然对人类利用水资源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地理环境却弥补了这一不足。当天山雪水不得不穿行于戈壁之中时，那些干燥的砾石却并不足以存住水。也就是说，这些雪水大多数并没有暴露在阳光之下，而是渗透到了戈壁的下面成为潜流，以渗透的形式向盆地的最低点——艾丁湖聚拢。对于人类来说，自山坡开始开挖暗渠，从这些地下潜流当中引水的“坎儿井”，就是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下诞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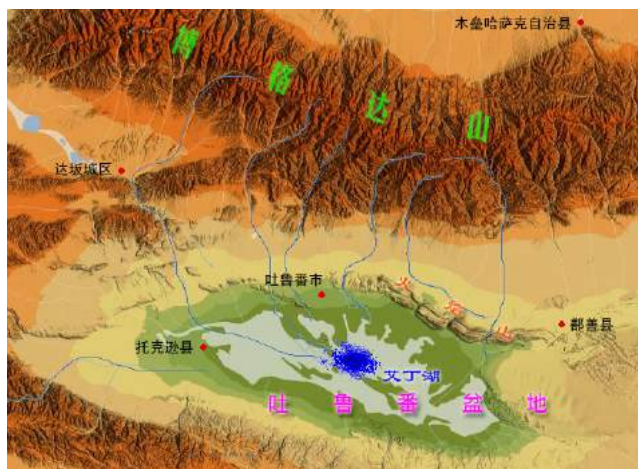
像吐鲁番盆地这样，雪水从戈壁下面潜行的情况在西域并不少见，毕竟这是一个雪山与戈壁并存的世界。然而真正能利用坎儿井来有效利用水资源的地区，却并不多。在新疆现存 1600 多条坎儿井中，大部分都是分布于吐鲁番盆地。以至于我们一提到坎儿井，首先想到的就是吐鲁番。实际上，在吐鲁番盆地隔壁的哈密盆地，其盆地北侧有机会从天山主脉获取雪水的哈密绿洲，也在利用坎儿井扩大绿洲面积。只不过从规模上看，无法与吐鲁番盆地媲美罢了。

影响两个近邻盆地可利用水资源的原因，除了吐鲁番盆地有更多来自天山的雪水补给以外，还和吐鲁番盆地的一个特殊地理结构有关。我们在地图中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与哈密盆地天山南麓的自然过渡不同，吐鲁番盆地在过渡到低地区时，又因为地质运动横亘出了一条东西向的山脉。这条海拔不过数百米的细长山脉，在中国的知名度可以说比吐鲁番和坎儿井还要高。即使是没有在课堂中知晓上述两个地缘标签的人，也应该对它有所耳闻，它就是“火焰山”。

提到火焰山，我们自然就会想到西游记。这部在绝大部分人童年记忆中出现过的神怪小说（电视剧），对火焰山的描写固然是有夸张的成分。但实际上，这片因干旱而寸草不生的山地除了上面没有着火以外，给人的感觉的确有如火炉一般。然



坎儿井示意图



吐鲁番盆地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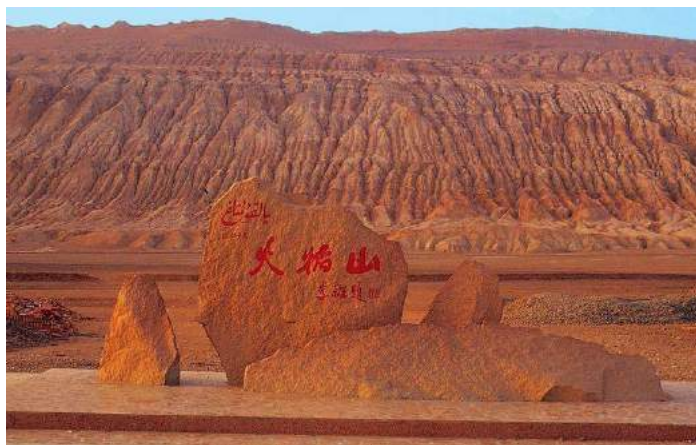
而正是这样一条看起来完全和“水”对立的火焰山，却和吐鲁番绿洲的生成、做大有着直接的关系。也正是有了它，吐鲁番才有可能大规模的利用坎儿井来截留那些珍贵的雪水。

我们知道，横亘在吐鲁番盆地北部的，隶属于天山主脉的博格达山，海拔最高处达到了 5445 米。而吐鲁番盆地腹地的最低点——艾丁湖，却为负 154 米。这样巨大的相对落差意味着天山雪水无论从地表还是地下流淌，都会以极快的速度渗透。而对于试图在中游地区依靠与地表夹角更小的暗渠截流的坎儿井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利好消息。如果雪水渗透速度过快的话，坎儿井的开挖者们甚至会很难找到一条成型的地下河流。就一项引水工程来说，水源处最好处在一个封闭或流速较慢的蓄水状态，才能提高有效利用率。

在现在的诸多引水工程中，在源头处筑坝蓄水是最为常见的做法。然而，我们不可能去要求两千多年前的人，就有这样的技术能力在那些天山雪水的源头下方筑一道坝，以使它们更多的蓄积在戈壁下面。不过火焰山的存在，却天然的帮助人类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一条横亘于天山脚下，异军突起的山脉，天然的承担了缓阻天山雪水的作用。使得火焰山北的地下雪水得以蓄积起来，成为坎儿井的水源。当然，即使没有人类的开发、引导来将天山雪水用来在火焰山南北进行农业开发，在自然力的作用下，这些雪水最终也会在火焰山中打开一些缺口，继续向腹地流淌的。事实上，火焰山中也的确存在很多这样的历



坎儿井



火焰山



吐鲁番葡萄沟

经千百万年而形成的谷地。而这些生长在炽热山体中的谷地，由于更有机会得到天山雪水的滋润，也成为吐鲁番绿洲的典型代表。我们所熟知的“葡萄沟”，就是生成在这样的谷地中。

自然界的鬼斧神工，加上人类的巧妙设计利用，使得早在两千多年前，火焰山南北就出现了多块绿洲。尽管就“坎儿井”这项工程本身来说，一直以来有说法，认为是在汉帝国开发西域之后由中原传入的。不过即使这种巧妙设计融入了中央之国的智慧，却也并不代表先期生活于此的土著居民，就没有办法从戈壁滩下那丰富的含水层中获取淡水资源了。事实上，在汉帝国的使者到来之前，吐鲁番盆地就已经存在了一个能够筑城，并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姑师国（车师）。而对于汉帝国来说，车师国和吐鲁番盆地的重要性，更要高于自然条件更好的焉耆国和焉耆盆地，以至于在汉帝国的历史中（西汉），至少对车师进行了五次征伐，并煞费苦心的将之分裂成数块。

在东疆盆地区所属的三个盆地之中，吐鲁番盆地并不算是条件最好的，但其在东疆乃至整个西域板块，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这一地位并不是现在才显现的。之前

我们也说了，以吐鲁番绿洲为根基之地的“车师国”，早在汉帝国开拓西域时期，就已经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能够取得如此地位，自然不是因为大家想去看火焰山的奇观或者想去吃葡萄了。在影响一个板块地缘地位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它本身的农业潜力，而是它的区位。吐鲁番盆地能够两千多年中压倒它的两个邻

居获得更多的关注，正是因为它处在沟通天山北路的枢纽位置。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从河西走廊经东疆盆地区进入天山北麓的话，无论是从焉耆盆地还是哈密盆地插入，最终都必须经由吐鲁番盆地转进。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必须”，其实指的是最合理的选择。要是一定想在干旱少水的荒漠地区体验生活，或者翻越高大山脉考验意志的话，就另当别论了。只是对于计划官道路线的政治家和必须计算成本的商人来说，永远需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这就好像网上有很多人说，马六甲海峡并不重要，东亚岛链的封锁也不重要，船只完全可以绕行一样。技术上看当然可以这样做，不过这样做的话，你就必须考虑到成本增加和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了。

第五节 柴窝堡——达坂城谷地的区位优势

由吐鲁番盆地转入到天山北麓的方案，之所以会优于从东疆另外两个盆地直接切入北疆，是因为在吐鲁番盆地的西北角存在一条天然谷地直通天山北麓。依照我们的经验来看，两条能够独立命名的山体之间，往往会存在明显的谷地作为地理分割线。吐鲁番盆地北沿的“博格达山”也不例外，这条天山主脉的东部延伸段，与它的西部母体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走廊状缺口。旅行者从吐鲁番盆地向天山北麓转进的话，只需要翻越体量不是很大的山体连接处，就能够进入这条宽阔的走廊带了。

在这条谷地之中，最明显的地理特征是两个湖泊。位置偏西、体量较大的那个是个淡水湖，叫做“柴窝堡湖”；偏东的体量较小的那个是个咸水湖，直接就叫“盐湖”了。提起柴窝堡来，穿行于天山南北的司机一定会有印象，因为绝大部分司机在路经柴窝堡时都会停下来，品尝一下当地名产“柴窝堡大盘鸡”。不过如果在柴窝堡经营大盘鸡的商家，要称自己做的是最正宗的“新疆大盘鸡”的话，天山北麓的沙湾（县）人肯定不答应。毕竟大盘鸡最初是在沙湾创造出来，并开始流行的。内地比较常见的鸡块烧土豆，带汤带水放宽面的新疆大盘鸡，就是指的“沙湾大盘鸡”。而已经另辟蹊径的“柴窝堡大盘鸡”实际上最接近川菜本质（沙湾大盘鸡最初就是由在疆的川厨所创的），大块干炸的鸡块和大把干炸的辣椒混合在一起，使之更接近于川菜中的辣子鸡。

其实从地缘的角度来解读各地饮食的源流、演变也是一件颇为有趣的事。不过，尽管个人对“食”方面也很感兴趣，现在还是不得不回归到更严肃的话题上来了。既然柴窝堡湖是这条走廊地带中最明显的地理特征，那么根据选取板块内最知名、最显性的地标来为整个板块命名原则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将整条谷地称之为“柴窝堡谷地”，或者“柴窝堡走廊”呢？这样做的话，在柴窝堡卖大盘鸡的商家肯定是愿意的，不过管理柴窝堡湖（风景区）的上级行政机构就不一定愿意了。因为这个行政标签的名气远比柴窝堡要更有名，不用它就是在浪费无形资产。这个行政标

签就是“达坂城”。

“达坂”一词的来源，有维语和蒙语两种说法。不过不管它最初的来源如何，它都已经成为中国西部地区代指山脊的一个最常见的标签了。在“达坂”之前加上一个前缀，就可以为一条穿越起来颇要费些事的山体命名了。在这些以“达坂”为名的地缘标签中，达坂城无疑是最为知名的。相信只要年纪不是太轻的朋友，现在脑海中都应该浮现出“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宽呀，西瓜大又圆啊；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只眼睛真漂亮……”的歌声来（“中毒”比较深的，现在身子可能都晃起来了）。而这个城镇所处的位置就是博格达山脉与天山主脉之间相连处，位于整条谷地西南门户的那一条山地的北侧。驱车从吐鲁番向西翻越这条达坂之后，你将明显感觉到道路通畅了许多。



汉西域全图

既然这条打通天山南北路的通道，有着柴窝堡湖和“达坂城”两个地标一中、一东的排列着，那么为了更完整的呈现谷地的地理结构，将之命名为“柴窝堡——达坂城谷地”会是最好的选择。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以另一个比达坂城还要知名的地标来为谷地命名。因为当我们从吐鲁番出发，翻越达坂城所在的“达坂”，绕过柴窝堡湖，走完这条 100 公里的谷地后会赫然发现，原来为整条谷地扼守西大门的就是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也就是说，乌鲁木齐和达坂城一样，处在天山南北交通的枢纽点上。仅凭这一点，乌鲁木齐就有资格竞争整个新疆地区的行政中心。

当古典时期最后的帝国——清帝国终于有能力透过控制蒙古高原，而消除天山

北麓的地缘威胁时，中央之国也终于有机会在布设西域行政中心的时候，考虑气候环境更好的天山北麓了。只不过在此之前的汉、唐两代，面对蒙古高原那挥之不去的战略威胁，中央之国却始终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将天山北麓稳定在势力范围内。也正因为如此，纵然乌鲁木齐这个点对于控制天山南北的交通，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却也没有机会成为整个西域的军政中心。就汉帝国和后面又一次将触角深入西域的唐帝国来说，如何控制吐鲁番盆地这个天山南麓的门户板块，才是最重要的。



柴窝堡——达坂城谷地示意图



柴窝堡——达坂城谷地卫星图

有相当成分是因为天山南北在气候条件上的差异。前面我们也分析过了，降水相对丰富的天山北麓，天然植被覆盖的情况要理想得多。对于被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来说，天山主脉以北的自然环境是他们最容易适应的。相反，天山以南地区在水资源上的不足，迫使那些点、块分布的绿洲，向能更深程度挖掘地缘潜力的农耕生产方式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汉帝国所能够带来的先进农业生产方式，就更容易被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控制吐鲁番盆地的意义更多的在于防守。因为我们后面会分析到，如果想保证丝绸之路畅通的话，有了天山南麓的两条路线就足够了。在中央之国还不能彻底解决来自蒙古高原的威胁时，通常双方在西域的博弈也的确会更容易在天山主脉一线形成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是动态的，并非说天山就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地缘分割线。鉴于游牧民族始终将劫掠这种方式认为是正常的“渔猎”生产，无论在哪个方位，物质相对丰富的中央之国控制区都对他们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并试图冲破中央之国所预设的防线。只不过以双方的地缘特点而言，立志开拓西域的中原王朝，通常会在控制天山南麓时更有地缘优势；相反，天山北麓则更容易受到游牧政权的影响。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

接受了。在汉帝国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少西域绿洲小国欢迎汉帝国前去屯垦的案例。对于这些小国来说，汉帝国的到来带来的不仅仅是安全和商业利益，还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用一句话来形容天山南北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异，那就是“南农北牧”。当然，这并不是说天山北麓就没有机会开展大规模的种植业的，毕竟在水资源上天山北麓会有优势（现在就已经在开发了）。只不过在游牧文化的压力之下，古典时期的中央之国很难在此形成稳定的农业带，类似的案例也发生在离中央之国核心区更近的河套地区。尽管早在战国和秦帝国时期，华夏文明就曾经在河套平原进行过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尝试了，但纵观两千年以来的古典史，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博弈中，游牧文化始终更容易占据上风。

实际上，农、牧两种生产、生活方式，也并非不可调解。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也可以看到很多农牧混合体的案例。比如青藏高原这个封闭地理单元所产生的族群，内部就有农、有牧。而张骞在西域诸国中穿行时，也能看到很多小国具备双重属性，一方面依托低地绿洲开发种植业，并因此而具备筑城自守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高山牧场放牧，来充分挖掘所在板块的地缘潜力。像以吐鲁番盆地为根据地的“车师国”就是这样一个农牧混合体。凭借在火焰山南北进行农业开发所提升的实力（主要体现在人口上），车师国并没有满足于困守在吐鲁番盆地。在汉帝国和匈奴人到来之前，车师国就已经将势力范围渗透到了天山北麓。只不过，这种内部一分为二的格局，也让车师国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来自汉、匈两面的压力之前，面临更加尴尬的局面，并直接导致了车师国的分裂。

第十一章 博格达山南北的地缘格局

第一节 博格达山地缘圈形成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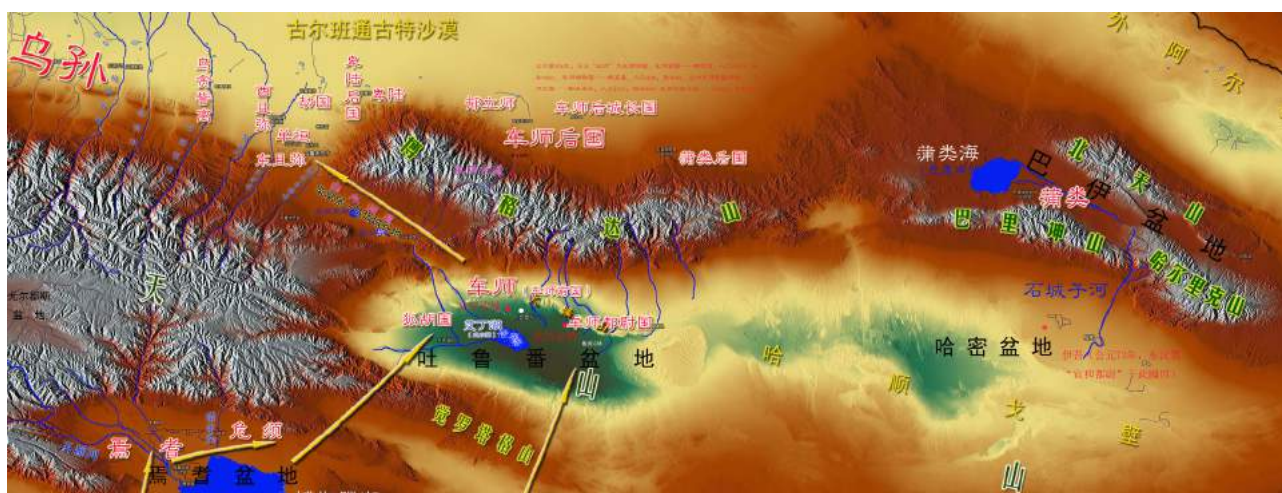
一提到西域,很多对这个地缘标签的来历有些了解的朋友,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西域三十六国”这个概念。这个说法具体来自于《汉书·西域传记》中所书的“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文中所说的“孝武”,指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汉武帝了。据此,普遍的说法就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时,天山南北所分布的国家是三十六国。历朝历代也有不少人煞费苦心的去探究到底是哪三十六国。其实类似“三十六”这种九的倍数,在中国文化中往往并非实指。一定要按这个数字去核对是没有必要的。况且即使是汉书中也说了,这些所谓“国家”的数量变化极大,没多久就变成五十多国了。

西域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如此具有吸引力,很大程度是因为深藏在每个男人心中的英雄情结。想想看,在张骞、班超这种冒险家的故事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仅凭着个人之力,或打或拉的左右了那么多“国家”命运,并为自己的祖国开疆扩土。这种传奇又有谁不向往的呢?其实,如果中央之国能够开启或搭上大航海时代的班车的话,我们就应该可以从离我们更近的历史中寻找精神寄托了。不过现在,如果我们不想只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羡慕殖民时代欧洲人的冒险故事的话,最有可能让大家有代入感的还是凿空西域的时代。

不过,当我们了解了那些西域小国的体量之后,也许有人会为此感到泄气,因为这些国家实在太小了。小到几百人就可以成为一个载入史册的国家,上万人就是数得着的大国了。当然,应该也会有人为此而感到兴奋。因为这样的话,那些带有浓厚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故事,才会更加真实可信。以西域的地理环境来说,每一片能够承接天山雪水的绿色之地都有可能成就一个所谓的“国家”。当然,如果周边更为强大的政权或部族一定要跨越戈壁来灭掉这些绿洲小国,也并非什么难事。问题是灭掉一个国家,将它的土地纳入直接管辖范围,很多时候并不是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对于需要大面积草场来维持游牧生活的游牧民族来说,这些绿洲规模着实有限。而在那些绿洲小国已经开始用种植业来提升自己人口承载量的情况下,直接控制这些绿洲来放牧,对资源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相比之下,让这些小小国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生活,并贡献高于自己经营的物质,却更能够让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相对自己经营)。这种情况,我们在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历史中也能体验到。在历史上,那些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政权,尽管数学和经济学都不会太好,但他们也很快都能够感觉到,保持中央之国固有的农业生产体系,并尊重他们由此而生的文化基础,更能增强自己的统治力。

基于上述原因，无论是哪一个时期的游牧政权，他们所真正能进行覆盖的区域，都是那些适合大规模游牧的区域。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在诞生之后，也一定是将那些同样生活在毡房里的部族优先变成自己人。至于来自中央之国的中原政权，他们的做法则正好相反。能够与中央之国连成片的农业区，才是他们所愿意直接经营的。在没有信心长期经营，而又基于服务核心利益的需要不得不加以控制的区域，“分而治之”以使之不能成为一个强大反对者的心理，就占据了主导。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那些小到人口几百，胜兵（可以为兵者）数十的部落，也在汉帝国的体系中获得了“国家”法人资格。



西汉东疆地区地缘结构图

当我们把吐鲁番盆地、哈密盆地腹地及南部那些大而无用的荒漠区，从我们的脑海中去除掉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对于即将在此进行博弈的汉、匈帝国来说，真正的关键先生并不是这些“盆地”本身，而是横亘在它们北部的山脉。尤其参与搭建“柴窝堡——达坂城谷地”、吐鲁番盆地的博格达山，更是一条天然的地缘平衡线。南农北牧的环境差，在博格达山南北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加上与战略通道相邻的位置，使得在帝国控制西域的计划中，博格达山及其周边板块是最容易受到匈奴攻击和影响的。而分而治之的战略指导，也在此得到了验证。那些让我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眼睛的几百人小国，基本出自于此。

如果以博格达山为核心，将其周边 100 公里范围内作为一个地缘圈来审视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博格达山地缘圈”），我们会发现，除掉沙漠戈壁以外，这个地缘圈涉及到博格达山北麓、依连哈比尔山北麓（乌鲁木齐以东的天山主脉北侧山体）、吐鲁番盆地、柴窝堡——达坂城谷地、哈密盆地，以及哈密盆地以北，与之以“巴里坤——哈尔里克山”为地理分割线的“巴伊盆地”（由“巴里坤盆地”和“伊吾谷地”两部分组成）。在这样一个地缘圈中，获得汉帝国认可，被载入史册的“国家”就达 15 个之多。不管西域的范围到底应该有多广，抑或数量应该是三十六还是五十

多,这个数量和密度都是惊人的。要是你看这部分内容,只是希望对朋友炫耀你对“西域三十六国”的了解的话,解读完“博格达山地缘圈”后,你就可以骄傲地告诉他,我现在已经快是半个西域专家了。

所谓“博格达山地缘圈”,并非是我们根据几何原则来划定的。事实上博格达山在其所处的区域中的确处于核心位置。由于西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原因,博格达山这类山脉本身所起的作用,有别于它的同类在东亚所起的作用。在东亚农业区,由于农耕民族对那些平原腹地所进行的农业开发,使得山地所能够奉献的资源变得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所承担的地缘作用更多的是天然防御和地缘分割。

而在西域,这些几乎是水资源唯一来源的山脉,所承担的更多的是纽带作用了。不仅山南进行农业开发的绿洲因为需要开发坎儿井一类的工程,必须重视对高地的经营;那些以牧业为生的部族,更是需要长时间的移牧于这些山地牧场中。在这种情况下,山脉在地缘圈中所扮演角色,就更像是地中海在“地中海文明”那样,处于一种必不可少的核心位置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阿尔泰山脉南北。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来说,阿尔泰山脉往往并没有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更多的是成为阿尔泰山南北的地缘联系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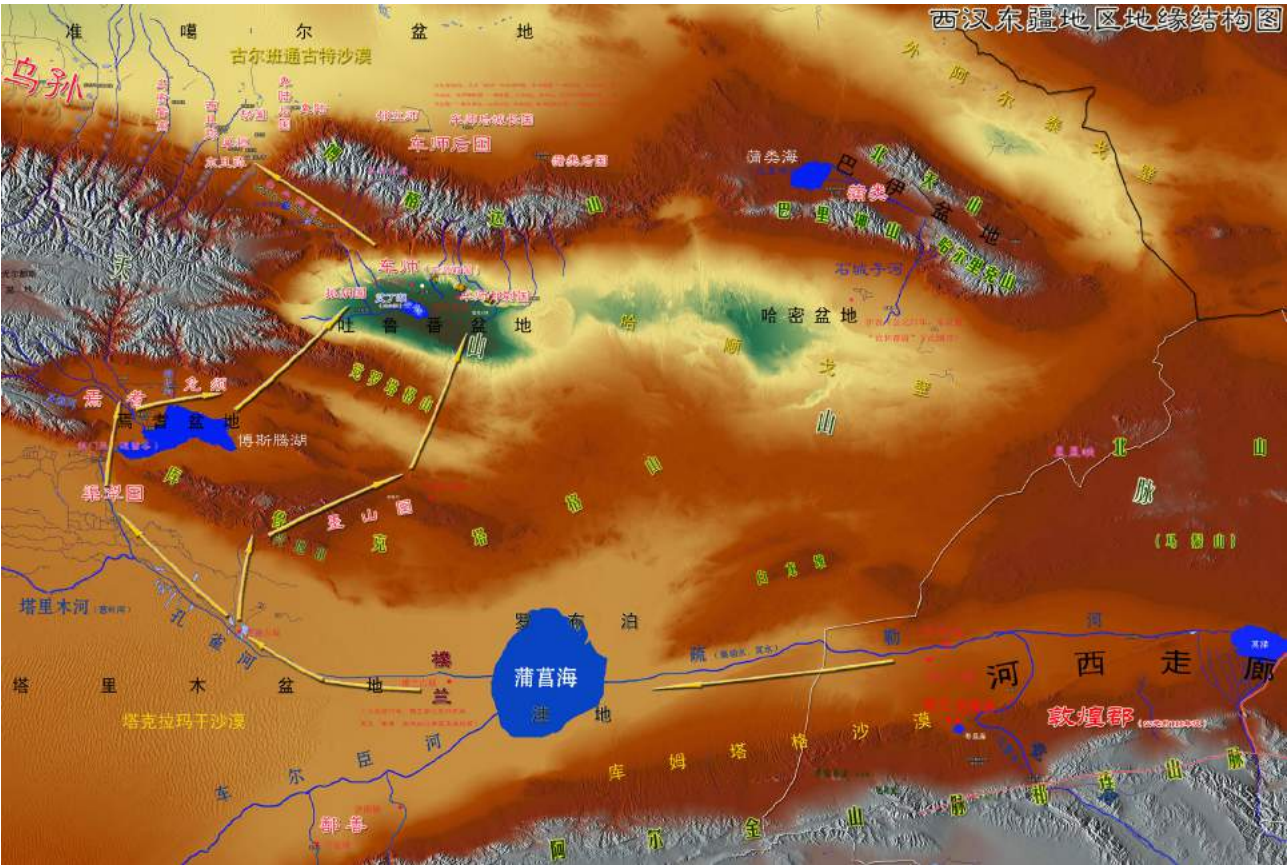
只是无论是西域这种类型的地理结构,还是游牧文化来说,在这个地球上都不是主流。在现代行政结构的调整中(尤其是国与国之间),山脉分水岭还是最容易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缘平衡线。至于这种划分方法,可能对一些源自游牧文化的地缘认同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不是重点考虑的了,由此也引发了非常多的地缘矛盾。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巴勒斯坦西北山地的一些部族心目中,在阿富汗的那些拥有共同地缘属性的“外国人”才是自己人,而国家认同只是那些政治家强加给他们的。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天山南北(包括西域与中亚部分区域),并影响着红色中国的西北稳定。

第二节 博格达山南麓分布的国家

既然从地缘角度上来看,东疆这些盆地实际上只有靠西、北侧山地的一面才算有价值,那么在对天山(主脉)南麓的地缘结构研究中,我们就要尽力排空在我们头脑中所固有的那些对盆地的认知了。换句话说,像博格达山这样的山体,才是这一区域地缘研究的核心。按照这个思路延伸下去,博格达山地缘圈中的那些西域小国,就很有必要当成一个整体来观察了。

前面我们也说了,以博格达山为核心的西域小国达十五个之多。如果按照地缘板块来为之归类的话,我们可以将之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处于天山主脉以南,也就是吐鲁番、哈密两盆地北侧的博格达山南麓国家。经过前面对吐鲁番水资源及区位的解读,相信大家都应该已经有个基本认知,即吐鲁番盆地的绿洲小国应该比哈

密盆地更大、更多。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只不过有一点可能出乎大家的预料，那就是在汉帝国开拓西域时，哈密盆地并没有部族对其进行绿洲开发。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在今天地缘位置非常重要的地理单元，在公元前并没有成为地缘博弈的焦点。



西汉东疆地区地缘结构图

之所以会这样，很大程度是因为哈密盆地相对于吐鲁番盆地更为恶劣的气候环境，包括缺乏火焰山这样的天然大坝帮助蓄积来自天山的雪水。不过，这也并不是哈密盆地未能得到西域诸部垂青的根本原因。毕竟最起码哈密盆地的北侧还是有机会开发、引入天山雪水的。在西域这种几百人都能立国的地方，哈密盆地并非没有机会滋养出一个“国家”来。真正让哈密盆地在公元前几乎成一个酱油板块的，是它的区位。因为无论是汉帝国准备开发的具有官方性质的“丝绸之路”，还是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上千年的，沟通天山南北的陆地交通通道，都有着比走哈密盆地更好的选择。具体来说，这样的选择就是由焉耆盆地转入吐鲁番盆地，再经由“柴窝堡——达坂城谷地”进入北疆；或者索性不经过焉耆盆地中转，直接翻越东疆盆地南侧的“库鲁克塔格山”，以及吐鲁番盆地南区的“觉罗塔格山”，然后进入吐鲁番盆地。

哈密盆地之所以在最初的选择中落选，是因为它与河西走廊之间所存在以哈顺戈壁为核心的大片沙漠戈壁。在前两条路线都有机会获得更多水源和绿洲补给的情

况下，这条存在于地图上的干旱之路并没有太大价值。当然，如果你希望从现在的地缘结构、交通状况来审视东疆地缘结构的话，就会惊奇地发现，哈密盆地已经成为进入天山南北麓地区必须经过的枢纽板块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汉帝国最初所选择的无视哈密盆地存在的路线，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这一点我们后面会分析到的。

现在我们还是把目光放回到博格达山地缘圈本身的地缘结构上来吧。哈密盆地是否能够在丝绸之路中占据一个节点的位置，并不会影响到吐鲁番盆地的地缘价值。有“柴窝堡——达坂城谷地”这样的天然通道在侧，吐鲁番盆地的地缘枢纽地位就不会动摇。我们已经多次提及的车师国，就是这个盆地的主人。唯一让人不确定的是，在张骞走过这片土地时，这个又被称为“姑师”的国家，是否是吐鲁番盆地唯一存在的政治体。而能够确定的是，后来在汉、匈博弈的夹缝中，车师国曾经被反复分裂、复合，并最终以后博格达山脉为分割线，彻底的分裂了。



汉西域全图

在汉书所记载的西域国家中。车师实际上最少已经被分裂为四个国家了。分别是博格达山以南的：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博格达山以北的：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国。当我们再具体研究史书所记载的这四个“车师”国的信息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四个国家可以分为两个实力完全不同的两个级别。其中山北的“车师后城长国”，以及山南的“车师都尉国”人口都不过千（前者 950 人，后者仅 33 人），绝对属于微型国家。相比之下，同样被博格达山分割的“车师前国”和“车师后国”，

人口相对就要多出许多了。身处山南，继承车师国原有核心区的“车师前国”，人口将近五千（以交河城为都）；而身处山北的“车师后国”人口则达到 6000。

将车师国以博格达山为界一分为二，并不让人难以理解其幕后的战略思路。毕竟对于汉帝国来说，在这样一个交通枢纽板块，一个国家做大到可以将实力延伸到天山南北，是存在很大风险的。这意味着，一旦匈奴人将影响力又一次的触及博格达山北麓，并试图夺回对天山南麓的影响力时（在汉匈争夺西域的过程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车师国很容易因为山北受制于匈奴而做出背叛汉帝国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将车师国一分为二的控制，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即使山北的车师后国不得不臣服于匈奴，汉帝国还可以在保证山南“车师前国”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将车师前国留在自己的体系中。身处地缘博弈的焦点，所领之地本身又有天然的农牧分割线，车师国的分裂应该说是必然的。可问题是，为什么在这南北两个车师“大国”旁边，还会有两个微型车师国呢？其实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削弱车师国的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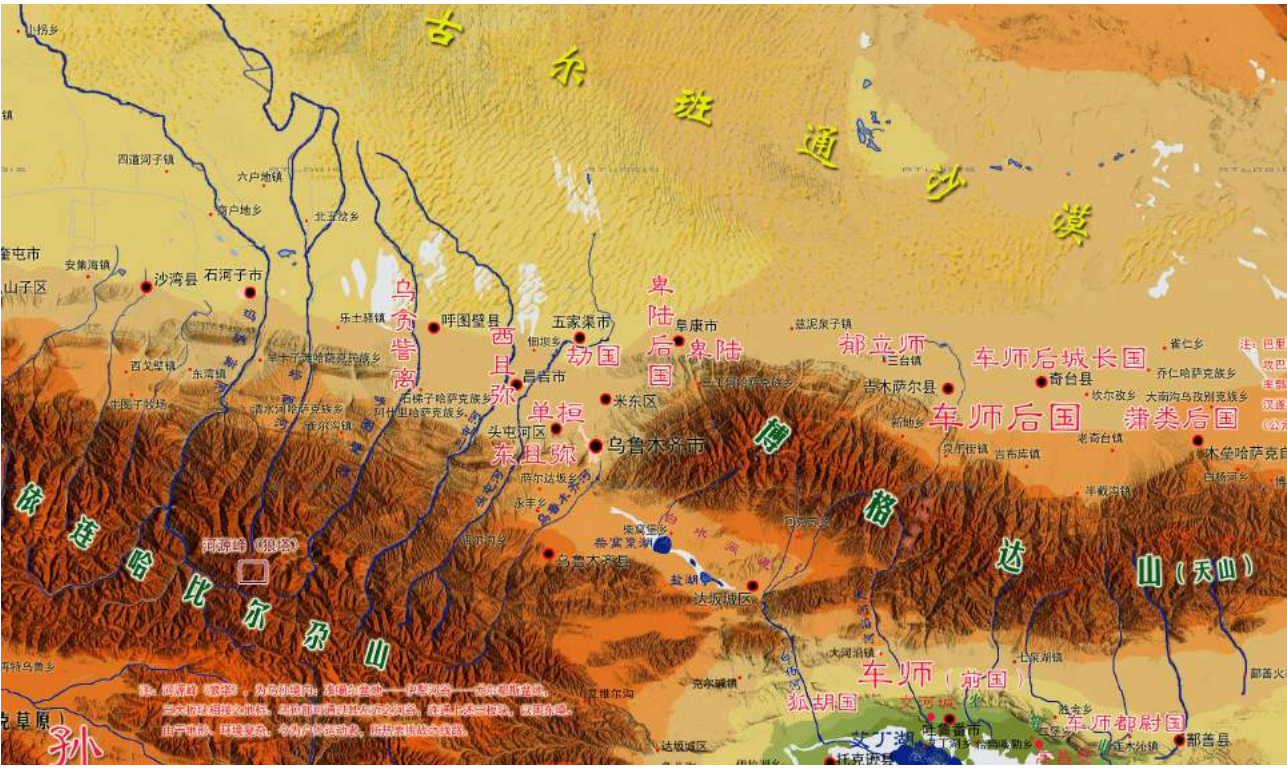
相比前、后两个车师国，汉帝国对两个微型车师国的控制力应该要更强。比如车师都尉国的得名，就是因为它所控制的城邑“高昌”城，本身就是汉军在吐鲁番盆地的直接驻军点。或者说，这两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那些与汉帝国关系更密切的车师人的一种认可和保护。而在汉帝国对西域的控制力减弱后，这两个微型国家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重新回归前、后车师国几无悬念。车师国并不是吐鲁番盆地内唯一被汉帝国认可的国家。汉帝国至少还认可一个叫作“狐胡”的小国。当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车师都是博格达山南北的最强者。

第三节 博格达山北麓分布的国家

相比博格达山以南地区的地缘结构，山北的地缘结构要更为复杂。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整个天山北麓地区更为优越的气候环境。西风所带来的水汽，让这里有机会在山前生长出连续的草原带。而更为寒冷的气候，无疑也更适合游牧民族生存（反过来对种植业不利）。即使车师国能够因为经营博格达山以南绿洲（这意味着能够因种植业而获得粮食和承载更多的人口），而在山北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但这种农牧混合体的最大优势，还是在于定居性质的绿洲上。至于那些在草原上游走的游牧部落，无论是车师国还是汉帝国，其实都无法做到真正的控制。

能够对游牧部落进行直接管理的，还是像匈奴这样的游牧帝国。那些被匈奴所吞并的草原部落，很快也会被冠以“匈奴”之名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不过，包括车师后国在内的山北游牧部落，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独立状态，并被汉书记录了下来。这些西域小国的人口数量和分裂后的车师一样，在几百人与几千人之间。如果没有外力干扰的话，人口过万的车师国，无疑就是整个博格达地缘圈的最强者了。

这些山北小国曾经被《汉书》冠以“山北六国”之名，只是当我们清点过《汉书》所记载的这些位于车师以西的山北小国后，会发现这些国家数量其实达到了八个。由西至东分布有：乌贪訾国、西且弥国、单桓国、东且弥国、劫国、卑陆后国、卑陆国、郁立师国。如果将那些明显由一国分裂而出的国家视为一国的话，倒是符合了六国之数。其实到底山北六国是哪些国家，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毕竟这些弹丸小国对历史几乎没有影响。我们所关心的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区域内能够密集的存在这么多的国家。在没有可能确定他们在每一个时期的数量之前，我们不妨将它们合称为“山北诸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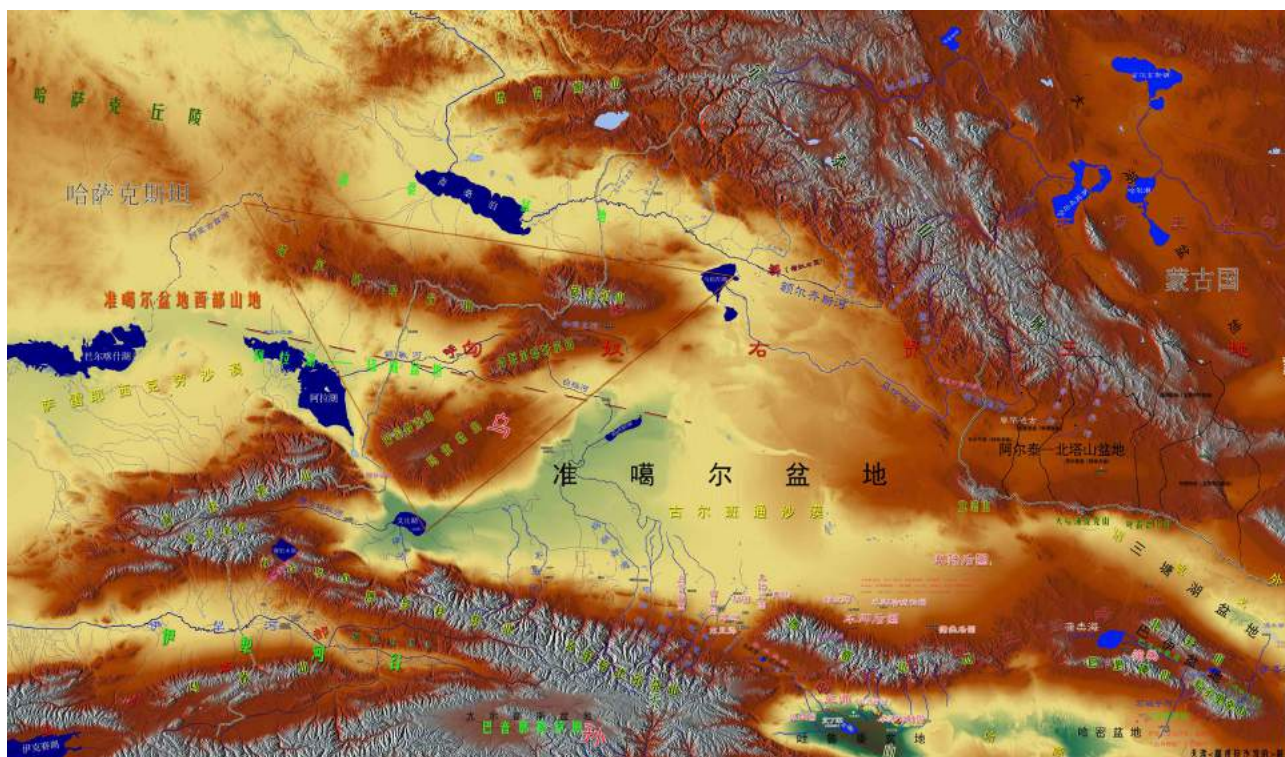
汉西域全图

从位置上来看，山北诸国的分布很有特点。从《西汉东疆地区地缘结构图》上看，这些小国紧密而又均匀的分布在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柴窝堡——达坂城谷地”谷口，及两侧山地上。很明显，这些山北小国对于控制这条战略通道显得非常重要。即使汉帝国在权衡之后决定放弃对天山北麓草原地带的经营，也不会希望匈奴人时刻守在门口威胁自己。而承认并扶植这些小国的存在，就是汉帝国为自己建立的一道防火墙。不过，即使是出于分而治之的原则，我们仍然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如此小的区域内，会有那么多独立的小国或者说部落存在。

按照我们之前所分析的西域山脉“西高东低”的走势来看，山北诸国所对应的这段天山主脉，应该是属于体量较小的末端了。这也意味着，东天山所能利用的水汽远比不上西天山。这一趋势对“山北诸国”的直接影响就是，这些西域小国所处

区域的河流规模都不大。那些天山雪水在从北麓山坡流下冲刷出河谷之后，最终并没有机会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水系。大多数河流各自在荒漠中渗透一段后，便消失在戈壁之中了。这种情况很像浙闽丘陵那些独流入海河流的分布结构。而它反应在地缘结构上，就是每一条河谷都有机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板块。

如果你对这些河流的分布有兴趣的话，我也在图上标示出了一些现在还明显存在的河流，比如塔西河、呼图壁河、三屯河、头屯河、乌鲁木齐河。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在那些高精度的地图上，可以清晰可辨出的每一条山谷，都有机会承接来自天山之上的雪水（有些是季节性的河流）。而这些河谷的存在，也为那些西域小国的存在奠定了基础。基本上我们所说的这些以游牧为主的山北小国，都会依附一条固定的河谷游牧、转换牧场。这和现在建立行政区的基础是一样的，以至于你几乎可以为每一个山北小国，找到现在所对应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当然，这些河谷的体量也限制了这些游牧部落的规模。如果不是正好处在一个敏感的博弈焦点，汉帝国需要缓冲国的话，山北诸国是很难避免被匈奴直接吞并的命运的。



西汉准噶尔盆地地缘结构图

对于匈奴来说，他们在翻越阿尔泰山分水岭后，控制阿尔泰山南麓，也就是准噶尔盆地北沿并没有困难。如果想继续向南渗透的话，沿“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渐次向天山北麓游牧区渗透是最自然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匈奴人会更容易对准噶尔盆地西南部产生兴趣。至于山北诸国所在的东南部，匈奴人如果想直接控制的话，准噶尔盆地腹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假使匈奴想稳定的控制

山北诸国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东天山北麓寻找一个条件最好的地理单元直接经营，以作为控制山北地区的基地和进一步渗透天山南麓的跳板。从战略用途上来看，其作用和匈奴必须取得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才能稳定控制漠南草原，以及攻击黄土高原是一样的。

不过，以山北诸国所在区域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哪一条河谷能够像河套地区那样，地理结构明显优于相邻板块。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匈奴人也许会“矮子里拔高子”，从中选出一条环境相对较好的河谷，作为他们在准噶尔盆地东南部的核心区。只是匈奴人的运气实在不错，他们只需要把视线向东移，越过车师国所主控的博格达山北麓，就会发现在哈密盆地以北，也就是天山最后一段主脉“巴里坤——哈尔里克山”北侧，有一个两山包夹的盆地（谷地）区可以承担这个战略任务。这个盆地就是与哈密盆地南北相连的巴伊盆地。

第四节 匈奴控制巴里坤盆地和伊吾谷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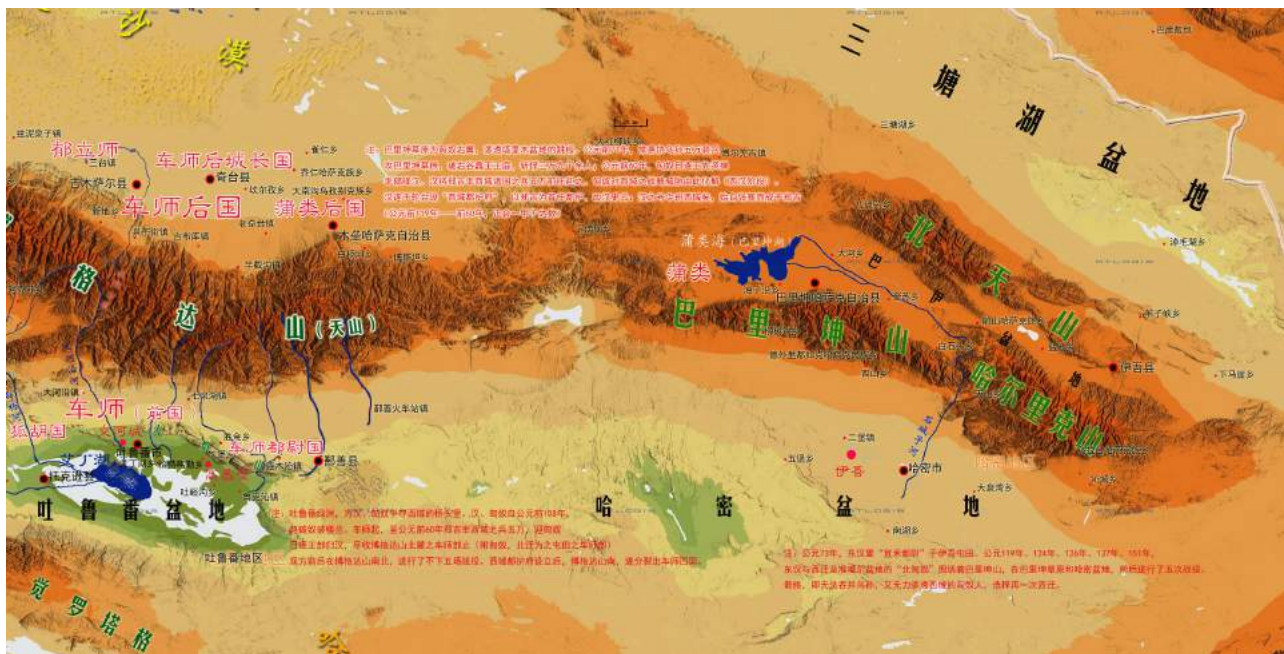
巴伊盆地实际上还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北天山与巴里坤山合围而成的“巴里坤盆地”；另一部分则是北天山与哈尔里克山包夹形成的“伊吾谷地”。这两部分也就是现在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和伊吾县的所在地。相比那些只能一面供水的博格达山北麓地区，巴伊盆地在结构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由山脉两面供水，以及北天山在阻挡北部外阿尔泰戈壁的侵蚀上所发挥的作用，都使得巴伊盆地在草场面积上明显优于东天山北麓诸河谷。那些从两侧山脉上汇流而下的雪水，甚至还在巴里坤盆地的腹地形成了一个湖泊——巴里坤湖（咸水湖）。

这样一个自成体系，水、草资源良好的地理单元，没有理由被游牧部落所忽视。在匈奴人相中这块游牧宝地之前，生存于此的部落（国家）叫做“蒲类”（巴里坤湖时名“蒲类海”）。然而伴随着匈奴人的南下，蒲类国的悲剧也即将来临了。蒲类国的悲剧在于，他们所经营的地方是东天山北麓唯一的盆地区，也是唯一拥有大型湿地的板块。如果没有外力干扰的话，巴里坤盆地完全有机会让蒲类国成为一个人口过万的国家。然而，这样的规模虽然可以让蒲类国有机会压倒周边的大多数竞争者，并能和车师国在山北地区一较高下，却没有机会抵御住已经统一在匈奴旗下的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政权。

在匈奴人渗透至此，并准备将巴里坤盆地作为他们经营东天山北麓的基地时，土著的蒲类人就只能让位，向周边地区迁徙了。以天山山脉的水草分布特点来说，向东迁徙是很没前途的选择。如果蒲类国不想走得太远，向西迁至博格达山北麓是最好的选择。最终匈奴人鸠占鹊巢的入主巴伊盆地后，六千多蒲类人被迫西迁至新的游牧地，史称“阿恶地”。其大致位置就在现在博格达山脉东北部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一带。

在匈奴人看来，西迁的蒲类人这时候也可以算是匈奴人了。事实上，所谓的匈奴帝国本来就是一个组织相对不是紧密的游牧部落联合体，任何一个受这个部落联盟控制的部族都可以被冠以“匈奴”之名。当然，这种身份认同的效力，只会存在于匈奴足够强大的时候。一旦匈奴帝国的统治出现危机，那些虽然被纳入匈奴体系，但却未被打乱原有结构的部族，很容易就会重新和匈奴人划清界限了。像后来鲜卑崛起后，在大兴安岭西麓游牧的数以十万计的匈奴人，就开始声称自己不是匈奴，而是鲜卑了。

试图搞清游牧体系内部这些融合、分裂的变化是徒劳的，因为没有文字记录传统的他们，自己也很难弄清这些。以至于在苏联准备为中亚那些部落按照他们自认为先进的方式划分“民族”时，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最终虽然勉强划分出了中亚五族，但民族认定模糊的情况到现在依然存在（比如中国境内的维吾尔族，在中亚很多时候就被认定为乌兹别克族了）。如果没有汉帝国的到来，蒲类国和其他北山小国应该很难有机会被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毕竟比起天山南麓那些选择定居生活的“城国”来说，天山北麓的这些游牧“行国”除了墓葬以外，一般很少给我们留下他们存在过的证据。即使偶有考古发现，也最多被认为是匈奴人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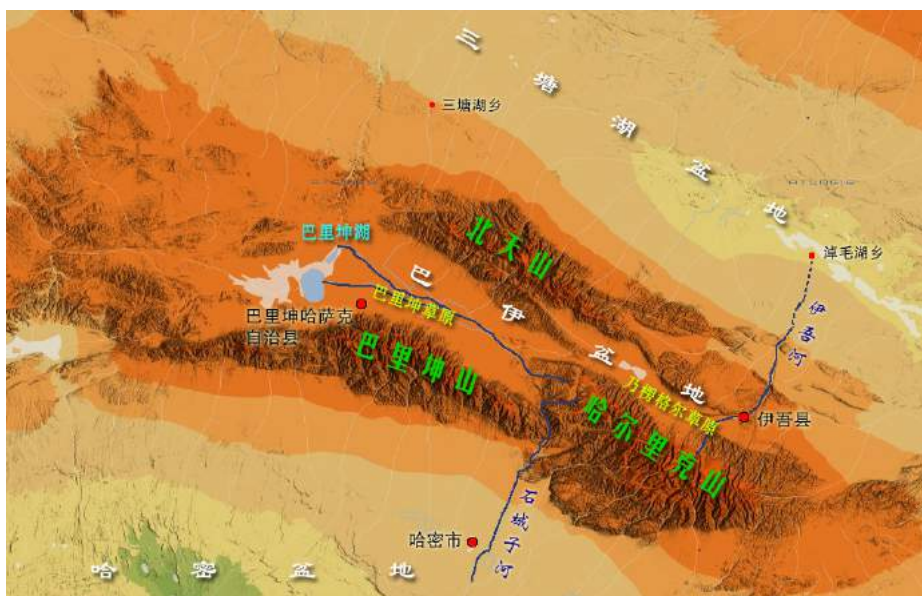


汉西域全图

然而，在汉帝国将影响力延伸到西域之后，和北山诸国一样，蒲类国的命运也被改变了。为了缓冲匈奴的压力，汉帝国在东天山北麓承认了包括蒲类国在内的十二个小国。这其中就包括两个以“蒲类”为名的国家，一个是回迁至巴里坤盆地的“蒲类国”，另一个则是由留在西迁地的部分蒲类人所组成的“蒲类后国”。其实这时的蒲类国完全可以因祸得福，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只不过汉帝国并不愿意

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控制力较弱的地区，分而治之总是最好的方式。

现在问题来了，汉帝国最终选择直接经营天山南麓，而放弃直接经营天山北麓的理由，除了天山北麓更容易受到匈奴的攻击以外，很大程度是因为天山北麓自然条件更适合粗放型的游牧经营。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游牧之地都无法变身为农耕区呢？当然不是这样。历史上像河套地区的经营模式，就经常在农、牧之间转换。而现在我们在乌鲁木齐以西的天山北麓地区，也能够看到一系列由生产建设兵团以“耕战”模式建立起来的城镇。比如博格达山西北角的古“劫国”所在地“五家渠市”，就是农六师的基地。问题是，就汉帝国所处的时代而言，暂时还没有合适的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来克服天山北麓的低温（水不是问题）。真正大规模的在这一地区尝试农业开发的，是第三个将控制力延伸到西域的古典王朝——清王朝。



巴伊盆地示意图

从青藏高原引进耐高寒的农作物“青稞”，来尝试开发天山北麓的农业潜力。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天山北麓的一系列城镇，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建立的。在此之前，整个天山北麓还是居无定所的游牧文化覆盖区。

现在我们应该对以巴里坤盆地为核心的巴伊盆地，在东天山北麓的地缘作用有所了解。在很多资料中，巴里坤湖都被描写成一个水草丰美之地，然而就巴里坤湖的湖体而言，实际上却是一个高咸度的“咸水湖”。不过，咸水湖本身并不意味着就是生命的禁区。在很多咸水湖区（包括海滨）盐碱化滩地上，同样可以生长出“盐生草甸”这种植被来。这些具有抗盐性的植物之所以能够在恶劣的环境生存，很多时候是因为它们的根系已经进化得很深了，足以透过表层的盐碱化土层从更深处吸收淡水了。

当然，如果仅仅依靠这些靠近湖体的盐生草甸，巴里坤盆地的草原规模是无法

在清王朝通过军事手段从准噶尔人手中夺取西域的控制权后，帝国的统治者马上就开始着手考察天山北麓的农业条件。比起两千多年前的汉帝国来说，清帝国的优势在于他们同时也在政治上控制了青藏高原。这使得那些执行这项任务的官员，有机会用



巴里坤湖卫星图



巴里坤湖



巴里坤草原

受到游牧民族的青睐的。那些在湖体周边依靠天山雪水渗透而形成的湿地，才是决定巴里坤盆地游牧潜力的关键因素。那些从两侧山地漫流而下的雪水，或从地表，或从地下渗透到了低地，再以泉水的方式滋润而成的湿地，才是游牧民族最爱。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可以放牧对于干旱环境更为适应的羊；也可以为自己的畜群增加对水资源要求更多的牛的比例。当然，不管放牧的是羊、牛，或者为游牧民族带来战术优势的马，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水草丰美之地，总是比那些只能生长矮草的荒漠草原，要更有吸引力的。

需要注意的是，当地牧民所称的巴里坤湖，指的其实并不是湖体本身，而是湖体外围这片水草交融的湿地。用更准确的地理名称来概括的话，应该是“巴里坤草原”或者“巴里坤湿地”。而我们在地图上所标示出的湖体部分，也就是地理意义上的“巴里坤湖”，当地人则称之为“海子沿”。这也就是地缘概念上的“巴里坤湖”和地理概念上的“巴里坤湖”之间的区别。所谓水草丰美的巴里坤湖，其实指的是地缘概念上的巴里坤湖了。

和西部大部分的河流、湖泊一样，由于人类在中游地区的过度开发。巴里坤湖的湖体大部分也萎缩，并露出深度盐碱化的湖底了。这些浓度越来越高的湖水，也

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周边湿地的生态结构。需要通过减少上游地区的用水，来保证生态环境不至于进一步恶化。不过对于关心 GDP 的官员来说，也许湖底那些千百年前因地质运动而蓄积在湖底的矿物质盐，才更有经济价值。只是提炼这些矿物质的话，恰恰又需要消耗大量的淡水资源。如何在短期利益与长期的生态环境中取舍，并不仅仅是巴里坤盆地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过对于古典时期生活在巴里坤湖的游牧部落来说，巴里坤湖湖体有多咸倒并没有太大影响。毕竟巴里坤盆地对他们最为有用的，本身就是依靠那些最终流入湖体的雪水在湖体外围所滋养出来的牧场。就游牧这种生产方式而言，对生态结构的破坏力也有限。相比之下，像巴里坤湖这样的咸水湖，对习惯于将湖泊本身视为生存核心的农业文明来说，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些。这意味着他们不仅难以在湖内直接获得经济收入和引水灌溉；也意味着农业民族所习惯的围湖造田的扩大生存之地的方式无法实践。这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在天山北麓已经被生产建设兵团深度农业开发的今天，巴里坤草原仍然很大程度的被保留了游牧本色，并在牧区排名中仅次于巴音布鲁克草原，位列新疆第二大草原。

第五节 柴窝堡——达坂城谷地的风灾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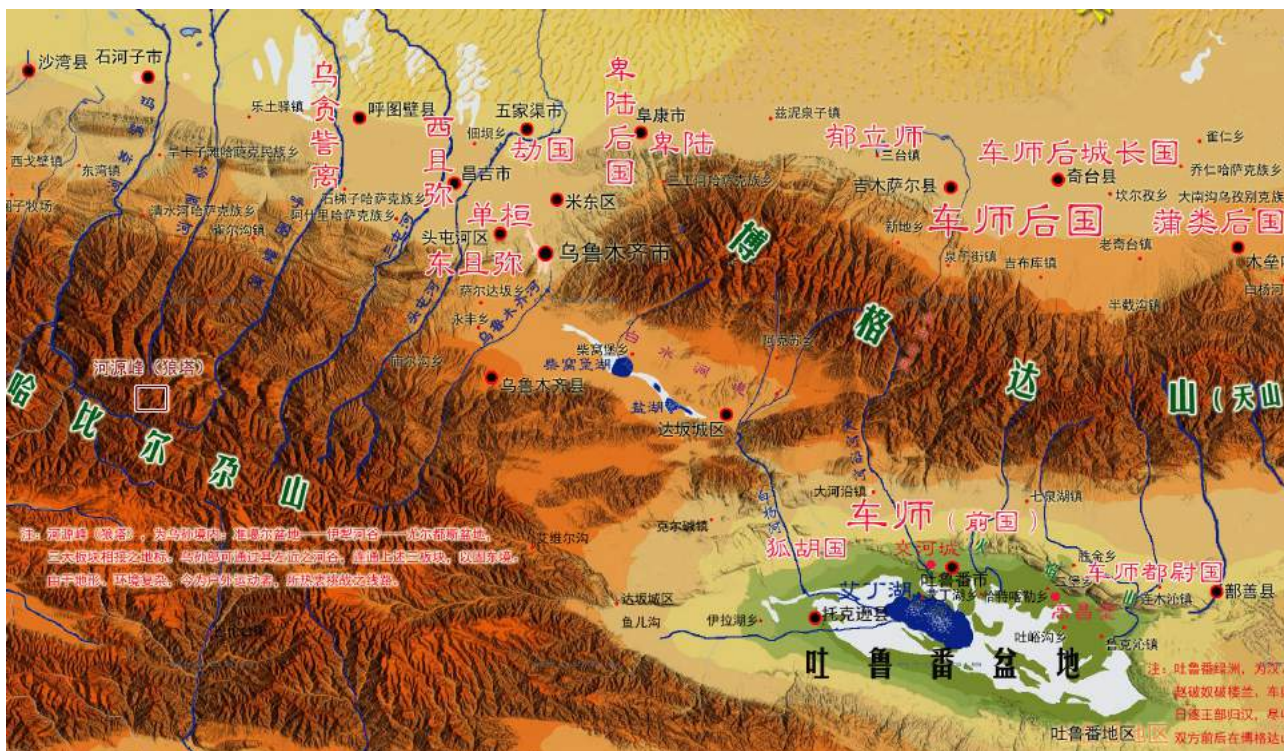
看来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比较清楚的了解“博格达地缘圈”在西汉时期的地缘结构，以及其内部各板块在地缘圈内所承担的角色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夹在汉、匈帝国之间，左右为难的地缘圈。而被天山主脉所分割的巴里坤盆地和吐鲁番盆地，则是这一地缘圈南北的两个重要支点，也是最有潜力的两个地理单元。在清帝国通过解决蒙古高原的战略威胁，完整将西域之地纳入版图之前，第二个将触角伸及西域的唐帝国曾经做过尝试，以博格达山之北的车师后国故地为核心，设立羁縻天山北麓的“北庭大都护府”（前身为隶属安西都护府的“金山都护府”，都护府遗址在今吉木萨尔县）。

不过这种没有大规模农业移民的羁縻管理，注定是不能形成真正统治力的。就像那些入主中原的游牧政权，尽管能够凭借武力和政治技巧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统治权，但却无力改变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农业结构一样，如果最终不愿完全融入农业文明的话，退回游牧之地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解读到这里，似乎有一个地理单元的潜力被我们所忽视了，那就是“柴窝堡——达坂城谷地”。以这条战略通道的结构、纵深而言，应当并不仅仅只是作为一条沟通南北的战术通道而存在，而是完全有机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基地。然而在西域三十六国的政治版图上，如此重要的地理单元却被博格达山南北的国家所遗忘，或者说并没有像我们想的那样，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地。

在西域地图上，如果你看到一片没有“国家”的空白区域，通常情况下意味着

这里属于干旱的荒漠地带。不过“柴窝堡——达坂城谷地”应该不会缺水。除掉那些由两侧山地而下，流过谷地的河流以外（如乌鲁木齐河），柴窝堡湖这个淡水湖的存在，也显示着这个板块并不缺水。既然这条谷地并不缺少西域最为珍贵的水资源，那么是什么力量阻止了它成为一个能够独立发挥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板块呢？答案就是“风”。



汉西域全图

最直接影响天山南北环境的因素，其实就是“风”。西、北部呈现为断续山体的（地理名称为“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准噶尔盆地，比起被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等高大山体，严严实实的封堵为一个近乎完美的盆地区的“塔里木盆地”来说，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处在西风带，承接更多的来自大西洋的水汽。当然，能够透过“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吹进准噶尔盆地的，并不仅仅是来自西风带的水汽。从北冰洋南下的冷气团也同样定期影响着准噶尔盆地的气候。在这些冷气的作用下，准噶尔盆地的积温相较塔里木盆地就处于弱势了。以至于在绝大部分的古典时期，它的环境更适合那些对积温要求不太高的草本植物的生长。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吹入准噶尔盆地的西、北风，在穿越整个盆地之后，依然有力量走得更远，甚至影响到河西走廊的西段。当然，风的形成原因其实很复杂，并不仅仅是单纯因为外来气流的影响。外来冷空气与沙漠热气对流，以及山坡和盆地之间不同温度的气层相互作用，都有可能形成风。不过不管是哪种类型、哪个方向的风，在通过像“柴窝堡——达坂城谷地”这样的天然通道时，“狭管效应”都

能让风力变得非常恐怖。按照往来于天山南北的司机们描述，就是这条“一年只刮一场风，只是从年初一刮到年三十”的百里风带刮起风来，足以把小车刮翻。



达坂城风力发电风车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选择一片生存、死葬之地都是要看风水的。这“风”、“水”二字就蕴含了我们祖先对于生存环境的认知。仅仅狭义的从这两项指标来看，柴窝堡——达坂城谷地在“风”上过于突出的表现，就增加了人类适应它的难度。在现在的行政规划中我们会看到，像达坂城、乌鲁木齐县这样貌似存在于谷地中的行政中心，其实都并没有定位于平坦的腹地，而

是扎根于边缘山谷，依靠周边山地来缓冲风的影响。至于整条谷地，自然也就没有地缘潜力来承担更高一级的行政职能了（整体属于乌鲁木齐所辖）。就像它在西域三十六国中，无法成为一国的核心区一样。

对于古典时期的人类来说，面对这样的大风更多的是只能苦笑了。不过仅仅是穿行的话，人类还是有办法克服大风的影响的。加上“柴窝堡——达坂城谷地”在地势、水源方面的显著优势，谷地在承担沟通天山南北的作用方面，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价值的。而“白水涧道”这个标签，就是它出现在历史记忆中的名称。至于这条道路，具体应当精确到谷地的哪一部分，就很难考证了。只是根据谷地的环境来看，那些没有钢铁车辆护体的古人所选择的道路，可能会比现在的穿行其间的国道、高速公路，更靠近两侧山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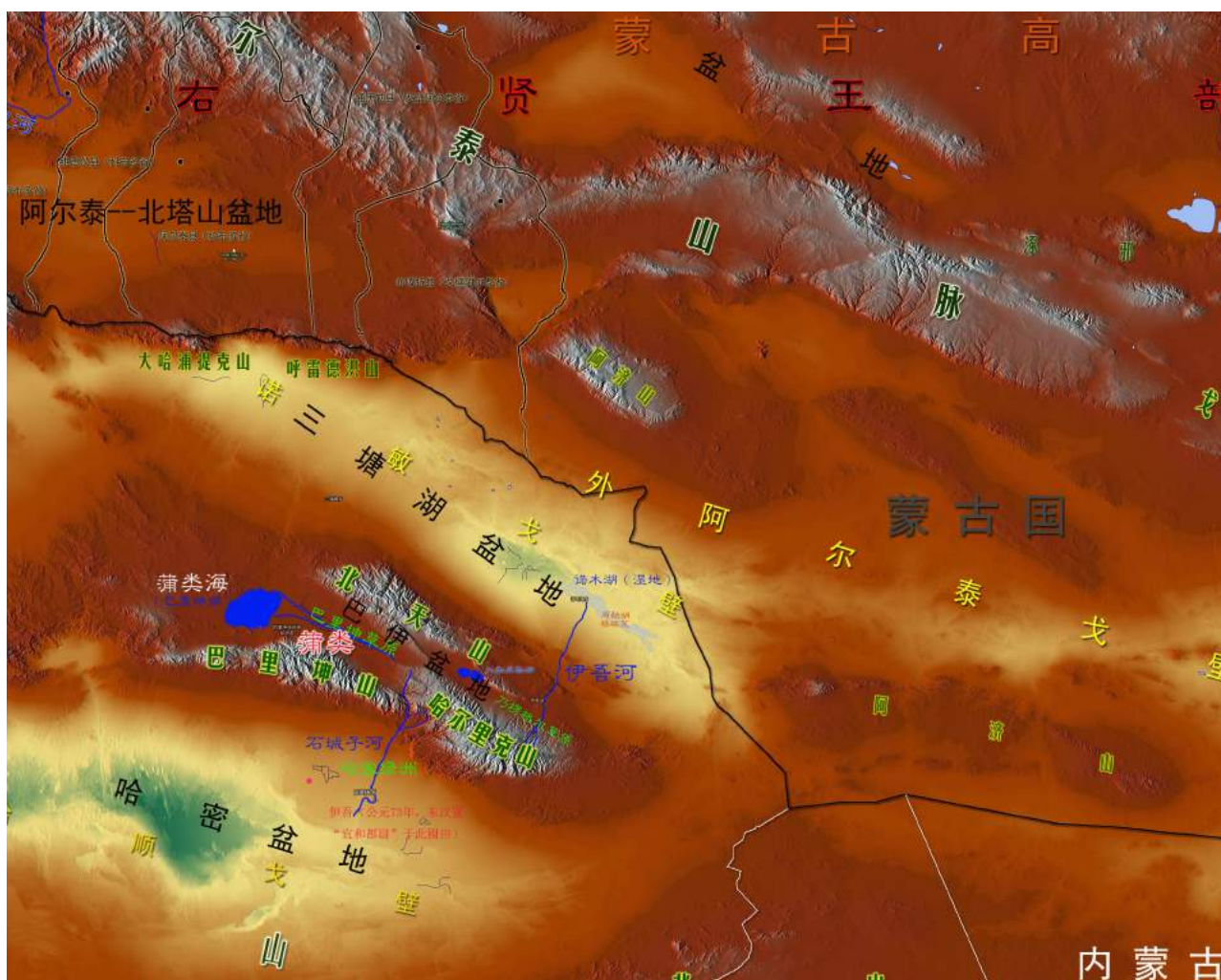
其实“柴窝堡——达坂城谷地”，并非是准噶尔盆地与东部地区交流的唯一风口。还有一个体量比它还大的天然通道，同样有可能为“风”和人类提供进出准噶尔盆地的路径。至于这个天然通道在哪，又有没有机会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所青睐，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

第六节 三塘湖盆地开发程度低的原因

总的来说，西域的两大盆地结构都不算完整。包括大部分边缘被高大山脉完美包裹的塔里木盆地也是一样，在东部也与河西走廊相接处未能封口。至于准噶尔盆地，同样也在东南角留出了缺口。只不过这个缺口处所面对的，却是更为广袤的戈壁地带，以至于它在历史上并没有承担起重要的战略通道作用（对华夏文明来说）。而我们

前面所说的另一个风口，也正是这样一个缺口。如果要为其打上—个地理标签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三塘湖盆地”。

从大的地理结构来看，所谓“三塘湖盆地”就是天山山脉东端与阿尔泰山脉东端之间所包夹的低地。就整个盆地区的地理结构、环境来看，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哈密盆地的翻版。然而就二者的命运来说，却是有天壤之别。在我们现在的行政版图中，哈密盆地北沿的“哈密市”，是包括哈密盆地、巴伊盆地、三塘湖盆地在内的“哈密地区”的地缘核心。而三塘湖盆地中所开发的绿洲——三塘湖乡、淖毛湖乡，在行政上只是隶属于巴里坤县、伊吾县的两个乡镇。



匈奴——天山诸国地缘关系图（西汉）

影响三塘湖盆地命运的，并不是它的地理环境。事实上位于天山北麓的三塘湖盆地，和哈密盆地一样，都是靠天山雪水在戈壁中点缀绿色。尤其是发源于伊吾谷地的“伊吾河”，其径流量和催生哈密绿洲的石城子河也相差不多（年径流量，一个 5000 多万立方，一个 7000 多万立方）。这条向北流向三塘湖盆地东部的河流，加上其他从戈壁滩下向低地渗透的雪水之力，甚至在三塘湖盆地腹地的东部形成了

一个湖泊“诺木湖”（也就是“淖毛湖”）。不过在西域游牧民族的概念中，“湖”所指的并不一定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形态，而是以湿地的形态呈现的。三塘湖盆地内所谓“湖”，也正是以湿地形式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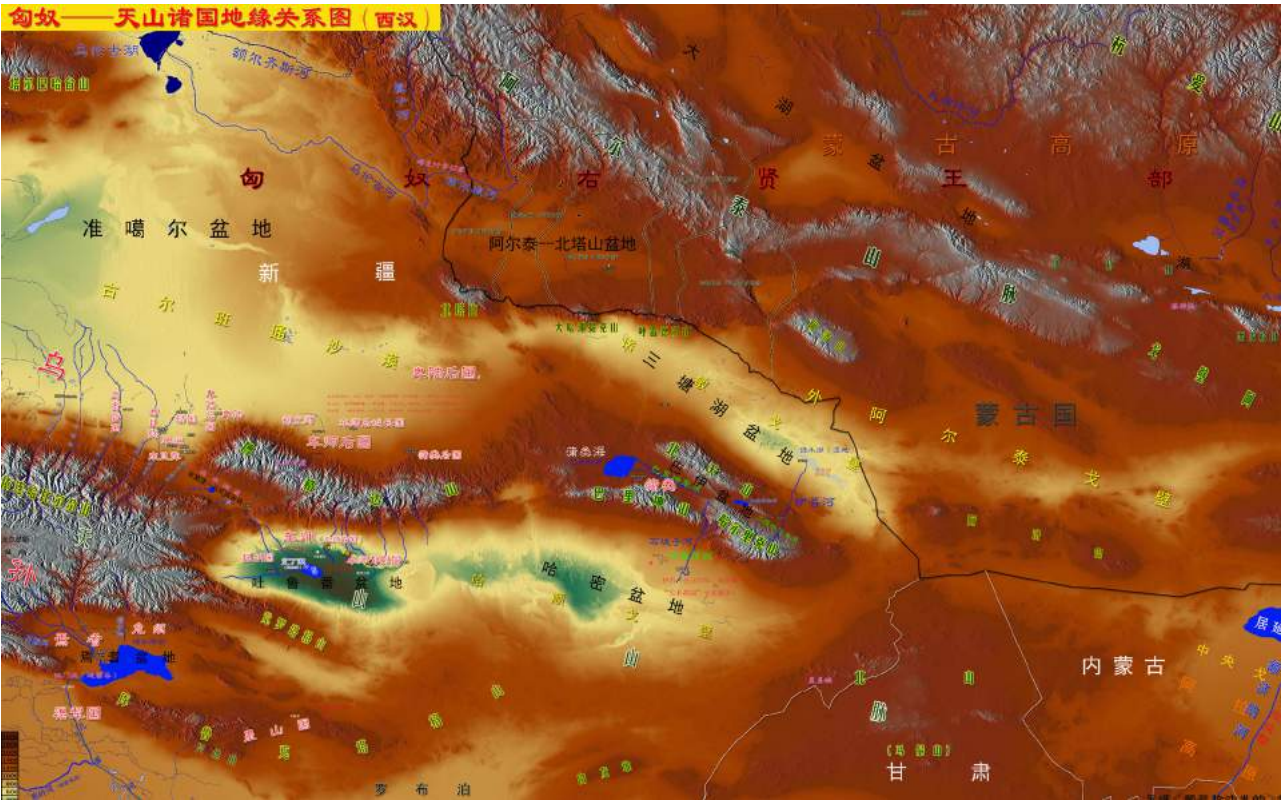
淖毛湖胡杨

只是如果你现在去找这片湿地的话，可能就会失望了。因为随着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过上世纪的屯田开发后，那些珍贵的水资源在滋养出能直接为人类所服务的经济作物后，就无力再为我们保持湿地的原始面貌了。现在的诺木湖已经变成了一个迁移不定，只有在洪水季节才会出现的湿地。而除了“淖毛湖”、“三塘湖”这类明显带着湿润气息的名称以外。现在淖毛湖东分布的40多万亩的天然胡杨林，也是向世人证明这里并不是一片不毛之地。只不过，像西域很多胡杨林一样，这里的胡杨林地面上也已经不复水草交融的湿地状态。而是以“三千年不死，死后三千年不倒，倒后三千年不朽”的胡杨林，展示出生态环境的变化。

其实无论是在哈密盆地还是三塘湖盆地，仅仅依靠天山雪水支撑的绿洲在整个盆地中的比例都是很低的。两个盆地的大部分土地，都呈现为荒漠化的戈壁状态。其中哈密盆地的戈壁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哈顺戈壁”；而覆盖三塘湖盆地大部分土地的戈壁，则叫作“诺敏戈壁”。作为天山北麓最东端的地理单元，地表整体戈壁化的三塘湖盆地和哈密盆地一样，干旱少雨，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这样的条件也使得，三塘湖盆地虽然没有巴伊盆地的草场规模，并为游牧民族所侧目，但经过农业开发后，却可以种植出和哈密盆地一样香甜的瓜果来。

说起来，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现在哈密地区最为香甜的哈密瓜并非产自天山南麓的哈密，而是产自天山北麓的三塘湖、淖毛湖。当然，不管是三塘湖盆地，还是哈密盆地现在都统属于“哈密地区”。所以三塘湖所产的哈密瓜再甜也是在为“哈密”这个品牌贴金了。需要说明的是，哈密瓜也并非只有哈密才有了。西域很多地区（特别是哈密盆地的邻居吐鲁番盆地），都有适合它种植的环境。只是由于当年最初向中原政权（清）进贡此瓜的为“哈密王”，此瓜才被贴上哈密标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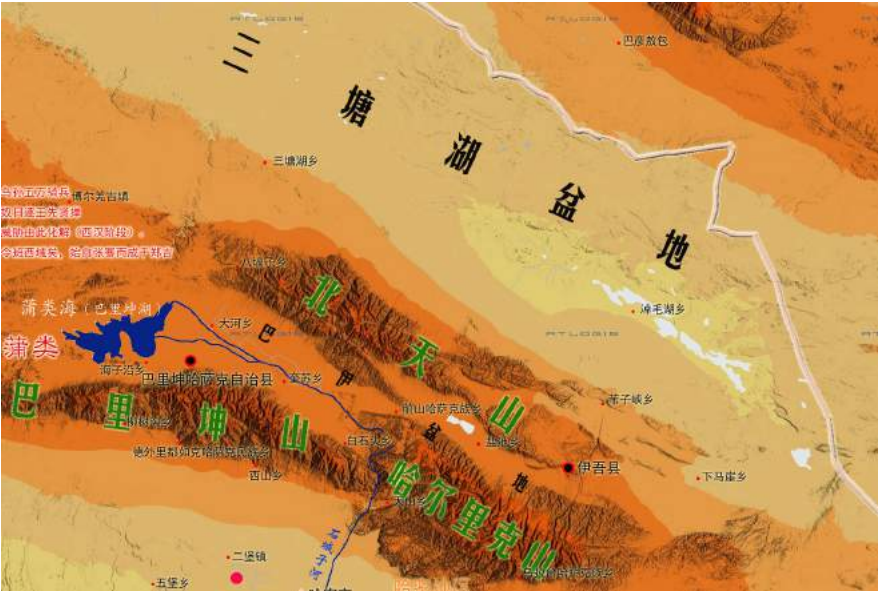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来，既然三塘湖盆地的地理环境与哈密盆地非常相似。那么在古典时期，它们应当都有机会因农业开发而承载更多的人口，并提升自己的地缘地位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哈密盆地的农业开发以及今日的行政地位，并非始于近代。事实上在两千多年前的东汉帝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对哈密盆地进行农业开发了。公元 73 年，东汉帝国在巴里坤山南置“宜和都尉”移民屯田，以护卫和经营哈密盆地的丝绸之路北道。可以说从那时起，哈密盆地就对天山北麓的巴伊盆地、三塘湖盆地有了地缘优势，并成为巴伊盆地南北的地缘中心。



匈奴——天山诸国地缘关系图（西汉）

真正让哈密盆地脱颖而出，并在两千多年时间内持续进行农业开发的，是它的区位。我们后面会分析到，当经由焉耆盆地进入吐鲁番盆地，以及直接切入吐鲁番盆地的“楼兰道”，因罗布泊洼地环境恶化而受阻之后。环境相对“较好”的哈密盆地，就成为进入天山南北麓的必经通道。具备了这样的枢纽地位之后，哈密盆地也就像吐鲁番盆地一样，成为中原王朝渗透西域的战略要地了。至于处于游牧之地包围之中的三塘湖盆地，尽管进行农业开发能够增加它的人口承载力。但除非中原政权有能力以屯田的方式在巴伊盆地立足，才有可能向北进一步开发那些戈壁中的原始绿洲。而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他们至多只会在“北天山”北麓稍事修整一下，就会扑向北天山南面，由此南下水草丰美的巴里坤草原（以及伊吾谷地的“乃楞格尔草原”）。

也许对于来自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来说，三塘湖盆地南线的这几处湿地，在他们南下巴伊盆地甚至天山南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中继点。但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生存方式，注定了像三塘湖、淖毛湖这样的小规模绿洲没有机会成为一个枢纽点。事实上像三塘湖乡的开发，仅仅始于清朝末年。在清政府不再封禁蒙古高原与中央之国其他板块之间的交流时，受益的并不仅仅是山西高原那些走西口的商人。那些以东疆地区为基地的商人，同样也开辟出了向北穿越阿尔泰山进入蒙古高原的商道。位于三塘湖盆地西南部的一处有三片水草之地的绿洲（三塘湖），也因此而成为东疆商人进入广袤戈壁地区的最后补给点，并最终在现有的行政结构中得到了“乡镇”一级的定位。



汉西域全图

至于位于盆地东南的“淖毛湖”地区，开发的时间就更晚了。一直到红色政权在整个西域寻找水资源相对充足的土地进行“耕战”形式的农业开发时，伊吾河下游才算有机会真正纳入政治家们的视野。在此之前，区位上毫无优势、位置偏远的淖毛湖绿洲所起的作用，和澳大利亚当年在殖民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类

似。仅仅是哈密的统治者用来流放犯人的所在地。即使是在红色政权开始耕战西域之时，淖毛湖地区一开始的定位也是“劳改农场”。

三塘湖盆地这样的地理单元，无论是历史还在现在，都算是一个很边缘的板块。之所以要花一定篇幅来解读它的地缘结构，主要是想说明“区位”这个因素在地缘结构中的作用。一个地区是否有长久的潜力，耕地、化石等资源只是一方面，很多时候，区位才是决定一个板块命运的关键因素。地理环境几乎为翻板的三塘湖、哈密两板块，在历史和现实中迥异的命运，也正是“区位决定命运”的实例。记得曾经有不少朋友指着地图上一大片肥沃的平原之地问我，为什么这一区域没有重要的城市，其实道理也在于此。就好像上海的崛起，并不是因为它是它鱼米之乡的江南之地，如果不是得江、海交错之利，它现在的行政级别很可能还是和清朝时期一样，只是一个小康级别的县城罢了。

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自从有了工业技术以后，人类改变、利用自然资源

的手段变得多样化了。无视耕地以及区位优势，仅凭某一资源而提升自己地缘潜力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火爆一时的“鄂尔多斯”就是一例。靠着天赐煤矿资源所带来的财富，鄂尔多斯的房价甚至比肩过东南沿海。也许三塘湖盆地业已勘探出的大型煤田，以及丰富的风电资源也能够让这一板块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两地都有大型风电场，达坂城风电场据称还是亚洲最大）。

只不过从地缘研究的角度看，资源并不是一个能在较长时间段保持稳定的地缘因素。像踌躇满志的鄂尔多斯新城变成“鬼城”的现象，不会是开始，也不会是结束。如果 100 年甚至 50 年以后，有人在看过此文后，再在波斯湾边的沙漠里，看着一座曾经因石油而辉煌过的“鬼城”之时，应该就不会感到意外了。既然三塘湖盆地在中央之国渗透西域的进程中，几乎处在一个完全无视的边缘位置，那么这个板块在蒙古高原与东天山南北的联系当中，是否又能发挥枢纽作用呢？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毕竟三塘湖盆地本身就是由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包夹而成的。如果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试图翻越阿尔泰山进入东天山地区的话，那么三塘湖盆地应该就是必经之路了。

毫无疑问的是，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无论试图从哪个方向进入东天山北麓，他们都必须穿越大片的戈壁地带后，才可能在像三塘湖、淖毛湖这样的绿洲上稍作休整。当然，对于这些习惯艰苦环境的游牧民族来说，那些顽强在戈壁中生存的植被也同样可以为一定数量的牲畜提供饲料。只不过要想依靠它们，形成一个足以在草原竞争中立足的强大部落就很困难了。

第十二章 清代时西域与外蒙古的分割线

第一节 外蒙古管辖阿尔泰山南麓的背景

有人会说了，在西域的相关地图上寻找绿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我们在东亚所形成的固有的低地概念，在此完全不适用。那些让很多朋友流口水的大片低地，很有可能就是戈壁、沙漠。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山地对于游牧民族的意义要大于东亚的农耕民族。对于古典时期的东亚农耕民族来说，尽管形成冲积平原的水，最初是来源于山地，不过在实际生存中，他们只需要对流入低地的水资源加以疏导和利用就可以了。山地本身所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防御上。不过对于亚洲中部的部族来说，无论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游牧民族，还是精耕于小块绿洲的农业小国来说，能够得到水资源的山地牧场以及山前绿洲、草原，几乎就是他们可以选择的全部生存之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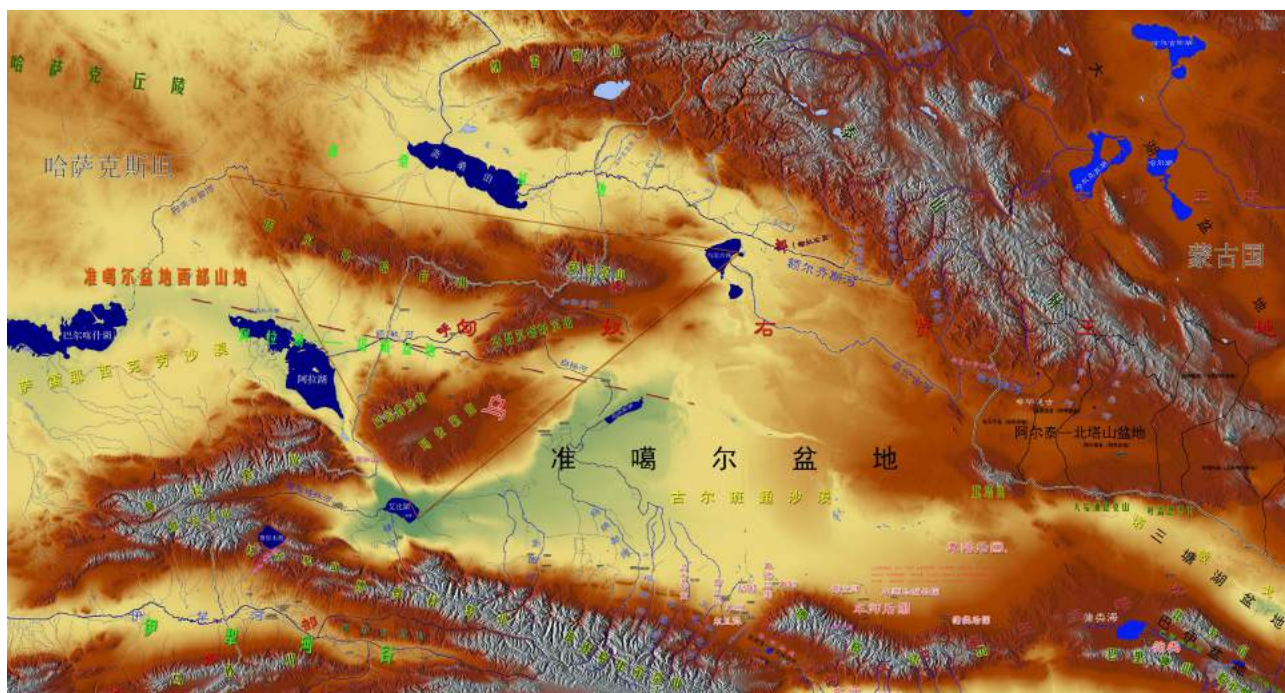
既然和西域的大部分盆地区一样，三塘湖盆地的腹地荒漠更多的只是起到了屏障作用，那么盆地北部边缘那些隶属阿尔泰山脉的山地，才应该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渗透东天山地区的桥头堡了。以西域水资源“西多东少”的规律来看，越靠近西部，海拔越高的山地，水资源供给越好。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会在三塘湖盆地的西北角看到一个很有潜质成为这个桥头堡的高大山体——北塔山。那么这座体量并不太大的山体，到底有没有真的在发挥刚才所推理出的地缘作用呢？

相信但凡在地形图上仔细观察过中国西北边境的朋友，都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中、蒙边境并没有依照一般的划界原则，划定在阿尔泰山的分水岭上。如果按照分水岭原则来看，很明显的是中国在这一区域吃了“亏”。事实上，也并不能完全说中、蒙两国的西部边境没有按分水岭原则来走。在最西段也就是阿尔泰山脉的最高、最宽处，分水岭原则得到了它应有的尊重。只不过当边境线向东延伸到三塘湖盆地的西北部时，平滑的曲线出现了变化，开始向中国方向明显的发生了弯曲。这个似乎是从中国领土上挖去的一块肉，就是我们下面所要解读的“阿尔泰——北塔山盆地”。

阿尔泰——北塔山盆地，并不算是一个正式的名称。因为在现有的地缘政治结构下，相关地理、地质结构的研究者，更多标注的是国境线以内的区域。至于这个位于阿尔泰山主脉与北塔山之间的地理单元，则鲜有人关注了。不过按照一般的地理命名原则来看，阿尔泰——北塔山盆地之名，足以清晰表明这个地理单元的组成结构了。

总的来说，阿尔泰——北塔山盆地和东疆盆地区的结构类似，是由山脉向外所延伸的支脉、山体与主脉共同合围出的山间盆地。在高大山脉覆盖之处，类似的山

间盆地是很常见的，并且经常成为各方争夺焦点。从地理形态来看，北塔山其实算不上山“脉”，而是一个呈点状的山体。这样一个虽然有高度，但无纵深的山体，并没有机会单独与主脉合围出一个盆地。事实上，在北塔山东、西两侧还断续存在明显与之呈线性排列的其他山体，其中东侧山体海拔较高，获得了独立命名的机会（包括有大哈甫提克山、呼雷德洪山）。这些山体最终也和北塔山一样，成为中蒙划界的分割点。也就是说，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蒙边境，是划在阿尔泰——北塔山盆地南线的分水岭上。这也意味着，中国失去了这个从结构上看应该属于中国的地理单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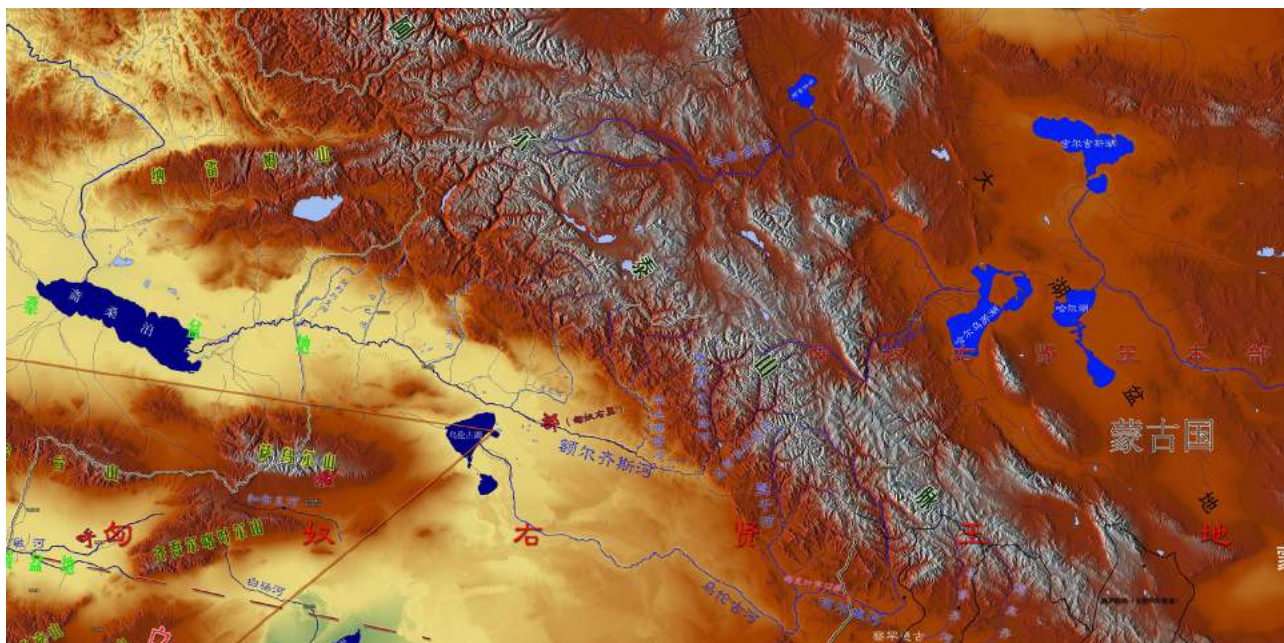
西汉准噶尔盆地地缘结构图

关于中国在与邻国，尤其是北方邻国划界“丢失”领土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长久以来一直是网上热衷争吵的话题之一。在此，我们并没有去参与这类口水战，而是仅从地缘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状。记得在分析蒙古高原西部地缘结构时，我们就曾经分析过，蒙古高原西侧的游牧基础与中、东部相比存在着质的不同。在蒙古高原中、东部（戈壁以北），相对充裕的水资源，使得我们在东亚大陆所形成的惯性思维才得以继续适用。即低地总能获得充足的水资源，并形成大面积的草场。

在这种结构下，山地草场只是游牧生产的补充，被用来躲避冬日严寒的。然而在蒙古高原西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山地（山前）草场开始成为主要的游牧区。穿行于山谷之中，在各种海拔的高山牧场中转场，成为游牧生活的主要内容。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得来自蒙古高原“大湖盆地”的游牧部落，很容易渗透到阿尔泰山

西南面，并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山前草原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匈奴人即使是在与汉帝国争夺天山南北控制权的博弈中落败，也依然可以保有整个阿尔泰山南北的领地。而汉帝国以及后世的唐帝国，却始终没有可能将整个准噶尔盆地变身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种基于地理结构而形成的地缘归属感，一直延续到了古典时期结束时。我们并不需要为这种地缘结构的稳定性感到惊讶，毕竟在 20 世纪之前，整个亚洲的生存方式都没有什么变化。大部分的土地在清朝时所适应的生产方式，和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并没有区别。这种地缘结构反映在行政区划上，就是在清帝国乃至民国初年的行政结构中，阿尔泰山南麓都是隶属于外蒙古板块（清之“乌里雅苏台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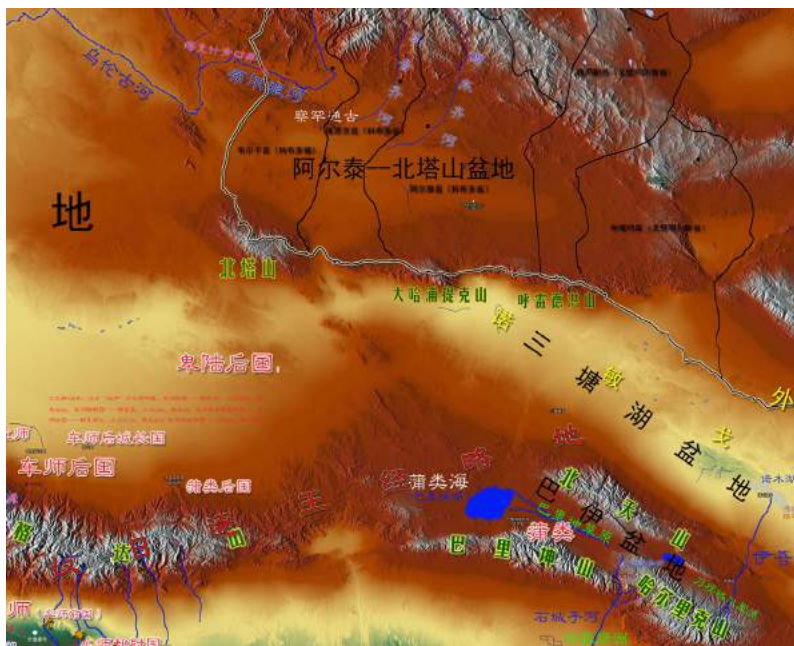
西汉准噶尔盆地地缘结构图

在整个阿尔泰山南麓，都被认定为外蒙古板块部落游牧地的情况下，再想寻找一条分水岭来为西域板块与外蒙板块作分割线是不现实的。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是以河流作为分割线。最终，阿尔泰山脉南麓的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成为西域与外蒙古板块的行政分割线。很多时候，乌伦古河会被误认为是额尔齐斯河的源头之一，但事实上这是一条独立的河流，最终注入的是额尔齐斯河上游南部两个断陷盆地：吉利湖（较小的那个）、乌伦古湖。不过我们现在倒也可以将额尔齐斯河上游与乌伦古湖视为同一水系了。在失去额尔齐斯河上游中续湖——斋桑泊的控制权后，中央之国的统治者就考虑依照“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将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河水，引入阿尔泰山南麓的另一个天然水库——乌伦古湖了。

当然，这样的想法势必会引发额尔齐斯河下游的那个红色帝国的不满。在两国尚处于蜜月期时，这样的举动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不过蜜月总是短暂的，利益才是

永恒的。当红色中国与曾经的老大哥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切割之后，这种顾忌就不复存在了。1969年，横亘于额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河之间体量很小的分水岭被打通了。乌伦古河从此额外得到了将近2亿立方米的淡水补给。换句话说，这些珍贵的河水被留在了中国境内。

对于额尔齐斯河上游掌握在中国手中的现状，那个强大而又对地缘政治有很深研究的强邻，显然早有不满意。也可以说，他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早就意识到了这其中的风险。而为了解决这个风险，俄国人也的确进行过一系列动作，并差一点成功。至于这些现在仍属敏感话题的动作，具体有什么样的地缘背景，我们以后会分析到的。回到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被作为行政分割线的问题上来。从地缘结构上看，其实这样的划分算不上合理。毕竟河流在低地的地缘分割作用并不强。游牧于河流两岸的部落仍然应当属于同一文化体系，不过一定要有明确的行政分割线的话，河流却又总是比分水岭更容易被政治家所看到。



西汉准噶尔盆地地缘结构图

阿尔泰山分水岭以南，北塔山以西的整个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南北（国境线以内）。从地缘结构与行政结构统一的角度看，算得上是吻合度很高的划定了。

在阿勒泰地区以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为界，归入蒙古高原行政结构时，北塔山以东部分却并没有东西向的大河承担这项使命。而在这个方向，分水岭原则重新又得到了运用。现在矗立于北塔山——大哈甫提克山——呼雷德洪山之上的国境线，大致也就是当年的地缘政治分割线。这也就是说，最起码在中央之国需要考虑外蒙古将要从领土中分裂出去这个问题之前。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最起码可以合法的依据地缘传统，游牧于整个阿尔泰山南麓的山前低地带。

当然，即使认为河流适合承担行政分割的作用，这两条河流所能分割的也仅仅是北塔山以西部分。由于这部分包括阿尔泰山分水岭以南，直至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区域，在清帝国时游牧的部落叫作“阿勒泰乌梁海”。我们可以将这一地区称之为“阿勒泰”。只不过这个地缘标签在作为行政标签时，所涵盖的内容会根据地缘政治作些许调整罢了。在我们现在的行政版图中，“阿勒泰地区”包括

如果整个蒙古高原能够一直如清帝国所搭建的架构那样，留在中央之国体系之中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疆也许就不会相对完整的领有整个准噶尔盆地了。问题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蒙古高原从中央之国分裂出去的趋势就已经很明显了。再将阿勒泰地区归入随时有可能在红色帝国支持下分裂出去的“外蒙古”，就变得十分危险了。任何一个有基本常识的政治、军事家，都可以看出高大山脉的分水岭对于国土安全是多大的保障。正是在这种危机意识指导下，1919年，阿勒泰地区被正式的划入了中央集权体系的“新疆省”。

现在看来，当时政治家的这种危机意识是非常到位的。仅仅是在2年（1921年）之后，外蒙古就自行宣布独立了。如果在其独立之时，阿勒泰地区仍然循旧例留在蒙古高原行政结构中的话（具体为大湖盆地的科布多所辖），在地缘政治上会造成什么样的麻烦就可想而知了。既然北塔山以西的阿勒泰地区已经在外蒙独立之前，通过内部行政结构调整，规避了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那么同样位于阿尔泰山分水岭以南的“阿尔泰——北塔山”盆地呢？

第二节 清帝国对蒙古高原统治的方式

如果希望探究中蒙边境在阿尔泰山一线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一下，中央之国对于边缘地区的统治方式了。就古典时期中央之国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形态来说，一直遵循的是“因俗而治”的思维。即在边缘民族承认中原政权统治权的基础上，尽量尊重并保有其原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就这种控制方式而言，历史上有一个专有名词来定义——羁縻。说起来这种羁縻之法，倒是与20世纪初，由美国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有些类似，表面上看都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不过透过表面看本质的话，这些尊重土著民族意愿的做法，其实都是对自己控制力不自信的一种表示。或者说，在自己无力直接控制某一板块时，试图以一种妥协方式将对方纳入自己的体系。

从中央之国的角度而言，如果某一区域与核心农耕区紧密相连，在技术上又适合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的话，那中原王朝一定会试图将之直接纳入中央集权体系。反过来，在那些与中央之国地缘关系并不紧密，又无法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区域，羁縻就会成为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在张骞通西域之后，汉帝国对于西域的经营，其实就是建立在羁縻当地部族的基础上的。这种尊重土著民族原有生存状态的做法，加上丝绸之路为之带来的获得额外利益，使得汉帝国可以较少的使用耗费巨大的军事手段，而更多使用政治、外交手段来维持在西域的统治。

当然，从更长的历史时间段来看，类似羁縻、民族自治一类的做法，所面临的地缘风险也是很大的。这意味着边缘地区在面临更大诱惑时，会更有力量从中央之国分裂出去。回想民国初年，执政新疆的杨增新将军敏锐地预感到将来有可能出现

的领土风险，将阿勒泰地区直接并入中央集权体系的“新疆省”的做法，的确是非常有政治远见的做法。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法律层面的行政调整只能规避的是法律风险。但这种行政调整要是没有相关的地缘基础，最终能否如调整者所愿就很难说了。这里所说的地缘基础，包括地理距离、当地居民的民族属性、民心所向等因素。

比如说清帝国在控制蒙古诸部时，就并没有把在地缘上难以直接施政的蒙古高原，完全用羁縻的方式加以控制。为了切断漠北蒙古与西伯利亚以及西域、中亚板块的联系，唐努乌梁海盆地，以及包括部分蒙古高原“大湖盆地”，准噶尔盆地北缘的阿尔泰山南北，被划定成为两个有别于蒙古高原其他板块的行政区。前者定位为“内属蒙古”，诸旗官员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而后者则由中央政府委任的“科布多参赞大臣”治理。

其实类似“唐努乌梁海”、“科布多”的设计，在蒙古高原东北部的呼伦贝尔也做了。清帝国将游牧于大兴安岭西麓的诸多部落编成“巴尔虎”诸旗，以“内属蒙古”的形式，归属于大兴安岭东侧的“黑龙江将军”管辖（更不用说阴山——燕山一线的蒙古部落了）。也就是说，尽管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土地，被羁縻给了史称“喀尔喀四部”的扎克图汗部、三音诺颜部、土谢汗部、车臣汗部，但实际上清帝国在蒙古高原板块的边缘，都设立直属中央政府的控制点，以保证帝国结构的完整。

上述设计，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很完美的。然而当蒙古高原整体出现分离倾向时，决定诸边缘板块命运的主要因素，就不是这些行政上的设计了。与中央之国核心区没有任何直接地缘联系的唐努乌梁海，并没有因为它内属蒙古的法律地位，就当然的成为现在的中国领土。不过这一连接西西伯利亚的关键板块，也并没有成为独立后的“外蒙古”的一部分。而是被俄国人巧妙的利用了它曾经有别于外蒙诸部的法律地位分离了出来，并最终成为俄国的一部分。对于试图控制整个蒙古高原的喀尔喀蒙古来说，让俄国人从蒙古高原切走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也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如果没有俄国人的支持，蒙古高原并没有可能借中央之国出现政权更迭之机，脱离中央之国的控制。同样在这一时期出现分离倾向的青藏高原南部地区，就是因为缺少这种外力的强力支撑，而留在了中央之国的体系内。

上述演变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决定一块土地归属权的，并非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决定，而是取决于它本身的地缘属性，以及与相关板块的地缘关系。当然，在强有力的行政控制力之下，不考虑土著居民感受的行政分割本身，也会促进地缘结构的重新洗牌。就好像俄国人在欧亚大陆鲸吞大片领土之后，试图通过民族迁徙等手段来“优化”帝国内部的地缘结构一样。问题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变化，是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并不如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通过改变基本地缘要素而引发的自然变化来得有力。这些可能最终反映到行政结构上地缘变化，有很多种：比如因利益或人口压力而产生的自然迁徙、通过技术提升改变土著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等（中

央之国对东北地区的消化，就是很典型的案例）。而地缘基础不稳，过多依靠上层的行政控制力来稳定的行政架构，一旦中央政权的行政控制力出现问题，就很容易功亏一篑了（特别是又有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上世纪初中央之国在蒙古高原遇到的麻烦，以及苏联最后的解体都是前车之鉴。

第三节 清帝国与漠西蒙古的博弈

回到阿勒泰地区最终成功留在中央之国，而“阿尔泰——北塔山盆地”却成为一个遗憾缺失的问题上来。这两个同属阿尔泰山分水岭之南的亚板块最终分属不同的国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自上而下的行政调整，而是在于早在清帝国晚期时，阿勒泰地区的地缘结构就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喀尔喀四部在越过阿尔泰山分水岭，占据了绝大部分“阿尔泰——北塔山”盆地之后，没有足够的信心与中央之国争夺“阿勒泰地区”。

说到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阿尔泰”和“阿勒泰”两个地缘标签之间的区别。一般情况下，阿尔泰山分水岭以南，戈壁以西，包括斋桑泊盆地、额尔齐斯河上游、乌伦古河流域，以及“阿尔泰——北塔山盆地”的区域，被称之为“阿尔泰”。问题是，在清帝国晚期，以及上世纪上半叶，阿尔泰地区的东西两端，也就是绝大部分的斋桑泊盆地、阿尔泰——北塔山盆地，被俄罗斯、蒙古两国所瓜分。这就使得“阿尔泰”这个地缘概念的使用上，出现了混乱（俄罗斯、蒙古两国内部的行政区也有阿尔泰）。为了避免出现认知上的混乱，最终在中央之国的版图上，“阿勒泰”之名取代了“阿尔泰”。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行文中，如果出现的是“阿勒泰”，那么指向的就是中国所控制的阿尔泰山南麓地区（基本也就是现在行政架构中的“阿勒泰地区”）。如果是阿尔泰，那么所指的就是无国界的阿尔泰山南麓地区了。

从地理位置来看，阿尔泰地区并不是中央之国与游牧部落博弈的焦点板块。通常情况下，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在西域的博弈焦点，是在东天山南北的“博格达地缘圈”。至于阿尔泰地区，则是属于游牧体系内部博弈的枢纽地区。参与这场博弈的，则是核心区在准噶尔盆地以西的中亚游牧民族，以及阿尔泰山以东的蒙古高原游牧民族。谁能够真正控制阿尔泰地区，甚至渗透到对方腹地，取决于谁内部整合得更好，力量更强。在历史上，可以说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部族代表两大游牧体系争夺阿尔泰地区的控制权。在匈奴崛起的时代，来自蒙古高原的力量显然占优。匈奴人在越过阿尔泰山之后，征服了原来游牧于阿尔泰地区的“呼揭”人，并将之纳入自己的游牧帝国。

呼揭人到底是先期从蒙古高原游牧而来的部落，还是从准噶尔盆地西南北上的中亚游牧部落，我们就很难知道了。不过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匈奴人再想继续南下时，就将遇到了立足天山北麓的中亚游牧部落的阻击了。至于这场博弈的终极

对手到底是谁，双方的平衡线又在哪里，我们在解读完中蒙西部边境的形成之后，很快就会解读到的。

当历史推进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时。阿尔泰地区的地缘结构开始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变化。在中、俄两国的博弈缝隙中，代表中亚游牧体系的哈萨克人与代表蒙古高原游牧体系的蒙古人，在阿勒泰地区展开了激烈碰撞，并最终影响到了这片土地的国家归属。

说起蒙古人在 13 世纪的辉煌，想必对历史稍有了解之人都会有所了解。可以这样说，这一次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几乎将欧亚大陆上所有适合游牧的土地都横扫了一遍。甚至于大陆东端一直没有被游牧民族完全征服过的东亚核心区，也未能幸免。当然，无论你采用何种体制，要想在如此广袤，地缘结构复杂的土地上，维持单一的统治权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蒙古帝国从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开始分家时起，其实就处在一个实际的分裂状态。我们所熟知的四大汗国，就是独立于元朝本部之外的四个独立国家。事实上，在蒙古黄金家族统治下，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立汗国并不止四个。历史研究者也一直认为有八、九个乃至其他数字之说。

考证在共尊成吉思汗的大旗下，究竟有多少黄金家族成员统治的汗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话题。按照进度来说，要解读这个问题还要等上一千多年。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清楚蒙古人的这次扩张范围有多大就行了。

所谓物极必反，13 世纪的蒙古帝国在扩张到极致之后，也势必会走向衰败、收缩的道路。当东亚大陆的明帝国、中亚河中地区的突厥人，以及东欧平原的俄国人（莫斯科公国），相继在 14、15 世纪击败蒙古人之后，蒙古人真正能够覆盖的区域，便不可逆转地向着蒙古高原回缩了。即使是那些崛起于中亚的突厥人为了继承蒙古帝国的政治遗产，打着成吉思汗子孙的名号向波斯、印度扩张，并建立莫卧尔王朝，从本质上来说，也已经与蒙古人无关了。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蒙古人如果想在蒙古高原以外保有额外的势力范围，那最后的机会肯定是存在于与之最近的阿尔泰山——天山一带了。最低限度，蒙古人还是很有机会，控制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传统势力范围——阿尔泰地区。不过，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了蒙古帝国当年打下的战略纵深以及余威在，蒙古人在游牧之地的收缩速度并没有像他们在东亚大陆那样呈崩盘状态。对于中央之国来说，蒙古人早在 1368 年明帝国建立时起，就已经成为过去式了。而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直到明帝国的后继者“清帝国”建立之后，蒙古依然可以保有在整个准噶尔盆地以及伊犁河谷的控制权，甚至开始向西南方向扩张出一个小高潮来。这支强悍控制西域的蒙古人，对于又一次试图进入西域的中原政权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地缘概念。也就是说，之前简单的以蒙古中央戈壁为分割点，将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划分为漠北、漠南两个地缘板块的做法，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了。

如果蒙古人一如既往的只是将势力范围延伸到阿尔泰或者更南一点，那么倒没

有必要单独为这部分存在于阿尔泰山分水岭之南的蒙古人单独拟定一个地缘标签。但现在，拥有一个完整地理单元，并有机会继续向西域、中亚纵深反攻的蒙古人，完全有权力成为一个独立的蒙古人控制区，并与相邻的漠北蒙古抗衡。为这个即将与中央之国发生地缘关系的新蒙古人板块设定标签的原则，与漠北、漠南两个地缘概念产生的基础是一样的，仍然是以横亘于蒙古高原腹地的戈壁为核心。这个位于“大漠”以西的蒙古板块，也因此被称之为“漠西蒙古”。

与所有的游牧体系一样，所谓的“漠西蒙古”（也称卫拉特、厄鲁特蒙古）内部也分成了几个相互独立的部落。在面对周边其他族群的竞争时，这样的松散结构显然是处在不利地位的。如果漠西蒙古诸部当中最终没有一支部落站出来统一漠西蒙古的话（就像成吉思汗当年做的那样），那么漠西蒙古的命运，很可能就是被中亚的突厥系游牧民族继续向阿尔泰山一线压缩了。不过，历史还是给了漠西蒙古一个不错的机会，为之打开了建立最后蒙古帝国的窗口。游牧于伊犁河流域的“准噶尔部”，最终成为天山——阿尔泰山之间土地的主人。这支蒙古人所建立的准噶尔汗国，也成为清帝国向西域扩张的对手。而清帝国与准噶尔汗国之间的博弈，也对中央之国最终版图的形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¹。

说明：突然发现我按照历史脉络来写中国部分的思路无比正确。因为一旦我希望详解一些大家所关心的发生在其他历史时期的热点事件时，就会发现需要不时的回补那些之前所没有涉及到的地缘板块，以及历史传承。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需要做很多解释工作，导入许多陌生的概念。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问题可能不大。但就本贴的立意来说，这种导入就显得仓促了。

具体到解读中蒙西北边境这件事上来说，就是如果想挖掘这一边境形成的宏观地缘背景的话，我们就必须对整个天山北麓的地缘结构，尤其是伊犁河谷及其以南部分有所了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读。事实上，按照正常的解读顺序，我们正好已经可以跟着大月氏、乌孙人的脚步进入这个板块了。如果不是试图插入多次被人问到的“北塔山”问题，现在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对这个中央之国曾经扩张到的最西部的板块有了解了。

好了。就下一部分的内容来说，我们还是会穿越回公元前的时空，去探究张骞所看到的西域。至于想看北塔山问题背景、准噶尔人、哈萨克人博弈，乃至想闻香香公主香气的的朋友也不用急，当我们将相关板块的地缘结构、特点都有所了解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相比我们所熟知的准噶尔、塔里木盆地，我们接下来所要进入的板块，大家会相对陌生一点。这个陌生绝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当中的大部分已经成为别国的领土了。如

1 这一章内容算是延伸插入，与现阶段（汉代）主题关联不大，当然可以拓展新知识。到此为止，日后有机会相信作者还会续写。只有理清了相关板块的地理结构，解读起来才会更多容易理解。后面继续回到主线上来。

果按照我们现在所处的时空来概括这片土地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乌孙之地”。当然，还有一个不带部族色彩的地缘标签来标示它。

第十三章 大月氏与乌孙先后入主伊犁河谷

第一节 伊犁河谷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

我们还是先放下准噶尔人和哈萨克人的恩怨，重新回到 2000 多年前，去看看他们的前辈们是怎么博弈的。在我们正在探索的历史时段，月氏人正被迫开始他们西迁的路程。如果他们想继续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和规模的话，由东疆盆地区切入天山北麓，便是唯一的选择了。问题是，天山北麓尽管有不错的草场条件，但却并不比河西走廊更加安全。因为月氏人的敌人——匈奴，此时也已经越过阿尔泰山，并沿“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向南渗透了。前面提到的“呼揭”部，就是匈奴在阿尔泰山地区（阿尔泰山南麓）扫平的第一个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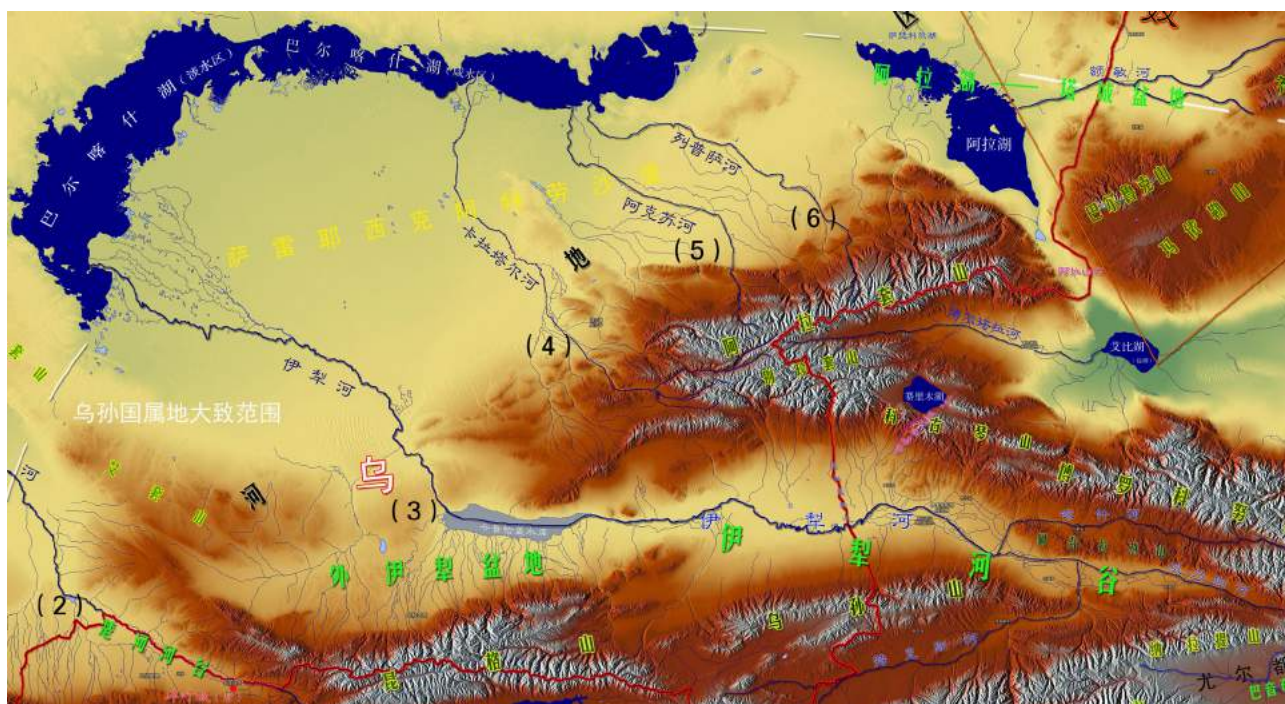
我们不是很清楚匈奴人是在月氏人开始西迁时，就已经搞掂了呼揭人，还是在月氏人进入天山北麓之后，再开始越过阿尔泰山的。不过摆在月氏人面前的形势却很明显，那就是如果他们只是想在准噶尔盆地南部停下脚步的话，那么就很难逃脱被匈奴两面包抄的命运了。那么，除了准噶尔盆地南缘以外，月氏人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答案是肯定的。大家应该还记得，在我们以东、南、西、北的方位划分西域地理结构时，整个西域被切割为了四“疆”。现在似乎还没有具体解读到底哪里才是西疆？其实从任何一张中国地形图上，我们应该都能够很快锁定这个区域，它就是伊犁河谷。

单从辨识度来看，伊犁河谷要比东疆盆地区容易辨识得多。天山北段在此向西延伸出的支脉，无论从高度还是连续性来看，都足以和博格达山这样位列天山主脉的山体相媲美。就地理标签而言，这条分割伊犁河谷的支脉通常被称为“博罗科努山”。不过事实上，“博罗科努山”之名只代表着中间那段山体。它东西两侧的山体，又被分别标识为“依连哈比尔尕山”和“科古琴山”。当然，一定要以博罗科努山之名也代指整条支脉也无所谓。名字嘛，只是一个标签，重点是大家知道它的位置和存在价值就行了。

博罗科努山与天山主脉合围成的这个夹角，可以说是整个西域乃至中亚地区水资源条件最好的区域。西宽东窄的喇叭口结构，让伊犁河谷可以正对西风带拦截水汽，将整个河谷两侧的山体都打造成为优质的集水区。这些水汽不仅仅在山脉高处遇冷凝结成冰雪，进而在阳光作用下化成雪水漫流向整个伊犁河谷，更会在遇到山坡急剧抬升时（遇到高端的冷空气），转化为地形雨直接滋养大地（低地年降水约 300 毫米，山地最高甚至能达到 1000 毫米）。相比之下，东疆盆地区的运气就差多了。西北高，东南低的山体结构，就只能让东疆地区在西、北两侧得到一点天山阴面流下来的雪水。如果没有人类巧妙的改造利用，吐鲁番、哈密盆地甚至都很难形成一

块像样的绿洲。

我们也可以从数据上看看伊犁河流域的潜力。西域地区整体的干旱是人所共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现实。然而我们正在解读的伊犁河谷地区，仅仅是在中国境内部分，河流的平均年径流量就超过了百亿立方米，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流域面积远超伊犁河流域（中国部分）的渭河流域。渭河流域面积为 13.6 万平方公里，而伊犁河流域的面积仅为 5.7 万平方公里。而覆盖华北大部的海河流域，虽然年平均径流量超过 200 亿立方米，但水资源却要供给 30 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虽然地表河流所带来的淡水不是一个区域水资源的全部，不过仅从这一数据的对比，我们就应该明白游牧在伊犁河谷的部落，所能享受到的水资源要远好于东亚核心区的北部。



乌孙地缘结构图（西汉）

其实造物主为伊犁河谷地区的照顾还并不止于此。一方面在南、北、东三面高大山脉保护下，东、南、北疆那些干旱戈壁的风沙、热量根本无力侵入伊犁河谷；另一方面，那些规律性的融雪、降水，以及天然水道密布的结构，也不至于让河谷内形成大的洪水。比起中央之国核心区那种水旱无常的气候变化，算得上是很幸福的了。伊犁地区的导游经常说“没有去过伊犁，就不算到过新疆”。既然伊犁河谷的自然条件这么好，那么它注定就不会是一块无主之地了。不管是两千年多年前，还是 100 多年前，这片美得让人无法呼吸的土地，都是各方争夺的焦点。

对于一直试图渗透西域的中央之国来说，最成功的一次并非发生在我们现在所解读的汉朝，也非后来更进一步的唐朝，而是古典时期最后一个帝国——清朝。而最近一次的博弈，则发生在上世纪中叶红色中国即将建立之时。以大历史的角度来

看，从 1755 年清军攻入伊犁河谷，将伊犁河流域置于中央之国的管辖之下算起，到 1949 年红色中国与俄国人达成协议，将险些分裂出去的伊犁地区（也包括塔城、阿勒泰地区，合称“三区”）重新稳定在中央之国的版图时止，中央之国花了将近 2 个世纪的时间，终于将伊犁河谷完全固定在了自己的版图中。尽管现在整个西域地区还有些许矛盾有待消化，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伊犁河上游那充沛的水资源都将为中央之国的西北边境安全，乃至在中亚地区施加影响做出卓越的贡献。



伊犁河

当我们还在为中央之国能在积弱已久的年代控制伊犁河谷而感到庆幸时，相信细心的朋友早已发现，中国境内的伊犁河谷似乎仅仅是伊犁河流域的一部分。单从流程来看，中国境内的干流河段甚至只有 422 公里，不到伊犁河全程（1500 公里）的 30%。这样来看，是不是说伊犁河流域的地缘控制权并非掌握在中国手中，而是在邻居哈萨克斯坦手中呢？情况并非如此。只能说，事情没有有些朋友想象的那么好；但也没有有些朋友想象的那么坏。

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即究竟哪一区域才是我们所称的“伊犁河谷”。通常

情况下，为这种边境地带的地缘板块圈定范围，都是一件令人头疼，并容易产生混乱的问题。这是因为，在我们凡事以政治为先的惯性思维下，一些地理结构的研究、划定也被国境线所圈定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被两国所分享，那么出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各种信息（尤其是官方、半官方层面），所指向的相关地缘标签都是指国内部分。比如我们曾经在国际部分解读过的“三江平原”，事实上仅从一般常识来想，我们也应该明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不会是它的地理边界。仅仅是由于政治方面的束缚，我们并不愿意去把俄国人所占据的那部分放进来一起研究罢了。在周边国家也以同样的地缘标签标注相关区域时，为了避免发生认知上的混乱，以及所谓的“政治风险”，将约定俗成的地缘标签改头换面也不少见。前面我们所解读过的，将“阿尔泰”地区改称“阿勒泰”，以规避俄、蒙两国对同样标签的使用，就是一例。在这种思维指导下，那些曾经在中国领土范围内，并与中国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地方，在相关研究中经常会被有意无意的忽视掉。哪怕它现在仅仅与它的中国兄弟仅仅一线之隔。



汉西域全图

回归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仍然是为之定义两个层面，即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伊犁河谷”与地理概念上的“伊犁河谷”。如果你像那些“专家”一样认定只有在国境线东面的伊犁河流域，才是伊犁河谷的话，那么我可以“欣喜”地告诉你，中国得到了全部的伊犁河谷；而如果你只是想从地理结构的角度，对这一板块加以了解的话，那么我必须严肃地告诉你：地理意义上，包括伊犁河中、上流流域的“伊犁河谷”，中国基本是和哈萨克斯坦对分。

由于中国部分的伊犁河谷大部分属于上游地区，因此山地 in 总面积中的比重，要明显高出哈萨克斯坦所得到的半个完全处于中游地区的伊犁河谷。如果按照我们在东亚古典时期得出的经验来看，这显然不是件好事。这意味着，哈萨克人应该可

能得到更多的耕地。然而，我们现在指向的区域是水贵如油的西域，能够得到上游的全部集水区，就不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了。任何一条河流都会有两条以上的支流作为上游，通常情况下，越往河流下游地区走，干流所能得到的补给就越多，干流的水量也就会越大。

不过经过中东部分的解读，相信大家已经颠覆了这个概念。如果你的下游河道所穿行的是一片沙漠之地的话，那么它所能指望补水的就只能是中、上游地区了。伊犁河的情况也是如此，和大部分发源于天山的河流一样，它最终也必须在沙漠当中延伸下游河道。绝大部分的补给，必须仰赖于与天山山脉紧密相连的中、上游地区。在这些合力形成伊犁河的支流河流中，上游位于中国境内的喀什河、巩乃斯河、特克斯河水量最大。当然，这些发源于中国境内的河流，在滋润过自己所在地区的山坡、谷地之后，都会穿越国境线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在无力也无心改变水资源分布状态的游牧文化覆盖期，这种肥水流入外人田的情况，并不会有人有异议。不过现在乃至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相信大家都能预感到。

事实上，古典时期的游牧民族即使有能力，也不会去改变伊犁河流域内部的水资源分布状况。因为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国境线出现之前，像伊犁河谷这样的地理单元并不会被人为的分割。尽管处在同一地理单元的游牧者内部还会分成大小不同的部落，但在游牧文化覆盖期，作为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伊犁河谷一般都会处在同一政治体管辖内范围内。不过，如果顺着伊犁河再往下游走的话，情况就不一定了。因为你会发现走出群山环绕的伊犁河谷后，并没有马上进入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而是还要经过一个有山地可靠的集水区——外伊犁盆地。

第二节 外伊犁盆地的地理结构

相信很少有人知道有“外伊犁盆地”这个概念，其实这个盆地形结构的地理单元，在结构上并不算完美。外围最完整的山体，是南线与伊赛克湖北部山体“昆格山”背靠背而生的“外伊犁山”。至于北线（严格说是西北方向），则主要是一些外伊犁山与阿拉套山之间的丘陵地帶了。与周边动辄4、5千米海拔的高大山体相比，这些完全没有积雪覆盖的低矮丘陵，就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了。当然，这个结构本身也并没有坏处，整个外伊犁盆地和伊犁河谷的淡水，都因这个西、北面低山丘陵带的存在，而显得更加充沛。可以让水汽一路畅通的渗透到伊犁河的最上游地区。

有的时候，外伊犁盆地也会被算入到伊犁河谷的范畴中去。最起码在低精度的地形图上，二者似乎也是腹地相连，并没有明显的分割线。不过无论是从地理结构，还是地缘结构来看，都有必要把外伊犁地区独立出来进行解读。首先从伊犁河的走向来看，在两个地理单元之中也有很大的不同。除去均匀的从上、中、下三个方向

向中心汇集的上游河谷以外，伊犁河的干流在伊犁河谷中的走向算是比较标准的，也就是从中间穿过。这其实也是两侧山体相互博弈的结果了。当两侧山体的高度、纵深属于同一级别时，各自所收集的雨（雪）水在量上也不会有质的区别。既然河谷两侧的水力作用相似，那么双方博弈的平衡线自然也就趋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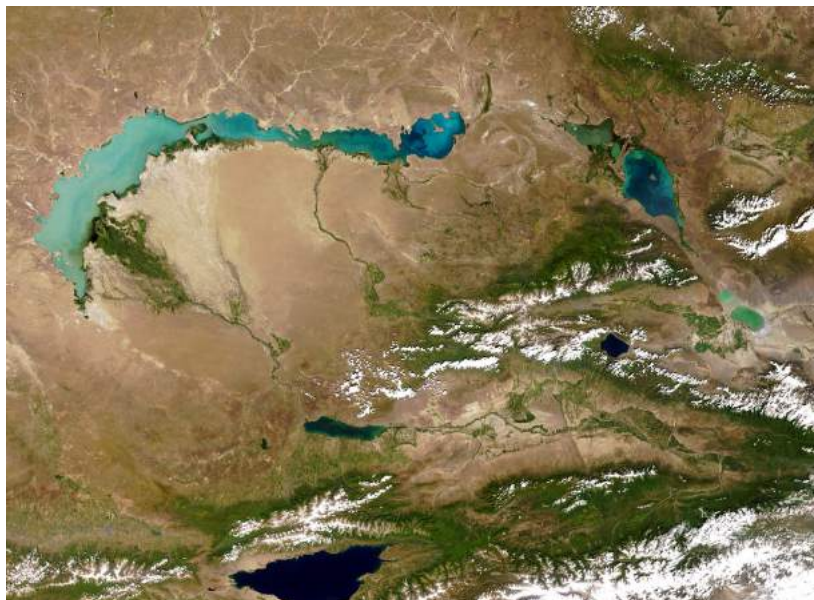
不过，当伊犁河突出伊犁河谷进入“外伊犁”地区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刚才也说了，对于这个地理单元来说，完整的连线只存在于南线。也就是说，无论从山体的纵深还是高度来说，外伊犁盆地的集水区都会集中在南部山体。至于北线山体，所能拦截的水汽就很有限了。这种失衡的结构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伊犁河在外伊犁地区是完全贴着北部山体的边缘走的（河流泥沙沉积的缘故）。南麓所形成的河流不得不在均匀的从山体流下之后，漫流过整个盆地腹地才得以注入伊犁河干流。这也使得整个盆地腹地的地形，并没有呈现四周高、中间低的“盆”状。如果说伊犁河谷腹地的地形是东高西低的喇叭形的话，那么外伊犁盆地所呈现的就是南高北低的“簸箕形”了。



汉西域全图

由于紧邻北部山体，缺乏必要的缓冲，伊犁河在平缓进入外伊犁盆地后，开始呈现出峡谷状态。这条两岸最高处高出水面将近 60 米的峡谷，被称之为“卡普恰盖峡谷”。从地理结构上来说，峡谷东端的山体明显从南北两个方向开始向中央收紧。尽管最终并没有紧密相连在一起，但也足以为伊犁河谷划出西侧的地理边界了。这种结构的综合变化反映在河流上面，就是卡普恰盖峡谷及其以西部分的伊犁河，被

认定为了下游。对于我们来说，上、中、下游的认定，并非只是单纯的在玩几何游戏，或者说一定要把一条河流相对均匀的分成三段。事实上，这种分段更多的是在显示河流所在板块地貌的不同。伊犁河在进入外伊犁盆地之后，所呈现的明显不同于中游地区的地貌，是整个板块应该独立出来的重要原因。



伊犁河流域卫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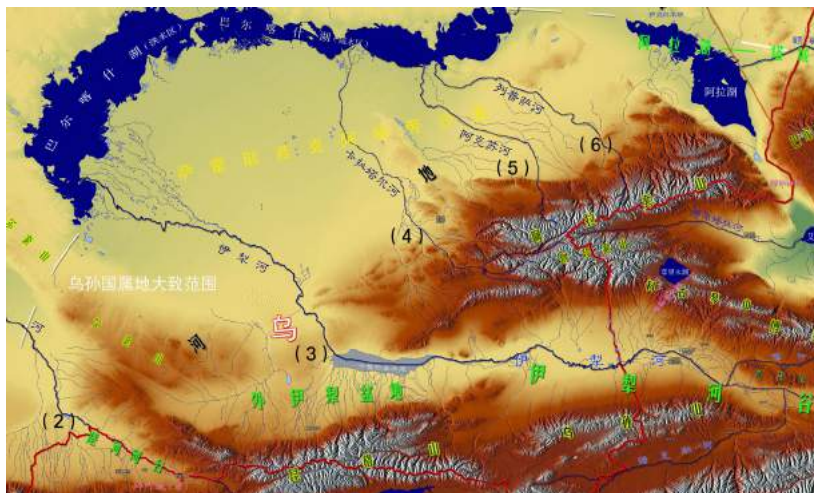
伊犁河（峡谷段）

也许对于已经习惯在各种地形游牧的游牧部落来说，这种变化并没有太大影响（关键是要有水有草，有了这些，你总能找到适应的牲畜的）。只是对于更适应低地农业的农耕民族来说，这种峡谷地貌无疑会影响他们对干流两岸的开发。然而，在整个古典时期，并没有哪一个进入此地的族群真正想过在此转型农耕生活。而当历史推进到 20 世纪，俄国人准备让那些固守游牧传统的哈萨克人，也开始用农耕的方式开发这片土地的潜力时。伊犁河谷在这里的峡谷地貌反而又成了优势了。利用工业技术所带来的进步，“卡普恰盖峡谷”变成了“卡普恰盖水库”。这也让左岸来自外伊犁山的那上千条溪、流，以及从伊犁河谷流淌出来的中、上游河水，都得以在外伊犁盆地的北沿蓄积。以至

于在一些资料中，“卡普恰盖水库”已经取代巴尔喀什湖成为伊犁河的终点了。

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让伊犁河水留在相对湿润的外伊犁盆地锦上添花，似乎要好过让它继续穿越天山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萨雷耶西克沙漠”要更划算（避免蒸发掉宝贵的淡水）。在整体干旱的中亚地区，有幸得到伊犁河最多水资源的外伊犁盆地，不仅成为中亚的农业重地，更成为哈萨克斯坦，乃至前苏联重要的工业基地。

然而与此同时，巴尔喀什湖的情况却开始恶化了。中、上游突然增加的用水量，打破了千万年来伊犁河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平衡关系。在此之前，除去土地自然吸收和蒸发掉的河水外，伊犁河超过 80% 的水量都最终会补入巴尔喀什湖。而在巴尔喀什湖所接收到的诸多河流中，伊犁河无疑是最重要的。



乌孙地缘结构图（西汉）



卡普恰盖水库

死海和曾经辉煌过的居延海，会很羡慕它。

在中国准备加大西北开发，并有意更多利用伊犁河这条“外流”河流那宝贵的水资源时，巴尔喀什湖甚至哈萨克斯坦经济所倚重的外伊犁地区，命运究竟还会有什么变化更加变得不确定。毕竟整个伊犁河流域，超过半数的水资源来自于中国部分。而中国在之前的历史中，暂时还没有兴建类似“卡普恰盖水库”那样规模的水利工程进行深度开发。唯一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感到更有安全感的，就是在先人们的努力之下，现在的中央之国在这个问题上最起码掌握有主动权。在哈萨克斯坦从强大的苏联当中分离出来后，这种安全感也很有机会转变为地缘政治上的优势。

这条水量巨大的河流，甚至让巴尔喀什湖呈现出了“西淡东咸”的奇特结构。也就是说，在伊犁河水高补给量的作用下，巴尔喀什湖西半段的矿物盐含量要比补给乏力的东半段低得多。这也让尤其是河口入湖处的三角洲地带呈现良好的植被覆盖状态，并一度进行了大规模农业开发。只是现在，这片三角洲上曾经的湿地、鱼塘、农田、养殖场都开始缩小、消失，并呈现荒漠化趋势了。相信这种情况大家并不陌生，无论是在中东还是中国的西北地区，人类在河流中、上游地区的开发，都无可避免地建立在了下游地区的痛苦之上。像巴尔喀什湖这样还能够保住基本形态的，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最起码即将死去的

从外伊犁盆地向西一直到巴尔喀什湖的广袤低地，都是被沙漠所覆盖，伊犁河水最多能为它的两岸带来一点绿意了。很显然，争夺伊犁河流域的重心，是在伊犁河谷和外伊犁盆地两个地理单元上。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习惯以地理标签来指向某一区域。那些更为我们所熟知的，是那些居于这些板块地缘中心位置的城市，其实这这也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在具体的实践中，通常这一地理单元所属的土地也都是由这一中心城市所管理的。用这个方法来认知伊犁河谷和外伊犁盆地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两个分别位于中、哈境内的城市。一个就是在伊犁河中游的“伊宁市”；另一个则是紧靠外伊犁山的“阿拉木图”。



汉西域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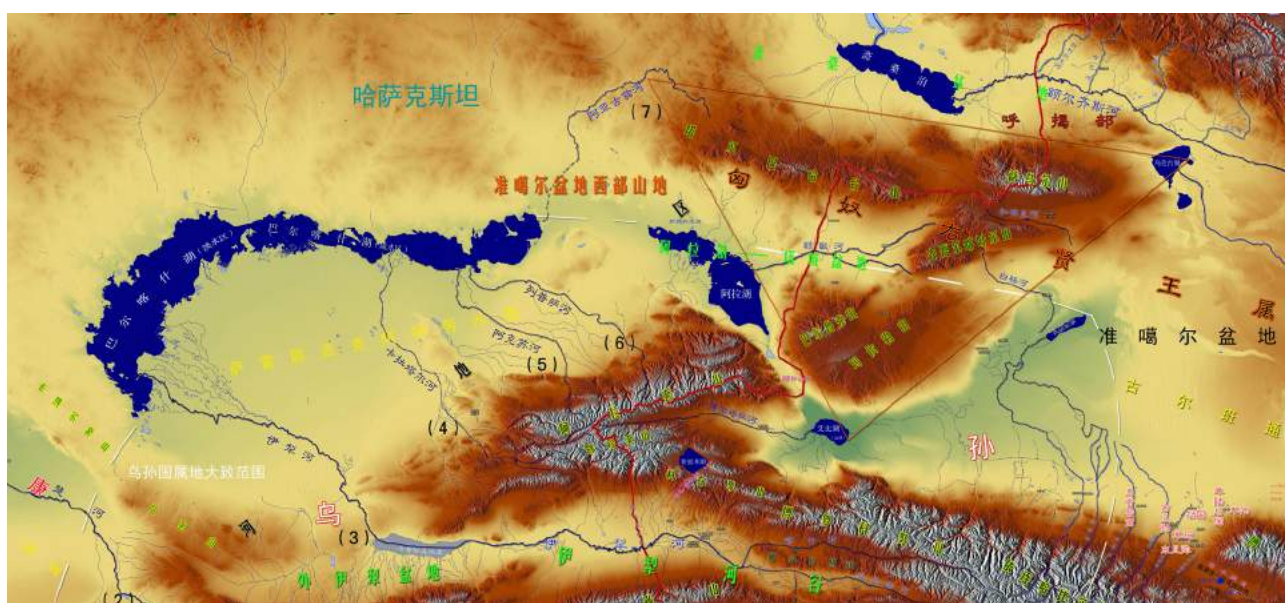
尽管我们一提到伊犁河谷，很自然就会想到“伊犁”这个行政标签。不过在现实的行政版图中，我们却找不到“伊犁市”这座城市。伊犁二字最初出现在行政标签中，是清朝在天山南北所设立的“伊犁将军”一职。这个军政合一的行政机构，在当时是整个西域的管理者。也就是说，伊犁河谷当时可以说是整个西域的行政中心。而为了更好的管理伊犁河谷以及整个西域，清朝在伊犁河的中游建筑了九个城池，合称“伊犁九城”，以容纳管理西域的军政人员。只不过那时的行政中心并不是在现在的伊宁市，而是在它西侧三十公里处，现在归属霍城县的“惠远城”（现霍城县惠远乡）。

如果今天纳入中央之国版图的“西域”还能够达到清帝国时期的疆界的话，那么伊犁九城所代表的伊犁河中流河谷，无疑还会是最理想的地缘中心。问题在于，在只能保有半个伊犁河谷，并丧失了准噶尔、塔里木盆地以西的领土之后，伊犁河谷就不再具有地缘中心的价值了。现在伊犁河谷的地缘中心——伊宁市所能延伸的行政力，是包括阿勒泰、塔城两区在内的准噶尔盆地西半部，以及中国境内全部伊犁河谷（共十县）的“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

第三节 近代中俄在伊犁河谷的博弈

通常情况下，我们提到“伊犁”的概念，指向的还是伊犁河谷所涵盖的地区，并不包括准噶尔盆地的塔城、阿勒泰两区。只不过，现在的我们应该会感到些许遗憾，因为在中（清）俄最终分割广义上的中亚时（包括西域在内），作为先来者的清帝国，在帝国最西部所设立的那些固定警备处——卡伦，最终成为两国划界的基点。虽然从实际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些驻扎军事力量的所在地并不意味着行政管辖的边界。但在面对强势对手的情况下，一切未示明利益就只能归于对方了。

现在的我们，当然可以回过头来责备当时北京城里的政治家危机意识不够强。应该在俄国势力渗透到中亚时，就加强在伊犁河谷西半部的控制力。果真这样做的话，那现在的中国即使仍然不得不失去伊犁河下游地区，也还是很有可能划得全部伊犁河谷的。只是此一时，彼一时。以古典时期的标准来看，已经完全控制了北亚游牧体系的清帝国已经做到中央之国所能做到的极致了。谁又能想到，此时的中央之国在这个星球上已经由自认为的中心区，变身成为欧洲人准备瓜分利益的“边缘区”了。而代表欧洲文明侵入天山南北的俄国人，其力量也决非那些游牧民族所能比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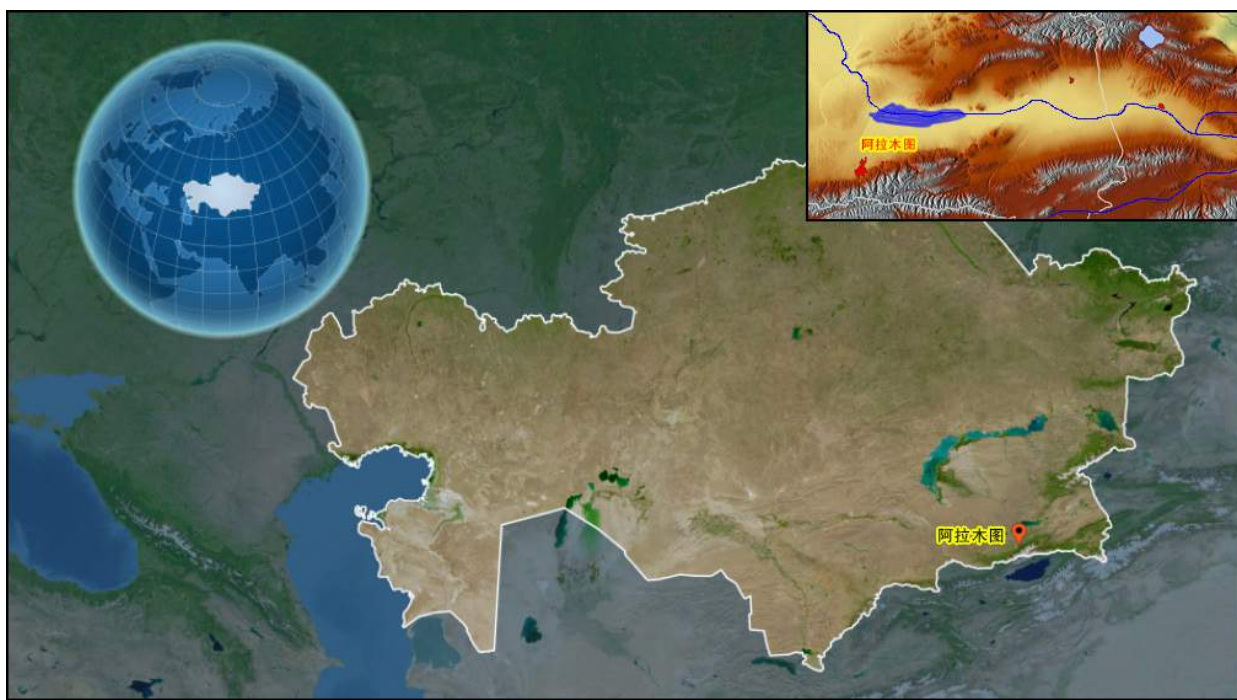


乌孙地缘结构图（西汉）

没有得到全部伊犁河谷的中央之国，固然会感到缺憾。但无论是当年将中亚带入现在国家体制的俄国人，还是现在据有此地的哈萨克人，也同样对两国在伊犁河流域，乃至整个准噶尔盆地的分配方案感到不满。这种不满源于地缘上的不安全感。如果再说得具体点的话，那就是因为在整个准噶尔盆地与伊犁河谷所对应的中亚地区，绝大部分的河流都源自于中国一侧。造成这样的困局，主要原因在于准噶尔盆地与伊犁河谷的西侧没有连续、完整的山脉封口。这些横亘于阿尔泰山与天山山脉

之间的断续山体，无法在西域和中亚之间筑起一道天然的地理分割线。尤其是在南北两侧，伊犁河与额尔齐斯河的上源实际上都已经深入西域腹地了。

如果仅考虑中亚方面安全的话，那么整个伊犁河谷，阿尔泰地区，以及准噶尔盆地西侧山地分水岭以西部分，都应该从中国的版图中剥离出去。只是那样的话，也就意味着中国会失去整个伊犁河谷和大部分的准噶尔盆地的控制权了。精于地缘政治研究的俄国人，当年也的确按照上述思路努力过，并差一点就成功了。在微观历史层面上，左宗棠、杨增新，乃至从政治上解决所谓“三区”问题的政治家们，都是为抵御俄国的这种渗透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事实上，俄国人也的确有理由认为他们有机会把领土继续向东扩张，前提是他们能够先控制住蒙古高原。最终蒙古高原从中央之国的板块上分离出去，对中央之国其他板块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了西域。



哈萨克斯坦地图

如果中央之国核心区内的混乱所持续的时间再长点的话，很难说我们现在是否还能够拥有相对完整的西域板块。回首历史，如果不是清朝为中央之国解决了来自蒙古高原的威胁，而仅仅是按照汉、唐轨迹，从河西走廊——东疆盆地区向西平推的话，那么最终中国在西域所得到的领土很可能只是塔里木盆地，以及以博格达山为中心的“博格达地缘圈”。这一点，并不能因为清帝国缔造者的所谓边缘出身而抹杀掉。

如果俄国人能为哈萨克斯坦拿到整个伊犁河谷控制权的话，那么现在外伊犁盆地的地缘中心“阿拉木图”也就不会在哈萨克斯坦的版图上显得那么边缘了。这样

的话，哈萨克人在将首都迁到哈萨克丘陵北部的“阿斯塔纳”时，也许就要多犹豫一下了。当然，哈萨克人迁都这件事，地缘背景并不仅仅是因为阿拉木图位置边缘（只不过这也算是人家的家事了，所迁之地也不在我们所要延伸解读的板块中，暂时就不会详解了）。

简单从地缘位置上来看，阿拉木图也的确无法做到以其为中心，辐射整个哈萨克斯坦。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阿拉木图所在的位置，所承担的都是沟通伊犁河流域与外伊犁山以西地区的作用。也就是说，阿拉木图的地缘优势，是体现在控制天山北路的“丝绸之路”上的，这也是1854年俄国人在此选址建城的根本原因。在俄国人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俄国人完全有理由相信，阿拉木图能够成为他们继续向东，沿丝绸之路向西域腹地渗透的基地，并最终形成以阿拉木图为中心的政区。在这样一个目标无法完成，外伊犁山脉以南的天山山脉腹地又单独分裂成为吉尔吉斯人的国家后，阿拉木图以及外伊犁盆地也就注定难以继续成为整个中亚北部的地缘中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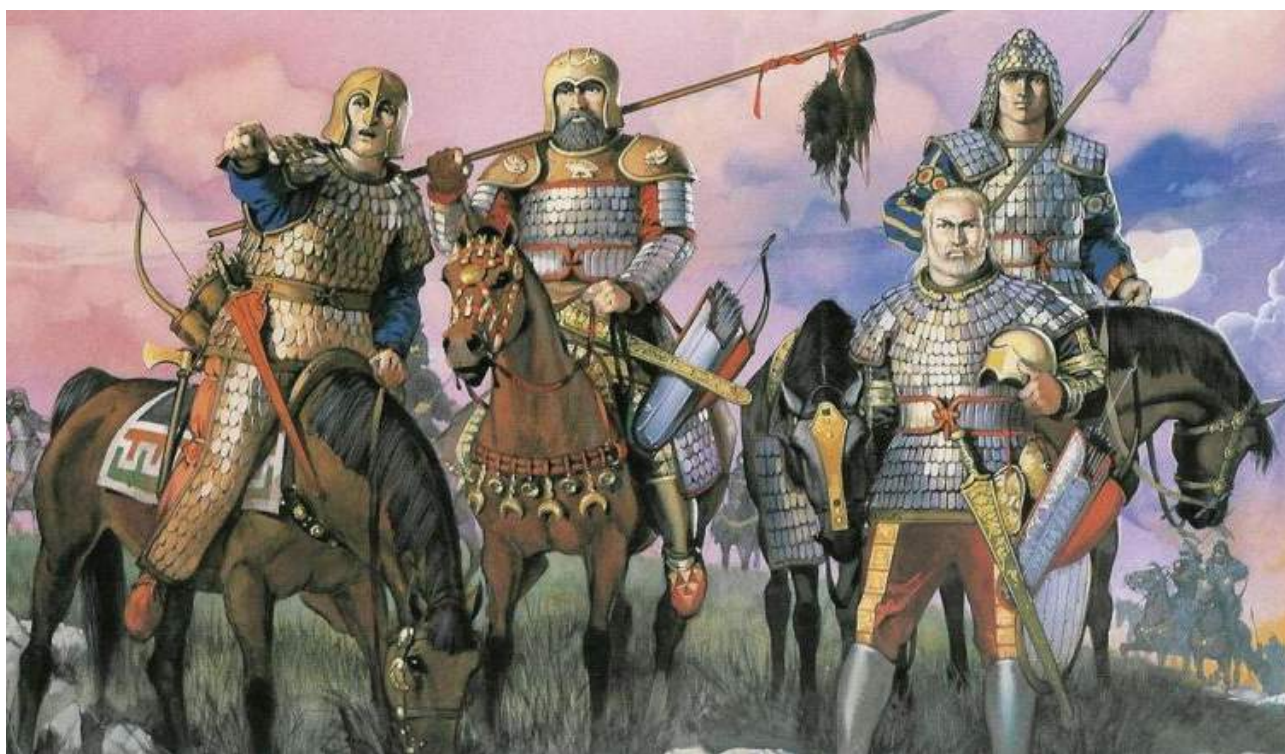
近代发生在天山南北的地缘博弈，实际上和大部分的古典时期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古典时期，来自蒙古高原、中亚等地的游牧民族才是天山博弈的主角。从结构上来看，这种博弈基本呈现南、北对抗的模式。只有在中央之国凭借广袤的纵深，强力渗透到了西域之后，这种模式才会发生变化。尽管争夺中亚——西域板块控制权的力量来自于不同方向，但伊犁河流域都是当然的中心板块，这块风水宝地所提供的不仅仅是水草丰美的牧场，更有控制东西、南北交通的枢纽之利。就中央之国而言，在我们所正在进行解读的华夏第一帝国（秦汉）时代，暂时还没有力量把势力范围覆盖于此。为华夏文明第一次尝试在伊犁河流域及整个天山北麓设立行政机构的，是另一个融入了北方马上民族基因的帝国——唐帝国。只不过，鉴于蒙古高原的战略威胁并没有被有效解决，这种尝试总的来说并不成功，也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记。

不管怎么说，汉、唐、清三代都以自己的方式，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段，为华夏文明向西渗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些历史沉淀也直接为我们今天去维护领土完整做出积极贡献。比较有意思的是，今日在大家看来似乎最不稳定的南疆塔里木盆地，在历史上却是华夏文明在天山南北所控制的最为成功的板块。事实上，鉴于这个板块整体的地缘实力太弱，在历史上很少有机会成就独立的政权。附庸于更为强大的政权几乎是它唯一的出路。

在纳入了东北渔猎民族基因的华夏文明再一次的将触角伸到了西域之时，来自东欧平原的俄国人也凭借整个欧洲在技术上的先发优势，在时隔三千多年后，代表欧洲人又一次的渗透到了天山北麓。这使得天山南北的命运，被完全交由了两股板块之外的力量来决定。就中亚——西域的历史来说，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段的地缘博弈中，博弈的各方中总是会有土著政权以独立的姿态参与其中。这种变化，其实也在预示着这个世界的博弈模式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

在欧亚大陆呼风唤雨的游牧民族，不可避免的在新世界格局下沦为配角了。

对于 100 多年前，中、俄两国在西域——中亚的恩怨，相信大家多少都有所了解。只是为什么我们要说欧洲人，也是“又”一次渗透到天山脚下呢？中央之国数次渗透西域是基本的历史常识，难道俄国人也曾经在三千多年前扩张到天山脚下？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所谓“俄国”的概念，最多不过追溯到 13 世纪末的“莫斯科公国”。我们这里所说的欧洲人，指的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塞种人”。如果说在河西走廊时的月氏人到底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还存有异议的话，那么所谓“塞种人”是来自东欧平原的白种游牧部落就没有异议了（欧洲称斯基泰人）。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被匈奴人整合在一起之前，以塞种为代表的欧洲游牧民族才是天山真正的主人。而伊犁河流域，当时正是塞种游牧部落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



塞种人（斯基泰人）

作为东欧平原与蒙古高原之间的板块，中亚无疑是欧、亚最有可能发生博弈的板块。当然，从位置上看，西西伯利亚平原似乎更有机会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只是过于寒冷的气候条件，让双方博弈的战场南移了。如果从种族覆盖的角度来看，这场跨度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博弈并没有胜者。因为除了北部的一些代表蒙古高原游牧力量延续的蒙古部族，以及帕米尔高原之上那些代表欧洲游牧部落遗存的“塔吉克人”以外，我们现在在天山南北所看到的土著居民基本上都是黄白混血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无非是在于混多混少罢了。

从技术上看，欧洲游牧民族能够在三千多年前成功的向东渗透，得益于他们对

于马的驯服和使用。那些驰骋在马背上的“斯基泰人”，曾经是欧亚许多民族的噩梦。只是当亚洲游牧民族也能够熟练地掌握这些技术，并不断从文明更为发达的东亚大陆学习时，欧洲游牧部落在中亚草原上的主导权就开始发生着逆转了。直接打破这一局面的，就是月氏人的西迁。如果你认为控制河西走廊的月氏人，在种族上应当是欧洲游牧民族的话，那么匈奴人对月氏人的进攻，就是亚洲游牧体系战略反击的开始。而如果你认为月氏人最初应该是黄色皮肤的亚洲游牧民族的话，那么他们西迁后赶走“塞种人”，入驻伊犁河流域的行为，才应当算是亚洲游牧民族反击的开始。

第四节 大月氏从尤尔都斯盆地攻入伊犁河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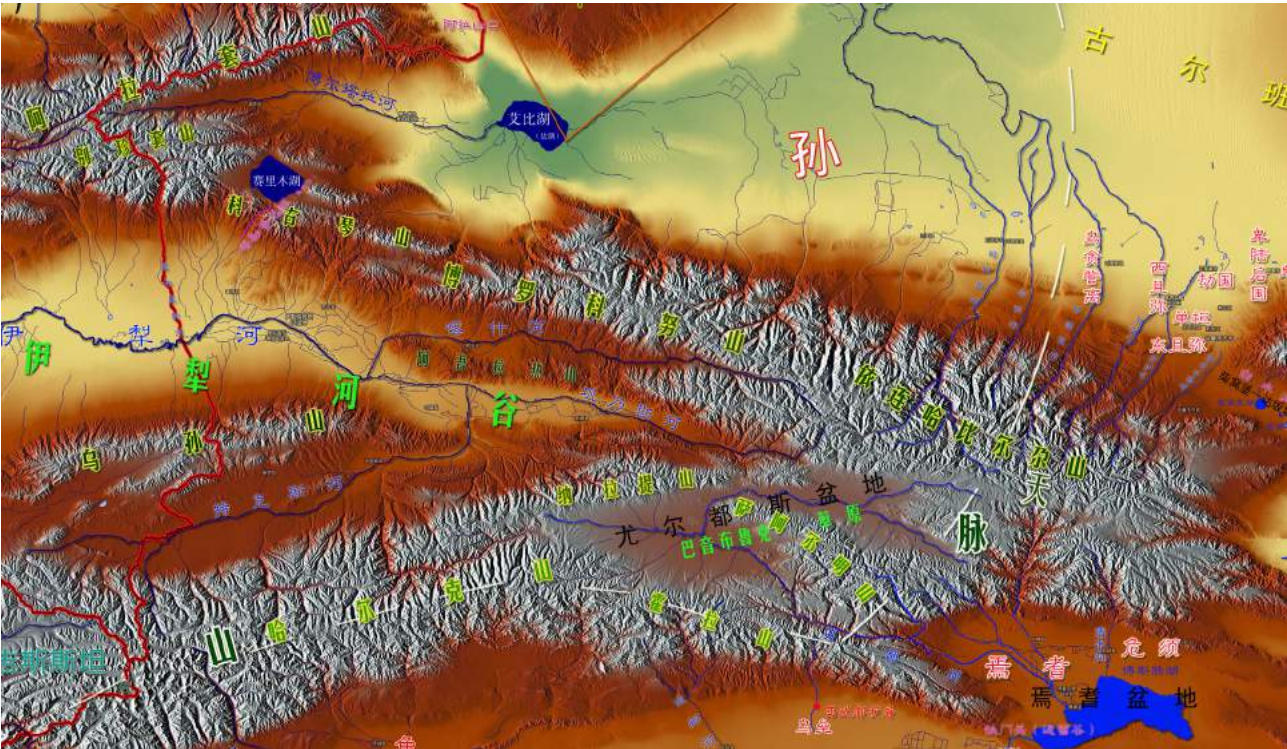
月氏人迁移至伊犁河流域以后的历史，是比较清晰的。身处丝绸之路中段的位置，让他们有机会同时出现在东、西方的历史记忆中。不过我们比较难以了解的是，月氏人是如何到达伊犁河谷的。正常情况下，月氏人应该是先进入东疆盆地区，然后或从哈密盆地开始穿越天山主脉进入“巴伊盆地”，或是由吐鲁番盆地经“柴窝堡——达坂城谷地”进入天山北麓，此后沿天山北麓一路向西游牧，并最终停留在了伊犁河谷。

然而就当时的形势来说，这样的路线也存在着很大风险。因为此时的匈奴人很有可能已经越过阿尔泰山，向天山北麓攻击前进了。另一方面塞种人的游牧范围其实并不仅仅限于伊犁河流域，博罗科努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西南部，也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假如月氏人在准噶尔盆地南缘就与塞种人拉锯的话，那么他们也许就要陷入匈奴与塞种两面夹击的境地了。那么有没有可能不经由天山北麓，直接翻越天山插入伊犁河流域呢？

从后来丝绸之路的几条路线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不过我们不要忘了，与商路的开拓重点在于具备长期通行条件不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并不在意有没有现成的所谓路线，他们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即将前往的区域有没有能够为牲畜提供放牧条件的草场。至于这些草场所处区域的地形是否复杂、海拔是不是太高，都不是问题。按照这个思路来探究月氏人西迁路线的话，我们就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天山南北麓的山前低地了。当我们不再以农业民族的视角视天山腹地为天然障碍时，我们会赫然发现，在天山中段腹地紧邻焉耆盆地处，有一处位于高山之上，面积与之相仿的高山盆地——尤尔都斯盆地。而对于这片位于天山之上的相对低地，还有一个更让游牧民族感到亲近的标签——巴音布鲁克草原。

巴音布鲁克草原应该是天山之上最好的高山草场了。在干旱的亚洲中部，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地形上最有利于人类大规模生存、发展的低地，总是因为缺乏降水而变得异常干旱。而山地之中虽然更为湿润，但复杂的地形又限制了它的人口承载力。相比之下，能够得山地之水润泽的山前低地，以及高山之上的盆地区，看上

去就有机会实现鱼和熊掌兼得了。像天山山脉这种体量的山地，注定会形成许多山间盆地和高山盆地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更容易注意到像东疆盆地区这样的绝对低地性质的盆地。相比之下，像尤尔都斯盆地这样相对低地性质的高山盆地，就比较容易忽视了。就好像我们看青藏高原腹地，简直就是一片无差别的极限之地。但仔细梳理那些山地的分布之后，那些深藏其间的相对低地，就能够为我们了解青藏高原的地缘潜力提供方向了。



乌孙地缘结构图（西汉）

从地理结构上看，尤尔都斯盆地是由北部的“依连哈比尔尕山”，西部的“纳拉提山”、“哈尔克山”，南部的“霍拉山”、“萨阿尔明山”合围而成的。这些隶属于天山主脉的山体，将之与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塔里木盆地、焉耆盆地分隔开，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由于萨阿尔明山向盆地腹地有所延伸，因此如果要再细分的话，尤尔都斯盆地本身还可以分成两部分，即萨阿尔明山西侧的“大尤尔都斯盆地”，以及东侧的“小尤尔都斯盆地”。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高山之上存在这样一块高低错落，有机会同时提供四季草场的水草丰美之地。

尤尔都斯盆地中所生成的草原，叫作“巴音布鲁克草原”。巴音布鲁克这个名字是蒙古语，意为“永不枯竭的泉水”，从这个名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它优异的水资源基础，也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蒙古牧民游牧的乐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并不熟悉那些自成吉思汗时代起所演变出的蒙古部族。不过提到游牧于此的蒙古部落，相信大家都会有印象。在清朝乾隆时期，曾经被历史浓墨重彩记录下来的，从

伏尔加流域东归而来的“土尔扈特人”，就曾经被安置于此。为了善待这支历经千难万险回到西域的“漠西蒙古”部，清帝国的统治者慷慨的提供了几处牧场进行安置。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阿尔泰山——北塔山盆地，也是其中的一块安置地。而最让土尔扈特人满意的，就是巴音布鲁克草原了。

既然我们说尤尔都斯盆地是一块水草丰美之地，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看看汇集到盆地当中的天山雪水，到底汇集成了一条什么样的河流。其实这条叫作“开都河”的河流，我们应该在前面也提到过了。在解读东疆盆地区时，相信焉耆盆地中的“博斯腾湖”应该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那些从西、北方向汇入博斯腾湖的上源河流中，最大的一支就是“开都河”。也就是说，尤尔都斯盆地的存在，无疑增加了博斯腾湖上流的集水区。如果没有尤尔都斯盆地的存在，周边各板块应该都有机会增加自己的淡水供给量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东疆三盆地中，只有焉耆盆地腹地形成了一个颇有体量的淡水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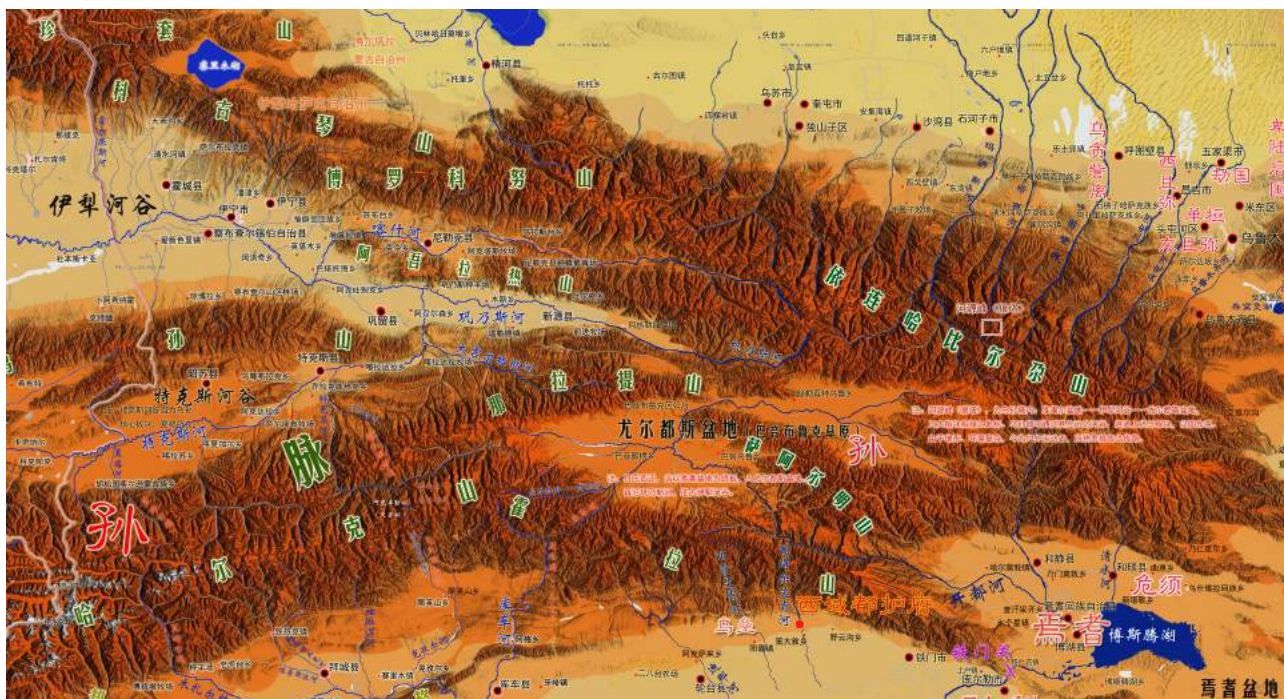
巴音布鲁克草原

布鲁克草原这块高山之上的世外桃源还在，能够让你充分体验游牧生活。

巴音布鲁克草原之所以还能保持原状态，原因在于它“边缘”的地理位置。尽管从地理结构上来看，尤尔都斯盆地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整个天山山脉的核心板块（最

开都河的存在，不仅为尤尔都斯盆地和焉耆盆地滋养了连片的牧场，河流也成为两个地理单元之间的联系纽带。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从安置土尔扈特部这件事上也能看出。事实上当时划给土尔扈特人的，并不仅仅只有开都河中上游的尤尔都斯盆地，下游的焉耆盆地西北部那些同样水草丰美的土地也被交给了土尔扈特人游牧。只不过由于像焉耆盆地这样的绝对低地，更有利于进行农业开发。随着历史的推进，迁入盆地的汉、回等农业民族逐渐在人口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即使是在焉耆盆地游牧的蒙古牧民也基本转而定居农耕了（特别是19世纪末，为了安置所谓“回乱”之民，造就了现在的“焉耆回族自治县”）。不过，对于喜欢草原风情的朋友来说，也不用感到遗憾。最起码巴音

起码是中国境内的天山），但这个核心位置并没有在地缘上造就它的枢纽地位。原因很简单，地缘与地理两个概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需要重点考虑人的因素。如果一个板块不适合人类生存或者通行的话，那么有再好的位置也是一个边缘板块。很显然，不管从通行还是农业开发的角度来看，高山之上的尤尔都斯盆地都不会是最好的选择。无论是那些以农耕方式开发绿洲的西域“城国”，还是借助这些城国沿途补给，开辟丝绸之路的中央之国，都只会把视线锁定在山前低地上。



汉西域全图

然而对于游牧属性的月氏人来说，这些并不是问题，他们现在急于找到的是一块能够远离匈奴攻击的牧场。很显然，焉耆盆地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基于它在天山南北通道中的位置。匈奴人无论是从准噶尔盆地向南渗透，还是由河西走廊向西扩张，都不可避免的会盯上焉耆盆地。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为匈奴经营西域的匈奴“日逐王”，甚至在焉耆盆地中设立了一个“僮仆都尉”的常设机构（看这名字，就知道匈奴是如何定位那些西域小国的了），以向那些势力范围内的西域小国征税。这样的位置，即使月氏人曾经留恋过，也断没有机会驻足经营的。隐藏在高山之上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才是月氏人最有可能西迁的去处。

月氏人没有进入天山北麓的传统西行路线，而是直接插入天山腹地的尤尔都斯盆地，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比起在准噶尔盆地南缘可能受到的来自匈奴、塞种人的战略包围，月氏人所需要面对的就只有先期游牧于巴音布鲁克草原的部族了。从地理环境上来看，能够经营这片高山草场的只能是游牧部落。而从地缘位置来看，在月氏人到来之前，以伊犁河谷为核心区的塞种人，是不可能无视这些高山草场的。

不过对于塞种人来说，他们应该从来没有考虑到来自天山南麓的攻击。以历史经验和地缘结构来看，伊犁河谷才是最关键的所在。敌人要么来自于博罗科努山北麓，要么就是先进入外伊犁地区后，再进入伊犁河谷。至于天山南麓那些绿洲小国，从来不会也没有能力想到渗透天山腹地。

可以想见的是，当数以十万计的月氏人突然出现在巴音布鲁克草原时，会给游牧于此的塞种部落会带来什么样的震撼。在此之前，不管匈奴此时有没有越过阿尔泰山北麓，征服塞种人的邻居“呼揭人”，强大的匈奴帝国在蒙古高原崛起的消息，都会让塞种人感到不安，并使得塞种人将防御重心放在博罗科努山北麓。这也从战略上增加了月氏人透过天山腹地，攻取塞种人之地的成功率。而从战术角度看，先乘塞种人不备，抢尤尔都斯盆地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让西迁的月氏人有了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休养生息，以作继续西迁的基地。更可以穿越伊犁河流域与开都河流域的分水岭，顺势马上进入塞种人的腹地——伊犁河谷。

不管月氏人到底是采用了哪条路线出现在塞种人面前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月氏人对伊犁河谷的征服，并没有受到匈奴人的干扰。如果月氏人在种族上也是隶属于欧洲游牧体系的话，那么这场战争也许应该被视为欧洲游牧民族的“内战”。不过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即使月氏人是出身于欧洲游牧体系，触发亚洲游牧体系反击欧洲游牧力量，并渗透中亚的功劳，还是要归功于亚洲游牧体系的杰出代表——匈奴人。正是由于匈奴人第一次将蒙古高原的游牧力量统一在了一面王旗之下，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北亚游牧民族，才在长达两千年的时段中，成为欧亚大陆腹地的主导者。只是当这些来亚洲东部的游牧民族进入中亚之后，在种族和文化上都不可避免的会受到那些土著化的欧洲游牧民族的影响。

面对亚洲游牧体系的强力反击，塞种人和其他被冠以不同标签的来自欧洲的渗透者，尽管必须退出他们先行占据的那些牧场，甚至最终消失，但他们的基因却还是留了下来。无论是最初西迁的月氏等部，还是那些越过阿尔泰山的蒙古高原游牧部落（如回鹘人），在土著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融入了大量来自欧洲游牧部落的基因。在人口就是战斗力、生产力的古典时期，亡国通常并不代表灭种。尤其对于种族概念比较淡薄的游牧民族来说，并不会介意自己的部落中是否掺入了过高比例的异种之人。

月氏人在征服伊犁河流域之后，不可避免地的会吸收很多塞种人的成分，而在他们后来的西迁过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基因也越积越多。以至于即使有人怀疑河西走廊时期的月氏人，应该是从蒙古高原或者黄土高原迁来的黄色游牧部落，也不会认为在天山北麓经营日久的月氏人，还能呈现蒙古人种的特征。至于被月氏人赶走的塞种人也并没有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是像月氏人一样被迫沿天山向西迁徙。这种类似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在欧洲大陆腹地是很常见的，在后面的历史中也曾经无数次的发生过。

然而月氏人最终也并没有成为伊犁河流域的主人，他们的这次征服不过是后来发生在伊犁河谷的，一系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连续剧的一部分，并且是演出时间最短的一集。很快，不希望看到月氏人绝处逢生的匈奴人，开始了针对月氏人的又一次进攻。只不过这一次，强大的匈奴帝国却并没有取得胜利之后，顺势成为伊犁河谷的主人，而是成为帮人做嫁衣裳的苦主。真正笑到最后，成为伊犁河谷主人的，是当年与月氏人在河西走廊西段博弈的乌孙人。

第五节 乌孙占据伊犁河谷

如果匈奴人只对与汉地接壤的土地感兴趣的话，那么赶走塞种人，入驻伊犁河谷的月氏人现在应该很安全了。可惜的是，汉地那些农耕区只是匈奴人额外获得物资补给的猎场。对于匈奴人来说，那些蒙古高原周边板块上的草场和那些毡房里的“兄弟”才是游牧民族的根本所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匈奴人和以后其他的北亚游牧民族，越过阿尔泰山向南扩张是必然的。

在东亚战场上的战略优势让匈奴得到的并不仅仅是信心，更意味着他们能够从汉帝国那里获得稳定的物资补给。比起月氏人在河西走廊或者伊犁河谷游牧额外获得的那些商业利益，匈奴人的这些额外补给，无疑要更为充足。毕竟在汉帝国以贸易终端、物流保障的双重身份正式建立“丝绸之路”之前，往来于东西方的商品交换量并不会太大。

对继续追击月氏人感兴趣的，除了匈奴之外还有乌孙人。论起彼此之间的仇恨来说，同处河西走廊的乌孙、月氏两族，肯定不比匈奴人和月氏人少了。前面我们也说了，在月氏强大之时，乌孙人甚至被赶出河西走廊，被迫依附于匈奴。而在匈奴人进占河西走廊之后，乌孙人也随之回到了他们曾经游牧的党河流域。然而对比之前与月氏人共居河西走廊的时期，此时乌孙人的处境却并不见得乐观多少，甚至说有可能会更糟糕。

一般情况下，匈奴人对于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游牧部落，总是当然的归入自己的直接控制体系。也就是说，不管是被迫依附的乌孙人，还是败于匈奴之手的其他游牧部落，此时都应该自称为“匈奴人”了。而乌孙人之所以能够暂时获得一个“独立”的身份，很大程度是因为匈奴需要这支复仇心切的部落全力为自己夺取河西走廊。在匈奴人并不十分有把握打败曾经战胜过他们的月氏人时，乌孙人因为被允许自立门户而激发出的战斗力，和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参战，所能贡献出的力量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就会让胜负天平倒向匈奴一边。

不管试图复国的乌孙人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匈奴与月氏战争的结果，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乌孙人并不满意现在的结果。尽管匈奴人最终也兑现了承诺，让乌孙人重新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但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即使匈奴人能够一

直信守承诺，让乌孙人保持独立，生活在匈奴之侧的他们也没有扩张空间了。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甚至还不如他们与月氏争夺河西走廊控制权的时期。最起码，那个时候的月氏人还没有现在匈奴人那么强大；最起码和月氏人处于敌对状态的乌孙人，还有向东扩张进占整个河西走廊的可能性。而现在，除非乌孙人愿意一直活在匈奴人阴影下，甚至被其直接吞并，否则他们也必须为自己寻找一片真正能够自立门户的土地了。而当乌孙人的战略规划也开始定位于避开匈奴势力范围时，他们的利益诉求就和月氏人相一致了。也就是说，月氏人刚刚从塞种人手中夺取的伊犁河谷，现在也成为了乌孙人的目标。

对于乌孙人又一次的积极参战，匈奴人应该是感到非常满意，甚至有些意外的。毕竟就乌孙人之前的诉求来说，打败月氏人并回到故土，就应该足够了。即使在后来对月氏人的战争中，匈奴人需要征调乌孙战士，相信匈奴人也不会指望乌孙人会尽全力了。当然，乌孙人又一次的积极表现，也可以被解释为知恩图报，或者说与月氏人的仇恨实在太大了。总之，乌孙人这次愿意举倾国之力打头阵，也算是在情理之中了。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乌孙人并不是在又一次战胜月氏人之后，才看上伊犁河谷的。因为他们在把月氏人赶走之后，并没有退回到河西走廊，而是马上显露出长期经营的企图了。这种做法对于匈奴人来说，显然是不可以接受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伊犁河谷是一块上好的游牧之地，更是因为伊犁河谷的战略位置。得到了它，不仅意味着可以控制整个准噶尔盆地，更意味着匈奴帝国可以继续沿天山向西渗透中亚腹地。也就是说，匈奴人之所以不放过月氏人，并不在于双方之间有多大的仇恨，必得赶尽杀绝。即使月氏人不西迁，匈奴也会针对伊犁河谷的塞种人发动战争。

既然匈奴、乌孙同时看上了伊犁河谷，那么双方从亲如父子的关系，转变为战场上的对手就不可避免了。在双方最初所发生的几场战争中，战术准备充分并且吸收了部分塞人、月氏人的乌孙人，顽强的抵御住了匈奴人，并取得了胜利。这种结果其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丛林法则的时代，付出和收获总是更容易成正比的。在两次对月氏战争中都冲锋在前的乌孙人（尤其是后一次），无疑也是收获战利品最多的部落。那些本来应该为匈奴所用的物资、人口，现在却让乌孙人迅速壮大起来了。

尽管准备充分的乌孙人在最初顶住了匈奴人的进攻，但从实力对比来看，双方如果进入拉锯状态的话，战略优势还是在匈奴一边的。毕竟此时的匈奴不仅已经统一了蒙古高原，还占据了漠南所有的游牧之地。这就好像二战中的日本虽然可以凭借充分的战术准备和突然性，在太平洋战争的开始阶段取得优势，但一旦战争陷入拉锯状态后，胜利的天平就开始向地缘潜力更大的美国倾斜了。谁更能消耗得起，谁就能够笑到最后。只是这个世界并非只有匈奴、乌孙两国，匈奴所面对的问题也并非只有乌孙人。在亚洲的东部，汉帝国所正在酝酿的强势反击，在一开始就影响

到了西域的地缘格局。

第六节 乌孙从汉帝国反击匈奴中获益

在乌孙、匈奴联军开始对伊犁河谷的月氏人发起总攻时（应当是在公元前 139 年——前 133 年之间），我们的张骞还被匈奴人扣留在河西走廊。也就是说，如果张骞没有被匈奴人俘获的话，那么他应该还是有机会在伊犁河谷找到月氏人的。尽管从时间上来看，这很可能还是无法改变月氏人的命运，但从合纵连横的角度来看，这种外交努力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在匈奴人完控河西走廊之后，能够对他们形成战略威胁的，就只有游牧于天山北麓的中亚游牧部落，以及东亚的汉帝国了。无论匈奴人想攻击哪个方向，都必须集中匈奴大部的机动力量才有可能取胜。如果这两个对于匈奴来说，都属于边缘板块的力量联合起来的话，那么匈奴所面临的局面就不容乐观了。

然而，如果汉帝国的西部边境只能到达黄土高原边缘，而中亚游牧民族的代表，最北只能突破到准噶尔盆地南缘的话，这种战略联合在技术上会存在很大问题。以古典时期依靠信使交换信息的技术条件来看，这意味着即使不考虑到时效性，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也很难突破数千里的匈奴控制区（想想张骞的遭遇）。也正因为如此，只有在汉帝国从匈奴手中夺得河西走廊，并将控制力延伸到天山脚下后，东、西两大边缘区的联合，在技术上才成为现实。

当然，不管占据以伊犁河谷为中心的天山北麓游牧地带是月氏、乌孙，亦或塞种人，匈奴人需要同时在东、西两线面临战争的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方与匈奴的博弈关系发生变化，都势必会影响到另一方的生存状态。如果这两条战线的对手都处在战略防御阶段的话，那么战略的主动权自然是在匈奴人手上了。这个草原的霸主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集中力量攻击一方。从战略背景来看，匈奴人之所以能够对月氏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正是得益于通过白登之围将汉帝国完全逼入了守势，这使得匈奴人有时间和精力收服那些与匈奴右翼相对应的游牧板块。问题是，当乌孙人显露出自己的野心，准备据伊犁河谷自立门户时，汉帝国的对匈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调整。此时的匈奴所面临的最大敌人，已经不再是“反叛”的乌孙，而是准备结束“韬光养晦”之策，而进入战略反击阶段的汉帝国了。

为了彻底解决来自北方的威胁，自白登之围以来，汉帝国已经用了一甲子的时间来休养生息。直到公元前 141 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皇位之后，帝国才开始真正进入战略反击阶段。不过对于匈奴人来说，他们并不会因为汉帝国换了个新皇帝，就认为自己面前这头睡狮已经苏醒了，真正能让匈奴人感到形势变化的只有战争。只有汉帝国在战场上向匈奴人显示出自己的决心和强大的攻击力后，匈奴人才有可能意识到必须重新评估东线的这个对手了。

让汉帝国转入战略进攻状态的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33年。尽管这场被称之为“马邑之围”的伏击战，最终因为技术原因而没有成功。但汉帝国调动三十万大军在大同盆地伏击匈奴主力的举动，已经足以显示出汉帝国的战略动态了。即使这个时候，匈奴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把战略重心放在东线，汉帝国很快也会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让他们意识到。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以伊犁河谷为核心诞生出一个独立于蒙古高原游牧体系之外，根植于中亚的游牧政权，机会是很大的。不过从微观历史角度来看，究竟是由谁来做这件事，就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了。如果汉帝国再早十年，也就是在张骞出使之前对匈奴发起反击的话，也许匈奴就没有精力去攻击伊犁河谷的月氏人了。那样的话，张骞就有机会完成他的出使任务了（联合月氏共击匈奴）。不过历史最终还是没有给月氏人或者说汉帝国这样的机会。从汉帝国反击匈奴中受益最大的是月氏人的宿敌——乌孙人。当然，机会只会青睐于有准备的人。如果乌孙人没有谋划过在伊犁河谷自立门户的事，亦或未能顶住匈奴人最初的那几波攻势的话，那么他们也就没有机会替中亚游牧体系出这个头了。

一方面是乌孙人的反叛，一方面是汉帝国的反击。匈奴人如果不想面对两线作战的话，就必须做出选择了。以匈奴帝国的属性来说，它似乎应该和汉帝国达成和解，以集中精力在草原上扩张。然而此时的汉帝国为了彻底解决北方威胁，不仅对漠南的河套地区势在必得，甚至对华夏文明之前从未染指的河西走廊、漠北都产生了兴趣。也就是说，对于匈奴来说，汉帝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用军事、外交手段稳住的邻居，而是一个将战略目标定位在消灭自己的对手了。反观乌孙人，所要求的不过是自立门户罢了。对于蒙古高原或者河西走廊等匈奴之地，倒没有想法。如果匈奴人不去攻击他们，那么乌孙人重新以独立国家的姿态，进入匈奴体系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尽管不能指望乌孙人像以前那样直接协助匈奴攻城略地，但最低限度可以保证匈奴右翼在西域已有势力范围的安全。

当我们将匈奴东西两线所面对的形势一一对比之后，匈奴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已经昭然若揭了。而如虎口夺食般从匈奴口中谋得伊犁河谷控制权的乌孙人，也终于有机会扩张属于自己的腹地了。从大方向来看，乌孙人的扩张方向有二个：一是伊犁河谷北部的准噶尔盆地；二是伊犁河谷南部的天山诸板块。很显然，如果乌孙人不想与匈奴人发生剧烈冲突的话，他们的主要扩张方向应该是南线。然而，这并不代表乌孙人就会拱手将整个准噶尔盆地让给匈奴人。单从缓冲的角度来看，让自己的核心区完全暴露在匈奴人面前也不是件好事。那么乌孙、匈奴之间最终在准噶尔盆地中博弈出了一条怎样的地缘平衡线呢？

第十四章 乌孙向伊犁河谷北部扩张的路线

第一节 准噶尔盆地难以诞生独立游牧政权

在我们的印象中，尽管准噶尔盆地的体量要比塔里木盆地小，并且准噶尔盆地所代指的“北疆”地区，无疑就是西域的半壁江山，然而非常奇怪的一点是，在我们所解读的时代，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线线性分布着许多西域小国，而准噶尔盆地除了博格达山脉周边二百公里范围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博格达地缘圈”以外，就没有绿洲小国的存在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准噶尔盆地的地缘潜力要比塔里木盆地小呢？

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之前我们也分析过了，西风带进入准噶尔盆地相对要容易得多。阿尔泰山南麓、天山北麓，以及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所能承接的水汽都要比塔里木盆地更多。问题在于，与塔里木盆地相比，准噶尔盆地除了更容易受到西风带影响外，也更容易受北冰洋冷气团的影响，这使得相对不缺水的准噶尔盆地气候要更为寒冷。积温不够的话，那些更耐寒的牧草就更容易（相对农作物）覆盖准噶尔盆地边缘的那些山前低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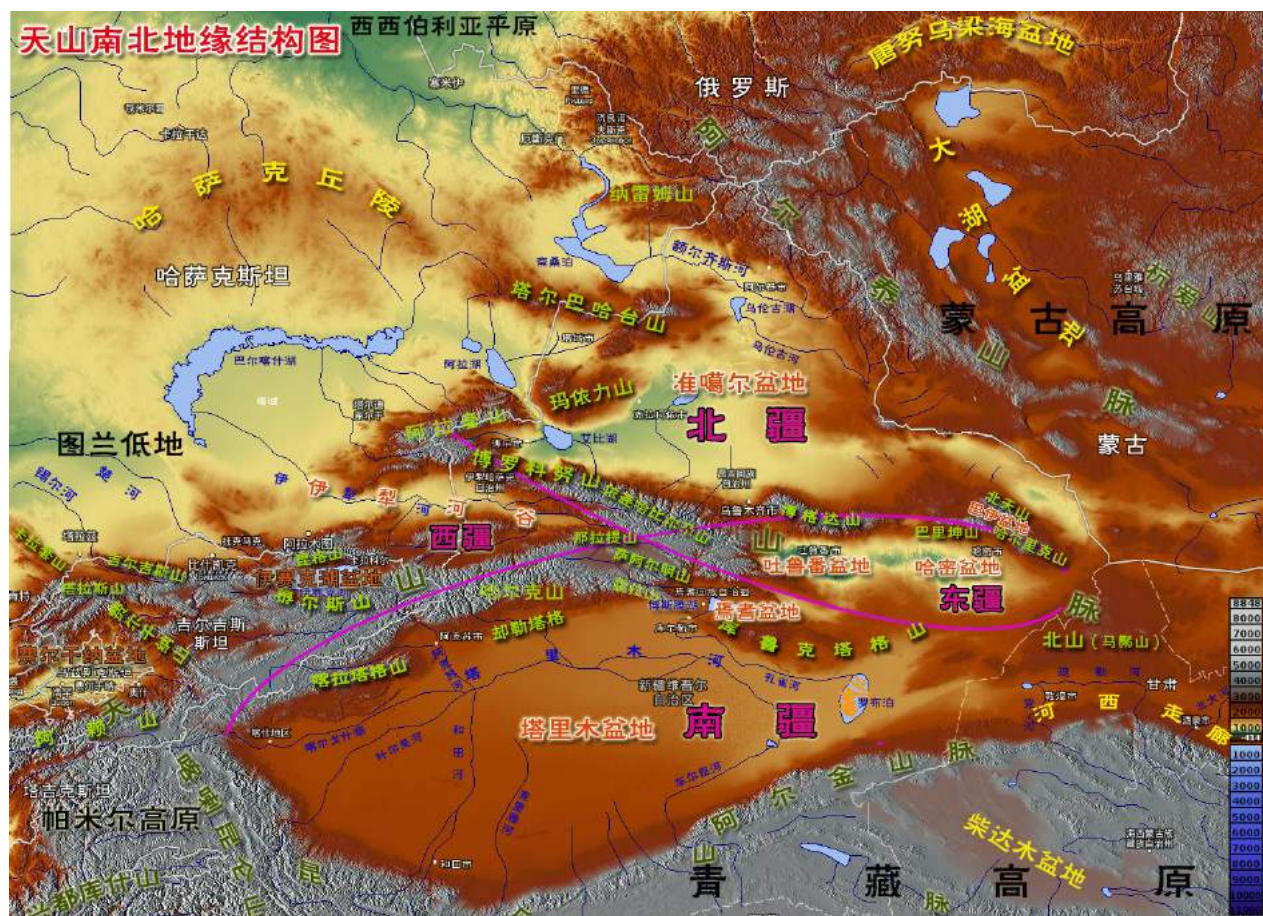
既然准噶尔盆地更适合游牧民族经营，而不是绿洲形态的农业小国生存，那么准噶尔盆地本身有没有机会诞生出独立且强大的游牧政权呢？情况并不乐观。一个板块是否有机会诞生出强大政权，除了本身的地缘潜力以外，与周边板块的横向对比要更为重要。这就好像法国的地缘潜力可以在欧洲名列前茅，但这样的体量如果放在中国边上，它的地缘地位并不会比越南或者朝鲜半岛高多少。

准噶尔盆地的悲剧也在于此，首先在它的北部是强大的蒙古高原板块。当这个板块内部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时，经营准噶尔盆地北部的游牧部落并不会太大风险。然而当蒙古高原内部最终被统一在一杆王旗之下时，甚至说仅仅是大湖盆地的游牧部落联合起来，都会很自然的渗透到阿尔泰山南麓。如果准噶尔盆地腹地被像色楞格河流域那样的水系所覆盖，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单凭准噶尔盆地本身所承载的游牧部落，也有机会将北亚游牧民族挡在阿尔泰山以北。问题是，准噶尔盆地周边的山体并无力为整个盆地腹地补给淡水（要是准噶尔盆地体量再小点，倒是有机会）。真正能够为游牧民族所利用的，主要是北、西、南的三条边了，这种结构无疑也影响到了准噶尔盆地的地缘结构。游牧于盆地边缘的部落，很难统一成为一个整体。阿尔泰山南麓的游牧部落，通常要独自面对强大的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入侵。

在准噶尔盆地北部游牧部落要面对来自蒙古高原的压力时，试图在盆地南部开辟出一片天地的部落，处境也同样不容乐观。相比之下，伊犁河谷以及整个伊犁河流域的地缘结构，要更有利于诞生出一支强大且统一的游牧政权。而当某一支游牧

民族凭借伊犁河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做大后，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向准噶尔盆地南部扩张领地了。

这样看来，腹地荒漠化的准噶尔盆地并不像我们在东亚所常见的那些盆地一样，有机会以中央低地为核心经营出一片独立王国来。它那最有潜力的边缘地区，更多的是成为周边板块游牧部落的领地延伸。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心中会有一个问题，为准噶尔盆地打上地理标签的“准噶尔部”当年难道不是以此为核心领地，成为中亚——西域统治者的吗？情况并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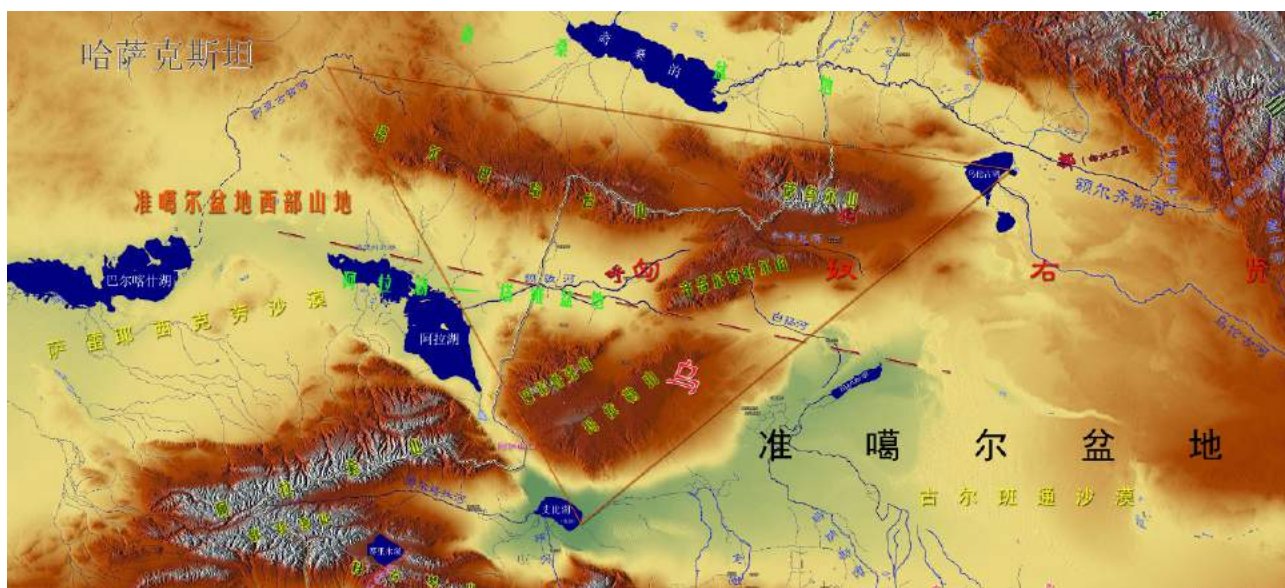


天山南北地缘结构示意图

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漠西蒙古”这个概念。在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强大惯性之下，蒙古人在天山以北的存在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抛开那些名存实亡，或者拉大旗做虎皮，自称黄金家族后裔的突厥政权以外，蒙古游牧部落真正能够覆盖的区域，主要就是准噶尔盆地边缘，以及伊犁河谷了。和我们前面分析的一样，这些依附边缘山地而生的蒙古部落，内部也被分割成了几部分。即以阿尔泰山南麓为核心游牧地的“杜尔伯特部”；以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为主要游牧地的“土尔扈特部”；以天山北麓为核心游牧地的“和硕部”。这三个同出一系，互不隶属的蒙古部落，所代表的就是 16 世纪前后准噶尔盆地的游牧力量。

那么我们的主角“准噶尔部”呢？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它的核心游牧地就是伊犁河谷。也就是说，像两千年前的乌孙人一样，准噶尔部又一次的验证了伊犁河谷对准噶尔盆地的地缘优势。准噶尔人以一部之力，击败了准噶尔盆地中的三个同族竞争者（土尔扈特人就是这样跑到伏尔加流域去的），以及在伊犁河谷南部，同样认为自己才应该是上述地区土著的突厥游牧民族代表——哈萨克人。在准噶尔部和其他漠西蒙古部落经营伊犁河谷和准噶尔盆地之时，哈萨克人本来还能够游牧于外伊犁盆地及其以南板块。而在准噶尔部崛起后，整个伊犁河流域也就成为蒙古人的游牧地了。

之所以又一次的提到准噶尔部，是因为我们需要离我们更近一点史料，更完整的时代，来解读伊犁河谷和准噶尔盆地之间的地缘关系。在同样的地理背景下，准噶尔部和乌孙人在伊犁河谷的崛起，以及地缘扩张过程，基本脉络并没有差异。最大的不同在于双方所面临的地缘形势。当准噶尔人崛起于中亚——西域时，蒙古高原游牧体系正被清帝国分割得支离破碎。那些尚能保持独立状态的漠北蒙古部落已经没有精力翻越阿尔泰山，与他们在漠西的兄弟部落一争长短了（反而是准噶尔部强大后，开始反渗透蒙古高原）。在这种背景下，此时已是中亚游牧力量代表的准噶尔部，有机会将整个准噶尔盆地统一在自己的旗下。也正因为如此，这个部落名才有机会成为盆地的地缘标签。



西汉准噶尔盆地地缘结构图

回到两千年前乌孙入主伊犁河谷的时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此时的匈奴正处在帝国事业的最高潮阶段。尽管在东线已经马上要接受汉帝国的挑战了，但匈奴人完全没有理由放弃他们在准噶尔盆地北部已经扩张出的领地。唯一要考虑的就是，既然迫于应对汉帝国的压力而给了乌孙人自立门户的机会，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和

平共处，就十分有必要分割一下准噶尔盆地了。从地理结构上来看，双方各占优势的部分分别是阿尔泰山南麓、天山北麓。让任何一方的牛羊到自己的优势区域来吃草都是不能容忍的，除非你想打破这种平衡状态。而在双方各取一边后，唯一值得分割，并拉出匈奴、乌孙两国地缘平衡线的，就是“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了。

只是这片山地看起来结构颇有些复杂，似乎很难拉出一条有地缘规律可循的平衡线来。如果让那些西方殖民者来处理的话，已经能够在地球表面划出经纬度的他们，估计又会偷懒的在地图上依几何原则划出一条貌似公平的直线来了。问题是，古典时期的游牧民族并没有这样的技术，他们之间的平衡线还是需要依赖那些明显的地理特征来定位。至于匈奴、乌孙两国是如何分割这片山地以及相邻地区的，则是我们接下来分析的方向。

第二节 准噶尔西部山地的地理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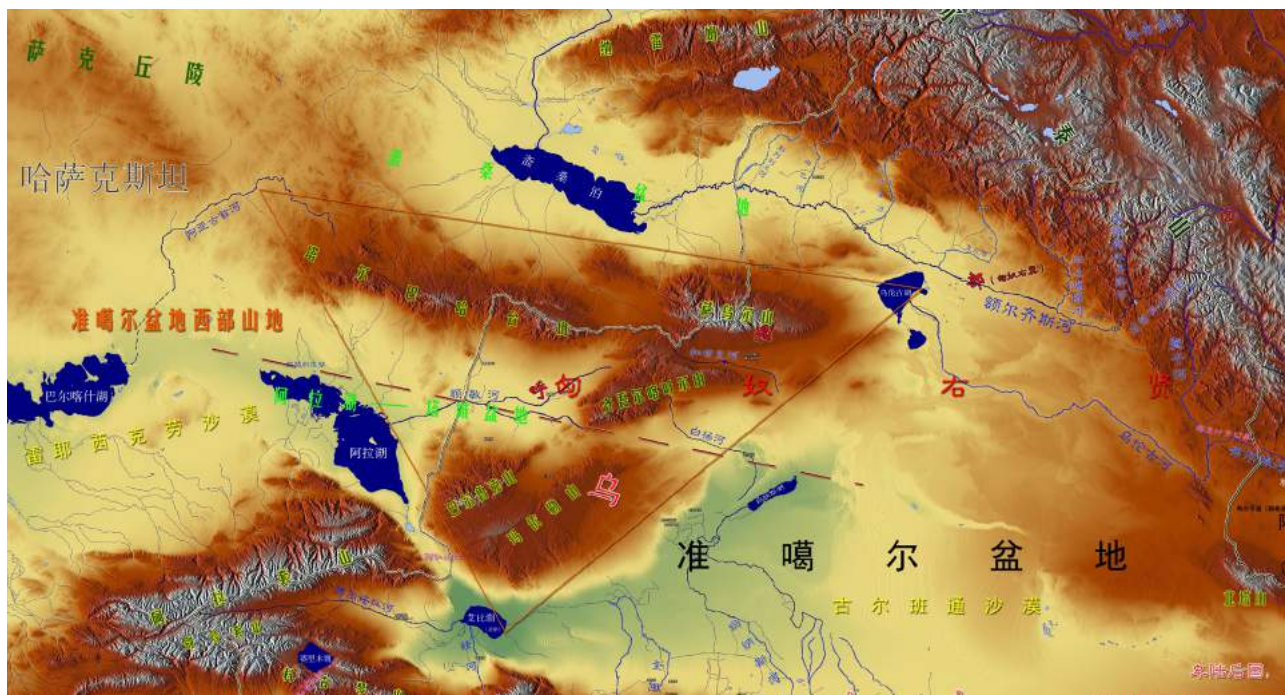
在我们通过各种资料试图了解天山以北地区的地缘结构时，经常会碰到三个行政标签：伊犁、阿勒泰（阿尔泰）、塔城。由于这些地缘标签在不同时期又被赋予了不同的行政范围，尤其是在中央之国被迫与俄国人割裂西北部的一些地理单元时，这些标签到底代指的是哪些区域，就变得更加模糊了。好在我们主要并不是在讨论行政沿革，更多的是在探究那些行政区域的背景，以寻找出相关规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为上述三个行政标签寻找一下它们所代指的核心地理单元。

在亚洲中部的这片干旱之地，一个重要地缘板块必须依附于有相当体量的山地。唯有依靠这些山地所蓄积的淡水，才能保证该板块的人口规模。单纯的因为面积原因为那些人烟稀少的荒漠化地区，划定一个更高等级的行政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首先我们来看看“阿勒泰”。不管这个板块叫阿勒泰也好，阿尔泰也罢，阿尔泰山脉都是其存在的基础。我们前面也解读过了，阿尔泰山分水岭以南的山地，以及东至“阿尔泰——北塔山盆地”，西至“斋桑泊盆地”的区域，包括乌伦古河流域、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的低地，都可以贴上这个地缘标签；伊犁的合理范围，则应该包括由天山山脉所包裹而成的伊犁河谷和外伊犁盆地。至于“塔城”，它的范围自然就就在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了。而它的地理核心，或者说所依附的核心山地，就是我们上一节所提到的“准噶尔西部山地”。

如果说准噶尔盆地南北两侧明白无误的是隶属于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的山体的话，那么在准噶尔盆地西部，为整个盆地封口的这片山地，就很难界定到底是属于哪条山脉的外延了。不过，地理学家们应该对搞清这点更有兴趣，我们只要明白这个方位独立存在一片山体，并有机会衍生出一个与阿勒泰、伊犁同级的地缘板块就行了。

从地理形态来看，被我们命名为“准噶尔西部山地”的这片山地，看起来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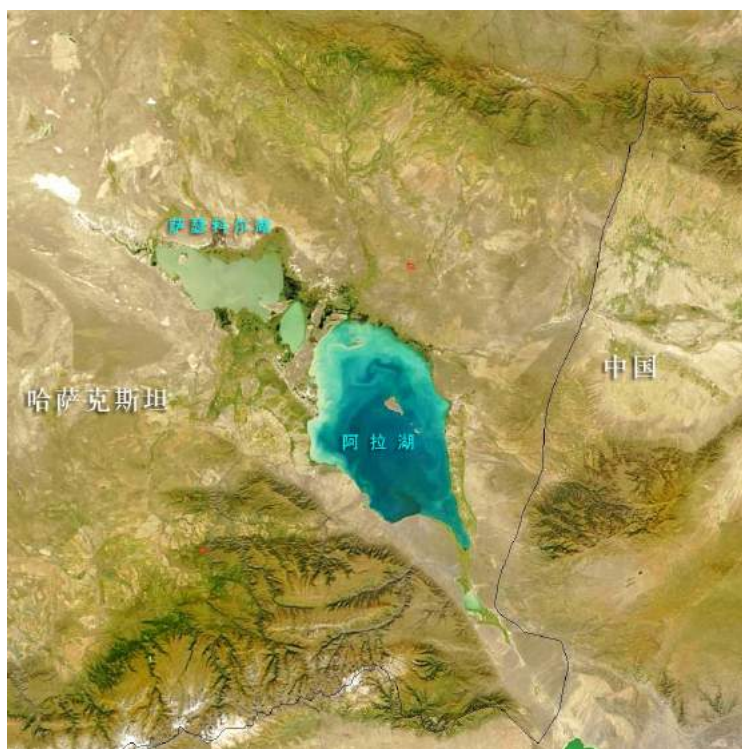
些与伊犁河谷或者整个准噶尔盆地有些类似。北部的“塔尔巴哈台山”，东南侧的“萨吾尔山”、“齐吾尔喀叶尔山”、“巴尔鲁克山——玛依勒山”，以及隶属天山山脉的阿拉套山东部山体，共同围就了一个夹角结构。比起伊犁河谷和准噶尔盆地来，这个夹角结构的西部边缘要更为开放，几乎没有山体可以影响它与更西侧板块的交流。而从环境的角度来看，这种开放的结构也无疑增加了“准噶尔西部山地”夹角内的集水区，使之更容易从西风带中收获水汽，并在腹地形成一条核心河流。在我们的地图上，这条河流叫作“额敏河”。



西汉准噶尔盆地地缘结构图

记得有朋友问到，为什么伊犁河那么大的水量，却没有在伊犁河谷乃至外伊犁盆地中形成一个天然大湖？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了，湖泊的形成跟水量大小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取决于河流经过之处有没有洼地。如果有的话，河流就会在此蓄积成湖泊。如果水量不够大，或者洼地够深够大的话，这个湖泊很可能就是河流的终点了，尤其是在欧亚大陆腹地这样的干旱区域。但要是水量足够巨大的话（相对洼地的容量），这个湖泊就会变成“中继湖”。河水在蓄满洼地后，会在边缘寻找板块继续流向下游地区，直至再寻找到下一个洼地（很多时候终点就是海洋了）。比如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河流在流入斋桑泊之后，就继续向地势更低的西西伯利亚平原渗透了。而同样发源于阿尔泰山南麓的乌伦古河，最终的归宿就是“乌伦古湖”，并没有成为额尔齐斯河的一条支流。

说这些的意思是就是告诉大家，虽然一些点缀在河流当中的湖泊，可以让相关河流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它存在与体量大小，其实与河流的水量大小并不成



阿拉湖卫星图



阿拉湖

正比，甚至有时候会产生矛盾。因巨大的流量也意味着能从上游地区带下更多的泥沙，进而将前进道路上的洼地给填平。想想我们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还能看到的那些黄河下游的巨大湖泊最终一个个都消失了，相信大家就能够理解了。

从河流归属的角度来看，向西流淌的额敏河本来应该和伊犁河一样，注入哈萨克丘陵南部的“巴尔喀什湖”。要是那样的话，巴尔喀什湖东半部也许就没那么咸了。不过在额敏湖还未脱离“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的庇护时，地质运动已经为它准备了一个足够消化掉它的洼地——阿拉湖洼地。

阿拉湖洼地的存在，让巴尔喀什湖几乎无法从“准噶尔西部山地”中得到补给。除了塔尔巴哈台山西端的“阿亚古兹河”，得以绕过这片洼地汇入巴尔喀什湖东端外。那些山地迎风面所收集的雨（雪）水，最终都成为阿拉湖水系的一部分。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要再细分的话，我们会

发现这块封堵在准噶尔西部山地西侧的洼地，现在已经最少分割出了两个独立的大湖了。南边那个较大的被称之为“阿拉湖”，北边那些较小的又被称作“萨瑟科尔湖”。这种情况其实很多了，就像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些上古大湖，现在已经破碎成很多独立的小湖了（比如云梦泽）。如果巴尔喀什湖的水量继续下降的话，它的东、西两部分也很有可能彻底独立。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的阿拉湖洼地到底有几个湖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由于阿拉湖洼地的存在，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腹地会更有机会打造成自成体系的地缘板块。这样的结构，即使没有机会诞生出一个以其为核心的独立政权，

也应该完整的归属于某一政权。然而无论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匈奴、乌孙博弈时代，还是现在的政治版图中，准噶尔西侧山地都没有机会完全归属于一个政权。无论是在匈奴、乌孙两族南北向的分割中，还是在中、俄两国东西向的划分时，准噶尔西侧山地都被和稀泥般的分属两边。我们就来看看对于相关政权来说，这两次分割是否能帮助双方维持平衡。

第三节 清俄在准噶尔西部山地的分割线

以“准噶尔西部山地”居于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之间的位置来看，无论从南北还是东西方向公平分割的话，都没有理由让一方独占。一般来说，当博弈的焦点是一片山地时，分水岭原则是最为有效的划分双方势力范围的方法。只是相比那些横亘在博弈平衡线上的线性山脉来说，这片呈“V”字形结构的山地，似乎怎么划分都很难在公平和分水岭原则中达到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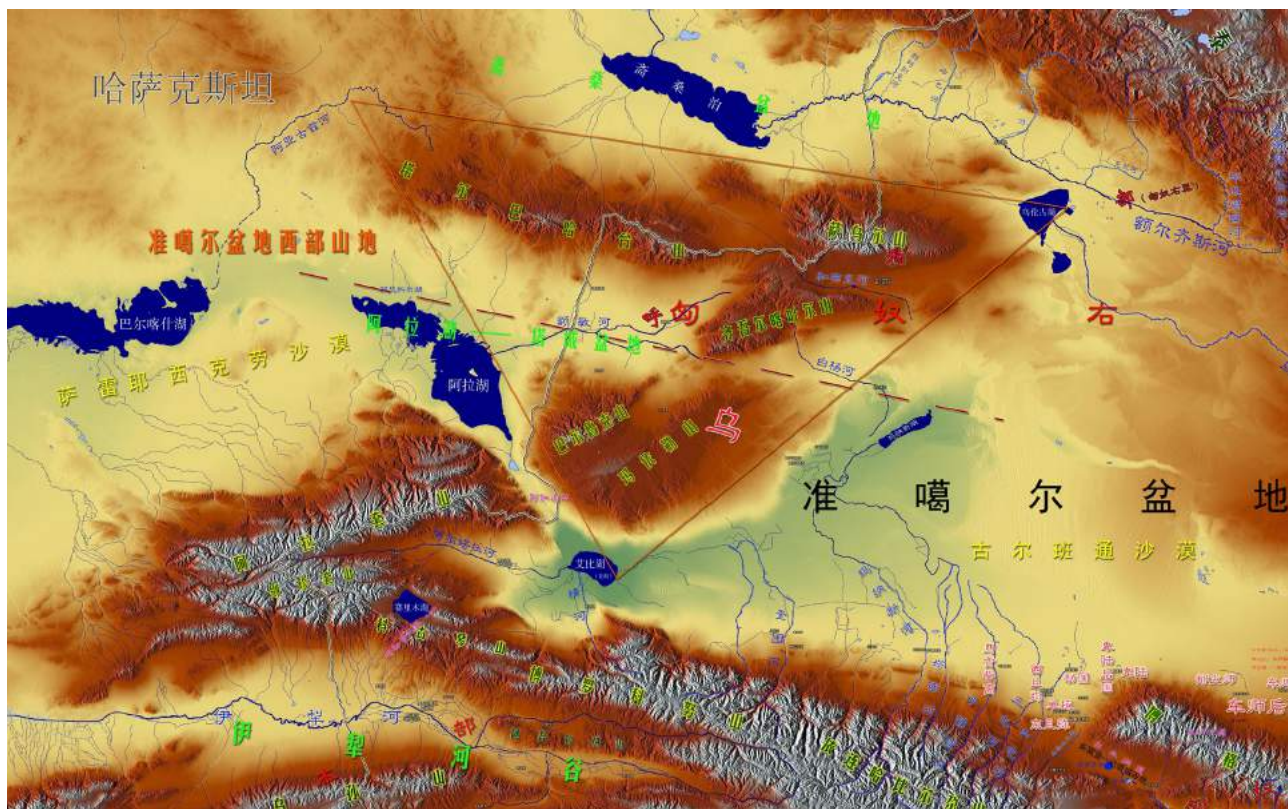
如果博弈的双方是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话，最终所呈现的博弈格局也就是当年中、俄，即现在中、哈相邻的格局了。在这种格局之下，准噶尔山地中最适合充当分水岭的是东侧的萨乌尔山、齐吾尔喀叶尔山，以及巴尔鲁克山——玛依勒山。而独立支撑着“V”字形山地结构另一条边的“塔尔巴哈台山”，则应当被认定为完全置身于准噶尔盆地以外的山体。也就是说，如果当年的中、俄双方如同实力相当、起点相同的西方殖民者的话，在他们所认定的“无人区”（在他们眼里，那些低文明状态的土著就不算拥有话语权的“人”了）圈地时经常所做的那样，上述分水岭原则就很有可能在技术上得到认同了。那样的话，山地东侧的统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准噶尔盆地，以及更东的地理单元。而西侧的统治者，则可以得到山地腹地的额敏河——阿拉湖流域，以及更西的土地。

然而，现实与理想值总是存在差异的。尽管中央之国在欧洲国家因大航海时代而起的，瓜分世界的浪潮中彻底落后了。但就天山南北这片土地来说，中央之国却并不感到陌生。自汉武帝时起，为了彻底解决来自蒙古高原的威胁，中央之国最起码已经三次将势力范围扩张于此。尤为值得庆幸的是，当俄国人代表欧洲殖民势力将触角伸到天山脚下时，清帝国已经通过击败漠西蒙古所建立的“准噶尔汗国”，而成为天山南路，以及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阿尔泰山脉之间土地的主人。这种实际控制意味着，俄国人如果想在中亚有所作为的话，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哈萨克人那样的游牧部落了。无论他们自己是怎么计划的，都必须客观面对清帝国到底为自己划出了一条什么样的实际控制线。

对于清帝国来说，将自己的实际控制线放置在分水岭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俄国人到来之前，那些游牧于山麓河流冲积扇上的部落，才是最有力量威胁帝国安全的力量。也就是说，如果帝国不想自己的西北边境再遭受游牧部落威胁的话，直

接入驻那些准噶尔盆地外缘山地背面的地理单元，才是延伸直接控制力的终点。当这些“依山傍水”的水草丰美之地都置于帝国的直接控制之下时，也就意味着那些来自中亚的游牧力量，再也没有力量对帝国在天山南北的统治权发起挑战了。

基于这种思维，依准噶尔盆地南部山地而生的“伊犁河谷”，以及依“准噶尔西部山地”而生的阿拉湖——额敏河谷，无疑是帝国需要进行直接统治的最边缘板块。从地缘位置上来看，失去伊犁河谷，意味着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被插入了一个危险的突出部。任何一个游牧政权占据了这片水草丰美之地，都可以对整个西域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而直接控制整个准噶尔西部山地的意义也在于此：不仅可以打通阿尔泰山与天山山脉的战略通道，使得帝国西北边疆呈现一个完整、闭合的状态，更可以避免中亚游牧势力在紧邻准噶尔盆地的地方获得一个立足点，以威胁准噶尔盆地腹地的安全。至于山地以西人口承载力较差的土地，帝国则没有兴趣去直接经营了。这些土地被放任给那些之前被准噶尔人挤压的哈萨克人游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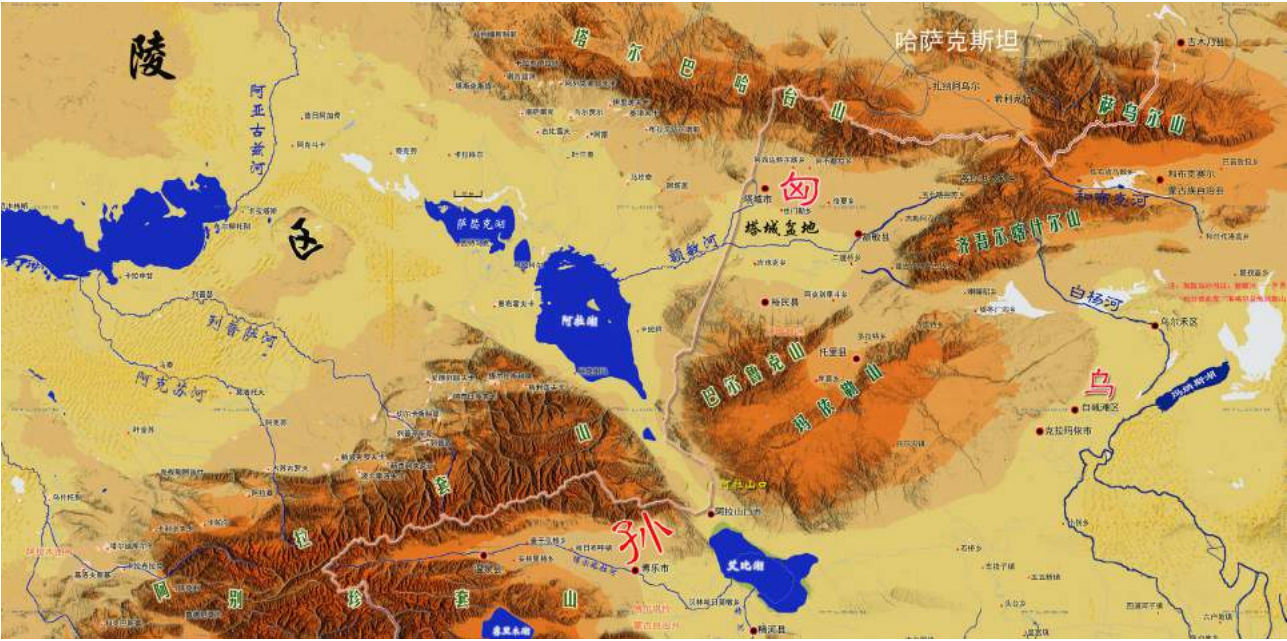


西汉准噶尔盆地地缘结构图

既然清帝国的目的是完控这片山地，并将势力范围向西延伸至巴尔喀什湖，那么像在伊犁河流域那样，在山地腹地的额敏河流域筑城并设立行政机构就属必然了。只不过基于古典王朝对于边境地区“因人而治”的统治特点而言，清帝国并不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在边境划出一条明确的边境线来。因为在传统的华夏民族思维中，那些边缘部落只要在名义上接受中央帝国的统治，那么他们所覆盖的土地自然也可以

被认定为是帝国的一部分了。即使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些边缘部落，并避免其与自己直接控制区发生冲突而设立边疆行政机构，出于地缘关系远近的关系，这种放置在边疆的行政机构会一般更加靠近帝国的直接控制区。在没有强大外部竞争者来竞争那些羁縻区域时，这种设置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当面临强大竞争者的时候，这种设置就会为帝国继续控制边缘板块，造成巨大风险了。

正是由于上述古典时期的统治思维 and 现代意义的边境划定方法出现的碰撞，伊犁河谷和阿拉湖——额敏河谷的分割，才出现了比较尴尬的情况。这种尴尬体现在中、俄（哈）双方，都必须在地理分割不明显的低地中寻求地缘平衡。如果说，清帝国当年将统治全疆的“伊犁将军府”设立在了伊犁河谷的中心，阻止了俄国人占据强夺整个伊犁河谷的计划的话；那么在额敏河沿岸设立的低一级的行政机构“塔尔巴哈台”（筑城之地就是现在的“塔城市”），就为中央之国保有了在准噶尔西部山地腹地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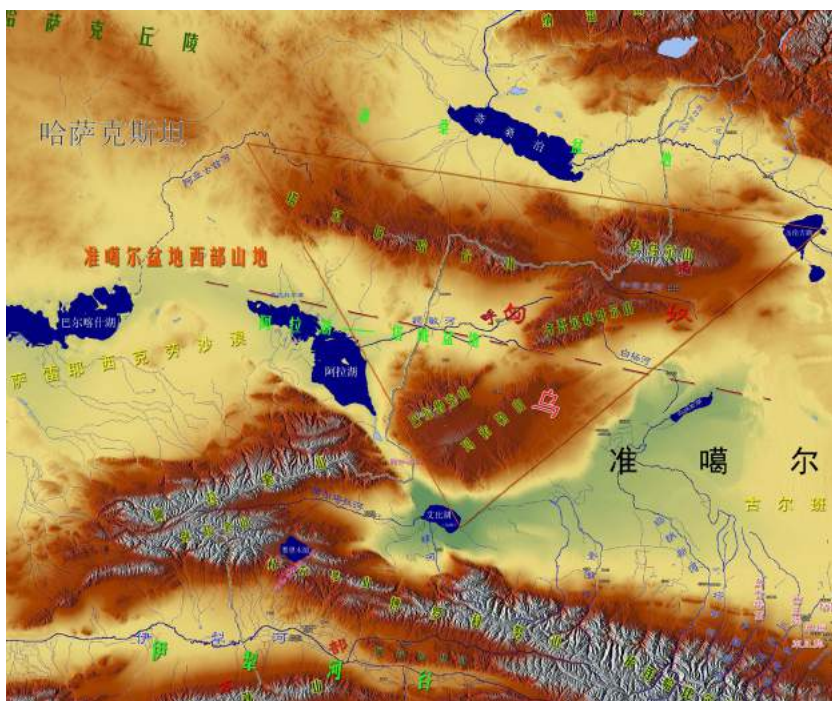
汉西域全图

从地理结构来看，准噶尔西部山地围就的这片三角形腹地也可以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额敏河中上游的“塔城盆地”；另一部分则是额敏河下游及阿拉湖所在的“阿拉湖洼地”。二者之间是由一条细长的丘陵所分割。我们也可以将整片腹地称之为“阿拉湖——塔城盆地”。其实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就像我们前面也用“阿拉湖——额敏河谷地”来代指一样。大家通过这些地理标签，能够知晓它的地理结构就行了。

如果一定要对“阿拉湖——塔城盆地”做出分割的话，那么中央之国得到全部塔城盆地，俄国人占得阿拉湖洼地也许是个选择。就像我们在技术上，认为应该将

伊犁河谷、外伊犁盆地分属中、俄两国会更为合理一样。然而让不能尽兴的俄国人，再去遵循什么地理分割的原则是很困难的。能够让俄国人尊重中国已经明确延伸到此的行政机构，已经是俄国人在自视无法完胜中央帝国之时所能做出的妥协了。至于那些中央之国没有设立常设行政机构，不能明确表明行政控制力的“无主之地”，自然就是俄国人的盘中菜了。

在这种博弈背景之下，那些中央之国能够证明存在的常设行政机构，与边缘山脉上依分水岭原则而勘定的界点之间的连线，成为双方最终的行政分割线。这也使得中俄（中哈）两国在额敏河和伊犁河流域的分割，都以一种近乎直线的方式来进行划定的。当然，这也并不代表地理分割线就完全不起一点作用了。那些正好在这些连线附近的河流，也还是有机会承担行政分割线的职责的（比如伊犁河谷中，现充当中哈境界河的“霍尔果斯河”）。只不过，像塔城盆地与阿拉湖洼地之间的山地分割线，就没有机会成为国境线了。俄国人并不愿意在承认中央之国对塔城的统治权以外，多放弃任何一寸土地。



西汉准噶尔盆地地缘结构图

除了伊犁河谷和额敏河谷之外，中央之国的北疆地区和西部邻居的行政分割线，基本还是遵循了分水岭原则。然而这样的分割，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遗憾。从中央之国的角度来看，这种遗憾更多的是出于对历史的回忆。毕竟在俄国人到来之前，能够羁縻部分哈萨克部落的中央之国，可以认为自己在西域的控制范围深及巴尔喀什湖。而从俄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则是出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对于

这个自彼得大帝时起，就非常重视地缘政治研究的民族来说，像伊犁河谷、额敏河谷那样，不能完控上游地区的局面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加上额尔齐斯河上游所在的“阿勒泰”地区仍在中央之国手中的。俄国人最起码会觉得整个哈萨克丘陵以东、以南，包括巴尔喀什湖——阿拉湖——斋桑泊在内的区域，地缘安全受到巨大威胁。

这不仅意味着俄国人在这一区域的防御缺乏必要的缓冲和制高点，更意味着仅仅从边境相邻板块的PK中，俄国也无法占得优势（如果这几大流域都在俄国人手中，

那么留在中国的部分，在潜力上就完全处于劣势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危机感更是从军事方面的忧虑转向水资源的分配问题上来。出于对这种分割的不满，俄国人曾经在中国的西北边境做过哪些动作，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了。基于意识形态的惯性，俄国人最接近成功的那次操作，我们并不能直接展开讨论。而我们接下来能够直接讨论的，就是乌孙人和匈奴人自南北方向而达成的那次平衡了。

第四节 乌孙沿阿拉套山西北麓北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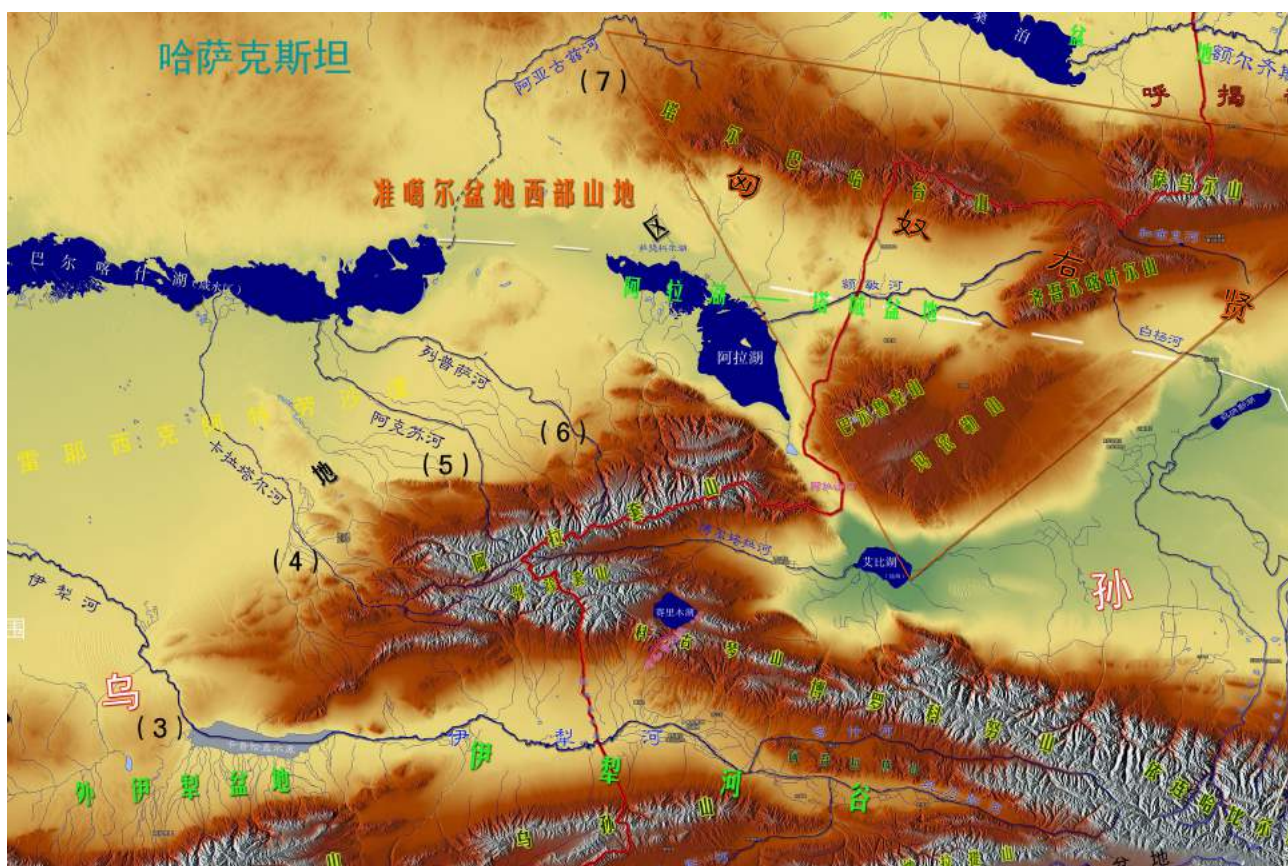
如果让占据伊犁河谷——外伊犁盆地的乌孙人选择向外扩张路径的话，沿伊犁河而下至巴尔喀什湖的这片土地，并不会是优先选择。相比那些依山傍水的草场，萨雷耶西克阿特劳沙漠中的伊犁河下游河段，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天山山脉北麓向西延伸的这条支脉（别珍套山——科古琴山——博罗科努山），在庇护伊犁河谷成为中亚难得一见的“湿岛”之后，转而开始向西北方向延伸成为“阿拉套山”。这段海拔与天山主脉相仿的山体，山顶也同样以冰雪的形式蕴含着大量的淡水。

尽管阿拉套山西北麓并没有其他山脉与之合力，围就出一条类似伊犁河谷、额敏河谷那样的完整谷地来，但以它的海拔和朝向来说，带旺一片山前草场及山地牧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由于地质的作用，中亚（包括西域）地理结构中的高低转换总是显得过于突兀，缺乏高原为山脉和低地承上启下。这种结构对河流的影响就是，让河流的走向变得有些不可捉摸。在干旱的季节，山麓下通常显得非常安静，并看不到太多的地表河流。而一旦到了融雪（降雨）的季节，那些山脉所收集的淡水又会顷刻间从山脉的缝隙——谷地中倾泻而下，一股脑的冲入山前平原之上。在这些缺乏约束的低地上，河水会先肆意流淌出一片冲积扇，滋养出一片水草丰美之地后，剩余的河水逐步收窄成一条或数条河流向沙漠腹地延伸。能为之集水的山地体量越大，就意味着山口冲积扇越大。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水草丰美之地。而对于有技术施展种植才能的农耕民族来说，这些原始状态的冲积扇就是未来的粮仓所在。只是由于地缘结构的关系，古典时期的农耕民族并没有机会到阿拉套山山前来验证他们技术。就流出阿拉套山的雪水而言，它们最终的归宿有三条河流：最北端的列普萨河，中部的阿克苏河，南端的卡拉塔尔河。当然，那些天山之水从山谷中突围出来时，可不止这三条河流。只不过在滋养了山前草原带，并和伊犁河一样，经受同一片沙漠的炙烤之后，能够到达终点巴尔喀什湖的就是这三条了。

如果我们一定细分阿拉套山西北麓的山前草原的话，那也可以将之分段命名为列普萨草原、阿克苏草原、卡拉塔尔草原。不过这样细分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在没有强大游牧部落联盟威胁的情况下，那些人口数千甚至数百的部落，固然可以据一条河流在高、低草场中转换牧场，维持自己原始的氏族状态，就像博格达地缘圈

中的天山北麓那些“行国”（游牧国家）一样。而如果你的周边有地理单元能够孕育出强大游牧政权的话，这些游走于雪线和沙漠之间的游牧部落，通常就没有理由独立了。换句话说，这个地理单元只能成为其他板块的附属板块。有伊犁河谷这样的优势板块在侧，阿拉套山想诞生一个独立游牧政权的机会几乎为零。即使我们不去考虑流域面积、山地结构这些因素，仅从河水的流量上来判断，也能探究出伊犁河的优势所在。



乌孙地缘结构图（西汉）

我们前面也说了，巴尔喀什湖这个呈新月形的湖泊，其实内部可以被分为两部分。由伊犁河所供给的西半部被定性为淡水湖；而由列普萨河、阿克苏河、卡拉塔尔河，加上更北部源出塔尔巴哈台山的“阿亚古兹河”所共同供给的东半部，却是一个咸水湖。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不在于两地湖盆矿物盐含量的不同，而是在于淡水补给量的差异。也就是说，伊犁河所收集的淡水，在带旺了伊犁河谷、外伊犁盆地后，还能供给出半个淡水化的巴尔喀什湖（连带湖河相接处还有一片三角洲）；而整个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供给另半个巴尔喀什湖时，却有些力不从心。

当然，造成这种状况很大程度是因为，阿拉湖洼地截留了准噶尔西部山地腹地所收集的淡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得“阿拉湖——塔城盆地”的地缘潜力，要明显优于阿拉套山西北麓草原。这意味着尽管乌孙人可以通过控制阿拉套山西北麓草

原，将势力范围沿河流一直延伸到巴尔喀什湖畔。但名义控制那些看似广袤，实则不堪大用的沙漠之地的意义，远比不上得到阿拉湖——塔城盆地。如果乌孙人不能越过阿拉湖进入额敏河流域的话，那么这片阿尔泰山——天山游牧力量博弈的“天王山”，将会毫无疑问的落入匈奴人手中。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乌孙人愿意看到的了。只是单线的沿阿拉套山西北麓向北渗透的话，乌孙人想在阿拉湖以北与匈奴抗衡是很困难的。除非乌孙人能从另一个方向，也能对额敏河流域保持压力。从地理结构上看，这表明乌孙人如果想以伊犁河为根据地向北扩张的话，就不能仅仅把方向锁定在准噶尔盆地的外围了。经营阿拉套山以东，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的那些山前草原，对于乌孙人来说也同样重要。

第五节 乌孙经果子沟和赛里木湖北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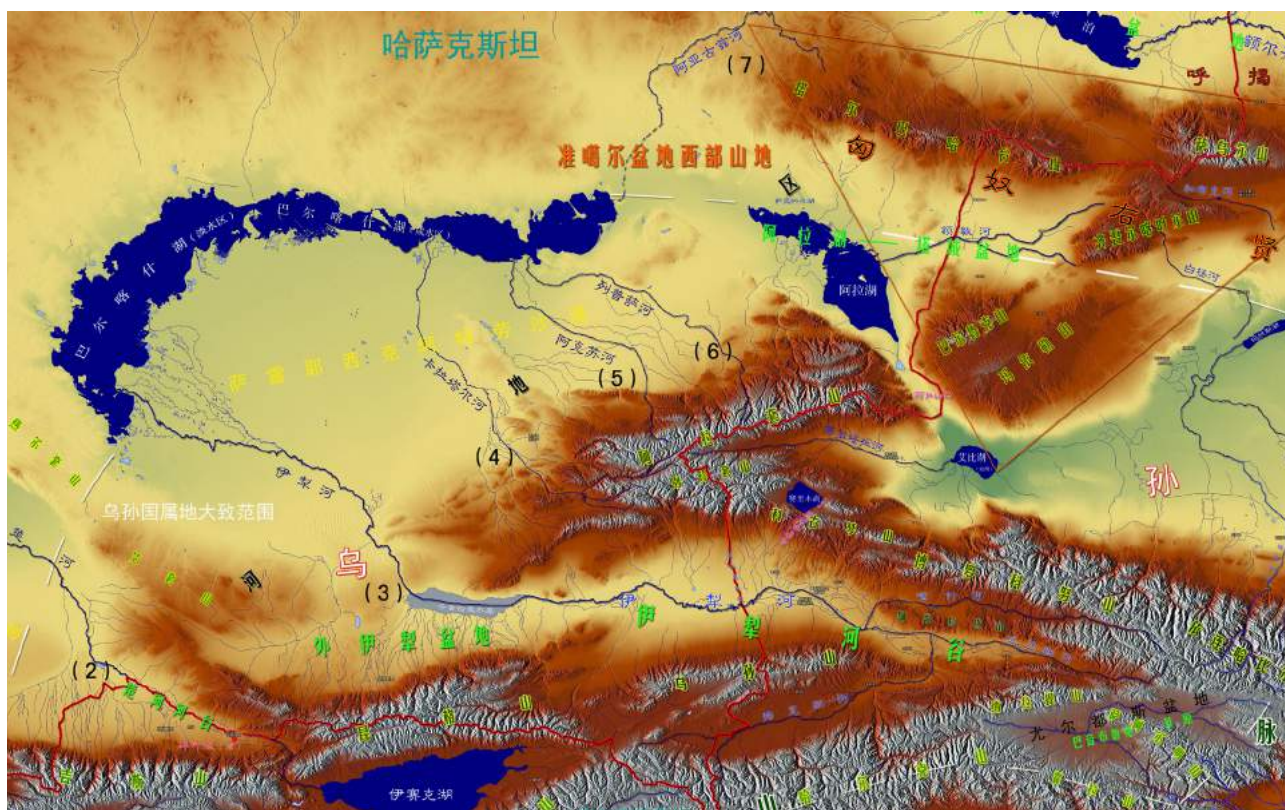
伊犁河谷对于周边地理单元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任何一个得到这片土地的游牧民族，很快都会感受到一点。即使他们最初并没有扩张并与更强大对手PK的心思，伊犁之水为部族所带来的更多的牲畜和人口(相对周边板块)也会激发他们将控制力、影响力向外延伸的想法。从这个角度来说，让乌孙人不对一山之隔的准噶尔盆地产生兴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乌孙人对于准噶尔盆地的渗透并不一定是在入驻伊犁河谷之后。因为之前的月氏、塞种两族，应该都已经做过这件事了。乌孙人很有可能在赶走大月氏之后，就一并取得了在准噶尔盆地南部的草原。

对于我们来说，探究那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并没有意义。事情为什么总是会遵循这样的逻辑而发生，才是我们所需要解读的。很显然，合围伊犁河谷的那些山脉，从来都没有成为此间游牧民族向外扩张的障碍。就好像他们攻进来赶走上家时，这些山脉也没有发挥应有的防御作用一样。对于这些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来说，农耕民族那种据险以自守、步步为营的观念显得过于保守，也不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性。拿出各自的人、马，在空旷的草原上进行一次决战，往往就能决定一个部落的命运。

当然，从地缘基础来说，不管热衷于面对面决战的游牧民族；还是喜欢保守战术，步步为营的农耕民族，决定他们实力的根本，还是在于他们能够稳定据有的根据地能承载多少的人口、资源。仅从这个意义而言，准噶尔盆地南部的那些草原，对于乌孙人来说也有足够诱惑。你不去抢，匈奴人就来了。此消彼长，乌孙人想在伊犁河谷偏安也不可能。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到底是如何穿越那些山地的，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特别去研究。只能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单从伊犁河谷——准噶尔盆地之间的那道分水岭的体量和结构来看，往来于两个地理单元的游牧民族，完全会有多条现成的谷地作为天然通道。最低限度，这条分水岭内的三段山体：别珍套山、科古琴山、博罗科古山之间，一定会存在天然通道，否则它们也没必要被分视为三段了。

如果伊犁河谷、准噶尔盆地自始至终都只是游牧民族博弈的战场的话，相信我们到现在也不会有兴趣去帮他们寻路。然而这两个亚洲中部重要地理单元之间的通道，在历史上却还承担了另一项重大任务——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有必要看看，走天山北路的丝绸之路北线，最终会从哪一条线路连接中亚——西域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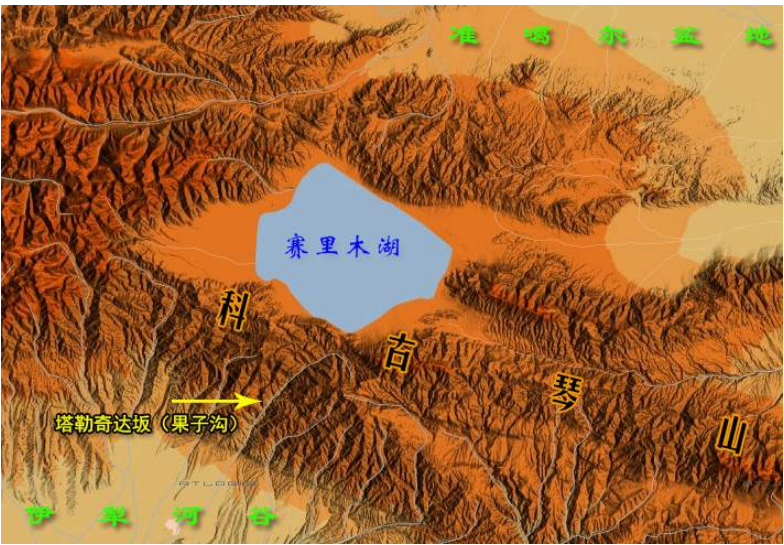
无论是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军人、商贾，还是游牧民族或者农耕民族，在穿越山地之时的选择都不会有异。相对平坦的谷地和充足的水源补给，都是大家都需要的。在大部分时候这两点需要是和谐统一的。你可以从分水岭的一侧沿一条河谷上溯至源头处，再在分水岭之上辟路转进到距离最近的分水岭背面的另一条河谷，并顺河谷而下进入相邻地理单元。试图在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分水岭上辟路的人，会发现通行的难度要比想象中更低一些。因为在分水岭中段的“科古琴山”西端腹地，有一块和“尤尔都斯盆地”结构类似的高山盆地。只不过，这个高山盆地实在太深了，深到河流从它周边山地带下来的泥沙还是没能把它淤积成一整片草原。我们现在在这个高山盆地腹地看到的，是一个东西 30 公里，南北 25 公里，最深处达 106 米的高山淡水湖——赛里木湖。



乌孙地缘结构图（西汉）

无论对于需要高山牧场转场的游牧民族，还是只希望能走得顺一点的商贾来说，赛里木湖的存在都是一个惊喜。湖盆的边缘不仅可以为牲畜提供丰盛的水草，也可

以让通行之人减少翻越分水岭的难度。就分水岭两端的地理条件而言，赛里木湖与准噶尔盆地地理关系要更为紧密些，二者之前的地势变化也较为缓和。相对较难通行的是它的南部山体，也就是面朝伊犁河谷的山坡。在这个方向，最终被选择光荣承担丝绸之路任务的谷地，叫作“塔勒奇达坂”。这样一个源自于突厥语系的标签可能会让你难以记忆，不要紧，它还有一个通俗易懂的“汉名”——果子沟。是不是又有人觉得这名字实在太过乡土气息了，实在难以与丝绸之路这样“神圣”的地缘标签匹配。要是那样想的话，那你就记 312 国道好了。当你沿 312 国道从北至南进入伊犁河谷时，在赛里木湖的美景从你眼前消失之后，很快就会感受到这条孔道的存在了。和大部分穿越山地的道路一样，古人按照趋利避害原则开拓的道路，也是今天那些道路设计人员最惯常借用的。



果子沟示意图



果子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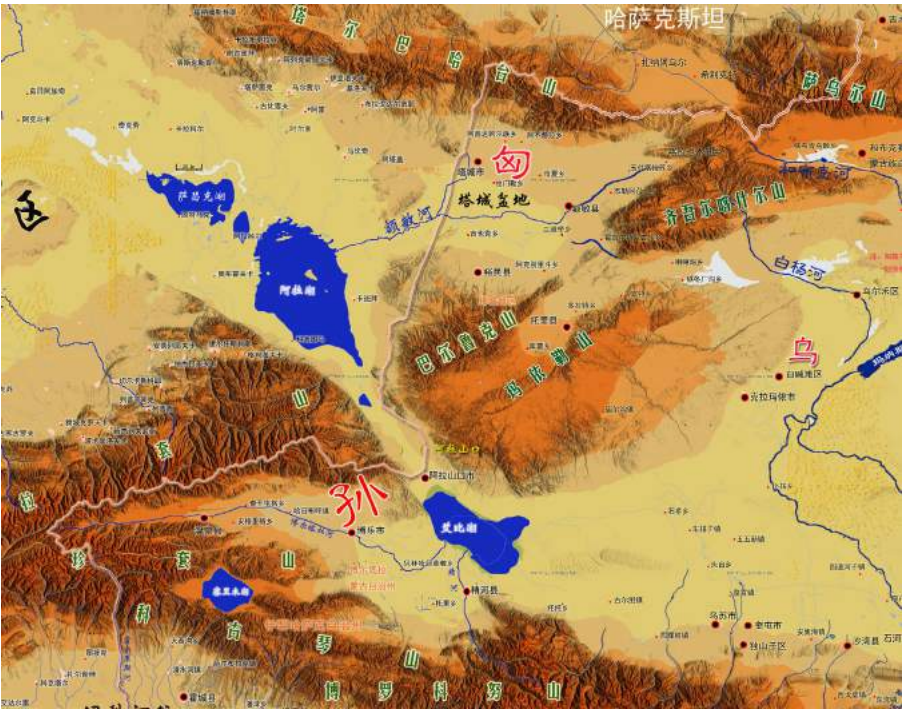
是，仅仅这样做就够了吗？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如果匈奴人占据了整个准噶尔盆地，那么赛里木湖畔的草原很有可能会成为双方决战的战场。也许匈奴人在一开始的确曾经试图从此突破过，不过乌孙人显然在后来的博弈中，将远离根基之地的匈奴人挡在了更北的地方。对于乌孙人来说，赛里木湖可以说是伊犁河谷的北方门户。在这个点上取得优势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拱卫后面的伊犁河谷，更可以顺势控制整个准噶尔盆地南缘。当然，乌孙人能够这样做的前提是，将战线继续向北推进，切断各条可能为匈奴人所用的，由阿尔泰地区攻击准噶尔盆地南缘的战略通道。按照这个思路推进的话，能否将整个阿拉套山的山前草原控制在手，就是乌孙人能否把匈奴人挡在天山草场之外的关键了。问题

第六节 准噶尔盆地西南角的地缘潜力

毫无疑问的是，乌孙人想在伊犁河谷自立门户的话，阿拉套山就是他们的门户。无论是山脉外侧面向巴尔喀什湖的草原，还是山脉内侧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南角的那部分，都不能让匈奴人染指。就地理结构而言，从赛里木湖畔下来的乌孙人，应该马上能够看到一片不错的草原。因为准噶尔盆地在这个方向所呈现的结构，是一个两翼有连续山地存在的喇叭形。将博罗科努山——科古琴山——别珍套山——阿拉套山，这些定性为天山支脉的“伊犁河谷北部山地”，和塔尔巴哈台山——萨乌尔山——齐吾尔喀叶尔山——巴尔鲁克山——玛依勒山，这些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连在一起看，我们甚至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几何现象，那就是在地质运动的作用下，天山主脉和阿尔泰山之间的这片山地，所搭建出来的是一个完美的“Z”字形结构。

“Z”字形的结构意味着这片山地当中应该有两个结构类型的，能从两面接受淡水补给的喇叭形河谷存在。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很容易会发现，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的这个夹角几乎就是阿拉湖——额敏河谷的翻板。只不过二者的关系有如太极鱼一样，一阴一阳。也正是这一阴一阳的关系，使得这两个结构相似的地理单元，在地缘潜力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而让他们之间产生如此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个字——朝向。



汉西域全图

的大片沙漠，以及遥不可及的太平洋季风。山地顶上流向这一面的雪水，以及西风带所带来的直接降水，明显要少于“Z”形结构的西南面。这种朝向所带来的影响反

“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腹地朝西的喇叭口结构，意味着这个“Z”形结构的西南面山麓，有机会从西风带收集更多的水汽。并在可以两面受水的阿拉湖——塔城盆地营造出额敏河这样的中心河流，以及阿拉湖这样的大型淡水湖。而反过来，准噶尔盆地西南角就是一个反面例子了。它的喇叭口所面对的就是准噶尔盆地腹地的

应在水资源结构上，就是准噶尔盆地西南角并没有在腹地汇集形成一条大河，并营造出类似伊犁河谷那样的全流域湿岛型气候。本来最有机会横穿整个腹地的发源于阿拉套山、别珍套山之上的“博尔塔拉河”，现在的年径流量也不到 5 亿立方米。尚不及额敏河的 1/3，更不用说和天时、地利条件逆天的伊犁河相媲美了。

与它背面的兄弟板块相比，天时（水汽）不足的博尔塔拉河与其他发源于两侧山地（主要是南部能更多受风的山地）河流，在准噶尔盆地西南角低地所打造出来的最终归宿地——艾比湖，在体量和质量上也不可同日而语。艾比湖所能够拥有的名头，只是新疆境内最大的“盐湖”。捉襟见肘的水资源状况，使得整个板块的地缘潜力受到极大影响。在古典时期，如果不是游牧过渡的话，艾比湖周边的荒漠化草原还勉强能为游牧民族所用。上千平方公里面积的湖区，也能够为缓解地区干旱气候做出自己的贡献。只是这脆弱的生态平衡系统，在上世纪中叶被打破了。



艾比湖卫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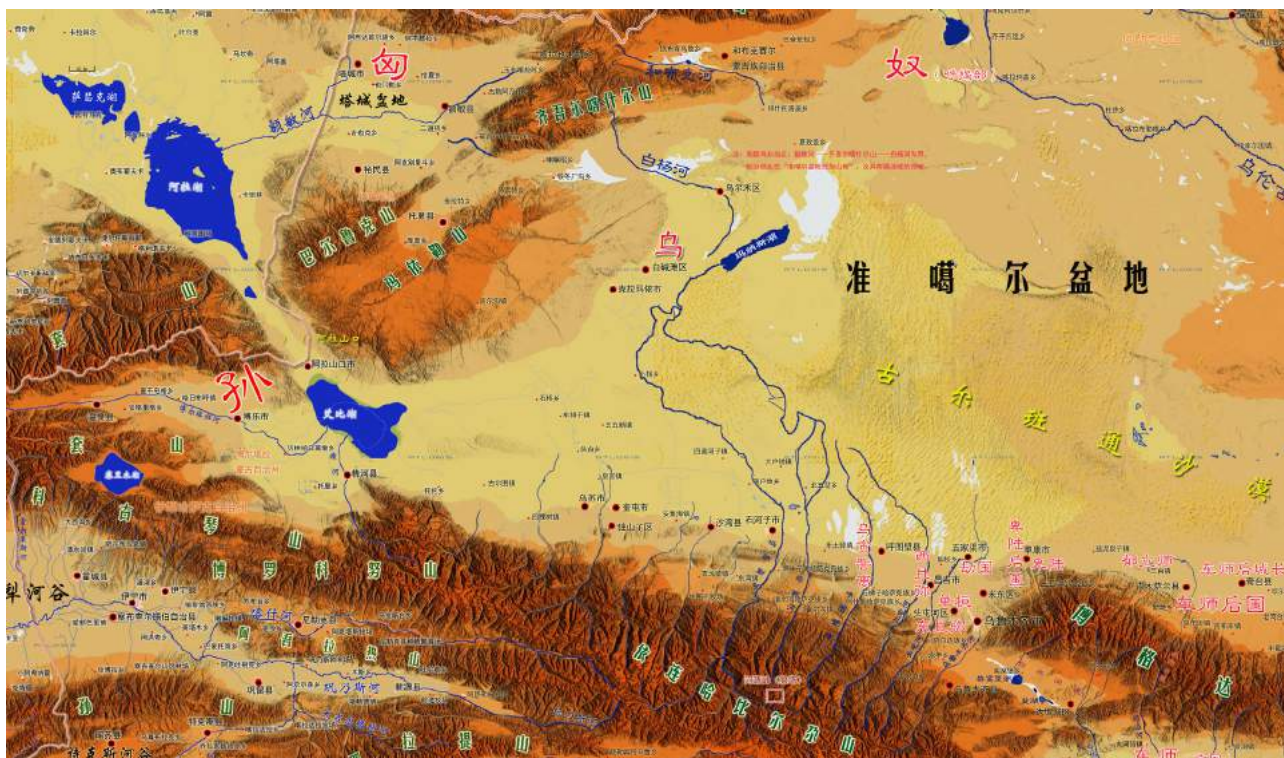
打破艾比湖生态平衡的，依然是来自中央之国腹地那些拥有了工业技术支撑的农耕民族。尽管艾比湖水矿化程度高，没有办法直接开发湖畔蓄积平原。但就现在的技术而言，让那些天山之水在山前低地就被利用，却是没有任何困难的。问题是，截留这些入湖河水，固然可以将山前草原变身成为人口承载力倍增的农田，却完全打破了准噶尔盆地西南角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生态

平衡。湖面大幅度缩减（湖内蓄水由 30 亿立方米锐减为 7 亿立方米），不仅让整个板块的土地加速沙化、盐碱化。更拉低了地下水位，直接影响到了那些农业人口的用水安全。

事实上，艾比湖湖区环境的恶化，其实影响面并不仅仅在于本流域。整个天山北麓直至乌鲁木齐一带，都会由此而引发环境危机。这是因为那些缺少水资源汇入而荒漠化的湖区，土壤会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沙化。而一会我们会说到，艾比湖区正对着一个巨大的风口。从这个风口刮入的穿堂风，足以把艾比湖区的沙土送给乌鲁木齐人民“品尝”。不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通常情况下，当居于政治中心的施政者直接受害于边缘地区日趋恶化的环境时，他们

在实施那些改善边缘地区环境的措施时，效率都会更高些。就好像对于北京地区的官老爷们来说，燕山以北那些荒漠化地区的环境是否改善（能让北京人民吃到沙子），其重要性肯定要比艾比湖区的环境能否改善要高。

其实要想改善艾比湖区的环境，进而避免整个准噶尔盆地南缘环境的恶化，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无非还是在于一个“水”字了。不过，通过节流来解决问题，似乎非常困难。经过计算，艾比湖如果想维持湖区正常的生态平衡的话，年需补水7亿立方米，而周边地区即使扎紧水袋子，让更多的水补入这个盐水湖，也还存在2亿立方米的缺口。除非你愿意把那些迁入的农业、工业人口大量迁走，否则以现有的人口承载量来说，通过节水就能恢复艾比湖的水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即使不考虑由此而带来的经济、人口安置问题，仅从地缘政治的层面来考虑，迁移人口的方案也是不可取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节流，只是说单纯的节流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水资源缺乏的状况只会更加紧迫。



汉西域全图

既然“节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只有想办法“开源”了。鉴于赛里木湖与艾比湖的地理距离，以及二者之间的高度差。我估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调赛里木湖之水补入艾比湖。事实上，从这个高山湖泊中调水的想法，早在50年前就已经实践了。只不过，当时急于“屯田固疆”的政治家们，还没有能力意识到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问题。他们将赛里木湖水调入艾比湖流域的想法，只是缘于博尔塔拉河之水已经被那些新开垦的农田消耗得差不多了。在那个所有人都抱

定“人定胜天”想法的年代，狂热的建设者们甚至在相关专家，还没有验证出赛里木湖之水到底适不适合用作农业用水之前，就开工建设“引赛济博”的输水大隧道了。然而在经过长达八年的施工，隧道距离目的地仅 300 米之遥时，工程被永久性地终止了。



赛里木湖卫星图



赛里木湖

“引赛济博”工程的终止，并非是因为工程技术上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最终让大家放弃引赛里木湖之水入灌溉农田想法的，是它的水质。尽管这是一个孕育出优势湖畔草原的淡水湖，但相比流动的河水，这些千万年来所积存下来的天山之水，矿物质含量还是超出了河水的数倍。农田在消耗大量淡水之后，那些无法被吸收的矿物质会沉淀到土壤里，让土地快速盐碱化。这一点，在经过数年的灌溉实验后已经得到了验证。悲哀的是，这一状况却是那些热衷于大手笔调水的民间“专家”，很少考虑到的。在他们眼中，有的只是简单的水资源加减法，以及因为高程差所带来的成本问题。在这里带出“引赛入博”工程，也是希望当年那些兵团建设者们所白白耗去的青春，能够让大家在论证相关问题时

变得更加严谨一点。

当然，这并不是说利用水利工程对水资源进行再分配的方式不可取。人类历史的发展，尤其是中央之国的形成过程中，对江河湖泊的改造、利用，确实是贯穿其间的。如果现在一定要用赛里木湖水去补给艾比湖而不是直接用于灌溉，也不是不可以。毕竟在艾比湖高浓度盐水面前，赛里木湖的那点矿物质含量就不算什么了。

假如当日的中国在天山北麓所保有的地理单元，仅仅只有准噶尔盆地的话，艾比湖区想获得额外补水的话，应该就只能指望赛里木湖了（按照分水岭原则，赛里木湖被划入中国境内的机会还是挺大的）。因为在生产建设兵团入驻，并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之后，那些流向准噶尔盆地腹地的河流，其潜力基本上都已经在本土消耗掉了。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在这种情况下，赛里木湖要想独善其身是很难的。不过在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之前，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去破坏这一地区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了。

其实说起来，准噶尔盆地南缘的各冲积扇也好，赛里木湖也罢，在水资源上都算不上“地主”了（赛里木湖充其量算是“富农”）。不过真要找“地主”的话，当年拼死抵抗俄国人渗透的政治家们，还是为艾比湖区乃至整个准噶尔盆地留下了可以“打土豪”的地方。相信不用我说，大家也已经猜到这个“地主”是谁了。真正能够有余粮帮到艾比湖甚至整个准噶尔盆地南缘的“地主”就是伊犁河。



阿拉山口卫星图

从伊犁河流域大规模调水，补入准噶尔盆地，同样是需要非常谨慎论证的事情。一方面是生态上的底线，不能以牺牲伊犁河流域生态环境为代价；另一方面是外交上的，毕竟这是一条国际河流。不过，从伊犁河流域（中国部分）一年上百亿的径流量（而且大部分都流入境外）中，分出2、3亿的水量支援一下饱受干旱之苦的艾比湖，生态、外交上所需要考虑的影响就很小了。而从工程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障碍。工程技术人员需要做的，就是尽量选择一条合理的路线，将伊犁河上源之一的“喀什河”之水，引入艾比湖流域。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项被命名为“引喀入艾”的水利枢纽工程已经在进行中了。

今天的我们再怎么为曾经的轻狂做补救措施，两千多年前的乌孙人并不知晓。这些惯于逐水草而居的人，凭借自身的感受能够得出的两点结论就是：准噶尔盆地南部的游牧条件远比不上伊犁河谷。如果想保有自己在准噶尔盆地的存在的话，仅仅满足于对艾比湖流域的控制是不够的。他们必须继续向北，去染指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真正的水草丰美之地“阿拉湖——额敏河谷”。

第十五章 乌孙在其北部和东部的控制线

第一节 乌孙与匈奴分割准噶尔西部山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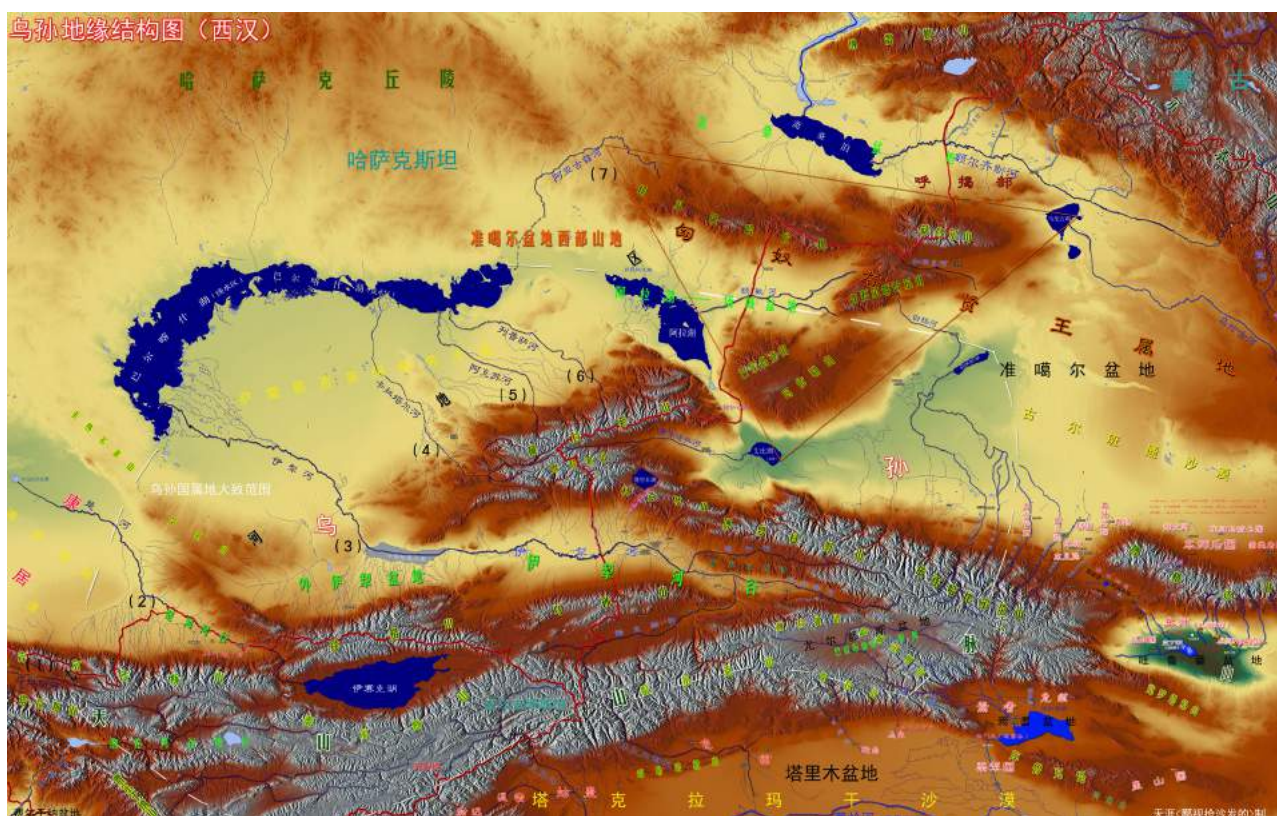
在乌孙人沿阿拉套山东南麓控制整个艾比湖流域时，很快就会发现阿拉湖——额敏河谷那片水草丰美之地，其实离他们已经近在咫尺了。连通准噶尔盆地与阿拉湖——额敏河谷的战略通道“阿拉山口”，就在艾比湖的西北方向。从大的结构来看，阿拉山口是天山山脉与“准噶尔西部山地”的地理分割点；而从具体的位置来看，这个天然通道就是阿拉套山与巴尔鲁克——玛依勒山之间的缺口。由于这个山口的存在，乌孙人在保有对阿拉套山的绝对控制权，以及继续渗透准噶尔西部山地腹地，与匈奴人分庭抗礼的时候，战略、战术上都更有保障了。他们既可以沿阿拉山口西侧非常方便地在阿拉套山南北两侧切换牧场；亦可以沿山口东侧贴着巴尔鲁克——玛依勒山进入到阿拉湖东侧的额敏河谷。

无论在什么时期，或是从哪个方向争夺准噶尔西部山地控制权的政权，政治家和军事家都不可能忽视阿拉山口的地缘价值。也有人认为，沿天山北麓而行的丝绸之路北线，最终是在穿越阿拉山口之后，再转而沿阿拉套山西北麓切入外伊犁地区，并继续南下的。其实如果不是想和游牧此地的部落做生意的话，这种走法是没有商业价值的。从赛里木湖畔打通伊犁河谷——准噶尔盆地之间的商道，才是政治家、军事家和商人们最合理的选择。

去除掉商业价值，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两千多年前的乌孙人，需要通过控制阿拉山口来保证自己在阿拉套山两侧的利益；而今天分据山口两侧的中、哈两国来说，需要阿拉山口承担沟通、贸易口岸的使命。当然，在双方关系紧张的时候（那时中国的邻居是苏联了），阿拉山口也不可避免的被双方视为兵家必争之地，并产生边境、领土纠纷。对于这一价值，大家最起码有两个可能熟悉的地缘标签来帮助加深印象。一个是“小白杨”，另一个则是“铁列克提”。

提到“小白杨”，相信大多数人脑海中第一时间出现的，是被阎维文、郁钧剑等军旅歌手唱红的歌曲《小白杨》。事实上这首歌曲正是出自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小白杨”。歌中所唱的哨所叫作“塔斯提哨所”（因歌而名，现在大家已经习惯称之为“小白杨哨所”），这正是中国军队警戒阿拉山口的一个边防哨所。至于另一个地缘标签“铁列克提”，可能有很多朋友就会略感陌生了。不过提到“珍宝岛”，相信知名度就要高得多了。这并不是说这两个标签所指向的是同一地点，事实上两地相隔万里。前者所具体的位置是在巴尔鲁克山西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阿拉山口这条战略通道上；后者则是乌苏里江主航道靠近中国一侧的一个江中小岛。将两者联系到一起的，是两件相互关系的，引发中、苏两国直接军事冲突的“战斗”。

当中国方面在战术上精心准备，且占据地缘优势的珍宝岛取得战术胜利之后（一个背后是人口数千万的工业基地，另一个背后则是人口稀少，补给困难的帝国最边远地区）。俄国的军事家们并没有建议克里姆林宫在相关地区展开报复行动。这其实与中、苏双方在当时的军事实力无关。一个合格的军事参谋人员必须考虑到各种因素，以确保本方是最终的胜者。以俄国的地缘结构来看，战略应对在中亚有可能扩大化的军事危机，显然比调动资源去外东北地区要容易得多。而在这个方向，中国核心区在地理、地缘方向的影响力又处于劣势。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看，事情往往就是这么诡异。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俄国人这些战略层面的考虑，让巡逻在铁列克提克的那支 68 人的中国边防军部队遭受无妄之灾，为中国在珍宝岛战斗中的胜利承担了战术后果。



乌孙地缘结构图（西汉）

在我们感叹完大国博弈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之后，还是让我们把思路拉回到两千多年前。如果乌孙人的企图是控制整个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的话，那么他们并不会就此止步。山地北部的塔尔巴哈台山，才是控制整个山地的关键所在。将匈奴人阻挡在塔尔巴哈台山分水岭的北侧，才有可能尽得腹地这片水草丰美之地。不过，乌孙人要是有力做到这一点的话，塔尔巴哈台山北侧斋桑泊盆地，以及整个阿尔泰山分水岭以南的“阿尔泰地区”，很可能就在他们的下一步计划中了。如果阿尔泰地区不是已经成为匈奴人的领地的话，那么这种想法还是现实的。现在的话，和这

个强大邻居相处，最现实也是能让双方都感到安全的地缘分割线，就是额敏河了。双方沿额敏河谷两岸游牧，不仅可以相对公平的分割额敏河谷，也可以在互不干扰的前提下共享阿拉湖畔的牧草。

单从平均分割准噶尔西部山地的角度来看，阿拉湖——额敏河这条分割线是很理想的。在匈奴人难以调动全部资源从乌孙人手中夺取伊犁河谷，又退而求其次的希望乌孙人在汉匈争夺西域控制权时，站在自己一边的情况下，这种理想状态的平衡是完全有机会达成的。这样一条以水为界的分割线，事实上也对整个准噶尔盆地西部的山地牧场做出了划分。匈奴人在这方面的利益应该会更明显一些，除了尽得塔尔巴哈台山之外，萨乌尔山和齐吾尔喀叶尔山也应该为匈奴所控制。而乌孙人如果想维持自己在额敏河谷的存在的话，将山地南部的巴尔鲁克——玛依勒山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是必须的。那么，除了地理距离之外，乌孙人又有什么样的地缘优势让匈奴人止步于玛依勒山以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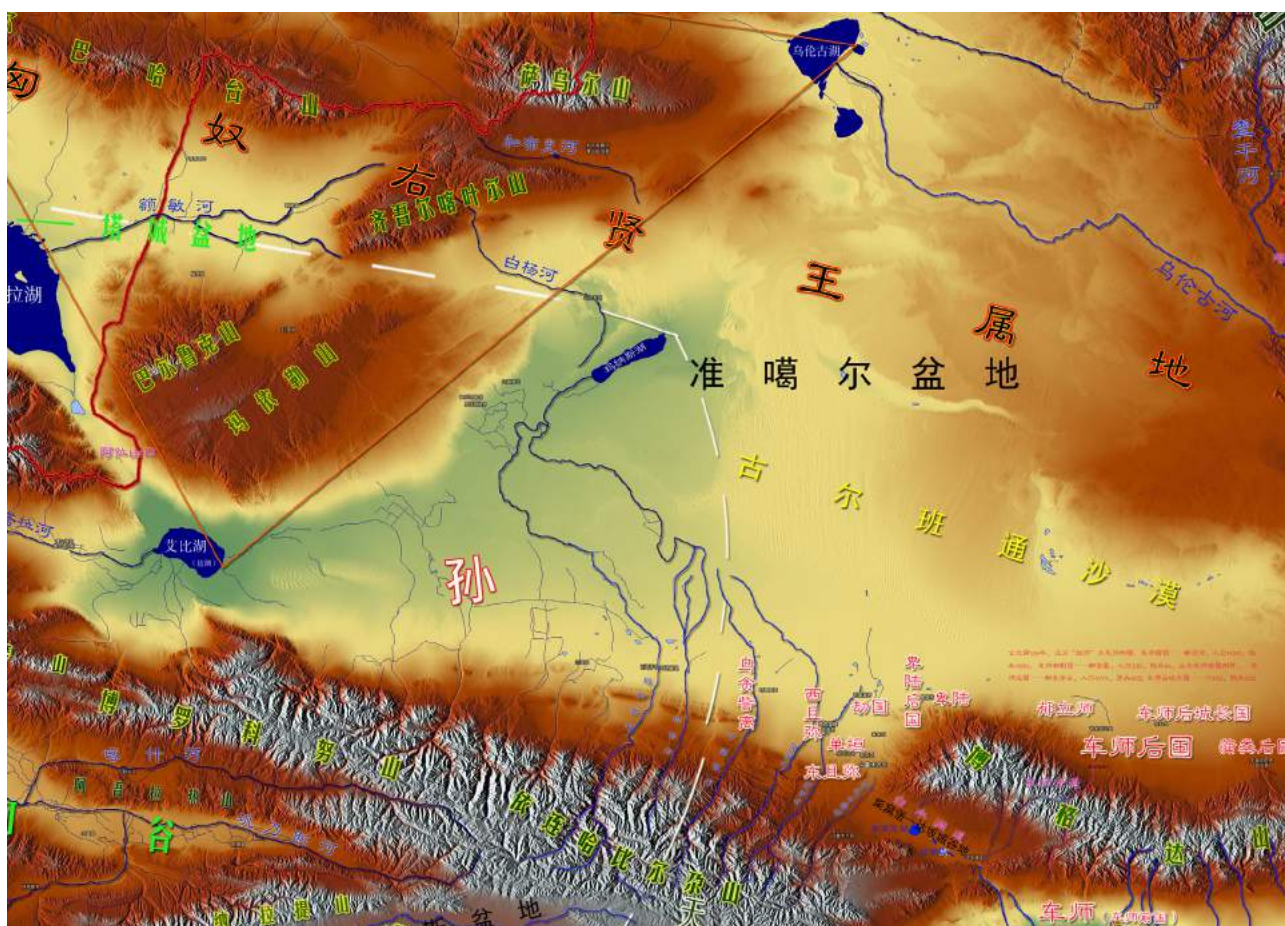
第二节 乌孙控制玛纳斯河和塔西河

提到“玛依勒山”，知道的人应该并不多，不过提到该山脉东麓的“克拉玛依市”，相信很多人就有印象了。就地缘结构来说，这座因石油而闻名于世的城市，无疑算得上是准噶尔盆地西部的地缘中心了。即使没有石油，相信以其地缘位置而言，也会因屯垦而兴起一座城市，以为中央之国拱卫西北边疆。只是单从农业开发的角度来看，这片完全背风，山地海拔又更低的山前低地，在淡水的供给上与阿尔泰山南麓、天山北麓相比，是处于劣势的。阿拉山口和斋桑泊盆地东西两端开放式的结构，让准噶尔盆地南、北边缘，都有更多机会迎接来自大西洋的水汽。不过事情总是这样的，“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总是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的。成就红色中国第一个大型油田殊荣，让克拉玛依在现阶段的地缘潜力上（主要是经济指标）显得更有优势。这一资源上的优势为克拉玛依所带来的好处就是，这片戈壁滩在利用完有限的水资源之后，可以从板块之外调水。现在，额尔齐斯河水正在通过“引额济克”工程，为克拉玛依的石油开采做出贡献。

从板块平衡的角度来看，从丰水区调水入贫水区并无不妥，尤其是在这些水资源会“白白便宜”邻居的情况下（在外交中优先强调“利己原则”并不是一件不道德的事）。只不过，如果不是克拉玛依有额外经济潜力的话，额尔齐斯河流域所在的阿尔泰地区，以及拥有政治优势的乌鲁木齐地区，在使用额尔齐斯水上应该会更有优先权（“引额济乌”工程的实施，要晚于“引额济克”）。这些从额尔齐斯河调水的工程也为中国整体“南水北调”的水资源平衡结构创造了一个例外，那就是“北水南调”。算起来，在西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在东亚核心区所掌握的一些固有的地缘规律，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颠覆了。

不管在现实中需要平衡多少问题，利用伊犁河、额尔齐斯河两条外流大河，平衡整个准噶尔盆地边缘的水资源结构都是一种趋势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类似的工程仍然会不断地出现。不过在两千多年前，乌孙人显然没有力量和意识来改善自己领地的地缘环境，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顺势而为控制那些自己能够控制的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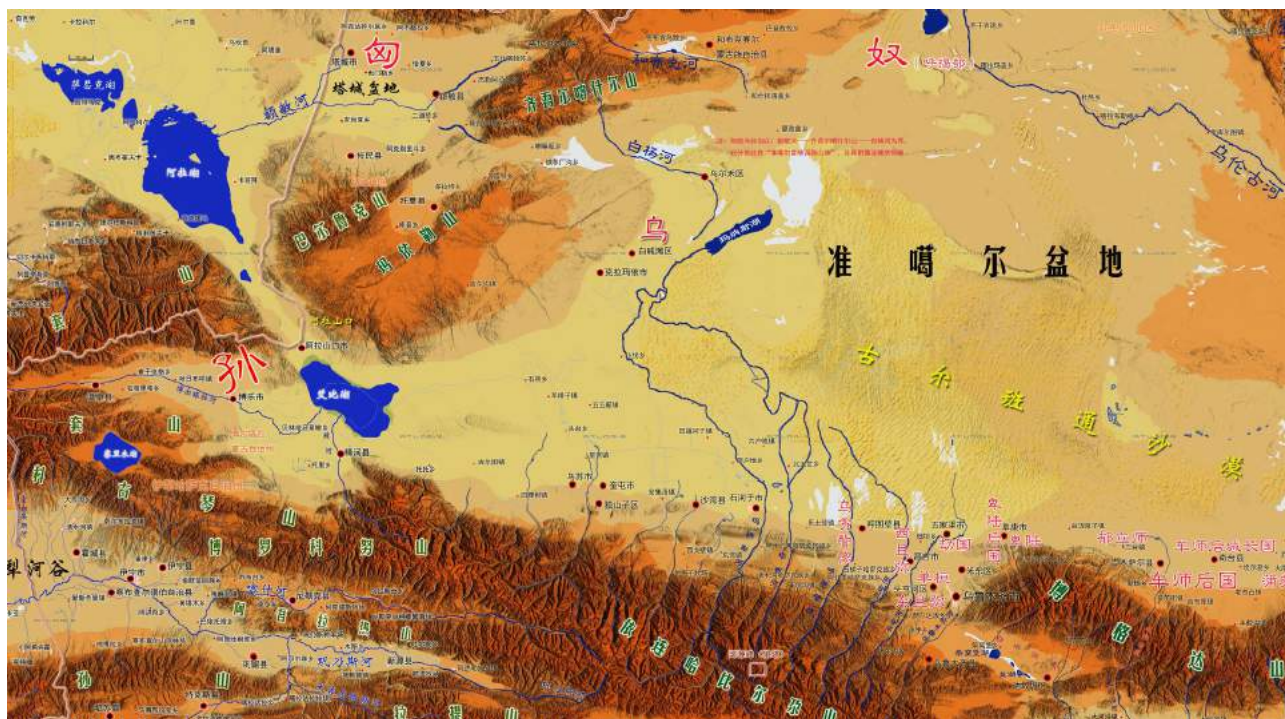
能够支撑乌孙人在准噶尔盆地西部存在的，除了玛依勒山东麓的山地、山前草场以外，一个叫“玛纳斯湖”的湿地的存在，显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与西域的很多湖泊一样，这个体量与艾比湖、赛里木湖同级的湖泊也是一个咸水湖。不过咸水湖本身并不代表无法为人所利用。这类湖泊的存在，最起码表明有河流流入，并在外围形成一片规模不等的湿地。像可以数面受水的依“巴里坤湖”而生的巴里坤草原就是这种情况。



乌孙地缘结构图（西汉）

今天的我们如果要去探访玛纳斯湖的话，应该会感到失望了。中上游的农业开发，已经让这个曾经的咸水湖大部变成了一片白花花的盐池。除非上游河流山洪暴发，否则基本上无水可入。我们之所以关注这样一个曾经存在的湖泊，是因为它的上游河水并非来自于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而是远在准噶尔盆地南缘的天山。准确点说，就是天山中段的“依连哈比尔尕山”。

前面我们还在遗憾准噶尔盆地西部的风水不好，背对西风带使得它的自然条件比盆地北麓、南麓要更差（也正因为如此，游牧民族和清帝国在经营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时，地缘重心都在山地腹地的额敏河谷）。现在的话，我们又要感叹天山之水的生命力是那样的顽强，使之能够冲破戈壁的阻碍，接近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



汉西域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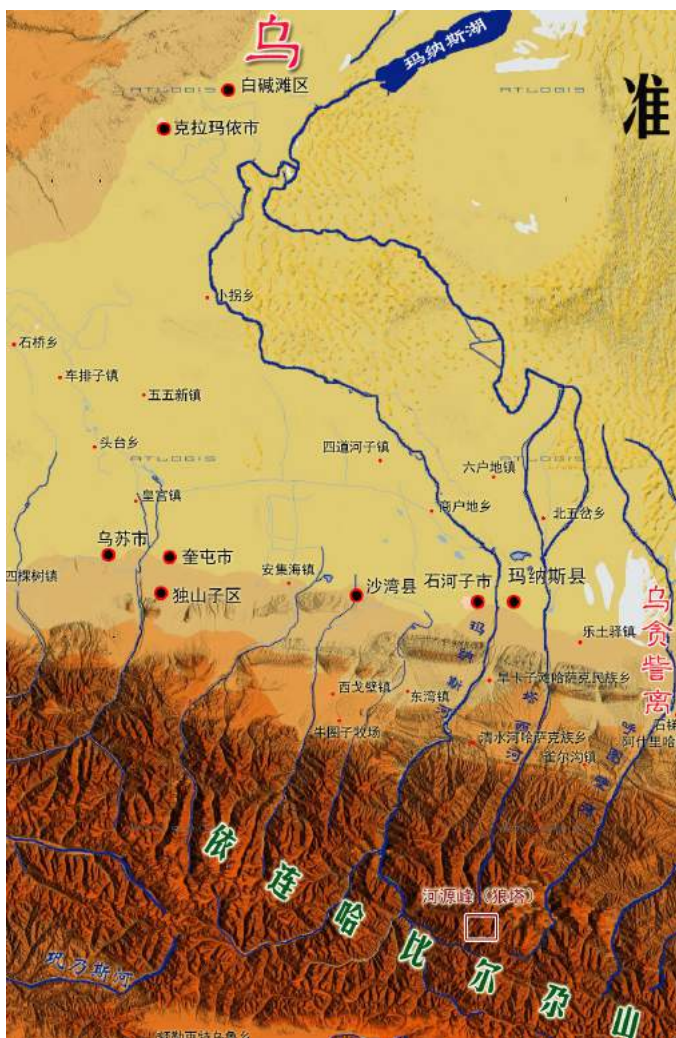


克拉玛依一带戈壁

在乌孙人生活的年代，如果从准噶尔盆地南缘向北移动的话，最起码可以找到两条河流帮助他们渗透到准噶尔盆地西部。其中一条，就是与玛纳斯湖同名的“玛纳斯河”，另一条则是在它东侧的“塔西河”。这两条河流的存在，以及艾比湖流域所处的准噶尔盆地西南角两面受水的地理结构，使得玛纳斯河——塔西河成为一条地理分割线。即在这两条河流东部的准噶尔盆地腹地，基本已经完成了沙漠化进程，被称之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而河流以东的这片三角形区域，荒漠化程度则归

类于荒漠化程度略低的“戈壁”。

对于很多人来说，戈壁与沙漠似乎都是人类的禁区。但事实上，黄沙漫漫的沙漠才更应该承担这项“罪名”。土地还未完全沙化的“戈壁”滩中，还是能够承担一些人口的（想想阿拉伯人的生存环境）。当然，沙漠和戈壁经常是相间的。在古典时期除了游牧民族和商旅之外，一般没人愿意去探究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多时候，地图上仅仅用“沙漠”二字，就把一大片包括沙漠、戈壁形态的土地概括进去了，就好像所谓的“撒哈拉大沙漠”一样。事实上，我们在中东部分也说过，这片地球上最大的沙漠更应该被称之为“撒哈拉大荒漠”。



汉西域全图

值，不仅让乌孙人和匈奴人划额敏河而治成为可能，也事实上使得这两条河流成为乌孙东部的一条地缘分割线。在现在的行政规划中，玛纳斯河和塔西河北流出“依连哈比尔尕山”的山前冲积扇，是由两个相距仅 11 公里的城市所控制的。一个是“玛纳斯县”，另一个则是“石河子市”。前者的形成是清灭准噶尔部后移民实边的结果；后者则是红色中国重拾“军屯制”经营西域的产物（所谓“师市合一”体制，石河

从依连哈比尔尕山、博罗科努山、阿拉套山、玛依勒山上流下来的雪水的合力冲击，虽然没有机会把这片戈壁地带变成一个类似伊犁河谷的“湿岛”，却还是能滋养出一些戈壁植被，甚至连片的荒漠化草原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以其为核心游牧地的话，玛纳斯河——塔西河以西的准噶尔盆地腹地，对于游牧民族还是有经营价值的。而对于乌孙人来说，这种经营并不仅仅在于可以多饲养一些牲畜。更为重要的是，乌孙人可以在沿途有淡水、草场补给的情况下，从准噶尔盆地南缘中部，快速移动到玛依勒山东北部。比起沿阿拉套山单线支撑乌孙人渗透准噶尔盆西部山地腹地的结构来说，玛纳斯河——塔西河，以及艾比湖周边地区那些河流的存在，都增加了乌孙人由准噶尔盆地南缘向北与匈奴人争夺额敏河流域控制权的能力。

玛纳斯河——塔西河的存在的价格

子市也是农七师的所在地)。

以伊犁河谷的地缘潜力来说,控制准噶尔盆地南缘并没有难度。而下游延伸至玛纳斯湖的玛纳斯河——塔西河,又让乌孙人在准噶尔盆地西南角拥有了一块自成体系,有游牧价值的地理单元。并支撑其与南下的匈奴人分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而治。既然如此,那么是不是说整个准噶尔盆地南缘就是乌孙人的天下呢?情况并非如此。至于是什么原因,下节再接着分析。

第三节 博格达山北行国能独立的原因

在乌、匈争夺准噶尔盆地控制权的时期,玛纳斯湖——塔西河冲积扇的东部,也就是呼图壁河及其以东那些直面沙漠的河谷中,仍然存在一些独立的,小规模游牧部落。而这些在之前的内容中,被划入“博格达地缘圈”的山北“行国”,在汉帝国的史册中也被记录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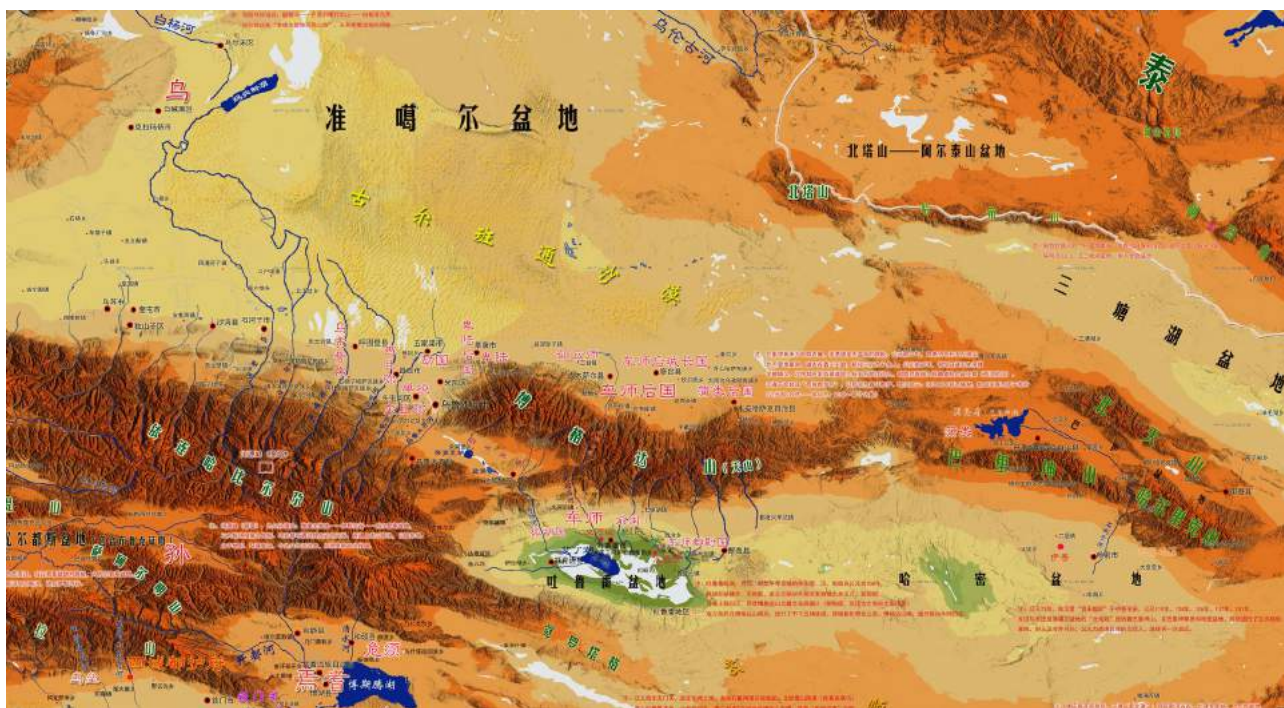
如果乌孙人试图一直向东控制整个天山北麓的草原的话,那么这些被分列为乌贪訾国、西且弥、东且弥、单桓、劫国、卑陆后国、卑陆国、郁立师国的小国,甚至那几个有农业绿洲为后盾的车师小国(车师后国、车师后长城国),以及被匈奴人赶到博格达山东北部的“蒲类”人,都很难有机会保持独立。将这些“毡房里的兄弟”纳入乌孙体系,并直接控制的难度,要远低于天山南麓那些定居的农业小国。问题是,乌孙和匈奴这两大游牧体系,似乎都没有兴趣将准噶尔盆地东南角的这片草原完全纳入自己的体系。或者说,他们曾经这样想过,但最终却还是长时间维持了这个板块的相对独立状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奇怪的平衡呢?

如果争夺西域的仅仅是匈奴、乌孙两个游牧民族的话,那么博格达地缘圈里的这些游牧部落,能够独立成国的几率几乎是不存在的。两大游牧体系在这一线争夺的焦点,很有可能是巴里坤草原。然而汉帝国渗透西域之举,却极大影响了这一地缘枢纽地区的地缘结构。很明显,汉帝国无论在核心区还是西域,竞争对手都是由北而来的匈奴人。如果乌孙人继续待在河西走廊的话,那么站队就是不可避免了。换言之,谁控制了河西走廊,乌孙人就会依附于谁。而现在,得到伊犁河谷这块风水宝地的乌孙人,却有机会置身于事外,并作为影响地区平衡的第三方力量而存在了。

在汉帝国取得河西走廊及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权之后,乌孙人也曾经识时务的与汉帝国结盟。当然,这并不代表乌孙人就一定要和匈奴人翻脸作对。整个西域的地缘格局所呈现的,是一种类似三国博弈的局面。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正是这种局面,让东天山北麓有机会出现那么多袖珍小国。首先从汉帝国的角度来看,拥有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条丝绸之路,就足以保证自己在西域的利益了。控制那些定居绿洲农业小国,也远比影响那些草原部落容易得多。至于东天山以北

的地区，汉帝国更多是出于一种防御的思维被动去施加影响。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对汉帝国来说，只是一个缓冲区。如果与汉帝国结盟的乌孙人愿意控制这一区域，并将匈奴人彻底阻隔在准噶尔盆地北部，那么对于汉帝国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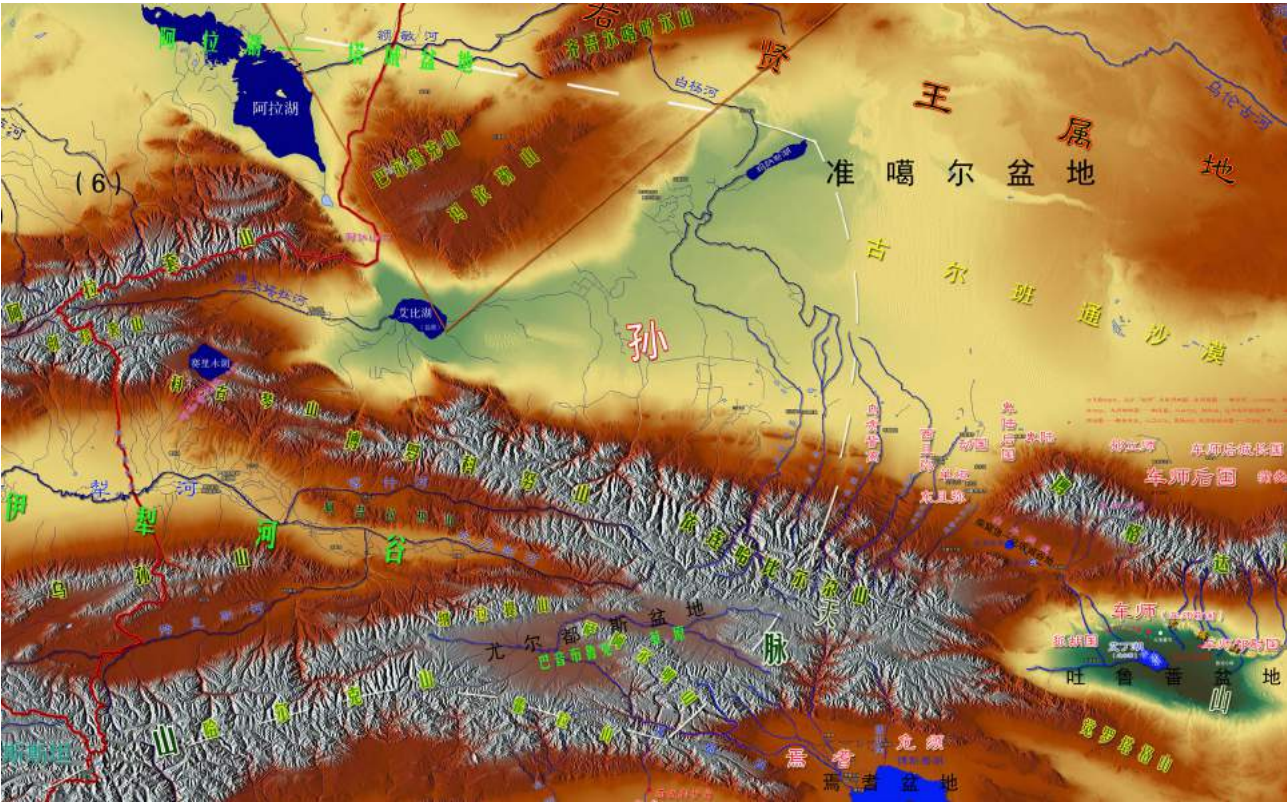
其次对于乌孙人来说，将控制线一直向东延伸到巴里坤草原的话，客观上虽然会为自己增加一些牧场，但这也意味着他们与匈奴的关系会变得十分微妙。因为这事实上阻滞了匈奴人向南渗透东疆盆地区，乃至与汉帝国争夺塔里木盆地控制权的进程。这会让本来因第三方身份在外交上游刃有余的乌孙人，成为西域博弈的主角。倒是便宜了一直苦于匈奴侵扰的汉帝国，使之成了渔翁得利的第三方。这样的局面，自然不是乌孙人愿意看到的。而反过来，汉帝国和乌孙人也同样不愿见到匈奴人完全控制东天山北麓，切割自己与另一方交流的战略通道。在这种三方博弈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以博格达山为核心的周边地区，就成为了密度最高的西域小国集中地。为大国提供缓冲，成为这十几个小国存在的价值所在。



汉西域全图

事实上，抛开地缘政治的因素，单从乌孙人的力量延伸来说，控制被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压缩为狭长走廊带的呼图壁河以东地区，也有些困难。从战略上来看，单线延伸的突出部向来是最容易脱离核心区控制的（想想朝鲜半岛和越南）；而从战术角度看，当乌孙人必须调动力量在东线与匈奴人博弈时，这条狭长突出部在战术上被对手切断的可能性也会很大。如果乌孙人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是把东部控制线稳定在玛纳斯河（至多塔西河）的话，那么乌孙控制下的准噶尔盆地东部边界，与同样受其控制的重要牧地——天山腹地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尤尔都斯盆地），就

可以完美对接了。这使得从玛依勒山起，至玛纳斯湖——玛纳斯河（以及相邻的塔西河）——尤尔都斯盆地东部的乌孙控制区，其轮廓呈现为一条有明确地理特征标示的弧线。



乌孙地缘结构图（西汉）

这样一条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弧线当然不是被刻意打造出来的，也不是在地图上追求几何意义的完美，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地缘价值。因为乌孙人沿这条弧线而走的话，有机会经营出一条全线有部落游牧的连续防御带来。当我们仔细观察地理结构时，就会发现玛纳斯河、喀什河——巩乃斯河（伊犁河三源之二）、开都河，三河的源头处非常接近。这样的地理结构让乌孙人能够在伊犁河谷、尤尔都斯盆地、准噶尔盆地，三地相接的天山之地方便移动，并快速在三河流域中调配力量。这样的话，最有可能承受匈奴压力的玛纳斯河一线，在战略、战术上就能够直接得到那些游牧于伊犁河上游、尤尔都斯盆地的乌孙部落的支援了（而不是一定要先集结到伊犁河谷腹地，再从赛里木湖进入准噶尔盆地）。

既然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地缘控制力来说，完全控制天山北麓都有些难度，那么乌孙人是不是可以就此满足于在准噶尔盆地获得的这些领地，并以伊犁河谷为核心区偏安一隅呢？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无论汉帝国还是匈奴人，愿意与乌孙人平等外交（汉帝国甚至给予了乌孙人和亲的待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乌孙人所显现出来的实力。而对这些实力进行量化的话，就是牲畜和人口的数量了。

尽管伊犁河谷的游牧条件非常好，能为乌孙人承载出相当规模的牲畜和人口。也尽管因为受制于汉帝国在东线发起的反击，匈奴人暂时也愿意与乌孙人维持平衡。但就整体实力对比而言，乌孙国现在牧地还是显得不足。一旦匈奴人在与汉帝国博弈中失败，亦或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话，这个整合了全部蒙古高原游牧部落的帝国，集中全部力量决战乌孙，并以中亚为重心进行扩张是完全有可能的。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也鉴于在北、东两线没有继续扩张的机会，乌孙人不可避免地会将视线投向于南线，在那里乌孙人又将开拓出一片新天地来。

第十六章 乌孙在天山南部扩张的边界

第一节 乌孙控制特克斯河谷地区

在中央之国古老的“风水”文化中，有“山管人丁水管财”一说。不过，相信诸位前辈“大师”应该怎么也没想到，在中央之国西北方向这片大陆腹地，这七个字才算真正显露出它的价值来。那些在东亚核心区更多是作为屏障的山地，不仅为整个中亚——西域地区提供绝大部分淡水，其本身也是重要的人口承载地。类似巴音布鲁克草原这样群山环绕的高地牧场，在乌孙的版图中并不是唯一。

就“伊犁河谷”这个地缘概念而言，本身所涵盖的并不仅仅是伊犁河中游腹地的冲积平原地区。以喀什河、巩乃斯河、特克斯河为代表的上游河谷，同样也是伊犁河谷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伊犁河谷中最好的草原，并不是在三河归一后的伊犁河中游的冲积平原。乌孙山之南的特克斯河谷，才是整个伊犁河谷风水最好的所在。

无论我们是在地形图，还是在伊犁河谷实地考察，都应当很容易在喇叭形的伊犁河流域中看到乌孙山的存在。这条横亘于伊犁河干流之南的天山支脉，与天山主脉中的“哈尔克山”，共同合围出了一条橄榄形的山间盆地区——特克斯河谷。如果说河谷低点在海拔 2500 米以上的尤尔都斯盆地是高位山间盆地的话，那么低点海拔在 1300 米以上的特克斯河谷就是中位山间盆地了。在我们现在的行政版图上，这片山间地带是由昭苏县、特克斯县两县所辖。因此也可以称之为“特克斯——昭苏盆地”。

和尤尔都斯盆地一样，“特克斯——昭苏盆地”也呈现西高东低的地势，这也让横贯其间的特克斯河走出了一条特立独行的路线。当天山北麓的河流大都向西流淌的时候，特克斯河却是固执的和远在万里之外的东亚核心区的河流一样东流。在“逆流”了四百多公里后，方北出盆地，与流向、结构上最根正苗红的“巩乃斯河”会合，并转而向着巴尔喀什湖方向西去。之所以说特克斯河谷风水最好，当然不是因为它那特立独行的流向，而是因为这一河谷地带优异的游牧条件。

尽管呈喇叭形结构的伊犁河谷开口向西，整体降水丰富，气候温和，但具体到内部诸亚板块，气候和地貌还是有明显的地带性差异的。伊犁河谷腹地的中游平原区由于与高山距离较远，相对较少的自然降水使之在气候环境上被划为了半干旱区（年降水量 200–350 毫米）。而上游那些河谷丘陵区降水就要高出许多了（年降水量 350–500 毫米），在气候上算是半湿润区。相对较高的海拔，也使得上游河谷的年平均气温要更低。在由两山包夹，海拔较高的特克斯河谷，这一点尤为明显（中游河谷平原平均海拔约 650 米）。凉爽的气候，使得特克斯河谷地区春秋对接，几

乎全年无夏。

对于游牧民族最为倚重的马、羊等牲畜来说，它们并不喜欢炎热的夏季。尽管这一季节往往会因较为丰沛的降水，生长出更为肥茂的牧草，但一方面炎热的气候会对牲畜生理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高温还会滋生蚊虻，使得牲畜不能好好进食。所以这一季节的牲畜一般最多只能保持不掉膘。真正的生长期和生长高峰，是在环境温凉，同样处于牧草生长期的晚春和秋季，所谓“秋高马肥”也正是指于此。有鉴于此，像特克斯河谷这样海拔适中，几乎不用考虑度夏问题的地区，就更容易受到游牧民族的青睐了。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气候相对寒冷，却又水草丰美的地区会更容易出好马（这也是中央之国核心区的短板）。



汉西域全图

在张骞第二次通西域，说动乌孙人与汉帝国交好时，他带回的数十匹特克斯草原上出产的“乌孙马”就曾经让汉武帝心动不已，并赐名为“天马”。今天的我们可能无法理解汉武帝当时的兴奋之情。不过你要试想一下，如果现在美国把他们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技术转让给中国，在技术上意味着什么，相信就更容易理解了。在古典时期的军事博弈中，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很大程度决定了你的军事潜力，尤其是当你准备战略反击游牧民族时（马源没有保证的话，就只能被动防御了）。因此当乌孙人以一千匹天马为聘礼，向汉帝国提出和亲请求时，汉武帝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当然，汉、乌两国之所以用这种最高外交礼节结盟，更多的还是出于地缘政治上的互有所需。不过有了这些重要的战略物资作为润滑剂，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显然更容易达成。为了庆祝这一外交成就所带来的政治、技术上的双重收获，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甚至亲自为这些天马写下了“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的诗歌以示庆祝（《西极天马歌》）。

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在这项改变西域地缘格局，让汉、乌两国战略双赢的交易中，唯一做出重大牺牲的，应该就是汉朝用来和亲的“细君公主”了。这位被迫牺牲自己个人幸福，完成国家使命的宗室之女，同样也用诗歌表达了自己的心境：

“吾家嫁我今方一，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相信以我们中学所掌握的古文功底，也足以从中感受到这位和亲公主的凄凉之情了。



特克斯河谷的草原

感慨完政治的无情之后，我们又要把视角拉到到大历史的层面了。相信特克斯河谷能够孕育出伊犁河谷最好的草原，让很多朋友感到意外。其实在伊犁河谷和准噶尔盆地中，产草量最高、整体环境最好的草原，往往就在特克斯河谷这样的中山带。这样的海拔既能保证有充足的降水（雪水），又不至于温度过低。那些生成在中山带的山谷、盆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普遍在冬季存在逆温层，白天比同海拔的其他地区温度能高上5——10度。在天寒地冻、草木枯黄的冬季，这样的逆温层也是

游牧民族窝冬的好去处（牲畜还有雪水可饮）。相比之下，海拔过高的山地草场以及海拔过低的山前草原，在温度和水资源上就有所不足了。

类似这样的中山带，在伊犁河上游地区可以说是大量存在的。特克斯流域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它处在这一海拔的区间是最大的。乌孙山与哈尔克山相对较宽的间距，让特克斯流域所产出的优质草原，在规模上能够更胜一筹。这也使得特克斯河谷成为乌孙核心部落活动的中心。乌孙人当年是怎么经营特克斯河谷的，我们已经很难考证了，不过他们还是给当地政府留下了不少可以拉动GDP的遗存。

相比很多不封不树的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乌孙人很喜欢“土墩墓”这种形式。也正是这些墓葬的存在，能够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乌孙人。在伊犁河流域遍布的乌

孙遗迹中，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乌孙古墓群，正是在特克斯河流域。不过这种上有封土、下有墓穴，并有大量陪葬品的墓葬形式，并非乌孙人所创，而是因袭那些来自欧洲的游牧民族。具体地说，也就是被月氏赶走的塞种人。包括后来渗透此地的突厥人也同样受此影响，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土墩墓。

既然特克斯河谷是伊犁河谷中最有可能成为核心板块的区域，那么即使单纯从辐射角度看，乌孙人也不应该止步于此。向东控制尤尔都斯盆地中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在地缘结构上并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在汉帝国无力维持在西域的优势地位后，乌孙人甚至于渗透到了焉耆盆地。只不过，在汉、匈激烈博弈的情况下，一定要再向东延伸自己的领地显然是不明智的。真正能让乌孙人不用考虑地缘政治影响的扩张方向，还是在西线。

第二节 乌孙控制伊塞克湖盆地区

当乌孙人发现特克斯河谷这块风水宝地，并让羊群品尝过特克斯河畔的每一处牧草后，他们应该马上就会在河谷的西侧，发现另一处体量上与特克斯河谷相当的高山盆地——伊塞克湖盆地。这两个地理单元之间的分水岭是那么的单薄，使得游牧于特克斯河谷的部落几乎没有理由不继续向西渗透。而鉴于特克斯河谷是伊犁河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塞克湖及其周边地区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都是和伊犁河谷置于同一政权统治之下的。事实上，乌孙人并不用去“发现伊塞克湖的存在”。在他们之前统治伊犁河谷的塞种、月氏两族，应该已经自然控制住这个高山盆地了。无论是谁，在追击对手的同时，就能够同时成为这两个地理单元的主人了。

尽管在游牧时代，乃至清帝国从准噶尔人手中接收西域的时候，伊塞克湖区都算是伊犁河谷的附属板块，但在俄国人强势渗透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能够勉强保住半个伊犁河谷的中央之国，甚至差一点失去了整条特克斯河谷。当以左宗棠为首的湘军从“浩罕”国手中收复西域时，特克斯河谷和整个伊犁地区是被俄国人，以保障自身安全、帮助清帝国维持地方之名强行“代管”的。如果清帝国没有湘军这支中兴力量强势收复西域的话，伊犁河谷被俄国人消化掉几无悬念。

然而在清帝国凭借湘军的出色表现，收复被费尔干纳盆地而来的“浩罕”国所占领的塔里木盆地之后，俄国人就不得不面对清帝国的交涉了。当自觉强占整个伊犁河谷无望后，俄国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是留下特克斯河谷了。只是对于经略西域的中央之国来说，无论是让俄国人得到整个伊犁河谷，还是单单得到特克斯河谷，都会在南、北疆之间插入一个危险的突出部，由此对中央之国西北地缘安全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正是因为看到这点，当时负责和俄国人交涉的外交官员宁愿在经济上承受更大的损失（俄国人以帮中国代管为名索要军费），也要力保特克斯河谷不失。尽管我

们现在看，觉得特克斯河上游还有一小部分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似乎不够圆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为中国的西北边疆线划出这样一条相对平滑的边境线，已是相当不易了。

当然，如果包括伊塞克湖在内的，现在占据吉尔吉斯斯坦大部分国土面积的整条天山山脉，都能够留在中国境内的话，这条边境线应该会更加饱满一点。只是对于俄国来说，这将意味着他们几乎在整条天山山脉都无法依据分水岭原则与中国划界。这对于处于强势地位，而又对分水岭极度敏感的俄国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至于说，如果依照分水岭原则，伊塞克湖以及现在整个吉尔吉斯斯坦应该归属于中亚还是西域，乌孙人当年以游牧逻辑扩张的区域，所扩张的西、南边境又应该在哪里，我们后面再分析。



汉西域全图

对于很多人来说，之前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天山腹地中那些高山盆地的存在。依照在东亚农耕区的思维惯性，大家在地图上审视天山南北时，多会把注意力放在那大片的低地上。不过伊塞克湖盆应该是个例外，由于伊塞克湖的存在，无论我们身边有什么样的地图，都不可能忽视它的存在。和大多数内陆湖泊一样，伊塞克湖也是个咸水湖，这在干旱的亚洲中部已经是常态了。作为一个平均深度达 300 多米，有九十多条河流汇入，却无一条河流流出的终端湖，伊塞克湖内要是没有累积相当量的矿物质，倒让我们感到奇怪了。这就好像有 300 多条河流供给的贝加尔湖，如果没有安加拉河（叶尼塞河上游河流）这根独苗帮着排水，这个世界上最大淡水湖的水质，估计也很难用来饮用和灌溉了。那样的话，经常幻想引贝加尔湖水灌溉华北的朋友应该会相当失望了。

当然，伊塞克湖也并非没办法直接为人类所用，千分之六的盐度只能算得上微咸了（海水一般是百分之三）。可以想见的是，这样大体量的湖泊意味着多么大的

渔业潜力。我们很难知道，乌孙人当初的食谱中有没有产自伊塞克湖的鱼。不过对于游牧属性的他们来说，即使有也不会是食物的主要来源。事实上，伊塞克湖以及这片山地之上的其他湖泊，直到上世纪 30 年代才开始大规模的渔业开发。在此之前，无论是两千年前的乌孙人，还是现在占据此地的吉尔吉斯人，最吸引他们的，还是伊塞克湖周边可以用来放牧牲畜的，面积达 2 万多平方公里的湖滨草原。



伊塞克湖

一般来说，海拔越高，环境越恶劣。然而由于伊塞克湖的体量巨大，湖水调解湖盆小气候的作用十分显著。大部分湖面即使在最寒冷的季节也不会上冻（以至于有“热湖”之称）。这种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的气候，加上湖滨充足的淡水资源，使得伊塞克湖地区在人口承载量这项指标上，有机会完胜同处天山腹地与之遥相呼应的另一处高山盆地——尤尔都斯盆地。

对于当年的乌孙人来说，并没有强大的对手能够与他们争夺伊塞克湖地区。而到了亚洲古典文明期行将结束的 19 世纪末，情况就有些变化了。伊塞克湖到底算是中亚游牧民族天然的领地，还是更应该留在中央之国的“西域”概念中，就成为影响中、俄两国切割天山北麓的重要问题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来看看在分水岭原则之下，伊塞克湖的地缘倾向到底是哪个方向，是西天山北麓的中亚板块，还是应该分水岭之南的塔里木盆地？

由于伊塞克湖是一个只进不出的高山湖泊，因此对其应该划入哪

个地缘板块的问题似乎很难明确。但仔细研究地缘结构后，我们会发现解读这个问题并不难。当我们不把视线仅仅局限于“伊塞克湖”，而是以一个高山盆地的角度来观察它的地理结构时，答案就出来了。我们会发现由周边山地流入这个湖盆地的

雪水，并不都是注入伊塞克湖的。在湖盆的西部，有一条水量最大的河流并没有成为伊塞克湖的附庸。而是特立独行的在与伊塞克湖仅隔 3 公里处与之擦肩而过，并最终西北向地奔向了中亚沙漠。这条河流，就是后面我们会分析到的“七河”之一的楚河。

事实上，如果伊塞克湖不是那么深，让湖面再抬高个 10—15 米，或者当年地质运动时让湖盆西部更低些的话，它的湖水就能够经由楚河河道注入中亚了（流入伊塞克湖盆地的楚河上游，名为“科奇科尔河”）。这样的话，楚河下游的水量和伊塞克湖的水质（指矿物质含量）都会发生积极的变化。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楚河的河床地势要更高，并无法帮助伊塞克湖导出收集到的雪水。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联系。因为在丰水季节，地势更高的科奇科尔河会溢出，穿越那三公里的距离补给伊塞克湖。在乌孙人所处的时代，这一景象可能会是常态。这也使得即使在当地人的观念中，楚河之水也常常被误解为是来自于伊塞克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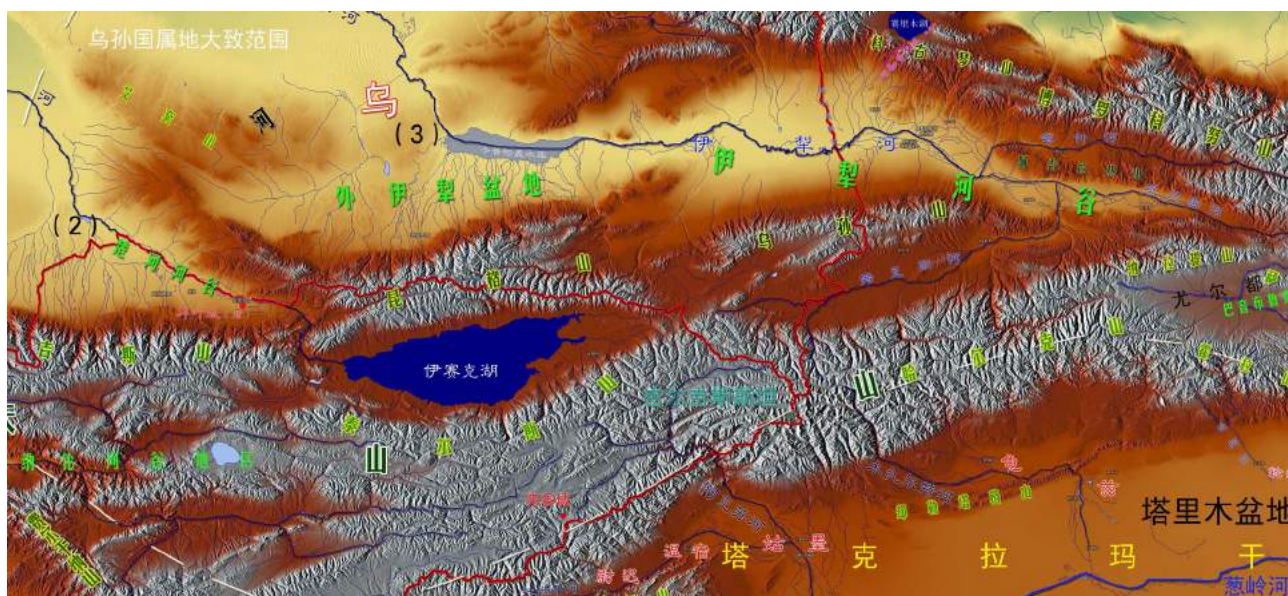


汉西域全图

不管古人有曾经多大程度误解过这一点。现在我们肯定都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如果你去实地考察的话，即使是一年 365 天守在楚河与伊塞克湖之间，也已经看不到二者之间有河水相连了。为了让楚河之水更好地服务下游地区，吉尔吉斯人（或者说俄国人）早已切断了二者之间的水文联系。而加上伊塞克湖周边其他河流开发的影响，现在伊塞克湖的水位较之上世纪中叶也已经下降了两米。当然，损失这些补水目前对于这个最深处达 700 米的高山湖泊来说，似乎算不了什么。最起码还不至于像“死海”那样几乎死去。不过吉尔吉斯人要是想保持伊塞克湖区原有的生态平衡的话，随时监控水质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穿行于伊塞克湖盆地西部的楚河（或者说“科奇科尔河”）并没有在盆地中逗留太久，很快它就将从一处叫作“博阿姆峡谷”的缺口向北流出伊塞克湖盆。在这个峡谷的北端，科奇科尔河会与另一条发源于“昆格山”腹地（伊塞克湖盆地北部山地）的河流——朱瓦纳雷克河会合，共同形成楚河干流，并在天山北麓滋养出一片重要的冲积扇绿洲——楚河河谷。

从楚河串联伊塞克湖盆地与天山北麓低地的角度来看，伊塞克湖地区显然应该归属于天山北部板块。中亚游牧民族经由楚河河谷或伊犁河谷中的“特克斯河谷”进入伊塞克湖盆地，要比从天山南麓的塔里木盆地方向渗透容易得多。实际上，特克斯河谷——伊塞克湖盆地——楚河河谷三个连续草原带的存在，也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北线提供了一种选择。那就是准备经由天山北麓穿越亚洲中部这片干旱之地的商旅，在穿行于楚河——伊犁河谷时，可以从外伊犁盆地、伊塞克湖盆地两条路线之间做出选择。



乌孙地缘结构图（西汉）

最早经由伊塞克湖盆地进入楚河河谷的著名历史人物，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也是他最早为我们留下了伊塞克湖环境的文字记录。不过，他走的路线比较特别，并没有经过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而是先选择沿塔里木盆地北沿（丝绸之路中线）西进，然后突然转向翻越纵深最宽、最为艰险的天山主脉中段进入伊塞克湖区。由于我们还没有对塔里木盆地两侧的地缘结构作具体分析，玄奘当年是怎么在天山南北切换路线的，要待以后解读了。

不过单从地理结构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伊塞克湖盆地与塔里木盆地之间的地缘联系是很弱的。这也使得中央之国如果想把伊塞克湖盆地纳入“西域”这个概念的话，只能从伊犁河谷入手了。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有效控制伊犁河谷的话，中

央之国并没有机会从塔里木盆地入手，控制这个制高点。当积弱的清帝国仅能为保有半个伊犁河谷而努力时，再试图和俄国人讨论伊塞克湖归属问题的想法，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就好像有朋友从法理上去讨论唐努乌梁海的归属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一样）。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俄国人甚至谋得了特克斯河谷的西端，以彻底隔离伊塞克湖盆地与伊犁河谷（中国部分）之间的联系。

这样的划分方式，当然会让今天的我们感觉很不爽。而对于俄国人来说，完控伊塞克湖所造成的地缘影响，并不只是让俄国人得到了一片能够承载众多人口的高山草原和控制了楚河的源头；也不仅仅意味着俄国人为自己境内的天山北麓低地（外伊犁盆地、楚河河谷）获得了一片大纵深的高地保护。至于这其中还有什么样的地缘影响，又与乌孙之地的范围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第三节 中亚北部族群属性的变迁

今天领有伊塞克湖盆地的是以吉尔吉斯人为主的“吉尔吉斯斯坦”。在现今“中亚五国”的地缘概念中，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可以说得上是高地之国。对于吉尔吉斯人，我们并不应该感到陌生。在分析蒙古高原地缘结构时，我们曾经解读过唐努乌梁海的位置和结构。而后来接纳过李陵的唐努乌梁海盆地，就是吉尔吉斯人的原住地（或说民族形成地）。不过，单凭这一点，就一定要说吉尔吉斯人是李陵和其他北入匈奴的汉人之后，显然是有问题的。

事实是，鉴于李陵当年在匈奴中的地位，很多北方游牧部落如果想和华夏文化拉上关系的话，都会附会于他。当然，如果对方一定要这样做，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这样可以接近彼此之间的关系，但如果对方不愿意的话，一厢情愿的帮人家“认祖归宗”就非常不妥了。试图证明吉尔吉斯人与华夏文明之间有亲缘关系的人，在看到吉尔吉斯人偏蒙古人种的长相后，往往会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

只是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吉尔吉斯人也好，哈萨克人也罢，他们在人种上更接近于蒙古人种，主要是因为整个中亚的北部，长久以来一直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渗透的重点区域。和中原一样，整个中亚地区在古典时期一直在承受着北方压力。而一波又一波的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其影响力是随着渗透的深入而递减的。从结构上看，与伊犁河谷无缝对接的中亚北部草原带（也就是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大部覆盖的地缘板块），是最有可能在人种和文化上为北亚游牧基因占优的区域（也可以说是被“洗黄”了）。而直接导致现在哈萨克、吉尔吉斯两族（国）地缘形态的，则是蒙古帝国那次史无前例的征服。

之所以说是“洗黄”，是因为在蒙古人种的亚洲游牧民族到来之前，最先到达并统治天山南北的是来自于欧洲的游牧民族。由于这些西来民族早在四千多年前就驯服了马，所以在争夺中亚——西域这片“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心脏地带的地缘

博弈中，能够有先发优势。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欧亚大陆两端在技术上没有了代差之后，亚洲诸板块就开始显现出它们的潜力了。边缘地带的东亚大陆开始在文明的体量和深度上，领先于西欧（东欧平原以西）；而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不仅在和欧洲游牧民族争夺中亚的博弈中取得领先，甚至反过来强势渗透东欧平原，乃至对西欧构成过威胁。



吉尔吉斯人

参与其间的部落、政权都各自发挥了多大作用，就很难厘清了。抛开那些混合了人种、文化、宗教、政治影响的民族标签去看每一片土地的地缘属性，会更容易让我们看透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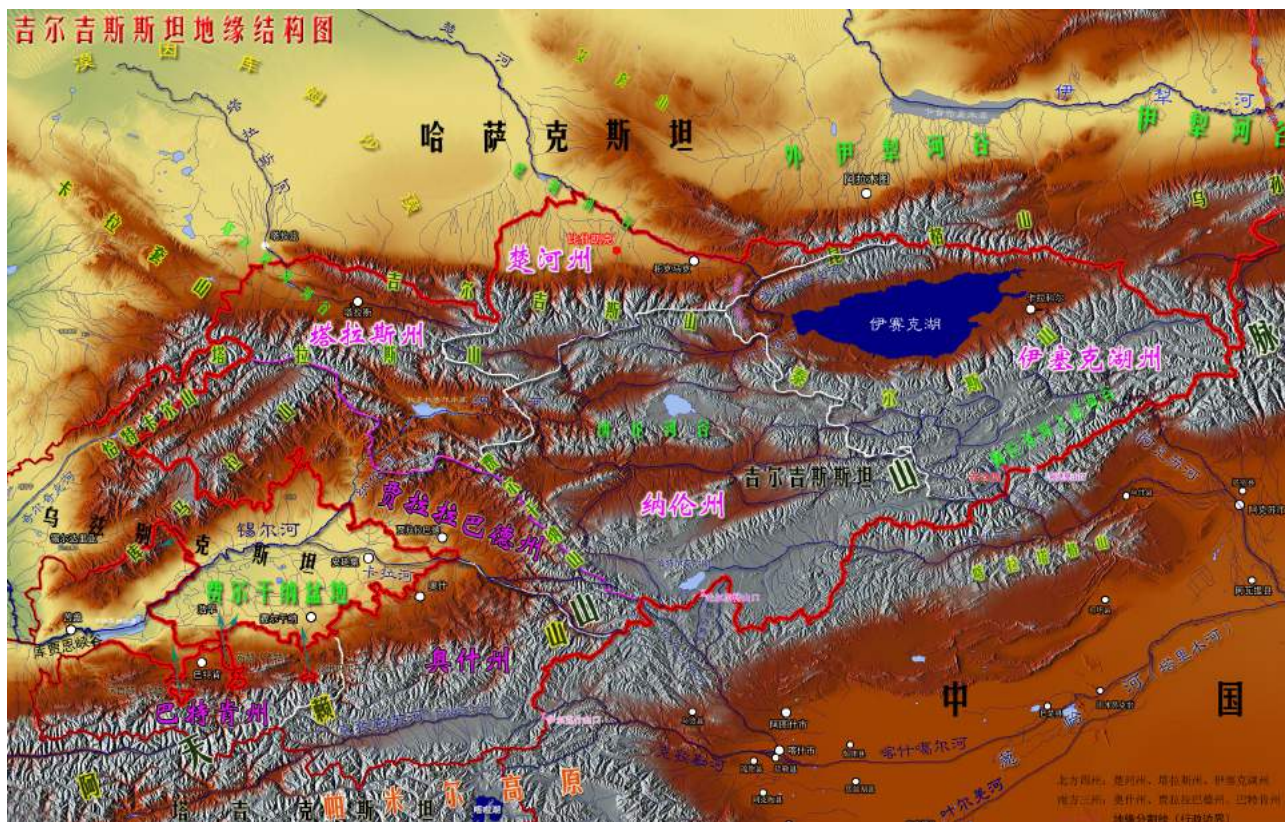
从地缘属性上来看，包括伊塞克湖盆地在内的高山盆地、河谷地带，无疑都是游牧民族和其文化的覆盖区。高海拔所带来的寒冷气候、短到甚至没有的无霜期，都足以让渗透于此的部族没有“进化”到农耕生产方式想法。即使是在有工业化助

其实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因技术革命而带来的先发优势，以及东、西方在技术上处于同一段位后，开始呈现的公平竞争局面，又何尝不是这一百多年来，东、西方文明博弈的写照呢？至于东方文明在整体完成工业化进程后是否能够逆转西方文明，历史会为我们书写出答案的。

未来会发生什么，还未可知。还是让我们把思绪从现实的文明博弈，拉回到现在正在分析的时空来吧。我们现在很难确定大月氏、乌孙两族在河西走廊之时到底是什么人种。如果是黄色人种的话，那么替亚洲游牧民族夺取中亚统治权，并开启中亚大规模混血进程的“功绩”，应该算在这两族头上了。只不过，从结果来看，即使这是一次黄种游牧民族的逆袭（而不是欧洲游牧民族的回流），也并没有改变中亚的人种结构。可以肯定的是，迁移到天山北部的大月氏、乌孙人，后来呈现在汉帝国使者面前的，都是带有强烈欧罗巴人种色彩的“异族”。

不管中亚北部是什么时候洗黄的，整个天山南北最终呈现黄白混血，并诞生有别于东欧、蒙古高原民族体系的“突厥”族系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说在这个进程中，每一个

力的今天，这些高海拔地带的草原也依然很大程度维持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两千年前入主伊塞克湖地区的乌孙人，还是现在据此立国的吉尔吉斯人，在天山腹地都不会碰到农业文明的阻力。除了伊塞克湖盆地以外，在湖盆西、南两侧的天山之地，同样有适合游牧的河谷供他们开拓。



吉尔吉斯斯坦地缘结构图



伊塞克湖地区

大规模的成为人类生存之地是有些困难，但这并不代表它们全部都是极限之地。那些高山河谷地带，由于地形的原因完全可以营造出一条条小气候不错的游牧地带，甚至农耕之地来。从这个角度看，伊塞克湖盆地只是其中体量较大，更容易被我们看到罢了。

无论你从多么大比例的地形图上去看伊塞克湖西、南两面的山地，心里都一定会产生一个疑问，像这种高密度、高海拔的山地难道不是人类生存的禁区吗？同样的疑问，相信很多朋友在看青藏高原时应该也会产生。

的确，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想

由于伊塞克湖盆地内的河流都是内流入湖盆，那么与它相邻的地理单元，河流很自然地就应该与之反向相流了。当我们从河流、水系的角度来解构天山之巅的这些山地时，这些板块的清晰结构以及相互之间的地理分割线，就能够清晰呈现出来了。以流域为地缘核心来划分板块的话，伊塞克湖盆地南部的山地可以被称之为“阿克苏河上游谷地”，而湖盆西部的山地则叫作“纳伦河谷地”。

第四节 乌孙控制阿克苏河上游谷地

我们先来看看，与中央之国现有国境线形成有密切关系的“阿克苏河上游谷地”。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曾经在巴尔喀什湖与阿拉套山之间标示过一条“阿克苏河”。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更为熟悉的阿克苏河还是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那条。在现有的行政区划中，塔里木盆地北部中心城市——阿克苏市，就是由这条河流在天山南麓的冲积扇滋养出来的。而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时代，这片冲积扇主要是被一个叫作“姑墨”的小国所控制的。

假如阿克苏河所流入的塔里木盆地也是一片草原繁盛的游牧之地的话，那么游牧于塔里木盆地的部落或者部落联盟，最起码会试图沿阿克苏河而上，为自己的牲畜寻找换季的山地牧场。这样的话，乌孙人也好，后来的吉尔吉斯、维吾尔两族也罢，他们之间的地缘分割线很可能就是阿克苏河与伊塞克湖之间的分水岭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草原更大、部落联盟实力更强的一方，越过分水岭将整片游牧之地连成一片，置于一个游牧政权之下。就像匈奴人越过阿尔泰山控制阿尔泰山南麓；乌孙人北上，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纳入自己的游牧范围一样。只不过，不管历史如何发展，后来中、俄（吉）两国的国境线，都不会是今日之走向了。

然而这一假设的前提，是塔里木盆地能孕育出游牧文化来。问题在于，在人类可以涉足塔里木盆地时，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就已经定型了。天山——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的完美对接，不仅将塔里木盆地隔绝在西风带之外，也同时断绝了温润的印度洋水汽进入盆地腹地。干旱少雨的气候让塔里木盆地腹地，成就了中亚——西域板块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与那些混杂了戈壁形态的“沙漠”不同，这可真是片黄沙漫漫的沙漠之地。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唯一能够支撑人类规模化生存的土地，就只能是那些山前冲积扇了。

早在汉帝国凿空西域之前，迁入塔里木盆地的部落就已经意识到，在这些点缀在山地——沙漠之间绿洲中，尝试他们曾经熟悉的游牧生活是没有前途的。依靠充足的光热资源进行农耕生产，才有机会让自己的部族稍具规模。这样所孕育出来的“国家”在纵深上的缺憾，使得它根本无力抵御强大政权的入侵。只不过对于乌孙和其他从天山北麓而来的游牧民族来说，直接占有阿克苏下游这样没有太大游牧价值的绿洲意义并不大。一定要进入的话，时间一长也是和当地土著融合为一支有别于山

北游牧体系的新族群（现在的维吾尔族就是这种情况）。

游牧文化在天山腹地几千年来的优势地位，以及塔里木盆地边缘更适合农业开发的现实，直接影响到了今日中、吉两国的边界形成。当俄国人渗透中亚，并使吉尔吉斯人臣服于他们时，那些原属吉尔吉斯人游牧的土地也自然被俄国接收了。相信俄国人对于这条边境线整体还是很满意的。毕竟伊犁河谷及其以北地区，俄国人没能全流域的控制伊犁河、额敏河、额尔齐斯河三条核心河流。仅仅是在特克斯河谷的西部，俄国勉强算是有一点上游优势。现在，俄国人最起码可以通过控制“阿克苏河上游谷地”，来缓解他们在北部的遗憾了。



汉西域全图

也许有朋友还是会为中吉两国的分界线，没有处在真正的天山分水岭上而感到遗憾。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条分割线其实是一条农牧分割线。除非你能从伊犁河谷方向控制整个伊塞克湖盆，否则以阿克苏河上游河谷的地缘属性，会让它几乎没有与塔里木盆地连成一片的可能性。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对当年负责与俄国人交涉的外交家们，提出过高要求了。

事实上，纵观历史，这样一条农牧分割线最起码在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准备经略西域时就已经稳定存在了。即使我们无法获知当年的塞种、月氏两族是否在控制了伊塞克湖盆之后，将触角伸到阿克苏河上游谷地，但可以从历史记载中得到验证的是，乌孙和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小国之前的领土边界，基本就是这样一个走势。也许是看中了此地的冬牧场，也许是希望借此从丝绸之路受益，乌孙王室曾经在阿克苏河上源地，即现在中吉边境附近（吉境内）营建过一个都城——赤谷城。这对于以迁徙不定的乌孙人来说，是很不寻常的。

以乌孙之地的结构来说，赤谷城绝不可能是乌孙的地缘中心。实际上，以游牧国家的属性来说，他们在不同的季节游牧于不同的板块是一种习惯。在这种生活背景下，所谓的都城通常也会有几个，并且不会限于一个板块（即使这个板块能够提供四季牧场），以让王族和核心贵族们能尽可能多的扩大巡视范围。乌孙王族真要锁定一个在环境、板块纵深、辐射力等诸多地缘指标上都占优的板块，作为自己核心活动区的话，也会选择特克斯河谷。



纳伦河流谷

将领土范围延伸到阿克苏河上游谷地，已经是乌孙人在这个方向上所能做到的极限了。如果他们还想寻找新牧场的话，就必须切换方向了。前面我们也说了，在伊塞克湖西面的天山之巅还有一片河谷之地。那些从雪线上融流而下的雪水在滋养过一条条谷地之后，最终万宗归流的汇集成了一条河流——纳伦河。整个纳伦河流域覆盖的这片土地，可以称之为“纳伦河谷”。那么乌孙人到底有没有像控制阿克苏河上游河谷那样，控制纳伦河谷呢？如果没有竞争对手的话，乌孙人控制纳伦河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像他们游牧于阿克苏河上游时，天山南麓那些农业小国也绝没有力量提出异议一样。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乌孙人在试图成为整个西天山高地的主人时，将遇到强大阻力。这些阻力使之很难完控整个纳伦河谷。

纳伦河谷会成为乌孙向西扩张的终点，并不是因为这片河谷本身有太大地缘潜力，以至于能够孕育出一个足以和乌孙相抗衡的部落联盟。真正让乌孙人止步的，是纳伦河下游所连接的低地。说起纳伦河，估计知道的人很少，其实纳伦河并不是一条完整水系的全部，而只是一条大河水系的上游部分。也就是说，纳伦河那密如蛛网的水道，从伊塞克湖西侧的天山高地上所收集到的雨水，在向西流到天山脚下后，将和其他方向汇集来的河流一起，共同汇集成一条大河。而说起这条河流来，相信知道的人就很多了，它就是中亚最核心的河流之一“锡尔河”。锡尔河在中亚的江湖地位，甚至还要高于我们之前不吝溢美之词的伊犁河。这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水量。在这片干旱的大陆腹地，水资源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你的地缘潜力。从

这点上看，年径流量在 300 亿——400 亿立方米之间的锡尔河，人口潜力就应该高于年径流量不超过 200 亿立方米的伊犁河。在以后的内容中，这一点也可以得到验证。

与伊犁河脱离山地庇护后，就未能有太大作为不同的是，锡尔河的下游河道两侧也成为人口聚集区。也就是说，锡尔河更为充沛的水量不仅仅滋养了山前低地，还在沙漠之中开拓出了一条绿色长廊。在中亚的历史中，锡尔河下游地区通常并不是作为单独的地缘板块，而是与另一条水量更大的中亚名河——“阿姆河”捆绑在一起进行研究的。二者最受天山宠爱的河流之间的区域（包括二者之间规模较小的河流），被称之为“河中地区”。如果和伊朗高原以南那片同样干旱的土地作类比的话，无论从地缘结构还是地缘价值上看，我们都可以把河中地区定位为中亚的“两河平原”。

关于中亚两河平原的解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有详细解读。不过对于乌孙人来说，他们在纳伦河谷所遇到的阻力，并非直接来自于河中地区。这是因为锡尔河在完全脱离山地的包围，在沙漠之中开拓河中地区之前，还曾经拜地质运动所赐，额外获得了一个新的集水区。而这个叫作“费尔干纳盆地”的山前盆地区，在为锡尔河下游收集更多淡水的同时，也把自己打造成了一支让中亚各民族垂涎三尺的潜力股。

第五节 大宛国控制费尔干纳盆地

从位置上看，费尔干纳盆地与伊犁河谷有诸多相似之处，即都是由天山支脉与主脉之间包夹而成的山前盆地区。从大西洋而来的水汽，不仅为天山带来了积雪，并进而补给河谷；也透过外伊犁盆地、库贾恩峡谷（费尔干纳盆地西部缺口，也是锡尔河上、下游的分割点），直接为二片腹地带来了数百毫米的降水。这种低地多面补水的结构，相比那些仅仅依靠高山之水补给的河流要幸福多了。不仅让伊犁河、锡尔河在中亚河流中的排名位列第一集团，也让它们的中上游河谷盆地区成为不可多得的湿岛。

尽管伊犁河谷和费尔干纳盆地一北一南，像是镶嵌在天山北路的两颗明珠，但对比两者的气候环境，费尔干纳盆地则要显得更为优越。近乎合围的盆地结构，成为它与伊犁河谷在结构上的最大区别，并直接对二者的气候乃地缘文化造成了影响。以伊犁河谷而言，其面向西侧半开放的结构，固然让来自西风带的水汽更容易深入河谷腹地，并为之带来充足的降水。但与此同时，穿越西西伯利亚平原、哈萨克丘陵的北冰洋冷气也同样更容易影响伊犁河谷的气候。

与之相比，整体轮廓呈三角形的费尔干纳盆地腹地，其北部横亘的恰特卡尔——库拉马山、费尔干纳山、塔拉斯山等山脉，就像一个厚实的房顶一样，帮助费尔干纳盆地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冷气。同时，相比伊犁地区更低的纬度也为费尔干纳人盆

地贡献了更多的日照时间。

纬度、地形结构上的优势,为费尔干纳盆地带来的是长达二百一十多天的无霜期。这一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时段,与华北平原、东疆、南疆地区处于同一数量级(伊犁河谷与北疆在160天左右)。仅从这一点来看,相信大家也已经想到了,即使是在古典时期的农业技术条件下,既不“缺水”,也不“少温”,地势还早已冲积成平原地貌的费尔干纳盆地腹地,是一块天生的农耕之地。如果费尔干纳盆地身处东亚核心区的话,相信它早已被华夏文明经营成天府之国了。



汉西域全图

写到这里,也许会有朋友认为,要等到汉通西域之后,费尔干纳的农耕潜力才会被发掘。但事实上,传入费尔干纳盆地及塔里木盆地的农业技术,与远在东亚的中央之国并没有什么关联。以西方人以前的视角来看,农业文明有两个独立的起源地。一个就是影响了欧亚非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中东两河流域;另一个就是孤悬“海外”的中美洲。只不过,后来他们发现,其实华夏文明的农业技术也是在独立状态下掌握的,并且很早就培育出了一些东亚所特有的物种。以中亚——西域的地缘位置而言,他们从与隔伊朗高原相望的阿拉伯半岛传入农业技术会更为现实。而汉通西域之后,中央之国更多的是从天山南北获取新的种植品种,以丰富自己的食谱。比如我们今天常见的葡萄、石榴、核桃,就是经由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的(并不一定是原产地)。

至于费尔干纳盆地乃至南疆地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农业化进程的,我们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可以确定的是,当张骞和乌孙人进入天山南北时,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大部分部族已经过上了定居的农业生活了。而统治费尔干纳盆地的,就是以拥有“天马”而闻名于世,甚至招来杀身之祸的“大宛”国。说起来,这个

“天马”之名本来是汉武帝赐给来自伊犁河谷的乌孙马的。只不过当他又见到锡尔河流域出产的大宛马之后，就移情别恋了。至于乌孙马，就只好另外以“西极天马”来重新命名了。

相比马的品种，很多朋友更关心的是人的种族。与乌孙人种族变化有些模糊不清不同，身处中亚南部的大宛人，无疑是源自欧洲的高加索人种，与月氏、乌孙人所驱逐的塞种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不确定的是，大宛人是否就是最初发现费尔干纳盆地的部族。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他们是最早进入盆地的土著部族的可能性很低（不过从种族上说，最初开发费尔干纳盆地的还是欧洲游牧民族）。因为即使不考虑农业潜力，费尔干纳盆地也是一块让游牧民族向往的水草丰美之地。在欧亚游牧民族的共同压力之下，历史上入主费尔干纳盆地的游牧民族，并不少于伊犁河谷。只不过，基于地缘位置的原因，北部的伊犁河谷融合了更多的北亚游牧民族的基因，在人种上更偏蒙古人种；而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乃至整个河中地区，则由于与蒙古高原距离较远，而保留了更多的早期欧洲游牧民族基因。



费尔干纳盆地农业

其实在游牧民族的心里，并不认为自己所拥有的游牧文化，相较农业文明是更低一级的文明。换句话说，一般情况下，游牧民族并不愿意主动接受定居生活，对于那些接受农耕生活的部族甚至有些蔑视。然而无论是哪一支进入费尔干纳的游牧民族，在地缘环境的影响之下，最终都会与土著部落融合，并接受定居的农业生活。对于这种变化，相信熟知华夏文明几千年历史的我们，并不会感到惊讶。

尽管在我们的历史中，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占据了大量篇幅，但实际上，在更多的时间里二者还是能和平相处，形成互补合作的稳定关系。在西域诸多小国中，这种情况就非常常见。比如那些游牧的行国就会定期与定居的“城国”进行物资

交换，各取所需。只不过，如果一方实力过于强大，这种平等交换的关系就会转化为政治上的依附了。身处南疆的诸多绿洲小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曾经多次被不同游牧政权所统治。鉴于它们的体量，能够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并在内部进行一些兼并已是最好的情况了。

不过以费尔干纳盆地的体量而言，倒是很有机会以“农耕”为立国之本，做出一番事业的。土地更高的产出率，以及由此产生的更大的人口承载力（现在生活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居民，人口已经过千万；而经由中央之国开发的伊犁河谷，人口数量还不到 250 万），都让大宛国有机会在自己的统治结构中纳入一些边缘地区的游牧部落。由于入主费尔干纳盆地的部族本身就源自于游牧部落，这种在中央之国核心区难以实现的农牧混合结构，在天山南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正是这种混合结构，让大宛国在拥有农业基础的同时，还能培育出让汉武帝羡慕不已的“天马”来。

由于纳伦河流域与费尔干纳盆地的地理关系，以及与农业区的物资交换原因，游牧于其间的部落会更倾向于在政治上接受大宛国的统治。对于大宛国来说，在纳伦河谷拥有一块缓冲之地，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也是很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有记录表明，乌孙国曾经止步于伊塞克湖西部，并没有进一步向前控制整个高地草原。而即使乌孙国曾经渗透过纳伦河谷东部，最终应该也没有对大宛国在费尔干纳的核心区造成过威胁。对于乌孙人来说，如果一定要从农业区获取些额外利益的话，塔里木盆地北沿那些绿洲小国，会更容易应付得多。

在后来的历史中，乌孙人也的确觊觎过汉帝国所控制的塔里木盆地北沿。然而对于游牧属性的乌孙人来说，这只不过是额外的补给。除非他们想改变自己的游牧属性，否则天山北麓那些连片的优质草原才是他们最关注的方向。以此思路推导的话，外伊犁盆地和伊塞克湖以西的楚河河谷，就将成为乌孙人领土中另一个重要的地理单元了。

第十七章 乌孙在天山西部扩张的边界

第一节 乌孙渗透入楚河河谷地区

楚河与伊塞克湖的地理关系，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即使最终发现它们二者并没有成为一个水系，但楚河本身也足以将二者串联为一个关联板块了。乌孙人，抑或在他们之前、之后统治这一地区的游牧政权，无论是先进入楚河流域的低地部分，还是伊塞克湖盆地，都会很自然的向另一板块渗透，并难以容忍其他对立族群生存在此。

从流量、流域面积来看，楚河流域在天山北麓并不算特别显眼，伊犁河、锡尔河、阿姆河等河的流域面积、流量，都要比它大得多（楚河现在的年径流量，不过 20 亿立方左右）。而以流域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山前绿洲的体量来看，楚河河谷也同样不算起眼。在地图上，我们甚至很容易忽视这片山前绿洲的存在。不过楚河河谷的地缘价值却非常大，尤其是与其体量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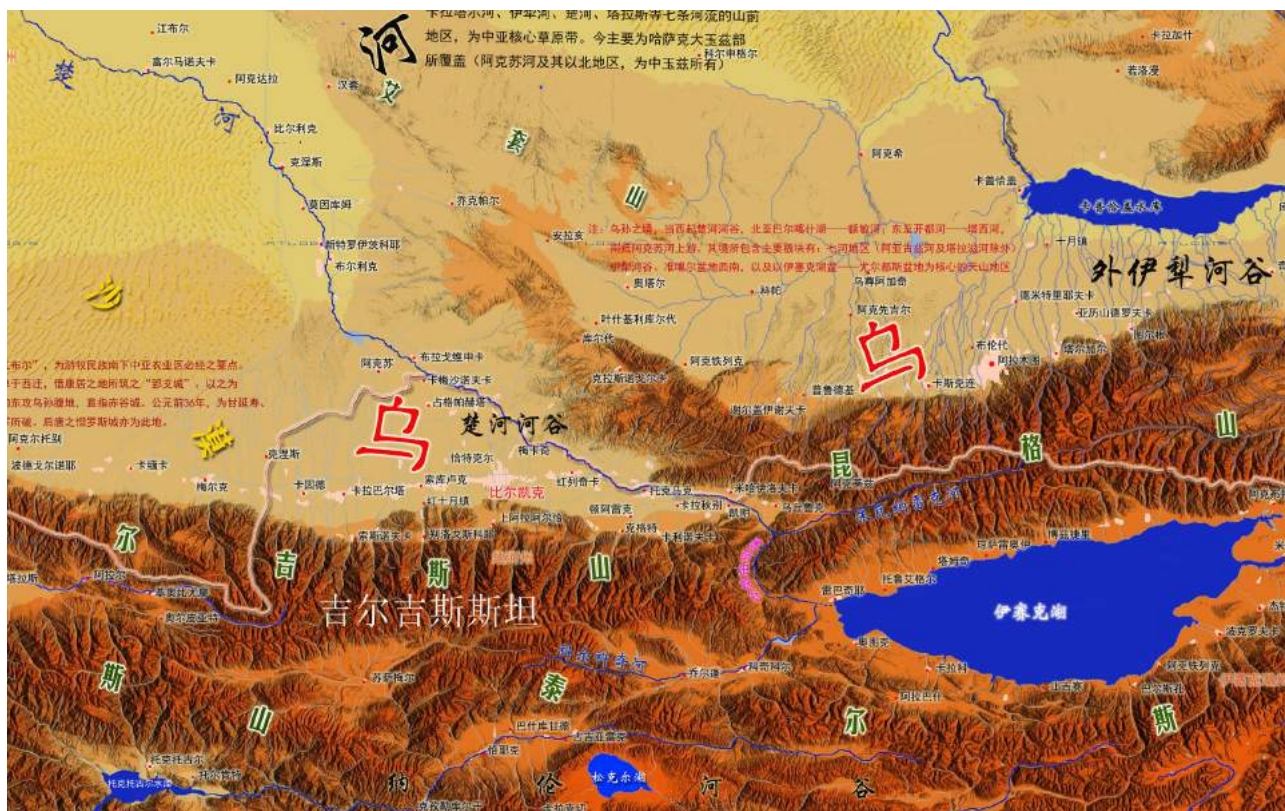
我们先来看看，哪一区域才是我们所指的“楚河河谷”。一般而言，我们会把“河谷”的标签贴在那种两面有山的河流经过之处。如果这一地区周边的山地布局更为圆满的话，我们会更愿意用“盆地”来概括这个地理单元。像费尔干纳盆地和伊犁河谷，就是依这个原则来标定的。以楚河流域的情况来看，显然与伊犁河谷更为类似。为楚河在天山腹地收集淡水的两大上游河流——科奇科尔河、朱瓦纳雷克河，在与伊塞克湖擦边而过，并在天山北麓合流成楚河干流之后，并没有马上形单影只的进入沙漠地带。为伊塞克湖盆围边的“昆格山”，在山体腹地孕育出“朱瓦雷克河”之后，并没有停止为楚河做贡献。其向西北方向延伸的那段山体，成功的与伊塞克湖盆地西侧的吉尔吉斯山包夹出了一个夹角。这意味着在昆格山和吉尔吉斯山的庇护之下，楚河中流地区有机会两面受水，成就一片三角形的冲积扇。很自然的，这片冲积扇会阻止西部沙漠的侵蚀，为游牧民族带来一片水草丰美之地。而我们现在所指的“楚河河谷”，也就是这片得两山庇护的楚河中游冲积扇。

天山山脉每一片前突的山地对山前低地来说，都意味着更多的绿意。而前突山地体量（纵深、高度）大小，也决定了河谷绿洲的体量、人口承载力。从这点上来看，昆格山的前突并不算太明显，楚河河谷的体量也不算很大。不过评判地缘潜力永远不能只看它本身的地理环境，地缘位置总是会显得更为重要。这就好像上海如果没有江、海相接的优势，它至多也只是凭借肥沃的冲积平原成就一个鱼米之乡的小康之地，就像古典时期的其他“江南”之地一样。而因江、海相接之利成为中央之国与世界相连的地缘枢纽之后，上海就有了竞争世界一流城市的资格了。

与上海一样，楚河河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理环境，并不是成就它历史地

位的主因。能在板块沟通上体现枢纽价值，才是提升它地缘地位的主因。如果来往于东、西方的商人能有强大政权保障旅途安全的话，天山北麓连通东疆与中亚的路线，通常会是一个重要选择。与依靠不连贯绿洲补给，并要翻越葱岭的丝绸之路中、南（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线相比，这条后来被称之为丝绸之路“北线”的路线，在地势和沿途的淡水补给上会更有优势。而它的劣势主要在于冬季，如果气温太低并伴随大量降雪的话，那么对来往的商旅同样是巨大的障碍。

不管怎么样，天山北麓的山前地带都有机会因商业而在地缘潜力上获得额外加分。像楚河河谷这样的山前绿洲，自然也是丝绸之路北线的必经之地了。不过，如果你由西而来，在经过楚河河谷，准备选择下一步的方向时，却可以有两个选择：或翻越昆格山西北部的那个前突，进入外伊犁盆地，然后转入伊犁河谷；或顺楚河而上，透过楚河上游两大源头相接处附近的“博阿姆峡谷”，进入气候较为舒适的伊塞克湖盆，然后再东入特克斯河谷（伊犁河谷）。当我们脑海中呈现出一幅“人”字形的交通图后，这一交通网的交通枢纽点在哪，就呼之欲出了。



汉西域全图

我们很难知道，乌孙人有没有试图在楚河河谷中部署常设机构（有也不可能是留不下痕迹的毡房），以管理来往的商旅。而在汉帝国开拓西域时，也并没有试图将控制力延伸至此。对于汉帝国来说，经营对游牧势力来说“食之无肉”的塔里木盆地，会更为安全。不过，当后来李唐王朝凭借所吸收的马上民族基因，为中央之

国又一次的经略西域时，却曾经成功地开拓了丝绸之路“北线”，并将军政力量直接布设到了楚河河谷。而在历史长河中，为华夏文明标示出这个地缘枢纽的，是一座城和一个人：城叫作“碎叶城”，人则是诗仙“李白”。



汉西域全图



碎叶城（阿克·贝希姆遗址）



楚河

尽管现在有很多地方为了名人效应和拉动地方 GDP，在争夺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但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说，从来都是认为“历史没有真相，只有共识”。就好像我在这里写的这些所谓“历史”，能不能成为“历史”，取决于将来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识”。对于李白的出生地来说，现在的共识就是“碎叶城”。当年唐帝国在此建筑的碎叶城（楚河时称“碎叶川”），曾经位列“安西四镇”，也是帝国直接控制力所延伸的最西点。只不过在 19 世纪末，随着俄国人侵入伊犁河谷，楚河河谷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俄属中亚的一部分。

对于李白来说，比较庆幸的是争夺他出生地的“战争”出现得比较晚。否则依据现在的行政区划来定性古人“国籍”时，他很可能被定性为俄国人了。现在的话，持此类想法的人，最多会在心里疑虑，李白是不是应该算是“吉尔吉斯斯坦”人。因为我们所说的“碎叶城”，现在已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了。以伊塞克湖流域等高山牧场为后盾的吉尔吉斯人，顺势渗透楚河河谷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不过在俄国人为哈、

吉两族所做的行政切割中，吉尔吉斯人也并没有得到全部的楚河河谷。对于据有从塔拉斯河到阿亚古兹河低地区（也就是所谓“七河地区”）的哈萨克人来说，不能在楚河河谷这片山前草原立足也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哈萨克人的领地，还向南延伸到了锡尔河下游。失去了楚河河谷，将意味着哈萨克人在东部的山前草原带出现了断裂。在这种地缘背景下，楚河河谷很自然的成为低地带的哈萨克人，与高地带的吉尔吉斯人之间地缘博弈的焦点。

实际上，如果不是选择了主力经营以伊塞克湖为中心的高地牧场，而是游牧于七河地区的话，吉尔吉斯人应该会像其他从蒙古高原迁移至天山北麓的部落一样，成为有共同民族意识的“哈萨克人”的一部分。就像现在哈萨克人中所存在的“乃蛮”、“克烈”等曾经在成吉思汗时代，与之争夺蒙古高原统治权的部落一样。如果天山北麓还是游牧政权统治之地的话，这种部族之间的差异通常也不会被强化，大家会更愿意以一个强大政权名称来共同标示自己的身份。就像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游牧部落，曾经以乌孙、突厥、蒙古等名自居一样。

事实上，在俄国人进入中亚，并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来为中亚居民划分民族属性时，“吉尔吉斯”之名是被贴在现在“哈萨克人”的身上的，而现在的吉尔吉斯人则被称之为“喀拉吉尔吉斯”。仅从这两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我们也能看出二族之间的关联。如果不是苏联后来一定要明确中亚各民族的民族属性，并培养各族的独立意识的话，在山地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和在低地游牧的哈萨克人之间的民族认同差异，会比现在模糊得多。这其实也是中亚民族划分的一个共同特点了。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民族关系，让很多历史名人、名城，成为相互争夺的共同遗产。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从地缘背景上探究出这些民族、行政切割的逻辑所在。

第二节 俄国接收东干人开发楚河河谷

在游牧文化占据优势的古典时期，楚河河谷对于游牧民族的价值，并不见得比伊塞克湖盆地这些高地草场高多少。事实上，这些放牧者会在不同的季节转场于这些高低地牧场中，以让牲畜最大限度的利用牧草资源。不过，当商业、农业，甚至工业因素夹杂进来后，楚河河谷和身后那些高地，在地缘潜力上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

当19世纪末，俄国人开始经营中亚时，楚河河谷和其他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所占据的地方一样，游牧经济还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在已经受过欧洲工业化进程洗礼的俄国人看来，这一点并不令人满意。因为这不仅意味着难以管理，也意味着这片俄属中亚之地，在人口承载力上将不会有太大潜力。与中央之国那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口资源相比，人力不足一直是俄国最大的短板，尤其是相比俄国那急速扩张的巨无霸体量来说。

从战略角度而言，提升人口潜力的最好方法，就是开发土地的农业潜力（农耕）。一亩能够种植小麦的农田，和一亩能够养羊的草场，谁能够提供更多的食物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俄国人甚至不用参考历史经验，或者从中央之国那里学习，仅仅从中亚各族的人口结构就能看出。乌兹别克人因为在费尔干纳以及锡尔河下游转型从事农耕，所获得的人口，甚至超过了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总和。有鉴于此，入主中亚的俄国人，除了竭力和清帝国争夺原有的游牧部落以外，也在尝试让当地经济转型。



东干人

之所以说沙皇俄国和清帝国会争夺游牧人口，是因为在两国正式划定边界之后，这些居无定所的游牧部落，本身也会面临一个选择，到底做哪一国的人？即使自己的传统游牧地没有被国境线一分为二，从地缘关系上和惯性来看，大部分靠近中、俄边境的游牧部落，也更愿意接受中央之国的统治。像现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之所以能够成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就是基于这样的地缘背景。

然而，在土著游牧部落更倾向于东迁之时，沙皇俄国也从中央之国方面得到了意外之喜。而且这次他们所得到的，是最能够帮助中亚转型的农业人口。这支从中国境内迁入的部族，就是在 2012 年奥运会上出过一把风头的“东干人”。也许你在关注奥运报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陌生的名词，但有两名曾经的中国运动员¹，转变国籍后为哈萨克斯坦夺得两枚女子举重金牌的事，相信真正关注过这届奥运会的人，都会有深刻印象。这件未了的公案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交易，又是否符合法律和体育道德标准，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这两位奥运冠军在无法回避中国背景时，哈萨克人掩耳盗铃式的为她们所抛出的民族背景——东干人。

如果能让外界相信两名原籍中国，说汉语比说哈萨克语顺溜千百倍的中国姑娘，是土生土长的哈萨克人的话，那么东干人可能是哈萨克官方、媒体，所能想到的最好身份了。只是对东干人族源略有了解的人，即使不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心中应该也会有所疑虑，为什么她们二人的口音明显是带着湖南和东北方言的味道？假如

——

1 指马内扎（东北人姚丽）和祖尔菲亚（湖南人赵常玲），两人在 2012 伦敦奥运会中夺得金牌，面对国内对其国籍的质疑，哈萨克斯坦方面称其为东干人。

你现在去中亚旅游，尤其是到楚河河谷的话，的确很有可能会碰到说汉语的东干人和你打招呼。不过要是你能带有陕西一带的口音来打招呼，应该更让对方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因为所谓的“东干人”，就是19世纪末从陕西、甘肃一带，迁入中亚的穆斯林。

一切的一切，源于19世纪末那场西北之乱（具体可百度“陕甘回乱”，或白彦虎）。从不同的角度来为这场血腥动乱定性的话，不同的人可以为之贴上起义、暴乱、种族仇杀、圣战、阶级反抗等不同标签。这些带有主观和政治色彩的定性，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我们所关注的，是这场动乱对于中、俄两国局部地缘结构的影响。从中央之国的角度来看，这场动乱一定程度改变了陕西、甘肃两省的民族结构。尽管从绝对人口损失来看，汉族在这场动乱中损失要大得多。但当动乱的组织者明显以宗教、民族来界定敌我时，失败后被以同样的标准进行清洗也就在所难免了。也就是说，这场动乱实际上缩小了伊斯兰文化在中央之国核心区西北部的覆盖范围。当一场动乱演变成一场无法调和的族群之间的战争之后，失败者唯一的选择，就是远走他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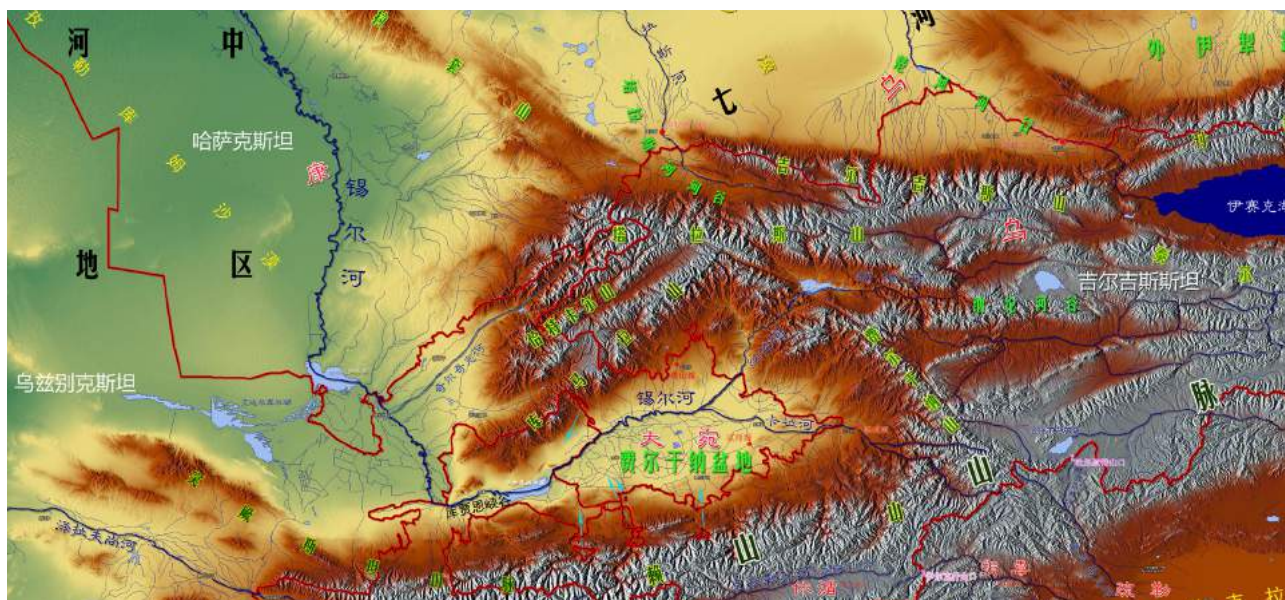
对于迁徙的穆斯林来说，无论是从宗教文化还是远离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角度来看，向天山一线西进都是唯一的选择。而在穿越河西走廊后，地广人稀的准噶尔盆地西南部是他们最初的选择。由于当时的南疆地区已经被从费尔干纳盆地渗透而来的“浩罕”贵族所控制（阿古柏在南疆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准噶尔盆地除少数据点以外，也已经处于叛乱状态。内忧外患的清帝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力。

在面临失去整个西域的危险之时，北京城里的决策者们却对于是否要收复西域产生了犹豫。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于清帝国来说，更为现实的压力来自于太平洋。那些跨洋而来的西洋人、东洋人，凭借他们在海上的优势，不仅觊觎帝国富庶的东部沿海地区，更直接对渤海之侧的京——津地区构成威胁。这使得中央之国所面对的地缘压力，在战略方向、技术形态上出现了质的变化。传统上对帝国核心区构成威胁的蒙古高原、东北地区，已经不再是地缘威胁的来源地了。尤其是在清帝国凭借自己的马上基因，开拓性的把蒙古高原诸部纳入帝国体系后。

在这种地缘变化下，西域的地缘价值，就似乎没有游牧、农耕文明对抗时期那么高了。最起码身处帝都的决策者们，不认为西域会有机会和蒙古高原再结合成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直接威胁到自己所处的华北地区的安全。有鉴于此，在帝国实际失去对西域的控制力之后，中央之国到底是应该倾力应对来自东部的海上压力；还是应该按照传统地缘战略，力求将西域稳定在中央之国的版图内，就成为一个问题。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清帝国还是选择继续经略西域。这当中所经历的种种波折和博弈，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亦不是今日之重点。不过有一个地缘政治层面的考虑，是肯定对最终的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的。那就是，尽管蒙古高原的

游牧民族不再对中央之国核心区构成直接威胁了，但这并不代表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北方就变得更加的安全了。事实上，掌握了工业技术的俄国人在占领中亚、西伯利亚，乃至外东北地区后，对中央之国的威胁要比传统的游牧部落联盟更大。如果中央之国最终决定放弃西域的话，那么天山以北的伊犁河谷、准噶尔盆地不可避免的会落入俄国手中。那样的话，这个来自欧洲的巨无霸帝国所威胁到的就不仅仅是蒙古高原的安全了。就地缘安全来说，中央之国除了担心东北地区被俄国人进一步渗透之外，在河西走廊这片核心区，也同样要面临强大的对手。



西天山北路地缘结构图（西汉）

正是这些地缘背景之下，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最终收复了整个新疆。而之前乘乱帮清帝国“代管”伊犁的俄国，也被迫吐出了包括大部分特克斯谷地在内的半个伊犁河谷。而对于那支后来以“东干人”（从东边而来的人）自称的移民来说，当整个天山南北都被中、俄两国无缝对接后，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而极度需要人力资源的俄国，对于这群前来投奔的移民也抱以了极大的热情。尤其是这些来自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东干人，还掌握了俄国开发中亚所急需的农业技术。对于俄国人来说，这些能够帮助他们提高土地产出的农民，会比那些粗放利用自然资源的游牧部落更有价值。他们甚至允许这些来自中央之国说着汉语的穆斯林，在自己所控制的中亚地区挑选自己的聚居区，并做出四十年不抽税，四十年不抽丁的承诺。

单从农业开发的角度来看，费尔干纳盆地及其以西地区会更加有潜力。而在白彦虎所带领的东干人投奔俄国之时，俄国人已经由七河地区南下，攻灭了控制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流域的浩罕国。问题是这些地区的农业潜力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开始开发了。换句话说，这一带的大部分土地已经被土著居民进行过农业开发了。相反，之前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所游牧的中亚北部，绝大部分土地却

是未及农业开发的处女地。在这种情况下，既不缺水，也不少温的楚河河谷，以及其南部的塔拉斯河谷，就成为这些“从东边而来的人”的主要聚居地了。时至今日，这些分批进入中亚，总人数约 1.5 万的东干人（1884 年统计数据，除陕甘回民以外，还包括部分由新疆地区带入的回民），族群规模已达 13 万人。

东干人的到来，可以说是俄国规模性开发中亚北部农业的开始。不过对于这些掌握了工业技术的俄国人来说，在中亚的游牧之地进行一场“农业革命”，只是他们经营中亚的开始。如果要想让中亚的资源融入帝国体系内，那么让中亚在帝国的工业结构中占据一席之地，就是必须的了。只不过这一进程，最终是由让俄国工业化程度出现质的飞跃的红色帝国——苏联来完成的。

从工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拥有丰富水资源和更广阔开发空间的低地，仍然是优先选择。也就是说，无论进行农业开发，还是工业建设，楚河河谷的优势都要大于它身后天山上的那些板块。而楚河河谷在交通区位上的优势，更加拉开了它与那些高地板块之间的差距。这些优势综合起来，让绝大部分国土都在天山之上的吉尔吉斯斯坦，选择了将首都放在楚河河谷中的比什凯克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最终被划入吉尔吉斯斯坦的低地，仅仅是天山北麓以楚河河谷为核心区的低地的话，那么整个吉尔吉斯斯坦内部的地缘结构，应该说还是相当稳定的。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个高山民族（吉尔吉斯的意思，本身就有“山里游牧之人”的意思）在另一个方向所打拼出来的一条狭长低地带，却为这个国家的内部分裂埋下了种子。至于这片低地带在哪里，有什么样的地缘特点，吉尔吉斯斯坦内部又是按照什么样的地缘分割线割裂成两部分的，我们接后面再接着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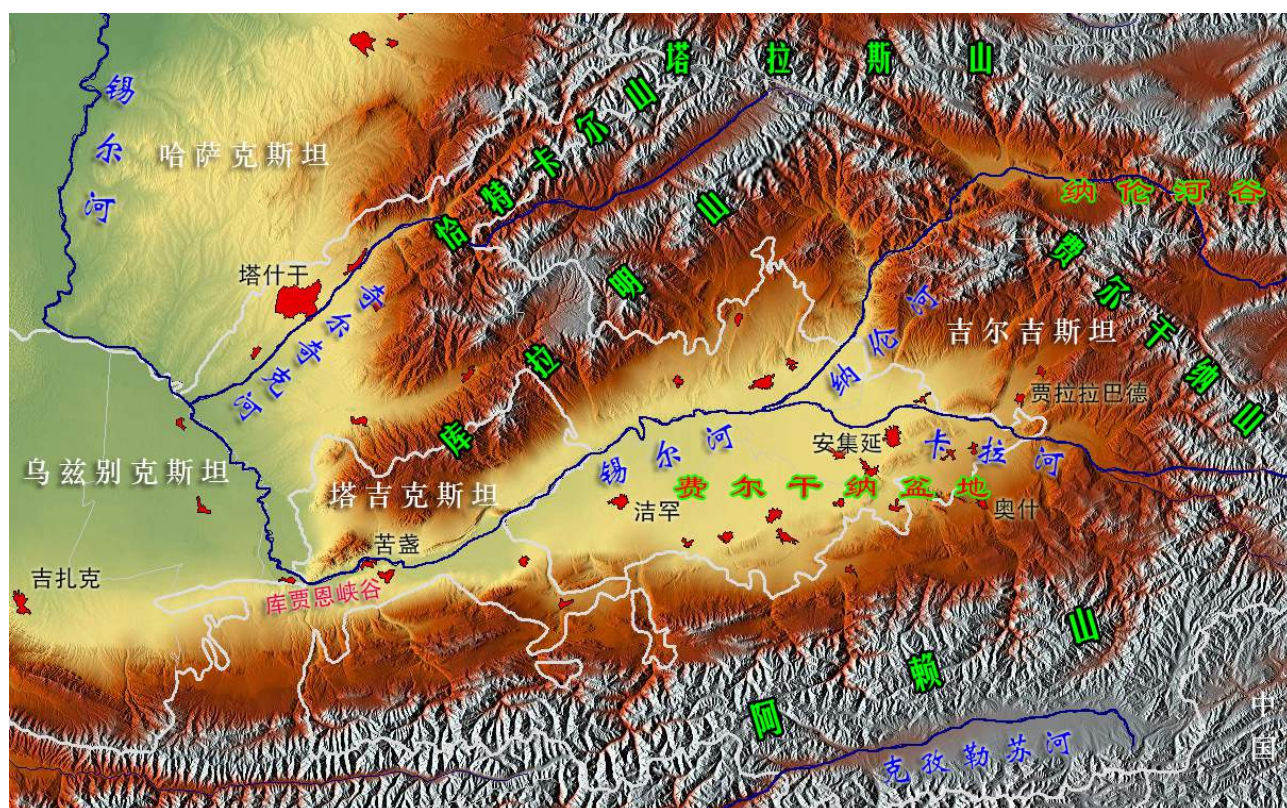
第三节 费尔干纳盆地的复杂形势

通过之前的解读，大家应该会有一种感觉，即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领土差不多相当于乌孙国的南半部了。最起码，我们之前所解读过的楚河河谷、伊塞克湖盆、阿克苏河上游河谷，这几个现在隶属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理单元，在两千多年前，也同样完全由乌孙人所控制。至于纳伦河谷，我们很难确定乌孙人是否能够完全控制它。不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版图上，纳伦河谷倒的确是由吉尔吉斯人所据有。由于吉尔吉斯人的努力，以及当年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些做法。吉尔吉斯斯坦在西线上的渗透程度，要比当年乌孙人更远。

吉尔吉斯人在纳伦河谷以西所扩张的领土，如果要用一个地缘标签来概括的话，那就是“环费尔干纳盆地地带”。就“盆地”的概念来说，狭义的理解是仅指腹地的低地（平原、丘陵）；广义的理解，还应该包括周边围就盆地的分水岭内侧的山地。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盆地都是广义的概念。

相信任何一个在地图上看过乌兹别克斯坦地图的人，都会对它东部那几乎被吉

尔吉斯斯坦所包围，还差点被塔吉克斯坦封门的悲剧结构，印象深刻。事实上，如果你看的是地形图，这种悲剧感一定会变得更深。如果仅以狭义的概念来理解费尔干纳盆地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认定这片腹地就是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至于吉尔吉斯斯坦，它所占据的费尔干纳盆地，在结构上显然要更丰富些。不仅围就盆地的恰特卡尔山——库拉明山、费尔干纳山、阿赖山，大部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掌握中。它的版图甚至还渗透到了费尔干纳盆地腹地的低地边缘。相当于沿着乌兹别克人所控制的腹地，环切了一个反“C”形包围。



费尔干纳盆地示意图

如果不是为了给乌兹别克斯坦留个口打通锡尔河下游与费尔干纳盆地部分国土之间的联系。乌兹别克人很可能一点山地都拿不到了。当然，其实乌兹别克人本来也可以不要一点山地，完全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低地国家的。因为费尔干纳盆地并不像伊塞克湖盆那样，看起来那么完整。它的西部有一条宽阔的通道——库贾恩峡谷，供锡尔河河水流出费尔干纳盆地，向西奔向沙漠腹地。只不过，我们后面就会解读到，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所控制的费尔干纳盆地来说，如此重要的一条战略通道，却是属于塔吉克斯坦的。而塔吉克斯坦在费尔干纳盆地那富庶的低地带“分一杯羹”的后果就是，乌兹别克人的国土被天山支脉“库拉明山”一分为二了。相信这样的地理结构，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出地缘分裂的风险了。

对于乌兹别克人来说，内部分裂的风险还不是最大的地缘问题。“环费尔干纳

盆地地带”大部分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领土，才是最大的问题。这意味着，乌兹别克斯坦在几乎所有的锡尔河上游补水区，包括锡尔河两大上游支流的高地区——纳伦河与卡拉河，都没有发言权。这意味着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部领土，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角度来看，都时刻处在不安全状态。

如果当年俄国人没有从旁介入，而是放任中亚民族内部博弈的话，相信中亚各国之间的行政边境会符合地缘规律得多。只不过，相应的代价也会很高。种族屠杀、强制迁徙之类的问题，似乎无法避免。然而苏联那看似尊重既有的种族分布和兼顾地缘平衡的分配方法，在拥有强势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并没有太大问题。比如上下游排洪、灌溉的问题，就很容易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寻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案。只是当中亚被分割成五个独立国家后，在本国利益至上的外交理念指导下，此类协调就变得异常艰难了。

事实上，不考虑中亚各国之间爆发地缘摩擦的风险，仅从内部结构的角度来看。苏联为中亚各国所设计的领土结构，也是危机重重。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因为地理结构原因，被分割成二到三个地缘属性差异甚大的板块。可以这样说，内部不和，甚至分裂的风险无处不在。我们现在正在解读的吉尔吉斯斯坦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内部地缘割裂的风险，并不低于看上去更容易分裂的乌兹别克斯坦。

第四节 吉尔吉斯斯坦的南北分裂危机

对于吉尔吉斯人来说，如果他们在俄国人安排下，仅仅得到大部分的楚河河谷，并以此为地缘中心控制身后高地的话，政治家们现在的烦恼应该会少很多。因为以楚河河谷的地缘优势来说，包括伊塞克湖盆地在内的高地板块，并没有能力与之竞争。反过来，双方之间却很容易达成类似城市——农村组合式的互补关系。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吉尔吉斯斯坦在费尔干纳盆地获得的并不仅仅是外围的高地，还包括与之相对应的“C”型低地带。鉴于费尔干纳盆地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这条低地带尽管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土内所占的比例很小，但环费尔干纳盆地的那些山前低地（丘陵、河谷、平原），却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土当中农业条件最好的板块。如果说天山北麓的楚河河谷还在等到俄国人入主之后，才开始用国家干预的手段进行规模性农业开发的话，那么这条环费尔干纳盆地低地带的农业历史，就要长得多了。

放在古典时期，有这样一条低地带的存在，意味着高山之上的吉尔吉斯牧民不需要向外族交换，就可以获得生活所需的农产品。相应的，这条环费尔干纳盆地低地带也将为吉尔吉斯斯坦承载更多的人口，以及在地缘政治中承担更重要的地位。要是吉尔吉斯人自己有更多期待的话，他们在费尔干纳盆地外围所渗透的桥头堡，甚至有可能成为政治中心所在。这就像当年满洲人虽然生长于白山黑水之中，但当他们从部落联盟进化到“国家”形态时，拥有农耕基础的辽河下游平原，就成为后

金国的核心所在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并没有给吉尔吉斯人以时间去向低地纵深发展。

而俄国人成为中亚的主人之后，带给中亚各族的也不仅仅只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结构、民族划分，更有着工业技术的输入。从发展工业的角度来看，它所使用的土地很大程度和农业用地是重合的。平整而又不缺水的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的最爱，也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从整体环境来看，以费尔干纳盆地的自然条件发展工业的话，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从俄国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并不认为费尔干纳盆地那得天独厚的农业环境需要特别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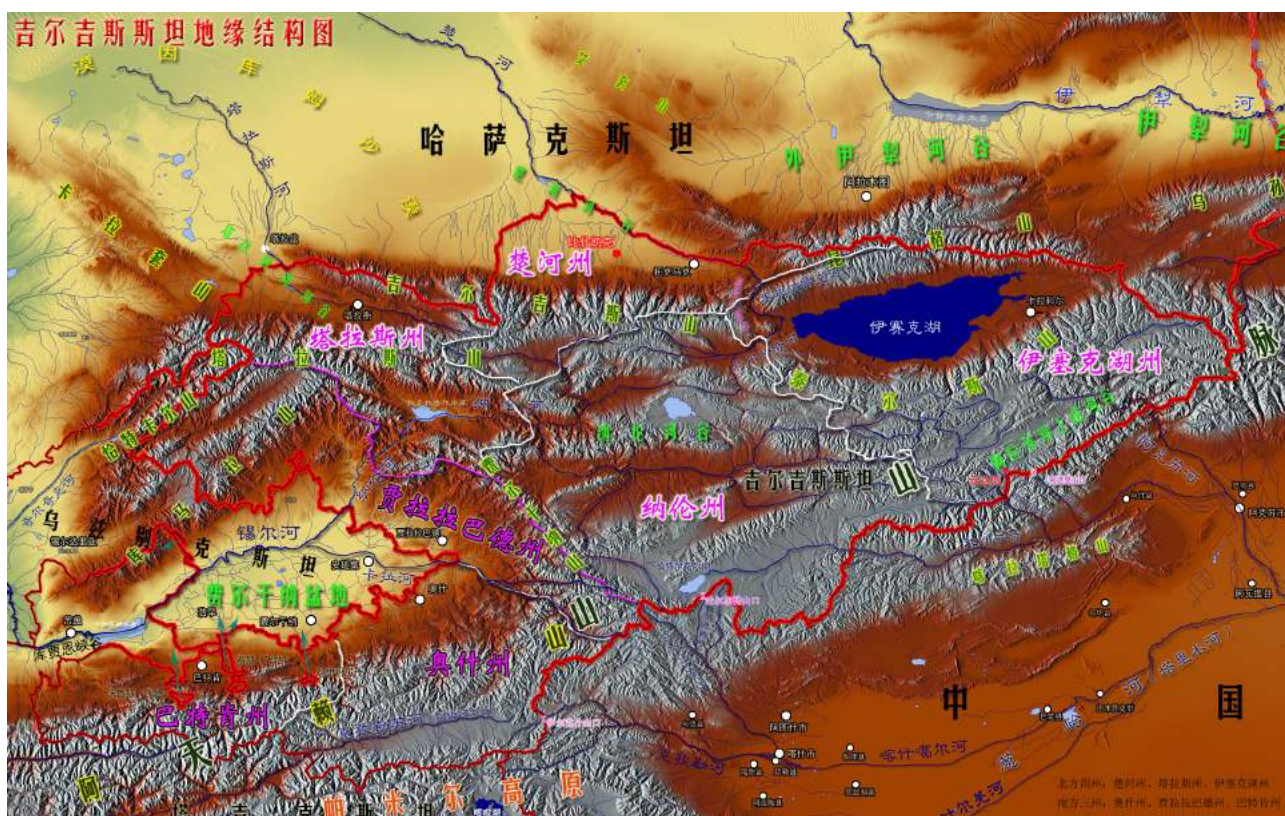
对于整体上缺乏人力的中亚地区来说，类似费尔干纳盆地这样的板块不仅能够带来更多的粮食，也能为帝国补给更多的人口。因此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后来的红色苏联，他们在费尔干纳盆地以及适合农耕的河中地区，做的更多的是加强当地的农业属性。通过兴修大坝、水库、运河等水利设施，最大限度的利用那些天山之水种植农作物。至于为中亚发展工业的任务，就交给那些农业基础相对较差的低地了。具体到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就是境内的两条重要低地带：环费尔干纳低地带与楚河河谷，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结构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地缘使命。前者继续依赖上天赐予它的自然条件，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粮仓所在；而后者则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工业中心。

楚河河谷能够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工业中心，河谷内的“比什凯克”城能够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并不仅仅是因为它那相对较差的农业条件所带来的后发优势。能够在政治、经济结构中承担主导作用，更多的是源自于楚河河谷的地缘枢纽地位。即使只从经济的角度对比，楚河河谷在物流、交通上的优势，也足以让它比被封闭在费尔干纳盆地边缘的天山西麓低地，更容易受到资本的青睐。换句话说，即使不是计划经济的苏联人来负责吉尔吉斯各板块的内部分工的话，楚河河谷和环费尔干纳低地带在吉尔吉斯斯坦内分别承担工业、农业中心的命运，也很难改变。

毫无疑问的是，尽管吉尔吉斯人在古典时期的原始属性，是以山地牧场为根本的游牧民族，但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最重要的却是南北两块低地。而占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土绝大部分面积的高山地带，在行政、政治话语权上更多的是处于从属地位。我们甚至能够很明确的为这个高山之国，在天山上划出一条地缘分割线来。事实上，这条地缘分割线已经很明显的存在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行政版图上了。

除了纵深广阔的纳伦河谷（仅指上游河谷）以外，其他流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河流，以及它们所依附的山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行政上被分割为了三个州：即北部包括恰特卡尔山——库拉明山山地大部，以及对应山前低地带的“贾拉拉巴德州”（不是新闻里经常听到的阿富汗城市）；中部包括费尔干纳山分水岭以西地区，以及阿赖山东段北部的“奥什州”；最西南部则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西南角的“巴特肯州”。

说到这个“巴特肯州”，其结构倒是非常奇特。在1999年10月13日之前，它还是奥什州的一部分。不过它的奇特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年轻，而在于该州境内有四块飞地，其中三块隶属于乌兹别克斯坦。最西侧一块，则归属于塔吉克斯坦。不用说，这种让人抓狂的结构，又是苏联人当年内部平衡的结果（比如最东侧那块叫“沙伊玛尔丹”的飞地，据说当年就是为了给乌兹别克人找个山地度假区，而划给乌兹别克斯坦的）。不管当年俄国人这样做，到底有没有让中亚各民族共和国互相牵制的意思在里面，他们给中亚各国留下的犬牙交错，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行政结构，足以让中亚各国花几十甚至上百年来消化了。



吉尔吉斯斯坦地缘结构图

怎么管理那些飞地，成为中亚各国头痛的问题，相关的置换方案也经常加以讨论。不过相比国家内部分裂的风险，这些看起来不那么美的飞地，就算不上大问题了。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甚至可以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上，明确看到这条内部分裂的地缘分割线。当我们把视线停留在贾拉拉巴德州与奥什州的东部边界上，并对照相关的地理参照，相信这条地缘分割线就已经呼之欲出了。它就是费尔干纳盆地的东部边界“费尔干纳山”的分水岭，以及恰特卡尔山——库拉明山与塔拉斯山的分水岭。而这条地理分割线，所隔离出来的环费尔干纳盆地存在的三个州，被称之为“南方三州”。相应的，以楚河河谷所在的“楚河州”领衔的，包括塔拉斯河上游河谷的“塔拉斯州”、伊塞克湖盆所在的“伊塞克湖州”、纳伦河谷所在的

谷的“纳伦州”，就是“北方四州”了。

其实，如果我们不清楚楚河河谷在北方乃整个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缘地位，只是按照上述地缘分割线来切割吉尔吉斯斯坦的话，大家可能会认为双方应该被贴上“西部三州”和“东部四州”的标签了。不过，当我们了解了低地的核心地位后，吉尔吉斯斯坦的所谓南、北之争就能够理解了。只是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仅仅是双方在工、农业的侧重点不同，就足以造成内部分裂的风险了吗？当然没那么简单。从地缘角度来看，最起码还有两个原因直接造就了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对立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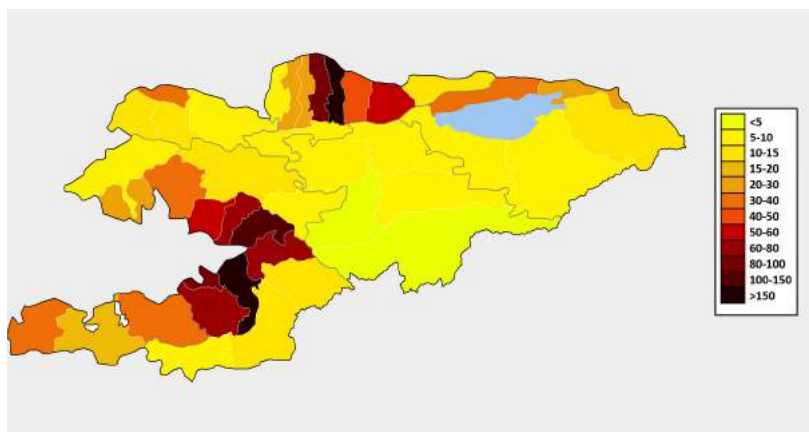


吉尔吉斯斯坦行政区划图

首先从地理联系来看，吉尔吉斯斯坦一南一北的两条核心低地带，要想跨越之间的高地区沟通是十分困难的。无论是楚河州的居民想到费尔干纳去旅游，还是生活在南部低地的居民想去首都比什凯克，沿天山山麓围着费尔干纳盆地北部那片山地绕一圈，难度都会更低。只是要想经过这样一片山前低地沟通吉尔吉斯斯坦南北的两个核心低地区，你必须穿行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个国家。即使没有这些地缘政治上的障碍，仅从地理联系来看，这种相隔几个地理单元的绕行，也足以让二者的地缘关系变得疏远。其实如果吉尔吉斯人还维持原始的游牧生活状态的话，南北两片低地之间的交流问题，并不会那么突出。山地牧场的核心地位，足以让吉尔吉斯人以山地为核心，辐射边缘低地。现在的话，在经济上不可避免边缘化的山地区，注定不能承担联系纽带的作用了。

地理上的分割，并不总是会造成势均力敌的分裂状态。如果一方实力够强的话，即使一方在地理结构上完全与核心区分离，通常情况下也不会造成分裂的风险。比如美国人就不必担心夏威夷会有从美国分裂出去的风险。从面积上来看，所谓“南

方三州”所占据的不过是吉尔吉斯斯坦西部，那包含两个突出部的反“C”型地带，似乎很难对抗土地面积上占绝对优势的北方四州。但请不要忘了，衡量实力最重要的指标并不是国土面积，而是能有效承载人口的国土（想想澳大利亚、西伯利亚、加拿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方三州那条低地农业带，所能承担的人口要远高于楚河河谷。在吉尔吉斯斯坦 550 万的人口当中，有接近一半的人口（约 260 万）生活在南部地区（主要是低地带了）。



吉尔吉斯斯坦人口密度图

差不多各占一半的人口结构，加上明显的地缘分割线，吉尔吉斯斯坦内部的地缘分裂风险，在苏联时代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为了平衡双方的矛盾，俄国人甚至采取让南北地区轮流出任总统一职的办法（北方核心楚河州，以及南方核心奥什州）。而在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北方出总统，南方出总理也成为

一个惯例。只是在“民主”政治的大旗下，之前依靠俄国人威权治理而维持的平衡状态，已经变得十分脆弱了。任何矛盾，尤其是事关每一个人生存的经济问题，最终都有可能演变为依地域划分敌我的对抗。而这还不是吉尔吉斯斯坦所面临的唯一问题，在南方三州内部，同样面临着另一种性质的分裂风险。至于这个风险是什么，是否仅仅作用于吉尔吉斯斯坦内部，我们下一节再解读。

第五节 吉尔吉斯斯坦南方的民族问题

如果说吉尔吉斯人在经营天山牧场，以及与哈萨克人争夺楚河河谷时，还要等到俄国人来为他们的游牧生活引入农耕基因的话，那么向西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边缘的那些吉尔吉斯人，就不用这么麻烦了。费尔干纳盆地几千年来的农业传统，已经足以让他们改变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了。事实上，这也是两千多年来，基于地缘环境而形成的宿命。一个民族必须适应一片土地的生产方式，才能够真正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否则即使在政治上取得一时的胜利，最终也不过是历史的过客。这一规律在东亚核心区的历史中，也已经无数次的得到验证了。

与已经稳定培育出这个星球上最稳定、最大规模农业文明的东亚核心区不同的是，生存在天山南北各绿洲的农业民族（部落），本身都带有强烈的游牧基因。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由游牧到此的欧、亚部落不断的与原住民融合而形成的。由于这

种游牧基因的不断导入，以及身处游牧势力的阴影之下，天山南北的农、牧部族有机会拥有共同的文化记忆，甚至于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曾经最早在整个天山南北建立统一政治体的“突厥”，是这个文化记忆可以追溯到的起点。而彼此之间略有差异的语言（突厥语），则成为寻求共同民族归属感的核心纽带（塔吉克人在这方面是个另类，我们后面会解读为什么）。

问题是，即使拥有共同的文化记忆，并有形成更大民族共同体的欲望，在欧亚大陆腹地再现突厥帝国的荣耀，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就中亚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来说，即使抛开那些难以理清脉络的融合过程不说，单就生产方式来说，中亚也被“南农北牧”的分为两块。在古典时期，向北渗透楚河河谷，并不会给吉尔吉斯人带来生活方式改变的风险。但向南渗透费尔干纳盆地，这种风险就无法避免了。



吉尔吉斯斯坦卫星图

尽管农耕文明看起来比游牧文化更为先进，但这并不影响游牧民族为自己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更贴近自然的生存状态而感到自豪。几乎每一个在类似费尔干纳盆地这样的绿洲附近游牧的部落，都会为自己的游牧文化感到骄傲，并鄙视那些定居者。在突厥语中，这

类定居者通常被称之为“撒尔塔人”（sart，也有译为萨尔特人的）。问题是，每一个曾经鄙视过定居者的部落，一旦自己入主这些绿洲，并受客观环境影响定居下来的话，也同样会被其他仍坚持游牧的部落所鄙视，并称之为“撒尔塔人”。

在历史上，曾经有非常多的民族被游牧者称为“撒尔塔人”过（所以撒尔塔之名，与其说是民族之名，倒不如说是指定居者）。以这个规律来说，如果在山地游牧的吉尔吉斯人最终在费尔干纳转型成功的话，那么也同样会被北方游牧者称之为“撒尔塔人”，并与比他们早一步定居于此的民族融合。依现在的民族划分来说，这些会被吉尔吉斯人鄙视，又有可能融合掉他们当中的渗透者的“撒尔塔人”，就是乌兹别克人。可以肯定的是，当年苏联人在甄别哪些中亚居民应该被归入乌兹别克族时，是否定居在连续的农业地带是最重要的标准。只不过要给这支占据了中亚大部分农业用地的民族，找一个准确的族源就很难了。

如我们前面所述，这些土地的农业潜力已经开发了两千多年，每一个时代都有

新的游牧基因加入。真要追根溯源，看看哪一民族最有资格说自己是费尔干纳及中亚南部的土著的话，塔吉克人要有资格得多。从种族上看，现在退守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一带的塔吉克人，才是当年那些最早开拓中亚之地的欧洲游牧民族的后裔。也正是因为基于此，塔吉克人所操持的语言与伊朗高原上同样保持纯正欧洲基因的波斯人更为接近。这也使得它们在与黄白混种的突厥中亚相邻时，显得更为独立。



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族聚居区



乌兹别克人

可能在那些边缘板块出现大规模民族杂居的情况。在最终划入吉尔吉斯斯坦的“环费尔干纳盆地低地带”，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些还带有山地游牧记忆的吉尔吉斯人，在还没有和乌兹别克人融合之前，就被红色苏联强化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这种情况下，以游牧、定居来划分彼此身份的标准，暂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鉴于乌兹别克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强势地位，俄国人并没有把进入“环费尔干纳盆地低地带”的吉尔吉斯人划给乌兹别克斯坦，而是把这些民族相杂的区域交给了吉尔吉斯人来管理。

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也有一定道理。毕竟境内山地比例过大的吉尔

其实古典时期的中亚各部，民族界限是很模糊的。以血缘、语言为纽带的部族标签，通常会更容易成为身份的证明。但自从苏联人将之划分为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五族之后，中亚各部之间原本并不太明确的民族界限就变得清晰了。尤其是在五个民族国家独立之后，大家更有机会各自塑造自己的民族，并为自己的民族整理历史。然而在身份证明上，为每一个人划定民族身份是一回事，为各民族国家划定行政边界又是一回事。因为在游牧与农耕文化交织，并不断有外来部落迁入的中亚，无论你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民族，都不可避免的在一些板块相接处出现犬牙交错的杂居情况。

这种情况，除非你在划分国家时采取转换土地式的人口迁移手段（比如印巴分治时），否则很可能

吉斯斯坦，内部需要一个粮仓来补充人口。问题是，这种政治上偏向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做法，却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南部稳定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因为在自然渗透状态下，吉尔吉斯人并没有真正如现在的国境线那些，在费尔干纳盆地腹地环切出一条低地带来。在南方三州的人口当中，有差不多一半的人是乌兹别克人。



乌兹别克族逃离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南部骚乱）

政治统治而产生动荡时，生活在南方三州的乌兹别克人，总是会比北方的那些吉尔吉斯人，更容易受到冲击（2010年的南部骚乱中，就有十万乌兹别克人逃往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边境）。

南北地缘矛盾，以及南方突出的民族矛盾，让吉尔吉斯斯坦的内部结构变得更加破碎。说起来，当年西迁的“东干人”，应该也看到了在这片成熟的农业之地上，与土著民族争夺耕地的风险（对于他们来说，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两族都是土著了）。曾经有一部分东干人进入了奥什，不过后来大都又转往楚河河谷了。相比之下，楚河河谷这片曾经地广人稀的游牧之地，才是东干人的机会所在。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吉尔吉斯人这些基于地缘结构而引发的结构性矛盾，应该都很难解决。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能是做一个旁观者，静观其变了。说起来，当年的乌孙人，就没有这些烦恼了。坚持以游牧立国，并时刻警惕北方威胁的他们，并没有试图向更南的地区渗透。能够将楚河河谷这片具有地缘枢纽价值的低地控制在手，已经足够让他们满意了。当然，如果他们一定还想要再扩张自己的游牧之地的话，也并非没有空间。楚河河谷之南的“塔拉斯河谷”，是另一片可以期待的水草丰美之地。即使不再向南，顺着楚河而下的乌孙人，也有机会发现另一片游牧空间。

只不过由于游牧民族进入中亚的历史已经很长了，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一片土地是无主之地。乌孙人如果想继续做大自己的游牧版图的话，肯定会面临竞争者。以乌孙人入主伊犁河谷的经历来看，被他们赶走的月氏人，应该会最有可能成为乌

鉴于乌兹别克人在整个费尔干纳盆的优势地位，这些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乌兹别克人，有带着自己世居的土地加入乌兹别克的想法，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而要让吉尔吉斯人放弃这条有法律保障的国境线，也是不可能的。双方接近 1:1 的人口比例，只会让博弈的局面变得更复杂。也正因为如此，每当以奥什市为核心的南方地区，因不满北方地区的政

孙人开拓新领土的对手。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为了摆脱乌孙、匈奴联盟的追击，月氏人要跑得更远一些（月氏与这两族的仇太深了）。而真正在乌孙人西南部与之邻的，是另一个由欧洲游牧民族建立的部落联盟——康居。

第六节 康居控制塔拉斯河谷

当我们解读完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缘结构后，应该有朋友发现了一个地理单元似乎被我们忽视了。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行政版图上，这个地理单元虽然体量不大，但也因其独立性而建制了州一级的行政区，这个行政区就是“塔拉斯州”。而塔拉斯州的核心地理标签则是“塔拉斯河谷”，之所以说是核心地理标签，是因为在行政区域上，纳伦河中游河谷也被划入了塔拉斯州（楚河州也带了部分纳伦河流域）。就现在的经济结构而言，这个位于高山之上的地理单元，为塔拉斯州所做的贡献，主要是体现在水力发电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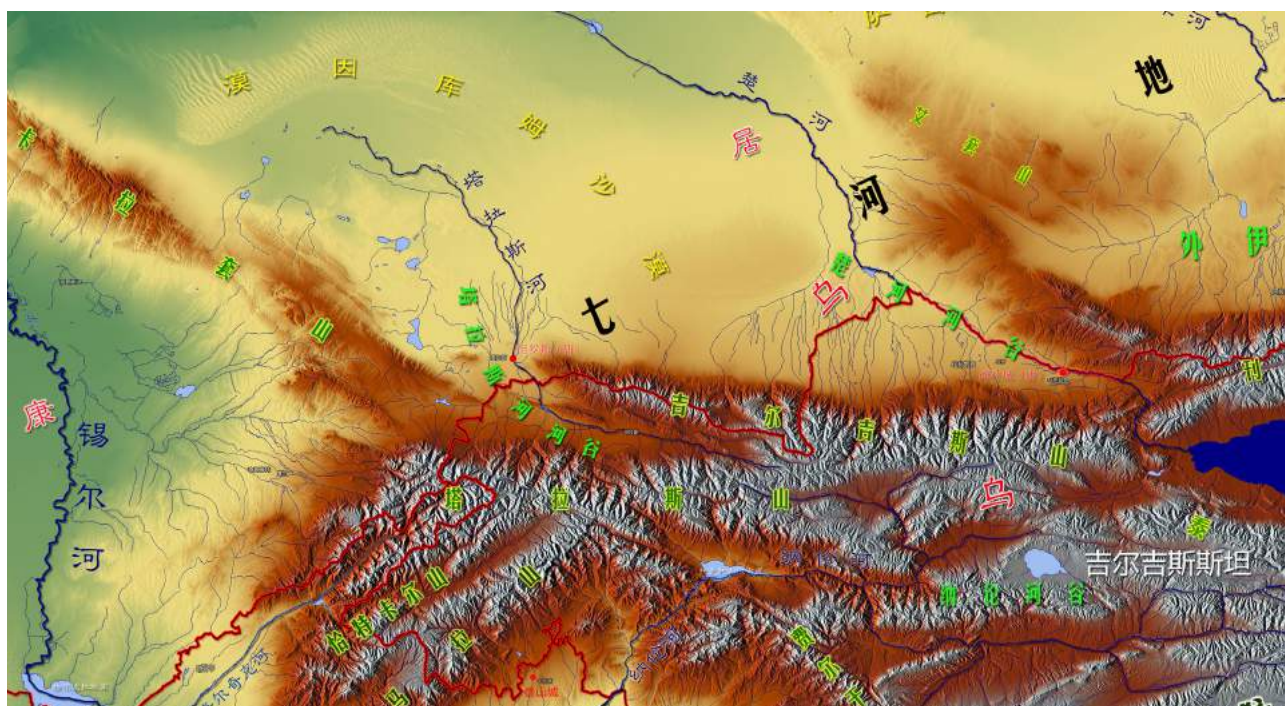
从地理结构上看，塔拉斯河的条件并不比与之隔沙漠（漠因库姆沙漠）相望的楚河河谷更好。昆格山向西北方向延伸的那段山体，让楚河有了两面受水的机会。相比之下，塔拉斯河所依附的那段天山山体，就要中规中矩得多了。为之集水的吉尔吉斯山、塔拉斯山之间并没有太大间隔，也就无法为塔拉斯河在低地谋取更大的冲积扇了。这一点仅从两河在沙漠腹地所延伸的距离也能看出。很明显，楚河在沙漠中所打拼出的狭长绿色地带，比塔拉斯河要更多。然而这一点，却并不影响塔拉斯河冲积扇在丝绸之路北路交通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于那些沿山前草原、绿洲前行的商人来说，每一条从天山流淌出来的河流都是弥足珍贵的。塔拉斯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体量，加上它的位置，无论从游牧还是控制商路的角度来看，都使之和楚河河谷一样，成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在近现代的地缘政治结构中，能够争夺塔拉斯河谷的，就是那两个因高、低地差异而分为两个不同国家的民族：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了。如果说在楚河河谷的分配问题上，俄国人多少照顾了吉尔吉斯人的话，那么在塔拉斯河流域的分配上，两国的国境线的走势就更贴近于高、低地的地理分割线了。也就是说，吉尔吉斯人的“塔拉斯州”，其核心部分的只是吉尔吉斯山脉与塔拉斯山脉之间的“塔拉斯河上游谷地”。而地缘位置上更为重要的山前冲积扇，则基本上划给了低地游牧民族——哈萨克人。

从吉尔吉斯斯坦内部的地缘结构来看，尽管同处天山北麓，但塔拉斯州并没有机会挑战楚河州的地缘中心地位。而是作为吉国“北方四州”的一员，在地缘政治上接受同处北方阵营的楚河州领导。这很大程度上与吉尔吉斯斯坦在塔拉斯河流域的低地上，没有获得足够纵深有关。没有低地纵深，以及地理结构的相对封闭，使得楚河州在获得政治、工业双重扶植的时候，塔拉斯州的农牧业仍然是其支柱产业（哈

萨克斯坦部分就有很强的工业基础了）。

如果吉尔吉斯斯坦当初能在塔拉斯河的山前低地获得更大纵深的话，那么它的“塔拉斯州”应该在经济、政治结构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了。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塔拉斯河流域能够纳入我们的视线，其核心价值也正在于它的山前低地。因为对于古典时期行走于丝绸之路的商旅、军队来说，山前冲积扇才是最有价值的补给点。即使是要与山地游牧部落进行交易，也多是在能够连接上游谷地与山前低地的交通枢纽点上进行。很自然的，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即使是不习惯于定居的游牧民族，也有可能考虑到要在这样的山前低地上，构筑一个永久性的定居点。在我们所解读的历史时段，塔拉斯河流域并不是由乌孙人，而是由另一个游牧部落联盟——康居所控制的。



西天山北路地缘结构图（西汉）

如果说很多朋友对于“乌孙”这个国家，多少还有些印象的话（最起码和汉朝和亲过，还贡献天马入汉），那么康居很可能就毫无概念了。不过当我们解读完康居的地缘结构后，大家应该会惊讶，这个“国家”所覆盖的领土并不比乌孙小。鉴于中亚整体干旱的环境，不管康居人的领地有多大，像塔拉斯河谷这样能够得天山庇护的板块，都一定是核心领地。这一点，其实从现在中亚国家内部的地缘政治结构中也可以看出。在所谓的“中亚五国”中，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都是与天山相邻的国家。而三国的首都有两个半，都是在山前冲积扇上。之所以说是二个半，而不是三个。是因为哈萨克斯坦现在因为地缘平衡的原因，已经将首都从外伊犁河谷的阿拉木图，迁往哈萨克丘陵北部的“阿斯坦纳”了（至于

为什么，等全景解读完哈萨克斯坦的地缘结构后，就会有答案）。

在张骞出使西域时,由于尚未打通东西方商路(官方通道),东西方的商业交易量,还不足以让那些游牧民族萌生建筑定居点的想法。不过在张骞从长安城出发一个世纪以后,塔拉斯河的山前冲积扇上,终于诞生了一个可以载入历史的城市——郅支城。不过这个城并不是康居人所建,而是由匈奴帝国分裂之后的,北匈奴第一代单于“郅支单于”所建。



汉西域全图



塔拉斯州

被乌孙人阻隔于准噶尔盆地北部的匈奴人，突然出现在塔拉斯河流域，相信让很多朋友出乎意料。不过考虑到康居人与乌孙人的地缘关系，匈奴人的出现应该算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就像匈奴与乌孙之间存在地缘矛盾一样，作为两个同样颇有实力的游牧国家，康居和乌孙这两个邻居之间也不可能没有冲突。如果说乌孙人对于入主费尔干纳盆地做“农民”可能兴趣不大的话，那么他们在由外伊河谷、伊塞克湖盆两路出击，控制楚河河谷之后，不顺势西进渗透塔拉斯河流域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地理结构上看，这也比图谋费尔干纳盆地要容易得多。

并不需要学习所谓的“兵法”，仅仅是出于本能，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应该也能悟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道理来。只不过为了应对来自乌孙的压力，“远交近攻”的康居人在战术上做得更大胆一些罢了。其实大胆的不只是康居人，匈奴人的这次西征，同样是一次极为大胆的跃进。不过鉴于它的地缘背景并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解读的历史时段，暂时就不展开了。不过倒是可以提前让一些把注意力放在战争和中原王朝扩张问题上的朋友兴奋一下，那就是郅支城最终是被汉帝国的远征军所攻破的。而发起这次攻击的将领，正是留下“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言的名将陈汤。

基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而建立的定居点，通常都不会太长久，尤其是筑城地点在草原上的话。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塔拉斯河及其以北，直至阿尔泰山一线的游牧之地，并没有连续性存在的所谓“历史名城”。当然，以塔拉斯河冲积扇如此重要的地缘位置，俄国人在入主中亚之后，是没有理由忽视的。俄国人在此构筑的城市，最早叫作奥里耶阿塔（1864年），后更名为“江布尔”。现在的话，哈萨克人又把它改名叫作“塔拉兹”了。不过，很多关注西域历史的朋友，应该并不是在探究陈汤远征路线时发现这座城的。因为在陈汤远征郅支城 787 年后（公元 751 年），来自唐帝国的另一位名将——高仙芝，又一次的跨越天山进行了一次影响力更大的远征。由于这次远征的主要对手，是几乎不可能相遇的，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帝国，所以这次远征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要更高。而这次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的远征，就是“怛罗斯之战”。至于塔拉斯河冲积扇当时的地缘标签，自然就是“怛罗斯”了。

“怛罗斯之战”之所以在世界历史中拥有一席之地，并不仅仅因为这是亚洲两大帝国之间的一次战争，更因为阿拉伯帝国属于地中海文明圈。而在此之前或者之后的古典时期，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个文明圈，都没有再这样直接军事接触过。仅仅从两个文明圈之间的地理距离，以及欧亚大陆腹地那恶劣的环境来看，我们也能判断出做到这点有多难。事实上，在绝大部分的古典时期，为欧亚大陆两端传递能量、信息的，通常是那些活跃于欧洲大陆腹地带有明显游牧基因的族群。无论他们是以商人，抑或军队、帝国的形式。

不过从地缘意义上看，怛罗斯之战的价值其实并没有评价的这么高。很多网友认为正是因为这场战役的失败，才结束汉民族乃至华夏文明在天山南北的扩张。而亚洲中部的伊斯兰化，也正是源于此。这其实是一种误读了，一场战役的胜利失败与否，并不能决定文明的进程，至多是对微观历史中的政权结构产生影响罢了（这点怛罗斯之战也还做不到）。华夏文明与伊斯兰教在天山南北能渗透到哪一步，最终还是取决于文明的属性，以及更基础的地理关系。

全面解答上述问题需要很长的篇幅，并对从尼罗河到黄河之间的诸多地缘板块有充分的了解。好在我们现在所进行到的阶段，应该已经足以让大家认识到，古典时期的中央帝国实际上并没有能力长期控制河西走廊以西地区，尤其是天山以北和中亚北部的游牧之地。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才是这片游牧之地最有力的争夺者。不过对于这片土地来说，蒙古高原并非只是唯一的威胁。游牧民族的入侵方向，也并非总是来自于东北方向。

第十八章 哈萨克斯坦三玉兹的地缘结构

第一节 大玉兹部游牧于七河地区

在我们过往的内容中，已经无数次的提到，尽管我们意识中的亚洲，在人种属性上更多呈现为黄皮肤的“蒙古利亚人种”；而且虽然现在中亚北部更多的是呈现出偏黄种人的黄白混血状态，但事实是，来自欧洲的游牧民族才是最早经营中亚这片土地的土著。这些曾经以亚洲为扩张方向的游牧民族，最初形成于东欧平原南部。具体说也就是俄罗斯南部，黑海以北的草原地带。现在分布于南亚次大陆北部——兴都库什山脉——伊朗高原的所谓“印度——伊朗雅利安人”，最初都是来源于此。

所谓“雅利安”一词，最初本来只是一个语言学的分类。不过由于那位“元首”的狂热，现在这个概念已经“不严谨”的扩大到代指那些以南俄草原为起点，向欧亚大陆两端扩张的早期欧洲游牧民族了。不管我们是用“雅利安人”，还是“欧洲游牧民族”这个标签，来代指这些至今仍然能够以族群的形态，完整存在于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北部的来自 3000 多年前的高加索人种。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亚地区是他们迁移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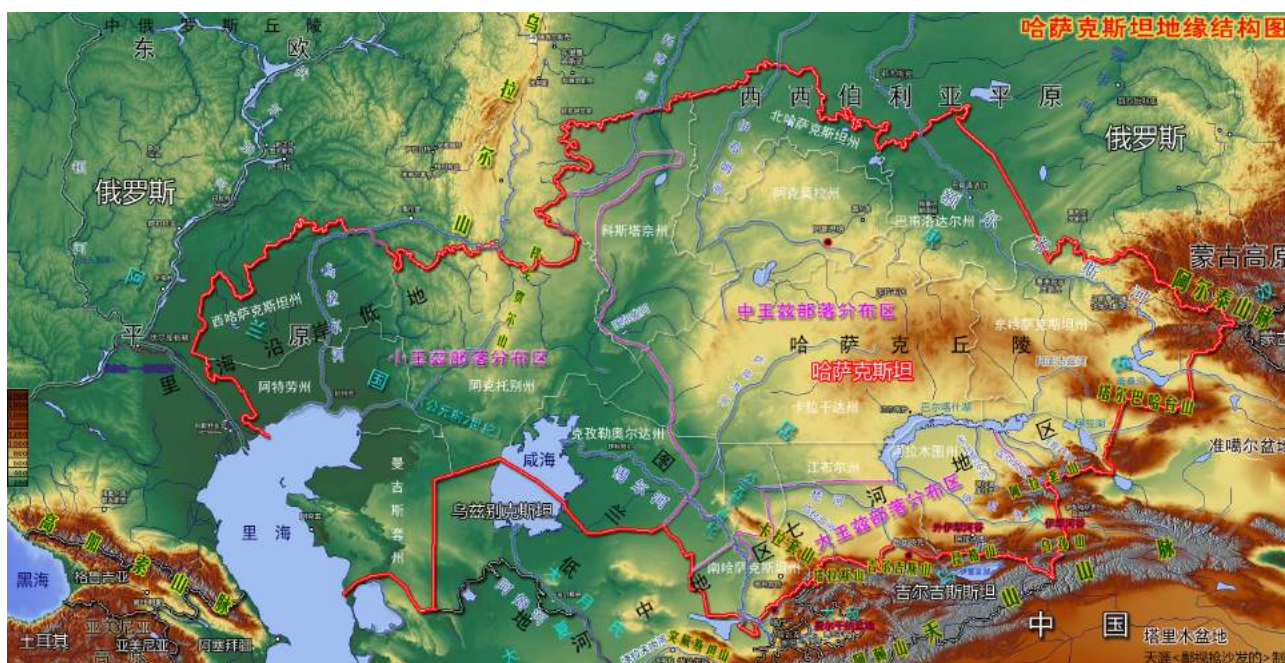
在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以及来自东亚的华夏农耕民族到来之前，他们都是从黑海到河西走廊西部的区域内当之无愧的土著。当以伊犁河谷为中心建立游牧王国的“塞种人”被迫向南迁移后，意味着中亚的“黄祸”时代也由此到来了（即使此时进入天山北麓的月氏、乌孙两族，是回流的欧洲游牧民族）。不过刚刚崛起的蒙古高原游牧帝国，暂时还不能对欧洲游牧区造成威胁。而进出欧亚大陆游牧区的通道，也还是掌握在欧洲游牧民族手中的。这一代表当中，就包括我们正在解读的“康居”。

作为一个战士数量在十万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塔拉斯河流域当然是无法满足康居人的游牧需要。事实上他们在进入塔拉斯河流域之前，已经拥有了大片条件不算太好的游牧地带（至于是哪，后面会解读到）。不过无论是对于哪一支游牧部落来说，紧靠天山的草场都是最有价值的。如果觉得向东北方向与塞种人、月氏人、乌孙人争夺楚河、伊犁河流域有困难的话，康居人还可以选择沿着天山北麓草原向西南方向扩张。那样的话，康居人会先遇到一条源出天山山脉，并向西北方向延伸的山地——卡拉套山。

这条海拔并不高，内部也有明显断裂痕迹的山地，并不能对往来的商旅，以及游牧民族的扩张造成障碍。不过，在中亚的地缘结构中，它却成为一条非常关键的分水岭。单纯从地理角度来理解的话，卡拉套山山脊所分割的是塔拉斯河与锡尔河流域。而从地缘属性的角度来看待这条分水岭的话，它分割的就不仅是两条河流了。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一条文明的分割线。因为卡拉套山北部，直至塔尔巴哈台

山的中亚北部地区，在古典时期完全是游牧民族的乐土。而那些从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进入斋桑泊盆地（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北亚游牧民族，真正能够在文化、种族上做到显著影响的区域，也正是这一区域。

整个区域的相似之处在于，它的各部分都是由源出天山、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并向西北方向流淌的河流所滋养。这些河流主要有：最终注入巴尔喀什湖的阿亚古兹河、阿克苏河、卡拉塔尔河、伊犁河；以及没有注入巴尔喀什湖，消失在沙漠中的楚河、塔拉斯河。这七条河流所滋养出的山前草原带，由于彼此之间的连续性，以及地理结构上的相似性，从而合成了一个更高一级的地缘板块——七河地区。



哈萨克丘陵地缘结构图

从七河地区的结构，以及河流的体量上来看，伊犁河都很明显的是七河地区的地缘核心。即使不能完全控制中、上游的伊犁河谷，最起码也要将外伊犁河谷（盆地）控制在手，方有机会争夺整个七河地区。在我们所解读的年代，七河地区的控制者无疑是乌孙人。除了北部的阿亚古兹河，以及南部的塔拉兹河被两个游牧竞争者匈奴、康居所渗透以外，中亚那些能够充分享受西风和高山雪水的草原地带，大都被乌孙人所控制了。而在近现代的地缘政治结构中，七河地区的控制者则是哈萨克人了。

最先从地缘政治角度为七河地区划出行政边界的是沙皇俄国。在他们渗透中亚，并成功与中央之国划界之后，整个中亚被依地缘背景划分为了两大块。包含七河地区、伊塞克湖盆等游牧地区被划归了北部的“草原总督区”（七河州的行政范围，还包括伊塞克湖盆地）；而卡拉套山西南方向那些以农业为主的绿洲，则组成了“突厥斯坦总督区”（也称“土耳其斯坦总督区”）。

尽管俄国人为中亚划定的行政边界，以及后来所做的民族划分，总体上是遵循

地缘规律的。但在细节上，想做到面面俱到总是很难的（包括中国所做的类似划分，也同样存在问题）。最初俄国人把高地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和低地游牧的哈萨克人混为一族，并把他们游牧的伊塞克湖地区也划入了七河州就是一个错误。而目前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让大家参透这些行政变迁背后的地缘背景。

如果七河流域以西，一直到东欧平原完全是一片类似撒哈拉沙漠那样的荒漠地区的话，那么七河中下游所滋养的草原，几乎就可以被认定为是中亚草原（低地部分）的全部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这片占据中亚半壁江山的游牧之地中，七河流域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也就是说，还有两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与之共同组成拼合成了东欧平原与西域之间的中亚草原。这两个区域就是：哈萨克丘陵，以及“里海——咸海北部低地”。当年沙皇俄国在中亚的“草原总督区”，以及现在的“哈萨克斯坦”，都在是在这三个亚板块之间做行政整合工作。



哈萨克三玉兹示意图

并非所有地理相接，文化相似的土地，都一定要被划入一个国家。这很大程度取决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族群，是否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意识。从这点上来说，俄国人倒是没有拉郎配式的为中亚草原上的部落做整合。

中亚低地草原的三个亚板块之所以被整合为一个国家，是因为早在蒙古帝国走向衰弱之后，准噶尔蒙古人重新崛起天山之前的 15 世纪中叶，生活在这三片游牧之地上的族群，就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意识，并诞生统一的“哈萨克汗国”了。也正是在那时候，中亚北部的草原地带有了一个新的地缘标签——哈萨克草原。而在汉帝国开始经营西域时，中亚的这三个亚板块，则分别是被我们已经充分解读过的乌孙人；正在解读的康居人；以及将要解读的阿兰人所分别控制。

然而，不管是否统一在一个政治体内，也不管是叫中亚草原还是叫哈萨克草原。这片草原内部依地理结构差异而产生的三个亚板块，始终是存在的。这一点，并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化，并同样会反映在哈萨克斯坦内部的地缘结构中。替代乌孙、康居、阿兰三族之名，以七河地区、哈萨克丘陵、里海——咸海北部低地为立身之地的，是哈萨克族的三个“玉兹”（哈萨克语中“地区”之意）：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

第二节 中玉兹部游牧于哈萨克丘陵

哈萨克斯坦现有的部落结构，应该说是亚洲游牧民族中最复杂的。可以这样说，几乎每一个在历史上曾经留名于此的游牧群体，都以部落的形式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鉴于中亚北部草原在欧亚草原的枢纽地位，这些部落的数量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哈萨克人有华夏文明那样用文字记录历史的意识和技术的话，那么他们所能够连接起来的历史，甚至能够对接到我们所正在解读的年代。

即使没有文字记录哈萨克诸部落的系谱，但那些部落之名，以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的氏族关系，也足以让大部分哈萨克人追忆祖先的足迹。当然，如果仅从这些游牧部落最初的来源地来判断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中亚北部会形成这样一个统一的游牧民族。因为他们当中不仅包括有东欧、北亚的游牧部落，甚至还有来自阿拉伯、波斯的成分。而从河西走廊迁移而来的“乌孙”部，至今也仍然是哈萨克诸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哈萨克”族形成的过程来看，也验证了我们长久以来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橘生南而为橘，生北而为枳”。一个族群从哪里来，最初又是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并不重要，土地的属性才是问题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现在哈萨克人的血液中也应该多少融入了一些汉民族的成分，毕竟汉帝国曾经数次渗透西域。只不过，比起那些只是换个地方生存，不需要改变生活方式的游牧部落来说，农耕属性的汉民族，并没有机会在哈萨克现有的部落体系中，谋得一席之地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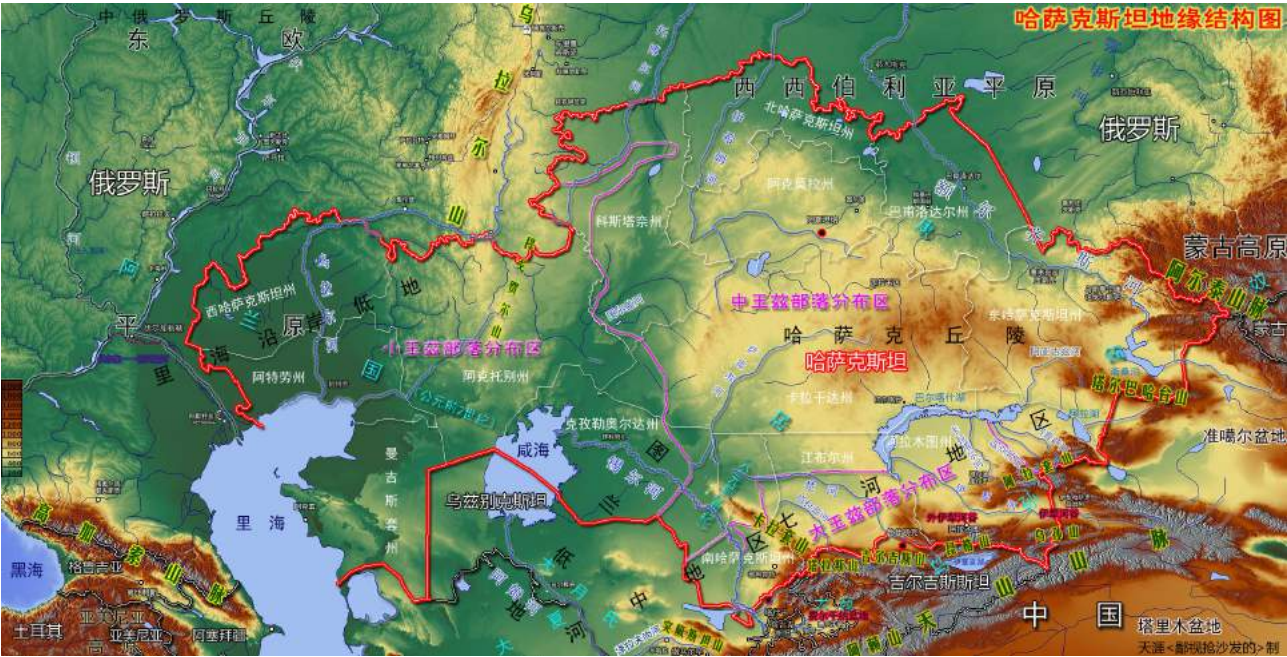
以属地原则来解构哈萨克斯坦的地缘结构，要比从各部落的源流来为之归类更合理。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哈萨克斯坦的乌孙部，倒是真可以称得上是“土著”了。因为他们今天所生存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是乌孙人的土地了。这块土地，我们很大程度上可以和“七河地区”，或者“大玉兹”两个地缘标签重合。以哈萨克在游牧时期的地缘结构来看，七河地区不仅能够因天山雪水，而滋养出高质量的草原，更因处在丝绸之路北线上，而成为中亚北部最重要的亚板块。俄国人最初选定外伊犁河谷的“阿拉木图”，作为整个哈萨克草原的政治中心，也正是基于此。

然而在现在哈萨克斯坦的行政版图上，阿拉木图已经不再是首都了。哈萨克丘陵西北部的阿斯坦纳才是哈萨克斯坦的新首都。在哈萨克现有的部落体系中，这里显然是中玉兹部落所经营的地盘。而在两千多年前，整个哈萨克丘陵则是康居人千里转场的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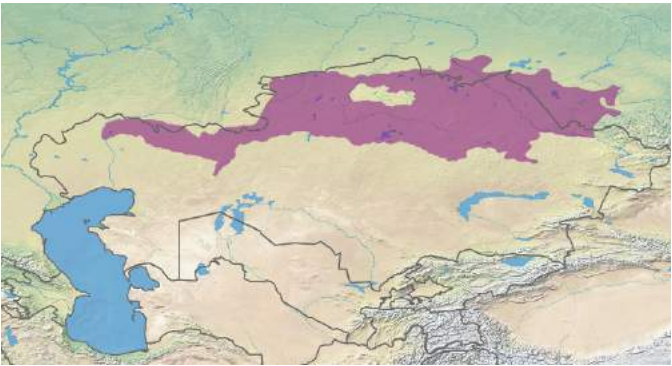
无论在何种形式的地形图上，我们都很难忽视哈萨克丘陵的存在。相比巴尔喀什湖与天山之间的七河地区，哈萨克丘陵的体量要大得多。几乎占据了哈萨克斯坦的半壁江山。只不过，真的比较游牧条件的话，哈萨克丘陵的整体质量就比七河地区要差很多了。这一点，从它那平均3、5百米，腹地最高山体不过1500米上下的

海拔高度也能看出。在亚洲中部这片干旱之地，这样的海拔并无法为之带来太多的降水，因此哈萨克丘陵的大片土地属于荒漠半荒漠地带。

就生存条件来说，哈萨克丘陵的北部要比南部更好。发源于哈萨克丘陵西北部的“伊希姆河”，甚至有机会同哈萨克丘陵东北方向的额尔齐斯河汇合，成为这条西伯利亚大河的一条支流，并最终汇入北冰洋。要知道，这种外流的待遇，即使是能够承接高山雪水的“七河”也不曾享有，它们最好的归宿也不过是像巴尔喀什湖这样的“大湖”。而哈萨克斯坦的新首都——阿斯塔纳，也正是在伊希姆河上游河谷中。



哈萨克丘陵地缘结构图



哈萨克草原示意图

对于试图在哈萨克草原腹地游牧的部落来说，哈萨克丘陵北部相比南部的优势，不仅在于相对更多一点的降水，还在于它紧邻“西西伯利亚平原”南部，是整个西伯利亚地区条件最好的地区。低海拔、低纬度，以及充足的水资源，使得西西伯利亚平原南部具备了游牧条件。而在经过俄国人的百年开发后，这一地区也已成为

俄罗斯最重要的粮仓之一（由于哈萨克斯坦也在此切了一条边，所以也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产粮区）。单纯从供水的角度来看，与哈萨克丘陵擦肩而过的额尔齐斯河，也能够为在哈萨克丘陵北部游牧的部落，提供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从地缘关系上来看，争夺哈萨克丘陵北部，以及沿丘陵平原带的游牧部落，应该来自于两个方向。即西侧透过乌拉尔山脉南部而来的，源自东欧平原南部（南俄草原）的欧洲游牧民族；以及东侧从蒙古高原渗透而来的北亚游牧民族。相比之下，从蒙古高原方向渗透而来要更容易。因为生存于蒙古高原西部的部落，无论是西出唐努乌梁海盆地后，还是先跨越阿尔泰山分水岭，进入阿尔泰地区后，都会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在试图沿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南下，切入七河地区的同时，同样与阿尔泰山相接，并具备游牧条件的哈萨克丘陵北部，没有理由不被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所渗透。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哈萨克斯坦的中玉兹部落，大都可以在蒙古高原找到他们祖先的足迹。



哈萨克草原



哈萨克丘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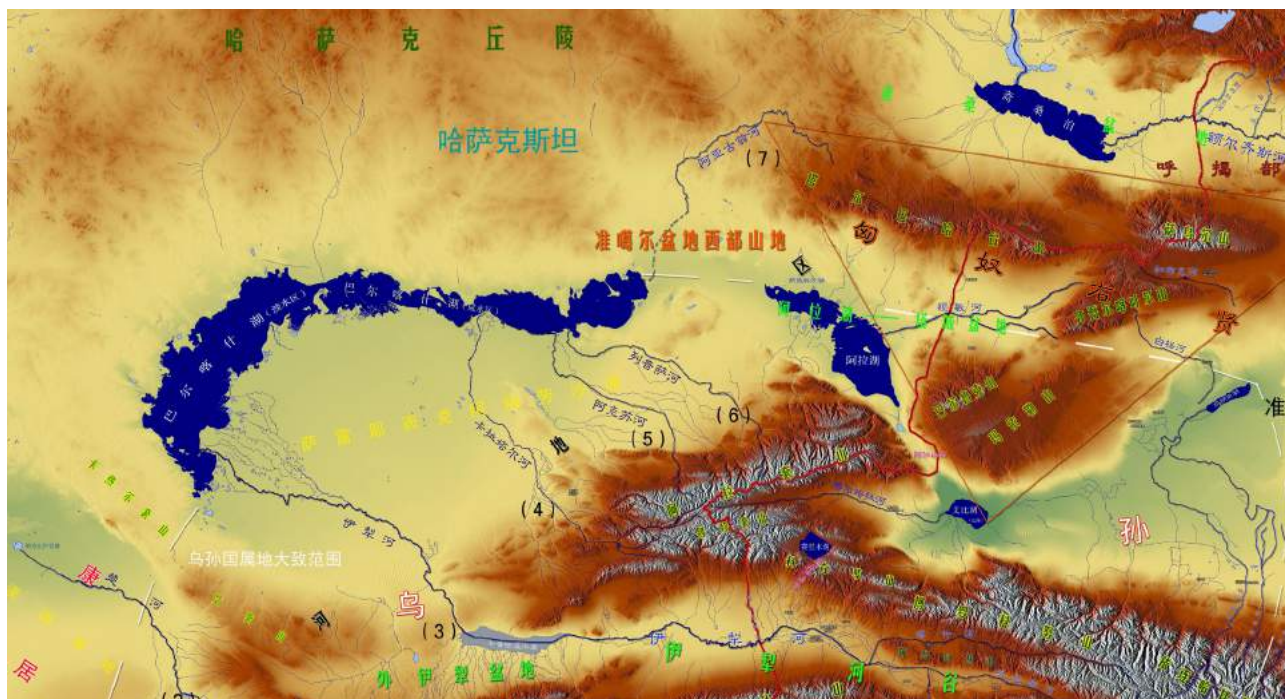
不过在两千多年前，先期从南俄草原游牧而来的欧洲游牧民族，在哈萨克丘陵地区以及整个中亚还是占大多数。控制哈萨克丘陵地区的康居人，也应该归于此类。对于隶属欧洲游牧集团的康居人来说，在控制哈萨克丘陵的北部，以及周边平原带以后，并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相比再进一步渗透西西伯利亚平原腹地，或者蒙古高原这两片苦寒之地来说，向天山方向渗透才是更大的诱惑。事实上，这也是每一

个入主中亚的游牧民族最理想的去处。那么他们是循什么样的路径接近天山的呢？

第三节 中玉兹部进入天山的路线

从直观感觉上来看，不管是来自蒙古高原还是东欧平原的游牧民族，在进入哈萨克丘陵北部之后，都应该先向南迫近巴尔喀什湖，并以其北岸为核心经营哈萨克丘陵地带。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上一节也说了，哈萨克丘陵地带北部的环境要好于南部。从环境上来说，这是一个由北向南，经历草原、半荒漠、荒漠地貌变化的板块。也就是说，越靠近巴尔喀什湖所对应的南部地区，环境反而越恶劣。

这点很让人奇怪，因为由于有伊犁河巨大淡水量的供给，巴尔喀什湖的西半部属于可供人畜饮用的淡水湖。有这样一个巨大湖泊存在，周边地区应该是湿岛气候才对。其实，真正造就大规模草原的，从来都不是湖泊本身，而是那些漫流在湖盆周边低地的河流，湖泊本身只是一个终端罢了。像巴里坤湖这样高咸度的咸水湖，并不影响它周边低地在承受大流量天山雪水的供给时，滋养出大片草原。相比之下，巴尔喀什湖地区就是一个反例了。为了更了解它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视角再拉高点，以山、水结合的角度来观察巴尔喀什湖地区的结构，一切就十分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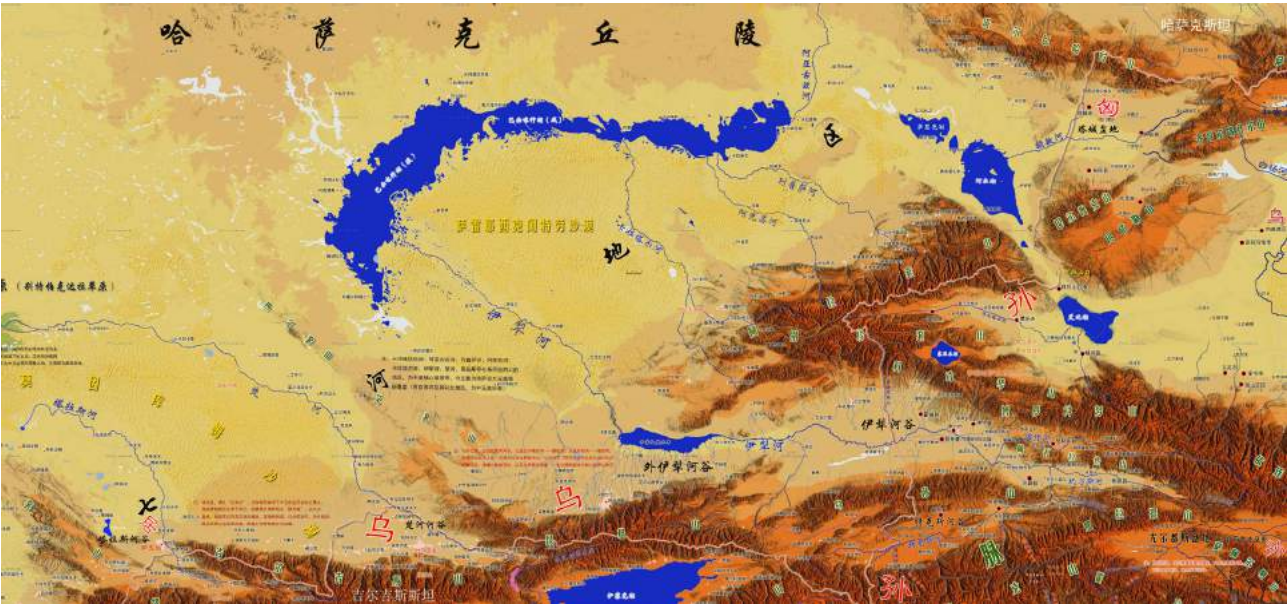


乌孙地缘结构图（西汉）

湖泊之所以能够成为湖泊，是因为它地势比周边地区要低，地理结构呈盆地状态。只不过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湖泊本身只是覆盖了一个盆底。由高地围就的“湖盆”面积，要远大于水面面积。当我们以湖盆的视角来为巴尔喀什湖地区寻找边界的话，

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介于哈萨克丘陵和天山山脉（主要是阿拉套山）之间的地理单元。包括哈萨克丘陵分水岭以东、以南地区，以及七河当中那五条（阿亚古兹河、阿普萨河、阿克苏河、卡拉塔尔河、伊犁河部分下游河段），都是属于这个湖盆的范围。

以我们之前分析天山南北环境所得出的技术标准来看，身处亚洲腹地，像巴尔喀什湖湖盆这样的大片低地，基本上是没有多少降水的。而想靠周边山地供水为整片低地涂抹成绿色，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巴尔喀什湖湖盆整体上不可避免的会呈现荒漠化地貌，就像它的邻居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一样。单从荒漠化程度来看，巴尔喀什湖南部的情况要更为严重，从巴尔喀什湖到阿拉套山之间的区域，都可以用“萨雷耶西克阿特劳沙漠”这个地理标签来覆盖。



汉西域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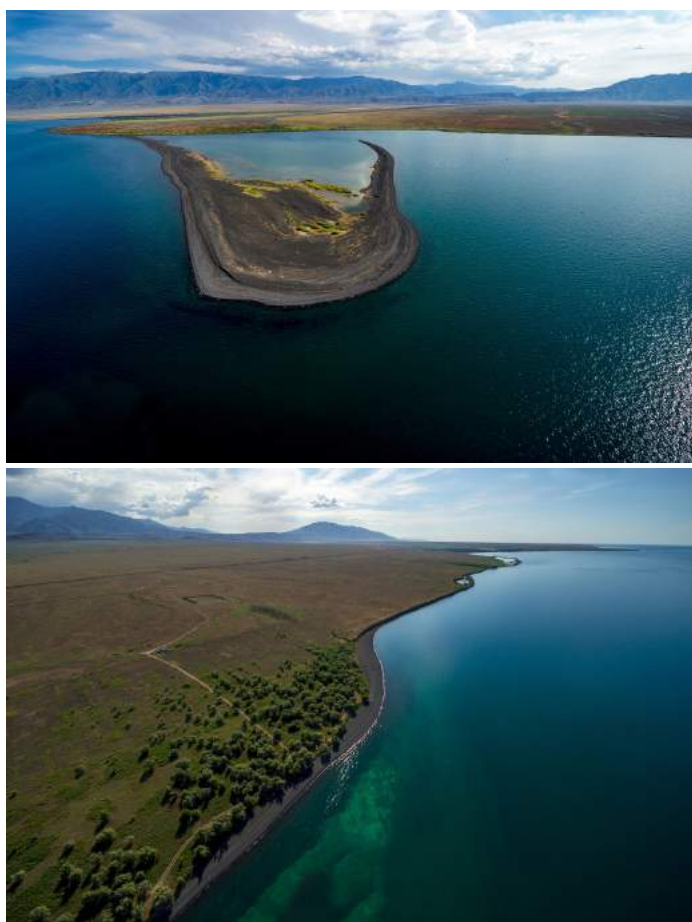


巴尔喀什湖卫星图

不过，这并不代表巴尔喀什湖南部地区的地缘潜力，要小于北部的哈萨克丘陵地区（东南部）了。因为即使是对游牧民族来说，不管一片土地全是沙子，还是说能长点稀疏、低矮植被的荒漠，区别的意义也不大。板块内有多少河流，河流的水量有多大，才是决定草原面积、质量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巴尔喀什湖南部的优势就很明显了。以阿拉套山为主的南部山地在海拔和朝向

上，都完胜哈萨克丘陵东南部被纳入巴尔喀什湖湖盆的地区。这些由山地而下最终流入巴尔喀什湖的河流，不仅在山前形成了一片高、低地相接的立体草原地带，还能够在汇入巴尔喀什湖时形成大小不一的三角洲平原形态的绿洲。尤其是水量巨大的伊犁河。

反观巴尔喀什湖北部，就完全是一个“矮、穷、挫”了，不仅海拔低，还背风。这样的结构，让你就不可能指望在哈萨克丘陵分水岭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看到大片绿色之地了。无论是游牧时代的古典时期，还是工业时代的现在，哈萨克人都不会把倍增人口的希望放在这片土地上的。现在这一地区最大的城市，就是湖北岸的“巴尔喀什市”，人口仅8万。而且绝大部分人口是生活在城市中（也就是说，在这里很少有人会指望依靠游牧、农耕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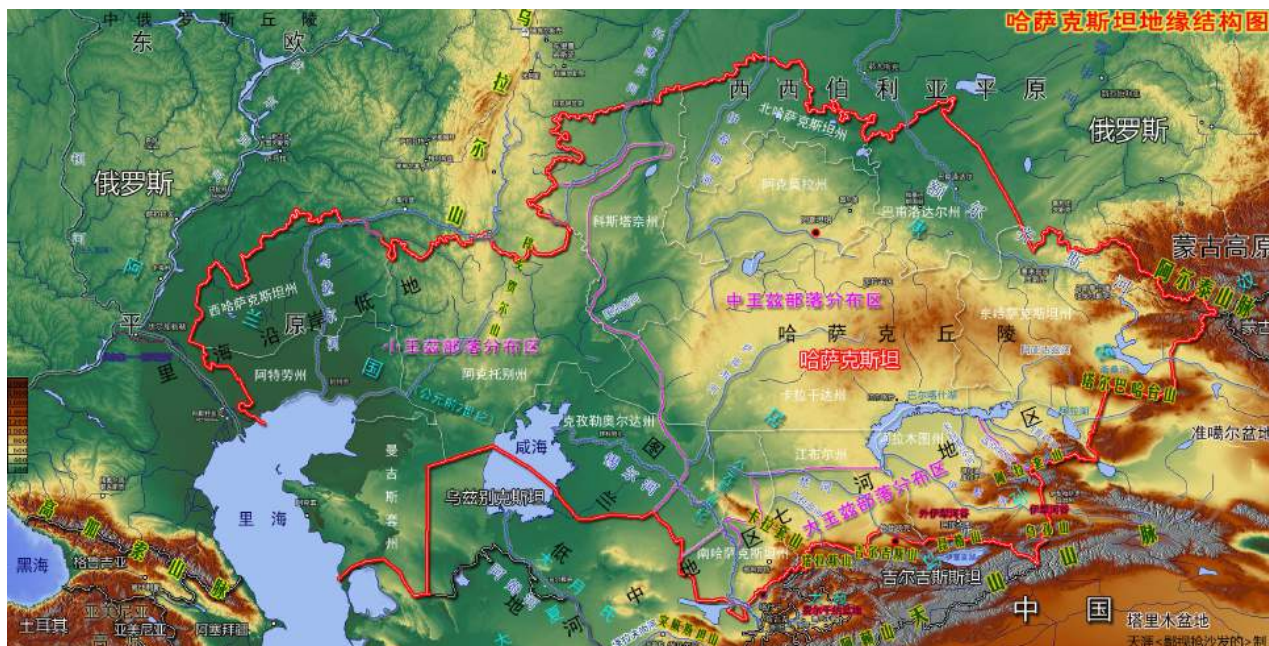
巴尔喀什湖

既然向巴尔喀什湖渗透，然后再沿湖的边缘向两端渗透没什么前途，那么当年占据哈萨克丘陵北部的康居人，以及现在哈萨克斯坦的中玉兹诸部，要想迫近天山的话，就只能在占据哈萨克丘陵北部后，先行向两端扩张，然后再寻机转向，朝着天山方向游牧了。以地理结构来看，从哈萨克丘陵北部进入七河最北端的“阿亚古兹河”（发源于塔尔巴哈台山西端）是最方便的，接下来他们可以向南，进入准噶尔西部山地腹地的额敏河流域，以及向七河流域纵深继续渗透了。

问题在于，这个方向在地缘结构上有巨大的障碍。因为从蒙古高原方向，总是不断有游牧民族翻越阿尔泰山南下，进入以斋桑泊盆地为核心的额尔齐斯河流域，他们也是七河地区的有力竞争者。而以伊犁河谷为核心的游牧部落，一般最低限度也会渗透到阿拉套山北部，并对由哈萨克丘陵东北部南下的游牧部落造成阻力。

在哈萨克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这一情况果然就发生了。在完控七河地区、阿尔泰山地区的准噶尔蒙古人压迫下，哈萨克中玉兹部不仅无法越过阿亚古兹河，反而有被征服的可能。只是在清帝国经过数十年的战争战胜准噶尔汗国后，哈萨克人才得

以在清帝国的允许下，进入斋桑泊盆地、阿亚古兹河等地，填补准噶尔人留下的牧场。而在中俄划界之后，很多不愿意接受俄国统治的中玉兹部，也随之进入了中国境内的阿勒泰、塔城地区（中玉兹乃蛮、克列部较多），这也使得现在北疆的半壁江山被打上了“哈萨克州”的标签。



哈萨克丘陵地缘结构图

不考虑外部因素，单纯从内部地缘博弈的角度来看，以哈萨克丘陵北部为中心的“中玉兹”部，在争夺阿亚古兹河一带的控制权时，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如果经营七河流域的大玉兹，能够如当年的乌孙人那样，完整的得到伊犁河谷、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的话，那么他们的领地应该也能延伸到塔尔巴哈台山。只不过参考当时乌孙、匈奴的博弈关系，我们也能够看出，仅仅从阿拉套山西北麓向北扩张的话，大玉兹部向北扩张的道路不会太顺畅。事实上，在现实的地缘结构中，从阿克苏河——阿亚古兹河的地区，都是中玉兹部落的分布区。基于中玉兹部落在准噶尔蒙古人被灭绝之后，就已经从清帝国手中接手斋桑泊地区，他们向南能够渗透到阿拉套山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由于伊犁河谷的地缘位置是那么的重要，地理环境是那么的良好，蒙古人和清帝国在经营西域时，都无一例外的将之作为自己的直属经营地。因此作为中亚土著的突厥系部落联盟“大玉兹”，实际上只能以楚河——塔拉兹河一带作为自己的经营重心了，最初的哈萨克汗国也正是崛起于此。而如果以乌孙部为核心的大玉兹诸部，能够恢复 2000 多年前乌孙国的领土范围的话，那么他们现在肯定是哈萨克三部中实力最强，最有话语权的部落联盟。只是现在，哈萨克内部的最强者，无疑是能够完整拥有哈萨克丘陵地区，并渗透周边板块的中玉兹部了。

当1994年哈萨克的政治家决定把首都从大玉兹地区的阿拉木图，迁往中玉兹的阿斯坦纳时，不得不说是这种地缘关系变化的产物。当然，对于已经形成统一哈萨克民族意义的这些中亚游牧者来说，也并不能将这种政治中心的迁移视作是部落斗争的产物。事实上，做出迁都决定的哈萨克总统，本身就是出生于大玉兹部落。这个决定，更多的是从稳定国家地缘结构的角度来做出的。因为以哈萨克所涉及的诸多地理单元来看，哈萨克丘陵无疑是最完整，最核心的地区，将政治中心设置于此，也的确符合哈萨克斯坦现有的地缘结构。

尤其是因为地缘关系的原因，哈萨克内部现实最大的分裂风险，也是来自于西、北地区。因为作为哈萨克境内最大的少数民族，也是前宗主国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的主要分布区，也正是在哈萨克斯坦的西、北部。

第四节 图尔盖草原在连通欧亚上的作用

让我们重新把视角调整到游牧时代。经常有人会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就是王朝不断地重复。其实对于更加“尊重”原始地理结构，几乎不会试图通过水利工程等手段改变地理结构的游牧文化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只要生活方式、生产结构没有重大变化，一个19世纪的哈萨克部落，如果穿越回两千多年前的乌孙时代，相信并不需要特别改变就能适应当时的生活方式。当然，在语言方面估计会有些不适应，因为当时的中亚北部草原，还是欧洲游牧部落的天下，而突厥语系的亚洲游牧部落，大多数还在蒙古高原游牧呢。

一成不变的，并不仅仅是生产、生活方式。地缘板块的划分，也同样没有变化。同处一板块的部族，总是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形成联盟（不管你最初的来源在哪里）。当年由欧洲游牧部落组成的“康居”国，以及现在的中玉兹部，一样都是以哈萨克丘陵为核心，并向周边地区渗透。向东接近准噶尔盆地只是一个扩张的方向，对哈萨克丘陵北部的游牧者来说，向南渗透到天山北麓会更有诱惑。我们已经知道康居人曾经成功的渗透到了天山北麓的塔拉斯河谷，并阻止了乌孙人继续南下。问题是，从地理结构上来看，哈萨克丘陵南部，尤其是东南部的荒漠化环境，看起来应该有很强的隔离作用。那么康居国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将自己所控制的游牧之地整合进一个部落联盟的呢？

尽管我们认定，哈萨克丘陵北部那些向北流淌，甚至有机会通过额尔齐斯河汇入北冰洋的河流，对于康居人或者现在的哈萨克中玉兹部落来说非常重要，但向北发展注定是一件没有前途的事，哈萨克丘陵以南那些相对温暖的草原才是游牧民族最希望得到的。事实上，从欧洲而来的游牧民族在跨越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缺口之后，最先看到的草原并不在哈萨克丘陵之上，而是在咸海北部、哈萨克丘陵西侧的“图尔盖草原”。

从地理结构上看，在咸海——乌拉尔山——哈萨克丘陵之间，存在一片低地，我们可以称之为“咸海北部低地”。而这片低地周边高地所收集到的雨水，所汇集成的河流叫作“图尔盖河”。虽然图尔盖河的流向对应着咸海，但北高南低的地势，注定了从乌拉尔山、哈萨克丘陵之间上汇流而下的雨水，会更加庇护它的北部地区。并且由于周边的集水区不太给力（海拔太低），所以图尔盖河水系其实也并没有办法为咸海供水，它的归宿只是低地中央的一片沼泽地（谢卡尔——纽吉兹沼泽）。而整个咸海北部地带的环境也如哈萨克丘陵一样，呈现草原（上游河谷地区，已经开发成农耕区了）、半荒漠、荒漠地带渐变的趋势。也就是说，越接近咸海，越不适合人居。



哈萨克丘陵地缘结构图

当然，图尔盖河流不流入咸海意义也不大了，就算是勉强流入咸海，在下流缺少支流补水的情况下，也无法把地图上咸海北部那抹绿色，变成真正的草原（在分色地图上，低地总是被标示为具有迷惑性的绿色）。对于后来有能力改变河流方向的人类来说，河流注入像咸海这样高咸度的湖泊中就是一种浪费。让他们留在中游地区滋养更多的绿色，成为一种通行的做法。至于这种做法对于生态平衡和当地人类生存来说是否更有利，并不是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我们只需要知道的是，在自然力的作用下，咸海北部的低地带中存在一片草原地区，可以成为欧洲游牧民族进入哈萨克丘陵北部的跳板。反过来，从蒙古高原下来的游牧民族如果想去欧洲发展

的话，也会经由哈萨克丘陵北部——图尔盖洼地，进而穿越乌拉尔山口。

现在我们似乎为蒙古高原和东欧平原的游牧民族，找到了一趟直通车。不过，我们先前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就是如果哈萨克丘陵的南部荒漠化严重，那么游牧于哈萨克丘陵北部那些看起来应该和西伯利亚关系更近的部落，又有什么理由和哈萨克丘陵南部那些靠天山雪水生存的部落，形成部落联盟呢？既然河流在地缘联系中那么重要，那么是不是有一条河流为哈萨克丘陵北部草原地带，提供南下的草原通道呢？

第五节 中玉兹部沿萨雷苏河南下渗透

能够为哈萨克丘陵北部草原提供南下的这样一条河流，显然不可能存在于巴尔喀什湖湖盆南部，也就是不能去哈萨克丘陵的东南部寻找。因为那片背风的土地，并不会有足以支撑一个部落生存的草原存在。真正的希望，在于哈萨克丘陵西侧的迎风面上。在这个方向，丘陵西北侧所收集到的雨水，流入了咸海北部的谢尔盖洼地；而南部的山地集水区，则是属于另一条河流——萨雷苏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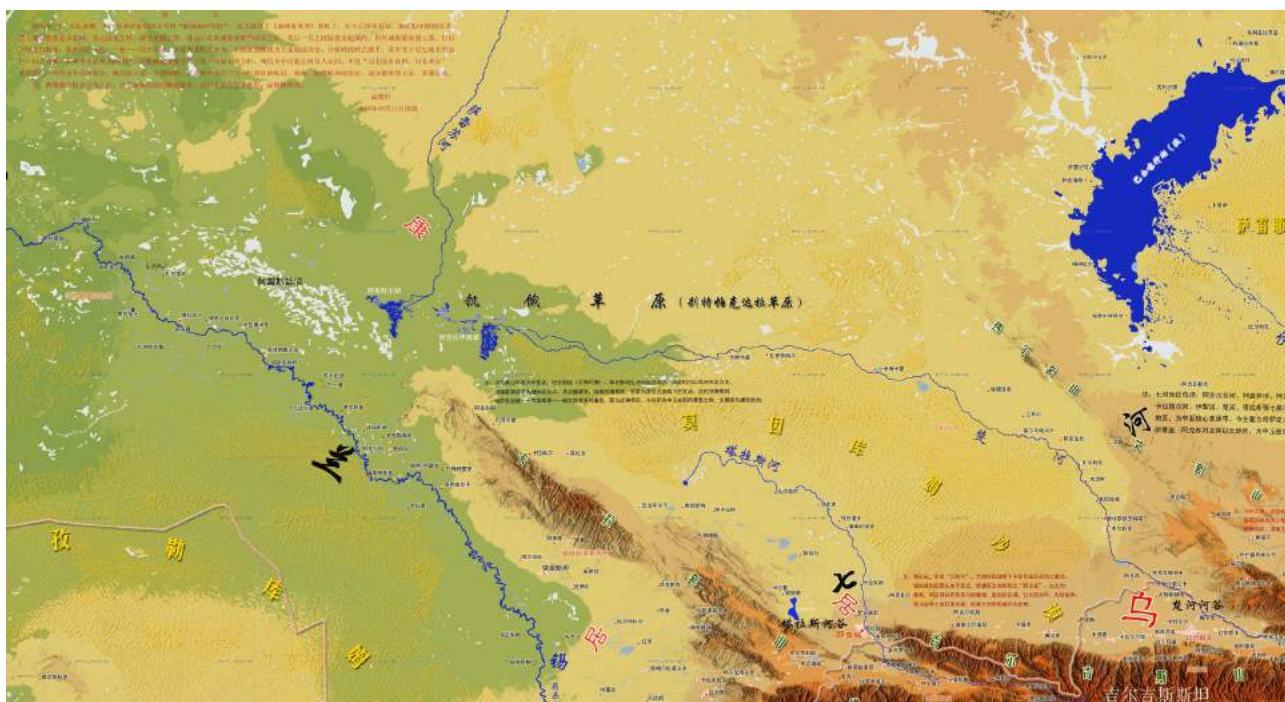
与中亚大部分河流一样，萨雷苏河最终的归宿地也是一片低平的荒漠之地。这片位于咸海——里海以东，哈萨克丘陵以南，天山——帕米尔高原以西，海拔高度在100——300米之间的低地叫作“图兰低地”。而中亚最著名的两条河流：锡尔河和阿姆河的下游地区，正是处在这片低地之间。因此对于泛突厥主义者来说，一直有图兰低地是突厥文化发源地之说。其实当我们仔细研究中亚的地缘结构以及历史之后，会发现这一想法并不符合地缘逻辑。中亚的地缘重心并不在这片低地上，而是沿天山北麓一线排列的那些河流冲积扇上。而在图兰低地腹地当中，真正适合人类生存的，只不过是水量巨大的锡尔河、阿姆河在沙漠当中开拓出的两条沿岸草原带罢了（现在已经农耕化了）。

如果哈萨克丘陵的海拔再高些的话，也许萨雷苏河就有机会流得更远一点，并成为锡尔河的一条支流了。不过现在，它的归宿只能是图兰低地最北端的“阿希科尔湖”了。说起来也是造化弄人，因为阿希科尔湖东侧不远处，就是楚河的归宿地“阿克扎伊肯湖”。也就是说，如果楚河或者萨雷苏河再努力一点的话，两条河流应该就有机会共同汇集成一个面积更大一点的湖泊了。其实在地质结构的划分中，楚河、萨雷苏河所流经的地区，也的确被划为一条低地带：楚河——萨雷苏河盆地。

尽管楚河、萨雷苏河最终并没有碰头，并且在人类活动加剧的现在，两条河流也并不总是能够流到自产自销的那个归宿地。但二者之间的地理关系，已经足以让分居两河的游牧部落之间发生紧密的地缘关系了。或者说，从其中一条河流转场到另一条河流，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今天哈萨克斯坦的地缘结构中，依附于楚河、萨雷苏河的草原，是以一种合乎地缘规律的方式划分归属的。既楚河流域归

属于七河地区的“大玉兹”部落联盟；而因哈萨克丘陵而生的萨雷苏河，自然就是中玉兹的领地了。

按照现在哈萨克诸部对于楚河——萨雷苏河盆地的分割，来推断两千多年前的地缘结构的话，那么以七河地区为核心的乌孙部，以及以哈萨克丘陵为腹地的康居人，应该也是大致遵循这样的分割原则来划分草原的。不过在当时，乌孙人在控制了有山地庇护的楚河河谷（冲积扇部分）后，并没有在下游渗透成功，控制整个楚河流域。也就是说，楚河最后在沙漠当中延伸出的那条狭长绿色地带，是由康居人经营的。以这样的一个对于双方而言都属突出部的板块相接地带来说，被由哪一方向而来的力量所控制，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乌孙人来说，匈奴人在北方造成的压力，以及将重心放在经营天山北麓那些离山更近、条件更好的草原，都是影响他们通过楚河进一步向哈萨克丘陵腹地扩张的重要原因。



汉西域全图

哈萨克丘陵西南部存在萨雷苏河这样一条流入图兰低地的河流，为当年的康居人和现在的哈萨克“中玉兹”部所提供的渗透机会，并不仅仅限于楚河，以及与之相邻的塔拉斯河。因为当那些进入萨雷苏河流域的部落顺河而下，游牧到下游地区后，他们会发现与他们近在咫尺的并不仅仅是楚河。一条比楚河更有名的中亚名河——锡尔河也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要是让控制了萨雷苏河流域的游牧部落，只能转进到另一条能接近天山的河流的话，他们应该会选择潜力更大的锡尔河。这条水量巨大的中亚名河不仅在山前滋养出了冲积扇，还一路向西穿越沙漠，和另一条与之齐名的大河——阿姆河，打造

出了共同的归宿地“咸海”。这意味着，锡尔河在咸海到天山之间的那片几乎无雨可下的图兰低地中（年降水量只有 100 多毫米）拉出了一条绿线。无论是对于保持游牧状态的部落，还是后来大规模开发引水工程，浇灌棉田的苏联人来说，锡尔河水都是他们眷恋这片低地的唯一理由。而作为本地区重要的河流，锡尔河也很自然的承担起了聚落人口的重任。

就地理距离来说，萨雷苏河、楚河、锡尔河是那么的接近，以至于让人怀疑，他们在历史上是否曾经在卡拉套山西北侧交汇过。从地缘联系的角度来看，要是萨雷苏河、楚河，甚至塔拉斯河的集水区规模再大点，最终能够合流成功的话，也的确是没有理由不在卡拉套山西端形成一个板块交汇的枢纽点的。虽然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造就这样一个地缘枢纽，不过对于机动性极强，又更适应恶劣气候的游牧民族来说，三河之间那些无河可依的地带，已经不足以阻挡他们在各河流之间切换牧场了。

就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中玉兹部来说，他们在锡尔河下游所控制的区域正是对应着萨雷苏河的那一段（靠近卡拉套山西端）。假如当年的康居人是由北向南渗透的话，那么他们最先进入的应该也是这一地区。只不过，在乌孙人苦心经营以伊犁河谷为核心的天山牧场时，康居人能够比中玉兹部落渗透的更加深入。除了向卡拉套山北部的塔拉斯河、楚河渗透，以期接近天山山麓以外，卡拉套山以南，费尔干纳盆地以西那些受山地庇护的锡尔河流域，更是康居人千里转进的核心目标。

最终康居人也的确控制了卡拉套山以南，费尔干纳盆地以西的锡尔河流域，这片介于卡拉套山——突厥斯坦山之间的土地，在中亚的历史中有着显赫的地位。在地缘板块划分上，属于中亚“河中地区”中的核心板块。无论是当年的康居人，还是后来的哈萨克人，都代表中亚北部的游牧部落强势向此渗透过。卡拉套山南麓，锡尔河右岸的突厥斯坦城，也曾经成为哈萨克汗国的都城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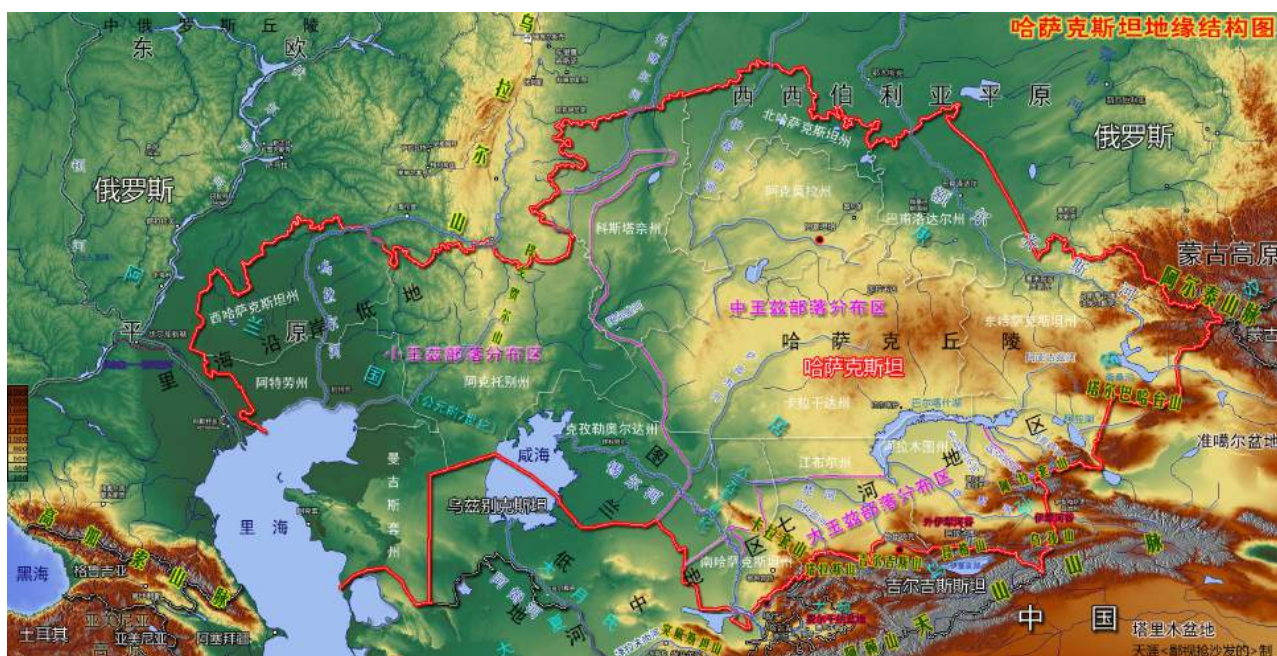
第六节 小玉兹位处中亚西部和东欧草原

以现在的地缘关系来说，由哈萨克丘陵而来的中玉兹部，以及由七河地区而来的大玉兹部，都有机会争夺卡拉套山一带的控制权。最终双方也的确在这一带形成了共生关系。相比之下，同为哈萨克丘陵控制者的康居人，就要做得更好一点了，这其实与整个欧亚草原的地缘背景不同有关。在中亚北部草原形成共同的“哈萨克”民族意识时，来自蒙古高原的北亚游牧民族，早已成为欧亚草原的主导者。而翻越阿尔泰山，沿山麓逐次向天山北路推进，是这些北方来者最主要的扩张方向。这使得已经土著化的七河游牧部落，不得不把扩张生存空间的希望寄托在南线。

时光倒流回到 2000 年前，中亚的地缘格局又完全不同了。中亚草原的主导者，还是那些来自欧洲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在土著化的乌孙人阻击下，并没有对中亚草

原进行实质性渗透。当然，这很大程度与他们的经济空间和对手在东方有关。在汉帝国用体量优势压垮匈奴帝国后，那些不愿意接受这一结果的匈奴人开始把扩张重点放在了“西方”，中亚草原乃至东欧草原都成为他们掠夺新生存空间的希望所在。只不过在此之前，扼守欧亚草原地缘枢纽的康居人，还可以与匈奴人和平共处。甚至在匈奴势衰、乌孙做大时，联手应对这个共同的邻居。

既然两千多年前，中亚草原的主导力量来自于欧洲，那么作为“西方”游牧势力一员的康居人，自西向东的在天山北路控制一片山前草原就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了。事实上，我们之前所说的占据七河之地的“塞种人”，以及占据哈萨克丘陵的“康居人”，都和现在中亚草原部落的“玉兹”结构一样，拥有一个更高一级的族群认同。后者就是经过苏联人强化的“哈萨克”；而前者的话，既然是带有明确的欧洲基因，我们就不妨用一个欧洲研究者所惯用的标签——斯基泰人来代指。



哈萨克丘陵地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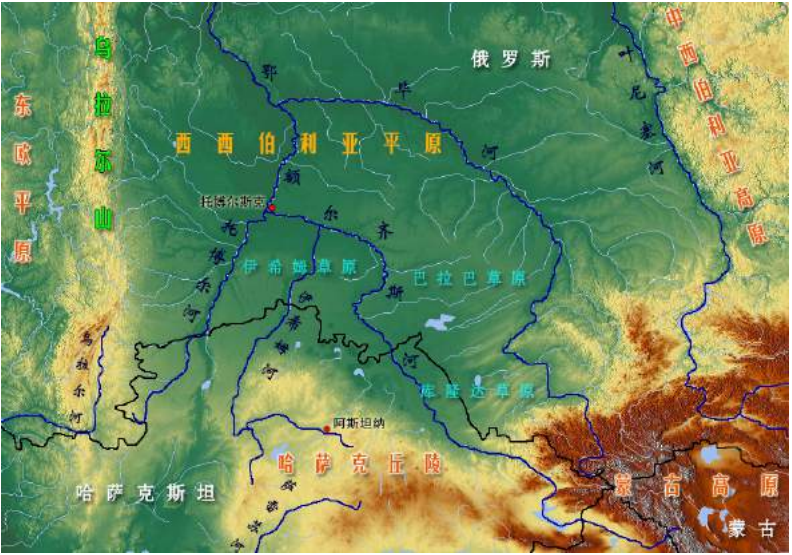
拥有更高一级的族群认同，并不代表他们之间就会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能够决定地缘政治结构的基础，还是在于基本的地理结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任何一支试图覆盖中亚的游牧力量，最终都会在七河流域、哈萨克丘陵、河中，形成不同的部落联盟或者“国家”，而斯基泰游牧体系也是这样的。不过这个游牧体系所覆盖的区域，并不仅仅是中亚草原，还包括整个东欧大草原。

相信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在现在哈萨克斯坦的版图西部还包括了一部分欧洲领土。而包括这部分领土在内的哈萨克丘陵以西部分，则是隶属于哈萨克“小玉兹”部落联盟的领地。其实从游牧民族角度来说，所谓的欧亚大陆分界线并不存在。在他们眼里，乌拉尔山——里海两侧都是属于连续的草原带。这片草原带所具备的共

同的“低地”属性，让生活在东欧草原和中亚草原的部落，有机会合体成为一个更强大的政治体（如蒙古“金帐汗国”）。如果不是属于欧洲斯拉夫人体系的俄国人，在东欧草原北部的森林地带崛起，并以迥异于突厥化的中亚游牧民族认同，向“南俄草原”（东欧大草原）渗透成功的话，所谓“哈萨克”的概念，势必会在欧洲渗透得更深。实际上，为俄国在草原以及西伯利亚渗透立下汗马功劳的“哥萨克”人，其名称就是从游牧于东欧大草原的突厥人那里得到的。只不过，当这鸠占鹊巢的斯拉夫人用了这个名称之后，俄国人就只好给这个名称本来的主人用上“哈萨克”这个名字了。

哥萨克与哈萨克，乃至整个突厥游牧体系之间的博弈，我们以后会有详解的。而在我们现在所解读的历史时段，这种基于不同文化（包括语言、宗教等）、生产方式、族群体系所产生的对抗，暂时并不存在于东欧——中亚草原上。在哈萨克丘陵，或者说图尔盖河以西，直至东欧草原游牧的部落，在种族、文化、生活方式上，与康居、塞种，乃至后来土著化的月氏、乌孙并没有大的差异。而如果要用一个国家，或者部落联盟的标签来标注这些康居人的邻居的话，他们就是“阿兰人”。

尽管这些戴着尖帽的游牧部落并没有对汉帝国经营西域产生过直接影响（他们主要祸害欧洲那些定居民族了），但作为一个在汉朝史书中出现过的最西部的游牧“国家”，我们还是很有必要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欧洲草原的西部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些来往于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又是循什么样的路径来影响欧亚大陆历史的（仅仅是出于全面了解中亚地缘价值的需要，我们也不可能疏漏掉这一环）。



中亚北部地区示意图

流位置关系，它们分别被称之为伊希姆草原、巴拉巴草原，以及库隆达草原，后两者位于额尔齐斯河右岸。而伊希姆草原则位于额尔齐斯河左岸，西至乌拉尔山东麓

单从位置来看，康居人也好，哈萨克中玉兹部也罢，除了可以从巴尔喀什湖南北两个方向，向七河流域渗透以外，应该还可以自然渗透到西西伯利亚平原的。由于南部靠近中亚地区，年降水量已经低至450毫米以下，这块世界上最平整的平原，除了大片为泥泽所覆盖的森林地带以外，在南部靠近哈萨克丘陵地区的鄂毕河流域，也存在着一片草原带。依河

的托博尔河（额尔齐斯河支流）。至于“伊希姆”之名，则得自于从草原中间穿过的，额尔齐斯河左岸的另一条支流——伊希姆河。



巴拉巴草原



阿斯坦纳

关于伊希姆河，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坦纳”，就在哈萨克丘陵地带的伊希姆河上游河谷中。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将首都定位于此，有以此来控制边缘的西伯利亚平原的意思。事实上，在古典游牧时期，沿哈萨克丘陵而生的这条西西伯利亚平原南部草原带，由于背靠无法有效渗透的沼泽森林地带，

又处在东欧平原、蒙古高原、中亚草原三个强势游牧区之间，并没有太多机会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结构中，独立发挥作用。

唯一值得一提的机会，是蒙古金帐汗国分裂成四块之后，在此诞生的“西伯利亚汗国”。不过支撑这个汗国存在的，并不是纯粹的游牧经济。那些从西西伯利亚北部平原所获取的毛皮，才是这个汗国的命脉所在（所以西伯利亚汗国的都城是在森林地带中，而不是草原腹地）。由于俄国人在东欧平原的崛起，并且与西欧国家建立了贸易通道，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优质毛皮，在欧洲市场上获得了几乎与中国的茶叶同等的商业地位。而追逐这些毛皮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也成为俄国渗透西伯利亚地区的原动力。总的来说，西伯利亚南部边缘的那条草原地带，并不是游牧民族最渴望得到的草原。真的让他们选的话，东欧平原上的草原会更有诱惑得多。

第十九章 哥萨克人在南俄草原的逆袭

第一节 东欧平原的草原与森林分割线

说起来，曾经被无数游牧民族染指，并被 N 多网友借势 YY 的东欧平原，在绝大部分人心中，都还只是一个模糊概念。尽管很多人早已把匈奴人的“上帝之鞭”归功于汉帝国的强势崛起，并把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扩张的土地，想象成华夏文明的胜利。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绝大部分的古典时期，能够决定这片欧亚草原归属，并影响两端定居民族命运的，只能是那些居无定所的游牧部落。而草原的实际控制权，也只是在各种出身的游牧部落联盟，或者帝国中流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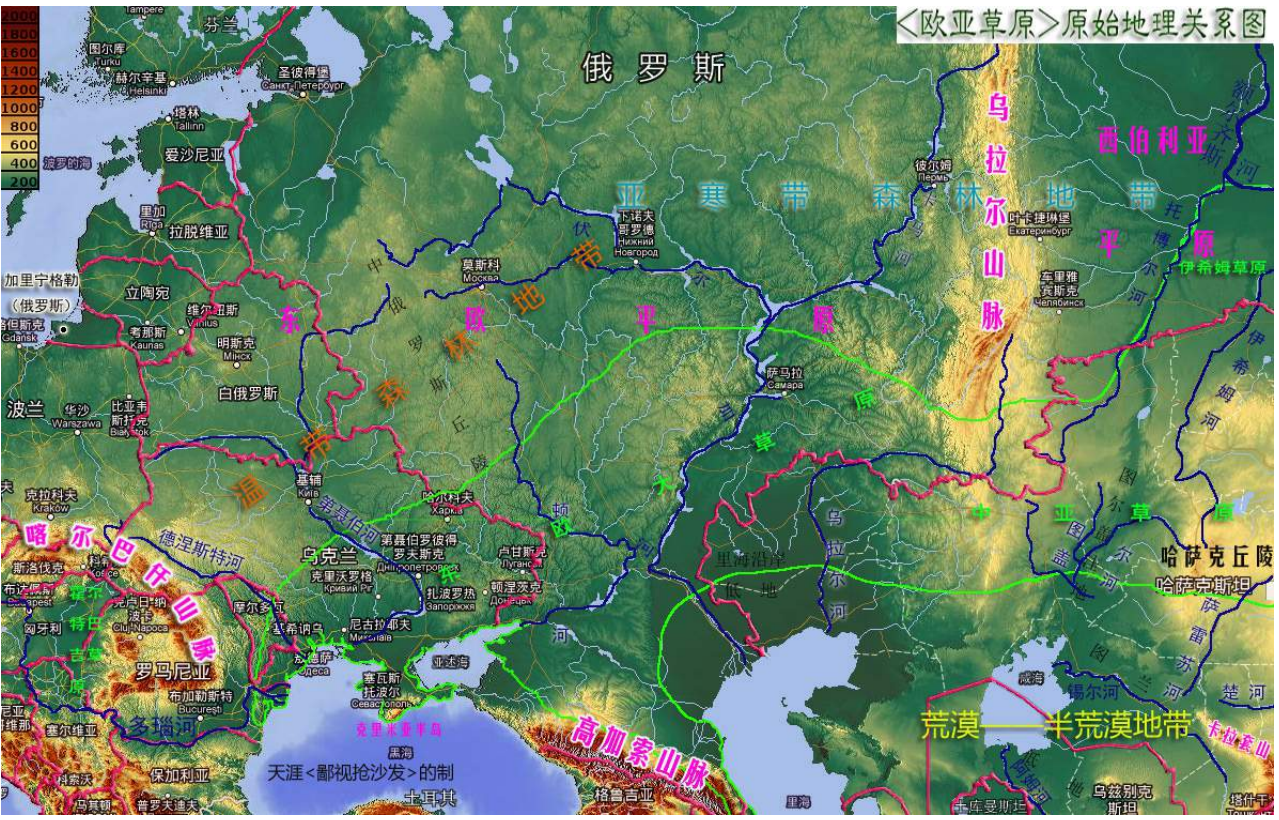
在游牧民族体系内，这片自西向东，由东欧平原（南部）起，穿越西西伯利亚平原（南部）、哈萨克丘陵、蒙古高原，直至大兴安岭以东辽河流域的跨越万里的草原地带，并不是以我们现在所认定的欧亚大陆分割线：乌拉尔山——乌拉尔河为界的，真正的地缘分割线是阿尔泰山西端。在地理划分上，阿尔泰山以东，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草原地带，被称之为“东干草原”；而阿尔泰山以西，以哈萨克丘陵北部、东欧平原南部为核心的典型草原地带，被称之为“西干草原”。

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曾经提到过东、西干草原的划分。所谓“干草原”，又称“典型草原”，从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草原类型是最常见的。我们脑海中那种一望无际，基本看不到树木存在的草原地带，所显示的就是这种草原类型。就其形成原因来说，主要是因为气候。200 到 450 毫米之间的降水量，使之虽无法孕育出大片对供水要求更高的森林，却又不至于变成沙石相间或黄沙漫漫的荒漠、沙漠地带。那些对水资源要求相对较低的草本植物，就此获得了大规模生长的机会，也由此而诞生了“游牧”这种生产、生活状态。

总的来说，东干草原和西干草原划分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地理分割上。事实上，这也是一条地缘分割线。就像我们之前内容所提到的那样，同属“低地草原”性质，并地理相接的西干草原带，会更容易成为一个游牧体系。而反之，“高原草场”（蒙古高原）属性的东干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也同样更有机会成就一个统一的游牧帝国。至于两者之间，阿尔泰山与天山之上的“山地草原”，以及因承受这些高山雪水，而延伸到荒漠地带的突起状草原带，就是两大体系争夺的目标了。

对于蒙古高原、中亚的草原结构，我们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是时候了解一下东欧大草原的基本状态了。就名称来说，东欧草原或者“东欧大草原”的概念并不太准确。这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整个东欧平原都是草原地带。事实上真正的草原地带，只存在于东欧平原的东南部。在俄国扩张到极致时，这一区域完全属于沙皇俄国，

乃至后来的红色帝俄的领土。因此以地缘政治角度来定义的话，比较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南俄草原”。当然，就一个地缘标签来说，把一个板块与某一现实存在的政治体联系在一起，总是会很麻烦，或者说让一些人不舒服（想想在亚洲东部，那些不同国家所定义的“东海”概念）。尤其是当年的俄罗斯帝国现在已经分裂，这片已经不复为草原的原始草原地带，除了俄罗斯以外，乌克兰、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也已经分得了一部分。因此我们还可以用一个纯地理上的名称来标示它：黑海——里海干草原（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后面还是用“南俄草原”代指好了）。



欧亚草原原始地理关系图

将这片草原与黑海、里海联系在一起，应该是这片草原的位置处在这两片“海”的北部。从气候环境上来看，黑海、里海之北拥有半干旱的“温带草原气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尽管整个欧洲实际上是一个被海洋三面包围的半岛型结构，能够最大限度的享受到海洋所带来的湿润气候。但具体到黑海、里海北部，却是欧洲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完全封闭的里海，以及几乎完全封闭的黑海，并不能为周边地区带来海洋气候。

当然，比起更加深入大陆腹地的里海以东地区来说，南俄草原在温度和降水上的条件还是要好得多了。相对温和的温度，以及更为充沛的降水（西北部降水可达450——600毫米/年），都让欧洲这片草原地带上的牧草，生长得更为茂盛。然而降水太多了，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也不是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木本植物将取代草本

植物，成为土地上的优势植物种群。大片森林的存在，无疑会阻碍游牧民族保持自认为“先进”的生活方式。在这些森林占优的地带，保持原始渔猎习惯的部落，一般会更容易过渡到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阶段，并让自己的文化发展方向与居无定所的游牧文化相背。

而从战术上来说，直接征服并占据森林地带也是一个难题。因为那些高大、茂密的树木，会让游牧民族眼中的“猎物”（既包括动物也包括人）更容易躲藏起来，并反过来攻击自己。这种情况，在一望无际的干草原上就不存在了。游牧民族兵民合一、牧战合一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强大战斗力、机动力，使得他们始终都是草原真正的主人。而来自草原以外的定居民族在拥有工业力量之前，即使能够让一些游牧部落听命于自己，也无法真正占有和开发草原。



东欧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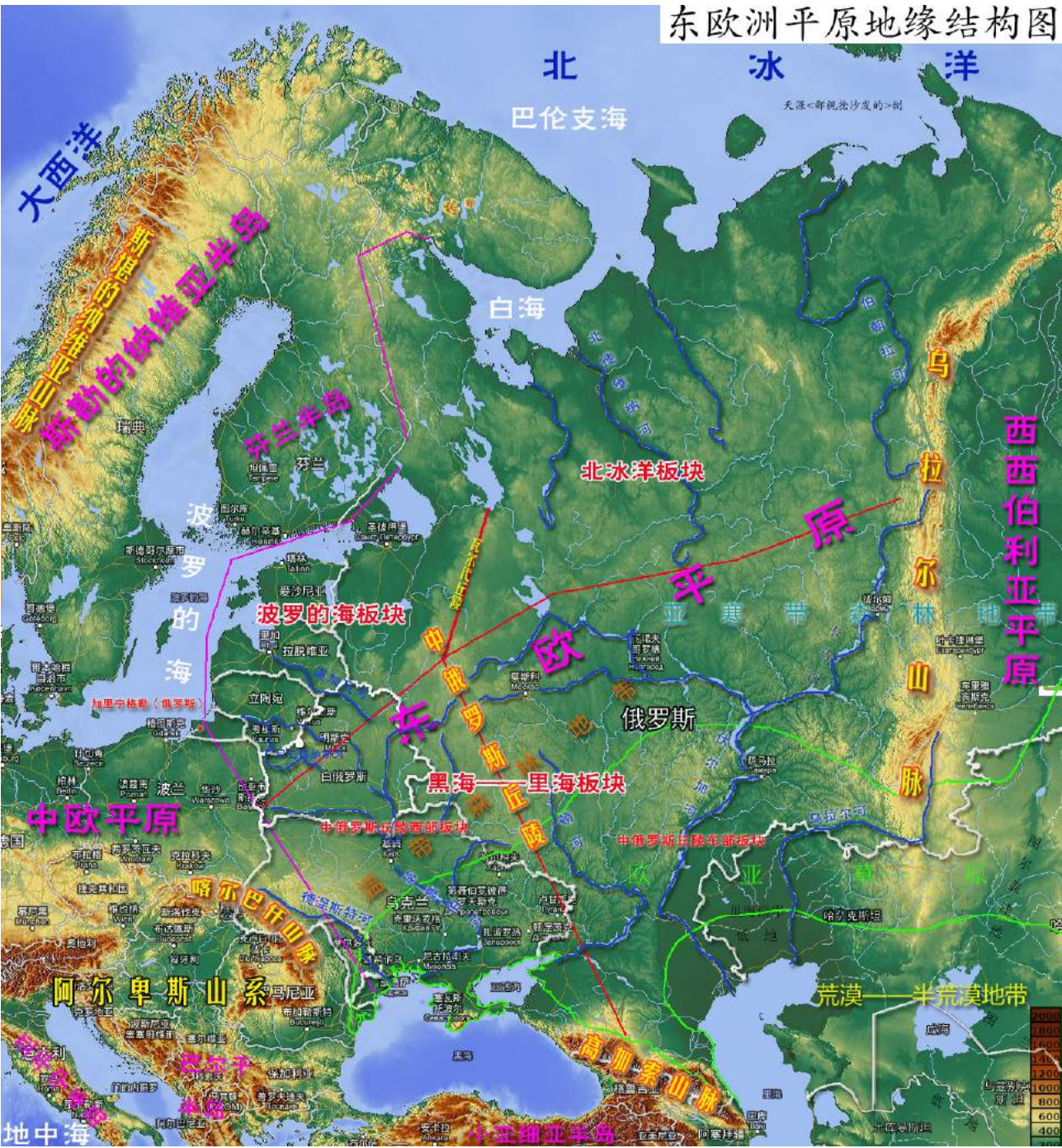
“东欧平原”这个概念。总的来说，欧洲大陆的一大特点就是“平”。最突出的一条山地，就是地中海北岸以阿尔卑斯山脉为核心的“阿尔卑斯山系”。而所谓东欧平原与中欧平原的分割，其实也是以这条山地带为参照的。阿尔卑斯山系以东的部分，一直到乌拉尔山脉都看不到山地，这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东欧平原”。如果要更直观的从行政地图上观察它的位置的话，我们可以从黑海的西边缘，拉一条直线到波罗的海的东南角（大致就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位置）。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就很简单了。我们需要找到一条能够分割森林和草原的降水线，以了解草原民族在欧洲地区究竟能够真正扩张到哪一步。这件事情如果让气象学家去做的话，相信他们一定能给我们找出一大堆数据，来标定这条分割线在各个历史时期可能的位置。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有更为简单的办法来理解我在《欧亚草原原始地理关系图》所标出的那条草原——森林分割线。而解开这个谜团的密码并不复杂，问题的关键仍是在我们在地缘解读中经常见到的两个字：风、水。

在解读欧洲草原的“风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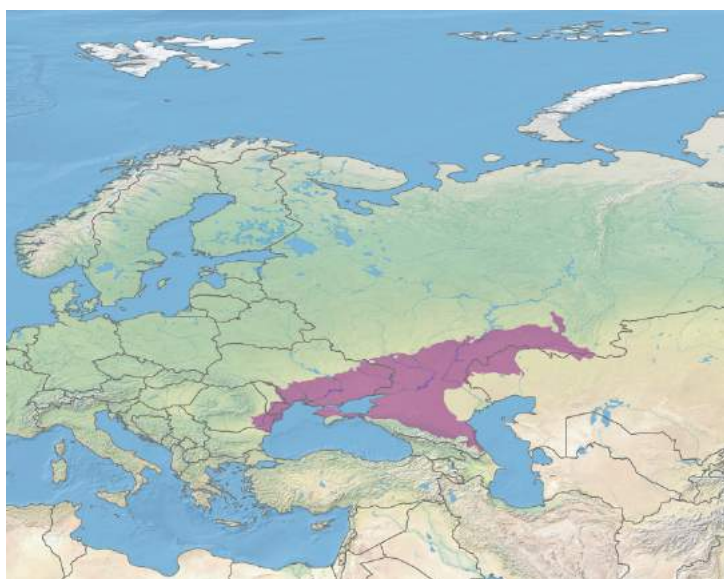
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确一下

直线以东的部分，大致就是东欧平原；而直线以西，阿尔卑斯山系以北，则是另一个地理单元——中欧平原（山地以东的平原是东欧平原）。



东欧平原地缘结构图

确定东欧平原的大致范围，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开心中的疑惑。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我们还需要从东欧平原的地理结构入手。在实践中，我们很容易被“平原”两个字限制了自己的思路。事实上，“平原”这个地理标签，并不是只是用于纯粹的河流下游冲积扇地区，而是往往会包含一些中游，甚至上游地区的低缓丘陵、



南俄草原位置图



南俄草原（大部已农业开发）

台地在内。像东欧平原也是这样，它内部大部分土地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平原，而是低缓的丘陵地带（海拔 300——400 米）。与真正的山地相比，这点海拔的丘陵地带实在是不值一提。但放在东欧平原这片平均海拔不过 170 米的土地上，这一点点相对高度差就足以改变各板块的命运了。

当我们不再认为东欧平原是一马平川的地带之后，就很容易从河流水系的走向判断出它的分水岭，并以此作为地理单元乃至地缘板块的划分标准。依此原则，我们可以将整个东欧平原分割为：北冰洋板块、波罗的海板块、黑海——里海板块。我们目前所解读的南俄草原，正是在黑海——里海板块中。单从那张《东欧平原地缘结构图》，相信很多朋友已经领悟到，原苏联欧洲部分的七个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以及波罗的海三国，是依照什么地缘原则来

划分的。这些国家的形成，又是建立在什么地理结构和哪些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之上的。不过，认真解读这些问题，是欧洲部分的事情了。我们现在的重点，还是在于那片影响欧亚大陆三千年历史的草原。

就欧洲的地形来说，如果说是一个院子的话，那么北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和地中海北部的“阿尔卑斯山系”，以及东边的乌拉尔山，就算是这个大院子的围墙了。只是这些“院墙”本身并没有把欧洲大陆合围成一个盆地地形结构，面对大西洋的整个西欧海岸线并不存在高地阻隔。这也为纬度偏高的欧洲大陆带来了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当然，真正算得上海洋性气候的，主要是现在法国所在的西欧平原了。到了离大西洋较远的东欧平原，气候类型已经变成“温带大陆性气候”了。

然而南、北欧两大山脉与大西洋的位置关系，也还是影响到了东欧平原的降水

分布。也就是说，大西洋的水汽，会更容易沿欧洲大陆中部（东西向）向东输送。具体到降水分布上，就是使得东欧平原呈现出降水由中间向南北两端逐渐减少的趋势，这种影响也很自然的体现到了植被分布上。这似乎意味着，东欧平原中部能够孕育出大片森林（依年平均气温不同，又分为温带森林和亚寒带森林）。而南、北两端，森林则会逐渐消失，退位给了对降水要求更低的草本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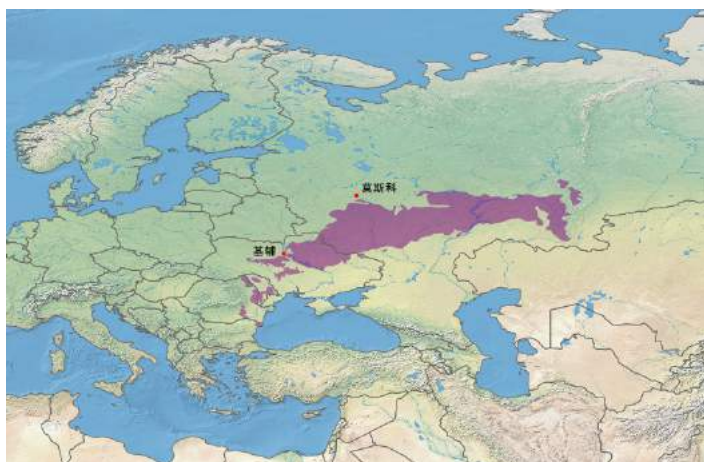


欧亚草原原始地理关系图

这一推测，放在东欧平原南部是对的。不过在北部靠近北冰洋的海岸线，温度却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过于寒冷的气候，使得那一区域虽然降水量少，但蒸发量也小，反而能够在地表保持相对湿润的环境。不过极端气候却并没有在此孕育出像温带那样的草原，取而代之的是更为低端的植被类型“苔原”。

无论是从植被类型，还是气候来说，东欧平原北部注定无法成为欧亚大陆博弈的主角了，就像西伯利亚板块一样。我们还是把目光锁定在南部那些靠近黑海、里海的低地上来。从河流的角度来看待这片草原地带。我们可以罗列出几条重要河流来，它们从西至东依次是：德涅斯特河、第涅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以及现在被认为是欧亚大陆分割线的“乌拉尔河”。所涉及的到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是“前苏联”的成员：摩尔多瓦、乌克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河流在东欧平原中部“高地”（相对高地）上的上游部分，还是属于典型的森林覆盖区，真正的典型草原存在于这些河流的中下游部分。需要



东欧森林草原地带示意图



东欧森林草原地带



莫斯科公国

说明的是，森林和草原之间并不是突然切换，而是存在一条狭长的森林、草原混杂的“森林草原”地带（北部森林成分多些，南部草原成分多些）。而这样一条森林草原地带，也自然成为森林、草原民族博弈的平衡线。当然，在大部分古典时期，拥有更强大内部整合能力以及机动性的草原游牧民族，会在博弈中更占优势。

在东欧平原上，最典型的博弈出现在蒙古帝国时期。受害者就是现在“东斯拉夫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族）的政治祖先——基辅公国。也就是说，东斯拉夫人的龙兴之地，算是在现在乌克兰境内的第涅伯河中游一带。问题是，这里离草原的距离实在太近了。在强大的蒙古人到来之时，尽管斯拉夫人联合了游牧于欧洲草原上的钦察人，共同抵御这些来自亚洲的敌人，但结果还是失败了。如果你希望自己能够脱离蒙古人控制，只是间接接受其统治的话，政治中心和领地就必须向森林深处转移了。在这种背景下，更接近森林腹地的“莫斯科公国”，就从诸多斯拉夫人小邦中脱颖而出，并发展成为后来的俄罗斯帝国的。

关于斯拉夫人之间的恩怨，以及草原游牧民族对他们的影响，不

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在我们所解读的历史时段，东欧森林里面的斯拉夫人祖先，还只是处在原始公社状态，并没有机会在地缘政治舞台上一展风采。而能让草原以南的巴尔干半岛上那些被希腊、罗马文明覆盖地区印象深刻，甚至让亚洲东部的汉帝国记上一笔的是还是南俄草原上的游牧者。在历史上，他们被统称为“阿兰人”。

第二节 哥萨克人在南俄草原形成的背景

现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小玉兹诸部因为位置关系，可以说是来自欧洲游牧者的基因保持最多（一定要把历史追溯到阿兰人也可）的。在欧洲文明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今天，相对较白的肤色，甚至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产生了优越感。事实上，自公元四世纪匈奴人西迁而起，欧亚草原上已经几乎不存在纯粹的欧洲游牧民族了。在后来的历史中，从阿尔泰山到多瑙河的草原地带，成为混合了欧亚游牧民族基因的，操突厥语的游牧部落的天下。而从游牧体系的属性来说，他们都应该被归属为亚洲游牧民族。

如果不是俄罗斯人有机会凭借他们的欧洲属性（主要是人种上），从西欧文明中吸收力量崛起的话，南俄草原到现在可能还是为突厥游牧部落后裔所覆盖。事实上，即使在能够从西欧工业化进程中直接吸收力量的19世纪后半叶，俄国人在征服南俄草原时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即使你能够凭借技术优势在一场战役中取得胜利，但要想长期占据这片草原，并把黑海以北那大片最具农业潜力的黑土地（由于土壤中有有机质的积累量大于分解量，所以土壤累计的肥力高）开垦成农田也是困难重重。这一点，和中原王朝对抗北方游牧民族时所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真正让俄罗斯人有机会在南俄草原站住脚跟，并进而强势渗透亚洲草原的，是一支来自斯拉夫人的变种族群——哥萨克人。

在事隔两千多年后，哥萨克人取代阿兰人，又一次代表欧洲人崛起于南俄草原。而他们后来为俄国人在亚洲所做的渗透工作，甚至可以与当年整个斯基泰游牧体系在亚洲的扩张，具有同等的地缘价值。这看起来像是一个轮回，一场关于欧亚大陆博弈的轮回。研究它的规律，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亚地缘政治的走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预测这个世界未来的地缘政治结构。

从出身上来说，哥萨克人和哈萨克人非常相似。前者的成员大部分是试图脱离沙俄帝国控制的农奴或者城市贫民；而后者则是由脱离金帐汗国的突厥游牧部落所组成（哥萨克和哈萨克同义，都是突厥语“自由人”之意）。在沙俄帝国还没有能力直接控制欧亚草原，而蒙古人所创建的游牧帝国体系又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分裂状态时，中亚——南俄草原所组成的“西干草原”地带，也就此开始了地缘政治上的重组过程。

蒙古人在欧亚草原所建立的以尊黄金家族成员为汗的游牧体系，最终崩溃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所谓有盛就有衰，无论再强大的帝国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只不过按照过往的经验来说，草原上的政治重组始终是游牧民族内部的事情。或者说，无非是这些部落当中有一个最强大者最终统一了整片草原，并将自己的族名覆盖到其他部落头上罢了。然而这一次情况却有些不同。因为从欧洲方向参与草原地缘结构重组的成员，并非游牧体系的成员。相反，他们更应该被视为西方文明在草原上的代

理人，他们就是“哥萨克”人。

哥萨克人出身之前我们也说了，他们之所以成为草原游牧体系的终结者，源于他们与游牧体系迥异的地缘背景。尽管看上去，这也是一个驰骋在草原上的马上“民族”。之所以为民族二字打引号，是因为在苏联官方认定的民族体系中，并不承认哥萨克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只是俄罗斯族内部的一部分罢了。这种情况与汉族体系中的客家人，颇有些类似。不过这些官方的认定，并不影响我们从地缘角度来审视他们的存在。



斯拉夫人



哈萨克人

哥萨克人与哈萨克人区别，首先在于人种上。尽管哥萨克人在形成过程中，也吸收了一定的突厥游牧者，但族群的基本属性还是属于斯拉夫人（主要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而后来被定义为“哈萨克”的族群，则是属于在中亚已经生活了上千年，并不断补充新成员加入的混血突厥游牧部落。当然，人种上的差别，并不是造成他们分隔成两大族群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所谓的突厥人，本身就是由欧、亚两股游牧势力混合而成的。在草原游牧者看来，肤色、长相从来不是阻止他们融合的问题。

问题在于，那些为脱离沙皇俄国控制，而选择进入南俄草原做“自由人”的斯拉夫人，已经拥有了成熟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很难融入突厥体系了。这一点，又与整个西方在文明影响力上的崛起有关。尤其是在俄罗斯帝国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手上过继东正教之后，这些在政治上试图脱离俄国控制的“自由人”，最起码在宗教和语言上已经很难伊

斯兰化和突厥化了。就这一点而言，虽然强力，但在“文化”上却略显原始的蒙古人（蒙古人最初所信奉的是原始的萨满教）就吃了大亏了。代表蒙古帝国征服各方的部落，后来大都被当地文化、民族所吸收。

实际上，早在沙皇俄国建立之前的 13 世纪，也就是东斯拉夫人各邦国还在接受

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之时,就已经开始有不同民族出身的人试图在草原上过“自由人”的生活了。也正因为这一时代的背景,突厥语的“哥萨克”,才成为那些在南俄草原游荡的斯拉夫人、突厥人共同的名称。只不过,民族出身、语言、宗教迥异的两拨自由民之间,最终还是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并成为西方文明与草原游牧文化争夺欧亚草原主导权的代理人。

就地缘政治背景而言,哥萨克——哈萨克两大族群的形成,与16世纪中叶的两个国家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一个是沙皇俄国的建立,另一个则是哈萨克汗国的形成。前者的形成,无疑是东斯拉夫人族群的一次成功整合。而出于增强国力的需要,强化中央集权体系也加速了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的人身束缚(变成了所谓“农奴”)。这种改变也使得逃往南俄草原的斯拉夫人数目剧增,以至于可以自成体系,与正在重新组成的突厥游牧体系相抗衡。至于这个新的突厥游牧体系,自然就是正在解读的,整合了从里海之滨到天山北麓各突厥游牧部落的“哈萨克汗国”了。



西干草原示意图

按照上个世纪流行的阶级划分来说,那些斯拉夫人的草原自由民,更应该与同样背景的突厥游牧民走得更近,甚至融合。不过,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根本性的民族背景(语言、宗教,甚至人种等),最终还是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那些哥萨克人最初是为了脱离沙皇俄国人统治,而逃到南俄草原上的。但共同的民族背景,还是让他们决心成为俄罗斯帝国在草原上的代理人。对于二者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决定。帝国可以通过这些拥有与游牧民族同等机动力、战斗力的哥萨克,扩张帝国在亚洲的领地。而哥萨克们则可以依靠强势崛起的俄罗斯帝国,所提供的支撑作用(包括从西方文明中获得技术优势,如武器),来扩张自己在草原上的利益。

反过来,那些重新组合起来,试图在草原上重新崛起的突厥部落联盟——哈萨克人,就很难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对南俄草原保持压力了。而等到哥萨克人为俄罗

斯帝国扫清南俄草原上残存的游牧汗国、部落后，哥萨克人的目标就不可避免的指向中亚草原了。

第三节 哥萨克人渔猎属性的形成

抛开那些政治、文化背景，从更原始的地缘关系来分析哥萨克与哈萨克人的博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南俄草原与中亚草原之间的板块碰撞，也可以将之看作是两种不同属性族群之间的博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活跃于南俄草原上的哥萨克人，其支撑自己存在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传统”的游牧。事实上，如果按照我们在古典时期，经常用到的三类族群标签来定义哥萨克人的话，我们更应该将之定义为“渔猎”民族。也就是说，哥萨克人在草原上的扩张，可以称之为“渔猎”文化对草原游牧体系的一次逆袭。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做出如此有趣的定位呢？

对于“渔猎”这种生产方式，可以说是人类最早谋生的手段了。从自然界捕猎、采集可食用的动植物，本身并不是人类所独创的方式，而是一种本能。然而人类毕竟与动物不同，作为万物之灵，人类的“渔猎”范围并不仅仅是那些自然界的产出，更包括那些其他族群通过各种方式所得到的产出，甚至是人类本身。从这点上来说，劫掠一类的生存方式，本质上也是“渔猎”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把一个族群或者政权的原始属性定义为渔猎、游牧或者农耕，并不是说这个族群就只能采取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了。而是说这种生产方式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并直接影响了族群的文化属性。尤其是所谓“渔猎”民族，如果想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话（标志是国家化），几乎很难依靠“渔猎”的方式做到。部分人口转事更“高级”的游牧、农耕生产，是一种趋势。不过因渔猎而形成的族群性格、行为方式，通常会延续一段时间，尤其是渔猎所获取的物资，在经济生活中还占有相当比例时。

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在东北地区强势崛起的高句丽人。在古典时期的农业技术条件下，燕山以北（包括朝鲜半岛）适合大规模农耕的土地并不多。这支渔猎民族在立国并成为唐帝国劲敌之时，渔猎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仍然占有 50% 左右的份额。也就是说，受地理环境所限，高句丽人并没有很好的完成由渔猎向农耕的进化过程。当然，这也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最起码这个渔猎份额不单让我们可以认定这个政权的基本属性为“渔猎”，更在技术上保证了高句丽人拥有优势的军事效率。而对于这点，来自中原的隋、唐二代帝国，都有着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回到哥萨克人的问题上来，将这个族群定义为“渔猎”，并不仅仅因为他们西伯利亚追逐珍贵的毛皮，并把它们输往西欧市场的行为。实际上，很多时候他们并不一定要亲自去做这些事，而是以军事、政治优势去胁迫那些土著渔猎民族上缴这些物产。只不过，从不事生产直接获取产出这点上来说，无论哥萨克人自己去干，

还是间接通过收税、劫掠的手段收获这些毛皮，都可以被归类为“渔猎”行为。

哥萨克人当然也会用商人的手段，去交易一些他们所需要的物资。然而，这一点只要是不太原始的族群都会很自然的运用，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的族群属性。事实上，哥萨克人的族群属性，并不是在为俄罗斯扩张西伯利亚时才定性的。当这些斯拉夫人聚集在南俄草原上，并因为宗教、民族方面的原因拒绝融入突厥游牧体系时，哥萨克“渔猎”的民族性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他们渔猎的重点并不是草原上那少得可怜的野生动物（相比森林地带），而是往来于欧亚大陆的商队。



哥萨克人

在此之前和之后，也一定会有愿意冒险的商人行走在草原上的。尤其是在小亚细亚半岛的土耳其人因为与欧洲人的博弈，切断了传统上由地中海进入欧洲的商路后，盘踞在南俄草原上哥萨克人就更有机会依靠劫掠来维持自己的存在了。当然，哥萨

对于中国人来说，东西方商路通常被定义为“丝绸之路”。而所谓“丝路”的重点，就是天山南北了。这也让我们对于天山北麓的河中之地，以及伊朗高原的关注度要高。不过，如果将东西方商路的西方终点定位在欧洲的话，我们会发现，乌拉尔山脉与里海之间的缺口也是一条天然的通道。而这条通道之所以不为我们所熟知，很大程度上在于这是一条草原通道。无论你从哪个位置向乌拉尔山南切入，都无法绕过南俄草原。对于商人来说，那些由定居民族所经营的城市，才是最安全的补给点（并且本身还是巨大的商业市场）。相比之下，让草原上那些行踪不定的部落来保障你的旅途安全的话，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特别是这些游牧部落本身，也喜欢用“渔猎”来补给自己的生活时。

不过风险固然存在，但通道也是现实存在的。即使没有像蒙古帝国那样横跨欧亚的帝国存在，以来保障“草原丝绸之路”的安全，在

克人“渔猎”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商旅了，那些试图在森林、草原地带开耕黑土地的农场，以及那些突厥游牧部落也是哥萨克人周期性侵袭的对象。总之对于一个准备以劫掠为生的族群来说，并没有义务去区分对象的属性（有没有经济价值才是最重要的标准）。

其实从技术上来说，渔猎的生活方式比游牧会更有攻击性。因为无论被攻击的对象是动物还是人类，这种生活方式本身都是一种军事训练。而与传统在森林中渔猎的民族不同，哥萨克人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渔猎者，这让他们拥有了与游牧民族一样的大规模机动的能力。而这些特点显示在军事上，就是让哥萨克骑兵成为历史上最让人望而生畏的骑兵集团。

当能够有不输于游牧民族的草原机动能力与战斗力的哥萨克人，与完成农业化进程，拥有更大人口、经济潜力的俄罗斯帝国结合在一起时，无论是来自北亚草原的蒙古人，还是中亚草原的哈萨克人，事实上都没有机会再染指南俄草原了。而当俄国人可以从西欧获得更高层级的军事技术，乃至工业技术、产品后，游牧民族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扩张空间有限的问题了。他们所世居的土地不可避免的成为那些来自欧洲的斯拉夫人，所扩张利益空间的方向。

第四节 清帝国和俄国同时逆袭草原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东欧平原所发生的这一进程，在欧亚草原的另一端，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东亚也同样在发生。沙皇俄国在东欧森林地带正式打出帝国大旗后（1546年）不久，欧亚草原东端的森林地带——东北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开始出现异样了。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的后金国正式挂牌成立。一场由东、西两个方向，以渔猎+农耕模式对游牧草原所进行的逆袭，也徐徐拉开了序幕。

满洲渔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关系，以及在融合过程中，代表华夏文明向西、北方向所做的扩张工作，相信即使没有我们之前内容的多次解读，大家仅凭传统的历史知识，也能有自己的认识了。从本质上来说，中央之国向欧亚大陆腹地的这次扩张，与汉、唐两大帝国一样，都是农耕文明对游牧体系的一次“逆袭”。不过，就结果来说，清帝国是做得最好的，帝国的实际控制区域要超出汉、唐两代。这其中起作用的因素有很多，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就蒙古高原、西域，以及青藏高原腹地的渗透来说，渔猎民族本身对于这些边缘地区的适应性，起到了关键作用。具体到“人”的因素上来说，满洲人本身的“夷狄”出身，让他们无论从自己主观愿望，还是对方的客观接受度上来说，都更容易与那些边缘民族之间取得政治、文化上的共识，并最终促进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发生质的变化（想想清朝皇帝大多能说几族语言，并有意识的接受各种宗教，相信大家就能够更理解这一点了）。

其实对于中央之国和华夏文明来说，整体的经济实力和文明程度，从来都不是

一个问题。问题是地缘博弈的结果，并不仅仅是由 GDP 和文明程度来决定的。对于华夏文明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族群或者文明本身太过强烈的农耕属性，使得即使在整体实力对比上拥有对边缘地区的压倒性优势，也很难真正把这些实力转换为军事优势，并体现在对边缘地区的扩张上。从这点上来说，导入一定对边缘地区更有适合性的外来基因，对于整个中央之国的成长来说，是有益处的。事实上，中央之国的形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导入、整合边缘文化的过程。在我们已经解读过的历史时段，原来被排斥在华夏文明之外的秦、楚文化都有过类似的过程，并且凭借他们的边缘基因，为中央之国后来的核心区吸收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欧亚草原地带示意图

回到欧洲大陆的东端。俄罗斯帝国向草原的扩张，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次农耕文明的反击。从经济层面上来说，沙皇俄国的建立，相当于在东欧平原上掀起了一场农业革命。尽管从阶级感情上来说，我们所曾经接受过的教育，会引导我们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沙皇俄国的“农奴制”。但对于地缘结构一盘散沙，农业规模和技术都处于相当原始阶段的欧洲人来说，像俄国这种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并把大量人力资源固定在土地上有计划的从事农耕经济的做法，已经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了。而这也是俄罗斯帝国最初能与整个西欧大陆对抗的力量来源。

当然，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完全有理由对俄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这一农业化进程嗤之以鼻。因为华夏文明的农业化进程，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了。问题在于，直到中世纪，整个欧洲的农业水平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规模上，都还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比如像华夏核心区那种精耕细作，能够利用一块土地进行不间断进行种植的做法，几乎不存在。那些欧洲中世纪的统治者和农民，对于农业的认识还处在很低级的阶段。每当一片土地因种植作物而耗尽肥力时，他们就是去寻找另一片土地进

行耕作。而所谓的进步，也无非是进化到有计划的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轮作（相反，农业化程度更高的中国人就会利用各种积肥的方式，让肥力重新回到土地上去）。而对土地利用效率上的差异，只是欧洲农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读并不是现在的重点，不过它已经能够给我们以启示了。由于没有强大的农业提供支撑，在俄罗斯帝国崛起之前，欧洲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包括曾经强大的罗马、马其顿帝国，能够真正逆袭过草原游牧民族。我们之所以要用“逆袭”这两个字，是因为鉴于双方的属性，游牧民族对于边缘定居区总是处于主动的。或者说，在古典时期的地缘博弈中，如果他们不对那些富庶的定居者（包括农耕、渔猎者）有想法的话，那些定居者并不会仅仅为了让自己的食谱中有更多的牛羊肉，就对那些草原产生想法的。真的要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将触角伸入草原的话，那就是“逆袭”了。

对比中央之国在东干草原的逆袭和俄罗斯帝国在西干草原逆袭的话，会发现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双方都是凭借农业所提供的强大经济基础，再在技术和意识上导入了一定渔猎基因来做到的。所不同的是，在东方，渔猎基因是伴随着满洲人在中央之国取得政治领导权，自上而下的导入的。这种政治上的主动权，加上东亚核心区更为成熟、强大的农业经济实力，使得在政治上后发的清帝国（比俄罗斯帝国建国晚）控制东干草原，进入东、西草原博弈的中间线：阿尔泰山（西、南麓）——天山北麓山地草原的时间，要远早于俄罗斯帝国。

不过，在整个欧洲技术崛起的大背景下（即使没有正式进入工业时代，欧洲人在火器以及军事理论上的进步，也已经与故步自封的清帝国和游牧民族，不在一个层面了），19世纪后半叶俄罗斯人最终也还是推进到了天山北麓。并与中央之国合力完成了对欧亚草原的分割。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分割一开始是以一种无缝对接的方式而完成的。然而当这个世界被各种性质的“革命”完全带出古典时期后，蒙古高原和中亚草原又分别从两大帝国当中分裂出来，在政治上完成了独立。只不过，在今后的历史中，这些曾经深刻影响欧洲大陆文明进程的草原之地，注定只能成为地缘博弈中的配角了。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来。既然我们认为俄罗斯帝国或者说斯拉夫人在草原西端的逆袭，大的地缘背景上取决于俄罗斯在农业经济上的进化。那些被我们认定为“渔猎”基因导入的哥萨克人，其所起的具体作用是否与东方满洲渔猎基因的导入相同呢？从技术上来说，其实这其中还是有很大不同的。简单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中央之国的这次导入，所引发的是战略层面上的影响；而哥萨克人的产生，对于俄罗斯帝国来说，则是战术上的导入。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渔猎基因的满洲人在中央之国所取得的是政治领导地位，这使得他们更多的是在凭借自己相对更开拓的思维方式，来调配中央之国的资源来实现对东干草原的控制；反过来，哥萨克人就没有那么好的命了，这些自由人血液

所蕴含的渔猎基因，对于俄罗斯帝国来说并没有政治上的影响。其价值仅仅体现在他们对草原的适应度，以及不逊色于游牧民族的机动力、战斗力。这些特点，既能够让他们为俄罗斯帝国在草原上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也能够让他们代表欧洲系的斯拉夫人，在人口覆盖上逆转亚洲突厥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的优势。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打得赢，站得住”。

现在问题似乎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将哥萨克人的族群属性定义为“渔猎”是否合适？对于这一点，也有人提出了异议。毕竟哥萨克人最初的来源很大程度是从俄罗斯帝国逃亡的“农民”（农奴），而后来哥萨克人看起来也在南俄草原，甚至西伯利亚南部草原定居下来，并开耕出大量农田了。不过，定义一个族群或者文明（文化）属性的基本标准，并不在于此。而在于这个族群文化中最本质的部分，到底源自于哪一种生产方式。

这就好像现在的华夏民族，即使因农耕所产生的 GDP 在整个国民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很低了。但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属性，还是产生于几千年来稳定的农耕生活。这一点，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不会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而产生质的变化；也不会因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拿来”了多少东西而改变。除非承载族群特点的那些载体，如有利于降低内部文化分裂（因方言）倾向的汉字；能够让族群内部所有人上溯到共同祖先的姓氏；记载农业文明记忆的节气等尽数消失。

第五节 哥萨克人渔猎属性的价值

对于哥萨克人的祖先来说，无论他们在逃入南俄草原之时，是否想过要在这片黑土地上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农场，客观现实都不允许他们做到这一点。在游牧民族占优的草原上，一块土地是否能够耕种，并不取决于土地本身是不是能够种出庄稼来。这些草原的主人会如华北平原上那些未治理的河流一样，用自己的方式粉碎你的播种计划。因此最初流入南俄草原的斯拉夫人，按现在的定义来说，可以说只是靠天吃饭的“盲流”。原始的从河流、植被中收获食物的“渔猎”方式；以及被我们延伸定义过的，从他人手中劫掠的“渔猎”方式，都是这些斯拉夫所用以谋生的主要手段。

事情出现根本改变的契机，出现在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后。帝国崛起后那种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农业化进程，逼迫更多的斯拉夫人逃出了南俄草原成为“自由人”。这无疑使得在南俄草原上从事“渔猎”生活的斯拉夫人群体，与突厥游牧部落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了偏向斯拉夫人的变化。这些开始以哥萨克人自称的斯拉夫人，开始有力量在南俄草原上开耕并保卫属于自己的农场。由此，从结果上来看，哥萨克人为斯拉夫人所做的事情，似乎与美国西部大开发中，那些武装过的农民很类似。

那么哥萨克人能够如此独特的在历史中存在过，是否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武装过的农民呢？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开发美国西部的那些美国人，并不会被单独认定为一个特别族群的原因所在。

当哥萨克人已经有力量依靠农业来保障基本生活时，这个族群的属性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长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没有自然防御力的地形，使得哥萨克人带有很强的军事色彩。这看起来的确与后来开拓美国西部的那些农民有些类似。然而问题在于，就哥萨克人的价值来说，他们已经与传统的农民有所区别了。或者说，不能仅仅因为开耕土地，而认为这个族群是一群简单的农耕者。因为哥萨克人的武力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使用在保卫自己的土地上，而是具有攻击性的。劫掠这种被我们归结为“渔猎”属性的行为，在哥萨克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甚至可以说这种族群属性就是哥萨克人的价值所在。



哥萨克人征服西伯利亚

哥萨克人的这种渔猎属性，对于周边地区来说肯定是一种灾难。当然，如果这些来去如风的劫掠者所针对的是自己的对手的话，那么他们对于引导者来说，就是“正能量”了。在最初的时候，这些以自由人自称的斯拉夫人，并没有具体的国家归属感，理论上周边任何国家都可以雇佣他们去攻击自己的敌人。波兰和俄罗斯这两个敌对的斯拉夫国家，就经常成为他们的雇主。不过到了十八世纪，与哥萨克人地缘关系更近的俄罗斯帝国，成为哥萨克人最终的主人。对于双方来说，这是一场双赢的合作。亚洲那广阔的草原地带（也包括寒冷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带），能够为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利益。

哥萨克人当然也十分清楚，是什么因素能够让自己可以在帝国的庇佑之下，保持自己“自由人”的身份。因此在哥萨克人的生活中，军事训练和定期劫掠成为一

种文化。而以国家名义进行的那些战争，更是让哥萨克人有机会延续他们的渔猎文化，并让帝国看到他们存在的价值。如果说哥萨克人意识到这一点，更多的是出于本能和生存环境的话，那么草原东部的典型渔猎民族“满洲”人，在这一点的认识上就要深刻得多了。成为中央之国统治民族的他们，一方面在制度上，切断了主体民族与华夏文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基本不能务农、经商）。另一方面以八旗军制、国家供给的方式（旗饷），维持旗人的军事能力。

相比哥萨克人，满洲人在政治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也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优势，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继续维持那些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渔猎基因。反观哥萨克人就没有那么好的命了，他们只有不断向宗主和对手显示自己的武力，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如果哥萨克人仅仅是一群能够保卫自己土地的武装农民的话，那么对于帝国来说，他们也就没有价值了。

正是由于看到哥萨克人的价值所在，俄罗斯帝国的统治者们在锁定哥萨克人的国家归属之后，甚至还有意识地为哥萨克人输送人口（对于俄罗斯这样地广人稀的帝国来说，人口是非常珍贵的，流放永远比绞刑更有价值）。从族群层面的地缘博弈来看，这也使得斯拉夫人所代表的欧洲民族终于有机会在战略、战术层面，对亚洲游牧民族呈现压倒性优势了。如果不是同时期的中央之国也吸收了部分渔猎基因，并凭借巨大的经济实力先期渗透到东干草原和中亚的话，来自东欧平原的俄罗斯帝国，成为整个欧亚大陆腹地的主人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所定义的“渔猎民族”，更多的是一种民族属性，而非生产、生活方式。就好像如果马可·波罗是在18世纪来到北京的话，他一定不会认为，帝都里那些提笼挂鸟的满洲人是“渔猎民族”。

实际上，纯粹的渔猎生活是很难保持的。这种完全靠天吃饭的生活方式，会极大限制族群规模的扩大，以及领地的扩张。从生产方式转变上来看，渔猎向农业转变几乎是一个必然（除了少数进入草原成为游牧者以外）。而历史上崛起的带有渔猎属性的政权，从生产方式、人口组成上来说，也基本都是渔猎——农业混合体。常见的崛起模式是那些在森林中从事渔猎（包括原始农业）的部落中的一支，率先来到森林的边缘，在吸收更先进的农耕文化而上升到“国家”形式后，再凭借这种杂交优势在地缘政治版图上崛起（族群中的渔猎基因，尤其是那些还在主要从事渔猎的成员，会放大国家的军事实力）。越国、高句丽的崛起都是典型案例。

当一个被我们定义为“渔猎”的族群完全没有环境让他们用武力直接获取经济利益时，这个族群也就不再拥有“渔猎”属性了。满洲人后裔变成现在身份证上的少数民族——“满族”的过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而我们所认定的哥萨克人，则消失于在20世纪上半叶。苏维埃政权取代沙皇俄国之后，高度集权的国家结构，很快就让哥萨克人失去了自由选择的空间。被固定在集体农庄的哥萨克们，几乎不可能再自由去实践他们的渔猎本能了。此时的哥萨克，更多是凭借惯性在维持他

们的马上文化。

不过真正让哥萨克文化消失的根本原因，还是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哥萨克还是游牧民族，他们赖以让敌人胆寒的机动力与战斗力，在发动机和机关枪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了。而在这种背景下，哥萨克人在红色帝国的军队中，保有一个带有族群标志建制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了（不会再有哥萨克骑兵团了）。这也意味着，哥萨克人最终失去了唯一保有自己族群属性的机会。



库班哥萨克合唱团

游牧文化的部落也同样和渔猎民族一样，有可能融入在技术上更高一级的农业文明中。而在我们正在解读的历史中，康居人和月氏人也正在面临这种风险。至于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后面再解读。

相比渔猎属性的哥萨克人，那些仍希望保有自己游牧文化的部落，似乎要幸运些。他们在那些暂时还没有农业、工业价值的草原上延续了游牧文化。不过以历史趋势来看，游牧文化的最终消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即使是在古典时期，游牧文化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那些承载游

第二十章 锡尔河中游地区的地理结构

第一节 锡尔河中游右岸的地理环境

我们前面也已经说过了，康居人也好，阿兰人也罢，包括在伊犁河谷立国的“塞人”，都是属于欧洲游牧体系的一员，彼此之间会有很强的亲缘关系。他们之间的地缘关系，基本上可以套用现在哈萨克内部三个“玉兹”的划分。只不过，如果从种族、族群文化来源的角度来看，当日从南俄草原到天山北麓的部落，要比现在在哈萨克草原上的族群更为单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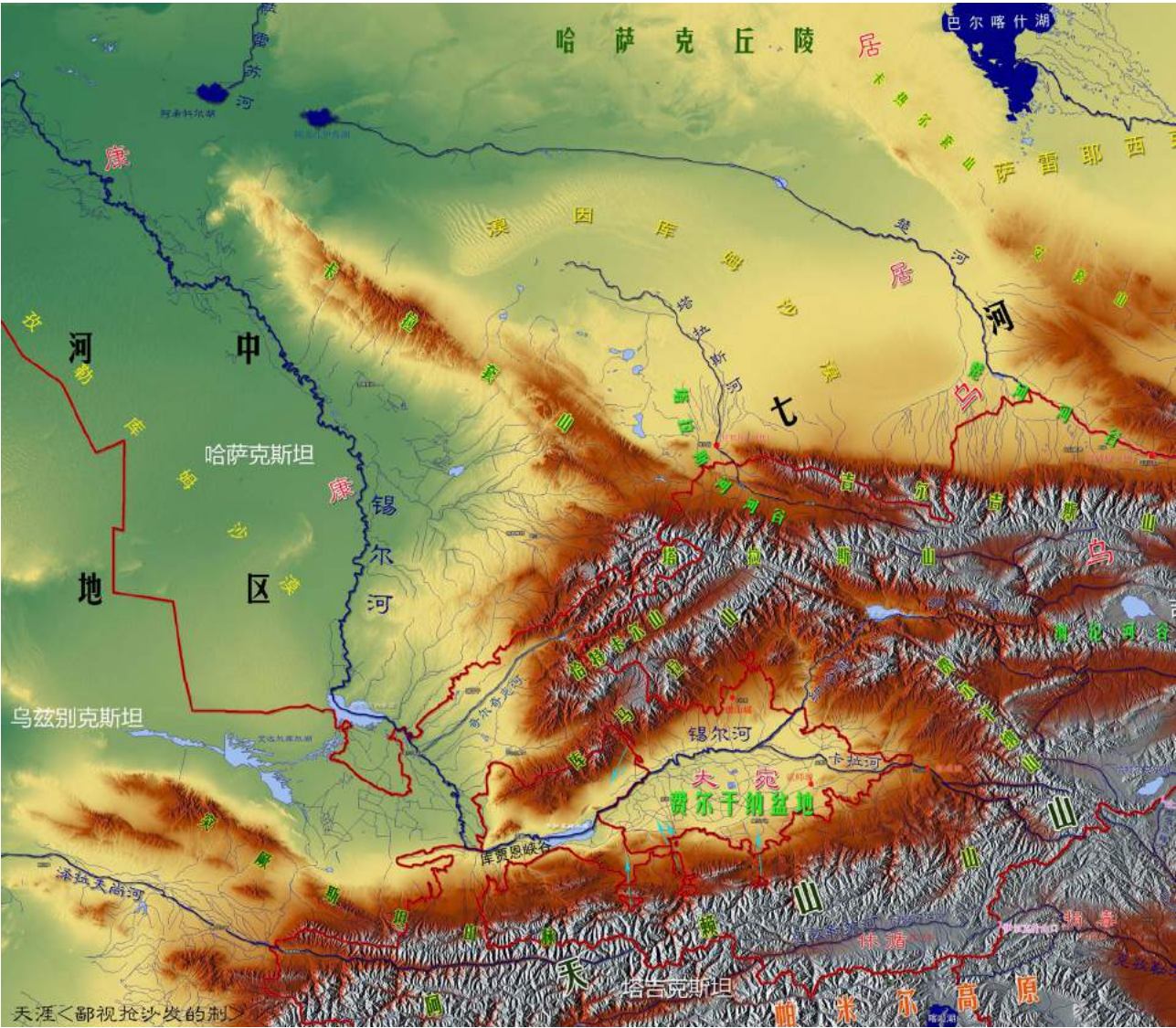
然而在月氏、乌孙这两支从河西走廊迁移过来的游牧民族，开始渗透入天山北麓后，这条东、西游牧体系博弈的草原线，地缘格局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了。即使这些来自东方的游牧部落本身也带有欧洲游牧民族的基因，但长时间与东干草原游牧体系交融的历史，以及与西干草原的地理距离，也足以让他们失去与活跃在西干草原上的欧洲游牧民族之间的血缘、文化联系了。换句话说，此时的月氏、乌孙两族，更应该被视为亚洲游牧体系渗透中亚的代表。

其实我们从大历史角度所分析出来的这些游牧体系之间的博弈格局，当时身处其中的游牧部落们并不会有那么深的感受。对于处在逃亡状态的月氏人来说，沿着天山草原带一路向西，逃离乌孙——匈奴两族的追击，才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中亚草原的潜力早已被那些土著欧洲游牧民族开发殆尽，并不会有一块无主地来收留他们。当月氏人被迫从刚刚到手不久的伊犁河谷出发，继续西迁时，从哈萨克丘陵而来的康居人，很有可能成为月氏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当然，此时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也可能是在伊犁河谷立国的“塞王”的领地，就像现在这两条河流的控制权，基本上归属于哈萨克大玉兹部一样。在这种板块相接之地，来自哪一方的力量占据优势都是正常的。

不管被乌孙——匈奴联盟挤压出伊犁河谷的月氏人，后来遇到的是哪个部落联盟的阻击，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些部落都是欧洲游牧体系的一员。我们也可以按照欧洲人的习惯，将他们统称为“斯基泰人”。如果没有别的力量介入的话，月氏人想谋得一块生存之地的努力，似乎一定要在与斯基泰人的博弈中见分晓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月氏人越过卡拉套山，到达锡尔河北岸时，情况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了。因为环境的变化，使得月氏人所面对的对手，不再只是和自己一样的草原游牧部落了。绿洲形态的农耕文化，也开始呈现在月氏人面前了。

从大的地缘板块划分来看，卡拉套山是被我们定义为中亚的农牧分割线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划分并不是说卡拉套山以南地区就不适合游牧民族生存。而是说卡拉套山以南的气候环境，已经能够孕育出以农立国的绿洲城国了。而西进的月氏人，

在越过卡拉套山之后，是否遇到过经营绿洲农业的“城国”，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在后来的隋唐帝国时期，卡拉套山与锡尔河之间，史书倒是很明确被记载存在过一个能种“粟麦”的国家——石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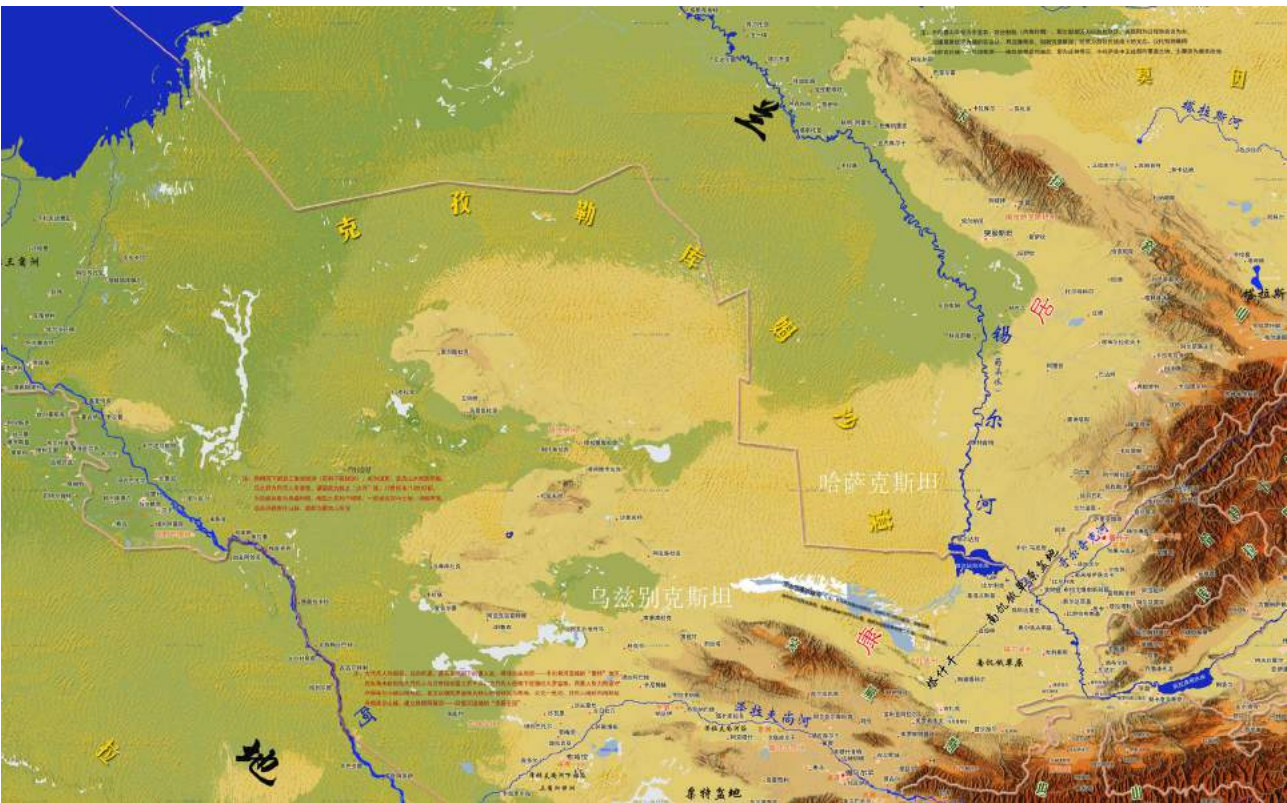
西天山北路地缘结构图（西汉）

按照中国历史的记载，石国是属于所谓“昭武九姓”的一支。昭武九姓又被定义为月氏后裔。这一切似乎都在向我们证明，月氏人在渗透入卡拉套山之后，便受环境影响开始逐渐接受农业文化了。问题是，卡拉套山以南的地理环境，就真的能把月氏人完全改造成为一个农业民族吗？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先来看看卡拉套山以南的地理结构。说起来很有趣，天山山脉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向西延伸一条支脉。而每两个支脉之间，就会自然形成一个“箕”状的地理区间。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塔拉斯河和楚河，就是处在昆格山和卡拉套山之间的区间。至于卡拉套山以南，同样的情况依然存在，充当另一条分水岭的山脉，拥有一个著名的

标签——突厥。也就是说，这条山脉叫作“突厥斯坦山脉”。

能够以“突厥”为名，突厥斯坦山脉在中亚的地缘地位可见一斑了。从地理结构上来看，突厥斯坦山脉也的确有机会突显自己的价值。因为这条体量并不大的天山支脉，实际上是中亚两河：锡尔河与阿姆河的分水岭。如果我们认同两河所处的“河中地区”是中亚文化的发源地的话，那么已经成为中亚文化新标签的“突厥”二字，给予这样一条位置居中的分水岭，也是很自然的事了。然而，尽管在地缘结构的认定过程中，结果会与我们单凭对地理结构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但一个地理中心能否升级为地缘中心，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它在人类交流中的区位，以及是否有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突厥斯坦山脉是具备的。因为后面我们将会分析到，突厥斯坦山脉所庇护的泽拉夫尚河绿洲，完全可以被称之为整个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枢纽。



汉西域全图

不过，我们先别忙着翻越突厥斯坦山脉进入下一个地理单元，因为作为在卡拉套山和突厥斯坦山脉之间的锡尔河还在静静地流淌。我们必须先厘清这个中亚名河周边的地理环境，才能继续走下去。如果要为这个地理区间命名的话，我们可以将费尔干纳盆地、卡拉套山、突厥斯坦山、咸海之间的这个区间叫作“克孜勒库姆盆地”。这个名字得自于占据这个区间大部分土地的“克孜勒库姆沙漠”。在干旱的中亚——西域地区，低地所代表的环境完全与我们在东亚所形成的概念相反，几乎就是荒漠

的代名词。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更像是在讨论哪个方向有机会成为天山雪水的汇出口，在荒漠之中开拓出一片（条）绿色之地来。

与卡拉套山以北的漠因库姆沙漠（这个地理单元也可以称之为“漠因库姆盆地”）南北各有一条自成体系的河流（塔拉斯河、楚河）的情况略有不同的是，这个地理单元中间只有锡尔河一条大河。形成这种局面，很大程度是因为费尔干纳盆地这个强大的集水区存在。而费尔干纳盆地西侧那狭窄的出口：库贾恩峡谷，则使得来自费尔干纳盆地的河水，不得不呈单线流入克孜勒库姆盆地。不过河流水系是合而为一，还是一分为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水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塔拉斯河和楚河的水量加起来，也只是锡尔河的零头了。



汉西域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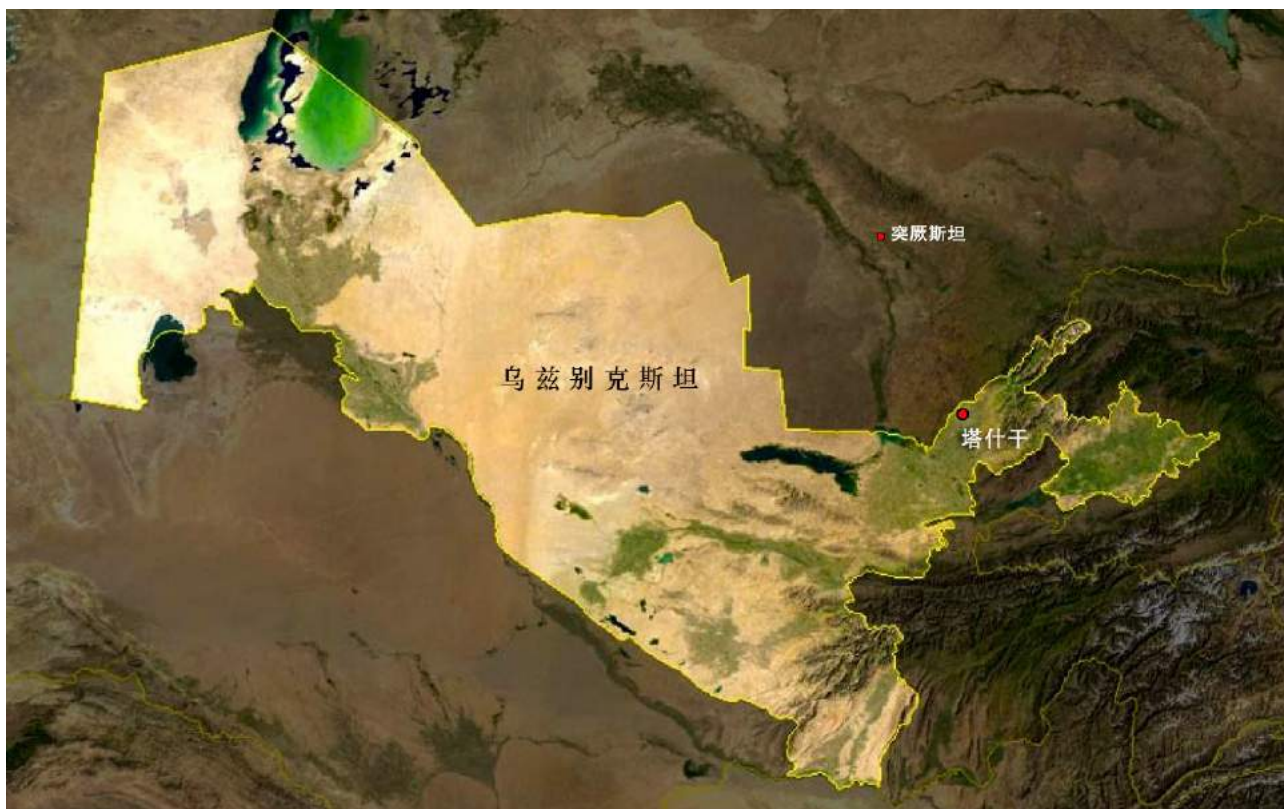
的大背景，以及在体量上明显占优的库拉明山、恰特卡尔山、塔拉斯山、卡拉套山上西流而下河水的不断引导之下，锡尔河干流用两次近乎 90 度的转向，向东偏移自己的流向。而锡尔河中下游与两侧山地之间的地理关系，也极大地影响了整个板块的地缘结构。具体的体现就是，锡尔河东岸，尤其是中游能够从塔拉斯山及其以南山地中获得支流补给的区域，更容易形成绿洲农业区。

在这些支流河谷中，最重要的河流叫作“奇尔奇克河”。奇尔奇克河谷所孕育出的重要城市，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其实单从农业条件以及

锡尔河流域最具潜力的地区，无疑是费尔干纳盆地。一般我们把锡尔河在费尔干纳盆地的部分，定义为河流的上游。而在流出费尔干纳盆地之后，锡尔河并没有顺势贴着突厥山脉北麓继续流下去，而是向北转了个几乎 90 度的弯，沿着费尔干纳盆地西侧的山前低地偏西北方向，呈弧状向卡拉套山方向靠拢，在即将进入卡拉套山集水区后，锡尔河又一次向北校正了自己的方向，转了一个 90 度的弯。这两个 90 度弯之间的锡尔河段，被划定为中游。

这种改变其实并不让人意外，从朝向和集水区的体量来看，克孜勒库姆盆地东北侧的情况，都要明显好于西南侧（突厥斯坦山脉东北面）。正是这种“风——水”关系的

人口潜力来说，塔什干及其周边的锡尔河中游右岸地区，是比不上费尔干纳盆地的。塔什干之所以能在乌兹别克斯坦内部竞争中胜出，得益于它在天山北麓交通线（丝绸之路北线）中的节点位置。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还包括远至咸海的阿姆河三角洲时，塔什干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东西纵深中，又具有了地缘中心的地位。这种交叉形成的区位优势，造就了塔什干的首都地位。其实这种天然形成的枢纽地位，也不是今天才被认识到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石国，也就是今日塔什干之所在。



乌兹别克斯坦卫星图

如果说锡尔河在拐第一个弯时，还能够在其右岸看到相对密集的农业绿洲区的话，那么当锡尔河拐出第二个 90 度弯，开始接收卡拉套山之水时，情况已经开始显得不那么乐观了。以卡拉套山的体量来说，已经不足以为锡尔河提供像样的淡水补充了。不过，这也是锡尔河在注入咸海之前最后的希望所在了。在以后的征程中，锡尔河注定只能在克孜勒库姆沙漠中孤独的前行。如果不是中、上游地区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淡水的话，锡尔河是不可能在自然损失掉（蒸发、渗透）1/4 的水量之后，还有机会和阿姆河一起，汇集出一个巨大的咸水湖——咸海。

尽管卡拉套山西南麓的降水情况不容乐观，很难形成像样的农业绿洲，但比起其他在沙漠中孤独延伸的下游地区，卡拉套山与锡尔河之间的这片区域，多少又有些优势了。干旱而又有些地形雨补给的环境，使得卡拉套山与锡尔河之间，有条件部分抵御克孜勒库姆沙漠的侵袭，形成一片三角形的荒漠草原带。对于从哈萨克丘

陵方向南下渗透而来的游牧部落来说，这也意味着他们在进一步渗透到天山山麓与那些绿洲城国 PK 之前，获得一个继续前进的跳板。

在哈萨克汗国的历史当中，也曾经在此筑“突厥斯坦”城为都城。而当准噶尔人占据了从锡尔河到额尔齐斯河之间所有的山前草原（也包括塔什干），并试图继续沿锡尔河向中玉兹部腹地渗透时，以突厥斯坦城为中心的锡尔河下游右岸地区，也曾经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地区。

第二节 中亚地区南农北牧的特点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再从另一个角度来定义一下“中亚”这个概念了。不可否认的是，中亚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以及曾经影响欧亚大陆两端的历史。问题是，那些能够让历史和世人记住的“中亚”文化，其实基本都是由卡拉套山以南的绿洲农业区所创造的。在卡拉套山以北，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能够代表土著文化的所谓“历史名城”。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在最初定义“中亚”的概念时，并没有将北部的草原地区包括进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亚（俄属中亚），在地缘文化上实际上是一分为二，被切割为草原区和绿洲农业区了（二者当然都还包括大比例的荒漠地带）。而“中亚细亚”的概念，指向的仅仅是卡拉套山以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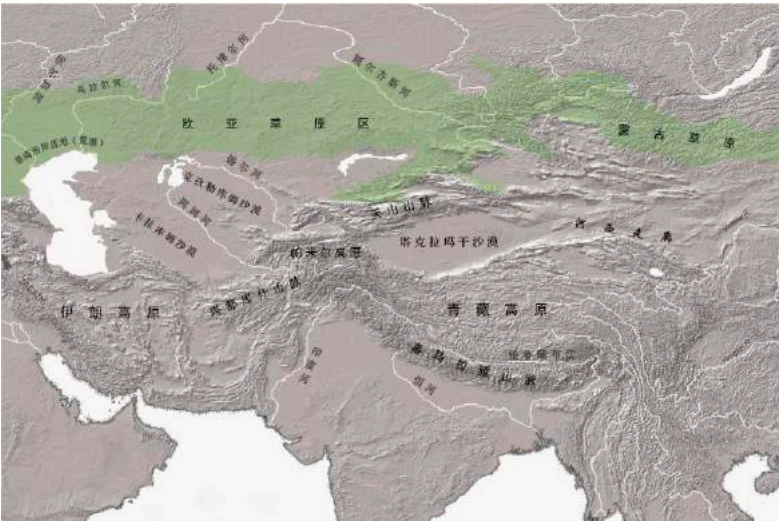
绿洲农业区基本分布在南部，至于北部，在地理结构上则被称之为“哈萨克草原”。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也反映到了地缘政治层面。在沙皇俄国最初的版图上，现在我们所说的中亚五国地区，被南北分割为“草原总督区”和“突厥斯坦总督区”（也称“土耳其斯坦总督区”）。现在中亚五国的形成，也直接源自于这种地缘认识上的分割。直到现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概念，也是俄国人对所谓“中亚五国”的正式定义。

应该说，俄国人的这种划分方法，是符合地缘规律的，这也反映了俄国人在地缘研究上的深度。事实上，中亚草原（哈萨克草原）与它相邻的南俄草原、蒙古高原的地缘关系要更紧密得多。这些同住在毡房里的兄弟也更容易形成政治同盟，对“中亚”进行渗透。这种情况跟亚洲东部的情况其实很类似。在大多数西方研究者看来，所谓“中国”的概念（尤其是古典时期的中国），是限定在长城以南的东亚核心农业区的。即使在中央之国已经在政治上掌握了原属地缘博弈对象的几个重要板块，甚至彻底改变了某些板块的地缘属性（比如被他们称之为“满洲”的东北地区），也很难在现实研究中改变这种概念。在具体研究甚至政治解读时，中央之国仍然被经常性的分为几块区别对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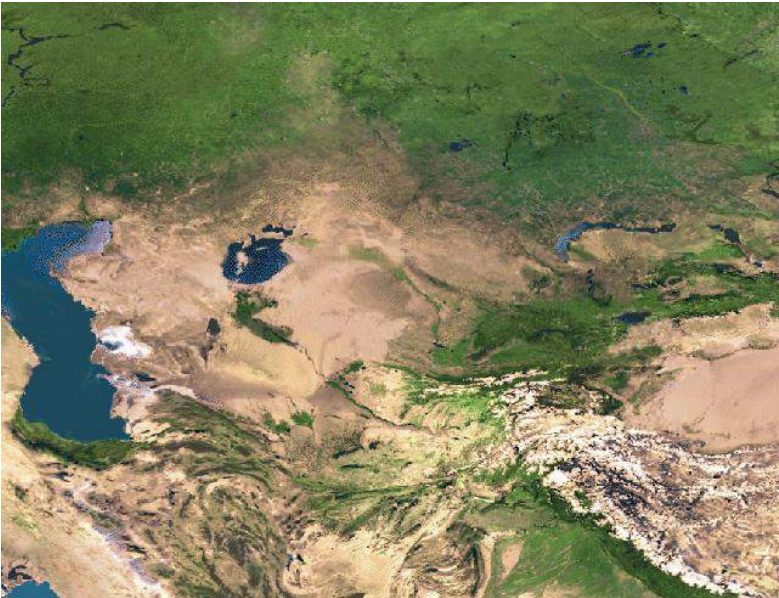
指出上述差异，并无意于引起一场政治上的口水战，也不代表个人的政治立场。只不过，我们在解读理解一些问题时，需要不受一些政治意识的影响，以使我们的思维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而包括中亚草原在内的“中亚”的地缘博弈本质，就是北部的草原游牧民族与南部绿洲农业区之间的竞争。这种情况，基本和东亚所发生的

情况一样。那些被称之为“突厥斯坦”的中亚地区，在历史上所承受的压力，生活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我们的祖先完全可以感同身受。

与拥有强大体量的东亚核心农业区，以及已经封闭在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南麓绿洲农业区相比，河中地区北部的绿洲农业地区注定会更悲剧一些。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无论是现在演变为哈萨克大玉兹部的，沿七河地区而来的游牧部落；还是重组为哈萨克中玉兹部的，从哈萨克丘陵南下的游牧部落，要想渗透中亚南部农业区的话，都会很自然的以锡尔河中游作为突破口。而绿洲农业区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又让他们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权对抗这种渗透。



中亚北部草原地带示意图



中亚地区卫星图

尽管草原民族大都以自己的游牧文化为傲，并且在心理上鄙视那些因农业、商业原因定居下来的“前游牧”者。但这并不妨碍这些游牧者渴望在农、牧相接处，获得一片能够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绿洲。对于这些部落的统治者来说，居住在一个因农业、商业而繁荣的城市中，会让自己有更强的经济实力来控制自己的部落，以及与其他竞争者对抗。风险控制的重点在于，这样的定居点不能离草原太远，以免彻底改变自己的部族属性，或者说失去对草原部属的影响力。在这种地缘背景下，锡尔河中游右岸以奇尔奇克河河谷为中心的地区（也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注定会成为多方争夺的焦点。不仅可能成为不同游牧体系渗透的目标，也可以成为南部绿洲农业政权对抗草原游牧政权的前哨。

在中央之国三次渗透中亚的帝国时期，争夺这片绿洲的控制权，甚至成就了一场被认为是影响欧亚大陆历史

进程的战争的导火索。这场战争就是我们多次提到的“怛罗斯之战”，而这场战役的指挥者——高仙芝，在怛罗斯与阿拉伯人决战之前，先攻击的就是现在塔什干所在的“石国”了。关于怛罗斯之战的解读，以及更详细的地缘背景，并不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带出这场战役，只是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锡尔河中游右岸地区”这个板块的地缘价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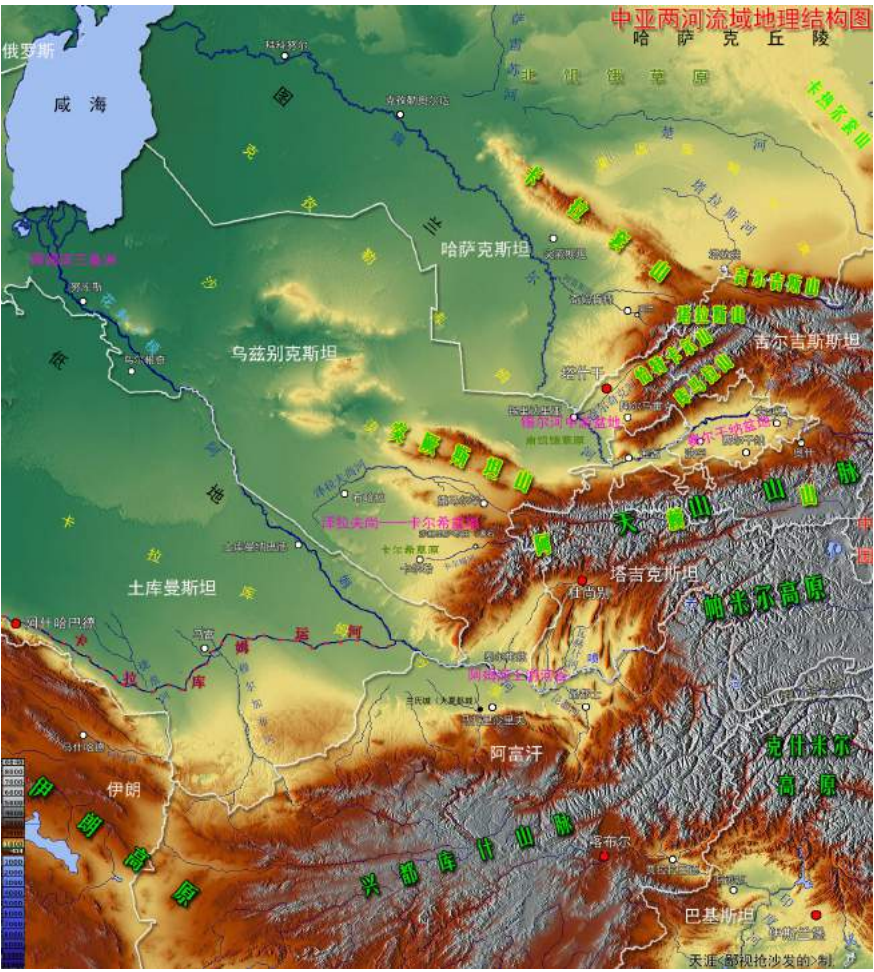
哈萨克斯坦卫星图

第三节 锡尔河中游左岸的地理环境

以争夺塔什干所在的“锡尔河中游右岸地区”来说，优势更多的是在草原民族那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最接近草原的绿洲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牧民族能够占据优势的区域，并不仅仅存在它的北方。因为在古典时期，我们可以将之称为“锡尔河中游左岸地区”的锡尔河与突厥斯坦山脉之间的这片平原地区，天然环境并不足以形成绿洲。背风的突厥斯坦山北麓所额外提供的降水，仅仅能够阻止从图兰低地漫延而来的“克孜勒库姆沙漠”不将其完全沙化，因此这一地区形成荒漠、半荒漠状态的草原。这种对于古典农业几乎无用，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又堪堪能用的地理环境，使得游牧民族有机会在锡尔河左岸，获得一个能够封堵费尔干纳、塔什干农业区的优势板块。

鉴于突厥斯坦山脉——锡尔河之间的这片荒漠草原，植被情况不那么理想，所以这片草原也被游牧民族称之为“饥饿草原”。不过更为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南饥饿草原”（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因为哈萨克丘陵南部地区的那片比“南饥饿草原”

面积大上两倍的，背风的荒漠化地带（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才是草原民族眼中最初的饥饿草原地带。鉴于它与“南饥饿草原”的对应关系，它现在被称之为“北饥饿草原”（也叫“别特帕克达拉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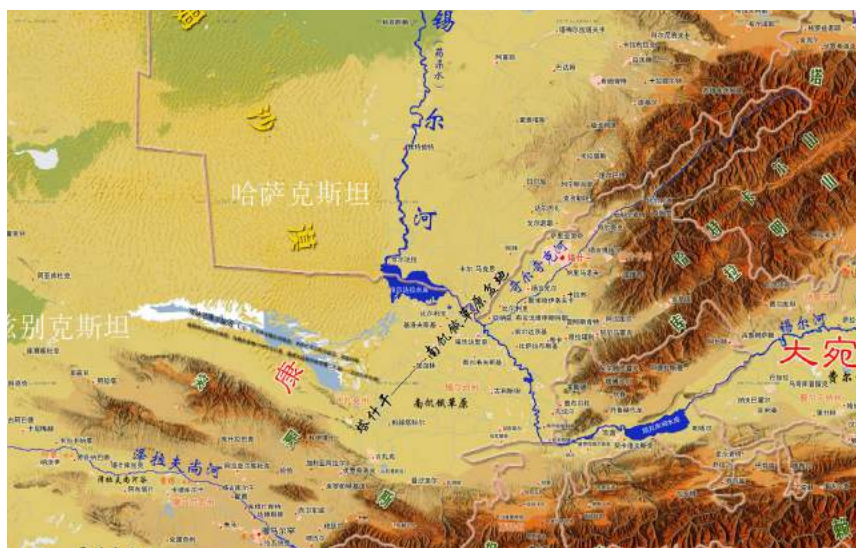
中亚两河流域地理结构图

受降水所限，农耕民族始终无法移民、开耕这片高原，尽管游牧民族本身也不是很满意这片草原的状况，但能够在里面讨生活的始终是对自然条件要求更低的游牧民族。这也迫使中央之国的统治者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不得不沿鄂尔多斯高原南缘修筑长城，以拱卫自己的西线安全。

不过比较下来，南饥饿草原还是要比鄂尔多斯高原更有机会覆盖农业文化。低平的地形，以及锡尔河那充沛的水量，都为它发展灌溉农业提供了可能。在苏联机械化的力量带领之下，现在的饥饿草原早已与费尔干纳、塔什干绿洲带连成一片（发生同样变化的区域，也包括现在隶属哈萨克斯坦南哈萨克州的卡拉套山——锡尔河地区），成为中亚最重要的农业种植区之一（由于气候干燥、无霜期长，包括饥饿草原在内的中亚农业区，最为知名的农作物是棉花）。

其实要是饥饿草原在中央之国核心区边上的话，掌握成熟水利技术的华夏农耕

如果从康居人或者中玉兹部落联盟向南渗透的进程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在从一个饥饿草原，向另一个饥饿草原渗透的过程。当然，仅仅凭借这种荒漠草原是绝对无法支撑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的（只能做一季或两季牧场，无法在板块内完成四季牧场轮换）。它们的存在，更多的是让游牧部落们拓展、连接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南饥饿草原这种与农业绿洲带紧密相接的板块，对绿洲农业国家的压力就更大了。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鄂尔多斯高原。由于



汉西域全图



锡尔河

民族应该在两千年前就将其开耕了。就好像赵、秦、汉三代，对河套平原灌溉农业的开发一样。当然，河套平原有机会被开发，有一个重要的地缘背景，那就是河套平原的位置与东亚核心农业区更近，中央之国有机会将力量延伸过去。而即使是这样，游牧民族在大部分时候，也还是能在河套平原的争夺中占据优势的。让中央之国不远万里的去经营中亚的农业区，并开发饥饿草原这样暴露在游牧民族攻击视野中的土地，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实上，无论从政治还是文明渗透的角度来看，中原政权或者华夏文明对中亚直接渗透的历史都是很短的。在绝大部分

历史时期，中央之国是作为欧亚大陆贸易线的终端，来间接影响中亚历史的。

更多的时候，对“中亚河中地区”（按刚才的解读，我们几乎可以将之与俄国人定义的“突厥斯坦”，或者“中亚”对等了）产生直接地缘影响，并与游牧文化发生碰撞的力量，来自于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这种情况，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在具体的军事博弈中体现出来了。只不过，那次代表农业文明出战的主角，并非来自于土著政权。而是像怛罗斯之战一样，由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帝国奇迹般的引发的。至于具体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第二十一章 伊朗高原与中亚的地缘关系

第一节 大中亚的农业带与早期存在的族群

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代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在中亚发生碰撞的帝国，是亚历山大所创建的“马其顿帝国”。由于这个帝国的建立实在带有太多的个人英雄色彩，大多数时候人们更愿意称之为“亚历山大帝国”。这个崛起于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本身带有强烈的农业文明色彩，并且在它的扩张过程中，也的确促进了欧亚大陆农业技术的交流。然而从文明角度来说，马其顿人并不是亚洲中部农业文明的拓荒者。在他们到来之前，中亚、伊朗高原一带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农业文明了。而就地缘关系而言，这些农业文明的创造者与欧亚草原上的那些高加索人种的游牧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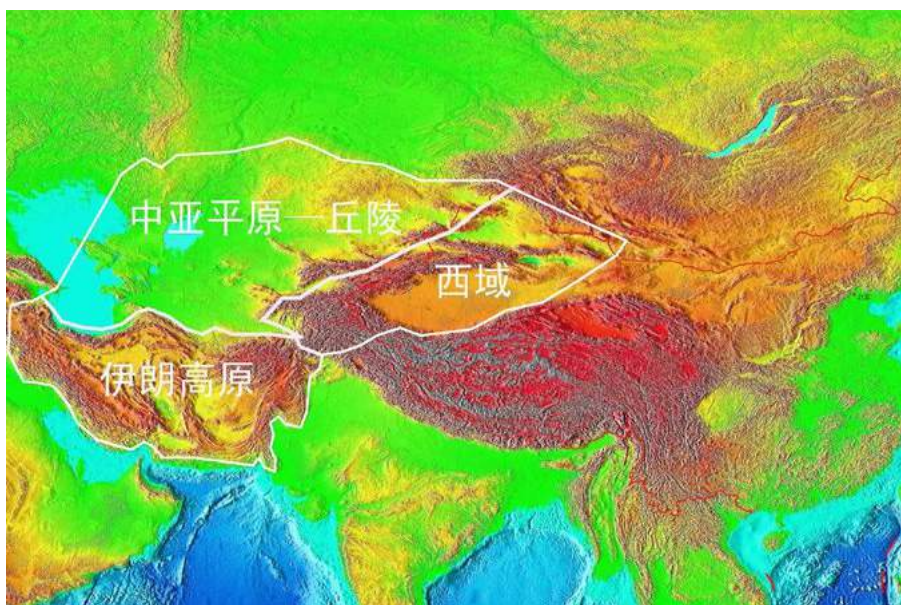
我们一直在强调，在匈奴人代表亚洲游牧民族开始崛起时，欧亚草原乃至中亚地区的主导权是掌握在欧洲游牧民族手中的。依时代和地域，甚至记录者的理解，这些高加索人种的游牧者又被冠以了不同的标签，如斯基泰、塞种、西徐亚、阿兰等。希望搞清他们之间的真正区别，基本是徒劳的。就像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记载于中国史书中的那些上古夷狄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内部构成如何一样。

事实上，即使我们看到的记录就是当时的观察者所留下的，也未必能够看到真实的一面。大多数时候，记录者只是像盲人摸象一样，从有限的接触者那里获得对整个族群的印象，这种情况也经常会出现于对一个具体人物的研究之上。我今天在新闻中看到一个很著名的“文人”，居然从白居易的诗中考证出有大量古伊朗语，并由此认定白居易是一个母语为古伊朗语的异族之人，就是最新鲜出炉的例子。先且不论那些被考证出源自于所谓古伊朗的词汇，是否真如研究者所认定的那样，单就从语言、文字中夹杂有外来词汇这一点，来判定出一个人的原始族群属性来，就显得十分武断。在此我真诚的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尽量不要在语言（尤其是要记录下来的）中夹杂有源自英语的词汇（更不要直接引用英文单词），以免我们的后世子孙据此考证出这十几亿人的种族、文化，原来是来自于欧洲大陆西侧那个小岛上。

好了，吐槽到此结束。不过如果谁想从白居易被定义为“伊朗人”这件事中得到启发，并想写点研究成果、穿越小说的话，以下内容倒是可以帮助你从地缘背景上完善整个证据链（菜刀的本意是用来做菜，但并不妨碍有人用它来杀人）。我个人一直认为，“历史没有真相，只有共识”。一个观点认可的人多了，它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全人类都承认的真相了。好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伊朗或者说波斯一词，所代表的意义基本上是存在一个共识。那就是不管这个地缘标签是在代表一个族群、

一个板块，还是语言、文化，它所指向的地区都是在现在的伊朗高原。古代波斯人在伊朗高原上的历史，与古典时期在东亚核心区经营的华夏族非常相似。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都成就各自文明在种族、文化上的连续性，独立性。

从种族渊源上来说，现在伊朗高原上的主体民族——波斯人，和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欧洲游牧民族是一脉相承的。然而这并不是说，波斯人就是他们的后代。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棵大树上所分出的不同分枝。在那位对净化种族特别感兴趣的元首渲染下，这棵种族大树被贴上了“雅利安”的标签。如果我们认为，“雅利安人”一词可以被认定为在公元前三千年至公元前两千年游牧于南俄草原的原始欧洲游牧民族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认为，在我们所解读的历史时段，从西干草原到中亚、伊朗高原，都是被这个雅利安人的后代所覆盖的。只不过，根据他们所沉淀的地缘板块不同，这些游牧者的后代被分别定义为不同民族了。



大中亚地区地缘结构图

抛开这些表面的定义，回归到最基本的地缘属性来看，从伊朗高原到欧亚草原的欧洲大陆中心地带的雅利安人后裔覆盖区，可以被一分为二的切割成两个区域。如果从被我们认定为中亚地缘分割线的卡拉套山，沿天山主脉向东拉一条直线，并将这条直线一直延伸到哈密盆地北沿的巴里坤山的话，这也是一条切割“大中亚”地区的地缘分割线。换句话说，不管覆盖这片区域的族群被定义为雅利安还是突厥，这条地缘分割线都足以将之分割为两个文化区，即南部的农业文明区，以及北部的游牧文化区。

所谓的“大中亚”概念，我们在三年前的国际部分就已经定义过了。这个概念包含有三个大的地缘政治板块：西域、中亚、伊朗。经过我们之前的解读，相信大家已经对大中亚地区北部的游牧结构有所了解了。就游牧文化区而言，其实很难说谁是文化中心。在游牧者们可以熟练借用“马”这个工具驰骋于欧亚草原之后，一个游牧于大兴安岭西侧的部落，与经营黑海北部草原的部落之间，在生产技术、文化层级上基本没有差异。不过，对于农业文明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土地的农业潜力、地理位置、地缘位置，将直接影响到每一板块的地缘地位。当我们以“雅

利安人”的概念，将伊朗高原和中亚乃至南俄草原、西域合成一个大板块来解读的话，就很快能够找到农业化雅利安人所沉淀的农业核心区了。

从地理结构上来看，这片农业核心区分布在兴都库什山脉——伊朗高原北部。很明显，这条农业带内部又可以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被分割为两个大的板块。如果按照现在的政治结构来划分的话，可以被笼统的归为阿富汗北部以及伊朗北部。不过在汉帝国前后的历史时段，这两个农业核心区有着更为精准些的地缘政治标签：巴克特里亚和呼罗珊。

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巴克特里亚和呼罗珊这两个名称，还是太过偏僻。如果换作“大夏”和“安息”，相信知道的人就会多出很多了。而这两个地缘标签，正是出现在我们正在解读的汉帝国时期。在张骞后来向汉武帝所做的报告当中，大夏和安息都是记录在案的重要国家。在我们所见到的描述当中，安息国往往会模糊的和现在的伊朗划等号；而大夏也不过是笼统的称为阿富汗北部。不过真要说到这两个国家所依附的地理单元、地缘板块究竟是何结构，就很少有人清楚了。好在，顺着张骞出使西域的脚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张骞还在河西走廊犹豫路线选择时，就提前顺着草原游牧民族南侵的路线，先将目光投向中亚南部这片高原之地。

对于从东方而来的旅行者来说，即使是后来正式开通丝绸之路后，他们的旅程也往往止步于兴都库什山脉——伊朗高原北麓。很现实的原因是，中央之国线性延伸的地缘影响力，尤其是军事威慑力，至多渗透到锡尔河中上游地区，再往西、往南的话就无能为力了。而在中国历史中也曾经无数次出现的“身毒”（印度）、“大秦”（罗马），更多的只是存在于传说中了。除了像玄奘这样意志坚定的僧侣会有勇气和机会以亲身经历，为中央之国的统治者带来第一手资料以外，绝大部分时候，中央之国只能间接接触到这两个国家所代表的文化圈的文明（南亚次大陆以及地中海文明圈）。

其实早在国际部分的“大中亚”章节部分中，伊朗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脉就已经纳入过我们的视线了。只不过鉴于那部分内容的视角过于宏大，对于这两个地理单元的认识，我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它们枢纽般的地缘位置，以及因海拔、体量所造成地理阻碍的问题上。即使是在夹入了很多具体历史事件，以作详细地缘解读的“中东部分”，我们的解读重心也依然是在阿拉伯半岛——北非这片干旱的低地上。在我们已经花费大量笔墨解读阿拉伯半岛、中亚的时候，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内部地缘解读的缺失，会让上述板块更有机的在我们脑海中连接起来。

事实上，在张骞寻找月氏人的归处时，最远所到达的国家就是大夏。而这一次未及拜访的安息，在他第二次出访西域（目标国家为乌孙）时，也派副使前去出使过了。作为丝绸之路的终端（中央之国的角度），我们也很确非常有必要在张骞完成连线之前，对它们的地缘结构做一个大致分析。

第二节 雅利安人迁入伊朗高原定居

就地缘影响力来说，伊朗高原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就其地理结构来说，这片高原其实可以被视为一个群山环绕的高山盆地，就像伊塞克湖盆地、尤尔都斯盆地那样。北线贴近里海——图兰低地的厄尔布尔士山脉、科佩特山脉；西、南线眺望两河平原——印度洋的扎格罗斯山脉、莫克兰海岸山脉；东线与南亚次大陆相邻的兴都库什山脉、苏莱曼山脉、基尔塔尔山脉，都是围就这个高山盆地区的边缘山地。

以我们所熟悉的东亚核心区内部诸板块来说，并非不能理解伊朗高原能够自成体系的问题。黄土高原之上的关中盆地与它边缘诸高地板块之间紧密的地缘关系，似乎能给我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按照这种思维惯性来看的话，以伊朗高原为依托的“波斯文明”，地缘核心应该是在盆地腹地的低地（相对低地），并以此而形成强大的农业文明区，辐射并控制边缘山地。然而请不要忘了，我们在解读中亚时所一直强调的逆转思维惯性的问题。在欧亚大陆腹地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很多地缘特点是和欧亚大陆两端的情况相反的。



伊朗地形图

尽管伊朗高原在南线拥有漫长的海岸线，看起来降水情况应该要好于远离海洋的中亚地区。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在中亚所形成的“低地”约等于“荒漠”的定律在这片高原上依然成立。也就是说，伊朗高原内部被分割为几部分的大片腹地，大多数并不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无论是三千年前渗透到此的雅利安人，还是现在的伊朗人，经营这片高原的希望都是在于盆地边缘的山地，以及与这些山地紧密相连的低地上。

虽然在更高视角的解读中，我们往往把伊朗高原视作一个地缘板块，并将内部的族群认定为一个统一体。但和所有的地缘板块一样，这片地形高低错落的高原，内部也注定可以分成为几个亚板块。尤其是在腹地无法形成均匀辐射四周的核心板块时（像关中平原在黄土高原内部结构中的一样），这使得定位伊朗高原的核心板块，本身也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一点和“地中海”文明圈所遇

到的问题一样。

其实对于一个大的地缘板块来说，内部并不一定需要有永恒的地缘核心。能够形成统一地缘意识的重点，在于各板块之间拥有相似的地理环境，以及紧密的地理联系。以伊朗高原来说，阻碍它内部形成统一意识的障碍，要远小于腹地纵深过大的地中海文明圈。当然，这片腹地的影响依然是现实存在的。其最大影响，就是在伊朗高原内部形成了三个平级的核心板块。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安息”（帕提亚）和现在几乎成为这片高原整体地缘标签的“波斯”；以及让很多人感到陌生的“米底”，则是这三个核心板块在融合过程中所形成的地缘标签。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三大核心板块的地理划分背景又是什么？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所谓“雅利安人”最初是生活在南俄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这些高加索人种的游牧民族向亚洲扩散的问题，我们也大致了解了。当然，德国曾经的领导者相信，这些几千年前的游牧者也是日耳曼人的祖先。单从地缘关系上来说，这也有可能。毕竟扩散这种事情，往往都是全方位的。既然雅利安人能够向亚洲渗透，也没有理由不向中、北欧方向迁移。至于这些游牧者是不是日耳曼人的直系祖先，就另当别论了。

尽管“元首”非常想以“雅利安人”的概念来“净化”欧洲的种族，但说到“雅利安”这个词，伊朗高原上的波斯人算是最有资格使用的了。从地理结构上看，雅利安游牧民族进入伊朗高原的方向会有两个：一是翻越高加索山脉以直线进入伊朗高原；二是先由里海——乌拉尔山脉之间进入中亚草原，然后向南进入锡尔河、阿姆河所组成的“中亚两河流域”，并最终在里海以东方向渗透进伊朗高原。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上述两条战略通道其实都为伊朗高原的波斯族形成补充了“雅利安人”成员。只不过，与南俄草原地理关系更紧密的高加索通道，应该为伊朗高原迁入了最初的雅利安部落。不过，雅利安部落在翻越高加索山脉后，最先进入的地理单元并不一定是伊朗高原（如果他们不是直接沿着里海西岸低地走的话）。而是有可能先进入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高原（小亚细亚半岛）之间的亚美尼亚高原，再向东折入伊朗高原。关于这三个高原之间的地理、地缘关系，我们在中东部分已经详解过了。如果不想费心从地图上辨识亚美尼亚高原与伊朗高原的位置关系的话，那么将伊朗、土耳其之间的国境线，视作二者之间的地理分割线就行了。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很难在地形图上辨识出亚美尼亚高原来。之所以现在要提到这个过渡性的地理单元，是因为这个地理单元在地理结构上与伊朗高原的差异，在地缘政治结构中也得到了反映。比起相对封闭的伊朗高原来说，亚美尼亚高原其实更为开放。因为这片高原所孕育出来的河流，最终大都汇入了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这两条中东名河中。

也就是说，从“水”的角度来说，亚美尼亚高原就是两河的上游集水区，这使得亚美尼亚高原与人类历史上最先出现农业文明的两河中、下游地区（美索不达米

亚地区)的地缘关系更紧密。加上它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伊朗高原这两大地缘板块之间的尴尬位置,使得进入这片高原的外来部族,想稳定独立的完成土著化进程会很困难。为了在波斯人重压之下保持独立状态,而最先举国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以及现在悲剧性的存在于突厥、波斯、阿拉伯三大民族之间的库尔德人,都用自己的命运很好的诠释了这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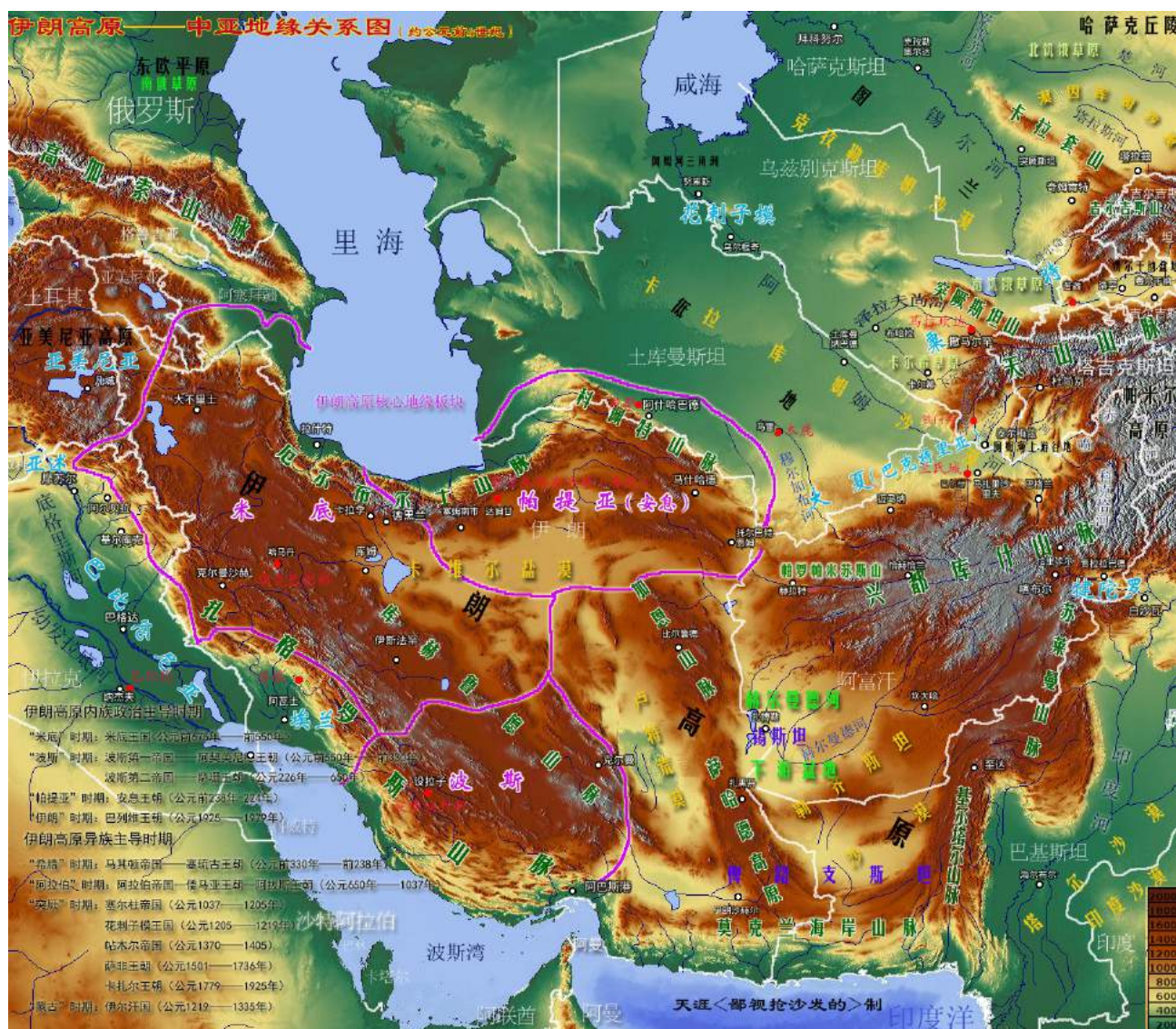
对于雅利安人来说,亚美尼亚高原并不是他们翻越高加索山脉后唯一能停留下来的高原之地。如果他们认为高原之地会有机会保持自己的游牧状态的话,那么向西进入小亚细亚高原和向东进入伊朗高原,一样都是一种选择。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雅利安人历史上没有这样做过。问题是,小亚细亚半岛本身还承担着连接欧、亚大陆桥的任务。这种更高级别的地缘枢纽位置,使得它的地缘命运比起亚美尼亚高原来说更为悲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小亚细亚半岛不仅在政治、宗教等表面地缘属性上,经常性的发生变化;其土著居民的民族属性也同样呈不稳定状态。在大历史的时间范畴里,突厥化是它的最新变化。

相比小亚细亚半岛、亚美尼亚高原来说,封闭的伊朗高原是最有机会让雅利安人沉淀为土著民族的板块。并且和中央之国的农耕民族一样,无视政治上的变化,在将近三千年的时空里,保持族群在这片高原上的优势地位。当然,如果波斯人能够在宗教上延续波斯帝国时期的信仰的话,这种地缘稳定性会更加的明显。只不过伊朗高原本身与“一神教”中心过近的距离,使得波斯人最终没能在文明属性上保持像华夏文明那样的传承性。

既然我们说伊朗高原有利于雅利安人形成新的民族,那么我们需要清楚,这些沉淀下来的部落最终是在什么样的地缘结构中博弈、融合而成现在的“波斯族”的。我们在前面也指出了伊朗高原的地理结构与气候特点。由于围就高原边缘的山地连接得过于完美(尤其是面向印度洋方向的南部),并且腹地内部又被分割为几个盆地,所以伊朗高原面向腹地的河流都是内流河。对于低地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些从高山汇流而下的雨水,注定会为下游地区带来矿物质。如果河流不能外流的话,那么下游平原地区就会是这些矿物质的最终归宿地。其结局就是,河流要么在盆地中心形成盐湖;要么就是在高蒸发状态下,变成大片的盐碱地。

既然那些被寄予厚望的腹地是那么的堪重用,那么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部落,就只能像他们渗透至天山北麓的亲缘部落一样,在山地和山地边缘寻找机会了。通过对中亚部分的解读,相信大家也都清楚了,山地的体量(海拔、纵深)、位置、朝向,会对它收集水汽的事业造成直接影响,并间接影响到山地的人口承载量。如果将兴都库什山脉视为单独的地理单元的话(虽然它帮伊朗高原东北部围边),那么整个伊朗高原最优质的地理单元应该存在于西部。在这个方位上,北部的厄尔布尔士山脉、科佩特山脉;南部的扎格罗斯山脉、库赫鲁德山脉的体量,要远大于高原东南部。

当我们把寻找伊朗高原核心区的眼光锁定在它西半部的山体上时，就会发现这片核心区的结构呈现为一个左转 60 度的“人”字形，或者说是一个不那么标准的三菱形。到底把它看成什么形状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片山地实际上呈现出了三个突出部状态。如果雅利安人是从高加索方向进入伊朗高原的话，他们在向东渗透过程中会发现，再东进一段时间后，之前纠结在一起，山脉走势并不明显的山地，开始向南北两个方向独立延伸了。而这两条分道扬镳的山体，最终也和它们亲如兄弟的西部地区一起，成为伊朗高原核心区的一部分。以这三个突出部为基础所形成的地缘板块，就是我们前面所列出的：米底、帕提亚、波斯。



伊朗高原——中亚地缘关系图

如果包夹在三大核心山地之间腹地是一片富饶的平原灌溉区的话，那么一定会天然成为对周边山地有影响力的核心区。但前面我们也说了，伊朗高原的腹地基本没有这个命，岁月早已将这片腹地烘烤成了“卡维尔盐漠”。盐壳、泥泽相间的地形，

使得即使是穿越它都很困难。其实既然我们已经认定了雅利安人的希望在于边缘山地之中，那么这些大而无用的低地，到底是盐多还是沙多就不那么重要了。

对于雅利安人来说，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需要重新适应新的地理环境。毕竟这片高原山地，无论从形态还是环境上都与他们在南俄草原上的老家，有着本质区别。这意味着雅利安人需要在生产方式、族群属性上做出一些改变了。简单点说，雅利安人不太可能在伊朗高原西部保持原有的游牧生活了。至于这种改变究竟有多大，又对波斯文明的形成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一节再分析。

第三节 伊朗高原承受的入侵压力

在影响气候的几大要素中，纬度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只要不是海拔高到离谱，由赤道向两极气候逐渐变冷的规律，并不会受到挑战。也就是说，相比中亚地区，伊朗高原的年平均气温应该更高些。鉴于大家比较熟悉东亚核心区的地理结构，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东亚的秦岭——南岭，各自往西拉两条平行线，来更直观的判断伊朗高原的纬度。当我们真这样做了的话，很快就会发现，伊朗高原的绝大部分土地都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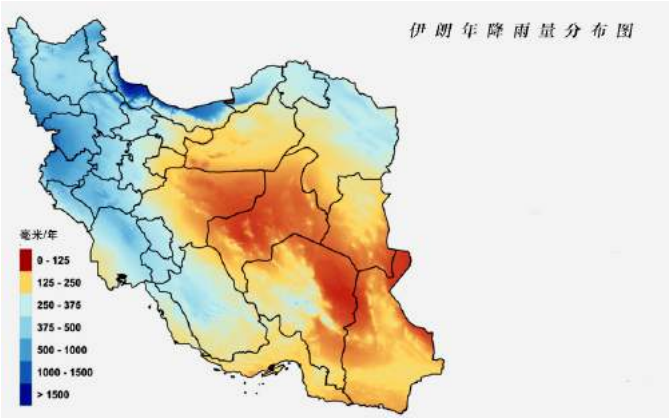
这是不是意味着伊朗高原的气候环境与中央之国的长江流域相类似呢？情况当然没那么简单。处在相同的纬度区间，只是让双方在气候带上都处于“亚热带”的区间罢了。相比受太平洋季风影响，降水充沛的东亚大陆来说，看着与印度洋近在咫尺的伊朗高原，却并没有从印度洋那里得到什么恩泽。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大陆性的草原、沙漠气候。这一点和中亚地区类似。只不过，伊朗高原的气候类型前面被冠以的是“亚热带”（如亚热带草原气候），而中亚则是“温带”罢了。

其实被印度洋无视的板块，并不只是伊朗高原。与印度洋零距离接触的阿拉伯半岛，在从印度洋获得降水的问题上，也同样是咫尺天涯。至于为什么，等我们分析到伊朗高原的东南部，也就是曾经在国际部分出现过的俾路支地区时，就会有答案的。说起来，关于这个气候的问题，专业人士一定能够从不同层面提出专业意见的。对于我们来说，明白伊朗高原总体是属于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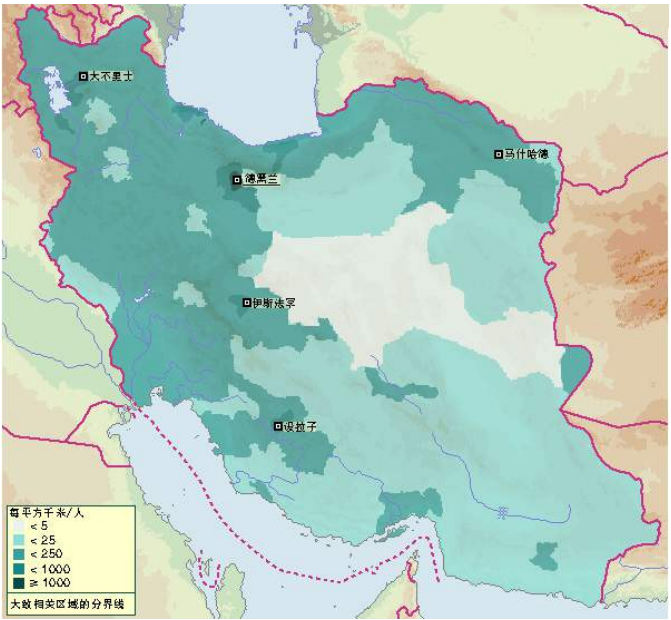
通常情况下，降水较少的大陆腹地（大陆性气候）是不受农耕民族喜欢的。能够适应这种环境，并充分利用那些耐旱草本植物的，是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然而，并非所有的大陆腹地都不适合农耕生产方式。最起码在中亚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有足够的积温和可以利用的高山之水，那些河谷地带完全可以通过铺设水利设施来发展“灌溉农业”。当然，由于受到水资源供给和地势的影响，你并不能指望这些农耕之地有太大的规模。星星点点存在于河谷、山前冲积扇中的“绿洲”，是这些在游牧重压之下生存的农业文化的主要载体。

以伊朗高原的纬度和所处的气候带上来说，应当会让它有着比那些中亚绿洲更

高的年平均气温。虽然高度对气温也会有一定影响。不过，对于平均海拔与黄土高原相近的伊朗高原来说，这并不会成为它产生农业文明的障碍。事实上，就发展灌溉农业这点来说，伊朗高原要比中亚地区的地缘优势更大。因为与之相邻的两河平原，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最早进入文明期的地区。而这片既无森林，又无矿产（古典时期可以利用的，如铁矿），并且还与沙漠相邻的土地上，之所以能够产生两河文明，其技术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灌溉技术的利用。当两河之水被引导着灌溉周边那些原本将被沙漠侵蚀的平原时，两河平原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也就迅速领先于周边板块了。



伊朗年降雨量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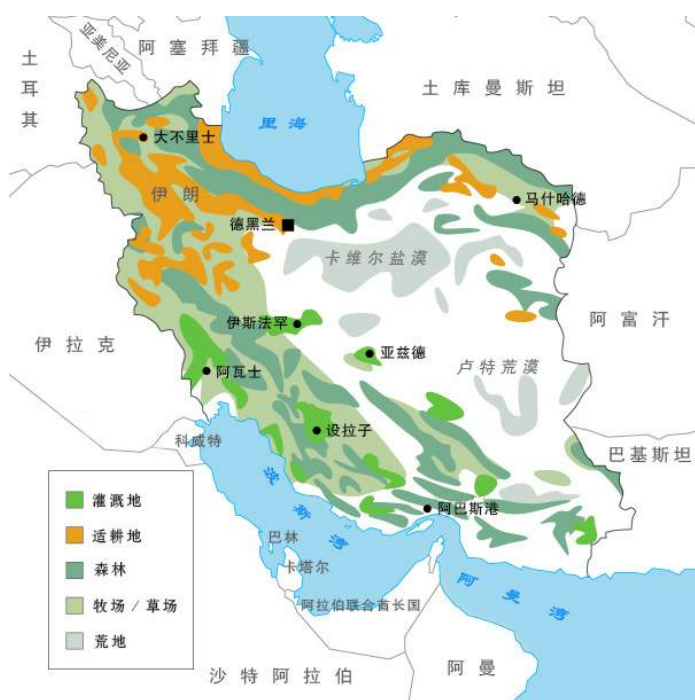
伊朗人口密度图

突厥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塞尔柱帝国、花刺子模国、帖木儿帝国、萨非王朝、卡扎尔王朝，都曾经统治过伊朗高原。

总的来说，伊朗高原所承受的入侵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这一点，

基于伊朗高原与最初农业中心的位置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伊朗高原内部农业绿洲的开发要早于中亚地区。不过与中亚那些农业绿洲所遇到的问题一样，这些农业绿洲始终都处在游牧部落侵袭的压力之下。因为即使我们认定在卡拉套山以南的中亚地区，以及伊朗高原之上，应该是农业文明占优的地区，但从大的板块位置上来看，这两个板块始终都是游牧区的包围之中。尤其是伊朗高原，更是要直接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游牧压力。

北方来自欧亚草原上的那些更耐寒的骑马游牧民族，以及南方阿拉伯半岛那些更耐热的骑骆驼（单峰驼）的游牧民族，在不同时期都曾经入主过伊朗高原。用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的地缘政治结构来描述这种压力的话，我们可以将之认定为伊朗高原在同时承受突厥人和阿拉伯人入侵的威胁。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统治伊朗高原历代王朝的族群背景上看出。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



伊朗土地利用情况



伊朗高原上的农业

从突厥人建立的王朝数量也能看出。事实上，这种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区。鉴于气候的恶劣程度，高纬度的游牧民族总是更有兴趣入侵并适应更温暖的低纬度地区的。相比之下，让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单峰骆驼去适应低温环境就困难得多了。然而已经视伊朗高原为自己领地的波斯人，也不用对这种北方压力耿耿于怀。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是由欧亚草原入侵而来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沉淀而来的。只不过，他们来得比较早，并且更早通过“帝国”这种集权式的政治形势，确立了自己在伊朗高原上的种族、文化优势罢了。

很明显，我们现在所说的，在三千年前从南俄草原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游牧部落，也并不是伊朗高原最早的土著。在他们之前，伊朗高原的土著在人种上应该会更接近于阿拉伯半岛。也就是说，伊朗高原上最初的农业文化，并不是由雅利安人所创造的。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南亚次大陆。只不过，伊朗高原的位置使得它在很长时间内，都能够持续不断的从欧亚草原吸收同种族的成员，并最终形成现在这种高加索人种特征明显的“波斯族”。而这些雅利安部落在入侵南亚次大陆后，在面对农业文明发达，人口基数要大得多（比之伊朗高原）的土著，就没有能力做到这点了。用“种姓”制度来进行种族隔离，以保证自己的阶级地位，是印度雅

利安人适应环境所做出的选择。

回到伊朗高原与雅利安人的关系上来说。作为最早大规模入侵伊朗高原的游牧民族，这些雅利安人在这片封闭的高原上也必须适应环境，根据环境来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这些雅利安人开始转向定居。即使是仍然以饲养牲畜获取食物来源的部落，也逐渐转而采取“畜牧”这种较稳定的生产方式。在被记录下来的波斯人历史中，其内部成员中既有从事农耕的部落，也有从事畜牧的部落。换句话说，最起码在被我们划定为伊朗高原核心区的水资源情况较好的西部地区，雅利安部落开始变成定居者了。对于文明的产生而言，定居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你将能倾注更多的精力，提升技术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

当雅利安部落在伊朗高原完成土著化进程之后，我们再用“雅利安”这个源自语言学的地缘标签，来代指这些来自南俄草原的游牧者，就不太合适了。因为很快，这些或农或牧，拥有相同语言、文化的部落，就将以各自所处的板块为基础进行政治重组，进而形成互相独立的部落联盟了。当这些依照地缘规律所形成的部落联盟上升为国家形式后，伊朗高原内部诸板块也即将产生属于自己的地缘标签。这一过程，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就已经逐渐完成了。

在张骞为汉帝国带回伊朗高原的信息之时，我们已经有了合适的地缘标签来为伊朗高原划定核心板块了。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米底、波斯、安息（帕提亚）三个地区，在公元前2世纪时，已经分别出现过影响伊朗高原历史的“国家”了。至于这三个板块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地缘关系，他们的崛起时间又与各自相邻的外部板块有何关联，我们下一节再分析。

第四节 米底和波斯在伊朗高原先后崛起

一个板块在历史中的表现如何，除了与自身的潜力相关外，相邻板块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蒙古高原的北亚游牧民族之所以能长期成为欧亚草原的优势者，与他们在东亚的邻居——中央之国就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同样的，当西欧地区崛起成为这个星球上的文明中心后，以东欧平原为核心区的俄罗斯人，也就有机会横扫整个亚洲游牧体系，并成为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绝对主导者了。

在伊朗雅利安部落进行国家化的过程中，三大核心板块各自的邻居也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影响力。最先受到冲击的，是高原西端的“米底”板块。这个板块的名字，来源于雅利安部落在公元前7世纪所创立的米底王国。而在米底板块完成土著化过程的雅利安诸部，之所以从部落联盟形式进化到“王国”时代，直接诱因是因为与之相邻的，植根于两河中游的“亚述人”的崛起。

对于很多对“西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来说，“亚述”这个名词应该并不陌生。这是一个在上古时代让人望而生畏的军事民族。能够熟练的将“铁”这种金属运用

在军事装备上，是亚述人能够在新月地带崛起的重要原因。而从地缘结构上来看，我们很容易看出，亚述人所经营的上千年的土地，位于新月沃地两大板块：西亚裂谷带、两河中下游地区，相接之处。这样的位置，如果实力不够强大，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的四战之地；而如果经营得好，也同样有机会从附近板块多方位的吸收技术优势。并在自身强大后，辐射、控制更多的新月沃地。

当南俄草原的雅利安人，还在以部落联盟的形式渗透、经营伊朗高原时，在两河中游已经生活了上千年的亚述人，开始厚积薄发般的进入帝国时代了。基于亚述所处的位置，这个军事色彩浓厚的帝国，很自然的会优先将扩张目标定位于整条新月地带。而最终，亚述人也的确做到了。在帝国历史中，他们甚至还短暂统治过尼罗河中、下游地区。这也使得亚述帝国得到了整个北非——阿拉伯板块中最为肥美的土地。接下来的扩张方向，也就不可避免的要指向北面了。

一个好的邻居，可以让你受益颇多（比如技术和经济上）；同样的，一个强势并对你有企图的邻居，也一样有机会成为你自身发展的动力。而米底板块之所以能够在伊朗高原上率先进入王国时代，更多的是缘于后一种情况。当亚述人开始顺流而上，希望占据亚美尼亚高原，并进而向两侧的安纳托利亚、伊朗高原渗透时，已经视自己为土著的米底诸部，当然是不会坐以待毙的。比起整体呈现低地属性的新月沃地，亚述人征服伊朗高原的过程要艰难得多。伊朗高原的高原特质，很明显会更有利于防御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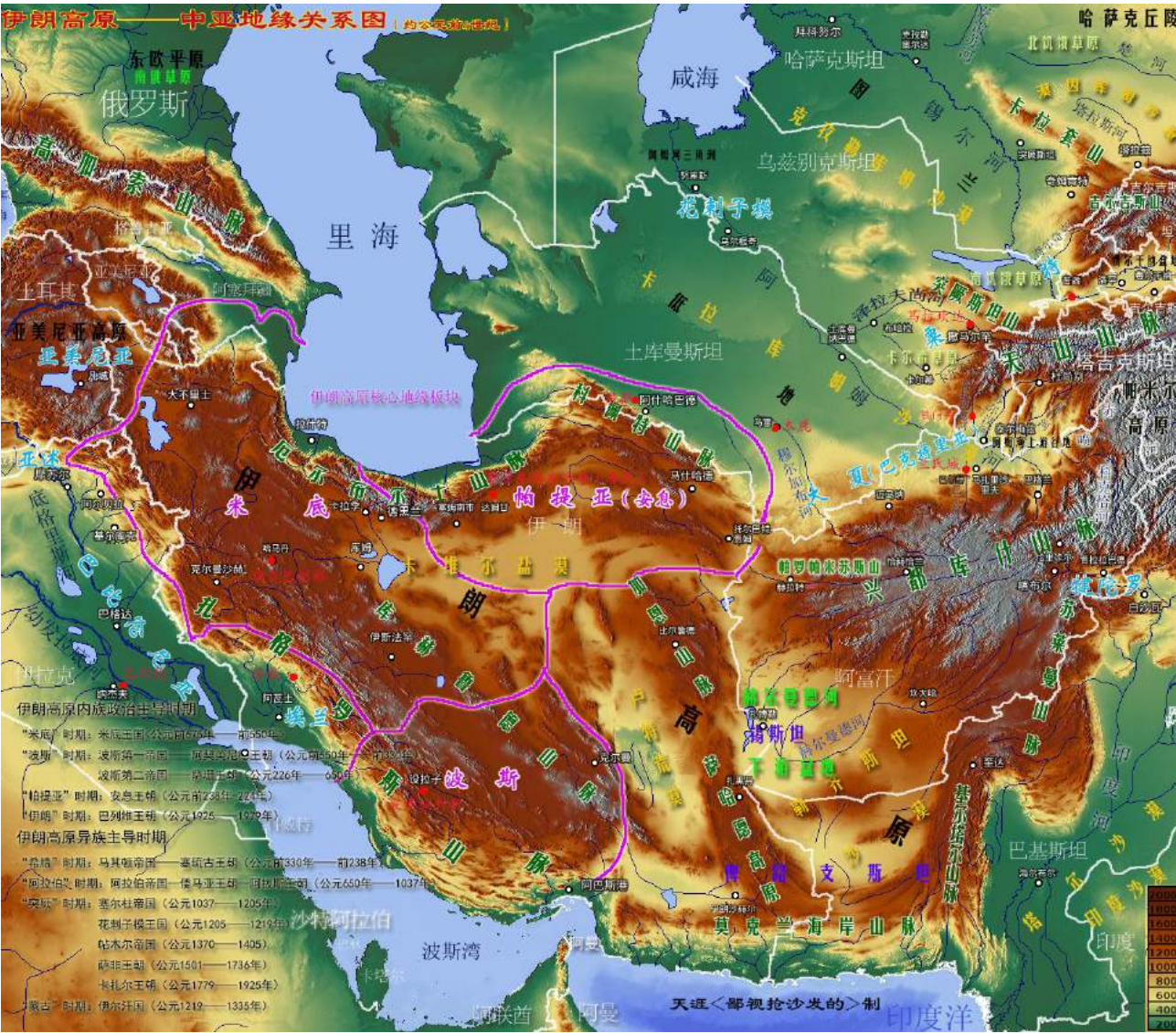
与亚述帝国的长期对抗，使得米底诸部推进到了王国时代。也就是说，米底诸部唯有更紧密的联合起来，才有机会抵御住亚述人的进攻。不过，米底人所做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像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进化。而不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体制，就变成超人了。事实上，米底人之所以能够抵御住亚述帝国的入侵，是因为在高加索山脉的北面，米底人那些留在南俄草原游牧的“亲戚”们，提供了重要帮助。在米底崛起的时代，统治南俄草原的雅利安属性部落，叫作“西徐亚人”。

这些拥有强大机动、军事能力的游牧部落进入伊朗高原，对米底人来说，无疑是战术上的利好。只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些来自草原的游牧部落在帮助整个雅利安部落体系对抗亚述人时，也同样会对他们在高原之上的亲戚产生兴趣。在米底王国崛起的历史中，西徐亚人就曾经与亚述人短暂结盟，鸠占鹊巢的成为米底人的国王。然而这些在结盟过程中所出现的反客为主现象，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关心的是他们的种族背景。在主、客两族实际都为雅利安体系部落时，无论哪一方取得了米底王国的控制权，客观上都在为后来波斯族的形成做出贡献。

尽管时代发展到今天，“民主”要比“集权”有市场得多，但公平和效率永远是一对矛盾体。相比那种各部落都拥有表决权的“部落联盟”时代，王国时代意味着权力将会更集中到王室，以提高效率。当你面对敌人的强大压力时，公平原则就会很自然的让位于效率了。将伊朗高原带入王国时代的“米底王国”，正是在这样

一个自然规律下，被亚述人“逼迫”着进入王国时代的。

当伊朗高原西部拥有地理优势的米底人，联合两河下游，拥有人口、经济优势的巴比伦人，合力击败两河中游的军事帝国——亚述帝国后，米底王国最起码可以有机会将整个伊朗高原作为自己的后花园了。如果米底人能够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做得更好一点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再称呼伊朗高原上这些雅利安人后裔的话，可能就是“米底”族了。然而历史并没有给米底这样的机会，最终为伊朗雅利安人建立共同民族意识的，是来自高原中南部，与米底相邻的“波斯人”。也就是说，本来只是伊朗雅利安部落成员之一的波斯人，通过努力让自己的族名成为了整个伊朗雅利安后裔共同的文化、民族标签。



伊朗高原——中亚地缘关系图

如果从米底板块自身来寻找原因的话，这个板块的地缘位置过于居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南方已经进入成熟农业社会的两河流域，北方仍在保持游牧文化的

南俄草原，以及小亚细亚半岛、伊朗高原中东部，都有实力对米底王国施加压力。说其是四战之地，并不为过。而要想摆脱这种强邻包围的尴尬地位，米底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整合一角。这样不仅可以增强自身实力，亦可让自己获得边缘优势。而这种整合并不能只是政治上的统治，必须辅以民族意识的统一，以让自己突破的一角从根本上成为自己的核心区。否则仅仅依靠军事、外交来维系的“统一”并不能持久。

能够成为米底王国腹地的区域，很明显是与之地缘关系紧密的帕提亚、波斯两板块了。问题是，尽管在战胜亚述人之后，米底王国已经成为伊朗高原的主导者，甚至可以说是统治者。但它对于米底以外的板块，做到的只是间接控制。包括波斯、帕提亚在内的高原其他地区，仍然维持着自己原有的政治、部族结构。而这时候米底王国的扩张重心，是在于与小亚细亚半岛（吕底亚王国）争夺亚美尼亚高原的控制权。

依照“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米底人在没有彻底整合好与自己地缘关系最接近的板块时，就与一个实力接近甚至超出的外部板块对决，是十分不明智的。不过，鉴于从进程上看，刚刚由部落联盟升级到王国时代的米底人，显然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时间来认识到这一点。四战之地的位置，也使得它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外部威胁。事实上，即使米底人不与小亚细亚半岛博弈，也随时有可能受到南俄草原那些游牧的“远房亲戚”的攻击（前面也说过了，这种攻击已经发生过了）。在这种背景下，与米底相邻的波斯人就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期，并最终将自己族名变成了整个伊朗雅利安后裔的共同标签。

相信在绝大多数人的概念中，“波斯”二字是与伊朗高原或者现在伊朗国的领土范围对等的。不过就像我们所熟悉的“华夏”、“蒙古”等标签，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过由点到面的扩大化过程一样，“波斯”这个标签也同样拥有这样的经历。最初的“波斯人”只是指生活在伊朗高原南部，扎格罗斯山脉东段，以农、牧业为生的几个雅利安部落。与伊朗高原另两个核心板块相比，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地缘结构来看，最初的波斯板块都可以说是偏安一隅。两面荒漠、一面大海（波斯湾）的位置，让波斯人基本不用考虑来自外部的威胁。西北方向与之相邻的米底人成为他们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当米底王国在忙于争霸中东时，波斯人终于开始在米底王国的后方插了一刀，并最终终结了米底王国在伊朗高原的统治地位。事实上，所谓“有盛就有衰”、“风水轮流转”，作为与米底同级的核心板块，波斯乃至帕提亚在某一历史时期崛起，并成为高原的统治者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波斯人显然吸取了米底的人教训，将伊朗高原从王国时代带入了“帝国时代”。

关于王国和帝国的区别，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从中央之国的形成过程来看，这其实是一个集权的问题，是权力又一次集中的过程。与王国时代的统治者满足于通过间接控制手段，确立自己最高统治权有所不同（比如周朝），帝国的

统治者会力求在政治、军事上控制自己的势力范围。当然，从较长的历史时间段来看，单凭政治、军事手段来控制一个地区，并不能持久。不过，如果你控制的区域，在种族、语言、文化、生产方式等诸多地缘因素上都拥有共同点，地理结构上又同属于一个更大板块的话，那么帝国这种高度集权的形式，便有利于在这个大板块内加速统一民族意识的形成。类似的现象，相信大家能在对秦帝国的客观评价中找到共鸣。

对于伊朗高原来说，波斯帝国的建立无疑与秦帝国在中央之国核心区所完成的统一，拥有同等的意义。尤其是当帝国的建立者在统一内部之后，继续寻求向外部扩张时，会更有利于新帝国整合出新的更大的核心区来。这一点，倒是和阿拉伯人常说的“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联手对抗陌生人。当没有外人时，我再对付我的兄弟。”是一个道理。就好像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中央之国的话，那么中央之国内部一定会以次一级的地缘板块为基础，进入分裂状态的；而当中央之国不得不时时面对完全不同属性的对手的压力时，大家都会更倾向于淡化彼此之间的差异，以应对共同的敌人了。

当波斯帝国开始对小亚细亚、新月沃地、中亚，甚至希腊人所在的巴尔干半岛进行扩张时，伊朗高原内部诸板块重新融合的外部动力也就形成了。比三百多年后统一中央之国的秦人幸运的是，波斯帝国成功的度过了“三代”这个危险期。二百多年的统治期（公元前 550 年——公元前 330 年），已经足以让伊朗高原形成强大的波斯认同了。相比之下，秦人就不太走运了，他们所厚积薄发出来的成果，最终被汉帝国摘了桃子（所以今日有“汉族”而无“秦族”）。

如果风水只是在伊朗高原内部流转的话，那么作为另一个核心板块，伊朗高原中北部的帕提亚应该是很有机会诞生出伊朗高原新统治者的。问题是，伊朗高原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而是一个闹中取静、占据地缘枢纽位置的板块。在这样的位置上，你虽然有机会四面出击，统治周边板块。但更多的时候，也会沦为周边板块的扩张对象。不过终结波斯帝国命运的，并不是来自相邻板块的政治体，而是与伊朗高原隔小亚细亚相望的，来自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帝国”。

第五节 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帝国

关于亚历山大那奇迹般的征服事业，是欧洲部分所涉及的内容。我们所关心的，主要是亚历山大在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北部的扩张。因为希腊人先行一步到达中亚，让后来也渗透中亚的中央之国，有机会在中亚南部与之进行地缘碰撞。而这种碰撞有可能是军事上的对抗，也有可能是文化上取长补短。至于这一切到底有没有发生，又是怎么发生的。与我们多次提到的安息、大夏两国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则是我们接下来解读的方向。

亚历山大带领马其顿人从巴尔干半岛南部向东发起的那次征服，在古典历史中

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因为无论是之后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都是局限在地中海文明圈中。在这种地缘思维指导下，新月沃地和小亚细亚半岛通常就是帝国亚洲部分的全部领土了。

然而在欧洲最先崛起的马其顿帝国，却并没有局限在这种地缘思维中。他们的扩张方向是向东，即在征服小亚细亚半岛、新月沃地之后，进一步向亚洲腹地扩张，不仅将伊朗高原纳入了帝国版图，更远征到了中亚的农业区（卡拉套山以南），以及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马其顿人之所以会有如此特立独行的扩张路径，很大程度是因为波斯帝国。因为在波斯崛起并征服小亚细亚半岛之后，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诸国都成为波斯帝国征服的下一个目标。

对于波斯人的入侵，欧洲人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斯巴达与雅典人在对抗波斯入侵中的表现，也一再被用各种文学、艺术载体展现。尽管我个人对欧洲文艺工作者们，所渲染的诸如斯巴达 300 勇士在温泉关力战数十万波斯大军，并杀伤数万对手之类的描述表示不屑。但不可否认的是，波斯帝国对欧洲的这次入侵最终并未成功。波斯帝国向西扩张的失败，军事战略层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海军不敌雅典海军（当然，斯巴达人在陆地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在战术层面上也是值得赞赏的），基于波斯人必须通过海上运输来保持它对希腊半岛的压力，制海权的丧失无论在战略、战术层面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想想金门战役的失败）。

尽管波斯帝国在征服小亚细亚和新月沃地乃至尼罗河三角洲后，在地中海获得了漫长的海岸线，并由此为帝国吸纳了海洋文化成分。但从本质上来说，波斯人还是一个陆地民族。那些依靠被征服地区土著民族支撑的海军，并不能为波斯帝国带来真正的海洋意识（战力本身也会大打折扣）。这种意识上的差异所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波斯人并不会会有坚定的决心一定要去争夺地中海的控制权。在一两次尝试失败后，帝国的统治者便会很容易的将经营重心调整到自己更为擅长的陆地。相比之下，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三面环水的希腊地区，海洋意识就要强烈得多了。尤其是像雅典这样依靠对外海上贸易，而在希腊地区获得领导地位的城邦来说。

类似意识决定战略的案例，在蒙古帝国的征服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强大的陆地帝国可以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征服南宋，却仅仅在两次失败的尝试之后，就放弃了对日本的征服。当然，波斯人最终建立的由尼罗河到印度河的广阔帝国，还是让这个山地民族最终逐步吸收了海洋文化。即使不图谋地中海争霸，出于维系帝国东西两端联系的需要，红海——波斯湾——印度洋航线的经营也是必须的。不过最终让“波斯”成为一个海陆兼备的边缘板块的地缘原因，还是在于伊朗高原南部本身就临海的地理特点。只要需要，伊朗高原上的雅利安部落（尤其是最初的波斯板块），在那条狭长的沿海低地上并没有竞争对手。

当“波斯”开始完成由一个高原部落联盟，向海陆兼修的帝国转变过程时，它曾经的欧洲对手那边，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变化。这个由数量众多的城邦国家所组

成的半岛地区，也开始了集权式的帝国进程。只不过，主导这个进程的，并不是海洋属性明显的雅典人，而是来自希腊半岛北部的马其顿。通常情况下，我们把欧洲东南部延伸进地中海的那部分陆地称之为巴尔干半岛，而这个半岛南部与小亚细亚半岛隔爱琴海相对望的突出部，又可以被单独称之为希腊半岛（就好像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的关系一样）。



古马其顿位置图

的地缘政治结构中，就是这个地区分别被南斯拉夫和希腊两国瓜分；体现在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城邦时代，则是马其顿人在文化属性上更愿意将自己视为希腊的一员；而在经济层面上，却完全是一个内陆农业国。

如果说波斯人想入主希腊半岛，就必须迎接希腊城邦在海上的阻击的话，那么由马其顿地区向南统一希腊，就完全没有这种障碍了。事实上，当我们把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认定为海洋国家、海洋板块的话，这种认定都只能是相对的。这更多的是指对于整个国家、地区来说，沿海地区依靠海洋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就其内部结构来说，总是会有完全依靠陆地产出的亚板块参与地区主导权竞争的。在马其顿代表希腊陆权崛起之前，斯巴达人就已经代表希腊内部以农立国的城邦们，与雅典这个以海洋贸易立国的城邦，长期争夺希腊地区的主导权了。

由马其顿人而不是雅典人统一希腊的地缘政治影响就是，马其顿人对于进入小亚细亚半岛乃至伊朗高原，去挑战波斯帝国在亚洲中、西部的霸业会更有兴趣。换作是雅典人来代表希腊人建立帝国的话，他们更有可能的是建立像罗马帝国那样的环地中海结构的帝国。至于波斯人入侵希腊半岛时所担心的制海权问题，对于马其

以整个巴尔干半岛倒三角形的外形来说，很明显它最具海洋属性的地区，是南部的希腊半岛。至于北部地区，半岛腹地的陆地民族就要更具优势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整个巴尔干半岛也大致依据这样的地缘原则，被切割成为南斯拉夫和希腊两个国家（也包括保加利亚南部地区，古称“色雷斯”）。至于马其顿人崛起的“马其顿地区”，则正好位于南斯拉夫与希腊两大板块相接的地方。这种板块相接的位置，体现在冷战时期

顿人来说倒不是问题了。事实上，鉴于波斯人之前的入侵对整个希腊地区造成的伤害，亚历山大将扩张的矛头指向波斯，反而会有助于帝国在希腊地区的整合。就像当蒙古人将铁蹄踏向蒙古高原以外地区时，蒙古高原那些被成吉思汗征服的部落，都会愿意以蒙古人自居了；而当成吉思汗开始征服那些富庶的农业区时，整个欧亚草原的游牧部落又都开始以自己是成吉思汗事业的继承人为荣一样。



亚历山大帝国地缘结构图



亚历山大东征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亚历山大这次史诗般的征服，相当于完全取代了之前的波斯帝国。唯一有所不同的是，他的帝国中加上了波斯人没有征服的希腊半岛。以地缘规律来说，马其顿或者希腊地区，显然不适合作为帝国的核心地区。如果一定要像项羽那样眷恋故土的话，那么马其顿帝国更应该把注意力放

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开拓上。问题在于，马其顿人并不是雅典人。这个内陆农业国十分清楚他们的军事优势，是通过将杂乱无章，类似打群架的步战方式，整合提升为有严格阵法的“马其顿方阵”体现出来的。这种步战技术上的提升，与游牧民族获得马上骑射技术，具有同等的价值。即使这种技术上的提升，不足以让马其顿人长久保持战略优势，但也足以凭借先发优势让马其顿人横扫其他陆地对手了。

既然马其顿乃至希腊地区都不足以为亚历山大支撑起一个陆权帝国来，那么他实现帝国梦想的唯一途径，就是取波斯帝国而代之了。事实上，亚历山大也的确是这么想的。在他开始远征之前，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和土地分赠给了别人。而在马其顿方阵征服波斯之后，亚历山大也明显希望自己融入波斯，并成为波斯帝国的继承人，以统治伊朗高原所能四周辐射的地区（为此，他不仅自己娶了波斯公主，还要求希腊将领与波斯贵族联姻）。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亚历山大的做法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这也证明了，他不仅仅是个军事家，而是一个有地缘思维的政治家）。以伊朗高原的地理位置来说，如果希腊人能够通过与波斯人的融合，成为伊朗高原主人的话，那么向西长期统治小亚细亚半岛；向南征服新月沃地；向东渗透印度河流域、阿姆河流域，都是可以做到的。

当然，维系这样一个内部板块众多的帝国，完成希腊人在波斯帝国的土著化进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是不考虑民族融合的问题，仅从政治稳定角度来看，马其顿帝国最起码也需要五、六十年的时间，来在帝国内部各族中建立统一意识。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亚历山大那么长的时间，这个奇迹般的青年仅仅活了 33 岁就重病身亡了。不过他继位 13 年所扩张的帝国，已经足以让希腊文化有机会与远在东亚的华夏文明发生接触，并造成一定影响了。而我们所划分的伊朗三大核心板块之一的“帕提亚”，也将在伊朗高原的内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成就载入汉帝国史书的“安息王朝”。

第六节 塞琉古王朝将统治重心西移

尽管亚历山大带领希腊人对亚洲进行的这次扩张，真正称得上是“帝国时代”的时间，只有短短 13 年（公元前 336 年——公元前 323 年，也就是亚历山大继位至病亡这段时间），但这次扩张所带来的地缘影响力，却并没有随着亚历山大的逝世而消失。帝国扩张的领土，很快就被那些手握军权的希腊将领们瓜分了。其中得到帝国遗产中最核心部分的将领叫作“塞琉古”，而他在亚洲所建立的希腊化王朝则叫做“塞琉古王朝”（也有译“塞琉西王朝”的）。

伊朗高原并不是塞琉古王朝得到的全部遗产。正如我们开始所分析的那样，以伊朗高原的位置来看，亚美尼亚——小亚细亚高原、新月沃地、兴都库什山脉以北的中亚地区，甚至印度河流域都是能够被伊朗高原辐射的板块。而凭借亚历山大的余威以及军事遗产，希腊人在帝国扩张成功的板块中，暂时并没有土著对手来挑战他们的统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塞琉古王朝就能够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全盘接收亚历山大的遗产了。

即使塞琉古和他带领的希腊人，能够完全让伊朗高原之上的波斯人成为自己王

朝的一分子，并据此对伊朗高原周边板块保持统治权，但就地缘关系来说，有两个曾经被亚历山大征服的板块却几乎没有可能被波斯高原完全控制。这两个板块，一个就是马其顿——希腊人崛起的本部：希腊半岛；另一个则是尼罗河三角洲。而希腊和埃及，就是这两个板块最常见的地缘政治标签。在亚历山大帝国陷入分裂状态时，希腊、埃及地区也顺势崛起能够与塞琉古王朝相抗衡的政治体并不让人意外，毕竟这两个板块在地缘上是完全独立的。其中在尼罗河地区建立的希腊化王朝叫作“托勒密王朝”；而那些重新陷入分裂状态的希腊城邦们，在经过一番博弈之后，也被整合成为“安提柯王朝”。

对于不熟悉西方上古历史的人来说，记住这些异域色彩浓厚的名称是一件痛苦的事。好在我们并不是在讲述历史，历史于我们来说，更多的是在验证地缘板块划分的原则是否准确。抛开这个希腊人留下的王朝标签，纯粹按照地理划分方式来归类的话，我们也会发现这其中的规律所在。很明显，亚历山大用 13 年时间所建立的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帝国，在他离世后被依照洲际归属分割为了三部分。即欧洲的安提柯王朝、非洲的托勒密王朝，以及几乎完全继承波斯帝国亚洲领土的塞琉古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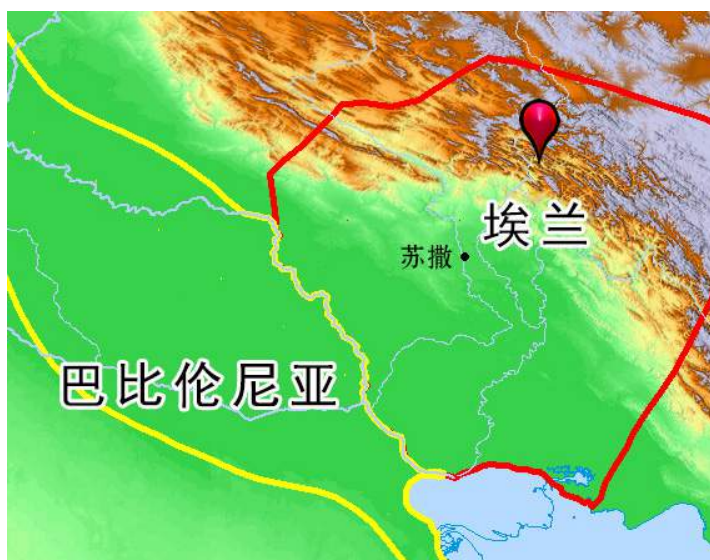
如果安提柯王朝、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这三个希腊化王朝能够按照纯粹的洲际归属来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的话，那么大家也许能够相安无事的各自打出一片天地来，但这种情况显然不会发生。以地缘关系来说，埃及地区的统治者对新月沃地，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西亚裂谷带”的兴趣，要远高于利比亚地区那大片的沙漠。即使是在今天的地缘政治中，埃及人也更愿意在阿拉伯半岛上面显示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至于希腊半岛，除非你真的相信在大西洋上有个“大西洲”，否则西方的文明中心肯定是从地中海以东的亚洲部分发源，并向欧洲传播的。这也使得希腊人对跨越爱琴海，殖民经济更为繁荣的亚洲会更有兴趣。而作为亚洲相接欧洲的大陆桥——小亚细亚半岛，自然也就成为希腊人扩张势力范围的首选了。

基于上述地缘取向，即使塞琉古王朝只想在亚洲称王，不想完全继承亚历山大帝国的衣钵，它在小亚细亚半岛和西亚裂谷带，也一定会长期受到其他两个希腊化王朝的压力。而如果想抵抗住这两个同属后亚历山大体系王朝的进攻，将政治中心放在伊朗高原之上就不是好的选择了。塞琉古和它的继任者们必须选择一个点，能够兼顾小亚细亚半岛与西亚裂谷带，以使自己不至于顾此失彼。

当我们沿着小亚细亚半岛以及西亚裂谷带的地中海海岸线划两条直线的话，我们很快就能够用几何原则为塞琉古王朝在地中海的东北角找到它的都城所在了。而这个点所在的板块我们在中东部分也曾经专节解读过，它就是曾经归属叙利亚，现在归属土耳其的“安条克”。从与托勒密王朝、安提柯王朝争夺亚历山大帝国遗产的角度来看，塞琉古王朝将地缘中心定位于安条克是十分正确的。鉴于安条克本身正处在新月沃地东、西两部分相交之处，塞琉古王朝选择定都于此，也十分有利于

控制身后富庶的两河地区。

当一个王朝能够同时拥有新月沃地和伊朗高原时，将经营重心放在灌溉农业发达的两河流域，以控制这个人口、经济上的优势板块，是一个必须的选择。如果不是为了应对来自西、南两个方向的手，两河下游的巴比伦地区会更容易受到塞琉古王朝的青睐（一开始也的确都于此）。事实上，伊朗高原南部的波斯板块能够在高原三大板块中崛起，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它在两河下游平原已经先期得到了一块富庶的平原地区。



埃兰位置图



埃兰王国圣城遗址

这块在波斯帝国统一伊朗高原之前，就已经成为波斯人领地的平原地区，位于两河交汇的阿拉伯河的左岸。并且作为伊朗最重要的农业板块（现大致为伊朗“胡齐斯坦省”），至今仍留在伊朗的领土之内。而在波斯帝国崛起之前，这一地区被称之为“埃兰”。从现在的流域归属来看，埃兰平原无疑是属于两河平原的一部分。然而在两千多年前，两河并没有合流为阿拉伯河，波斯湾的顶端也比现在更深入陆地。也就是说，那时候从扎格罗斯山南麓流入埃兰地区的河流，是自成体系直接注入波斯湾的。这种靠山面海，河流自成体系的地理结构，使得埃兰地区成为独立于两河下游的巴比伦地区的独立文明区。而在此上所诞生的文明和王国，也被称之为埃兰（其都城叫作“苏撒”，是不是有点眼熟）。

如果有足够的水资源进行灌溉农业的话，同等体量的低地所能够被激发的人口潜力肯定是要远高于高地的。

因此无论是波斯人在崛起过程中，先将埃兰平原吸纳为自己的核心控制区，再图谋伊朗高原的统一；还是后来塞琉古王朝决定以两河平原作为自己的核心经济区，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当塞琉古王朝决心将经营重心放在波斯高原以南的新月沃地时，它对伊朗高原以及需要借助这个高原来辐射的中亚、印度河流域的影响

力就势必会减弱了。即使它能够相对有力的控制与两河流域相邻的米底、波斯板块，对于远在伊朗高原北部的“帕提亚”板块，也有些鞭长莫及了。换句话说，如果伊朗高原上这些雅利安部落后裔，想去希腊化重新主宰自己命运的话，最有可能率先独立的板块就是帕提亚了。

每七节 帕提亚崛起并统一伊朗高原

由于与两河文明中心的距离最远，以厄尔布尔士山脉（东段）、科佩特山脉为基础的帕提亚板块，在伊朗高原三大核心区中最后崛起是合乎逻辑的。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地缘板块和人一样，也是会受到自己周围环境影响的。抛开伊朗高原内部那些开始逐步进入文明状态的邻居不说，最有可能对生活在帕提亚板块的那些部落造成地缘影响的，就是来自中亚地区的游牧部落了。

对于已经进入文明阶段的伊朗高原来说，北方游牧民族不时地入侵肯定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然而从种族覆盖的角度来看，这些仍留在马背上的雅利安系游牧部落不断的南侵，却对伊朗高原的雅利安化有着莫大的益处。如果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部落仅仅是三千年前的那一批的话，那么他们将很难在基因上压倒土著居民（在雅利安人之前经营伊朗高原的部族，应当是和阿拉伯人、犹太人同属闪、含体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波斯人”，其形成过程其实是非常漫长的。是经由上千年时间，不断由驰骋在西干草原上的雅利安系游牧部落（可以统称为斯基泰人）补充新鲜血液而形成的。

对于“波斯人”的形成过程，相信身处华夏的我们应当能够理解。毕竟我们现在所说的华夏族，在形成过程中也有着类似的经历。那些同属蒙古利亚人种的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每一次入侵，都在客观上为华夏民族输送了新鲜血液。而华夏民族植根于强大农耕基础所形成的文明认同，是这种融合能够稳定且一脉相承下来的根本保障。

回到波斯认同的问题上来，在伊朗高原雅利安人后裔形成共同文明认同过程中，波斯帝国的建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帝国的建立，不仅使得伊朗高原上的大多数雅利安部落后裔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认同，更使得后期进入伊朗高原上的那些游牧远亲们也愿意以波斯人自居，并力图证明自己在血缘上与原有的高原雅利安土著之间存在亲缘关系。而共同的种族背景，则是双方能够完成这种地缘融合的重要基础。

在伊朗高原试图脱离希腊时代时，上述融合就又一次发生了。在帕提亚地区建立“安息王国”，并最终带领整个伊朗高原脱离塞琉古王朝的，并非是一片高原上原有的雅利安土著，而是由中亚草原渗透而来的，隶属斯基泰游牧集团的“帕尼人”。尽管这些新渗透进来游牧者，在语言、文化上已经与伊朗雅利安人有着明显区别了。不过我们刚才也说了，共同的种族背景是双方融合的地缘基础。事实上，和发生在

中央之国的情况一样，这些文明层级更低的游牧者在进入定居农业区后，很多时候会选择主动融合，洗白自己的“野蛮”身份，以真正得到这些富庶、稳定的农业区。

安息王国的建立者正是这样做的。王室所做的努力，就是力证自己是波斯帝国建立者（阿契美尼德家族）的后裔。可以想见，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相信这种附会之言的人都不会太多。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这些取得政治主导权的游牧者愿意做波斯人，并且只需做文化认同上的改变就做到这点。相比之下，当顶着“突厥帝国”的文化认同，操着源自蒙古高原的突厥语，并且明显黄白混血的突厥系游牧民族形成后，再发生类似游牧渗透时，就很难为波斯民族的壮大做出贡献了。换句话说，最起码在突厥帝国形成之后，中亚草原的游牧者就已经很难再为伊朗高原的波斯人，补充新鲜血液了。



帕提亚军队

雅利安游牧者的民族所覆盖。

在输入了新鲜血液的新伊朗雅利安人王朝——安息王国建立时，伊朗高原南部的那些波斯土著们，其实已经开始试图脱离希腊人的控制了。只不过，鉴于地缘位置的关系，安息王国的机会最好。对于始终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西方的塞琉古王朝来说，需要应对两个系出同门的希腊化王朝，是他们不得不允许帕提亚人独立的根本原因所在。

由于继承了亚大历山大帝国最为富庶、辽阔的亚洲部分，此时的塞琉古王朝在应对两个同门对手时，还是有比较优势的。只不过为了能够在西线占优，像帕提亚地区这种远离王朝核心区的板块，就不得不放弃了。真正让希腊人完全放弃伊朗高原，并使得帕提亚人得以代表高原土著政治力量，重新统一伊朗高原的地缘原因，在于罗马人的崛起。当希腊人把注意力放在东方时，罗马人已经通过战胜迦太基人成为

虽然亚洲游牧民族的西进，让伊朗高原的雅利安后裔们在后来的历史中，不得不时常承受亡国灭种的压力（从地缘角度来说，重要的不是政治上的“亡国”，而是种族、文化上的“灭种”）。但在匈奴刚刚代表亚洲游牧势力崛起的汉代，伊朗高原的这种压力暂时还不存在。从多瑙河到额尔齐斯河；从哈萨克丘陵到扎格罗斯山；包括兴都库什山脉南北、南亚次大陆北部，都是由源自

整个地中海的霸主。而当罗马人通过攻占希腊半岛，也开始向亚洲进军时。那些先期殖民亚洲的希腊人，所面对的压力与之前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当罗马人成为塞琉古王朝的强大对手时，整个伊朗高原重新获得独立的机会也就来了。而之前已经获得独立地位，并且带有“蛮族”基因的安息王国，也得以凭借先发优势，填补希腊人退出后的政治空白。

现在看起来，伊朗雅利安人又在安息王朝的带领之下实现了复兴。然而不管是“帕提亚”还是“安息”之名，最终都没有成为伊朗雅利安人最终的标签。能够在两千多年历史中，为世人所认可的还是“波斯”之名。从技术上来看，这应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安息王朝的建立者属于游牧民族入侵（土著化后自称“帕提亚人”）。尽管从他们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结果来看，最终都成为土著雅利安人的一部分。但这样的出身，会让后来的高原土著们在寻找民族、文化认同时有所疑虑。这一点，相信有无数次“蛮族”入侵、融合经历的华夏民族，会有同样的感受。

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安息王国对于波斯高原的统治形式，不足以让整个波斯高原重新建立共同的民族认同。相比于之前的波斯帝国，安息王朝对帕提亚以外的地缘板块，控制力要弱得多。王朝的统治是建立在对一个个土著政权的认可基础上，而不是由直接对中央政权负责的“总督”所控制。实际上，无论是伊朗高原之上的那些雅利安系板块，还是后来征服的高原、低地地区，都是以独立王国的形态继续存在的。他们对于安息王朝更多只是宗主权的认同（实际义务基本局限在进贡和军事协助上）。

想象一下这种分散的邦联形式，是不是和项羽曾经试图建立的政权形式有些像？虽然最近有导演试图用投资人的商业资来证明项羽那样做是在践行“民主”理念，但就那一历史时段来说，这种体制结构并不代表着先进。在项羽短暂的辉煌之后，刘邦和他的后代们通过半个多世纪的过渡混合期（中央集权与王国封建并存时代），最终带领中央之国又一次地进入了中央集权体系的“帝国时代”。

其实说起来也很巧，帕提亚人脱离塞琉古王朝成为独立王国，直至彻底击败塞琉古王朝，以松散的政治结构统一伊朗高原（包括两河地区），建立继承波斯帝国主要遗产的王朝的时段，与从秦末战争开启（大泽乡起义）到汉王朝真正进入帝国时代（汉武帝继位）的时段，几乎重叠。在大历史的视角下，来对比同一时段发生在亚洲大陆两端的两个古老族群的不同政治走向，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其结果可以用一段话来总结，那就是：当汉帝国得以凭借“帝国”优势，将政治、军事影响力延伸到天山北麓时，伊朗高原的雅利安后裔们，却重新回到了米底时期式的王国统治时代。

没有重现波斯帝国体系的直接后果，并非仅仅是无法为“安息”或者“帕提亚”之名后面加上“帝国”二字（只能给予其“王国”或者“王朝”的历史地位），更直接让安息王朝的势力范围不足以与当年的波斯帝国相提并论。一些在帝国时代完

全有机会被波斯高原统治的低地地区，并没有纳入安息王朝的统治范围。尤其是与帕提亚地区直接相接的中亚农业区。这片曾经被波斯人和希腊人统治的中亚农业区，在我们所解读的时空里被称之为“大夏”。而对于正在西行路上的张骞来说，安息王朝没有取得对大夏地区的统治权，也间接影响到了他的任务是否完成。

第二十二章 大月氏人进入粟特地区

第一节 希腊化时代的中亚政治格局

一直以来，卡拉套山都被我们认定为是“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分水岭。从地缘文化来说，卡拉套山以北属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区”。除了远在东亚，体量庞大的中央帝国曾经在历史上将政治影响力触及到此，并留下些许文明遗迹外，这片草原上的城市基本都是由 19 世纪后半叶的俄国人所开拓的了。也就是说，在绝大部分的历史时间，卡拉套山以北都没有真正被文明所覆盖过（如果我们认为“游牧”只是一种文化的话）。

如果说卡拉套山以北因为游牧民族的存在，而无法成为文明积淀地的话，那么卡拉套山以南就幸运得多了。温度变化所带来的显著影响，就是绿洲文明的产生。而从影响力源头来说，伊朗高原是对中亚文明区影响最深的板块。在波斯帝国时期，帝国就曾经把势力范围延伸到卡拉套山以南的锡尔河中游地区，而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也同样沿着相同的路径渗透于此。并与被欧洲人称之为“斯基泰”的欧洲游牧民族，在阿姆河北岸展开了一场终极对决。

在中国人记录的历史中，锡尔河也被称之为“药杀水”。所以这场欧洲农业民族——马其顿人，与欧洲游牧民族——斯基泰人的对决，也被称之为“药杀水之役”。不得不说，这是一场奇迹般的对决。因为以双方原始的地缘位置来说，双方最有可能发生博弈的区域，应该是巴尔干半岛北部。事实上在历史当中，巴尔干半岛也的确成为游牧、农业民族混战之地。而巴尔干半岛北部那复杂的地理结构（山地、平原交错），也让这种博弈的结果变得异常复杂。以至于直到上个世纪末，巴尔干半岛上的居民还要以丛林法则、民族仇杀的方式，来延续这场博弈（南斯拉夫悲剧）。

以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和生产方式来说，无论是来自南俄草原还是北亚的部落，机动到其他草原，或者入侵农业文明区都不会让人感到奇怪。所以就亚历山大帝国在锡尔河北岸与斯基泰人对决这件事来说，创造奇迹的是马其顿人（或者说是希腊人）。当然，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也不需要为此妄自菲薄，因为后面我们会看到，东亚农业文明在此创造奇迹的次数会更多。

就药杀水之役的结果来说，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军团取得了胜利。只不过，以我们之前所分析过的地缘结构来说，战略结果也是很明确的。即亚历山大帝国至多能控制的，就是卡拉套山与锡尔河之间，以现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为中心的绿洲地区。再往北或者往西，离开了绿洲农业点的支撑，无论是马其顿人还是之前的波斯人，都没有办法再进行长期的占领了。事实上，对于农业属性明显的政权来说，那些草原实在是太过寒冷和干旱了，如果不是为了反制游牧民族的入侵，并不会有人真的

对它们感兴趣的。

当亚历山大帝国的辉煌瞬间消失，帝国分裂出来的希腊化王国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争夺时，卡拉套山至伊朗高原之间的中亚农业区，也很自然的成为边缘地区。而之前被压制的游牧势力，进一步向锡尔河以南地区蚕食也就成为必然。实际上在之前和之后的历史中，来自欧、亚两个方向的游牧部落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种南下的步伐。尽管最终的结果，都是变成带有游牧基因的农业民族。不过在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之后将近 200 年的时间里，西干草原上的斯基泰游牧部落并没有深入中亚农业区太深。在汉武帝决心派张骞凿空西域之前，锡尔河以南的“南饥饿草原”，是他们的势力终点。



巴克特里亚疆域

当然，如果这某支游牧部落体量不是太大，本身并没有大的政治企图，只是希望在农业绿洲与沙漠之间的干旱草原地带谋得一片游牧之地的话，也并不总是会被定居政权当成入侵者。鉴于环境原因，这种介于丰水区与沙漠之间的“荒漠草原”过渡区，总是不同程度存在的（比如撒哈拉沙漠以南与热带草原之间的“萨赫勒地带”就是最典型的案例；黄土高原上那些不能种地，只能养羊的土地，也是这种过渡性的体现）。

即使是农业居民本身，也会尝试充分利用这些草场进行畜牧，以作经济的补充。这使得那些即使被我们认定为是农耕文明覆盖区的地区，实际上呈现出混合经济的模式（并非像东亚核心区的农耕方式那样纯粹）。

至于说这种农、牧共存的方式，会在政治上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不一定了。像游牧到伊朗高原北部的帕提亚人，在还没有完全消去游牧基因时，就反客为主的成为伊朗高原的主人，也可以被认定为是游牧民族在农业区的一次逆袭成功（同样的情况，五胡乱华时期的中央之国也发生过）。当然，从本质上来说，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农业文明在吸收新的血液。因为这些带有游牧基因的民族，最终都被环境所融化了。

以我们的视角而言，那些小规模农牧融合事件并非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就像帕提亚王朝在伊朗高原的崛起，我们还是应该将之认定为是伊朗内部民族的重新崛起。

起。只不过它的这次崛起，融入了一些游牧民族基因罢了（在此之前，帕提亚人已经开始在伊朗高原北部接受定居生活了，并且在崛起之后将自己归入了波斯民族体系）。真正被视作大事件的，是那种由大规模游牧民族入侵，直接改变地缘政治结构的历史事件。从这个角度来说，亚历山大帝国崩溃之后，中亚农业区整体并没有出现这种大事件。而导致出现这个结果的地缘政治原因，是因为亚历山大帝国在此也留下了一个遗产——“巴克特里亚”王国。

就地缘标签而言，巴克特里亚和大夏所指向的都是同一地区。不过以政权属性来说，它们却有所区别。前者是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之后建立的希腊化国家；而后者则是草原游牧民族入侵之后建立的政权。至于说到底是哪支游牧部落建立了大夏，这个政权的建立又与远在东方的汉帝国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后面再分析，现在最重要的是厘清这个地缘板块的结构和位置。由于在张骞到达此地之时，已是“大夏”时代，我们暂且以“大夏”之名作为它的正式标签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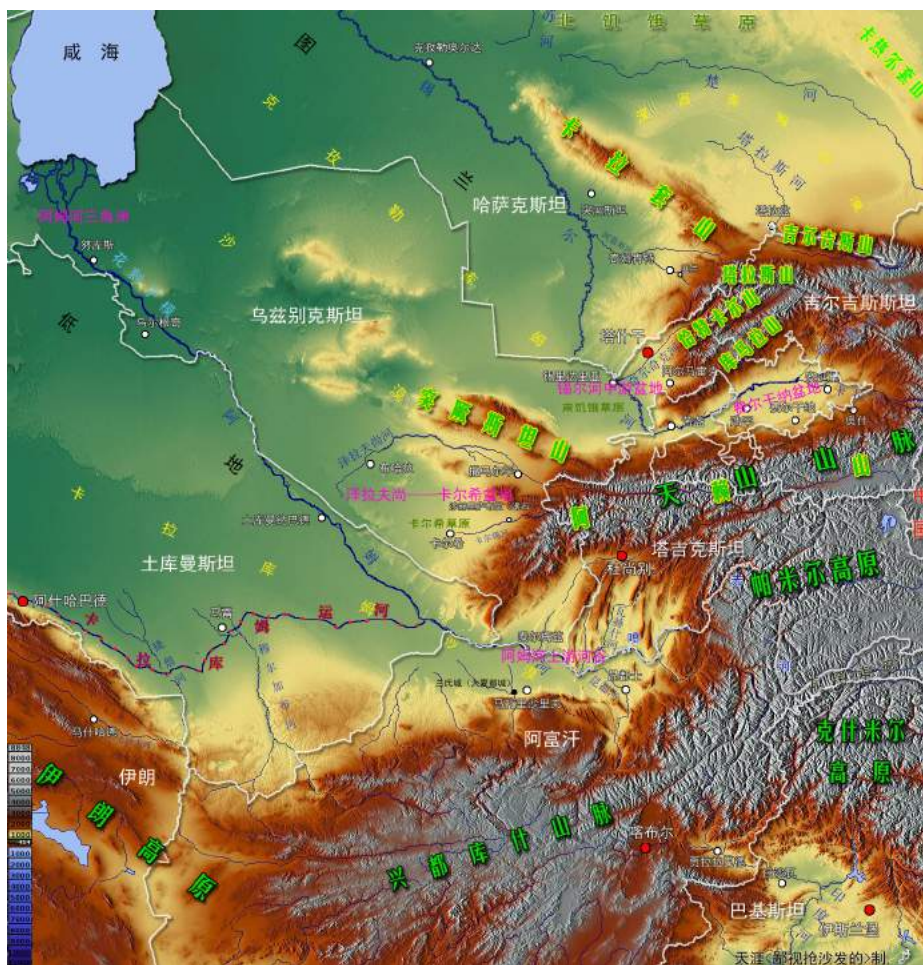
第二节 泽拉夫尚河中下游形成的绿洲

依照我们长久以来的分析方法，“水系”一直是界定某一地缘板块范围的重要依据。以此标准来看，中亚两河中锡尔河齐名的“阿姆河”就是大夏之地的经脉了。而广义的大夏之地也可以被标注为“阿姆河中上游地区”。如果再说得具体点的话，那就是从突厥斯坦山脉到兴都库什山脉之间，所有由边缘山地汇集而下的雨（雪水）水流经过的低地，都可以被称之为“大夏之地”。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阿姆河中上游地区”，只是理论上的。理论上纵横于这些低地的河流最终都应该汇入阿姆河，并连片成一个树状结构的冲积平原区，就像东亚核心区的那些大河水系一样。然而问题是，这里并不是临近海洋且因季风存在而雨水丰沛的“东亚半岛”（东亚核心区实际上就是弧形伸入太平洋的低地半岛结构），而是远离海洋、高山阻隔的欧亚大陆腹地。仅仅依靠高大山脉拦截水汽所汇集下来的淡水，是不足以让整片低地变成绿色之地的。尤其到了远离高大山脉的中游地区，事实上已经没有任何一条河流能够真正注入阿姆河了。那些从突厥斯坦山南麓、阿赖山西麓、兴都库什山脉西段北麓，流入阿姆河方向的河流，最终都消失在了“卡拉库姆沙漠”之中（阿姆河至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之间，覆盖图兰低地的沙漠之名）。

在这些被沙漠吞噬，没能将高山之水带入阿姆河的河流当中，最为重要的有两条：一条就是阿姆河北岸，由突厥斯坦山——阿赖山（天山主脉最西段）所共同打造的“泽拉夫尚河”；另一条则是南部源出兴都库什山脉北麓的最后一条河流——穆尔加布河。而这两条河流所孕育出来的绿洲，也可以被认定为巴克特里亚王国或者大夏王国领地的最西端。

泽拉夫尚河、穆尔加布河等河流，没能最终与阿姆河一起打造出一个完整水系，虽然有点遗憾，但这并不代表这些河流不能为人类的生存发挥作用了。只要有水，就意味着有生命存在的可能。这些河流在山前的冲积扇地区，以及延伸入沙漠中的河流两岸，依然有机会以绿洲的形式成为人类的生存之地。只不过，这种沙漠相间的结构，也注定使得“阿姆河中上游地区”处于不稳定状态。



中亚两河流域地理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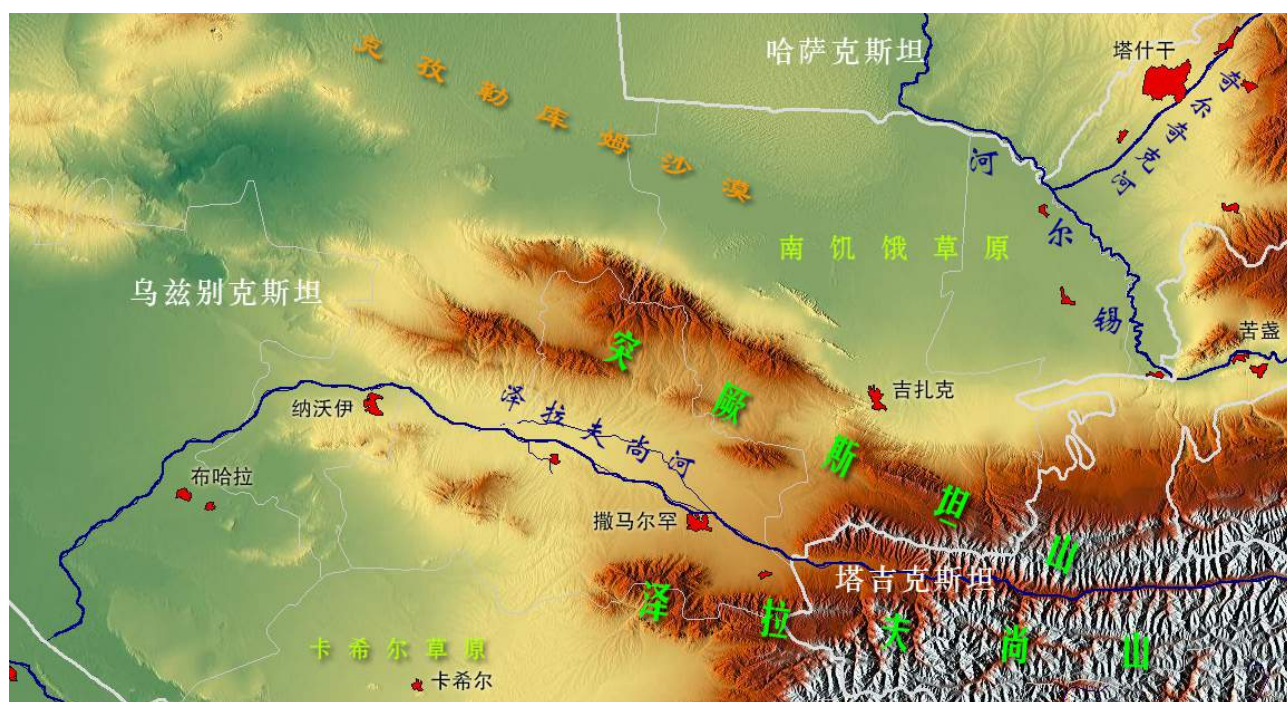
这种不稳定性也在现实的地缘政治结构中得到了体现。这个曾经在2000多年前，被巴克特里亚、大夏两个政权统一在一起的板块，现在则分别被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四国所分割。而经由这四个国家所分割的“阿姆河中上游地区”，也“恰好”大致代表了大夏之地的四个板块。如果我们还以阿姆河为参照对其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将之称为“阿姆河上游

北岸地区”（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有）、阿姆河上游南岸地区（阿富汗所有）、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乌兹别克斯坦所有）、阿姆河中游南岸地区（土库曼斯坦所有）。接下来看看这四个板块当中哪一个板块才是“大夏”的核心板块，又是如何演变到今天这种地缘格局的。

以从中央之国或者欧亚草原进入大夏之地的顺序来说，大夏四个亚板块当中，“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应该是最先进入视线的地理单元。以地理结构来说，来自亚洲草原的游牧民族向阿姆河流域方向的渗透路径，是沿着天山北麓一路向西，在卡拉套山南麓的塔什干绿洲稍作停留，然后再翻越突厥斯坦山进入“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而来自欧洲方向的游牧民族，大多数时候则是溯锡尔河而上，在塔什干绿洲

与亚洲游牧民族的南下路线交汇，再沿着相同的路径推进。至于我们最关心的，以张骞为代表的来自中央之国的旅行者，最惯常采用的路线，是沿塔里木盆地南沿西进，在翻越葱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再沿山麓穿越突厥斯坦山。

当我们在地图上将上述路线分别标示出来后，就会发现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盆地，以及中游地区的塔什干绿洲都不能成为三方渗透的必经之地。三条路线所交汇的枢纽点指向的是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很明显，在这种地缘背景下，应该有一些更知名的地缘标签，来取代我们所标定的“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这个仅显示地理方位的名称。既然我们现在分析的是中亚，那么就不妨从现在中亚土著们的视角来选择一个好了。以此来看，撒马尔罕这座历史名城应该是最合适的了。



泽拉夫尚河地区示意图

与塔什干一样，撒马尔罕也是乌兹别克的重要城市。仅仅考虑乌兹别克斯坦内部地缘结构的话，这座乌兹别克第二大城市，也许更应该成为首都（那样它肯定就是第一大城市了）。每一座繁荣城市的建立，一定会与一条河流的存在息息相关。这座位于阿姆河北，突厥斯坦山南的绿洲城市，所依附的河流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过的“泽拉夫尚河”。在所谓“河中地区”，除却锡尔河、阿姆河这两条大河之外，泽拉夫尚河可以说是唯一会与这二者同时被提起的河流。而从地缘位置上来说，泽拉夫尚河所孕育的绿洲甚至可以说是河中地区的核心之地。

从位置上来说，撒马尔罕位于泽拉夫尚河的中游河谷地带。也就是河流从高山下来，紧贴山地的部分。这也是整个大中亚地区的一大特色了，紧邻高山的中游河谷地带往往会比深入腹地的下游地区，更有绿洲潜力。不过泽拉夫尚河被山地庇护



撒马尔罕

的河谷低地，并非是这条河流的全部潜力所在。我们从地图上就能看出，泽拉夫尚河与阿姆河有近在咫尺的感觉。如果这两条河流能够合流的话，那么在它们交汇之处应该会有机会形成一个三角洲绿洲，并成为灌溉农业兴盛之地。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泽拉夫尚河并没有汇入阿姆河。尽管有些遗憾，但却并不代表泽拉夫尚河下游就只能默默无闻的淹没于沙漠之中了。它的上游所依托的集水区，是天山山脉的西段“阿赖山”，突厥斯坦山脉又从侧翼为其保证了中游地区的淡水补给。在这片沙漠包围的低地上，生成有一个有两千多年建城史的城市——布哈拉。事实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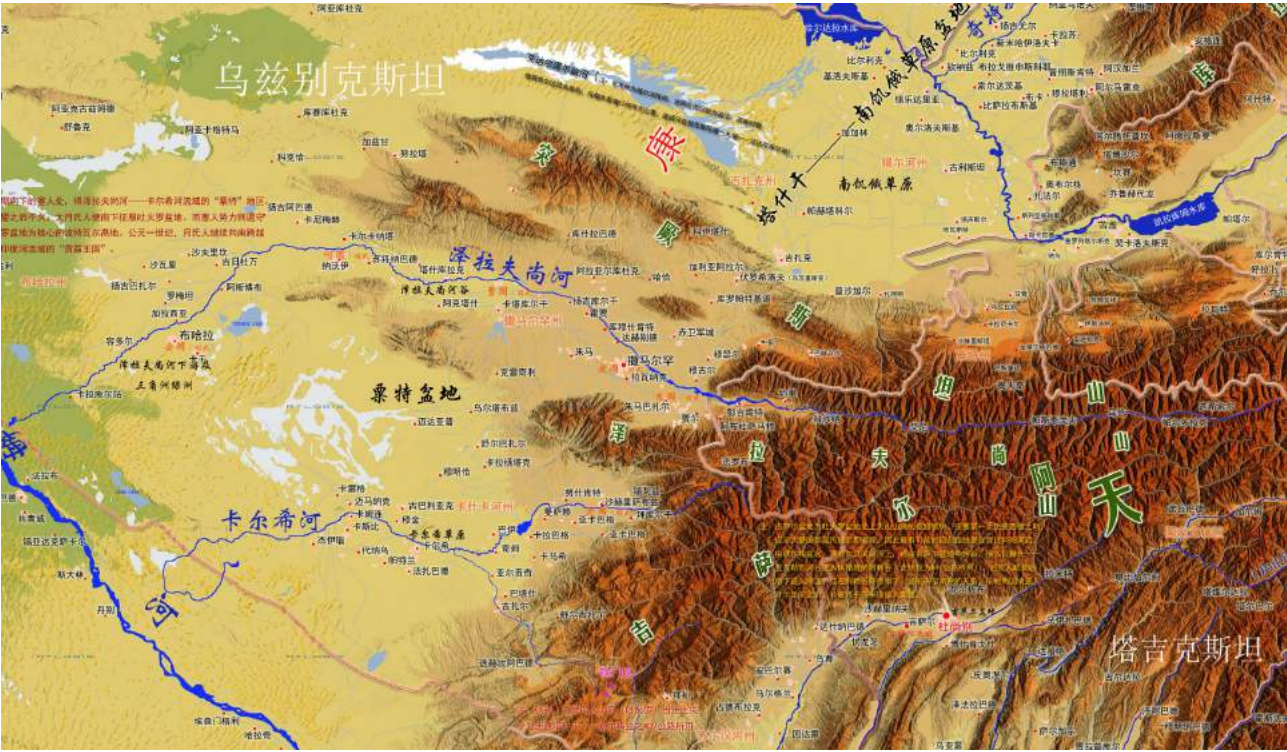
泽拉夫尚河没有最终流入阿姆河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布哈拉、撒马尔罕绿洲很早就被进行了农业开发。在生活在布哈拉绿洲与撒马尔罕绿洲的居民共同开发下，泽拉夫尚河之水被大量消耗，以至于与阿姆河失之交臂。不过，这也不算是坏事，毕竟这些河水最终都为人类所用。对于地缘上最大的影响，就是本来应该出现在阿姆河——泽拉夫尚河河口的绿洲，被北移到了布哈拉地区。

第三节 卡尔希河中下游形成的绿洲和草原

现在看起来，所谓的“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的范围，似乎可以被缩小为“泽拉夫尚河中下游地区”，或者说撒马尔罕、布哈拉两座城市（也可说绿洲）了。至于周边更为广袤的区域则应该是被沙漠所覆盖了。不过有了在卡拉套山之南的经验，我们再审视这个地理结构与之犹如翻版的区域，就应该在泽拉夫尚河以南，看看有没有在邻近山地的地方，发现一个在淡水补充问题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介于沙漠与农业绿洲之间的干旱草原地带，就像“南饥饿草原”那样。当我们以这种逻辑进行推定时，很快就會在泽拉夫尚河之南，阿赖山西端之北，真的找到一片干草原——卡尔希草原。由于所依靠的山地为面对西风带的阿赖山西麓，卡尔希草原上甚至还出现了一条源自阿赖山的，略具规模的河流“卡尔希河”。

与中游地区还能从周边山地补水的“泽拉夫尚河”相比，卡尔希河就没那么幸

运了。在古典时期的技术条件下，它的下游地区并没有足够的湿地来支撑像布哈拉那样的绿洲存在。和大多数系出天山的河流一样，雪水从高地奔流而下，在山前形成的冲积扇平原是卡尔希河流域的精华所在，也是开发绿洲农业、建立“城国”的希望所在。在现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行政版图上，矗立在这片绿洲上的城市叫作“沙赫里夏勃兹”。不过就整个卡尔希河来说，其现在地缘中心却是在卡尔希河下游的“卡尔希城”（地理范围为卡尔希草原的“卡什卡达里亚州”首府）。



汉西域全图

如果以卡尔希城的位置来说，它的确是整个卡尔希草原的地理中心。不过我们刚才也说了，就其本身的水资源状况来说，却并不足以在古典时期的地缘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与撒马尔罕这些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相比，卡尔希所在的卡尔希河下游，一直要到 14 世纪才有机会因交通需要而成聚集定居者。真正让它及整个卡尔希城有机会成为卡尔希地区地缘中心的原因，来自于工业技术的运用。在俄国人成为整个中亚地区的主人后，他们在中亚大规模的开建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苏联时期）。以使得那些“白白”流入沙漠、咸海的雪水，能够将那些地势平整，介于原始绿洲和沙漠之间的半干旱草原转变成为高产的灌溉农业区。在这种思维指导下，锡尔河中游、卡尔希河下游半干旱的“南饥饿草原”、“卡尔希草原”，都升级成为农耕区。而锡尔河、阿姆河、泽拉夫尚河之水，则成为润泽这些草原的源头。

在卡尔希草原被大规模进行农业开发之前（也可以说是整个古典时期），史称“渴石”的沙赫里夏勃兹，才是卡尔希河流域的地缘中心。对于渴石或者沙赫里夏勃兹

两个名字，知道的人应该不多，不过提起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的“跛子帖木儿”来，相信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大多都会有印象了。在世界历史中，帖木儿之所以闻名，是因为他以卡尔希河流域为起点，建立了一个与波斯帝国、塞琉古王朝重合度颇高的帝国，并且顶着蒙古黄金家族后裔的名义入主了印度西北部地区。这对于以蒙古帝国为荣的一些人来说，又间接增添了兴奋点。毕竟以此逻辑来看，蒙古人及其后裔在中世纪所征服的每一寸土地，似乎都应该模糊归属于华夏文明。



卡希尔位置图



卡希尔市

事实上，即使认定蒙古帝国的荣耀应该归属于中央之国，帖木儿帝国的建立也应该被归类于中亚突厥人的崛起。只不过成吉思汗在欧亚大陆史无前例的那次征服，使得后来的游牧政权更愿意与其建立历史渊源，并试图以此来继承他的政治遗产罢了。不过如果说帖木儿帝国就此与中央之国一点关系没有，也是不尽然的。因为这个突厥血统的征服者，生前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回到”突厥帝国曾经染指过的东亚，与当时的明帝国一战（即使在今天，以突厥帝国继承者自居的土耳其，也一直宣称“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的长城”都是他们的利益区）。只不过随着他的离世，没有继承者愿意再去实现这个宏伟愿望罢了。

单从地理结构来看，卡尔希河流域的命运很显然应该和泽拉

夫尚河流域捆绑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将突厥斯坦山和阿赖山所共同庇护的这片地区，称之为“泽拉夫尚——卡尔希盆地”。就这两条河流的关系来说，应该是很有机会被同一族群或者政权所覆盖。其中绿洲条件最好的撒马尔罕是最有机会成为整个板块的地缘中心。事实上，在帖木儿开始在中亚地区的征服后，也的确将都城设立在了撒马尔罕。

然而以我们所用来解读中亚地缘结构的历史时段来说，帖木儿时代还是过晚了。它所提供的证据并不一定能够证明，在张骞到来之时，整个“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

也会拥有类似的地缘结构。提出当时或者相近时代的历史证据，会更有利于我们从大历史角度来定位这个板块的地缘属性是否稳定。而对于希望看到这一点的朋友来说，其实也并不会感到失望。因为在下一节的内容中，消失已久的大月氏人即将出现在泽拉夫尚——卡尔希盆地。并且作为与“大月氏”有直接血缘关系，并曾经出现中央之国历史中的两个地缘标签：粟特和昭武九姓，也即将出现。

第四节 大月氏人南下阿姆河流域

在大月氏人被乌孙人从天山山地草原地带赶出来后，他们选择的逃亡路线是顺着天山山脉继续西迁。当然，如果他们愿意，沿楚河或者锡尔河向西去竞争哈萨克丘陵地带的草原，也是一条路。那样的话，他们或许就有机会代表亚洲游牧势力进入南俄草原，并影响欧洲历史进程了（这个开先河的机会，后来被称之为“上帝之鞭”的匈奴人拿到了）。

不过，后来大规模进入欧洲的亚洲游牧民族，多是沿草原条件相对优越的西西伯利亚平原与哈萨克丘陵北部相接的草原地带西进，穿越乌拉尔山与里海之间的缺口进入欧洲的。而对于本来想在伊犁河谷休养生息的大月氏人来说，这条路线却已经彻底被匈奴人在北部封堵住了。如果一定想向欧洲方向迁移的话，就必须经由哈萨克丘陵南部那些荒漠地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继续沿天山山麓前进会是最安全的方案。继续被迫迁移的大月氏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很快他们就要翻越一条重要的地缘分割线——卡拉套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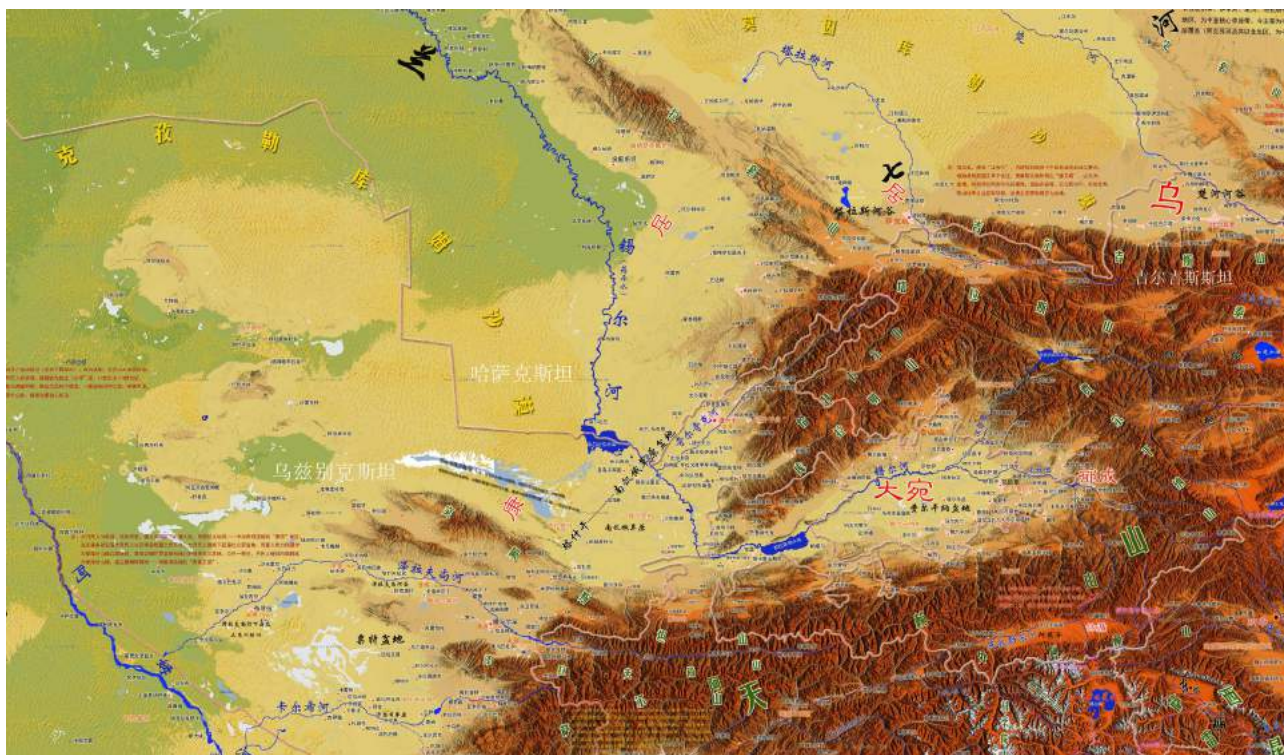
对于他们来说，当时最大的感觉可能是方向上的，因为之前的迁移方向一直是沿天山北麓向西。而越过卡拉套山进入锡尔河流域后，再想第一时间获得那些高山雪水的话，就必须由西向南调整方向了。在卡拉套山以南，大月氏人并不会感到不适应。那些从天山流淌而下的雪水，会继续在山坡、山前滋养出草原来。问题在于，卡拉套山以南的气候已经具备绿洲开发的条件了。即使没有马其顿、波斯这两个带有农耕属性的帝国渗透，在那些可以开展灌溉农业的河谷绿洲中，也已经开始进行农业开发了。

面对这些点缀于沙漠、草原之间的绿洲，大月氏人的感觉应该是惊喜，毕竟这些绿洲的产出会远胜于同等面积的草原。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些灌溉农业的贡献，更有着其作为交通补给站而获得的额外商业利益。南下的大月氏人尽可以一方面在山地、山前草原上维系自己的游牧文化，另一方面又控制这些绿洲土著，增强自己的实力。

以卡拉套山以南地区的地缘结构来说，锡尔河中游北岸的奇尔奇克河河谷（也就是塔什干绿洲），无疑会是大月氏人最先控制的绿洲农业点。而如果大月氏人想获得抵御乌孙人的实力的话，仅仅以锡尔河中游左右两岸之地作为根据地是不够的。

他们需要继续扩张自己的领地，才能保证自己在中亚的地缘政治结构中获得一席之地。在这个时候，大月氏人又一次的面临了方向的选择，即到底是溯锡尔河而上，以费尔干纳盆地（也就是大宛国）为目标；还是继续南下，进入阿姆河流域。

从后来的历史记载来看，大月氏人并没有选择突破费尔干纳盆地，而是选择了穿越突厥斯坦山，进入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也就是我们上一节所分析过的“泽拉夫尚——卡尔希盆地”。做出这样选择的最大原因，可能在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地缘潜力。作为天山南北水资源、气候条件最好的板块，费尔干纳盆地整体已经不能用“绿洲”来定义了。这样一个类似于东亚平原板块的地理单元，所滋养出来的“大宛国”无疑是个大国了。其数十万的人口数量，也远非那些数千、数万人口的西域城国可比。面对这样一个物资充沛、人口众多的国家，大月氏人一旦决心取而代之的话，很可能会陷入持久战。这对于还随时处在乌孙人威胁之中的大月氏人来说，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



汉西域全图

影响大月氏人决定的地缘因素，应该还有费尔干纳盆地的地理位置。试想一下，在大月氏人与大宛人拉锯于费尔干纳盆地时，一旦尾随而来的乌孙人，或者从哈萨克丘陵方向而来的康居人，南下控制了塔什干绿洲及南饥饿草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很容易看出，大月氏人自此再无退路了。在被人扎口费尔干纳盆地的同时，乌孙人还可能从纳伦河谷而下，打击尚未在锡尔河上游站稳脚跟的大月氏人。真要形成这种“关门打狗”的局面的话，除了上葱岭，大月氏人就只有向塔里木盆地突

破了。先且不论塔里木盆地边缘有没有足够支撑大月氏人存在的草原条件，单就地缘格局来看，这也是把自己置于乌孙人的眼皮底下。

既然选择向费尔干纳盆地突破没有必胜的把握，并且在战略上是往死胡同里钻，那么选择继续向南，进入泽拉夫尚河流域就属必须了。控制以泽拉夫尚河流域为核心的“阿姆河中游北部地区”的好处在于，这是一个可以多方选择的枢纽板块。既可以继续向南，以征服大夏为目标，控制整个阿姆河中、上游地区；也可以选择沿阿姆河向西，去争夺“阿姆河下游三角洲”（花刺子模）。

现在对于大月氏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控制阿姆河中、上游地区的“大夏”所拥有的人口超过百万。大月氏人如果想继续南下的话，面临的障碍似乎要高于东进。不过，决定博弈结果的因素，永远不会只是单纯的人口数量、经济实力。那么究竟大月氏人是如何做到在阿姆河北岸（中游）立足，并最终取大夏而代之的呢？

第五节 昭武九姓分布于粟特和花刺子模

当入侵阿姆河流域的力量来自于北方时，阿姆河——卡拉套山之间这片绿洲、草原交错之地，通常会有机会作为一个整体，帮助这些强悍的游牧部落沉淀下来，并与原有的绿洲土著融合出兼具农、牧优势的新政权来。对于这片帮助北方游牧民族完成定居化进程的土地，有一个专属的地缘名词——粟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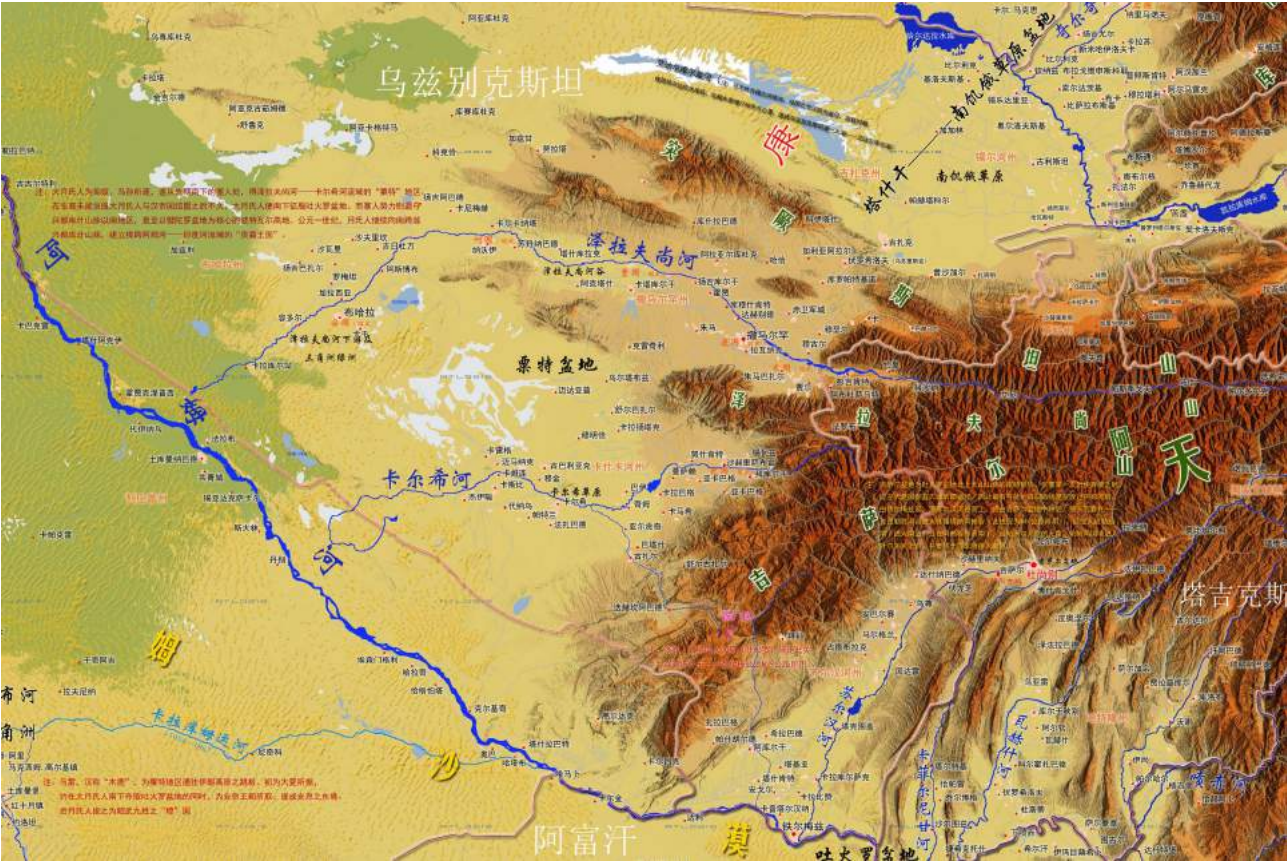
对于中国人来说，粟特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如果你不是很熟悉历史的话，那么安禄山、史思明总知道吧？还不知道的话，那么安史之乱呢？杨贵妃呢？好了，不卖关子了。造成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就是由迁居中央之国的粟特人所引发的。安禄山、史思明二人能够对中央之国的历史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本身与粟特地区的地缘结构无关。这一后果的产生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唐帝国过于依赖军政独立的“藩镇”来统治边缘地区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没有安禄山、史思明二人，最终也会有其他藩镇军事领袖去挑战中央政权的。

然而，这种授权藩镇也不能说完全错误，在实际操作中，这样做也使得唐帝国的军事力量更具有攻击性和扩张性（所以唐帝国在西、北方向的扩张，要比汉帝国更甚，而这还是在外部压力大于汉帝国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在帝国中央政权尚能掌控局势时，这能使之成为帝国强大的保障。相比之下，吸取唐帝国教训的宋王朝就显得内敛得多了。避免出现军政独立的藩镇，成为宋王朝的立国理念。至于说两种做法谁更好，是一件很难用是、非结论来评判的事情。只能说，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前者的风险在于，王朝崩溃的风险通常来自于内部；而后者则在对外扩张以及抵抗外部压力时，显得低效。

言归正传，唐帝国的历史并不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重点，引出“安史之乱”来，只是想拉近大家与这片“化外”之地的心理距离。事实上，安禄山、史思明二人本

身也的确与我们这一节的内容有直接关系。因为这些粟特人，就是在“阿姆河——卡拉套山”之间完成定居化进程的大月氏人后裔。在中国的历史中，有一个更精确的标签来从“人”的角度为之进行归类，那就是“昭武九姓”。

以姓氏作为标定族群归属，并非为华夏文明所特有的文化。只不过，强烈的农业背景，使得华夏民族在技术上更有机会维系这种血缘传承罢了。如果是居无定所，且部族关系随时处于丛林法则状态的游牧部落，一个姓氏或者家族要想流传有序的传承下来，就非常困难了。对于大月氏人来说，他们的后裔能够有机会在粟特地区形成血缘印记明显的九个聚集区，与粟特地区的地缘特点是分不开的。那些分布于各个河谷的绿洲农业区，天然就具备独立性。在没有强大政权将之统一时，这些具有相同民族背景的绿洲，在政治上也很容易成为相互独立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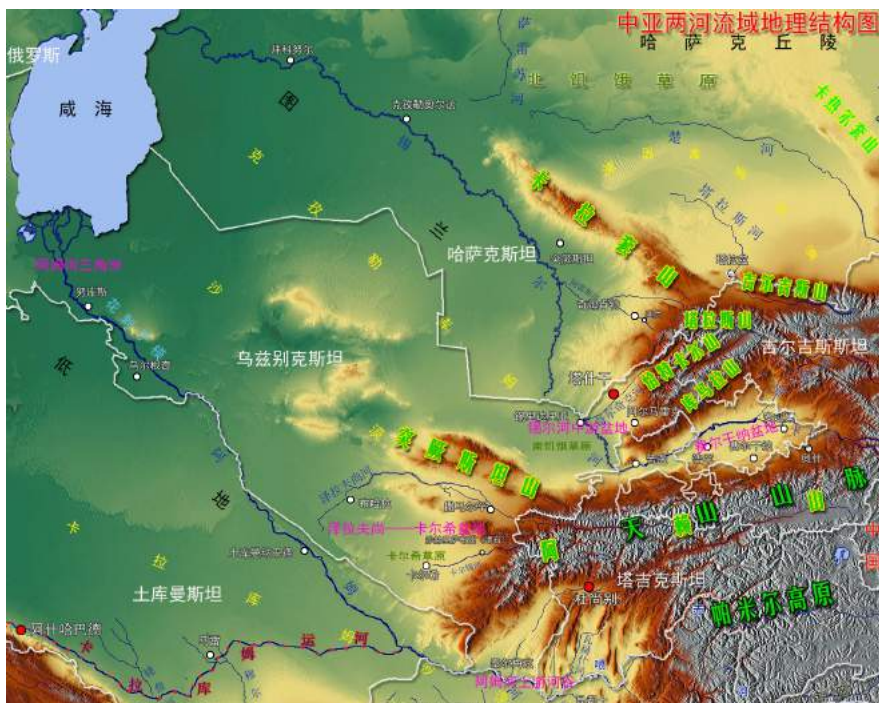


汉西域全图

按照中国历史的记录，这些试图以大月氏人后裔之名，拉近与唐帝国关系的粟特人，被分为：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九个国家（或者说部族）。其中康、安、曹、米、何五族，分布于撒马尔罕，也就是泽拉夫尚河中游一带；戊地则在布哈拉一带，也是就泽拉夫尚河下游绿洲；塔什干所处的奇尔奇克河绿洲，属于“石国”之地（后来引发怛罗斯之战的国家）；而史国则占据了卡尔希河流域最有可能成为绿洲的山前冲积扇地区。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帖木儿的故乡“渴石”

地区。

在此不妨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是来自中央之国的宋王朝或者明王朝，而不是蒙古人在中世纪将帝国扩张到中亚地区的话，那么，像帖木儿一类中亚土著，在试图崛起时是会更愿意追溯到与中央之国地缘关系更亲近的“大月氏人”，还是像现在这样以蒙古黄金家族成员自称呢？历史已经发生了，再多假设也只是为了活跃一下大家的思维罢了。



中亚两河流域地理结构图

的地区位置处在图兰低地腹地，无法像他们同根生的兄弟部族那样得以背靠天山山脉。而从地缘结构上看，火寻国所寻求发展的空间，并不属于粟特板块。而是属于“中亚河中地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阿姆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

在低地几乎意味着沙漠的中亚地区，要想在一条河流的下游地区立足，建立一个足以对抗周边板块压力的政权，是一件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能够支撑火寻在阿姆河下游立足的基础，在于阿姆河充沛的水量。在包括草原地带在内的中亚板块中，由天山、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这三大高地，合力集水打造出来的阿姆河流域，所蕴含的水资源潜力是十分巨大的（没有过度开发之前，年径流量超过 600 亿立方米）。其年径流量相当于中亚排名第二、三位的另两条大河：锡尔河和伊犁河的总和。如此丰富的水资源，加上相对较低的纬度（意味着更多的光热资源），使得阿姆河流域成为中亚的农业中心。

除去天然受山地庇护的中、上游地区以外，穿越沙漠之后的阿姆河，仍然有余力在注入咸海之时，漫流出大片湿地——阿姆河三角洲。实际上在伊犁河以及锡尔

回到粟特问题上，相信有朋友经过简单的数字计算，已经发现在我们前面的内容中还少了一个隶属“昭武”体系的国家，它就是“火寻”。这个同属大月氏后裔的国家，并非是在“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的泽拉夫尚河、卡尔锡河流域；也非是在“锡尔河中游北岸地区”的奇尔奇克河附近，它的位置是在阿姆河下游地区。这样一个位置，意味着这支月氏后裔所处的

河注入巴尔喀什湖、咸海之时，也同样因为流速骤减而沉积出了三角洲平原。只不过这两个三角洲并没有机会在地缘政治舞台上，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这种差异取决于两点，一是阿姆河的水量更大，所形成的三角洲平原体量也更庞大；二是阿姆河三角洲的气候环境更加适宜进行农业开发（无霜期超过 200 天）。鉴于这两点，阿姆河三角洲地区如果得到充分开发的话，其农业、人口潜力并不会比中游地区差。

问题在于，这个中亚难得一见的既远离高山，又体量巨大的三角洲平原，地理位置有些孤独。与依附于天山山脉的阿姆河、锡尔河中游地区相比（这使之天然成为商路的一环）。荒漠、咸海环绕的阿姆河三角洲，本身很难成为东西方交流通道上的一环。这不仅使得阿姆河三角洲很难像泽拉夫尚河流域那样，额外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更会因为它的边缘位置，而延缓它的大规模开发时间。



阿姆河

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源来说，我们很难确定被归入昭武国家的“火寻国”，是否真的占据并开发了整个阿姆河三角洲。因为从地缘位置上来看，对这片湿地感兴趣的并不止已经在阿姆河中游站稳脚跟的月氏人。控制锡尔河下游及哈萨克丘陵地带的隶属欧洲游牧体系的康居人，除了向东渗透天山山麓以外，也不会无视这片相隔并不遥远，孤立于荒漠之中的湿地。作为锡尔河、阿姆河的共同归宿地，康居人如果沿着咸海东岸向南渗透并驻牧于阿姆河三角洲，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

事实上，在现有的地缘政治板块上。已经被归入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姆河三角洲，实际上是一个半独立的行政区。居于其上的“卡拉卡尔帕克人”，就是在 19 世纪从锡尔河流域迁移而来的游牧部落。鉴于他们与现代哈萨克人之间有更多的亲缘关系，苏联人为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行政体系下，设置了半独立状态的“卡拉卡尔帕克共和国”。

尽管阿姆河三角洲平原具备大规模农业开发的潜力，但历史上这片三角洲的命运，通常是由建立在其东侧的阿姆河下游河谷两侧的绿洲城市所掌控的。如果要具

体到城市的位置，那就是努库斯东部的“乌尔根奇”一带。以地缘结构来说，乌尔根奇及其东侧狭长的下游河谷地区，既是阿姆河三角洲通往阿姆河中上游地区的必经之路，也可以充当阿姆河三角洲的土著防御中上游地区渗透的门户走廊。最终的角力结果，很可能是双方各据一半。这一点，在今天乌兹别克的行政版图上也同样得到了体现。阿姆河三角洲平原以东的下游河谷地区，一部分为其东端的“布哈拉”所控制（布哈拉州）；一部分则归属以乌尔根奇为中心的“花刺子模州”。



乌兹别克斯坦行政区

中亚前，这个以“阿姆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为根基之地崛起的中亚国家，刚刚向东统一了整个阿姆河流域。并向南征服且短暂控制了兴都库什山脉及波斯高原的国家，这也直接导致了“阿姆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被贴上了花刺子模的地缘标签。要不是如此倒霉的遇上了史上最强大的游牧征服者，也许花刺子模的高潮期能够更长久一些。

“阿姆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直到13世纪初才昙花一现的迎来了自己的高潮，也体现出了这个板块的无奈。尽管同属于河中地区的一部分，但紧靠丝绸之路的粟特地区所发生的故事，要远比花刺子模地区更多。大月氏人入主粟特地区，就是一次重要事件。不过这些远道而来的游牧者在占据粟特地区后，应当暂时不会将注意力集中于向下游地区扩张。因为相比之下，阿姆河南岸那些能够近距离承接高山来水的绿洲、草场会更具有诱惑力，拥有巨大财富的定居者也更多。而在这个方向上，月氏人的对手将是人口处于巨无霸级别的“大夏”。

现在我们应该基本了解了，在中亚历史中经常出现的“粟特”和“花刺子模”

而鉴于“花刺子模”这个地缘标签曾经的辉煌，它也成为“阿姆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的地缘标签。就现有的行政区划来说，我们可以大致认为它是乌兹别克斯坦“花刺子模州”+“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对于中亚历史或者蒙古帝国扩张有所了解的朋友，一定会对“花刺子模”这个国家印象深刻（蒙古人在征服花刺子模王朝时，曾经屠杀了上百万居民）。在蒙古人征服中

两个地缘标签的范围了。至于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粟特地区，与大月氏人的渊源相信也比较清楚了。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像泽拉夫尚河流域这类水、热条件俱佳的绿洲，没有理由等到大月氏人来开发的。而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大月氏人在到达此地之前，粟特地区应该已经有了成熟的定居族群。那么这些定居者究竟是谁呢？

第六节 大月氏到来前粟特存在的定居者

在这里，我们需要先对“定居者”这个概念做一个解读。将一个族群的经济基础完全定位为一种生产方式之上，肯定是不妥的。在实际生活中，游牧者也会打猎；农耕者也可能捕鱼；而渔猎者也有可能同时饲养牲畜和用技术含量不高的方式开发部分耕地。我们为这些族群冠以游牧、农耕、渔猎等名，主要是指向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以此来说，将古典匈奴人定位为游牧民族，华夏族定位为农耕民族并没有问题。然而具体到中亚绿洲的经营者来说，将之完全定义为“农耕民族”却有些不妥，因为这有可能让将之与华夏族这样近乎纯粹的农耕民族划等号。而实际上，二者在文化、生产方式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环境上的，二是地缘位置上的。中亚整体干旱的气候使得绿洲的边缘，总是存在一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荒漠化草场（也包括临近的山地草场）。为了利用这些宝贵的植被，小规模蓄养一些牲畜是很常见的事情。而由此所带来的收益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例，整体要比东亚农耕民族要高得多；另一个影响源在于这些绿洲农业区通常也是东西方商路的一部分。这使得那些试图在绿洲定居的人，有相当一部分纯粹凭借商业交换所获得的利益，就能够成规模的生存下来（并在经济乃至政治层面中占据主导权）。

这种农、牧、商混合而成的经济状态，对中亚——伊朗高原地缘文化的形成有些非常深远的影响。农耕的稳定性与商业的流动性，在中亚这些定居者之中达到了一种平衡，并共同成为族群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具体的表现为，他们并不会像东亚农耕者那样，如此的眷恋一块土地。如果某一地区有更好的经济空间，主动进行迁移并非不可接受的。像部分粟特人看到开放的唐帝国能够带来机会，就主动以家族为单位内迁就是典型案例（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波斯人身上）。即使是现在，我们在中央之国腹地的一些族源、文化与大中亚地区有着渊源的民族中，依然能够看到这种地缘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影响。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将中亚的这些绿洲居民概括为“定居者”，会比简单的归类于“农耕民族”更准确些。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来。在大月氏人到来之前，谁是粟特地区的定居者？单从种族上来说，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这些定居者与那些被称之斯基泰的源自南俄草原的游牧者，以及定居伊朗高原的所谓“雅利安人”属于亲缘民族。按照地缘

分类，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伊朗高原以东的定居者，称之为“东伊朗人”（最初东伊朗的概念，和雅利安一样，只是一个语言分类）。种族和语言是划分东伊朗民族的重要标志。就现有情况来看，塔吉克人与普什图人（阿富汗主体民族）都可以被归类于东伊朗人。从地缘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在经过千年博弈之后，黄白混合的突厥人已经成为中亚农业区的主体，而唯一在中亚有资格继承古代东伊朗人衣钵的，就是现在被挤压到中亚边缘的塔吉克人了。



斯基泰人（西徐亚人）



普什图人

在欧洲游牧民族入主中亚农业区，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东伊朗族群体系后，他们并没有形成统一而又强大的国家。这一点倒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毕竟各块绿洲是被沙漠、山地所分割的，地理上的分割势必容易引发政治上的独立。真正让整个中亚农业区有机会融为一体的，源于“西方”的两次入侵。一次是来自于西面，系出同源的波斯人；另一次则是来自于希腊半岛北部的马其顿人了。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建立后，对中亚农业区的征服，促进了各块绿洲在政治上互通。而在继承亚历山大帝国原“波斯帝国”领地的塞琉古帝国，也陷入分裂后，整个中亚农业区终于有机会由希腊人主导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政权了，它就是巴克特里亚。

既然希腊人在中亚农业区主导建立了巴克特里亚，那么是不是说，大月氏人是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粟特地区呢？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之前，希腊人的统治权已经被先期到来的

“塞种人”所终结了。这里所说的塞种人，指向的是当日在伊犁河谷一带称王的那支部落联盟。这些被月氏人鸠占鹊巢的游牧部落，命运一直为很多朋友所关注。而向西进入中亚农业区，取希腊人而代之建立的“大夏”政权，就是他们的归宿。这看起来似乎是一场多米诺骨牌的游戏。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在河西走廊所触发的一场民族大迁移，最终将影响力直接传递到了兴都库什山脉脚下。而在这件连锁事件中，更为让人惊讶的是，作为这场连锁反应的最初参与者，大月氏人居然又成

为最后的终结者。他们不仅从立足未稳的大夏政权手中得到了粟特地区，并且还在不久之后，进一步向南渗透，成为整个中亚农业区的主人。

对于最早经营中亚农耕区的这些古代东伊朗人而言，还有一个更为知名的标签来标注他们，那就是“吐火罗”，这个名字是远征至此的希腊人为之标注的。和很多地缘标签一样，“吐火罗”一词最初也是一个语言标签。不过一个地缘板块之所以会被视为一个整体，就是因为相关地理单元在技术上有可能成为同一族人的覆盖区。所以从语言角度来验证一个地缘板块的边界，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吐火罗与雅利安这两个标签之间的区别。说得简单点，他们都是原始欧洲游牧部落迁移亚洲的结果。只不过，希腊人所遇到的吐火罗人，其迁出南俄草原的时间，要早于后来向欧洲、亚洲方向扩散的雅利安人部落。在公元前三千年——公元前两千年，雅利安部落开始从南俄草原向外迁徙时，吐火罗人已经定居于天山南北了。不过这种区别，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意义并不大。类似的族群分化、融合，再分化、再融合过程，在东亚大陆也同样发生过。大多数人只是关注能够影响到现在地缘政治关系、民族归属的地缘标签罢了。吐火罗和雅利安人毕竟已经是历史名词了，他们被打上什么样的标签，对于能够将触角延伸于此的中原王朝来说，都是种族迥异的异族人。而对于今天试图从地缘角度，大历史范畴来解读中亚地缘属性的我们来说，种族、生产方式这两个基础地缘要素才应该是关注的要点。

事实上，这两点也是张骞和汉帝国当年通西域时所关注的重点。鉴于原始的欧洲移民在天山南北精耕已久，张骞希望在此找到一支在种族属性上接近于自己的部族，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发生的事了。不过张骞还是敏锐感觉到，这些后来被统称为西域胡人的部族之间存在明显区别，而这种区别就是具体体现在生产方式上。那些生活在卡拉套山以南，貌似以土谋生的定居者，被汉帝国称之为“土著”。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帝国也会发现这些土著居民跟他们在中央之国所管理的农民，还是有显著区别的。不过单凭“定居”一条，就足以让汉帝国看到在西域吸纳盟友的希望了。

第二十三章 大月氏人入主吐火罗盆地

第一节 大月氏攻取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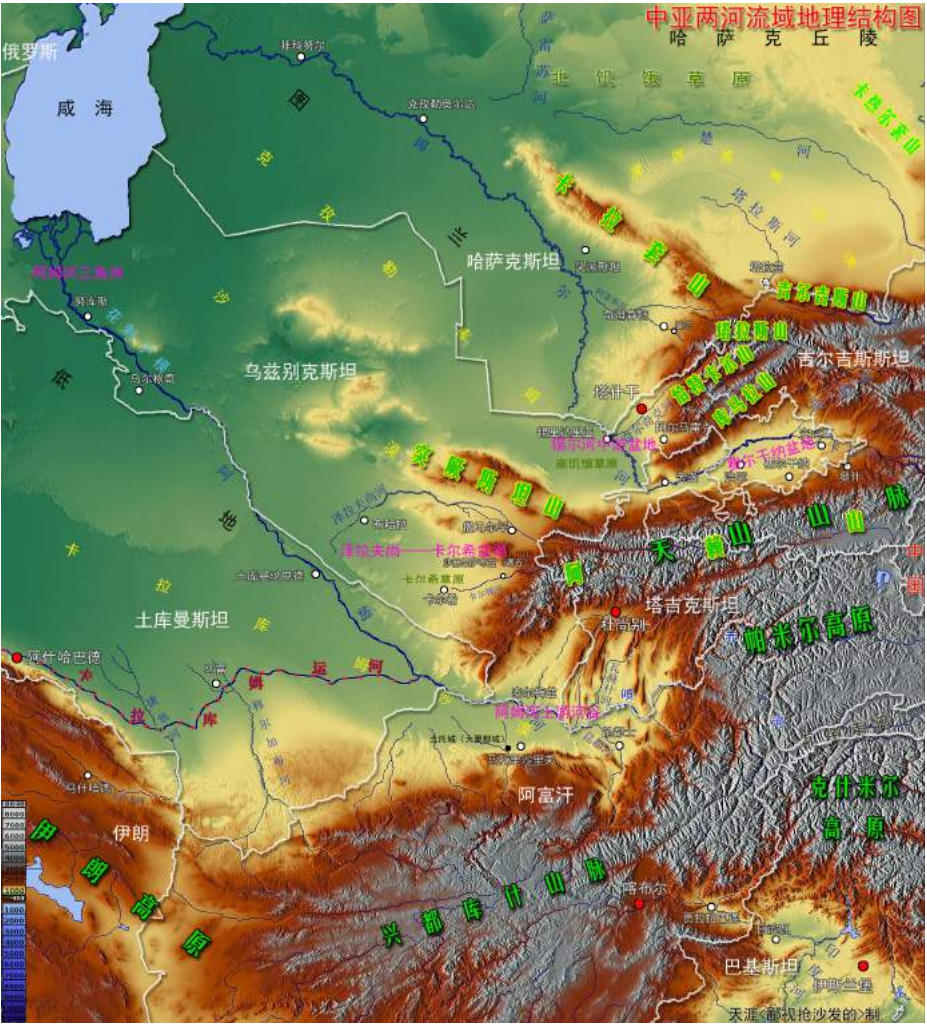
在张骞的描述当中，大夏这个人口高达百万的“国家”，就是一个军力不强、以农为主、善于经商的典型土著国家，也是属于汉帝国可以结盟的对象。他对于这些阿姆河绿洲土著的印象，与在费尔干纳盆地所见到的大宛极为类似。以之前的历史来说，阿姆河中上游地区与锡尔河中上游地区的“土著”拥有共同的种族、文化背景，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在塞人入侵之前，定居属性的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都曾经统治过中亚农业区，并将领地延伸到费尔干纳。而在波斯人和希腊人的整合下，两河地区分散的绿洲形成共同的文化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然而从地理结构上来说，费尔干纳盆地与阿姆河地区的联系，又极易被入侵至“南饥饿草原”的游牧民族所切断，并最终形成独立的政治体。最起码在张骞到达天山北麓时，费尔干纳地区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为“大宛”了。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西迁的塞人也同样可以选择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不过塞人在西迁之时所面临的抉择，和后来大月氏人是一样的。为了避免继续处在对手阴影下，二者都选择了将阿姆河方向作为突破口。对于塞人来说，极为有利的条件是，此时的巴克特里亚内部正处在分裂状态。以我们在中央之国的经验来看，如果一直威胁农业区的草原上正发生着天灾人祸（比如大的灾害气候、周边民族的军事压力）的话，受此压力影响，游牧民族南侵的力度往往会很大；而如果此时农业区正处在分裂状态，无法集中力量来构筑战略防线的话，这些本来只是指望弄点好处的南侵者，很可能就要将目标调整为“入主中原”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塞人在进入阿姆河流域后，很有可能并没有将这些巴克特里亚故地在政治上重新整合为一个国家。作为仅仅在中国历史中出现过的“大夏”一词，应该只是一个笼统的地缘标签（而不是政治标签）。毕竟南侵的塞人是被大月氏人击溃，被动“逃入”阿姆河流域的。这和一个强大帝国的入侵，在结果上会有很大的区别。如果塞人是在混乱状态下入侵巴克特里亚的话，那么在失去统一政治、军事指挥的情况下，这些游牧者最有可能做的就是以部落为单位，各取一块绿洲作为自己利益区。至于之后到底是建立部落联盟，还是相互攻伐就需要时间来磨合了。假以时日的话，以塞人为统治民族，整合原有土著居民建立一个强大统一国家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只不过，历史并没有给塞人这样的机会，这个历史使命最终由大月氏人来完成了。

如果不是大月氏人的到来，塞人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在河中地区融合出一个农牧混合，具有杂交优势的政权的。悲剧的是，在他们越过卡拉套山后不久，大月氏就

紧随之至了。这其实也不能怪大月氏人，要不是被匈奴人和乌孙人逼得太紧，他们也不愿意放弃天山北麓那些草原的。大月氏人对阿姆河流域的渗透，并非一蹴而就的。最先被大月氏人控制的是阿姆河北岸地区，也就是以泽拉夫尚河流域为核心的“粟特”地区。一般的看法是，大月氏人是以臣服“大夏”为代价，获得了在粟特地区立足的机会。但实际情况更有可能是，还没有在阿姆河流域完成整合工作的塞人不得不与大月氏人妥协，与之划阿姆河而治。当然，鉴于大月氏人当时所面临的境遇也不太妙，暂时也没有把握一鼓作气谋得整个巴克特里亚故地。在谋得实际领地的同时，政治上表态愿为塞人屏障北方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中亚两河流域地理结构图

与塞人相比，大月氏人的运气要好得多。因为连锁反应到他们这里就结束了。本来可能成为大月氏人背后那张骨牌的乌孙人，并没有继续西进。这实际上还得感谢汉帝国在亚洲东部所做的努力。已经明显摆出战略反击态势的汉武帝，让匈奴不得不放弃进占天山草原的企图。如果不是东线存在巨大压力的话，匈奴人几乎是不可能允许乌孙人独占天山草原的。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代表汉帝国进入战略反击

阶段的“马邑之围”（公元前 133 年），与大月氏入驻粟特地区的时间关系，就很容易理解这点了。

当张骞历尽千辛万苦，在阿姆河北岸找到大月氏人时，大月氏人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片绿洲、草原、荒漠相间的土地。欧亚草原的争霸事业，已经对他们不再有诱惑了。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尽管草原民族从心底里为他们自由自在

的游牧文化感到自豪，但一旦稳定享受到农耕区所带来的高额经济利益后，再劝说他们放弃这一切，重新回到草原去过那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就很困难了。更何况从地缘关系上来看，此时的大月氏人即使想找匈奴人复仇，也已经完全对匈奴人构不成威胁了。除非历史可以倒流，大月氏人能够顶住匈奴、乌孙联军的攻击，在伊犁河谷站稳脚跟。

不过大月氏人没有同意作为汉帝国的盟友，并不代表张骞此次西域之旅就以失败而告终了。事实上，大月氏对于汉帝国来说，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仅仅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理论中，推理出来的盟友。张骞和汉帝国很快会发现，在合纵连横式的外交博弈中，现实地缘关系的影响，远比这种会被时间冲淡的仇恨更为重要。基于地缘格局，取大月氏人而代之，占据伊犁河谷的乌孙人，才是他们在匈奴右翼牵扯匈奴的希望所在（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张骞以乌孙为目标的第二次出使西域）。

如果说后来张骞出使乌孙，是在完成第一次出使所未完成的使命（断匈奴右臂）的话，那么在西域发现一系列土著经营的绿洲国家，就是一个意外收获了。这些绿洲国家的存在，让汉帝国直接介入西域成为可能。而通过这些西域土著所打通的丝绸之路，就是维持汉帝国与西域地缘关系的核心纽带。基于阿姆河南岸地区在整个东、西方商路中的重要位置，以及它的“土著”属性，张骞在劝说大月氏人无果之后，并没有就此返回长安述职，而是渡过阿姆河继续去为帝国探寻可能的盟友。

不过张骞应该也没有想到，在他结束这次西域之旅后不久，大月氏人就迫不及待地越过了阿姆河，从塞人手中夺取了整个阿姆河流域的主控权。事实上，大月氏人的这一战略方向，在张骞找到他们时就应该已经确定了。一方面大月氏人既已决定不再重返草原，就势必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博弈方向；另一方面，在粟特地区尝到的甜头，也让大月氏人对控制南部那些绿洲更加的渴望。

当大月氏将扩张方向瞄准南方的大夏，乌孙人又不得不时刻防御北方匈奴人的窥视时，大月氏、乌孙这对死敌之间再爆发地缘冲突的可能性就不大了。这种战略取向上的差异，甚至为双方在卡拉套山南北拉开了一片缓冲区，或者说双方都不会誓死必争的边缘地区。而填补这片缓冲区的部族，就是来自哈萨克丘陵地带的康居。对于游牧于哈萨克丘陵地带的部落来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向东到雪山脚下赢得一片水草丰美之地，都会是永恒不变的战略目标。完成这个目标，不仅意味着更多的牧草资源，也意味着能够从天山脚下的商业利益中分一杯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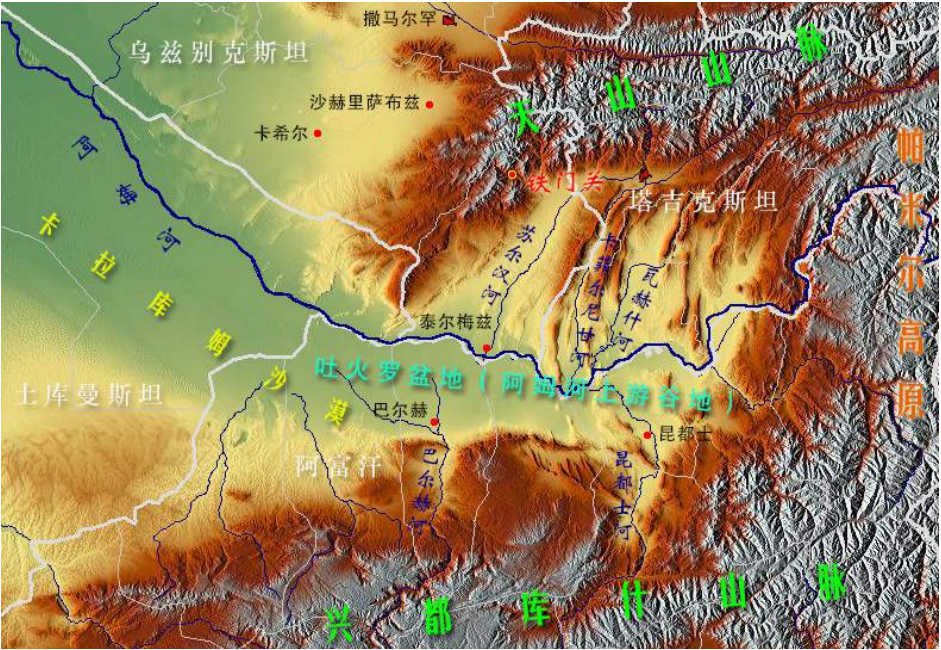
有记录表明，在张骞跨越天山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之时，康居人就已经渗透到了饥饿草原，客观上为乌孙、大月氏两族充当缓冲国了。这也导致张骞在经过大宛之后，需要再穿越康居人的控制区，才最终找到大月氏人。而在后来的历史中，同为游牧政权的康居，也的确不得不长期承受乌孙人的压力（类似于现在哈萨克斯坦大、中玉兹在锡尔河流域的竞争）。康居人虽然在天山北麓拥有了自己的草场，但它原有

的核心之地却在哈萨克丘陵的西、北部。这也使得康居人很难在天山一线有大的作为。在卡尔套山以北，占得塔拉兹河谷的控制权；以南得到锡尔河两岸的土地，已是他们所能够做到的极致了。而对于大月氏人来说，有了康居人在卡拉套山南北辛苦的车位，反倒可以安心对付阿姆河南岸的大夏了。

第二节 吐火罗盆地分属不同的国家

从几何结构上看，占据“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的大月氏人，下一个征服目标应该是与之隔河相望的“阿姆河中游南岸地区”；或者是溯河而上，先行征服“阿姆河上游北岸地区”。但事实上，这两个板块并非是大夏之地的核心板块。大月氏人会走一条类似对角线的路径，直插大夏的核心板块——阿姆河上游南岸地区。

我们很容易在地图上看出，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三面合围的阿姆河上游地区，整体呈现为一个开口向西的盆地结构。按照我们之前在伊犁河谷、费尔干纳盆地的经验来看，这种可以三面集水的盆地区，应该会形成一个结构完美、人口潜力巨大的地缘板块。这样一个地理单元，我们可以单纯的以水系为之命名，称之为“阿姆河上游河谷”；也可以用上“吐火罗”这个加入了“人”的影响的标签，将之称之为“吐火罗盆地”。



吐火罗盆地地理结构图

比起费尔干纳盆地来说，吐火罗盆地的知名度貌似要低得多。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阿姆河成为一条边境线，一条重要的地缘政治分割线。北部虽然为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所共有，但最核心的南部却归属了在地缘政治上没有归入传统“中亚”概念的阿富汗；这个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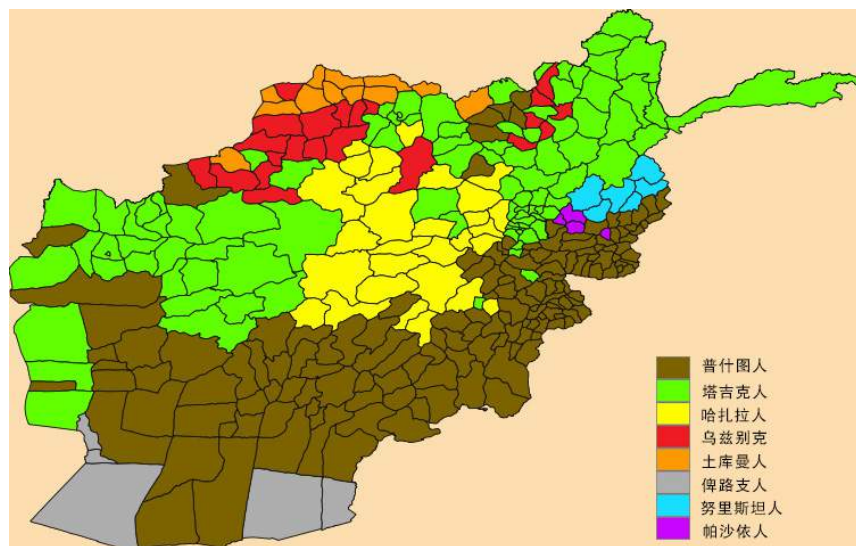
是当年英、俄两国角力的结果。当大英帝国完成了在南亚次大陆的征服工作以后，他们开始试图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向中亚渗透。而与此同时，沙皇俄国也乘着清帝国的衰弱，几乎控制了整个中亚地区。以俄国人试图打通四海的帝国梦想来说，兴都

库什山脉——伊朗高原是他们必须跨越的天王山。

如果没有英国人的阻击，俄国人的这个梦想还是有机会实现的。不过英国人对南亚长期而又卓有成效的经营，使得他们有机会抢先一步控制阿富汗的政治。并让俄国领土扩张的步伐不得不止步于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的北部。其反应在地缘政治上的后果就是，阿富汗——波斯成了俄属中亚和英属印度之间的缓冲国。并且在英、俄双方的主导之下，以阿姆河上游为边界，划定了阿富汗与俄国之间的边界。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阿富汗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似乎是政治操弄的结果。不过仔细分析吐火罗盆地的地缘结构，这种以河为界划分边界的方式也还是有它的地缘基础的。阿富汗在这次划分之后，在吐火罗盆地所得到的“阿姆河上游南岸地区”，在历史上也的确作为一个单独的地缘板块而存在，并且与兴都库什山脉南麓关系紧密。如果俄国人当年想以“阿富汗自古是俄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理由，在兴都库什山脉主张领土的话，他们最早能够追溯以为依据的历史，会是希腊人所建立的“巴克特里亚”以及塞人所控制的“大夏”（当然，俄国人似乎不屑于这样做）。在这种假定的历史主张中，“阿姆河上游南岸地区”的得失会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在当年巴克特里亚——大夏时代，“阿姆河上游南岸地区”是这两个政权的核心板块。以此为核心，希腊人曾经向北控制了粟特、费尔干纳地区，向南几乎控制了整个兴都库什山脉。悲剧的是，在现实的地缘政治结构中，由于阿富汗的地缘政治中心在兴都库什山脉的南麓。这个曾经在中亚、南亚地缘博弈中起着枢纽地位的板块，却暂时成为一个不太重要的边缘板块。



阿富汗各民族分布图

主要是由与中亚地缘关系紧密的“塔吉克人”所控制。假如当年俄国人能够早一步控制整个阿姆河上游河谷低地的话，今天塔吉克斯坦的南部边界，就很有可能划定在兴都库什山脉分水岭之上了。那样的话，塔吉克斯坦就将几乎拥有整个吐火罗盆地，

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兴都库什山脉东南麓，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带，一直是政治热点地区。而以阿富汗主体民族“普什图族”为基础的“塔利班”政权，所控制的区域大体上也是兴都库什山脉分水岭以南地区。至于兴都库什山脉分水岭北部，特别是“阿姆河上游南岸地区”，则

并且有可能将自己的历史上溯到“大夏”时代了。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却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牺牲品，被压缩成为中亚最边缘的政治单元。

大月氏西迁阿姆河流域的时代毕竟离我们太远了。即使只是想写一本历史小说，也很难有足够的史料帮到我们。好在我们的目标是解读“人”与环境的关系。在整个大中亚地区环境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今天阿姆河流域的地缘结构，可以为我们还原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提供有益的参考。

第三节 粟特经铁门关沟通吐火罗盆地

记得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塔吉克人是中亚诸民族中唯一不属于突厥系的民族。也是唯一在种族与语言上指向原始欧洲游牧民族的族群。从族群博弈的角度来说，塔吉克人今天困居帕米尔高原——吐火罗盆地的命运，是受到来自亚洲突厥系游牧民族的挤压而形成的。而这种突厥——东伊朗族群博弈的局面，并非始于汉帝国——匈奴帝国博弈的时代。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匈奴还是一个以草原为本的游牧民族，暂时还没有对整个中亚农业区造成压力。他们的历史贡献在于（从亚洲游牧民族的角度来说）向西干草原地带迁移，将纯粹的欧洲游牧民族变为了历史。以至于在后来欧洲人的记忆当中，游牧民族与“黄色”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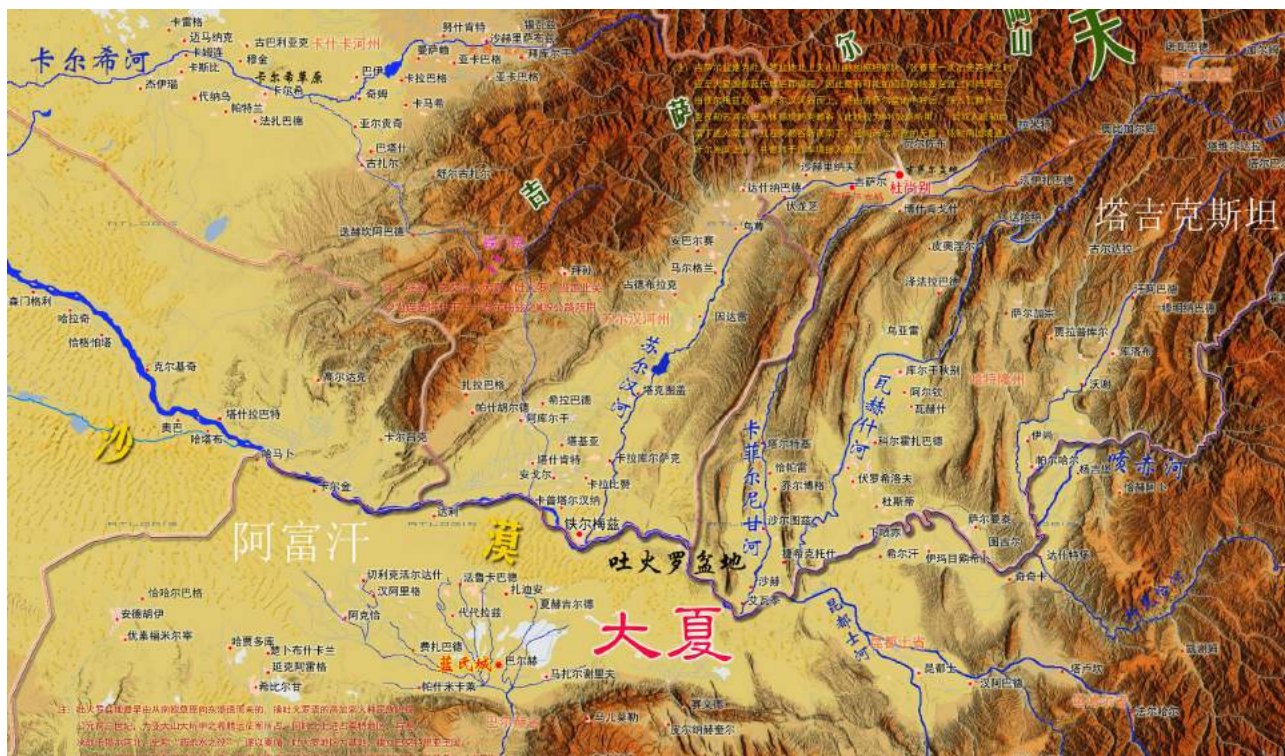
真正让中亚进入突厥化时代，并开始在中亚农业区挤压东伊朗人空间的时间，始于公元6世纪末西突厥帝国的崛起，并随后将汗廷迁入卡拉套山脚的塔什干绿洲的时间。不过，如果我们仅仅从地缘博弈的角度，来看待亚洲游牧势力对中亚农业区的入侵的话，大月氏人控制阿姆河以北的粟特地区，也许应该算是一个开始。当然，大月氏人的这次入侵，本质上并不能算是亚洲游牧民族的胜利。因为无论大月氏人最初是黄种的亚洲游牧民族，还是东迁至河西走廊的欧洲游牧民族，他们都没有改变中亚农业区的种族特征。

无论是最初以逃亡者身份出现在粟特地区的大月氏人，还是后来以征服者姿态入主中亚农业区的突厥人，他们在控制泽拉夫尚河——卡尔希河盆地之后，都势必会转向东南方向进入吐火罗盆地，去征服中亚最南部的这块农业区。很明显，这两个盆地的分水岭本身应该很有机会成为一道地缘分割线。从地理结构上看，这道分割线就是天山山脉（阿赖山部分）的最西端。而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有一个具体的分割点来让我们体会它的存在，它就是“铁门关”。

单从字面上理解，“铁门关”一词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成语。要想以一门之力控制一条交通要道，这个关口势必应该是建立在一条狭窄山谷的谷口。在焉耆盆地与塔里木盆地的出入山口（孔雀河上游河谷）曾经也出现过的一个铁门关，就是循此思路建筑并命名的。地缘分割粟特地区与吐火罗盆地的铁门关，构筑于吐火罗盆地一侧。从撒马尔罕或者渴石出发的商旅，可以先沿着阿

赖山西北麓南行，在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古扎尔”（Guzar）开始转向穿越山谷。在谷地的后半段，有一条叫作“舍拉巴德”的河流，会为大家指明穿越铁门关的方向。顺河而下，很快就能到达阿姆河北岸富庶的冲积平原带。

尽管张骞在出访大月氏时，去大夏地区考察过民情，但却没有记录下他的具体路线。真正为我们留下铁门关记忆的是玄奘。在他的描述当中，铁门关是昭武国家（粟特）与吐火罗故地之间的政治分割线。而这条分割线，我们也同样可以认定为是大月氏与大夏之间的分割线。如果我们今天想重走玄奘之路的话，那么乌兹别克境内的 M39 公路，会引领着我们穿越这段山谷的。需要说明的是，“铁门关”一词并不仅仅用于上述两个地点，穿越突厥斯坦山进入泽拉夫尚河或者卡尔希河河谷的山口，在有的记录中也被称之为“铁门关”。其实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铁门关，这些点具体在河谷的哪一个点已经不重要了，明白它们究竟扼守了哪些地理单元之间的交通要道才是最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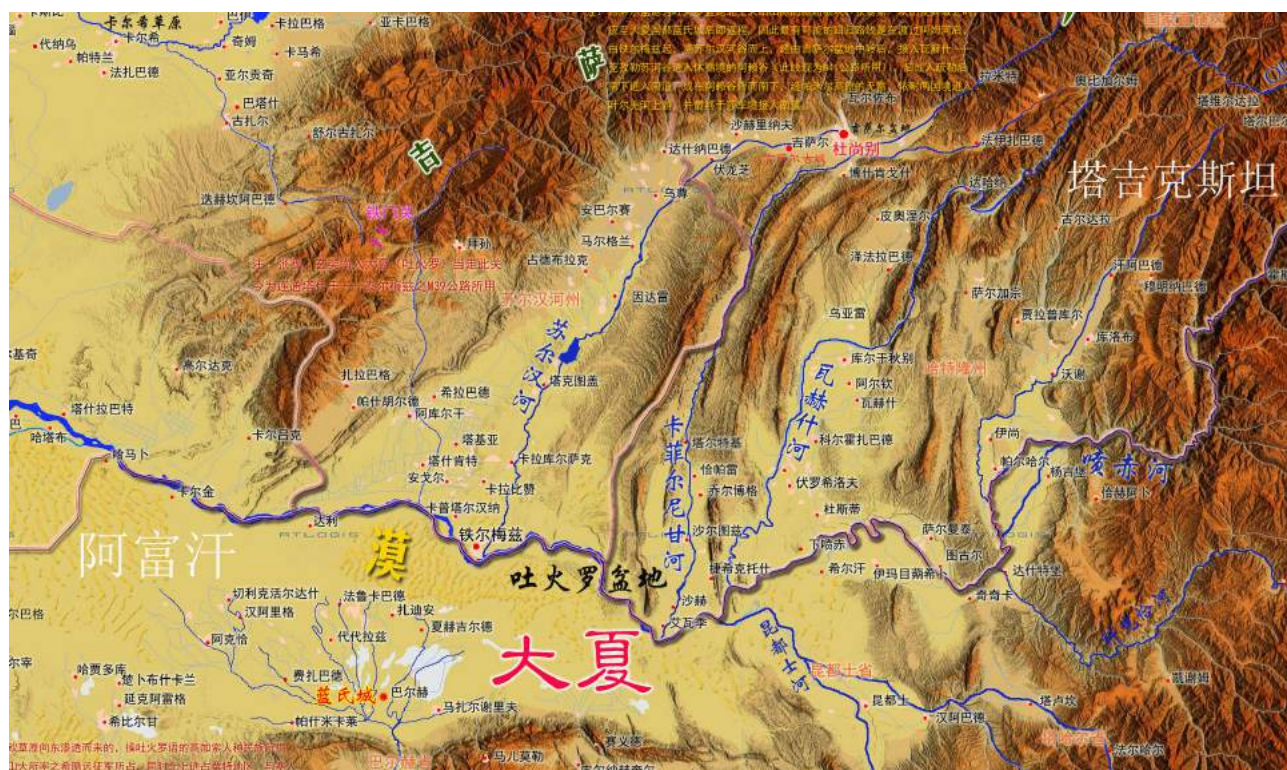


汉西域全图

回到我们现在着力解读的铁门关问题上来。从技术上看，穿越铁门关进入吐火罗盆地的路线，也许并不是最容易想到的路线。按照一般逻辑，我们更容易想到的路线，是沿着阿赖山西北麓一直向南，在到达阿姆河北岸之后，再转而向东穿越天山以及阿赖山之间的空档进入吐火罗盆地。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网中，也的确存在这样一条路线。问题在于，鉴于阿姆河那巨大的水量，以及它与天山山脉的地理距离过于接近。这样一条路线在古典时期的技术条件下并不会太稳定。洪水、

河流变道等因素都会影响它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合适的山谷打通一条通道直插吐火罗盆地北部，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现在我们需要观察一下吐火罗盆地的北部，也就是被我们划定为“阿姆河上游北部地区”的板块，是否有成就一个强大国家的潜力了。从地理结构上看，进行这样整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整个阿姆河上游北部的低地，是被一条条由阿赖山延伸下来的山地南北纵向分割的。也就是说，每一条阿姆河北岸的河谷，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板块。最先暴露在大月氏人和张骞眼前的，是河谷纵深最宽的苏尔汉河谷。由于从铁门关而下的舍拉巴德河对谷地南部低地的形成亦有贡献，因此这条谷地也可称之为“苏尔汉——舍拉巴德河谷”。在这条河谷当中有两个著名的城市，一个是阿赖山脚下，河谷低地区最北部的“杜尚别”；另一个则是河谷的最南端，苏尔汉河——阿姆河口的“泰尔梅兹”（也译铁尔梅兹）。



汉西域全图

就今天的政治结构来说，作为塔吉克斯坦首都的“杜尚别”显然要比泰尔梅兹更有知名度。然而这其实是一座在十月革命之后，才兴建的年轻城市。在历史上，泰尔梅兹的地缘位置要重要得多，兴建城市的历史也要久远得多。至今我们仍然能够在此寻找到希腊人所留下的城市遗迹。而在玄奘的记录中，泰尔梅兹地区所建立的政权，被称之为“咄密”，并且被视为中亚——西域佛教传播的起点。

泰尔梅兹地区在苏尔汉河谷受青睐，并不仅仅因为它处于肥沃的苏尔汉河——阿姆河三角洲，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缘位置。因为从粟特地区穿越而来的政权、商旅，



泰尔梅兹位置图

接下的并不会着力翻越一条条山地，去征服吐火罗盆地北部的其他河谷。绝大部分时候，他们会由泰尔梅兹渡河，迅速穿插到兴都库什山脉北麓的绿洲带（比如玄奘以及后来的蒙古人都是这样走的）。正是由于泰尔梅兹处于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在地缘压力持续由北方导入的情况下，目前泰尔梅兹及其所处的苏尔汉河谷地区，大

部分为突厥系的乌兹别克人所覆盖。乌兹别克人在此以河为名，建制了“苏尔汉河州”。而塔吉克人只能保有河谷低地的最北部，并在此建制了首都杜尚别。

两千多年前的月氏人，在入侵大夏之时应该也是遵循这样的路线，在先占据了苏尔汉河下游之后，渡过阿姆河攻击大夏之地的都城——蓝氏城。这样的攻击路线，也就是我们之前所称的“对角线”式的路线。至于河对岸究竟是什么情况，又是什么原因让巴克特里亚和大夏将统治中心设于兴都库什山脉北麓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

第四节 吐火罗盆地南部蓝氏城的位置

蓝氏城的位置在现在阿富汗的巴尔赫。在地图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它的位置是在吐火罗盆地的西侧，兴都库什山脉的北麓。如果用阿姆河为参照定位的话，蓝氏城的位置恰好就是处在阿姆河流域中、下游的分割点上。在蓝氏城与铁门关两点之间连一条直线的话，就可以将吐火罗盆地通往波斯、中亚方向的通道给封堵住了。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试图做到这一点的政权并不会去费心在二者之间建筑一道长城。在中亚这种环境之下，你能够控制住那些在沙漠之中点状分布的绿洲，就可以做到这点了。

蓝氏城所处的绿洲，所依附的河流叫作巴尔赫河。这是一条发源于兴都库什山脉中段的河流，而蓝氏城所处的位置，是在巴尔赫河的山前冲积扇。这一点与对岸的泰尔梅兹城有所不同，后者的位置是在支、干相交（苏尔汉河、阿姆河）的三角洲平原上。实际上我们仔细观察吐火罗盆地两岸的城市分布，就会发现一个特点，即阿姆河北岸地区，在阿姆河沿岸多有城镇分布；反观南岸这种情况就几乎看不到了，现在阿富汗境内的城镇几乎都是分布于兴都库什山脉北麓。

造成这种地缘格局的根源，在于吐火罗盆地的地理结构，以及图兰低地整个荒漠化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天山西端（阿赖山）在最后阶段向南延伸了一段山体，与阿姆河几乎无缝对接。这使得吐火罗盆地北部与图兰低地最南部的“卡拉库姆沙漠之间”多了一道屏障，有效的防止了沙漠对谷地的侵袭。另一方面，吐火罗盆地北部被多条山体纵向切割，也增加了阿姆河上游北岸河流的补水区（一直到阿姆河口，都能补水）。这些地理特点最终反映到河流结果上，就是现在被划入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境内的阿姆河上游地区，每一条从高地下来的河流，都有机会汇入阿姆河，并在沿河形成三角洲形式的绿洲。



汉西域全图

反观阿姆河南岸，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地质运动在抬升兴都库什山脉时，太在意它的轮廓完美了。以至于它没能延伸一条支脉为吐火罗盆地南部地区封口。当然，你也可以认为阿赖山做得不够。要是能再往南延伸些，贴近兴都库什山脉，也能为整个吐火罗盆地封口，就像费尔干纳的地理结构一样。

问题在于，现实情况就是吐火罗盆地南部几乎一览无余的暴露在卡拉库姆沙漠面前。并且兴都库什山脉不光没有延伸出支脉帮助盆地封口，也没有像北岸地区那样，延伸出其他山地来帮助经营南岸地区。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卡拉库姆沙漠得以深度渗透吐火罗盆地南部低地，逼迫吐火罗盆地南部的居民定居于兴都库什山脉北麓。其对于河流走向的影响就是，目前没有一条河流能够有机会从兴都库什山脉方向，跨越盆地南部这片低地荒漠注入阿姆河。也正因为如此，将整个吐火罗盆地



巴尔赫位置图



卡拉库姆沙漠

整合成一个整体的努力，做得无比困难（北方是被山地条状分割的独立河谷带，南方是沿山麓点状线性连接的绿洲带）。

尽管迫于结构原因，吐火罗盆地腹地那些低地并没有像费尔干纳盆地那样，成为连片的农业区。但对于已经习惯在沙漠中穿行的中亚民族来说，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从泰尔梅兹到蓝氏城之间这片沙漠，还不会成为生命的禁地。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为什么蓝氏城所属的巴尔赫下游绿洲，能够在兴都库什山脉北部诸多绿洲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巴克特里亚以及大夏的都城？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根本原因很可能还是在于它的地缘位置。如果征服者或者商旅是来自伊朗高原方向的波斯人、希腊人的话，那么在选择沿着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北麓东行进入吐火罗盆地时，他们就会在盆地入口看到巴尔赫河冲积扇。而在这些征服者入主蓝氏城之后，会发现可以有多种战略

选择：一是可以转向北方渡过阿姆河，通过控制苏尔汉河谷完成对吐火罗盆地的战略围堵，迫使盆地内其他绿洲土著归附。

等到你能够拥有了整个吐火罗盆地之时，整个粟特、费尔干纳盆地等中亚农业区的精华地区，就都会有机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了。以吐火罗盆地为起点，向北征服整个中亚农业区固然是一个选择，然而对于将势力范围延伸至此的族群来说，能否保有或者渗透粟特地区，却并不是最重要了（或者说不是最有吸引力的）。真正能诱惑到他们的是兴都库什山脉东南部的南亚次大陆。

第二十四章 兴都库什山脉北麓的地缘结构

第一节 兴都库什山脉的特点及其战略价值

如果我们仅仅把东、西方交流定义为中央之国与地中海文明圈之间的交流的话，那么兴都库什山脉本身能够引起我们关注的，就只是北麓沿线的那些绿洲了。问题是，就欧亚大陆文明之间的交往来说，居于终端位置的并不只有身处东亚的中央之国，以及后来以罗马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几乎和南亚次大陆概念等同的印度地区，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端地区。用我们在国际部分所标定的概念来看，这三个地区代表了三个边缘地区。而处于这三个边缘地区之间的板块，或多或少都会受益于这三者之间的交流。

既然欧亚大陆内部的交流存在三个平级的终端，那么只从中央之国的角度考虑，把视线局限在有中国参与的“丝绸之路”上就有些失之偏颇了。这会让人有一个错觉，认为在大部分的古典时期，世界上只存在两个国家：中国和“外国”。而实际情况是，在绝大部分时候中央之国是活在自己的东方世界里。在这个东方世界以外是更多元、更呈现“世界”属性的，包括印度在内的西方世界。在这个西方世界里，各板块地缘关系紧密，有机会真正影响到其他板块的历史进程（比如来自欧洲的雅利安人入主南亚）。事实上，即使是到了后来大航海时代，欧洲人最初所理解的世界中也不包括中央之国。他们所寻找的目标，是真实存在于“世界”中的印度，或者说曾经让欧洲人真实触摸过的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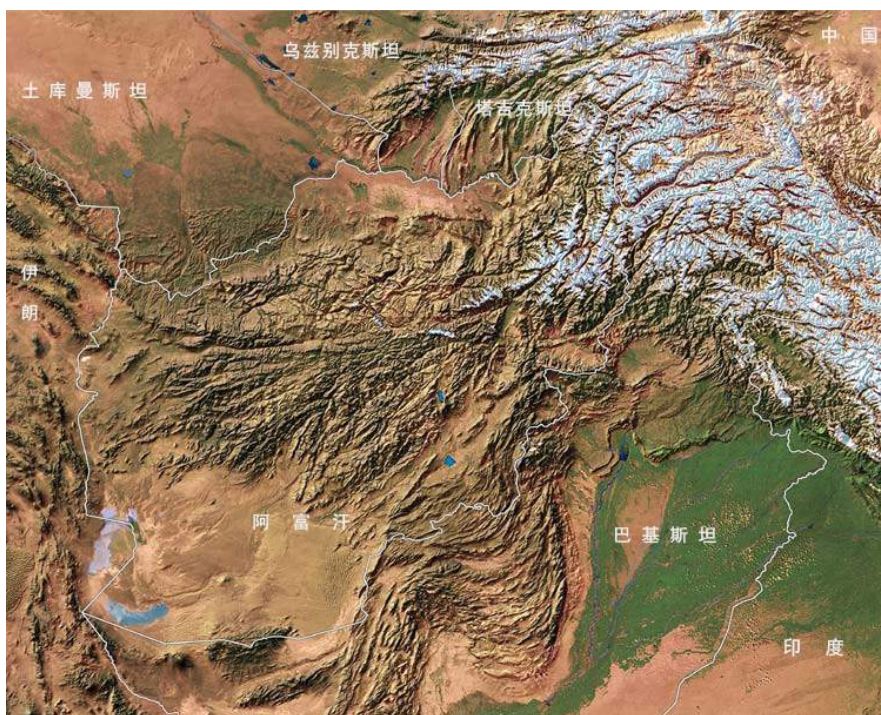
之所以做这些解读，是想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虽然我们目前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主线，来解读中央之国在天山南北的渗透，以及东西方交流的路径，但切勿被这个视角所局限了。对于我们目前所试图解读的吐火罗地区来说，中央之国所发生的一切并不会真正影响到它。吐火罗盆地以及它所处中亚农业区的命运，更多的是和旁边的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把中亚农业区、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主要是西北部）视作一个关系紧密的地缘圈来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处于这个地缘圈核心位置的，就是包括吐火罗盆地南部地区的兴都库什山脉地区。无论是这三个板块之间的交流，还是透过这三个板块延伸影响力到其他地区（比如透过中亚向南渗透的北亚游牧民族；以及通过伊朗高原向东渗透的欧洲民族），都必须经过这片山地。

与那些隐藏在高原之上的山脉不同，兴都库什山脉在地图上具有很高的辨识度。这是一片轮廓呈叶状的山体，并且与它的邻居“伊朗高原”在地理结构上完全不同。伊朗高原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形，使得高原腹地（也就是山脉内侧）有机会出现大量绿洲，并且由于这种环境的闭合，而更容易形成统一的文明体。相比之下，兴都

库什山脉就是一段纯粹的山脉了，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闭合的、有价值的地缘板块。

作为一段山脉来说，兴都库什山脉的形态有点过于完美了。山体内部没有明显断裂、凹陷（像天山山脉中的伊塞克湖盆），周边也没有延伸出明显的突起，来庇护出一块类似费尔干纳盆地的那样地理单元。这使得兴都库什山脉本身并没有太多战略价值，无论是承载人类生存，还是打通道路的希望，都寄托在山地的周围。也就是说，那些既能够承接高山来水，又有低地优势的山前绿洲，才是阿富汗的地缘重心所在。只要征服了这些环绕于山地外围的绿洲，你就可以自豪的声称，你得到了整个兴都库什山脉。



阿富汗卫星图

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彻底让土著民族臣服，得到那些绿洲本身也许会成为一场噩梦。因为兴都库什山脉本身会为那些反抗者提供足够的藏身之处，并让他们以合适的时机对绿洲城市，以及绿洲之间脆弱的交通线进行袭击。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一再上演，以至于为阿富汗地区赢得了“帝国坟场”的称号。既然我们认定兴都库什山脉周围的那些绿洲，才是征服

这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山地的重点，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来看看它的周边到底存在哪些绿洲，这些绿洲相互之间的地缘关系又是怎样的。

根据我们在天山地区得来的经验来看，寻找这些绿洲的关键在于找到河流的位置。每一条从山脉腹地流出的河流，它的山前冲积扇地区都会成为一个人类的聚落区（规模与水量大小有直接关系）。我们前面曾经把兴都库什山脉的轮廓比喻成一片叶子，那么那些纵横于山脉之间的河流，就是这片叶子上的经脉。至于兴都库什山脉这片叶子上的经脉是怎么分布的，又对阿富汗内部的地缘结构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方向。

有朋友问为何亚历山大止步于费尔干纳盆地外，其实在亚历山大东征至锡尔河南岸的“南饥饿草原时”，他的主要对手是锡尔河北岸的斯基泰游牧部落。只要战胜了这些游牧者，并控制了塔什干一带的绿洲。费尔干纳的土著并不会试图对抗这



苦盏位置图

个强大的帝国。事实上，根据考古发现，马其顿人也的确在费尔干纳的入口，也就是现在被塔吉克人控制的“苦盏”地区建了一座“亚历山大城”。而建这座城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控制费尔干纳盆地。只不过，亚历山大帝国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

尽管亚历山大的大军在锡尔河以北战胜了游牧大军，但他的继任者：塞琉古王朝和巴克特里亚，都没有力量和意图维持这个临近草原带的突出部。如果让他们选的话，希腊人更愿意透过吐火罗盆地去渗透、征服更为富庶的印度河流域。将中亚控制区的北线，定位于突厥斯坦山是比较现实的选择（这块也保不住的话，就退回吐火罗盆地了）。而这也为费尔干纳盆地出现独立的土著政权“大宛”制造了机会。

第二节 昆都士河谷与蓝氏城的交通优势

每一条山脉本身都会成为一道分水岭，并由此而自然分割出两个有地缘差异的地理单元。只不过，有的山脉形态不太规整，河流的走向有些杂乱，不太容易看出分水线在哪罢了（比如天山山脉）。好在兴都库什山脉的形态堪称完美，我们依几何原则在这片东西横放的叶片中间拉出一条直线来，就基本可以认定为是兴都库什山脉的分水线了。依照这个原则，以及阿姆河的位置，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分水线以北发源于兴都库什山脉的河流，理论上都应该是流向北部的图兰低地，并最终汇入阿姆河中；而南部的河流最终的归宿地是哪里，估计对于绝大部分朋友来说，就无从得知了。不过不要紧，后面都会有答案的。

先来看看分水线以北的情况。很明显，这一区域应当相当于我们之前所标定的“阿姆河中游南岸地区”加上“阿姆河上游南岸”地区。当然，不管你用哪个概念来标定这一区域，重点都是都在山前低地区上。我们先来看看“阿姆河上游南岸”地区的情况，这一区域实际上就是吐火罗盆地的南部。在这个方位上有两条河流值得关注：一条是“昆都士河”；另一条则是“巴尔赫河”。很多时候，河流之名会成为其流域中最重要城市的名称（也可能反过来），兴都库什山脉北麓的这两条河流也不例外。如果你在地理上很难找到这两条河流的踪迹的话，那么巴尔赫和昆都士这两个城市

应该还是能看到的。

昆都士这座城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说，应该是陌生的。不过相信最少会有 11 个中国家庭会永远牢记这座城市。因为在 2004 年 6 月 10 日，11 名在阿富汗施工的中铁员工在此遇袭身亡。这应当也是近年来，中国人在海外所遭遇的最大伤亡。除了对遇难的同胞表示哀悼以外，大家也可以通过这部分内容，领悟到为什么在如此不稳定的安全环境下，中国人会到此修筑公路。



汉西域全图

当我们沿着昆都士河上溯到兴都库什山脉腹地时，会发现我们将要接近兴都库什山脉的最窄处了。在地形图上找到这个点，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如果说兴都库什山脉的整体形象酷似一片树叶的话，那么这个最窄处就相当于它的叶梗了。当然，过了这个叶梗再往东位于阿富汗境内的部分山体，也属于兴都库什山脉。不过在当初为阿富汗划定东部边界的英、法两国来到兴都库什山脉之前，试图翻越兴都库什山脉的那些商旅、军队并不会关心这些地理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能够从山地障碍最少处翻越兴都库什山脉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昆都士河能够让我们从北部接近兴都库什山脉的“叶梗”的话，那么相对应的分水线的另一侧，也应该会有一条起着同样作用的河流存在了。在没有高精地图参考的情况下，寻找与之相对应的城市，比摸索河流位置要容易得多。不用怀疑，你现在在地图上所看到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就是这个点。而它所对应的那条

河流就叫作“喀布尔河”。

我们现在可以为试图统治兴都库什山脉南北的政权，找到一条沟通南北地区的捷径了。如果你是从吐火罗盆地出发，那么你可以先顺着昆都士河向上游走。在翻越分水线后进入喀布尔河流域（如果你是从南部出发，那么就把程序倒一下）。实在觉得在群山中寻找这样一条道路有些困难的话，那么可以在昆都士——喀布尔之间找到一条 A76 的公路。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今人在修建公路时，选择并不一定会比古人多。无论在古典时期还是现在，打通这样一条路线，对于将整个兴都库什山脉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都非常重要。否则的话，那些兴都库什山脉外围重要的绿洲城市，就只能走一条“C”型路线来沟通彼此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吐火罗盆地与喀布尔一带的地缘关系势必会疏远。在这样地缘结构的作用下，也许兴都库什山脉的分水线就会成为一条国境线了。



汉西域全图

对于整个兴都库什地区来说，昆都士河谷有着重要的地缘作用；而单就吐火罗盆地或者“阿姆河上游南岸地区”来说，昆都士河谷也是一个重要的分割线。当我们不再顺着昆都士河向上游方向走，去寻找通入南部地区的关口，而是顺河而下，一直走到阿姆河口时，会发现昆都士河的左岸一直有由兴都库什山脉延伸出来的支脉所庇护。与之相对应的阿姆河北岸地区，也同样有着从天山延伸下来的山地，向南延伸到了阿姆河岸（这种情况，在北岸是很常见的）。这意味着昆都士河谷及其

以东地区，有机会避开来自图兰低地的沙漠侵袭。

正如我们之前曾经分析过的那样，尽管阿姆河至兴都库什山脉之间那片平整的“绿色之地”（分色地形图上显示的颜色），会让我们联想到费尔干纳盆地那些富庶的农业灌溉区。但实际上，由于兴都库什山脉的边缘整体太过平滑，以至于无法为吐火罗盆地南部阻拦来自图兰低地的风沙。昆都士河谷以西地区，早已成为卡拉库姆沙漠的一部分（主要以破碎岩石地貌为主）。这也使得昆都士河以西再无河流自阿姆河左岸流入。由此，相信大家应该也能够理解，为什么阿姆河上游两岸没有如费尔干纳盆地腹地那样，基本置于一个族群、政权覆盖之下了（乌兹别克斯坦）。

既然昆都士河有机会与阿姆河相连，沿着昆都士河谷上溯，又有机会穿越到兴都库什山脉以南地区，那在以吐火罗盆地为核心之地建立政权的希腊化巴克特里亚时代，昆都士河谷应该是最有机会诞生出它的都城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最终成为巴克特里亚政权都城的点，在昆都士河的西侧的巴尔赫河之侧。这座城的位置大致也就是现在阿富汗的巴尔赫市。在张骞出使西域时，它被中央之国称之为“蓝氏城”。

对于从粟特方向过来的旅人来说，铁门关——泰尔梅兹——蓝氏城路线，是他们进入兴都库什山脉北麓的最佳途径。当然，沿着阿姆河北岸东行，然后在对应昆都士河口的方位渡河，也是一种选择。不过作为中亚水量最为巨大的河流，越靠近阿姆河上游，沿河行走的风险就越大。那些从周边高地奔流而来的河水，经常会在汛期改变阿姆河的河道。更何况北岸的每一条河流几乎都能汇流入阿姆河。如果一定要沿北岸前行，将意味着要穿越N多河流。鉴于这些情况，直接从苏尔汗河口（泰尔梅兹）一带渡河，然后穿越沙漠进入巴尔赫绿洲的难度，就相对较小了。只要事前准备充分，早已习惯干旱气候的旅人，在这一小段沙漠中丧生的几率，并不会比被阿姆河水冲走的几率大。

蓝氏城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位于吐火罗盆地的入口处，也就是我们定义的爱姆河中、下游南岸地区的交汇处。鉴于波斯人、马其顿人都是自西从伊朗高原而来的征服者，把新领地的政治中心放在板块的西侧，以使自己更有安全感也是情有可原的。按照这个逻辑，这些征服者在征服吐火罗盆地乃至阿姆河北岸的河中地区时，都应该是先沿着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北麓前行，然后到巴尔赫河绿洲这个点上做出新的选择。或先向东征服整个吐火罗南部地区；或渡河征服吐火罗盆地北部以及粟特地区了。然而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因为这条路线并非是唯一的选择。

首先对于来自伊朗高原的征服者或者商人来说，如果只是想进入粟特地区的话，并非一定要东行到吐火罗盆地，再折向西北方向进入卡尔希草原、泽拉夫尚河谷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样一条路线明显有些绕远了。单从距离上来说，既然我们把主要包含泽拉夫尚河、卡尔希河的粟特地区，定义为“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那么从“阿姆河中游南岸地区”穿行并渡河，应该效率会更高。这条线路当中最大的障碍，

还是在于沙漠。

如果说从泰尔梅兹到巴尔赫的旅程中，沙漠的纵深还很窄的话，整个阿姆河到伊朗高原之间的沙漠规模就很大了。作为降水不足的图兰低地的最南部，阿姆河以南的地区同样是被沙漠所覆盖。被称之为卡拉库姆沙漠的这片土地，也是中亚规模最大的沙漠。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既然想在中亚、西域讨生活，就不可能视沙漠为畏途，前提是这段沙漠之旅不能太长。中间要有能够提供中继的绿洲。

以绿洲为中继打通道路的情况，在低地同样为沙漠所覆盖的塔里木盆地是一种常态。不过塔里木盆地南北的两条丝绸之路，是沿着山麓开拓的。在沙漠边缘行走，意味着风险被大大降低。反观从伊朗高原到阿姆河的这段路程，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你必须在沙漠腹地中穿行将近千里，才能喝上阿姆河水。这样说来，难道就没有办法直接穿越卡拉库姆沙漠，进入中亚农业区的核心板块——泽拉夫尚河流域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只要中间有绿洲中继，就有机会让沙漠之旅缩短到可以承受的程度。

第三节 捷詹河绿洲和马雷绿洲的价值

既然从方位上来看，阿姆河中游地区在南岸所对应的是兴都库什山脉的西段，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从这片山地北麓流下来的河流，有没有机会渗透到沙漠腹地，为伊朗高原直通粟特地区的交通打通一条捷径来。而依照这个思路，赫里河和穆尔加布河这两条源出兴都库什山脉的河流，开始进入我们的视线了。这两条河流在兴都库什山脉的谷地纵深都足够长（意味着更多的集水区），且谷地形态都是东西向，略呈“西宽东窄”的喇叭形。这种向西张开的喇叭口造型，对于采集西风带的水汽是很有帮助的。

在赫里河和它东部的穆尔加布河向西流出兴都库什山脉后，伊朗高原成为它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这迫使它们要么在伊朗高原与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低地上形成一片湖沼，要么改变方向继续前行。基于地势和水量的原因，最终两条河流并没有止步于山前，而是向西北方向渗透进了沙漠腹地。当然，与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一样，沙漠还是耗尽了它们的最后一滴水。也就是说，作为“阿姆河中游南岸地区”的两条核心河流，赫里河和穆尔加布河，与北岸地区一样，是理论上的阿姆河流域成员（而不是真的汇入了阿姆河）。不过感谢兴都库什山脉所做出的贡献，让赫里河、穆尔加布河下游的两个绿洲——捷詹河绿洲、马雷绿洲（也是两个城市的名称），有机会成为横穿卡拉库姆沙漠道路的中继站。

鉴于捷詹河、马雷绿洲处于波斯高原与粟特地区之间的地缘位置，它们和其所依附的河流，很容易成为中亚、波斯两大板块的争夺焦点。这一点，无论是在古典时期，还是在现实的地缘政治结构中都有所反映。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赫里河

西出兴都库什山脉之后的部分河道，已经成为伊朗、阿富汗、土库曼斯坦的行政分割线。而在古典时期，争夺这两个绿洲，尤其是马雷绿洲的控制权，也是波斯——中亚博弈的焦点。

在我们所参考的历史当中，马雷绿洲的战略价值已经得到了体现。在中国的史书当中，它被音译成“木鹿”，被视为帕提亚与粟特地区的地缘分割点。至于控制权在哪一方手中，倒不一定了。比如在帕提亚王朝兴盛的年代，他们便从吐火罗人手中夺取了木鹿的控制权；而到了唐帝国渗透中亚的年代，马雷地区则是被以大月氏人后裔自居的粟特人所控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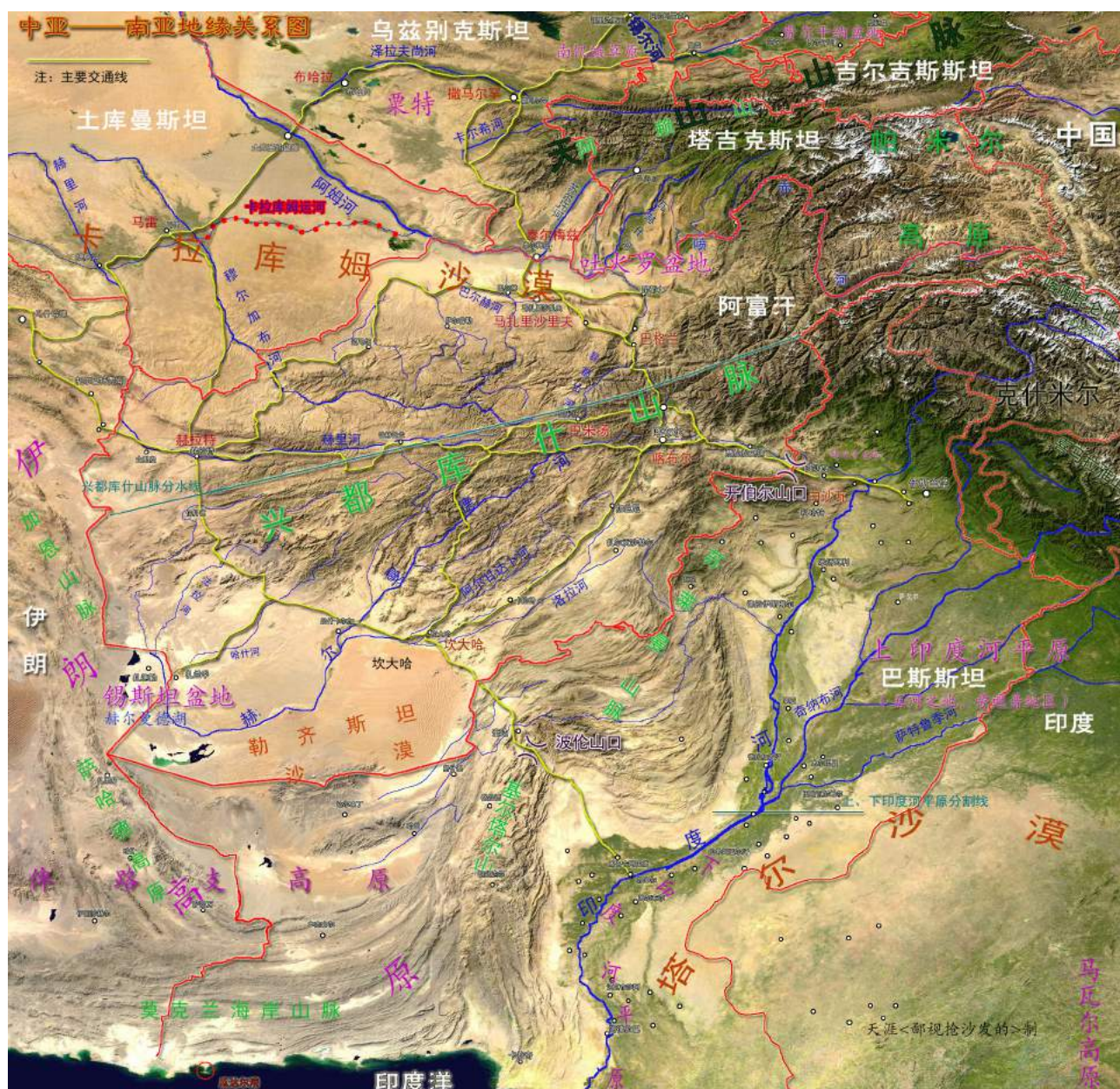


汉西域全图

事实上，马雷绿洲及穆尔加布河所能够分割的，并不仅仅是帕提亚、粟特两大板块。在粟特与吐火罗地区交往的路线中，穿越天山西端的“铁门关”路线并非是唯一的选择。经由马雷绿洲，再沿着穆尔加布河南行至兴都库什山脉西北部，同样也可以进入吐火罗地区。如果要在粟特和吐火罗之间再找一个分割点的话，那就是马雷绿洲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定要为地缘概念的吐火罗划定一个边界的话，那么穆尔加布河下游——马雷绿洲——阿姆河——铁门关之间的连线，就是吐火罗地区的西、北部边界，也是它与帕提亚、粟特两大板块的地缘分割线。

鉴于在历史中，无论是波斯高原还是兴都库什山脉，更多的是在承受北方压力，也就是来自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入侵。现在的马雷绿洲、捷詹河绿洲，甚至波斯高原北麓的山前绿洲带，都已经成为突厥人的领地了。具体到族群和国家来说，就是土库曼斯坦。对于土库曼人来说，阿姆河南岸绿洲带和波斯高原北麓绿洲带，是

支撑他们国家存在的两大核心板块。



中亚——南亚地缘关系图

我们很容易感觉到，这两条线性存在的核心区被广袤的卡拉库姆沙漠隔绝成路人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古典时期相对较低，因为在游牧时代，卡拉库姆地区并非一无是处。与大部分被统称为“沙漠”的地区一样，卡拉库姆沙漠其实更应该被称之为“卡拉库姆荒漠”。除了我们印象中那种典型的黄沙漫漫的地貌外，荒漠中的很多区域还是能够稀疏生长一些草、灌木的。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尽管这点荒漠中的植被比不上连片的干草原，但它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帮助支撑游牧生活方式在卡拉库姆荒漠，乃至整个图兰低地的存在（一般用作冬牧场）。

卡拉库姆荒漠在古典时期固然能够勉强支撑游牧生活方式的存在，但现在的问题

题是，在游牧经济已经完全边缘化，绿洲农业区所支撑的人口占据绝对优势的今天，卡拉库姆地区的那点游牧经济已经无法承担地缘联系的功能了。真正能够为土库曼斯坦结构稳定做出贡献的，还是捷詹河、马雷这两个有农业价值的绿洲。与前人相比，土库曼人促使国家地缘结构稳定的方式，并不仅仅在于经营好捷詹河、马雷这两个绿洲，以及经由它们连接阿姆河——波斯高原的通道。他们更有机会在阿姆河与波斯高原之间开拓一条绿色农业带，以使自己国家的人口密集区呈现不间断的连续状态。而支撑这种改变的基础则在于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卡拉库姆运河。



卡拉库姆运河

简单点说，卡拉库姆运河就是从阿姆河中游引水，灌溉波斯高原北麓绿洲带的调水工程。无论是出于政治（首都阿什巴哈德的位置所在）还是农业需要，土库曼人都希望利用阿姆河充沛的水量，来滋养相对干旱的波斯高原北麓地区，尤其是为首都所在的阿什巴哈德绿洲供水。然而这条运河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与绝大多数山前绿洲一样，波斯高原北麓诸绿洲也是由一条条河流独立支撑存在的。修建这条运河的苏联人意识到（1962年开始兴建），如果将卡拉库姆运河继续沿波斯高原北麓向西延伸到里海之滨，那么红色帝国的南方边境将会变得更加的安全和稳定（土库曼斯坦是苏联帝国最南端的板块了）。为了完成这一战略设想，苏联人默默的进行了三十年的施工，而这一工程最终

也让独立后的土库曼斯坦受益匪浅。

对于土库曼人来说，卡拉库姆运河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均衡了自己国内的水资源，更在于在卡拉库姆地区拉出了一条绿色长廊。也可以说，在地缘上本应面临被分割风险的土库曼人，拥有了一条贯穿全境、沟通南北的“龙脉”。相比古典时期单靠两个绿洲的断续状链接方式，卡拉库姆运河两岸那些连片农业区的地缘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唯一的风险在于，阿姆河并不是土库曼人所独享的。从地理角度来看，土库曼斯坦的领土本身并没有对阿姆河和卡拉库姆运河之水做出任何贡献。这一点，放在地缘政治层面上就是极大的隐患了。在苏联时期，有了帝国中央的统筹安排，土库曼斯坦作为一个水资源的纯粹消费国，并没有什么不妥。但现在，谁都知道为

了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上游国家可能会做什么。

第四节 游牧民族在卡拉库姆荒漠占有优势

以绿洲为链接点，去探究农业民族或者说政权的扩张轨迹要相对更容易些。因为他们必须步步为营的获取那些农业区，才能延伸自己的领地。这一点，在汉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的扩张轨迹中都能得到验证。相比之下，游牧民族就不需要这样按部就班的扩张了。尽管我们将卡拉套山以南的中亚地区定义为“中亚农业区”，但这个农业属性只是相对的，范围仅仅是限定在费尔干纳、粟特、花刺子模、吐火罗这几片水资源相对丰富的绿洲之上。而不管定居于这些绿洲之上的族群最初是否来源于游牧民族，一旦他们完成土著化进程，再想控制那些绿洲之外的荒漠地区就十分困难了。能够利用这些荒漠上有限植被资源的，只有那些纯粹的游牧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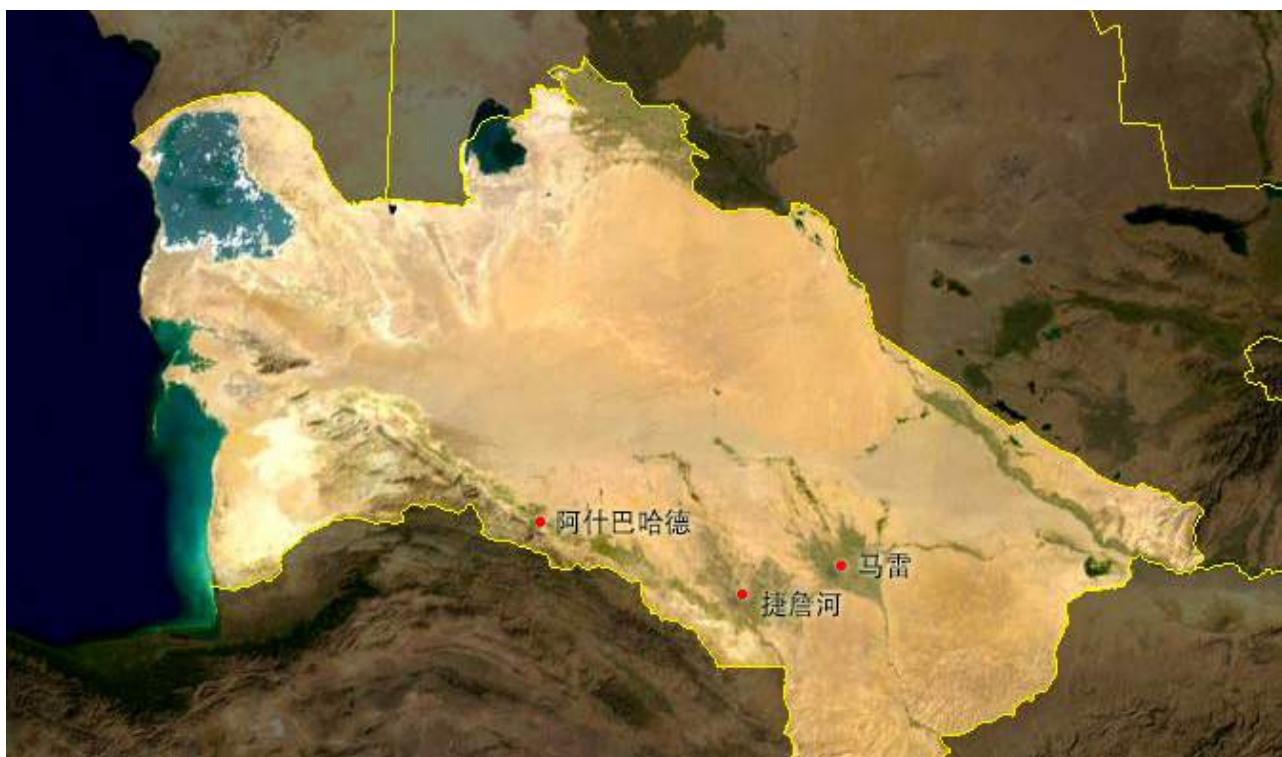
在中亚这些农业区当中，费尔干纳——粟特——吐火罗所处的东部地区，由于都是依山相邻而生的农业板块，即使不能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也能让整个锡尔河、阿姆河中上游地区显示出较强的农业属性。相比之下，远离山脉庇护的图兰低地腹地，能够连片开发灌溉农业的，就只在阿姆河三角洲了。当然，单从地理形态、水资源结构来看，锡尔河三角洲也应该有此潜力。不过，鉴于它的纬度以及与欧亚草原相接的地缘位置。锡尔河三角洲更多的是让游牧民族多了一块草场。

中亚农业区的这种两头开发的情况，很明显在图兰低地南部，阿姆河下游至伊朗高原之间，拉出了一片无法被定居政权有效控制的荒漠地区。即使花刺子模与粟特地区能够置于一个定居政权控制下，或者双方能够打通商路，他们所能依靠的，也仅仅是是阿姆河沿线的据点。至于从阿姆河到伊朗高原之间的卡拉库姆荒漠地区，就不可避免的成为游牧民族的牧场了。当然，仅仅依靠卡拉库姆荒漠中那点植被，是无法支撑一个有一定人口规模的部族生存的。如果想在图兰低地南部生存，这些移动至卡拉套山以南的游牧部族，主要依靠的还是阿姆河沿岸以及波斯高原北麓的草场。

对于伊朗高原来说，中亚农业区之间拉出的这个巨大空当，意味着他们时刻有可能受到那些纯粹游牧民族直接渗透的风险。也就是说，所谓中亚农业区并不是一道横亘在欧亚草原——伊朗高原之间的缓冲区。那些来自欧亚草原的部落，不一定需要征服或者臣服于那些绿洲政权，才能够迁居到中亚的最南端。当然，与欧亚大草原相比，这片绝大部分土地为荒漠所覆盖的土地，人口潜力并不算大。如果周边的定居政权处于强盛期，那么这些处于农业区包围的游牧部落，基本都会选择臣服。而一旦定居政权内部出现分裂、衰弱趋势的话。那么他们又有可能凭借游牧基因入主农业区，并替代原有土著完成新一轮的土著化进程。

在我们所解读的年代，在伊朗高原北部建立帕提亚（安息）王朝的帕提亚人，

就是循着这样的路径，最终成为波斯高原的统治者的。在后来的历史中，类似的游牧征服也一再上演。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应该可以为这块夹在波斯、花刺子模、粟特、吐火罗之间的游牧区域划出个大致范围了。结合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这几乎就是土库曼斯坦的领土范围。就土库曼人的历史而言，他们不仅曾经是伊朗高原政权的附庸，也同样成为过整个伊朗地区的统治者（比如伊朗“卡扎尔王朝”）。而土库曼斯坦现在位于波斯高原北麓的首都“阿什巴哈德”，在两千多年前也正是帕提亚王朝最早的都城（后来随着帕提亚人统治了整个伊朗高原，都城也随之南移）。



土库曼斯坦卫星图

这一切都表明，土库曼斯坦在中亚南部的存在，所代表的正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对波斯高原直接渗透的结果。由于自突厥帝国以后，中亚草原的游牧部落便已经突厥化了。土库曼人在中亚南部的存在，也可以说是突厥游牧文化的遗产。相比那些在中亚农业区变成“农民”的乌兹别克人；被输入太多北亚蒙古人基因的，并试图继承成吉思汗文化遗产的哈萨克人；以及本身就不属于突厥系，源自古代欧洲游牧民族的“塔吉克人”；土库曼人完全有理由坚称自己才是最纯粹的突厥人。

当然，在阿姆河水被引向波斯高原北麓之后，那些零散的绿洲也被链接成了连续的灌溉农业区，游牧的土库曼人也开始了农业化进程。只不过，土库曼人的这种转变，却是以牺牲一个传统农业区——花刺子模为代价的。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天山——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这些高大山脉，所能收集到的降水量是基本恒定的。一片绿洲的兴起，就必然牺牲掉另一片绿洲。土库曼人把阿姆河水引向了



土库曼人



卡拉库姆荒漠（沙漠）

波斯高原北麓，那么注入阿姆河三角洲和咸海的水自然就减少了。现在阿姆河三角洲的主要行政区——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已经成为一片没有希望的土地。

在咸海水域开始因上游地区过度开发、引水而日渐萎缩时，今天生活在花刺子模的“卡拉卡尔帕克人”，还曾经挖掘过一条数十公里长的运河，以使得他们还能从咸海中获取渔业资源。然后不久之后，渔民们便放弃了这种努力。他们发现，即使能够从自己的定居地乘船驶入咸海，他们也捕不到鱼了。因为随着河水补给的减少（上世纪 80 年代已经差不多是零补给了），咸海水的盐度已经高到无鱼可生的地步了。问题还不仅止于此，咸海的萎缩还造成了周边小环境的变化（大型水域有调解周边气温的功能）。在那些因缺水而面积大大缩小的农田中继续耕作的农民，突然发现对农作物生长有重要影响的无霜期，从之前的 200 多天缩短到了 170 天。以至俄国人为中亚农业区所引进的重要经济作物“棉花”，在这一区域的种植也很难再继续了。

从地缘政治格局来看，卡拉库姆运河的兴建，实际上是在损害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利益（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不过，乌兹别克人也不能完全将责任归结于土库曼人。因为他们自己也在阿姆河沿岸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用以扩大阿姆河沿线的农业区。鉴于水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即使乌兹别克人

自己愿意放水给咸海，也很难阻止其他国家打阿姆河水的主意（尤其是因此而改善内部地缘结构的土库曼斯坦）。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花刺子模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板块，衰亡几乎是无法逆转的了。



咸海面积变迁卫星图



咸海萎缩后的景观

以花刺子模的地理位置来看，它作为一个重要板块存在于中亚西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是阿姆河上游拥有巨大集水区的话，阿姆河三角洲也不会有机会成为重要的农业区（这和尼罗河三角洲的情况是一样的）。不过以花刺子模板块那孤立的位置来看，它在很多时候更容易成为游牧民族南下的跳板，或者说作为他们夺取的第一个规模化农业区。而无论是否借力花刺子模，来自中亚北部的草原游牧民族在渡过阿姆河之后，通常都会注意到马雷、捷詹河绿洲这两个据点。因为得到了这两片绿洲，不仅意味控制伊朗高原与粟特地区直通吐火罗地区西部的通道。更意味着，他们可以从容的选择到底以哪一个板块，作为下一步的征服方向。

控制马雷和捷詹河这两个绿洲据点之后，是向东还是向西，这是一个问题。不过很多时候，对于南下的游牧民族来说，这只是一个顺序问题。游牧民族其实并不会如我们今天这样，去研究战略方向。他们只是关注哪一区域更为富庶，或者更容易征服罢了。如果由马雷、捷詹河绿洲一直向南的话，入侵者所能选择的，并不仅仅是向西渗透伊朗高原的帕提亚板块；或者向东，经由蓝氏城征服整个吐火罗地区。他们还可以选择由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的结合部插入，继续南下。然后再选择是向西进入伊朗高原南部的“波斯”板块，或者东插入兴都库什山脉南部地区。

最先有案可查，选择结合部插入方案的政权，并非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他们之前肯定这样做过了），而是从地中海而来的马其顿人。基于方位的原因，

亚历山大和他的追随者是在征服了整个伊朗高原核心区之后，再到达伊朗高原与兴都库什山脉结合部的。这也使得马其顿人的选择方向和南下的游牧民族有所区别，他们要做出的选择，是先搞掂兴都库什山脉北麓，还是先征服兴都库什山脉以南地区。

由于亚历山大是先攻取波斯帝国的核心区——波斯板块，然后折向西北方向占领米底，最后再向东征服帕提亚板块，到达兴都库什山脉与伊朗高原的北部分割点——赫里河中游的。按照正常逻辑，马其顿方阵下一步的选择，应该是沿山麓继续向东，先征服整个吐火罗盆地，再入主粟特；也可以选择先向北，直接插入阿姆河北的粟特地区，然后再回头覆盖吐火罗盆地。不管先攻击哪个方向，中亚农业区都应该是马其顿人下一步的选择。然而事实上，亚历山大并没有这样选择，而是在赫里河中游转而南下，开始了在兴都库什山脉南部的征服。



亚历山大帝国地缘结构图

这样看似在绕圈的路线，其实并不是亚历山大主动选择的。他不过是紧跟波斯帝国最后的统治者——大流士三世脚步追杀罢了。当波斯帝国不仅丧失他们在新月沃地的行省，还丢掉了帝国在高原之上的三大核心区之后，帝国复兴的希望，就只能寄托于兴都库什山脉南北的东方殖民地了。而对于一个农业属性明显的帝国来说，波斯人征服和殖民的重心，也无外乎是沿山麓低地分布的那些河谷平原。

也就是说，当马其顿人跟着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围着兴都库什山脉转一圈，并占领那些绿洲之后。他们也就基本完成了对波斯帝国东方领土的接收工作。至于这个圈应该是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就不那么重要了（关键看波斯人怎么逃了）。如果大流士三世在离开波斯高原之后，是向吐火罗或者粟特方向逃亡，那么他和亚历

山大将会进入我们所熟悉的板块。不过既然双方都选择了南下，我们正好沿着他们的足迹，去看看兴都库什山脉西、南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第二十五章 兴都库什山脉西麓的地缘结构

第一节 赫拉特为阿里亚地区的地缘中心

当我们把视线放在波斯高原与兴都库什山脉的结合部时，就会发现为这个中间地带滋养绿洲的任务，是由南、北两大水系——赫里河和赫尔曼德湖来完成的。由于为亚洲中部带来水汽的风，基本都来自于大西洋方向，因此兴都库什山脉对于这个中间地带的淡水供给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赫里河（也有译哈里河的）、赫尔曼德湖水系，主要都是由兴都库什山脉集水的。在波斯帝国时期，结合部的北部被称之为“阿里亚”地区。其地缘核心则在今天阿富汗西部，赫里河中游的“赫拉特”。

赫拉特能够成为阿里亚地区的地缘中心，一方面是因为它所处的那段河谷相对开阔，相应的绿洲面积也更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沿赫里河谷向东，可以开拓出一条深入兴都库什山脉腹地的东西向通道。这使得赫拉特实际处在十字相交的交通枢纽位置上。当然，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赫里河那充沛的水量，参考附图中所显示的赫里河在兴都库什山脉的流程，我们就能感觉到，在有水就有了一切的中亚地区，赫里河谷内的低地是相当有农业潜力的了。

对于攻击赫拉特的亚历山大来说，在沿赫里河前行至赫拉特后，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向上游地区走了。我们前面也说了，征服兴都库什山脉地区的重点在于周边沿线的绿洲。一定要到山脉腹地，去打扰那些山地游牧部落平静生活的话，只会让自己陷入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更何况财富主要都集中在周边绿洲中）。因此无论是波斯人，还是马其顿人，他们在征服以赫拉特为核心的赫里河中游地区后，都会继续选择向南去寻找下一片绿洲。

如果赫里河和穆尔加布河最后不是在受阻于伊朗高原后，转而注入图兰低地形成捷詹河、马雷绿洲的话，它们应该有机会在两大高地的结合部冲积出更大规模的绿洲来的。问题是，它们最终还是向北流，成为阿姆河理论上的中游支流了。赫里河、穆尔加布河下游在为波斯高原与粟特地区之间构筑两个中继站的同时，也将兴都库什山脉分水线以北山地所收集的大部分淡水，送给了卡拉库姆沙漠。至于赫里河以南的两大高地结合部，就只能依靠一些规模较小的河流来滋养了。

由于没有大型河流的补给，整个伊朗高原与兴都库什山脉结合处的中北部，并没有值得关注的绿洲。那些小规模河流最终只能在今天的伊朗、阿富汗边境处的低地中，蓄积出一系列的咸水湖（如最北部，被两国一分为二的“纳马克扎尔湖”）。在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的亚洲中部，如果没有大量的高山淡水补给，这几乎是每一条河流归宿地的命运。能够利用这些干旱土地的，只有那些将这里作为冬牧场的游

牧部落。对于希望找到绿洲的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来说，离开赫里河谷南下的这段日子里，应该会比较失望。不过，兴都库什山脉很快就会给他们一个惊喜了。因为一片纵深开阔，且有充分淡水补给的湖泽之地，即将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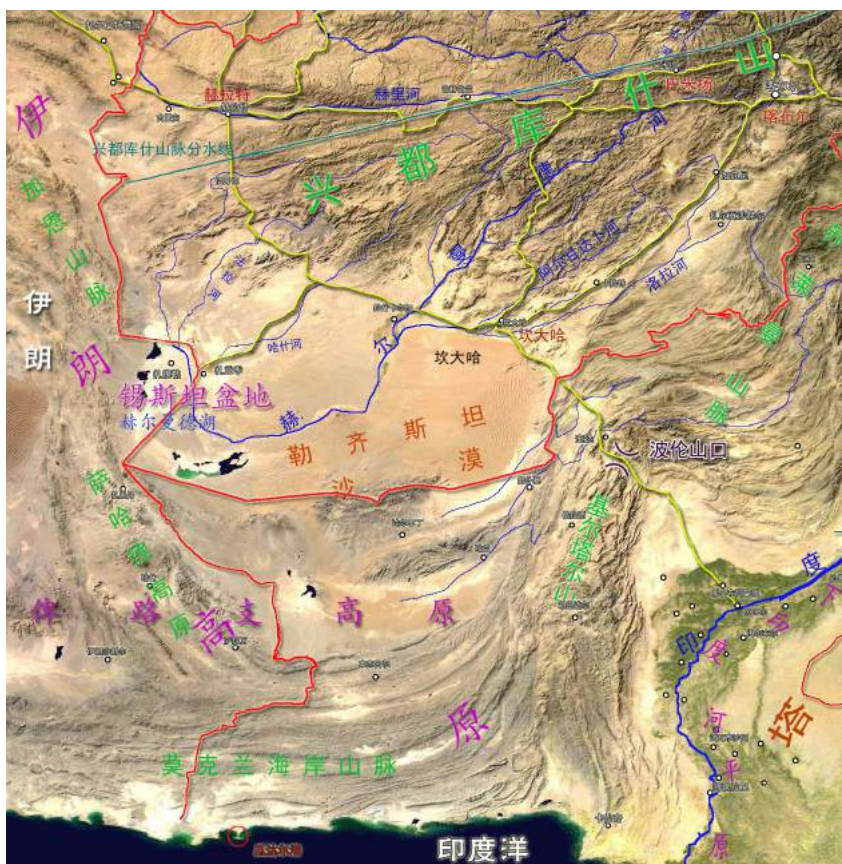


汉西域全图

第二节 锡斯坦地区的地理结构

尽管我们把兴都库什山脉北麓的河流都归为阿姆河流域，但前面我们也说了，由于面向极端干旱的图兰低地，在卡拉库姆沙漠的侵袭之下，自昆都士河以西就再无河流能够真正注入阿姆河了。相比之下，兴都库什山脉分水线以南的河流，所面临的环境就要好一些了。尽管低地上的降水依然稀少，荒漠化严重，但最起码，这些被山地分割的荒漠体量都没有卡拉库姆沙漠那么大。南线大部分山地，还有机会把自己所收集到的雨水汇集到一起的。而这些雨水的主要去处，就是兴都库什山脉与伊朗高原接合部的南部地区。在波斯——马其顿时期，它被称之为“德兰吉安纳”。不过现在我们通常称之为“锡斯坦”地区。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伊朗高原地理范围的认定。如果我们把兴都库什山脉也视为伊朗高原一部分的话，就会发现西起亚美尼亚高原，东至帕米尔高原的这片高原，中间有一道明显的山脉将之分为东、西两块。这条山脉北部被称为“加恩山脉”，南部则叫作“萨哈德高原”。之前我们所认定的伊朗高原三大核心板块：米底、波斯、帕提亚，基本都在这条地理分割线的西部。整个加恩——萨哈德山脉及其以西的伊朗高原，几乎就是现在伊朗领土的全部，我们也可以将这一部分伊朗高原称之为狭义的伊朗高原。



中亚——南亚地缘关系图

现在的问题是，兴都库什山脉一般并不会被认定为伊朗高原的一部分，而是单独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存在。至于兴都库什山脉以西、以南部分，也会被算作伊朗高原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认定的，兴都库什山脉与伊朗高原之间的结合部，其实更应该被认定为是加恩——萨哈德山脉与兴都库什山脉的结合部。不过怎么认定，应该是地理学家头疼的事。从地缘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这些地区适合什么样的“人”生存，这些人又应该与地理相邻的哪些

板块地缘关系更近。事实就是，从地缘结构的角度来说，加恩——萨哈德以东地区，并非波斯文明的核心覆盖区（只能算是势力范围的延伸）。

从地缘关系来看，加恩——萨哈德山脉以东与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低地，应该与兴都库什山脉地缘关系更近。因为为这片低地提供淡水补给的河流，基本都是源自东侧面向西风带的兴都库什山脉。这一点，尤其是在锡斯坦地区表现得更明显。我们在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兴都库什山脉中、南部由东向西汇集的多条河流，都注入这片开阔的低地。这些河流当中最大的一条，叫作“赫尔曼德河”。而在加恩山脉、萨哈德高原结合部处汇集而成的湖泽，也被称之为“赫尔曼德湖”，因此我们也可以为这片山地包夹的结合部，命名为“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不过，尽

管兴都库什山脉已经竭尽所能为“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供给淡水了，但这片低地的纵深实在过大，这些高山来水并不足以滋润盆地腹地的每一寸土地。最终能够成就大规模绿洲的，只有赫尔曼德湖一带。不过在干旱的亚洲中部，这种体量的绿洲已经足以让人给予足够的重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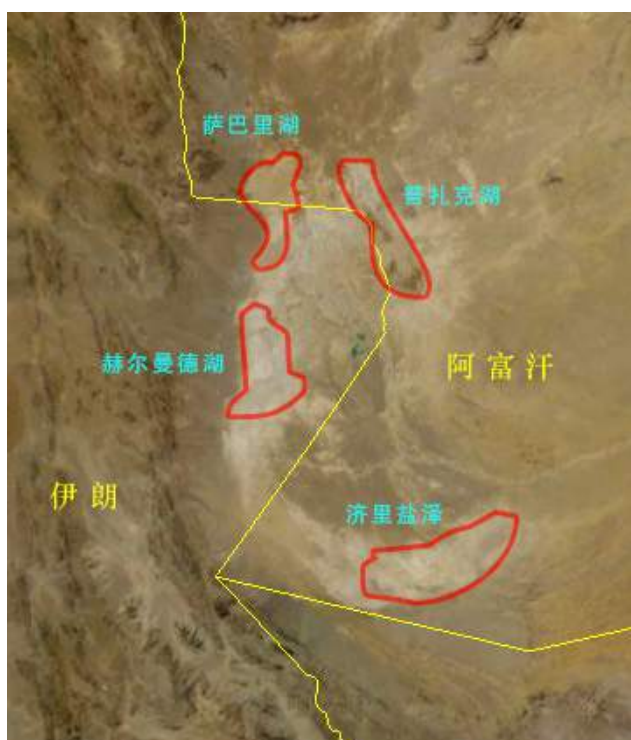
赫尔曼德河流域图

对于中亚的湖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排出多余的盐类矿物质。与那些能够外流入大海的河流不同，这些内流河经年累月由山地带出的矿物盐只能沉淀在下游低地，这也使得大中亚地区的湖泊往往都是咸水湖。不过，赫尔曼德湖是个例外，它是一个淡水湖。这也使得整个湖区不仅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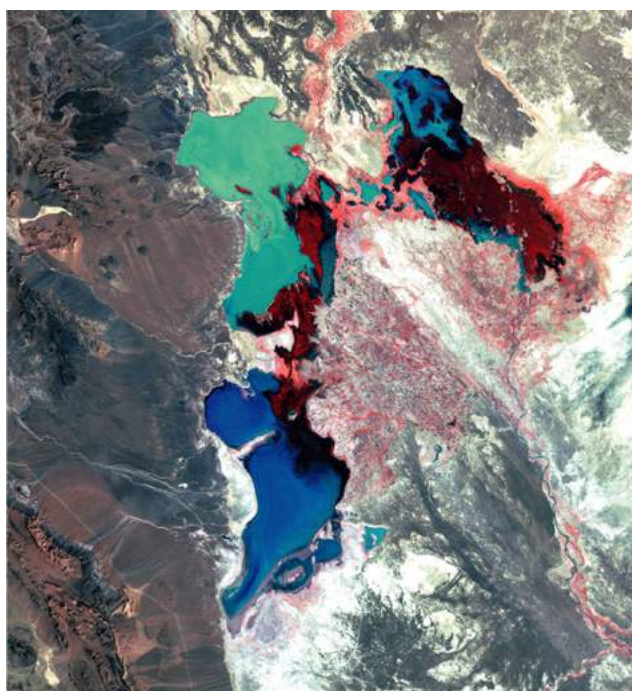
够成为水草丰美之地，更有机会成为灌溉农业的兴盛之地（交给中国人来管理的话，很快就会围湖排水，造出大片耕地来）。每一个成功者的对面，都有可能有个倒霉蛋。对于赫尔曼德湖区来说，保持水质、土地不盐碱化，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作为赫尔曼德河流域的终端，它应该会沉积下很多盐分的。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现实，是因为赫尔曼德湖并不完全是兴都库什山（西南部）之水最终的归宿地，在它的南面还有一片地势更低的洼地帮助它来储存盐分，这片洼地就叫作“济里盐泽”。

我们可以在《中亚——南亚地缘关系图》上清楚地看到“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在西、南部靠近山地处有两片蓄水的湖泽之地。一片在北部，大部分被划入了伊朗境内，这片湖泽就是“赫尔曼德湖”。实际上，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赫尔曼德湖是被分割成三块的。最大的一块，也是湖区的主体（狭义的赫尔曼德湖）在伊朗境内；而其东、北部还有两个平时不相连的，面积较小的湖泊在阿富汗境内，分别是萨巴里湖¹、普扎克湖。每当春季洪水泛滥时，这三个湖泊就会合为一体，并共同

1 萨巴里湖为阿富汗同伊朗交界处的湖泊。与伊朗境内的赫尔曼德湖、阿富汗境内的普扎克湖一同分布于锡斯坦低地的底部，三湖水源主要依靠阿富汗的赫尔曼德河、法拉河等河流。



锡斯坦湖泊分布图（前期）



赫尔曼德湖（1976年卫星图）

向湖泊的西南方向扩张，输送水土资源。这也使得得到赫尔曼德湖区西部的伊朗，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或者说伊朗得到了赫尔曼德河下游最适合开耕的土地（尽管阿富汗貌似得到了绝大部分的盆地）。

第二年春季的这一次洪水，不仅扩张了赫尔曼德湖的湖水面积，让湖区的土地更加肥沃，更让湖区的土地洗了个澡，得以冲刷掉一年当中累积的盐分¹。而这些盐分最终的归宿，就是赫尔曼德湖南部，也就是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处的“济里盐泽”了。事实上，济里盐泽才是整个赫尔曼德河下流盆地的最低点。在它和赫尔曼德湖之间有一条水道相连（叫作“沙拉格河”）。每当赫尔曼德河水位上涨、连成一片时，多余的湖水便会顺着沙拉格河南下，注入地势更低的济里盐泽。这实际上也使得赫尔曼德河本身成为一个中继湖而不是终端。河水周期性的冲刷，保证了湖水及周边湿地不至于盐碱化。至于阿富汗得到的那片洼地就没那么幸运了。否则也不会成为“盐泽”。

类似的情况其实在中亚其他地区也出现过。我们之前说过，巴尔喀什湖其实是分为两部分，中间由一根狭窄水道相连的。只不过两湖相距很近，通常被视为一个蓄水区罢了。由于西区是由水量巨大的伊犁河所供给，并且相对更浅。因此就巴尔喀什湖东、西两区的河水流

1 湖区每年春季涨水，3个湖泊连成一片，5月水面最大，并通过沙拉格河向阿富汗境内的济里盐沼排水。5月以后水位下降，3个湖泊逐渐分离，向盐沼的排水也逐渐终止。向盐沼的短期排水使3个湖泊都保持为淡水湖。湖区每年浸水的陆面于湖水退落后一部分成为沼泽，一部分成为牧场。目前已有计划恢复与改造古代的灌溉设施使该湖区重新成为农耕地。

向来说，也是至西向东的。换句话说，西区所存的是“活水”，东区才是那个倒霉的终端。也正因为如此，巴尔喀什湖才会形成“西淡东咸”的奇特现象。现在大家应该已经很清楚，所谓锡斯坦或者说“德安吉安纳”地区的地缘重心在哪了。简单点说，就是伊朗占据的那块土地。就当时两国划界的情况来看，得到赫尔曼德河河口以西部分的伊朗，貌似占了很大便宜。因为大部分可供可耕的湿地都是伊朗一侧（1872 年英国人主持的划界）。

问题是，真正为这片湖泽之地供水的赫尔曼德河（包括其他注入湖区的河流），却是在阿富汗手中的。在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阿富汗战乱结束（悲剧的是，都持续 100 多年了），准备开发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的话，伊朗得到的那片天然农业区能不能保证供水就是个大问题了。事实上，即使阿富汗人没有什么动作，伊朗人也还没有能够充分开发锡斯坦地区的农业潜力。因为早在 14 世纪，这一地区原来成熟的灌溉体系就被破坏，转而成为一片游牧经济为主的土地了。

第三节 锡斯坦灌溉设施在历史上遭破坏

导致锡斯坦农业体系崩溃的罪魁祸首，是那位来自中亚的征服者“帖木儿”。这位崛起于粟特，试图继承蒙古游牧帝国遗产的突厥人，在行事风格上似乎也在刻意模仿成吉思汗，那就是对反叛者进行无情的惩罚。在他的征服过程中，赫拉特和锡斯坦的政治中心“扎兰特”（现在阿富汗一侧），都曾经因反抗而遭遇过屠城。不过赫拉特比较幸运，因为帖木儿的继承者最初受封于此，并在经营过程中发觉，赫拉特绿洲不仅可控波斯高原与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交通要道，还与帝国的龙兴之地：粟特地区相距不远。这使得他在继位之后决定定都于此，并将赫拉特建设成为一个可与撒马尔罕相媲美的中亚名城。

相比之下，锡斯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帖木儿在屠城的同时，还对锡斯坦地区成熟的灌溉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破坏，以根除反抗者的经济基础。而一直到今天，这一地区都没有恢复成为富庶的农耕之地。不得不说，锡斯坦今日之状让人十分惋惜。因为赫拉特、锡斯坦地区的农业潜力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得到了开发。在波斯、亚历山大帝国时期，锡斯坦都是征服东伊朗高原地区所必得的战略要点，而锡斯坦绿洲甚至还有机会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在公元 7 世纪，中央之国进入第二帝国时代（隋唐）的鼎盛时期：唐帝国，而此时的伊朗高原也处于第二帝国时期（萨珊王朝），同样兴起于波斯板块的“萨珊王朝”已经统治了伊朗高原 400 多年。虽然此时的唐帝国已经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了粟特地区，但和所有立足于伊朗高原的王朝一样，萨珊王朝地缘扩张的重点，也是西侧的小亚细亚高原以及南侧的新月沃地。对于他们来说，从环地中海文明圈所获取的利益，要远远高于中亚农业区那点绿洲。这其实也是为什么伊朗高原在地缘政

治上通常与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半岛，乃至尼罗河下游地区组合为“中东”板块，而不是与中亚地区结合为“大中亚”概念的原因所在。

尽管中亚农业区对于伊朗高原的统治者来说，并非重点经营对象，但这也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向东、北方向延伸自己的控制线。一般情况下，伊朗高原的统治者会希望将控制线定在阿姆河南岸至铁门关一带，将马雷绿洲——吐火罗盆地划为帝国的西北领土。这样做，不仅能够缓冲中亚游牧民族的冲击，更可以为帝国在兴都库什山脉以南地区的扩张解除后顾之忧。在这种情况下，汉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其实并没有地缘矛盾，相反却都是丝绸之路的受益者，并愿意因此而共同维护这条东西方交流的大动脉。



赫尔曼德河

如果唐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能够同时期立国，两大帝国之间和谐共处的关系也许能够更持久些。然而，在唐帝国立国三十多年后，萨珊王朝立国四百多年时，伊朗高原的地缘政治形势出现了大的转变。阿拉伯人的崛起，很快让波斯人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而当阿拉伯人控制了伊朗高原三大核心板块之后，波斯帝国的末代君王的儿子“卑路斯”只能像当年波斯第一帝国的

末代君王（大流士三世）一样，将复国的梦想寄托在帝国的东方领土：赫里河——锡斯坦一线以东地区（吐火罗盆地是东伊朗地区的核心）。

与当年覆灭于希腊人之手的波斯第一帝国相比。萨珊王朝最后的力量，在地缘政治上还可寄希望于遥远的东方。毕竟强大的唐帝国，此时已经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天山西麓了（亚历山大帝国时代，中央之国还处于战国时代）。在这种背景下，“卑路斯”曾经多次请求唐帝国出兵复国。然而对于唐帝国来说，军事介入伊朗高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帝国所能够提供的支持只有两点：一是善待这位波斯帝国最后的希望，为其提供政治避难（卑路斯最后终老于长安）；二是通过在锡斯坦（具体的点，就是前面提到的扎兰季）设立名义上的“波斯都督府”，以试图扼制阿拉伯人的进一步东侵。

当然，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除了让今天喜好地图开疆的朋友，找到中央之国曾经渗透伊朗高原的“证据”以外，毫无意义。兴都库什山脉南北，连同这条中间地

带很快还是被阿拉伯人所征服。如果介于伊朗高原与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这条结合部，仅仅是这两大地缘板块之间的缓冲的话，那么它今天的命运应该会好得多。问题是，这个结合部还是中亚游牧民族南下的天然通道。导致锡斯坦地区荒漠化的那次突厥人征服，只是北方威胁的一次极端展示。在此之前，蒙古人可以说是帖木儿的直接示范者（蒙古人也屠过赫拉特）。

而在我们现在所解读的年代，同样的游牧入侵事件也正在上演。不过，上演这出戏的并非正准备入侵吐火罗地区的大月氏人。以大月氏人当时所处的位置来说（张骞出使至大月氏时），这些从河西走廊远道而来的游牧者，应该是可以从粟特地区渡过阿姆河，并在占领马雷、捷詹河两块绿洲后，渗透伊朗高原以及这条结合部的。至于他们最终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

第四节 锡斯坦由塔尔纳克河谷进入南亚

大月氏人之所以没有西进伊朗高原，是因为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游牧民族捷足先登，控制了伊朗高原北部。并正好在大月氏人南下粟特前一点强势崛起，赶走了整个伊朗高原上的希腊人。这个属于伊朗历史的古典王朝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由斯基泰系游牧部落建立的“帕提亚王朝”（伊朗高原东北部的地缘标签也因此被命名为“帕提亚”。中国史书称之为“安息”）。

面对一个同样也拥有游牧基因，且刚刚成为伊朗高原之主的强大王朝，大月氏人并没有必要一定要去硬碰硬。因此大月氏人的经营重心只能是吐火罗地区了。而马雷——赫拉特——锡斯坦这条中间地带，就是双方势力范围的结合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条结合部中的各个点，可能会归属于任何一方。只不过，帕提亚人和大月氏人并非是这个结合部的唯一争夺者。在他们对面博弈之前，还有一支游牧民族曾经顺着这个结合部向南渗透，并试图在夹缝中求生存过。这个民族就是曾经在伊犁河谷建国的“塞人”。

当帕提亚人成为伊朗高原的主人，大月氏人又南下吐火罗盆地后，悲剧的塞人残部所能选择的，就是沿着这个结合部向南迁移。然而，试图在赫拉特立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一带离帕提亚人和大月氏人太近了。双方都有可能顺着赫里河而上，抢夺这个战略要点。有鉴于此，真正有可能让塞人远离事端，夹缝中求生的就只有锡斯坦地区了。

面对安息王朝的阻击，大月氏人试图从结合部南下，进入兴都库什山脉分水线以南地区固然是十分困难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塞人就获得了一片安身立命之地，原因在于强大的安息王朝并不会放弃东方。尽管帕提亚人崛起之地在伊朗高原的东北部，地缘博弈重心又在于地中海沿岸板块（这甚至影响了他们争夺中亚农业区积极性），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安息王朝会放弃锡斯坦。因为对于伊朗高原的统治者来说，

控制锡斯坦的同时，也开启了另一条同样具有诱惑力的征程，那就是征服“印度河平原”。

就东亚以外的亚洲世界来说，有两个“两河平原”的文明是举世所公认的。一个就是新月沃地中，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所组成的中东“两河平原”，这也是通常意义上所认知的两河平原；另一个，则是南亚次大陆北部的“印度河——恒河平原”了。以伊朗高原的位置来说，优先渗透与之相邻的中东两河平原是很自然的事。至于入侵印度文明的发源地——印度河平原，伊朗高原的统治者也同样抱有兴趣。只不过，要做到这点，仅仅控制米底、波斯、帕提亚三个伊朗高原核心区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向东跨越整个伊朗高原东部，才能俯视南亚次大陆最西端的印度河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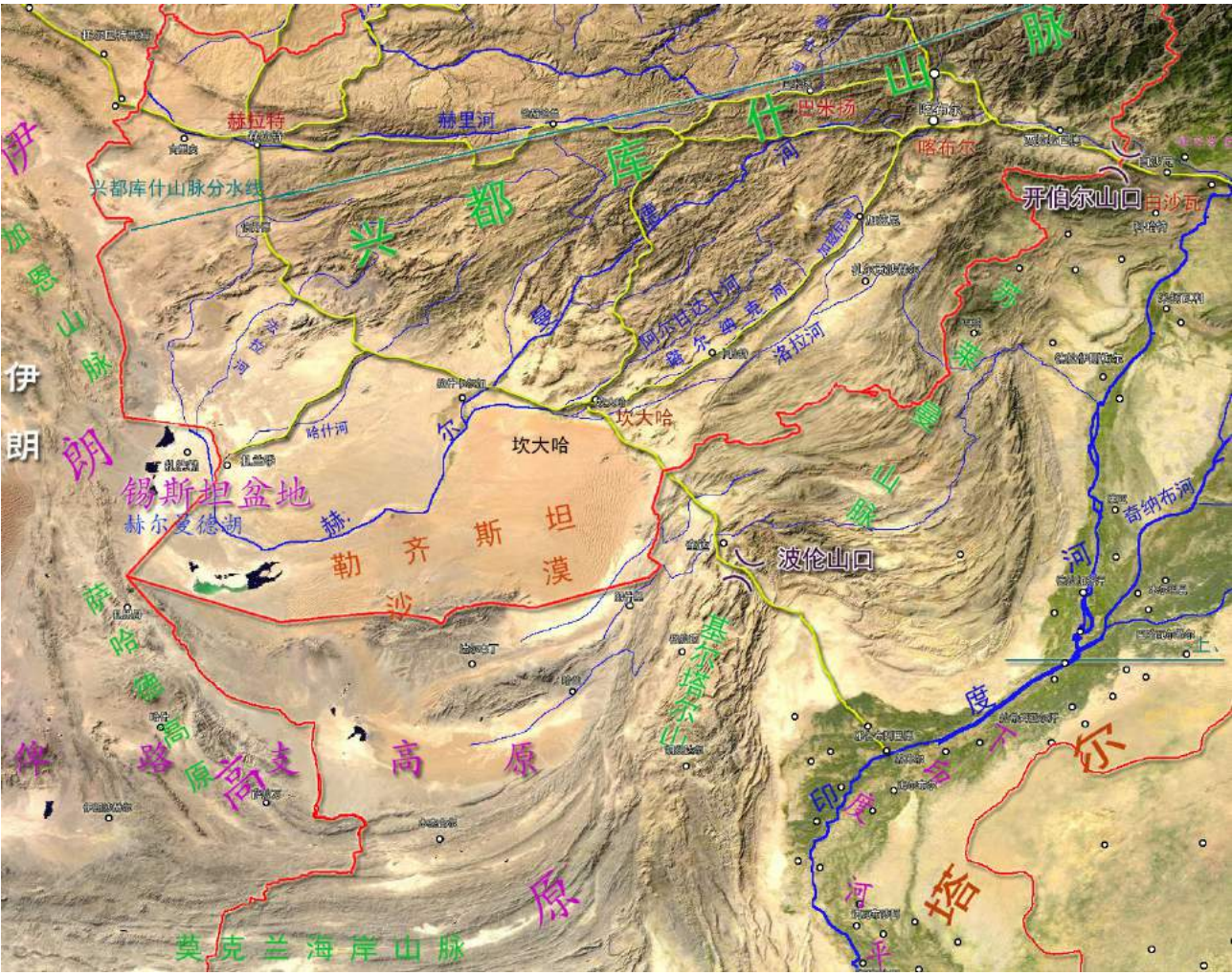
希望做到这点的帝国缔造者，并不一定要征服整个兴都库什山脉。他们只要在兴都库什山脉分水线以南，也就是赫尔曼德河流域所处的地区占优势，就有机会打通一条战略通道了。而加恩——萨哈德山脉以东，去除掉兴都库什山脉的山地，其实就是伊朗高原东部地区，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东伊朗高原”。而赫尔曼德河流域的终点，现在被我们称之为“锡斯坦”的赫尔曼德湖地区，就是自西向东征服东伊朗高原的桥头堡了。

对于占据赫尔曼德湖地区的部族或者帝国来说，他们如果再想继续东进的话，理论上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沿着赫尔曼德河前进，并沿途占据绿洲了。只是，沿着赫尔曼德河走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被确定为赫尔曼德河主干的这条河流，实际位于兴都库什山脉腹地。问题在于，无论是通行，还是进行农业开发，除了水资源之外，相对平坦的地势也很重要。以我们在天山山麓的经验来说，最好的方案是沿着兴都库什山脉南麓山地、平原相接处的绿洲向东渗透。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存在一系列平行排列的，由南北向河流所滋养的绿洲存在，为这段旅程提供补给（就像兴都库什山脉北麓的情况一样）。

不过与兴都库什山脉北麓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兴都库什山脉并非是滋养它南麓低地的唯一山地。在这片低地的东南侧还有一片山地，也就是伊朗高原与印度河平原的分水岭——苏莱曼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和苏莱曼山脉之间紧密的地理关系，使之有机会共同保护二者之间的低地。也就是说，这片本来应该由兴都库什山脉之水独立经营的山麓低地带，其实是由苏莱曼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所共同滋养的谷地。虽然由于兴都库什山脉和苏莱曼山脉内部都有许多东西向的谷地，并将降水直接引向“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等低地，但两山包夹而成的谷地最低点并没有得到巨额的水量补给。但是，这种地形结构已经足以在两山之间形成一条两面受水，并与兴都库什山脉、苏莱曼山脉平行的河流了。这条河流也就是塔尔纳克河。

在分布于兴都库什山脉南部、苏莱曼山脉北部的众多赫尔曼德河流域支流中，塔尔纳克河是一条不起眼的河流。你甚至在一般比例的地图上找不到这条河流的名

字。与之相比，其北部单独由兴都库什山脉供给的“阿尔甘达卜河”；以及南侧主要由苏莱曼山脉集水的“洛拉河”都要更为显眼。不过，如果你的关注点是在阿富汗南部的交通线上的话，那么你所看到的那条起自赫拉特，终至喀布尔的，沿兴都库什山脉西、南麓而行的 A1 公路，其坎大哈以东部分路线，大部分就是沿“塔尔纳克河谷”而行的。



中亚——南亚地缘关系图

对于波斯人、马其顿人、塞人，或者现在准备进入东伊朗高原的帕提亚人来说，前进到塔尔纳克河谷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这意味着他们离富庶的印度河又进了一步。不过且慢，既然大家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进入那片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就步入成熟文明期的土地（印度河文明），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沿着“塔尔纳克河谷”向东渗透呢。以一般规律而言，印度河流域的精华之地应该在它的下游地区。而依照几何原则，从锡斯坦向东南方向穿越伊朗高原东南部的山地，不是能够更快到达印度河下游吗？

单从地理结构考虑，的确如此。但事实是，大家更愿意舍近求远的先进入“上

印度河平原”（印度河上游地区），再沿河而下控制下印度河平原。也就是说，这片被波斯人和马其顿人称之为“格德罗西亚”的位于伊朗高原东南角的土地，在地缘政治结构中被彻底边缘化了。而在今天，它在地区地缘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我们现在更习惯称之为“俾路支斯坦”。

伊朗高原——中亚地缘关系图

伊朗年降雨量图

第二十六章 兴都库什山脉南麓与南亚的通道

第一节 俾路支高原的潜力及其战略价值

我们很容易发现，被我们认定为伊朗高原核心区的三个板块，所依附的就是高原的边缘山脉。而帮助高原东北部封口的兴都库什山脉，边缘也有不少可供农业开发的绿洲。那么东伊朗高原呢？那块位于兴都库什山脉——苏莱曼山脉以南的地区，难道只有锡斯坦地区是值得关注的绿洲吗？既然我们认为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山、水之间的关联是那么的紧密，那么就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区域都有哪些山体组成的。

伊朗高原东南部的山脉，总的来说有两条：一条走向和苏莱曼山脉一致，叫作“基尔塔尔山脉”。其实一定要把他们看成一段山脉也没问题。不过从结构上来看，我们还是能够找到明显区分这两条山脉的地理分割点的。当我们顺着基尔塔尔山脉南行，到达印度洋边时，山地开始沿着海岸线向波斯湾方向延伸，并最终与伊朗高原西南部的扎格罗斯山脉对接。这段西临波斯湾口，东接南亚次大陆的山体，叫作“莫克兰海岸山脉”。

从位置上来看，我们很容易认为，基尔塔尔——莫克兰海岸山脉是伊朗高原最具潜力的板块。因为他们看起来，是整个大中亚地区离海最近的地理单元。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山、海的共同作用下，伊朗高原的这个东南角有机会营造出富庶的农业区来。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与海洋的距离远近并非是决定降雨量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风向，在于是否有能把海洋滋润水汽带过来的风。

以伊朗高原整体的降水情况而言，呈现的是“西高东低，北多南少”的格局。西部山区年平均降水能达到 500 毫米左右（最好的是厄尔布尔士山脉北坡，能达到 1000 毫米），而到了东南部就最多只有 200 毫米了。这种降水格局意味着真正为伊朗高原提供水汽的，还是来自大西洋的西风。至于印度洋，相信有了在阿拉伯半岛的经验，大家应该不再对这片海洋抱有太大的希望了。因为印度洋真正能为大陆带来水汽的“西南季风”，是从南亚次大陆的西南部登陆。在润泽了大部分印度半岛的同时，也绕过了阿拉伯半岛和伊朗高原。

仅仅依靠 200 毫米的降水，包括萨哈德高原、莫克兰山脉、基尔塔尔山脉在内的伊朗高原东南部山地，在古典时期所能维持的就只能是游牧经济了。至于这些山地之间的低地，自然更是没有机会蓄积出足够的水资源来摆脱荒漠化的命运。当然，像赫尔曼德湖区这样，由几乎半个兴都库什山脉和部分苏莱曼山脉所供水的低地，还是有机会成为例外的。只不过它的地缘位置实在有些危险，往北看，是中亚游牧民族南侵的通道所在；往南又紧邻着伊朗高原内部的游牧地带。在这两股游牧力量的夹击之下，赫尔曼德湖区在古典时期后期，呈现出了由农转牧的状况。



中亚——南亚地缘关系图



俾路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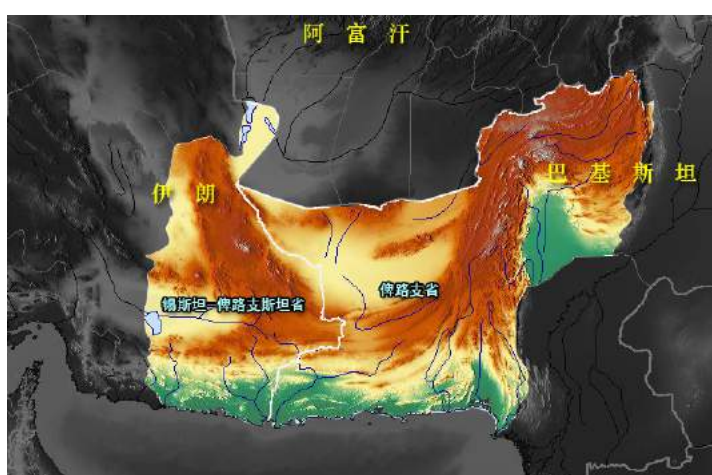
当年南迁至锡斯坦地区的塞人，有没有对赫尔曼德湖区的农业经济进行破坏，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在帕提亚王朝东征之后，塞人如果还想以游牧的生活方式维持政治上独立的话，应该就只能是退入南部山区了。现在游牧于萨哈德高原——莫克兰山脉——基尔塔尔山脉的游牧民族，被称之为“俾路支人”。而包含这三条山脉的伊朗高原东南部地区，也可以单独称之为“俾路支高原”。基于游牧民族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我们无法得知现在居于这片山地的俾路支人，到底跟当年的塞人有无关系。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从人种还是语言来说，他们都算得上是欧洲游牧民族的后代了。

至于远道而来的亚洲游牧民族，他们千里迢迢的来自这片高原，所图谋的只是那些富庶的农业区。对这片边缘山地并没有势在必得的想法。尽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俾路支高原在古典时期应该没有太大价值，可在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它却有着特殊的价值。印度洋虽然没有为俾路支高原带去多少水汽，但还是为它提供了上千公里的海岸线。这在海权为大的时代，就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了。

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是俄国人，这一点我们在国际部分曾经分析过。为了让独立的“俾路支斯坦”国能够与苏联相接，俄国人甚至“帮助”俾路支人在地图上向北扩张了一倍的领土，以使得这个拥有印度洋海岸线的“国家”能够与现在的土库



俾路支斯坦示意图



伊朗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地区

曼斯坦相接。至于如果俾路支斯坦当年真的独立了，最终会不会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国，就不得而知了。反正苏联这个红色帝国在很多设想还未实现之前，就已经崩溃了。其实真从地缘结构来看，有独立倾向的俾路支人除了图谋从伊朗、巴基斯坦领土中分割出俾路支高原外，最多能够向北延伸的领土要求，就是锡斯坦了。在由中亚方向而来的突厥人将锡斯坦的精华之地——赫尔曼德湖区的农业灌溉系统破坏殆尽后，他们并没有试图在此完成土著化进程。

我们前面也说了，那些更富庶的农耕区才是这些北方入侵者的欲望所在。而对于邻近的俾路支人说，这却是一个向北延伸势力范围的好机会。所以现在的锡斯坦地区，也有俾路支人分布。

而在伊朗的行政版图中，波斯人所分得的那部分锡斯坦地区，以及俾路支地区，也因此合二为一成为“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而分得大部分俾路支高原的巴基斯坦，则单独为俾路支人设置了以其族名命名的行政区——俾路支省。很多人会感到奇怪。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低地的南亚次大陆应该没什么机会染指这片高原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真正让巴基斯坦（或者说分裂前的印度）得到这片土地的是英国人。为了英属印度的地缘安全，英国人从波斯人手中谋得了三分之二的俾路支高原。这也使得现在的巴基斯坦在内部安全上必须面对俾路支分离势力的威胁。只不过，俾路支高原的边缘位置，以及游牧属性，使得它在波斯人眼中也是一个有分裂倾向的边缘板块。也就是说，波斯人在俾路支独立的问题上，是绝对不会投赞成票的。这也使得伊朗、巴基斯坦两国，都不至于成为俾路支斯坦独立的幕后黑手，并试图以此来影响对方的地缘安全。

鉴于上述原因，在地区地缘政治中，俾路支斯坦本身是没有太大机会搅起事端的。不过上升到国际政治层面，事实就有些微妙变化了。典型的案例，就是苏联试图通过鼓动俾路支人独立来打通印度洋通道。而就现在的地缘政治动作而言，对俾路支

地区最有兴趣的就是中国了。俾路支高原紧邻印度洋、波斯湾的地缘位置，还是让试图染指印度洋的中国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大家关注时事的话，应该看到过中国接收瓜达尔港管理权的消息了。这个港口，就是在俾路支高原的南部沿海地带。当然，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虽然中国是绝没有机会，也不会有想法去通过俾路支斯坦，扩张出一片对接印度洋的领土来。真正能做也会做的，反倒是帮助巴基斯坦加强对俾路支地区的控制力度。

好了，通过上述解读。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清楚，无论对于波斯人、马其顿人、帕提亚人来说，在进占赫尔曼德湖地区之后，继续向南都不会是选项了。他们接下来的选择，将会是一路向东……。那么，一路向东是不是就只有进入兴都库什山脉——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塔尔纳克河谷”呢？情况并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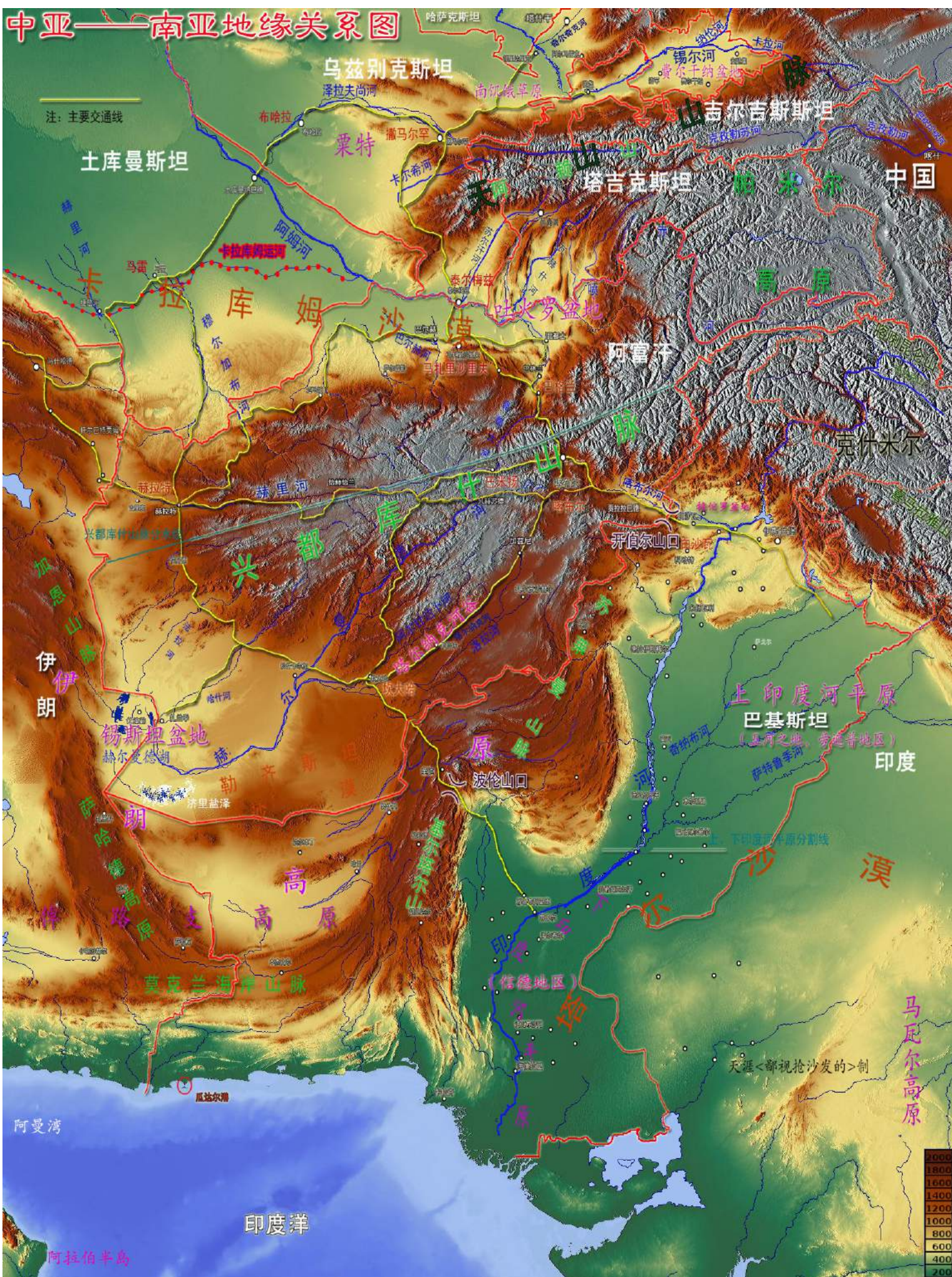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坎大哈经波伦山口沟通南亚

有地理学家认为，兴都库什山脉的西界应该到赫尔曼德湖的。也就是说，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也应该归入兴都库什山脉的范畴。从地理角度来看，这种归类也不无道理，毕竟赫尔曼德河之水大多是从兴都库什山脉而来的嘛。不过怎么归类，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整个赫尔曼德河下游地区的荒漠化。这个盆地区南部的大片低地，现在已经被标注为勒齐斯坦沙漠了。而这片沙漠横亘在兴都库什山脉和伊朗高原东南部之间，也使得整个俾路支高原在地缘上更显孤立了。相比之下，赫尔曼德湖地区与同处赫尔曼德河流域的“塔尔纳克河谷”之间的地缘关系，就要紧密得多了。赫尔曼德河本身天然成为双方地缘联系纽带的角色。

从地理结构上看，由兴都库什山脉和苏莱曼山脉包夹而成的塔尔纳克谷地，呈现的是条状结构。对于这种结构的地理单元来说，谷口绿洲会有很重要的战略价值。在阿富汗现在的行政结构中，这一点也得到了充分反映。我们从《中亚——南亚地缘关系示意图》上，很容易找到这座经常出现在时政新闻中的城市——坎大哈。坎大哈所依附的绿洲，并非仅仅由塔尔纳克河供水而成的。这座在阿富汗城市规模中位列第二的城市，实际是位于塔尔纳克河与阿甘达卜河之间的绿洲上的。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了，有两条赫尔曼德河的支流共同滋养，只会增加它的地缘潜力。占据了这片绿洲，接下来很自然的就向塔尔纳克河谷的纵深，向东北方向渗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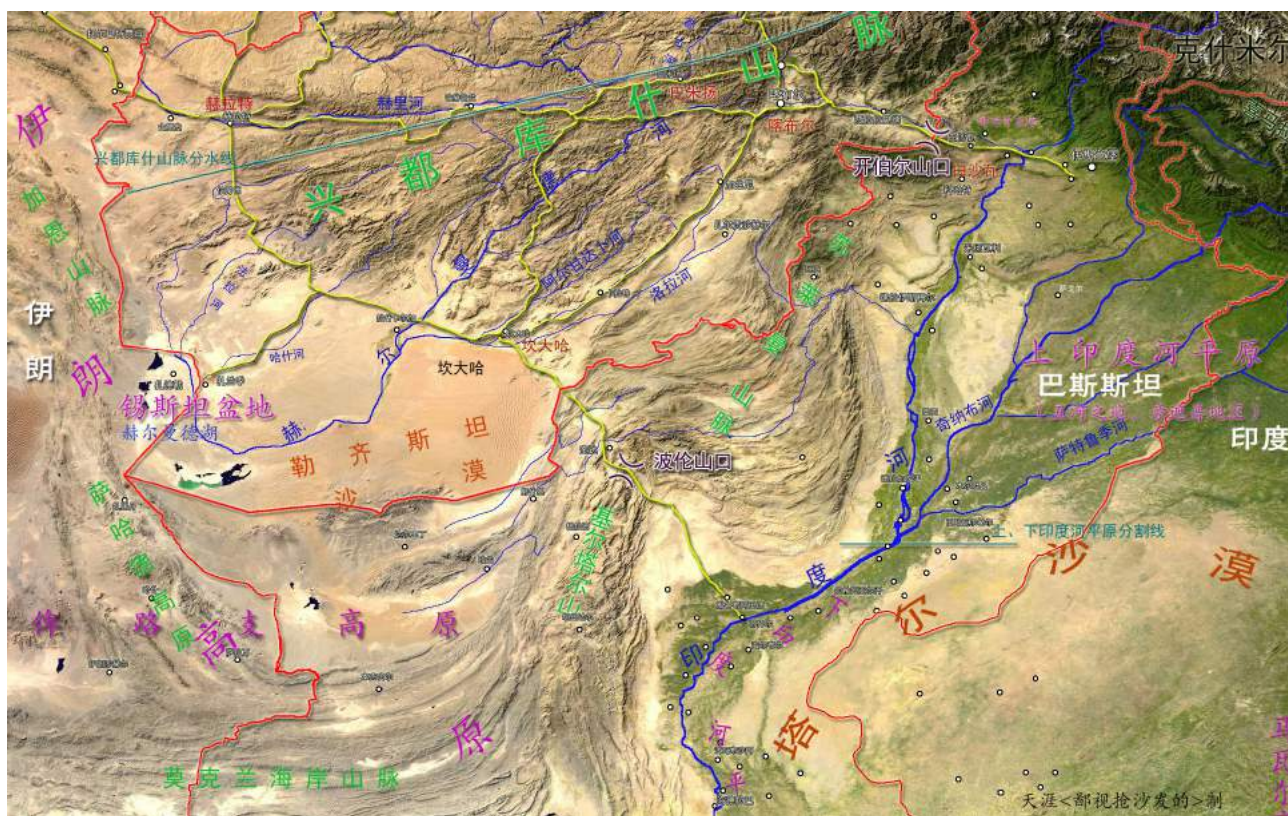
在马其顿人东征的时代，亚历山大所带领的大军，就是沿此路线控制整个兴都库什山脉南部地区，并最终转入上印度河平原的。坎大哈的战略价值，也是因亚历山大的到来而在史料中得到体现的（城是亚历山大所建）。在希腊人之后，入侵赫尔曼德河流域的外来者，就是被大月氏人逼入锡斯坦的塞人了。只不过，这些塞人还没来得及经营出自己的国家，就被试图重现波斯帝国荣耀的帕提亚人征服了。帕提亚人本来是很有机会重建帝国体系的，然而帕提亚人的游牧基因，最终阻碍了他

中亚——南亚地缘关系图



们建立更为紧密的中央集权体系。所谓的“安息王朝”，整体所呈现的还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形式。那些帕提亚以外相对独立的地缘板块，大多只是间接臣服于安息王朝罢了。这一点，后来出使中亚的汉帝国使者也意识到了。在他们的记录中，兴都库什山脉分水线以南的绿洲，是被一个叫作“乌弋山离”的国家所统治的。

乌弋山离作为一座城市名的话，其实指的就是现在的“坎大哈”。很明显，如果你想统治的是赫尔曼德河流域绿洲带的话，坎大哈会是连接中、下游绿洲带的地缘中心。在波斯帝国当年的政治体系中，坎大哈以东以塔尔纳克河为轴心的这条谷地，被称之为“阿拉科西亚”。当帕提亚人派军征服塞人，占据同属赫尔曼德河流域低地带的“德兰吉亚”（赫尔曼德湖下游盆地）与“阿拉科西亚”之后，这些南下的帕提亚人并没有将这两个地区归入安息王朝的直接统治下，而是马上独立建立了由帕提亚人——塞人混居而成乌弋山离国。当安息王朝强大时，乌弋山离国应该是选择依附于这个同根生的王朝的。不过在后来大月氏人进入兴都库什山脉南部，甚至控制印度河平原时，他们所建立的贵霜王朝也同样覆盖过这片土地。不管地理指向于赫尔曼德河流域的“乌弋山离”地区，最终在政治上臣服于何方。坎大哈这个点，似乎只是一个东、西地缘博弈的点。



中亚——南亚地缘关系图

不过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从坎大哈向东渗透塔尔纳克河谷，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当我们把视线从坎大哈向南移动的话（你必须看的是地形图，才会有这种感觉），

会发现伊朗高原东部边缘的山脉，在这个位置上有收紧的趋势。事实上，这个伊朗高原东部边缘的最薄弱处，也是苏莱曼山脉与基尔塔尔山脉的结合部。依照我们过往的经验，一片地理相接的山地被分别命名的话，它们之间一定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地理分割线，并因此而产生一条穿越其间的通道。而苏莱曼山脉、基尔塔尔山脉，这两条山脉之间也的确存在这样一个山口——波伦山口。当我们把视线从波伦山口东移的话，会赫然发现下印度河平原就在眼前。



波伦山口



波伦山口绘图

波伦山口的存在，让我们不由得为波斯高原的统治者设计出了另一条进入南亚的快捷路线。那就是由赫尔曼德湖溯河而上，占领坎大哈，然后再南下穿越波伦山口切入印度河下游平原。那么这样一条路线，在历史上有没有被利用过呢？答案是肯定的。那位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就曾经穿越过波伦山口。只不过，他的军队是反方向从印度河下游地区北上，试图穿越山口进入坎大哈的。

对于已经征服伊朗高原核心区、兴都库什山脉南北，以及印度河流域的亚历山大来说，伊朗高原东南角的这片时称“格德罗西亚”的山地始终是个心腹之患。如果格德罗西亚的游牧部落试图去农业区打草谷的话，那么以它的地缘位置而言，可以轻而易举的向波斯、锡斯坦、塔尔纳克河谷，乃至下印度河平原攻击。鉴于

上述地区都已经成为帝国的领土，亚历山大并不希望在这些农业区之间还活跃着难以驯服的游牧部落。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格德罗西亚地区没有可控通道的话，印度河平原与伊朗高原核心区、两河平原之间的交通线，就太过脆弱了。你会发现，依靠如此曲折的交通线来连接帝国东、西部最有潜力的土地的话，存在多大变数。



坎大哈城市



俾路支斯坦地理环境

有鉴于此，不管亚历山大的士兵是否熟悉山地战，都需要在伊朗高原东南部的山地中显示一下武力了。为了完成这次征服，亚历山大分兵南北两路。一路先切入基尔塔尔山区，再北上穿越波伦山口进入坎大哈；主力则沿着基尔塔尔山脉——莫克兰海岸山脉南麓西行，并在现瓜达尔港以西翻越莫克兰山脉，进入俾路支高原西部。然而对这些山地游牧者的征服，注定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在亚历山大的军队付出惨重代价后，也没能真正完成对格德罗西亚地区的征服。

其实，即使亚历山大帝国不是那么短命，他们应该也不会再想去对这片山地有想法了。因为希腊人在陆地征服的同时，也发现了通过海路打通两河平原、波斯地区与下印度洋平原之间的通道更为便捷和可控。虽然对于伟大的征服者来说，在自己的视野之中出现一片难以征服的土地，应该会让他如鲠在喉。不过亚历山大也大可不必为此感到遗憾。因为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哪个国家敢真正说，行政掌控了这片被我们称之为“俾路支斯坦”的土地。

在俾路支斯坦这片荒凉、干旱的土地上，游牧生活已经延续了几千年。除了少数规模不大的绿洲可以支撑农耕生产以外，游牧成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而紧邻着这样的交通要道，本来就有机动优势的俾路支人（以及在他们之前占据这片土地

的部落），自然是不会轻易放弃由此而带来的商业利益的，这些都成为外来民族染指波伦山口的重要障碍。其实俾路支人能做的并不仅仅是从南亚——西亚、中亚的贸易中分一杯羹。既然那么多路途遥远的民族都在觊觎印度河平原的富庶，那么近在咫尺并占据高地优势的他们，应该也没有理由不产生这个想法的。

事实上，从13世纪起，俾路支人就开始陆续下山，自然渗透与之相对应的下印度河平原了。在印度的地缘结构中，占据下印度河平原的族群被称之为“信德人”，而相应建制的行政区也被叫作“信德省”。在18世纪末，英国人入侵印度河流域之前，俾路支人本来很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当时趁着波斯的衰弱（在这个西方殖民时代，想不衰弱也不行了），高原上的俾路支人本来已经组成了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并入侵信德地区成功了（因为印度的莫卧尔王朝也在英国人的重压下衰弱了）。然而很快，英国人便结束了这一切，并反过来将大部分的俾路支地区划给了印度，以为地缘屏障。

为了保证英属印度的地缘安全，仅仅得到俾路支高原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得到波伦山口以北的苏莱曼山脉的话，“印度”仍然是个门户开放的板块。问题是，再往北走的话，游牧的俾路支人就没有优势了。那些占据塔尔纳克河谷绿洲的民族，会更有优势控制这些山地。而这支民族叫作“普什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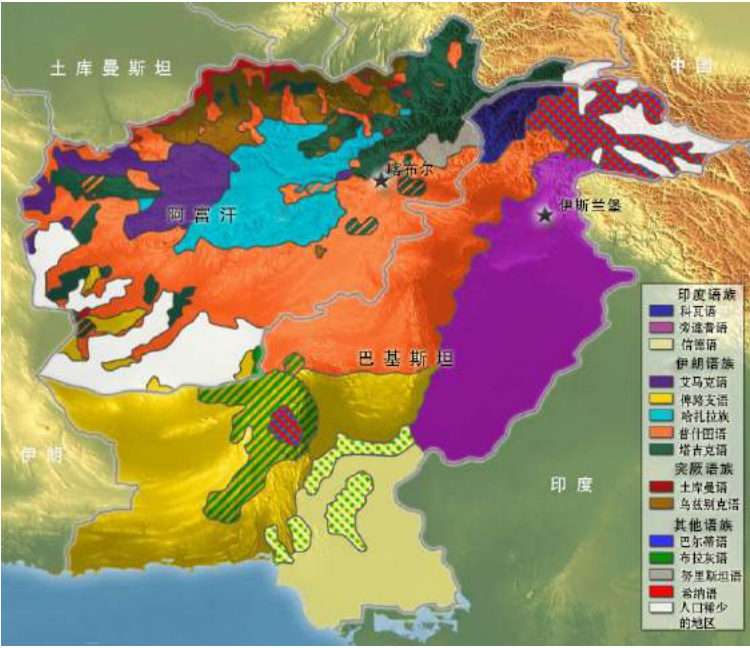
第三节 普什图人与周边族群的亲缘关系

很多人知道普什图人，是因为塔利班。自从911之后，关于阿富汗和塔利班的新闻，几乎天天都可以见诸媒体。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从族群利益代言的角度来看，塔利班所代言的并不是全部的阿富汗“人民”。它真正的群众基础，是在兴都库什山脉分水线以南被普什图人所覆盖的区域。至于分水线以北，尤其是吐火罗一带，则是塔吉克人占优的区域了。关注过早期阿富汗政治新闻的朋友，应当注意过一个叫作“北方联盟”的阿富汗政治联盟。这个政治联盟就是以塔吉克人为主的北方非普什图民族的政治代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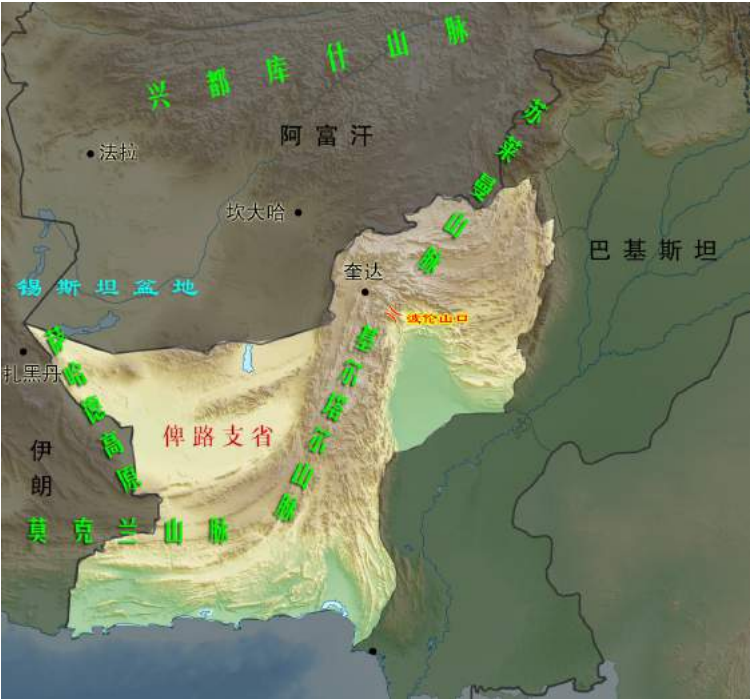
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时，北方联盟因共同的反塔利班立场，而成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并在今天的阿富汗合法政府中，谋得了自己应得的政治权利。说起来也是一个悲剧，尽管美国人竭力向外推销以“民选”为重要表现形式的“普世价值”。但到头来，在那些经济基础尚无法支撑这座“上层建筑”的地区，所谓的“民主政治”包装出来的，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族群博弈。所以真的要看懂这些热点地区的时政，理解它们地缘结构划分才是关键所在。

与俾路支高原上的俾路支人、吐火罗盆地的塔吉克人一样，普什图人和波斯人在语言、人种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说他们都是源自当年的雅利安人游牧部落也是可以的。只不过，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使得波斯、俾路支、普什图、塔吉克成为四个相互独立的族群。由于在现在阿富汗的人口中，普什图人占据了多数，并且

阿富汗最后的古典王朝是南统北，由普什图人建立的（现在的政治中心喀布尔也在南），因此普什图人也可以认为，阿富汗是普什图人的国家。当然，他们要这样说的话，塔吉克人肯定是不答应的。不过好在俄国人当初为塔吉克人设计了一个单独的国家，以使得今天的塔吉克人有机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以民族国家的面貌展示自己的存在。



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语言分布图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示意图

鉴于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与波斯人之间存在紧密的地缘关系，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成为今天伊朗重点经营的区域。这一点，在国际部分曾经被我们总结为“波斯同盟”。至于俾路支人，就没有这份幸运了。被分割而又希望取得独立地位的他们，几乎没有建立自己祖国的希望。由于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乃至中亚国家的边界都是在外力作用下划定而成的，今日俾路支人被分割的悲剧，也可以说是英国人直接造成的。而抛开这些人为的行政边界，单看民族属性的话，波伦山口可以说是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的一个分割点。比如波伦山口西北侧的城市“奎达”就是一个普什图人占优的城市。

不过，在今天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版图中，我们会看到波伦山口、奎达，乃至苏莱曼山脉南部那片普什图人占优的山地，都被划入了这个省份。其实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因为如果你单独设立一个普什图省的话，它与阿富汗之间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是可以预见的。其实即使没有这样独立的行政

区设置，现在的巴基斯坦也一样要为境内的普什图人头疼（哪有这么容易就解决地缘矛盾的）。只不过，这些有分裂倾向的普什图人，更多的是以“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政治面目示人罢了。

拥有自己的祖国，在邻国又是被压制的少数民族。这就是被英、俄分割的大中亚地区的现实状况。比起只被分割，没有祖国的俾路支人来说，普什图人还算幸运了。最起码，普什图人所主导的重要地区，还都留在了阿富汗境内。实际上，如果没有英国人“帮忙”，也许阿富汗北部地区当初就是俄国人的“塔吉克斯坦”了。其实在历史上，兴都库什山脉南部的族群，并没有对北部地区拥有稳定的辐射力。相反，在中亚游牧民族的助力下，兴都库什山脉以北的族群，入侵南部地区的情况会更为多见。像今天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人口占优的族群，就是塔吉克人。而开启这种入侵模式的，就是张骞所寻找的大月氏人。

第四节 由锡斯坦进入南亚的河谷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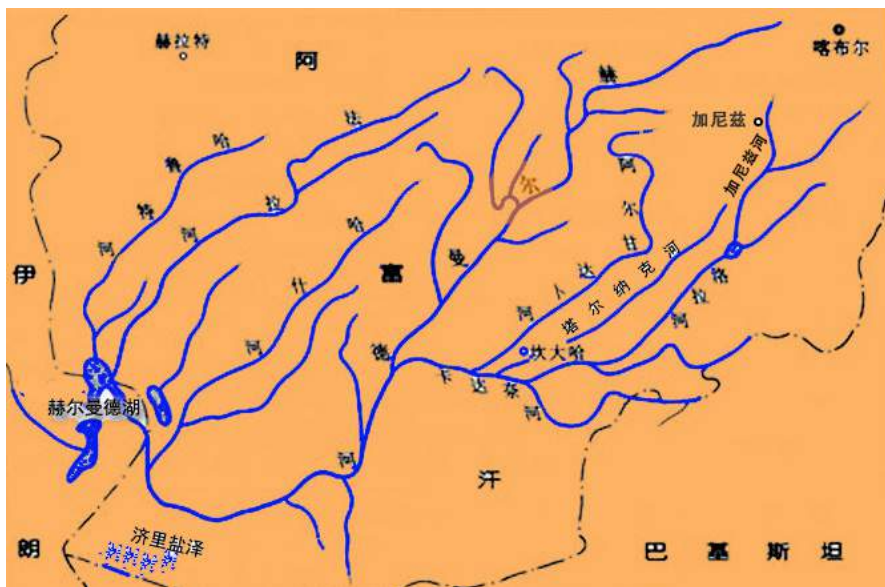
大月氏人后来的南侵，并没有延续亚历山大或者波斯的路线。这是因为，同时期控制伊朗高原的安息帝国还足够强大。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的欧亚大陆被四大帝国所统治，即东亚的汉帝国（东汉）、地中海的罗马帝国，以及二者之间的安息、贵霜帝国。不管这种排法是否有拔高安息、贵霜实力的成分在里面，这两个国家在东汉、罗马两大帝国之间并立而存却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月氏一定要去争夺赫拉特、锡斯坦的控制权，然后再顺着塔尔纳克河谷东进的话，就得和安息血拼一场了。鉴于双方都从丝绸之路的经营上得到了不少好处。贸然将双方引入全面战争阶段，很可能就是双输的局面了。

当然，即使大月氏人不走这条路线，塔尔纳克河谷这条战略通道也是现实存在的。我们之所以将兴都库什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这片低地带，统称为塔尔纳克河谷。是因为这条体量不大，两面受水的河流，所占据的是整个低地带的最低点。但实际上，塔尔纳克河并不能帮助我们全程完成兴都库什山脉南麓的旅程。而这片相对低地带的绿洲，也并非都是沿塔尔纳克河分布的。最后的旅程需要接入另一条河谷——加兹尼河谷。

加兹尼河所收集到的雨水并没有汇入塔尔纳克河谷，而是向南流入了苏莱曼山脉西北侧的洛拉河。有鉴于此，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塔尔纳克——加兹尼河谷”之名，来为这条战略通道命名的。为这条战略通道扼守东大门的，是以河为名的城市——加兹尼。对于这座城市，时政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对中亚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听过一个发迹于阿富汗南部的王朝——伽色尼王朝（相当于中国的北宋时期），这个王朝的首都就是加兹尼。

总的来说，加兹尼的名气并没有坎大哈响，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并

不是阿富汗东南部真正的大门。所谓“大门”，一定要能够将我们指引向另一个重要的地理单元。就兴都库什山脉南麓来说，这个方向就是印度河平原了。坎大哈之所以能够成为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并在 2000 多年前就被亚历山大相中，除了能够为塔尔纳克河谷看守西大门以外，能够就此南下波伦山口也是重要原因。而如果想在波伦山口以外，再寻找一个通往印度河平原的通道的话，我们的视线就必须脱离赫尔曼德河流域了。



赫尔曼德河水系流域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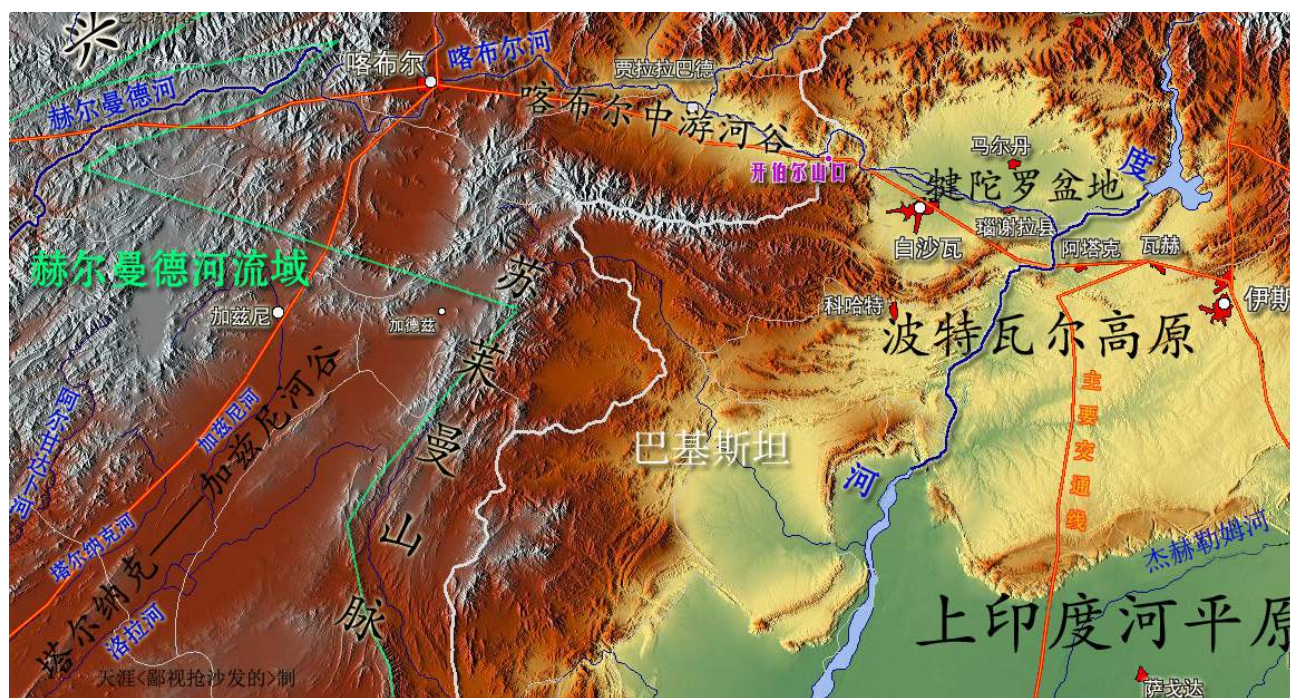
离开加尼兹继续向东的话，河流的流向开始出现了重大变化。既然兴都库什山脉离印度河平原那么近，很难想象这座山脉上的雨水不会为印度河平原的形成做出贡献。这其中最大的障碍，应该就是苏莱曼山脉了。有了这条给伊朗高原东部围边的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南部众多河流的归宿，就只能

是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了。不过，苏莱曼山脉并没有完全封堵住兴都库什山脉与南亚次大陆之间的地理联系。很快我们会看到，苏莱曼山脉的北端与兴都库什山脉东部之间，拉开了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兴都库什山脉东南麓的河流（加尼兹河以东）得以汇集，并最终注入了印度河。这样一条位于兴都库什山脉与南亚次大陆之间的河谷，不仅天然成为二大板块之间的联系纽带；也提供了水源充足，地势相对平缓的低地绿洲，用以战略控制这个兴都库什山脉地区的东大门。至于它的名字，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所耳闻，那就是“喀布尔”。

虽然我们都习惯将“喀布尔”这个地缘标签理解为阿富汗的首都，但事实上，它也是一条河流的名字。一条能够为中亚——南亚交通提供便利的河流的名字。能够借由喀布尔河谷进入印度河平原的旅行者，并不一定要走“塔尔纳克——加兹尼河谷”路线。因为喀布尔河谷所处的位置，正好对应了兴都库什山脉的最薄弱处。那些从吐火罗盆地而来的族群，也同样可以在这个点上寻找合适的山谷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并最终进入印度河流域。当年的亚历山大就这样做了，只不过它的路线有些怪异。为了让波斯帝国最后的希望破灭，由锡斯坦沿兴都库什山脉南麓攻击至喀布尔河谷的马其顿军队，在攻击印度河平原之前，先翻越兴都库什山脉扫荡了吐火罗、

粟特地区（波斯的末代君主逃亡至此）。然后主力再挥师南下，去到印度河平原寻找他们梦寐以求的财富。

真正代表北方势力由吐火罗盆地南下，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喀布尔河谷的，是我们的重点分析对象——大月氏人。大月氏人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中叶开始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并最终建立北至锡尔河，南至恒河的“贵霜帝国”。然而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是大夏或者土著化的希腊人建立了这个帝国。其实要从族群覆盖的角度看，这三个族群应该都参与其间了。毕竟大月氏人是没有可能完全替代原有的土著民族的。但从政治角度看，这次征服仍然可以被视为是大月氏人的征服（参看清朝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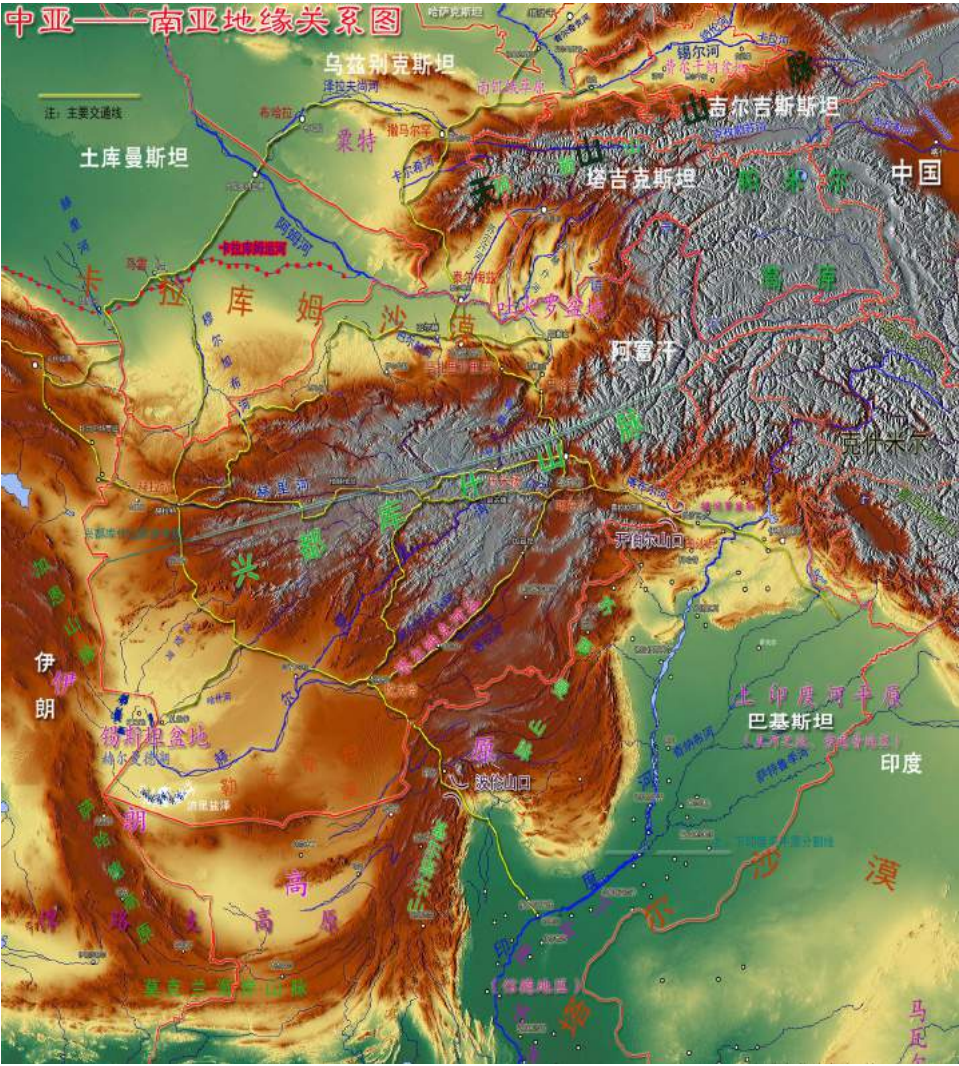


兴都库什山脉主要山口地缘关系图

不管最终建立贵霜帝国的部族在文化上到底认定自己为何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贵霜帝国对印度的渗透，是一次中亚对南亚的征服。在最初来自南俄草原的雅利安人入主南亚次大陆之后（约公元前 1000 年），大月氏人所主导的这次征服，算得上是又一次的地缘大事件了。不过雅利安人凭借先发优势，以及为保障自己民族血统纯净的“种姓”制度，保证了自己印度主体民族的地位没有受到冲击。而类似大月氏人一类的后来者，在衡量过利弊之后，也都满足于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一个掌握实权的“刹帝利”阶层的亚种姓。也就是说，在能够保证获得最高政治权力的同时，并不需要一定要消灭雅利安人文化代言阶层——婆罗门。类似情况，其实在满洲入主中原也发生过。只是华夏体系没有一个这样固定的模式来吸收、隔离不同民族，满洲人最终所做的努力，在三百年后还是付诸东流了。

大月氏人之所以等待了上百年时间才开始南侵，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糟糕的政

治体制。与大部分的游牧民族一样，大月氏人内部也是以部落的形式各自独立存在的，史称“五翕侯”。也就是说，入主吐火罗盆地、粟特地区的大月氏人，内部被分割成了五块(康居内部也有五小王)。一个草原部族内部是否独立成块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这些独立的部落能否因一个强势的核心部落而形成合力。就这一点来说，匈奴人做到了，蒙古人也做到了(他们因此而能够让其他受其统治的部落冠以他们的族名)。而这些各据一片绿洲以自给的大月氏部落，最终也有一个部落做到了，它就是五部之一的贵霜部。



中亚——南亚地缘关系图

的路径攻入印度河平原的，却是有迹可循的。这当中，喀布尔河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至于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径，沿途又有哪些地理单元可以提供战略支撑，我们后面再分析。

贵霜部在崛起并统一其他四部之后，他们的族名便以胜利者的姿态成为整个政权的名称。因此而建立的政权，也就被叫作“贵霜帝国”了。关于在兴都库什山脉以北时，月氏五部之间是如何分割那些绿洲的，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在他们统一在“贵霜”的旗帜之下，开始进入兴都库什山脉之南后，这些即将改变中亚——南亚地缘关系的入侵者，最终是循什么样的

第二十七章 兴都库什山脉南北通行的山口

第一节 昆都士河谷切入喀布尔河谷的山口

以水系来划分兴都库什山脉的地缘结构，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就是包括赫里河、穆尔加布河、昆都士河、科特恰河流等归属于“阿姆河流域”的区域；另一部分则是兴都库什山脉西南部，这一区域的河流最终所注入锡斯坦地区的“赫尔曼德河流域”。最后一个部分，则是兴都库什山脉东南，包括喀布尔河谷及其以东地区的“印度河流域”。如果我们以印度河平原作为战略目标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从阿姆河或者赫尔曼德河流域，转进印度河流域的过程。

对于试图从伊朗高原或者吐火罗盆地进入印度河平原的族群来说，发源于兴都库什山脉中部，位于苏莱曼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东段）之间的喀布尔河谷，会是他们最先接触到的印度河流域的河流。虽然这些入侵者既可以从兴都库什山脉北部翻越分水岭而来；也可以从借由赫尔曼德河流域的“塔尔纳克——加兹尼河谷”绕过兴都库什山脉，切入喀布尔河谷。但就大月氏人来说，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并没有选择与安息王朝硬碰硬，去争夺赫尔曼德河流域那些山麓低地。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路径翻越兴都库什山脉中段，接入喀布尔河谷，距离会更短。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山口，以翻越兴都库什山脉那段海拔 3000 米左右的分水岭。

既然我们认定喀布尔河谷是通往印度河平原的最佳战略通道，并且喀布尔流域所对应的那段兴都库什山脉山体中是最“薄”的一段，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分水线的对面去看看有哪些河流，能够与喀布尔河上游的那些支流对应上。因为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寻找道路者一般会最大限度借助河谷来接近分水线，然后在越过分水线之后尽快转入相反流向的另一条河谷，并最终完成这段山地之旅。以这个逻辑来说，所谓的“山口”，通常就是在无法借助河谷穿越的那条分水线上了。

由于每一条河流的上源都是由不同支流所组成的“伞”状结构，因此从喀布尔河上游的长度来说，它们可以接近分水线的河谷并不止一个。至于这些河谷之北能否出现可供人类穿行的所谓“山口”，就要看它的对面有没有河谷接应了。很幸运的是，在分水线以北，也同样有这样一个“伞”状结构的河流在兴都库什山脉最“薄”处，以帮助来自吐火罗盆地的旅行者接近分水线。这条河流，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昆都士河”。为喀布尔河上游——昆都士河上游诸河谷配对的结果很让人满意。在那段分水线上，我们可以据此找到三个山口，它们由西至东分别是：希巴尔山口、萨朗山口、卡瓦克山口。

从地理结构上来看，中间的“萨朗山口”无疑应该是最有可能成为主通道的路径。



萨朗山口

它两端不仅直接对接相对宽阔的昆都士、喀布尔中游河谷，更处在兴都库什山脉最窄的那个点上。也就是说，无论从距离还是难度来说，萨朗山口都应该有机会成为阿富汗内部最重要的关口。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昆都士——萨朗山口——喀布尔的路线，

也是阿富汗内部沟通南北的主通道。也是中亚——南亚交通的重要路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萨朗山口今日的地缘地位，是在历史中早以得到确认的。因为在整个古典时期，它西侧的“希巴尔山口”所发挥的作用会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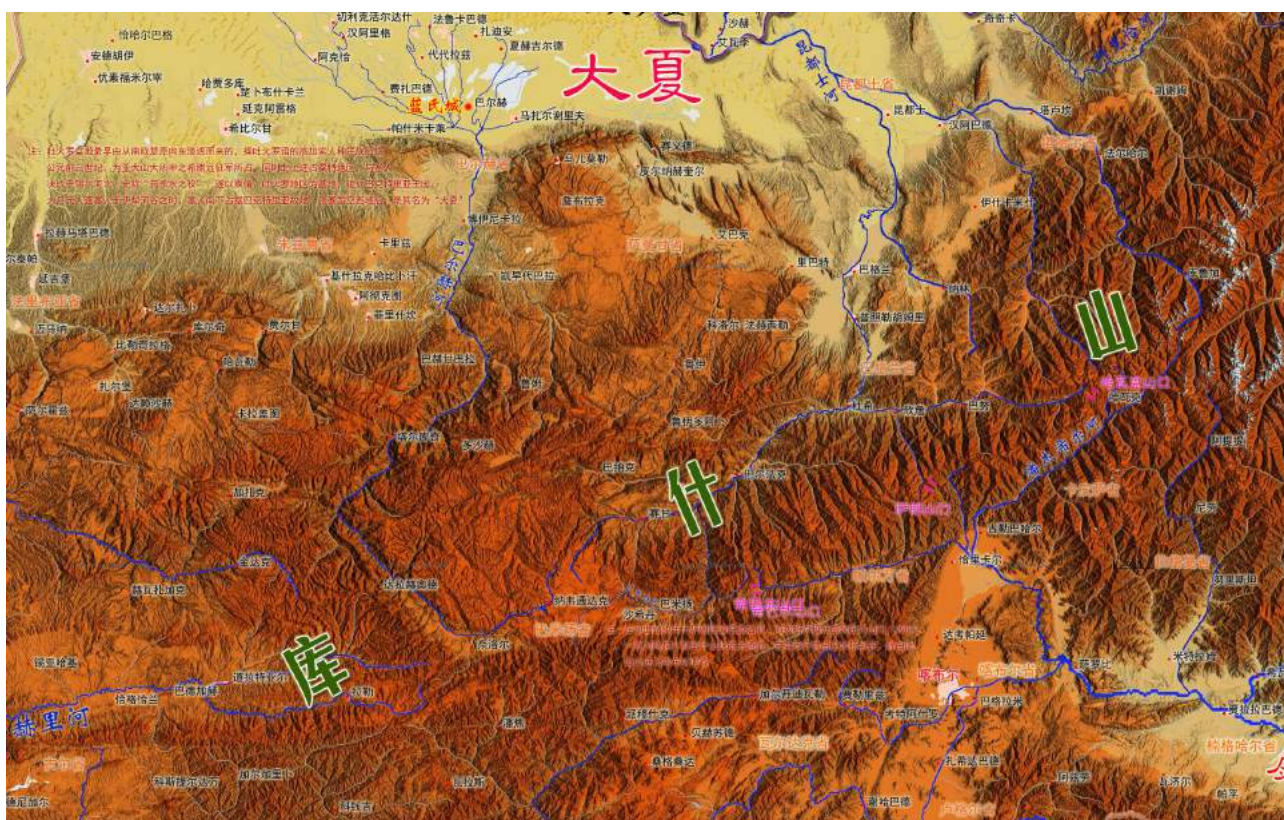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巴米扬和希巴尔山口的区位优势

对于“希巴尔山口”这个陌生的标签，我们还可以引出一个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的地缘标签——巴米扬。“巴米扬”的名字，想必大家都已经听闻过了。2001年3月，塔利班对两座大佛所进行的毁灭性破坏，让世人知晓阿富汗曾经是佛教圣地的同时，也记住了巴米扬这个地方。很难想象，那些被我们看中的，沿兴都库什山脉山麓分布的绿洲政权，会有兴趣在1500年前跑到兴都库什山脉腹地去修建如此规模的巨型佛像。真正能够让巴米扬兴盛的，还应该是它本身的地缘潜力。

从地理角度为巴米扬地区拟定标签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巴米扬谷地。以巴米扬河谷所处的位置和海拔来说，只能说是比周边那些山地显得更开阔、平坦些，本身并不太可能有太大的农业潜力。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游牧经济在巴米扬河谷也还是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对于一个地区的地缘潜力来说，地缘位置永远是最为重要的。如果你的位置足够重要，能够成为物流、人流枢纽，那么其他的资源自然会向此集中，并养活与本身产出不成正比的人口。而巴米扬谷地能够成就辉煌的历史，也正是得益于它的位置。像大多数的谷地一样，巴米扬谷地中也流淌着一条河流——“巴米扬河”，一条最终汇入昆都士河，并走向阿姆河的河流。相比其他隶属昆都士河水系上游，接近分水线的河流，巴米扬河所处的这条河谷，可以算得上是最开阔的了。尽管我们刚才也说了，这并不足以让巴米扬谷地成为一片农业兴盛之地。但在与同级别的那些临近分水线的河谷相比，这一优势还是能够让巴米扬河谷更有

机会兴建城市，成为战略支点的。

尽管我们认为巴米扬谷地的位置，使其有机会承担从昆都士到喀布尔的交通重任。但实际上，这条交通线本身并不会延伸到谷地腹地，也就是巴米扬城所在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这个方位上与喀布尔河上游支流分水的山口——“希巴尔山口”，实际上是位于巴米扬谷地的东侧。越过这个海拔 2987 米的山口，很快就能进入另一条通往喀布尔地区的谷地了。其实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兴建城市总是会倾向于地势平坦，水资源补给方便的地点，并不一定要围绕山口、道路而建。只要城市能够辐射、控制这条通道就行了。当然，稍微绕一点路，到人口聚集的城市进行补给、商业交易的话，也是很好的选择。毕竟想在这片高山腹地中找到一片繁华之地休息一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汉西域全图

仅仅依靠临近一条交通线，对于巴米扬来说，并不足成就它的历史地位，因为在它的东面最起码有两个山口可以承担类似的功能。尽管谷地本身的条件，让它能够有机会成就一个人口相对聚集的战略补给点。但在直线距离上的劣势（不如经萨朗山口的路线），很有可能会抵消掉这点。要想拥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唯有凭借自己本身的结构优势，成为其他翻越兴都库什山脉线路的中继站，以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多方交汇交通枢纽。

那么这样的交通线存在吗？按照之前的分析，由兴都库什山脉北部渗透到南部

的线路，似乎只有两个方向选择。一条是沿山麓绿洲而行，绕锡斯坦、塔尔纳克——加兹尼河谷进入喀布尔地区；另一条则是由北向南，在兴都库什山脉中段翻越分水岭，接入喀布尔河流域。从大的方向上来看，这样说的确没错。但兴都库什山脉西段那些由西向东的河谷本身，也提供了另一种组合方式。那就是利用这些河谷移动到兴都库什山脉中段，然后再寻机进入喀布尔河谷。



中亚——南亚地缘关系图

对于已经进入锡斯坦地区的人来说，一定要在赫尔曼德河流域中，找一条在兴都库什山脉腹地中穿行的河谷东进，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样的走法，在距离上并不比沿塔尔纳克河谷东进缩短距离。不过对于山脉西北部的另一个战略要地——赫拉特来说，意义就大不一样了。因为以赫拉特的位置来说，无论是向东北方向绕经吐火罗盆地，再向南越过分水岭进入喀布尔地区；还是南下锡斯坦，再往东经坎大哈进入喀布尔，都是在绕路。最好的几何路线，是溯赫里河而上，斜插入兴

都库什山脉中段，然后再寻机翻越分水岭。

对于兴都库什山脉北麓沿线绿洲来说，如果不想被占据昆都士河谷的部族雁过拔毛的话，也同样会有另寻路径接近分水岭的想法（比如巴尔赫河下游的蓝氏城）。而不管我们是选择赫里河，还是巴尔赫河谷向兴都库什山脉中段进发，最终都会发现，他们在分水线以北的最后一个补给点，都是巴米扬谷地（只不过赫里河路线要借巴尔赫河上游河谷过渡一下，再接入巴米扬河谷罢了）。在这片谷地中休整之后，很快就可以翻越希巴尔山口进入喀布尔河流域了。上述路线的存在，使得兴都库什山脉西、北麓的绿洲，无论处于政治分裂还是统一状态，要想打通进入印度河流域的商道，都有可能在巴米扬河谷交汇，并使得这个点成为兴都库什山脉腹地的地缘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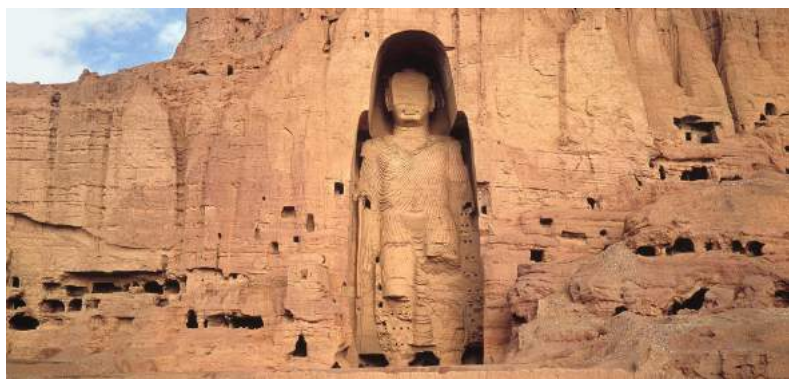
这一点，在当年玄奘西行时就已经有所见识了。只不过，他当年见的大佛是何等胜景，我们今天只能自己想象了。



希巴尔山口



巴米扬谷地



巴米扬大佛（已毁）

巴米扬谷地的地缘位置，固然让它成为西北方向旅行者的必经之地。不过我们前面也说了，就从吐火罗盆地穿越而来的人来说，并不一定非要走巴米扬谷地和希巴尔山口的。尤其是看起来在高山中行进距离更短的萨朗山口路线，应该显得更有吸引力些。然而当年的玄奘还是选择了看似绕道的巴米扬路线。除了他本身想去考察巴米扬的佛教氛围以外，希巴尔山口相对较容易翻越也是重要原因。

以兴都库什山脉的结构而言，整体所呈现的是“东高西低”的走势。这一特点也在喀布尔——昆都士水系配对成功的三个山口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中线的萨朗山口（3660米）、东线的卡瓦克山口（3548米），海拔都要高出西侧的希巴尔山口（2987米）五、六百米。在这种高海拔地区，海拔每高出一米，不仅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体力，也意味着可能面临更恶劣的气候。另外萨朗山口两侧其实是兴都库什山脉中段的核心所在，相比

之下希巴尔山口两侧的谷地则要显得开阔得多。这些因素都使得希巴尔山口和巴米扬谷地，长期成为兴都库什山脉南北交往的主路线。然而这一优势在上世纪中叶被



萨朗隧道



美军在萨朗山口（2011年）

彻底终结了。因为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人类已经可以通过打通隧道的方式来穿越那些海拔过高的山口。在这种情况下，萨朗山口的直线穿越优势（与昆都士、喀布尔河谷三点一线）就显现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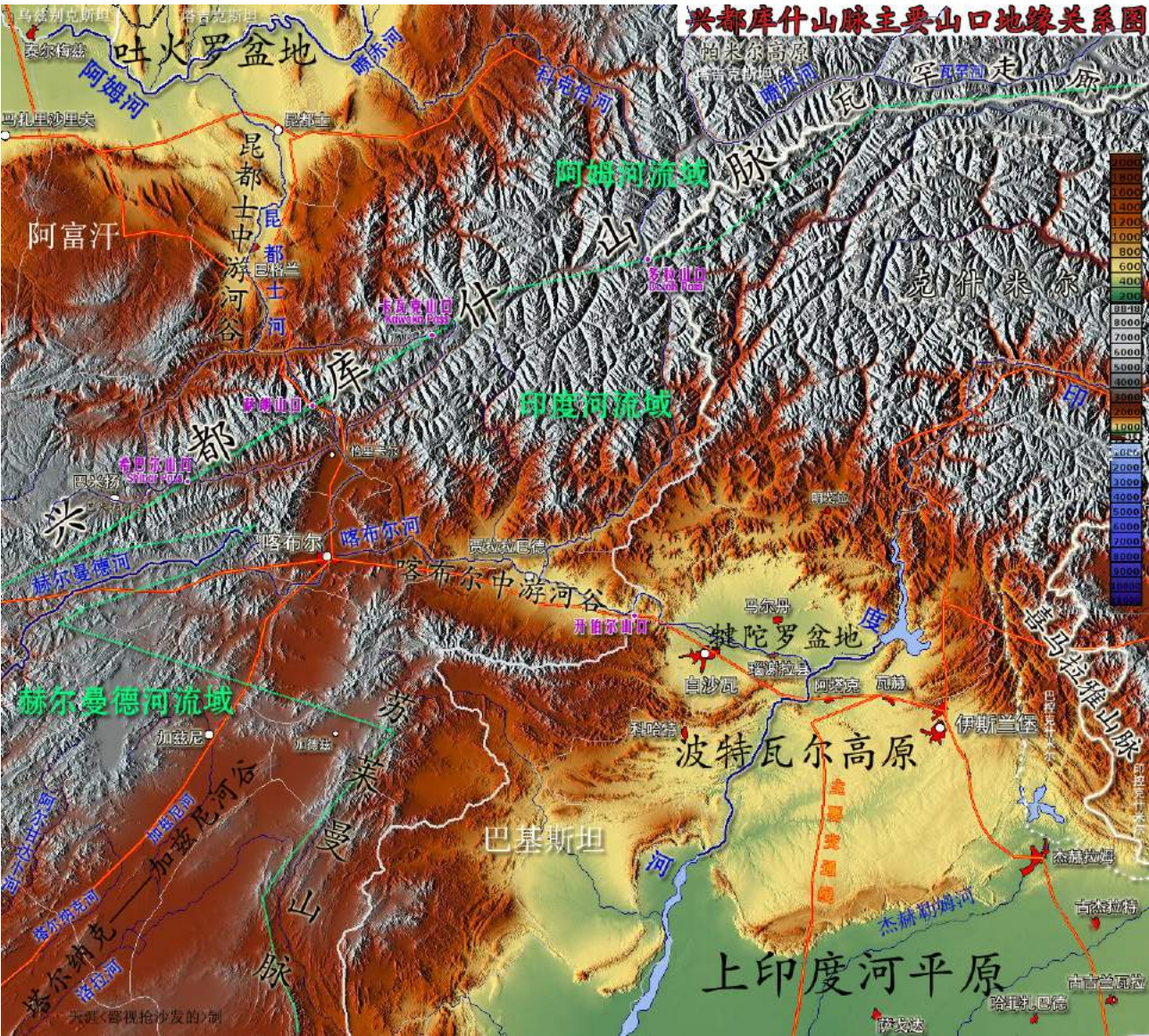
主导萨朗隧道修建工程的是当年的苏联（1964年修建）。只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苏联决定以战争手段教训不再听话的阿富汗之后，萨朗隧道以及南北两端的道路就基本没人再维护了。战争的伤害，以及恶劣的环境（沿途经常雪崩），都让今天再使用这条道路的美国人感到痛苦不堪，以至于将之称为死亡通道。问题是萨朗山口的重要性又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有“控制了萨朗通道，就控制了一半阿富汗”之说。美国人要想维持在阿富汗的影响力，就必须重金维持这条交通要道的通行安全。而如果有一天，当美国无力再在这个帝国坟场中纠缠的话，谁又会对萨朗通道感兴趣呢？

基于阿富汗的特殊位置，以及与中国接壤的现实，估计很多朋友对中国去填补美国战略撤退后的空白很感兴趣。不过

对于中国来说，武力介入应该永远不会成为选项。即使中国不抱着和平崛起的想法，有了那么多前车之鉴，相信也不会有谁头脑一热，把自己陷到这个帝国坟场中去。相比之下，去帮助阿富汗人民修复诸如萨朗公路这样的基础设施，倒是一个双赢做法。正如汉、唐时期，大家都能从丝绸之路的开通上获利一样。

第三节 卡瓦克山口和多拉山口的位置

回到兴都库什山脉山口的问题上来。萨朗山口和希巴尔山口，并不是唯一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山脊的通道。在喀布尔水系和昆都士水系配对的过程中，最起码还有一个山口有机会承担这个战略任务，那就是位于萨朗山口东部的“卡瓦克山口”。如果将萨朗山口视为中点的话，卡瓦克山口和希巴尔山口显得颇为对称。不过就通行情况来说，卡瓦克山口的使用频率应该没有希巴尔山口高。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卡瓦克山口再往东的话，是这个星球上山地最密集，海拔最高的区域。波斯、中亚，乃至欧洲方向而来的商旅，一般情况下没有理由一定要绕远攀高，跑到卡瓦克山口来过境。当然，对于身处吐火罗盆地东部的民族来说，这样一条通道的存在还是有意义的，最起码可以让他们在向南渗透时，有更多的选择。



兴都库什山脉主要山口地缘关系图



潘杰希尔省位置图



潘杰希尔谷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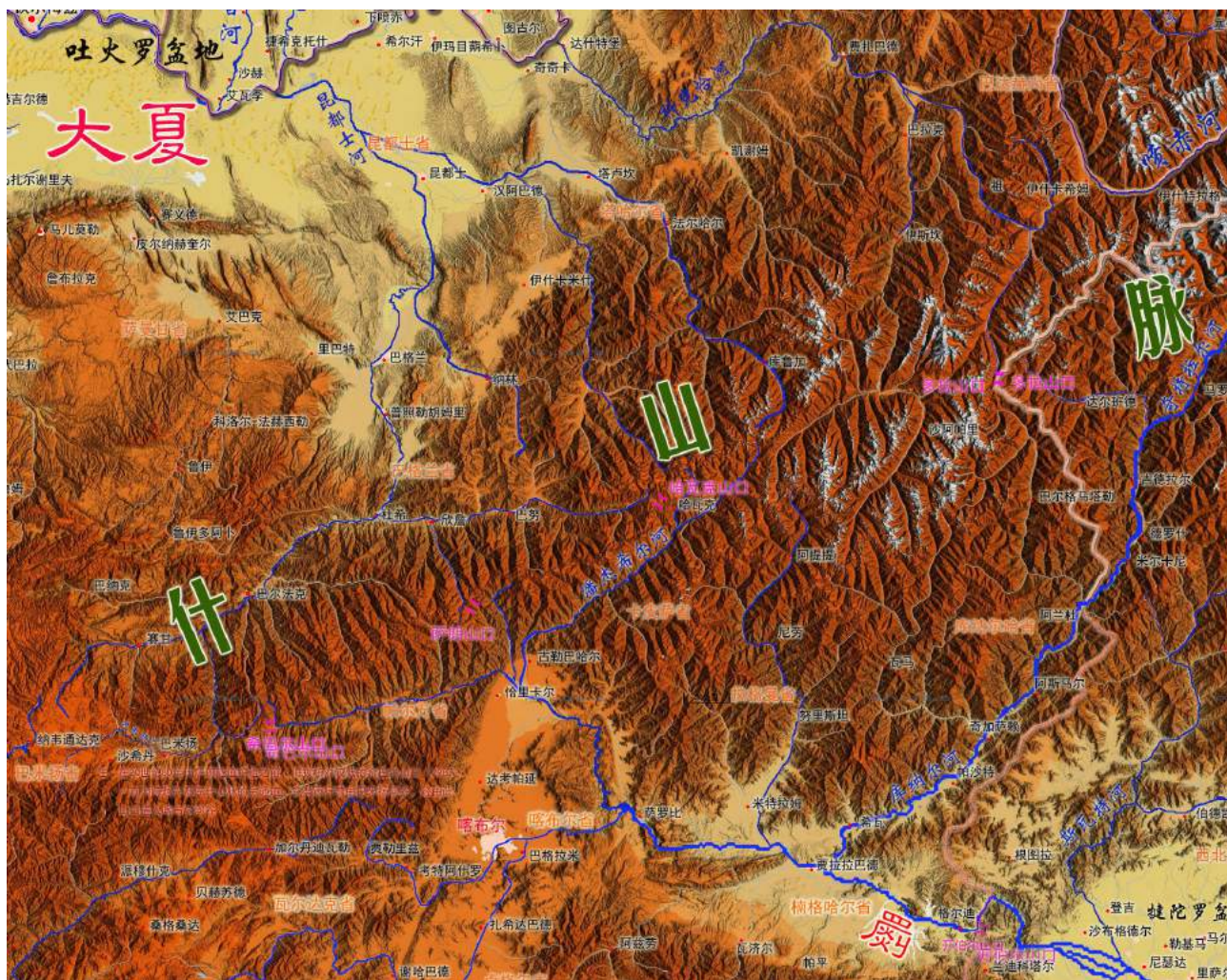
马苏德

以兴都库什山脉南北的族群分布来说，卡瓦克山口对于塔吉克人的意义应该是最大的。因为在以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为代表的中亚突厥民族挤压下，土著的塔吉克人在吐火罗盆地西部已经不能保有优势了。只有像卡瓦克山口这样位置偏东，又不处于各方博弈焦点的通道，才有可能被塔吉克人所真正控制。

卡瓦克通道对于塔吉克人的战略意义，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当时反抗苏联入侵的诸多部族武装中，对苏军杀伤力最大，名声最响的是有“潘杰希尔雄狮”之称的塔吉克人——马苏德。而马苏德的根据地：潘杰希尔谷地，正是卡瓦克山口对接喀布尔河谷的上游河谷，也是塔吉克人在兴都库什山脉分水线之南渗透、覆盖成功的重要成果。当然，同样的，在山南政权占优的时期，普什图人也同样在山北地区谋得了一些重要据点。这种你来我往，大分割下的小杂居现状，也使得阿富汗有机会成为一个统一国家。

塔吉克人之所以能够渗透潘杰希尔谷地，是因为潘杰希尔河其实就是喀布尔河的上游。如果大家想在谷歌地图上搜索“潘杰希尔地区”也很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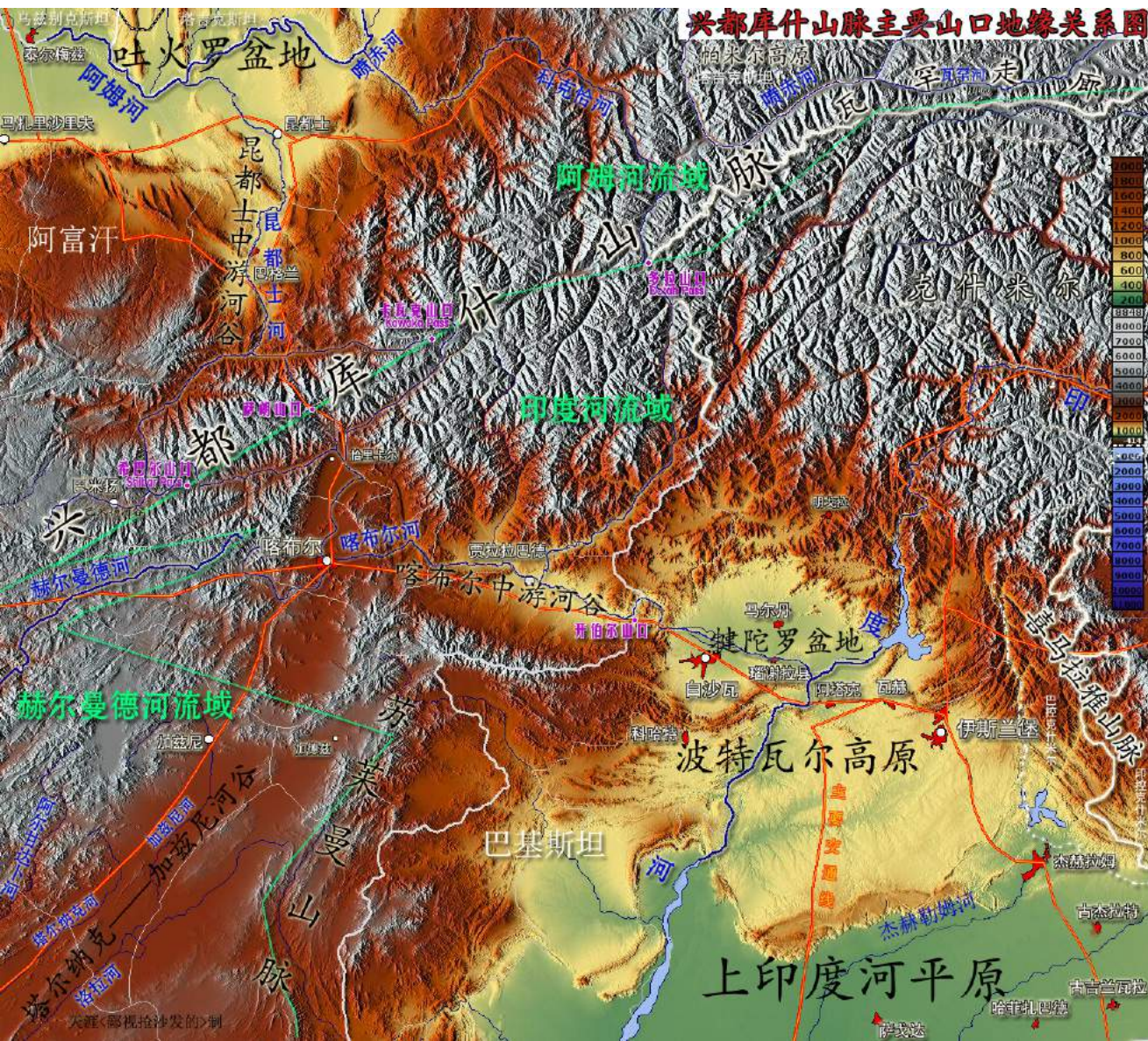
因为也许是为了纪念这位抗苏英雄，在阿富汗的行政版图上，潘杰希尔地区在 2004 年已经从“县”升级为“省”了。从渗透的角度来看，即使塔吉克人无法在萨朗山口及其以西地区占优（那个方向参与争夺的人太多了），他们也可以从吐火罗盆地东部的“老家”，通过卡瓦克山口——潘杰希尔谷地，插入山南的核心区——喀布尔河谷。



汉西域全图

关于潘杰希尔谷地的抗苏传奇，在网上应该可以找得到。只不过，在很多叙述中，潘杰希尔谷地通常被错误的与“萨朗山口”，而不是卡瓦克山口联系在一起，并由此而导出一个结论，认为塔吉克民兵扼守住了苏军的咽喉。其实不论是苏联人还是美国人，都没有失去萨朗通道的控制权。为了维护这条战略通道，苏联人甚至部署了一个师的军事力量以为安全保障。问题在于，潘杰希尔谷地被塔吉克人覆盖的现实，使得北方反抗苏联的部落联盟（除了塔吉克人，还有乌兹别克、土库曼等部族）有了一条绕过主通道，将北方抗苏力量输送到南部，直接威胁喀布尔地区的战略通道。这也使得苏联人无法坐视潘杰希尔谷地的塔吉克游击队存在，并为此而进行了数次

围剿。只不过在这种山地中，土著民族的优势总是更为明显，更何况潘杰希尔谷地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苏联人损失惨重的进攻，不仅成就了马苏德和塔吉克人的传奇，也帮助整合了一个能够和塔利班抗衡的“北方联盟”。



兴都库什山脉主要山口地缘关系图

事实上，卡瓦克山口也还不是从吐火罗盆地方向翻越兴都库什山脉的位置最靠东山口。在它的东面，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线上，还有一个“多拉山口”提供可能的通道。就地理结构而言，我们所说的兴都库什山脉中段，指向的也正是从多拉山口到希巴尔山口的这段山体。与其他三个山口有所不同，为阿姆河——多拉山口连线的，并非昆都士河，而是它东面的科克恰河。至于山脉南面连入喀布尔河谷的，倒还是属于喀布尔河水系。只不过，这条叫作“库纳尔河”的河流（依河而生的行政区，就叫“库纳尔省”），最终注入的并不是喀布尔所在的盆地，而是

位处喀布尔河干流中游盆地区的“贾拉拉巴德”地区。

一般情况下，河谷平原越往下游纵深越开阔，相应的农业潜力也会更大些。我们在地形图上也能感觉到，无论是海拔还是纵深，贾拉拉巴德所在的喀布尔河中游地区，都要比喀布尔地区更有优势。事实也的确如此，除了因位处喀布尔河通道而额外获得的商业利益以外，贾拉拉巴德盆地（行政上为“楠格哈尔省”）也是阿富汗非常重要的灌溉农业区。然而就现实的情况来说，看起来农业潜力不如贾拉拉巴德的喀布尔，才是本地区的地缘中心。这其中的原因无他，就是我们一直所强调的地缘位置。喀布尔四线相交的枢纽位置，使得它更具战略价值。如果“多拉山口——库纳尔河”通道，能够有机会成为兴都库什山脉南北交通的主通道的话，那么贾拉拉巴德倒是有可能显得比喀布尔更有价值。只不过，无论从地理结构还是地缘结构上来看，这样做都没有太大价值。无论是入侵者还是商旅，顺喀布尔河而下，将喀布尔、贾拉拉巴德过一遍都是最佳选择。



贾拉拉巴德与喀布尔河

既然我们刚才把贾拉拉巴德所在的板块，称之为喀布尔河中游地区，那么我们沿喀布尔河而下，挺进印度河畔的旅程应该还不能告一段落了。按正常逻辑，喀布尔河下游与印度河相交的地方，应该有着喀布尔河流域中面积最大的冲积平原。而连接中、下游地区的通道，自然就是喀布尔河了。

喀布尔河下游也的确没有让我们失望，顺着喀布尔河而下，一个体量数倍于贾拉拉巴德地区的标准盆地区——犍陀罗盆地，即将出现在我们眼前。之所以将这个盆地称之为犍陀罗盆地，是因为在我们所解读的时代，大月氏人即将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并以此为中心建

立横跨中亚、南亚的贵霜帝国。而在此之前和之后，这一地区所产生的土著政权就叫作“犍陀罗”。如果我们要用现在地图上能够查到的地名来标示这个盆地，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白沙瓦盆地”。因为当年犍陀罗国、贵霜帝国曾经的都城，就是现在经常出现在时政新闻中的“白沙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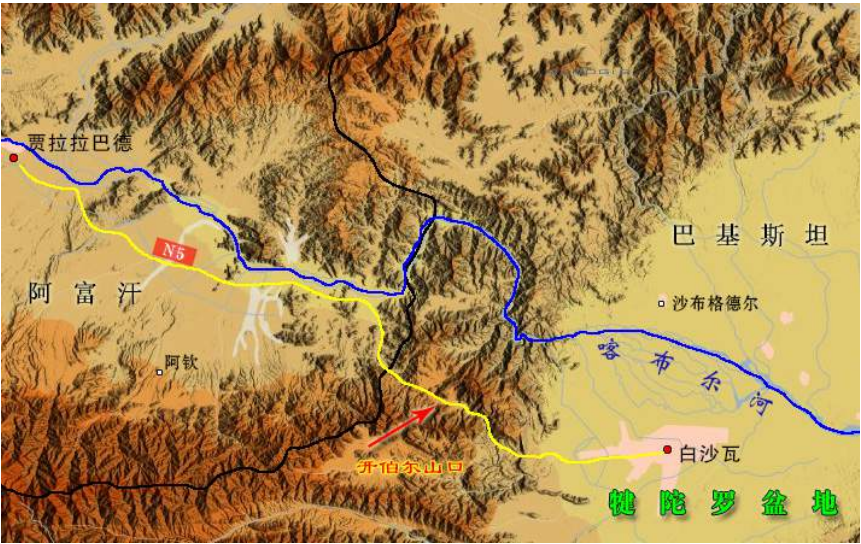
提到白沙瓦和贾拉拉巴德，关心时政的朋友应该马上想到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地缘标签——开伯尔山口了。从喀布尔流域的地理结构上看，开伯尔山口就是连接白沙瓦、贾拉拉巴德盆地的山谷。而放大影响范围来看，这个山口也是伊朗盆地——兴都库什山脉地区与低地属性的“南亚次大陆”之间的分割点。唯一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喀布尔河在中、下游盆地相交的地方，固执的向北在山地中弯了一个几字弯。这使得人们在打通道路时，选择了地势更平坦、直线距离更短的山谷。也就是说，所谓的开伯尔山口（其实是一段山谷了），本身并不是喀布尔河谷的一部分。



开伯尔山口



开伯尔山口绘图



开伯尔山口示意图

开伯尔山口没有在喀布尔河畔，并不影响喀布尔河在串联兴都库什山脉、印度河的过程中，所起的战略价值。正是在它的引导以及战略支撑下，一波又一波的入侵者，才会去试图建立横跨中亚、南亚的帝国。而经过开伯尔山口进入犍陀罗盆地，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已经

站在富庶的印度河平原上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至于为什么，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第二十八章 印度河平原的地缘结构

第一节 波特瓦尔高原上的犍陀罗文化

尽管进入犍陀罗盆地后就马上能够看到印度河了，但这其实还并不算到了真正的印度河平原。因为按照一般规律，在高大山脉和冲积平原之间，通常会有一片海拔介于二者之间的台地以为过渡。在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开伯尔山口所对应的这一区域，苏莱曼脉——兴都库什山脉——喜马拉雅山脉也的确共同延伸了一片高地——波特瓦尔高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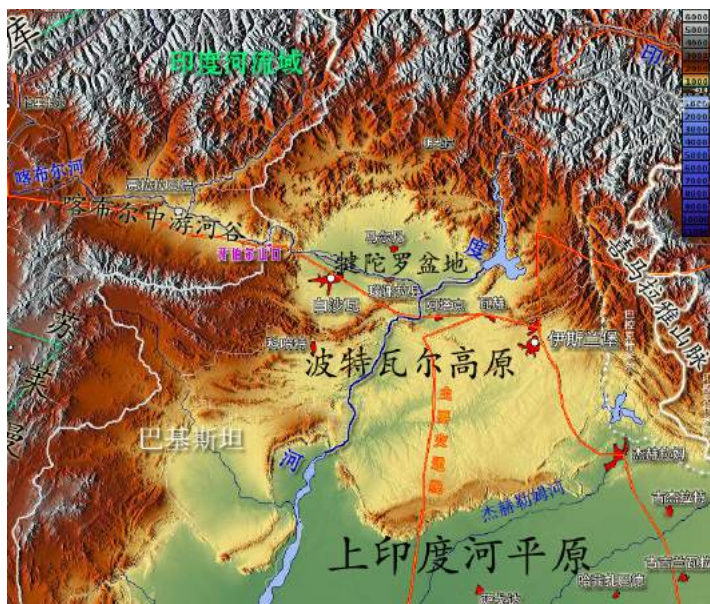
与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这类绝对高度都在千米以上的高原相比，波特瓦尔高原那 5、600 米的海拔，实在是称不上高了，将之命名为高地可能会更合适。不过，面对东、南方向的印度河——恒河平原，这点海拔倒也能够显出优势来了。要知道，印度河、恒河平原的分水岭海拔也不过才 250 米。对于刚从山地中走出来的入侵者来说，波特瓦尔高原的存在，天然让他们获得了一个渗透印度全境的基地。那些从西、北部山地上汇流而下的河流，在最终淤积出印度河平原之前，也在这片高地凹陷处填出了一块块盆地结构的冲积平原。白沙瓦所在的犍陀罗盆地，只是其中最大，位置又最为重要的一块罢了。

研究者认为，犍陀罗作为一个国家，疆域经常在变化。而在亚历山大入侵印度之时，它的都城位置在现在的白沙瓦。其实如果只从政治角度去理解所谓“犍陀罗”的范围，是一定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就像我们去回看中央之国的历史，每一个朝代，甚至每一个朝代内部的不同时期，中原王朝的疆域都在发生变化。好在我们已经抛开这种政治视角，而是从最基础的地缘结构来为中央之国划出了核心区，帮助我们在地缘角度界定了古典时期的“中央之国”的边界，到底应该是哪里。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用在犍陀罗地区的划定上。很明显，以犍陀罗盆地为核心的波特瓦尔高原，就是地缘意义上的犍陀罗地区。

对于很多中国历史的爱好者来说，犍陀罗这个地缘标签并不会感到陌生。因为南亚对东亚影响最大的“大事件”，就是佛教的传入了。而在这场跨越万里的文化传递过程中，最初的起点就是犍陀罗地区。以文化的视角来看，犍陀罗文化实际为希腊与印度文化的混合体。具体到佛教这个载体来说，就是佛像的造型艺术是从希腊方面传承而来的，而教义则是印度土生的。也就是说，中央之国所见到的佛教，是在犍陀罗地区被希腊艺术包装、偶像化后，再顺着丝绸之路传入的。不得不说，这种文化上的融合很奇妙，地中海、南亚、东亚三大文明板块通过佛教的传播，相隔万里的产生了交集。

在这场文化盛宴中，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其实并不是佛教最终能够传播到

中国，而是希腊文化居然在地处南亚次大陆的犍陀罗地区生根发芽了。当然，我们之前已经花了不少笔墨来解读亚历山大那次伟大的东征，相信写到这里，已经没人会真的感到惊讶了。



兴都库什山脉主要山口地缘关系图



犍陀罗佛像

就亚历山大和他的希腊部下来说，尽管东方世界的财富让他们感到眩目。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希腊人在文化上保持优越感。其实直到今天为止，不管我们的自尊心让我们有多么的不愿意承认这点，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在艺术、人文上的遗产仍然在深刻影响着这个世界。在人数远高于自己的被征服民族当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性，是征服者的普遍心态和下意识做法，更何况希腊人很为他们的文化及生活方式感到骄傲。希腊人每征服一个地缘板块，就会在其中建一座希腊化的城市，并从希腊移民，在异国他乡完全复制希腊式的生活方式（那些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就是其中一部分）。当然，以希腊的人口数量来说，并没有办法真的让那些殖民地全面希腊化。他们苦心经营的那些希腊文化，最终只是为土著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些新鲜血液罢了。

如果说亚历山大和希腊人为犍陀罗地区带去了来自地中海的艺术

那么以宗教形式为犍陀地区输入文化的，又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阿育王。作为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阿育王的贡献在于完成了南亚次大陆的第一次政治统一。虽然可能有人会说孔雀王朝最终还是没能统治南亚次大陆的最南端（包括莫卧尔王朝也没有），并据此认定印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统一过。但这个标准有些过于严苛了。要知道，即使我们所认定的那些中国大一统王朝，也并不一定每一个朝代都能完全控有我们所认定的核心区的（更别说那些现在纳入版图的边缘区了）。

好了，印度到底有没有统一过，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重点。不管阿育王和孔雀王朝算不算统一了印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崛起于恒河流域的他们，将希腊人赶出了印度河——恒河流域，并顺势吞并了开伯尔山口两侧从喀布尔河谷到波特瓦尔高原的战略要地。这片原本被北方入侵者用作跳板的土地，也一度成为孔雀王朝的西北屏障。只不过，在中央之国以外的大多数地区，其实并没有将“统一”上升为一种民族意识。孔雀王朝在南亚所完成的政治统一，也只是昙花一现。

当东亚的汉帝国重新完成统一，并开始卧薪尝胆准备反击来自北方的威胁时，印度地区又重新进入了邦国林立的状态。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大月氏人最终得以成为新的征服者，沿着亚历山大和波斯人的足迹入侵犍陀罗地区。并以此为地缘中心，建立横跨中亚、南亚的贵霜帝国。不管是亚历山大还是大月氏人，犍陀罗地区从来都不会是终点。占据这片高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控制高原东、南部那大片的冲积平原。至于接下来会往哪个方向走，我们下一节再分析。

第二节 影响印度河流域伊斯兰化的因素

即使在普通行政地图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出南亚次大陆的范围。而如果从地形的角度来为之划分边界的话。苏莱曼——基尔塔尔山脉、喜马拉雅山脉、诺开——那加山脉，就是这片大陆的三条边。这三条山脉分别将南亚次大陆与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青藏高原，以及中南半岛分割开来，使这个半岛形的地理单元更加有机会自成体系。

通常情况下，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标签就是“印度”。对于那些试图到东方寻找财富的西方人来说，印度的概念更多是一个地缘板块，而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统一的国家。就像他们理解当中的“中国”，其实所指的只是长城以南的东亚核心农业区（直到今天，这种认知也很有市场）一样。鉴于中国、印度两国都是现实存在于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国家，这种认知当然是不能出现在官方语言当中的。不过，如果仅仅是无关现实政治的技术研究，这种认知也不无道理。就像我一向不认为，按照现有版图，一定要将国境线内的所有领土，界定为某个古典王朝时期“中国”的一部分是合乎逻辑的一样。只是为了避免与现实政治发生交集，并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将地缘意义的古典中国称之为“中央之国”会更为妥当。

至于“印度”这个地缘标签，解读起来倒是不用这么瞻前顾后了。除非特别声明，以后行文中所指的“印度”，所指向的就是南亚次大陆上这片拥有独特地缘结构的土地。单从内部地理结构来看，印度形成共同文化背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管在各式地图上，印度的南部一般都会很明显的标明“德干高原”字样，但其实这片高原和与之相邻的其他所谓“高原”，其海拔高度都与我们之前所解读过的“波特瓦尔高原”类似。其5、600米的海拔，并无法使得这些所谓的“高原”成为一个封闭

的地理单元。不过，却也的确有机会让它与北部的平原地带产生一些地缘差异。这种“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地缘结构，反映在具体的“人”身上，就是整个印度南、北方在宗教文化上都隶属雅利安——印度教体系，而在种族上，则呈现“北白南黑”的走势。也就是说，北部最为肥沃的区域主要是被那些雅利安民族后裔所覆盖，而原始土著的后裔则更多被挤压、沉淀于高地之中了。

对于雅利安人和其他向印度渗透的民族来说，如果想成为整个次大陆的主人，在渗透的大方向上一定是遵循着西北——东南的走向。对于他们来说，跨过波特瓦尔高原之后，马上就能面对印度最为平坦、肥沃的土地：印度河——恒河平原，应该说也是一种幸运。只不过，此时的他们需要在战略方向上做出一个选择，到底是向南还是向东？



南亚次大陆地缘结构图

从入侵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最有可能先做的，是先征服印度河流域。毕竟他们入侵印度的主通道——喀布尔河谷，本身就属于印度河流域的一部分。而在入主犍陀罗地区之后，即使想东入恒河平原，也必须经过印度河上游平原（上印度河平原）。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先征服眼前的印度河平原，再向东扩张应该是最为合理的。

探究到底是先征服印度河平原，还是恒河平原，似乎并没有太大意义。毕竟在我们看来，那些骑马而来的北方民族在这种一马平川的平原上攻伐，应该没有太大难度。不管先征服这片新月形平原的哪一部分，都很有机会建立一个覆盖印度北部

与中亚、中东，包括东亚的“两河”有所不同，印度半岛的这两条河流并非平行而是“八”字形走向。其中西侧的印度河由北向南流向了半岛西侧的阿拉伯海，北侧的恒河则由西向东注入了半岛东侧的孟加拉湾。而这两片平原的距离是如此的接近，以至于如果不看河流走向的话，我们甚至无法确知双方的地理分割点在哪里。从

的王国。也就是说，印度河——恒河流域统一在一起的可能性，应该要高于它们各自与南方那些高地结合在一起。然而从现实的地缘政治结构来看，恒河流域（下游三角洲以外）则是与半岛南部那些高地在一起，组成了现在的“印度”。而大部分的印度河平原，则成为了巴基斯坦的核心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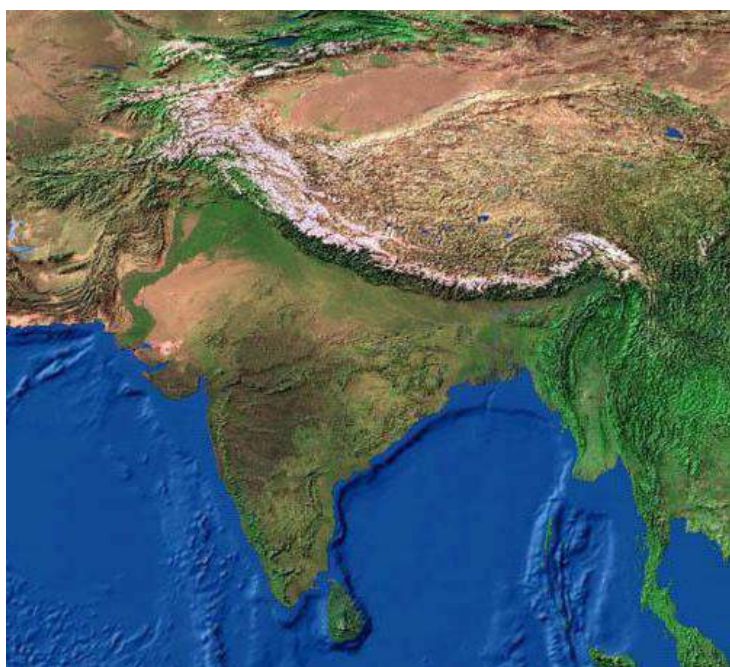
按照我们几十年来被灌输的思维逻辑来看，印巴分治这笔账显然是要算在帝国主义的英国身上了。正是这个居心叵测的老大帝国不甘心退出这颗“英国女王王冠上最耀眼的宝石”，才会造成今日印、巴对峙的局面。然而回顾当年和现实的地缘结构，我们会发现这种设计其实只是在顺应英属印度原有的格局。因为此时的印度河流域已经在地缘文化上发生了第二次质变：伊斯兰化（雅利安——印度教体系的建立，是印度的第一次质变）。

虽然在很多国家都会有一定范围的穆斯林聚集区，但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人口过亿，拥有独立地理单元，且背靠伊斯兰国家的区域会不产生分离思想。即使没有英国人当年从中主持，分裂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了吗？假设历史，更多的是拓展一下思维。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为什么印度河流域会出现伊斯兰化的现象。从地理角度来看，这似乎并不难理解，因为整个印度河流域本身完全处于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侧面。无论是同时从开伯尔山口、波伦山口渗透，还是先占据了上印度河平原，再顺流而下控制下印度河平原，在整个中亚、中东都已经伊斯兰化的情况下，那些入侵者将会一次又一次的将伊斯兰文化带入与之地理接近的印度河流域。只不过，仅仅是地理接近而导致印度河流域伊斯兰化的理由，似乎过于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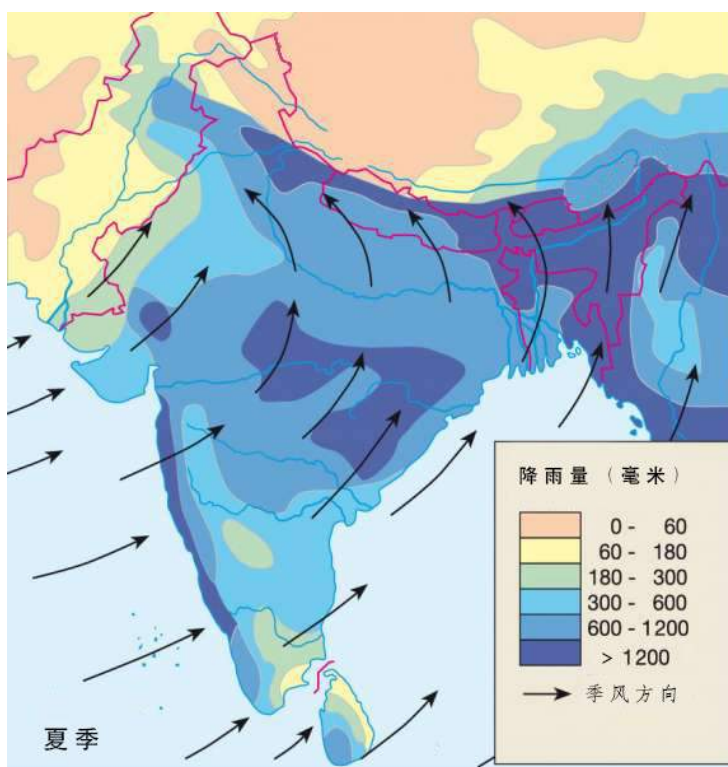
以我们在东亚的经验来看，一片土地是不是能够被华夏文化所覆盖，应该与它本身的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气候、地势能否支撑大规模农业生产，是其中最重要的标准。不过这一标准，在印度半岛似乎却并不适用。因为无论是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还是地势略高的南部高地，大部分土地都很适合发展种植业（现代印度的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0%）。不过当我们再仔细分析三大板块的气候时，就会发现一条与现代巴基斯坦、印度国境线高度吻合的气候分割线。而这条分割线，才是造成陆地渗透的伊斯兰文化止步于印度河流域的根本原因。

这条分割线我们可以称之为“季风线”（参见《南亚次大陆地缘结构图》）。季风线以东部分，除了也被划入“南亚”板块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地带属于特殊的“高原——高山气候区”以外，整个恒河流域以及南部地区都属于降水充沛的热带季风区，而印度河流域则属于降水稀少的“热带草原——沙漠气候区”。

关于季风区的概念，我们在以前的内容中已经多次涉及过了。简单来说，季风是“以年为周期的，风向随季节变化显著的大范围对流现象”。其特点就是夏季由海洋向大陆输送湿润水气，而冬季气流则是由大陆往海洋方向运动。对于身处太平洋季风区的我们来说，理解这点并不难。在东亚的表现就是夏季温润的东南风和冬季干冷的西北风，周而复始的伴随着四季的轮回。至于印度半岛，为它带来大面积



南亚次大陆卫星图



南亚次大陆夏季季风与降雨量图

降水的季风，则是来自西南方向，被称之为西南季风；相对应的，冬季由陆至海的季风，则为东北季风。对于东亚来说，这种“雨热同期”的规律恰到好处，能够让同时需要光照和淡水补给的农作物鱼和熊掌兼得。至于在纬度已经完全处于亚热带、热带的区间，几乎没有霜期的印度来说，对雨热同期的要求倒并不十分在意（所以全境耕地基本都能一年两熟甚至三熟）。

然而对于生活在印度半岛的族群来说，在生活和农业生产中，是否有大规模降水的“雨季”，其地缘影响却非常大。在人类的迁徙过程中，与自己原居地气候类似的区域，总是会更容易吸引他们的脚步的。试想一下，那些从亚洲中、西部渗透而来的民族，在从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下来进入印度河流域之后，已经适应了干旱气候的他们，在环境上并不会感觉到不适。而当他们希望进一步渗透恒河平原、德干高原等地理单元时，这种环境上的不适就会对自己的生活习惯造成很大影响了。从个人甚至族群的角度来看，你当然可以选择改变去适应新的环境，不过这也意味着“人”的地缘属性发生了根本

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占据印度河、恒河流域的族群在种族上是否相似，二者之间截然不同的气候环境，都有可能使得两地的居民产生族群认同分化。

如果没有外部强势影响的话，印度内部环境差异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可能只是会停留在类似中国的所谓南方人、北方人之分的级别上（毕竟在生产方式上，印度河、

恒河流域都还同是农耕区)。不幸的是,在伊斯兰文化全面覆盖亚洲西部、非洲北部降水稀少的干旱地区之后,南亚次大陆西侧这块同样干燥的区域,不仅一如既往的成为北方入侵者最容易渗透的区域,在文化上也同样不再具有同化对方的优势了(这种情况在中央之国也同样发生)。最终体现在地缘政治中,就是伊斯兰化的巴基斯坦从“印度”的概念中分裂出来。

第三节 印巴两国分割上印度河平原

既然印度河流域在气候上是如此的干燥,几乎没有从印度洋季风中得到任何好处。那么这片土地又是怎么养活了将近2亿人口,又是如何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就成就了灿烂的印度河文明的呢?这个地球上最早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地区是两河流域,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这个结果更多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考证出来的。不过,纯粹从地缘角度来看,这个结果也是可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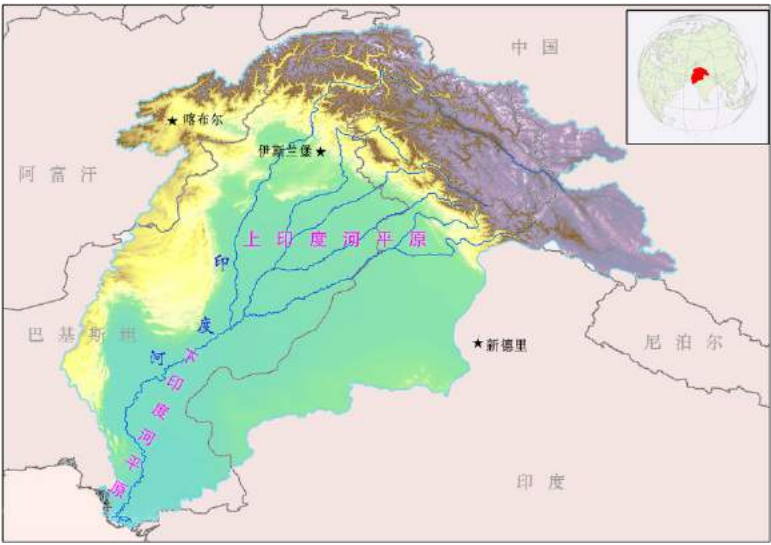
尽管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需要为水资源日趋紧张的现状而烦恼,但对于上古时期的人来说,一片土地上的自然降水太多却并不是好事。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出来的人工河道必须考虑到双重功能:导洪和灌溉。而这种复杂性也势必会迟缓大规模农业开发的进度。当生活在东亚季风区的华夏先人正在因每年必至的洪水问题,而苦恼无法利用河流下游那些面积庞大、土壤肥沃的冲积平原时(所以才会有大禹出现),亚洲西部那些无法被季风照顾到的地区,反而因为干旱的气候获得了先发优势。稀少的降水,使得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居民们,在洪水问题上所面临的压力要小得多。整体环境的干旱,又让他们有足够多的土地来调节那些高原来水。

在这种客观环境影响下,人类悟到利用灌溉技术来发展农业要容易得多。与此同时,比东亚、西欧这种高纬度地区更多的光照时间,也使得类似两河平原这样的低纬度地区,在发展农业技术上拥有更高的效率。因为,在高纬度地区,你今年犯的错误可能要到明年才能够改进;而低纬度地区发展种植业,却可以在同样的时间里做更多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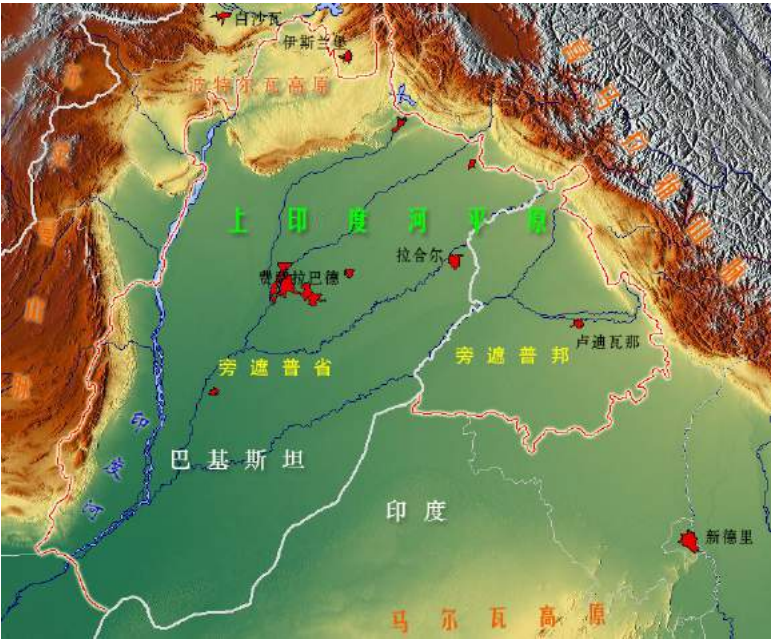
当两河流域发展出来的灌溉技术开始向外传播时,那些与之地理接近、气候相似的地区就会最有机会做第二个吃螃蟹的人。当然,这些试图复制两河经验的地区,也同样必须与高地相邻,能够有河流将那些高地之水带入这些本来应该草原化或者沙漠化的土地上来。基于这些条件,有埃塞俄比亚高原补给的尼罗河下游地区;以及背靠青藏高原的印度河流域,很快也发展出了农业文明。

如果没有青藏高原之水,仅凭借季风所带来的雨水,恒河流域也还是有机会成为农业兴盛之地的。但如果没有上游来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印度河平原就应该是一片荒漠之地了。不足250毫米的年降水,最多只能帮助这片土地滋生一些脆弱的草场。然而,青藏高原的存在却改变了这一切。这座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高原,只是

对印度河流域开放了部分集水区，就已经足以提供两倍于尼罗河，三倍于底格里斯河 + 幼发拉底河水的水量了（所以巴基斯坦人口比埃及 + 伊拉克还要多）。几乎完全依靠上游高地补水的现状，也使得印度河平原出现了与季风区截然相反的结构，那就是上游的河流灌溉平原的面积要大于下游平原。在花了这么多时间解读中亚的情况下，相信大家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不会意外了。那些紧邻山麓的冲积扇地区，才是整个流域当中最具开发潜力的地区。



印度河流域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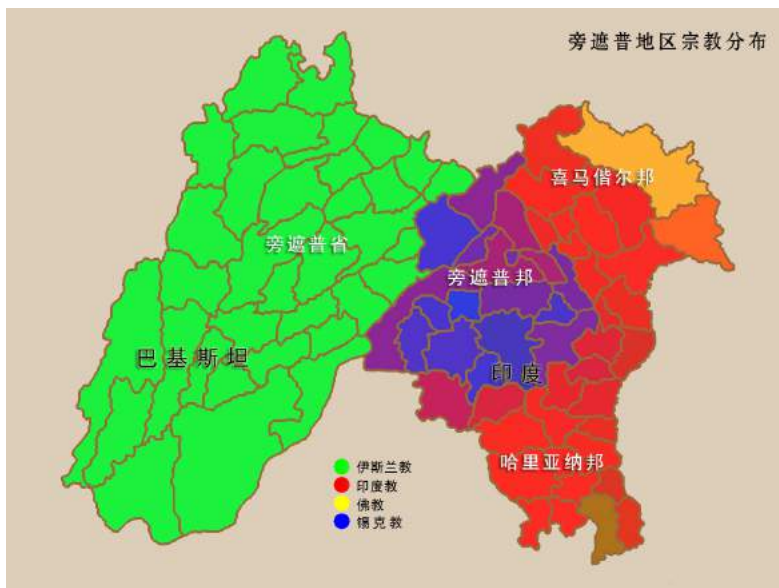
印度河上游平原示意图

最先接收上游来水的印度河平原，我们称之为“上印度河平原”，或者“印度河上游平原”。相对应的，下游地区就是“下印度河平原”或者“印度河下游平原”了。与其他山麓冲积扇地区一样，上印度河平原实际也是由多条河流共同冲刷而成的。只不过，这些河流最终都会汇集到一起，我们又会选取其中最长、最大的一条，认定为干流罢了。以这个标准来认定，整个冲积扇水系中最靠西侧那条，也就是在犍陀罗地区接受喀布尔河补给的这条河流，就是印度河干流了。而上印度河平原与下印度河平原的分割点，自然就是印度河与它左岸支流的会合点了。

这些呈扇形分布，直接确定上印度河平原范围的河流中，体量较大的大约有五条，因此入主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也将上印度河平原叫作“五河之地”。至于这五河到底指向哪五条河流，我们就不考证了（因为河流的结构在变，现在跟三千年前会略有不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到地图上去找。不过相比“上印度河平原”、“五河之地”这两个指向地理结构的标签，“旁遮普”这个地缘标

现在跟三千年前会略有不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到地图上去找。不过相比“上印度河平原”、“五河之地”这两个指向地理结构的标签，“旁遮普”这个地缘标

签的名气要大得多（旁遮普在印地语中就是五河之意）。因为无论是对于印度还是巴基斯坦来说，旁遮普都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也就是说，在印巴分治时，巴基斯坦其实并没有得到所有的上印度河平原。以至于今天在两国的行政版图中，都有叫“旁遮普”的行政区。只不过巴基斯坦境内的叫“旁遮普省”，印度境内的叫“旁遮普邦”罢了。



旁遮普地区宗教分布图



锡克人

自于这个独特民族。那些在租界中执勤的锡克警察，让当年的中国人误以为所有的印度人都长得很高大、蓄着大胡子，包着红色的头巾（所以才有“红头阿三”之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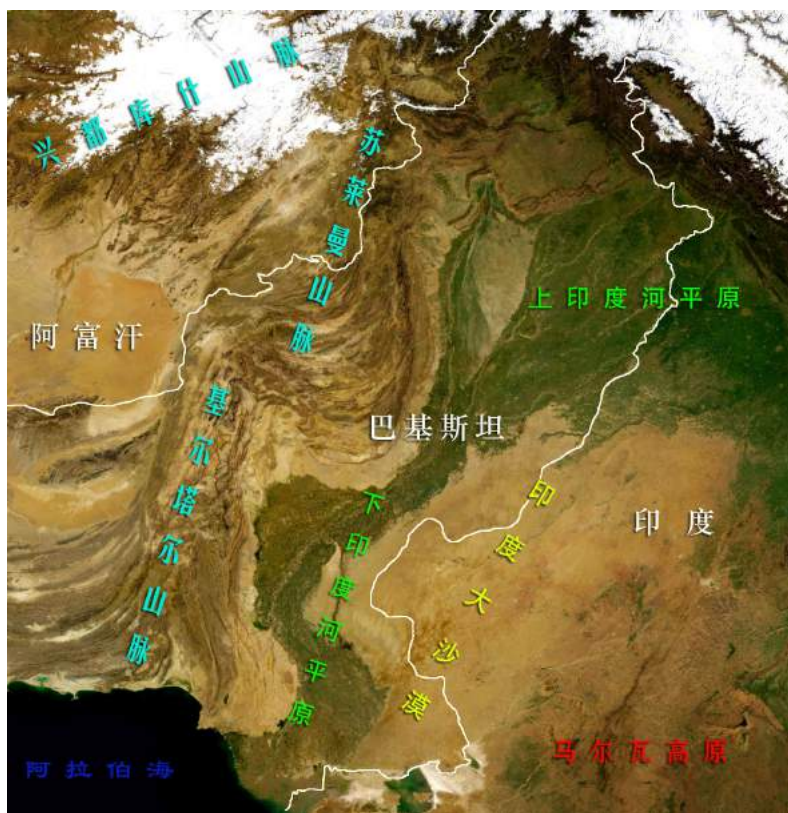
从印巴分治的表面标准来看，印度得到部分旁遮普地区的领土，是因为在旁遮普的东部生活着一个介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民族——锡克人。其实从地缘角度来看，锡克教的产生，正是南亚土著的印度教与由中亚、西亚渗透而来的伊斯兰碰撞的结果。对于身处两大宗教结合部的土著居民来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要么选择坚守印度教信仰，要么被动或主动的归化于伊斯兰教。然而也会有一些人既

对印度教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种姓制度感到反感，又对伊斯兰教缺乏包容性的思维方式嗤之以鼻（两教的不足，又恰是对方的优点），并因此而试图创立出一种兼具二者优点的宗教。这个宗教就是“锡克教”，信仰这个宗教的人就是“锡克人”了。

要想在两大宗教之间自立门户（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伊斯兰教），锡克人能够生存下来，并坚守住自己的信仰，军事化是在所难免的。这一点，也被后来的英国殖民者认识到了。对于殖民地遍布全球的大英帝国来说，尚武而又忠诚的锡克人，是他们在印度最喜欢征召的民族。而近代中国对于印度的印象，其实也很大程度源自于这个独特民族。

从地缘结构来看，锡克人在上印度河平原东部的强势存在，无疑在客观上成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缓冲者。只不过，基于他们的地缘位置以及有限的人口数量（现在大约 2000 万人吧），独立建立政权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此在英国退出南亚，准备以宗教为标准分割“印度”时，并没有为锡克人设计一个独立国家。而如果必须在印、巴之间做出选择的话，留在态度更为包容的印度教国家，会是更明智的选择（在锡克教创立、延续的过程中，与当时统治印度的穆斯林不知道进行过多少战争）。而这种选择，最终也让印度得以将触角伸入了富庶的上印度河平原。

其实就上印度河平原与恒河平原几乎无缝对接的结构来看，一定要遵循分水岭原则在印、巴之间划出一条合乎地理逻辑的国境线来，本身就比较难。即使没有锡克人的存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这一区域也同样会呈现犬牙交错的情况。相比之下，下印度河平原的地缘结构就要显得简单得多了。因为这片地势平坦之地，并非全部都是富庶的冲积平原。那些从北部山地汇流而下的河水，到了下游地区已经呈强弩之末了。在整体干旱少雨的环境下，一旦上游来水受到自然或者人为（上游的灌溉用水）影响，印度河下游的灌溉区就会减少。那些无法被印度河水滋养的土地也就有可能荒漠化。



巴基斯坦卫星图

之古典时期要更大，环境更恶劣。

尽管印度大沙漠的存在和扩大，让南亚次大陆少了一块面积不小的产粮区。但

如果印度河注定无法滋养全部的下游平原，那么最有可能荒漠化的，就是印度河的右岸地区了（左岸还可以从基尔塔尔山脉补水）。而在现在下印度河平原与印度半岛南部高原之间（具体的是马尔瓦高原），也的确生成了一片将近 60 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印度大沙漠（塔尔沙漠）。我们很难明确印度大沙漠到底是什么时代形成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人类对印度河流域的开发，最终能够滋养这片低地的水资源总体是呈减少的趋势。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印度大沙漠地区，比

它也天然成为印、巴两国，或者说印度教、伊斯兰教两教之间的缓冲地。在这样一片荒漠之中，即使是以几何原则拉出一条直线做国境线，所需承担的风险也要远小于印度河、恒河平原无缝对接的北部地区。



印度大沙漠

当然，如果有一天印度大沙漠获得了充足的补水，成为一片富庶的产粮区。也许印、巴两国的南部边境也将成为地缘博弈的焦点。不过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现在肯定还不会想到那么远。对于他们来说，五河之源才是地缘博弈的重点。在技术不发达的古典时期，你当然可以放心的经营河流下游的冲积平原。

而在工业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仅仅掌握下游平原，而放任上游高地集水区落入他国所产生的地缘风险，相信已经有 N 多教训供我们参考了。

对于印、巴两国来说，共享上印度河平原的结果就是，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放弃印度河上游集水高地。至于这片高地所处的位置，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它就是“克什米尔”。虽然当年在国际部分，我们从分水岭及战略安全的角度对克什米尔地区做了很详细的分析，但由于没有对印、巴两国核心区的地缘关系做出过解读，所以也没有具体从“水”的角度切入过。

然而现在仍然不是再次解读克什米尔的好时机。因为在这片至今仍然被视为热点地区的土地上，并非只有印、巴两国参与博弈。已经强势扩张、消化西域及青藏高原的中央之国，也同样是克什米尔问题的重要参与国。不过我们并不需要改变这一阶段的历史背景，将对克什米尔的解读变成一个时政解读。因为在张骞所处的时代，他所引领开辟的丝绸之路，最终也指向了克什米尔。有鉴于此，是时候回到张骞从匈奴人手中逃出来的时间点上，去探寻张骞真正用脚丈量过的“丝绸之路”了。当张骞的脚步无限接近这片三国相交的山地时，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